

雅众·音乐系列

Is This the Real Life?



The Untold Story of

QUEEN

[英] 马克·布莱克 著
席虎牙 译

狂想人生： 皇后乐队传

2019 奥斯卡四项大奖获奖影片 —————
《波西米亚狂想曲》传主乐队音乐传奇

狂销 3 亿张唱片、揽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入选摇滚名人堂和词曲作者名人堂
著名音乐记者布莱克权威传记 | 呈现史上最绚丽、最动听、最直击人心的传世经典

生活不是玫瑰铺就，它的航行并不愉悦 | 无暇理会败者，我们是世界的冠军

目录

[第一章 美丽的人们](#)

[第二章 你体验了吗？](#)

[第三章 幸运的巧合](#)

[第四章 奇异的颤音](#)

[第五章 那帮蠢货们](#)

[第六章 秃鹫的胯裆](#)

[第七章 嘞——嘞——嚓！](#)

[第八章 一山有四虎](#)

[第九章 高耸的假胸](#)

[第十章 晚安，好梦](#)

[第十一章 库藏的名车](#)

[致谢](#)

[译后记](#)

第一章 美丽的人们

你跟那个死基佬讲，这将是历史以来最牛逼的事情。

——鲍勃·格尔多夫说服皇后乐队参加“拯救生命”（Live Aid）援助非洲大型慈善摇滚演唱会

你好，世界！

——“拯救生命”温布利球场现场，观众打出的横幅

我必须赢得观众的心，这是我的责任。那完全是一种掌控的感觉。

——弗雷迪·莫库里，1985年

1985年7月13日，正值老牌摇滚明星们日子不太好过的时期。他们很多成名于六七十年代，眼下靠往日的辉煌和粉丝的非理智崇拜度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摇滚明星退休这种事，彼得·汤申德^[4]年轻时的使命宣言“希望我在变老前死去”就显得十分应景了。

这一天，“拯救生命”大型摇滚演唱会在美国费城和英国伦敦同时举办，各个年代的乐手们齐聚一堂。演出的共同目标是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赈灾筹集善款，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意义：仅在伦敦温布利球场就聚集超过8万观众，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电视直播，无论演出好坏，都有超过4亿人实时见证。在观众捐款总计1.5亿英镑以帮助非洲饥民的同时，表演者们或许会成就美名，也可能颜面尽失。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全球观众将看到准备不够充分的鲍勃·迪伦、未能激起人群热情的齐柏林飞艇乐队^[5]，以及宛如两只孔雀抖动尾羽般争奇斗艳的米克·贾格尔和大卫·鲍伊。^[6]“拯救生命”将成为彼时还是新人的麦当娜、U2乐队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但对亚当·安特、霍华德·琼斯或汤普森双子乐队^[7]的青史留名就没什么帮助了。即使是对当时极受追捧、已拿到多个白金唱片销量的恐怖海峡乐队^[8]和菲尔·柯林斯来说，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盛事了。

群英荟萃的演出阵容中，有一支成立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的摇滚乐队。乐队的成员都是千万富翁（作为全英国赚得最多的公司董事，载入

198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已经拿下数量多到令人生畏的金曲和热门唱片，其风格不断变化，包含摇滚、流行、放克、重金属等等，甚至还有福音音乐。虽然有超凡的现场演出名声在前，但就算是他们最死忠的粉丝也预料不到今天会发生什么。

下午6点44分，乐队上场前，由喜剧明星梅尔·史密斯和格里夫·瑞思·琼斯串场报幕。史密斯扮成一个打官腔的警官，琼斯扮成他的倒霉搭档。相声很简单，官方对“屁民”，两人的段子——“有人跟我们抱怨（这场演出）噪声太大了……这位女士住在比利时”——有助于活跃观众气氛，不过他们几乎被身后演出的工作人员最后调试设备的声音淹没了。终于，史密斯摘下警帽夹在腋下，站好立正，像行礼一样有请“女王陛下……皇后乐队！”。

事后采访时，“拯救生命”的组织者鲍勃·格尔多夫会试图去描述这四个天赋异禀的人。在“拯救生命”的舞台上，正如格尔多夫所说，他们看起来“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不像摇滚乐队的样子”。

约翰·迪肯（格尔多夫称他为“缄默的贝斯手”）让自己站在舞台的后部，靠近鼓台的地方。尽管顶着明星才会有的一头蓬松卷发造型，他看起来似乎更像本来要成为的电子工程师——假如没搞音乐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参加演出的乐队站成一排与前来观看“拯救生命”的王室成员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见面，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皇后乐队粉丝很困惑，为什么本该站着约翰·迪肯的地方，却站着一个可能是他们巡演工作人员的路人。“我太腼腆了，不敢去见戴安娜王妃。我觉得我要出丑的。”他后来承认，确实是派了自己的工作人员斯派德代班。

布莱恩·梅，他那又瘦又高、微微驼背的“祈祷的螳螂”体格和浓密卷曲的黑发（“嬉皮士吉他手”，格尔多夫说），似乎从乐队创立起就没有变过。梅的摇滚吉他英雄形象下带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学术气质，对于这位理科学士、曾经的数学老师来说，吉他演奏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年轻的时候，他会像个网球运动员争取赛末点一样，在专注的时候对自己低声碎念。

与此同时，你可能会想，罗杰·泰勒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堆架子鼓后面度过，他是否会感到沮丧呢？拥有那么漂亮的金发和秀美的容颜（为此他曾经留过胡子为了不让别人再误会他是美女），私底下喜欢开跑车和泡模特，泰勒无疑是乐队里最像明星的人了。最近几年，他的低音大鼓鼓皮上印着一张自己的脸部特写，即使你买最便宜的座位都不会错过

此场景。虽然泰勒本人经常坐在鼓的后面不被看到，但他却不可能不被听到：他那独特的、沙哑而高亢的伴唱是构成皇后乐队声音的重要元素。

不过，无论三位队友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分钟里做什么，那位被格尔多夫称为“惊世骇俗的主唱”的弗雷迪·莫库里都将成为全场的中心。最初，莫库里曾是一朵华丽摇滚的繁笺花，现在却大大不同。他剪短的黑发光亮服帖地梳往脑后，曾经由桑德拉·罗德斯^[4]为他设计的飘逸绸缎戏服，换成了简单的白背心和紧身的浅白色牛仔褲。

多年来每次谈到性取向时，莫库里总是和媒体捉迷藏，但这时他的形象显然是美国同性恋圈流行的“卡斯特罗款”造型。点睛之笔还包括箍在右手上臂的一个铆钉臂环，以及标志性的上唇一字胡须——几乎正好掩盖了他稍微突出的牙齿。莫库里轻快地跑步上台，略显夸张的步态仿佛是一位正在追赶公交车的芭蕾舞者。

也许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音乐行业大咖或真人秀评委很难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三十八岁中年男人作为世界级巨星的概念。然而，在未来的很多年里，莫库里都拥有着超越时代的、与现在的后起之秀们旗鼓相当的共同点。在“拯救生命”发生的许多年前，那个怀着音乐梦想的艺术生，原名弗罗可·保萨拉的年轻人就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当明星”。当时几乎没人相信他。

尽管乐队一直保有坚定不移的自信，他们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来的观众并不都是他们的乐迷。于是，一些同行采取的草率做法就不是他们的行事方式了。他们进行了四天的密集强化排练，按每个乐队只有二十分钟的设定充分利用到最后一秒，并且精心挑选歌曲，以获得最大的冲击效果。上场快速地巡视一圈之后，弗雷迪·莫库里坐到了舞台左边的钢琴前面。他弹出《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前奏，观众立刻沸腾了——还有比这更适合开场的吗？——他的双手花哨地交叉，弹出曲调中的两个高音。第一句歌词刚刚吐出，观众再次热烈地和声回应。尽管钢琴上并未装饰着烛台，而是摆放着印有百事商标的纸杯和装着淡啤酒的塑料杯，但也不会破坏这首歌曲中那丰富的戏剧氛围。无所畏惧且处于巅峰状态的弗雷迪，一开口就把这首歌推到了极致，如同传递一个让世界震颤的重要讯息。今天，“拯救生命”将属于皇后乐队。

其他乐队成员也加入进来，伴随着梅的巴洛克式华丽吉他独奏，毫无预兆地，莫库里突然站起，《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第一个渐进高潮、激起的热情还未消退时故意中断。

弗雷迪的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进入视野，将主唱那具有高度辨识性的道具递给他——带有半截麦克风棍子的话筒。莫库里沿着舞台边缘踱步，挥舞着拳头，噘着嘴，高昂着头。在他身后，泰勒打出了《收音机嘎嘎》（Radio Ga Ga）的鼓点前奏，这是皇后乐队去年排名第二的金曲。它的配乐使用了时下流行的合成器和电子节拍器，正好和纯乐器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相反。

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是对当下收音机电台现状的不平，以朗朗上口的副歌润色。它的宣传视频借鉴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的场景，对歌曲销售帮助不小。此刻，第一段副歌响起时，观众模仿着视频中的场景，成千上万的手臂在头顶翻飞，整齐地击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布莱恩·梅后来感慨道。

从这段起，乐队已然逆天。莫库里开始了他的观众调教，变换着调子和观众进行了一唱一应的对歌，然后接入下一首《一锤定音》（*Hammer to Fall*）。一首也算是金曲的歌，具有画面感的重金属风格就是为温布利这样的大体育场而准备的。布莱恩·梅明显放松了不少，他挥手扫弦；莫库里此时直接与台上的摄影师玩起来了，他搂着摄影师转动还对着镜头扮鬼脸，之后又绕着吉他手走动，像斗牛士在挑逗公牛。过一会儿，梅滑步移开后，莫库里对着观众面露坏笑，套弄起麦克风来，现在这玩意正搁在他的胯部位置。

看起来，弗雷迪更像一个淘气的高中男生，而不是健壮的摇滚巨星，他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表明他并没有真的把自己和这些玩闹当回事。“拯救生命”肩负着重要使命，但很多明星的随意表演导致今天的温布利球场出现不少令人皱眉的时刻。然而，似乎在皇后乐队表演时却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明白，‘拯救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点唱机，”格尔多夫说，“而且那位弗雷迪可会当着全世界的面风骚了。”

舞台上的皇后乐队可能已经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但幕后却另有故事。他们并没有参与1984年11月“乐队援助”^④慈善单曲的录制，很多伟大的、优秀的（和不那么优秀的）音乐明星合力做出这张唱片以帮助埃塞俄比亚筹款。“当时我们都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呢。”莫库里后来说。现实情况是，那时候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南非太阳城的巡演，这场表

演因为政治原因被黑得一塌糊涂，皇后乐队正处在重启全球巡演之前闭门疗伤的阶段。

此外，虽然乐队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会产生录音室里的灵感碰撞，但到了1985年，用罗杰·泰勒的话说，皇后乐队已经“审美疲劳”了。鼓手的直白评价“我们乐队甚至比我们的婚姻都持久”并不能避免这场“婚姻”也有触礁的时候。毕竟年复一年的巡回演出、音乐创作，以及一直需要的相互包容，是要付出代价的。

皇后乐队最近的一张专辑《作品》（*The Works*），恢复了一些在1982年《白热空间》（*Hot Space*）后失去的势头，后者偏向舞曲且明显地缺失吉他，算是一张走得太远的实验专辑。皇后乐队的星光有些暗淡，尤其是在美国。当时出现了数不清的问题：与美国唱片厂牌的争执；缺乏电台播放推广；弗雷迪身边的人带来的分裂影响；以及单曲《我要挣脱一切》（*I Want to Break Free*）的宣传视频中，皇后乐队四个人穿女装出境（在英国很受欢迎，在美国却并非如此）。

梅、泰勒和莫库里都制作了个人专辑，尤其弗雷迪的首张个人专辑就是在“拯救生命”前两个月发布的。脱离了被布莱恩·梅称之为“母舰”的乐队，他们都还没能塑造起成功的单飞艺人形象。原本皇后乐队的计划是参加完“拯救生命”后就休息，至少五年内不巡演，也有可能再也不演出了。

事后，“拯救生命”的推广商哈维·高德史密斯公司会庆幸，皇后乐队没有要求在某个更晚一点、似乎更压轴的时间上台，但其实这是乐队有意为之的。很多年前，在等待皇后乐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布莱恩·梅曾目睹了大卫·鲍伊在舞台上化身为“Z字星尘”（*Ziggy Stardust*）的一面，他无比嫉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已的乐队打出名头。后来，皇后乐队曾和艾尔顿·约翰共用一个管理团队，争取着属于他们的关注度。今晚，鲍伊和艾尔顿都将在皇后乐队之后表演，给了乐队先于这两位出风头的机会。同时，皇后乐队选择在傍晚演出，正是美国早晨同步直播开始的时间。

《一锤定音》后，莫库里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片刻。他将一把白色吉他挎上肩头，向着人群致意：“下一首歌，献给今晚在此的，美丽的人们。”他告诉观众，“意思就是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前来，制造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音乐气氛再次激昂。乐队已经表演了被布莱恩·梅称作“伪歌剧”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子流行乐《收音机嘎嘎》和重金属乐《一锤定音》，是时候来一首近似乡村摇滚风、欢快的1979年金曲《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莫库里宣称他是在洗澡时突发灵感写的这首歌。歌曲结尾处，弗雷迪不再拨弹吉他，他把它取下指向前方，又握着琴颈举高至背后，逗着观众玩，好像他只要不互动就浑身不舒服。

现在进入最后的高潮部分，罗杰·泰勒敲出《我们会震撼你》（We Will Rock You）那铿锵又熟悉的鼓点，第一段副歌莫库里直接抛给观众由他们大合唱。早于皇后乐队一个半小时上台的U2乐队曾进行了夺人耳目的表演，但此时有位粉丝的U2横幅似乎举得不是地方了。梅以电吉他失真音快速结束《我们会震撼你》，莫库里已回到钢琴旁边。

皇后乐队的《我们是冠军》（We Are the Champions）总是能让最激烈的批评家都无话可说。写于1977年的这首歌里的那种大无畏情感——更大、更好、更多，还有输家去死——与当时流行的音乐情绪不一致。那时，唱着颓废现实生活的年轻一代的朋克乐队，就是要将皇后乐队这种类型赶下王位。“拯救生命”的观众里，有些人可能在今天之前从来都不算皇后乐队的粉丝，丝毫没有在意这种所谓的对立。《我们是冠军》是一首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歌曲，就像去年的《终结者》

（*Terminator*）或者一年后的《壮志凌云》（*Top Gun*），它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幻境。没有比它更适合结束皇后乐队演出的曲目了。

大卫·鲍伊、艾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都将在皇后乐队唤起的热潮后进行表演，他们的努力可算是徒劳了。在短短的20分钟里，这支完美的大型体育场演出级别的摇滚乐队，展现了从歌剧摇滚到电子流行，从重金属摇滚到乡村摇滚再到力量抒情歌曲的全范围音乐：每一首歌都引起轰鸣，每一首歌都能被立刻辨识且具有过耳不忘的感染力。这场难忘的表现将对乐队本身产生持久的影响。“‘拯救生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剂强心针。”罗杰·泰勒说。所有休息、疗养计划全部搁置，坎坷的“婚姻”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也如弗雷迪·莫库里所说：“如果你能体会到我获得的那种成功的美妙，你是不会想很快放手的。”

[1] 彼得·汤申德是六十年代成立的著名摇滚乐队谁人乐队（The Who）的吉他手。（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英文名为“Led Zeppelin”。

[3] 详见歌曲《大街上跳舞》（Dancing in the Street）视频。

[4] 英文名为“Thompson Twins”。

[5] 英文名为“Dire Straits”。

[6] 即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7] Zandra Rhodes（1940— ），著名英国设计师，时尚界教母级人物，尤其长于设计女式时尚服装。

[8] Band Aid，当时录制了一首单曲《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

第二章 你体验了吗？^[1]

弗雷迪·莫库里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我创造。他造就了他自己。

——罗杰·泰勒

就算在我最狂野的梦里，我也绝对想象不到布莱恩·梅这样的人是摇滚乐手。

——弗雷迪·莫库里

罗杰·泰勒就是摇滚界的小飞侠彼得·潘。

——布莱恩·梅

1964年，圣诞节，距离喧嚣的伦敦希斯罗机场片区仅6英里处的艾尔沃思工艺学校^[2]里，学生剧团正在舞台上进行期末演出。今天演的是阿诺德·威斯克的社会剧《厨房》（*The Kitchen*），讲述了一桩发生在年轻主厨和已婚女服务员之间不被允许的情事。

剧中的门童迪米崔，一个来自塞浦路斯、因工作卑微而失意的角色，由名叫弗罗可·保萨拉的美术基础课程班十八岁学生扮演，大家都管他叫“弗雷德^[3]”。保萨拉是个渴望融入集体、积极参加学校社交活动的人，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凭标志性的夹克衫一眼就能认出他来：那件褐红色的法兰绒上衣他穿有点小了，是从他老家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带来的。在表演《厨房》时，弗雷德·保萨拉身上换了件白色的门童西装外套。他的道具是一把扫帚。

十年后，1974年12月28日的《流行音乐周刊》（*Melody Maker*）封面标题叫作《皇后的圣诞致辞》^[4]。下面配着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照片，穿着毛皮短外套的他看起来十分贵气，身旁飘洒着节日气氛的金箔，手里递出一杯香槟，头部边上的对话气泡里写着“干杯！”这一年皇后乐队表现上佳。《绝对心脏暴击》（*Sheer Heart Attack*）专辑取得榜单第二名的佳绩，而最近刚结束的巡演最后一场，巴塞罗那场的六千个座位在二十四小时内被一抢而空。

杂志内刊登了皇后乐队的采访，在某个前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学生眼里，这个弗雷迪·莫库里的照片看起来迷之眼熟。摄影师抓拍到了弗雷迪的习惯动作，他常常会收下唇以藏起凸出的门牙。尽管有摇滚明星的发型和服饰，这一点却直接把他暴露了。“当时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弗雷德·保萨拉嘛，”他的老校友说，“他嘴巴的那种不安的抽动是比他的褐红色外套还要鲜明的标志。”

弗雷迪在《厨房》里的表演应该算他的英国舞台首秀，几个月前他和家人才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1946年9月5日，弗罗可·保萨拉出生于非洲温古贾岛上的桑给巴尔市，这个岛是桑给巴尔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十九世纪下旬成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地之前，桑给巴尔曾是非洲奴隶贸易的中心；后来它的主要产业变成了香料出口。

弗雷迪的父亲波密曾担任桑给巴尔高等法院出纳员，为英国总督服务。妻子婕尔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随丈夫到此地安家。两个人都是波斯裔印度帕西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5]，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几百年前，大量帕西人逃至印度次大陆，以躲避在故乡波斯发生的迫害。在非洲桑给巴尔也有日渐繁荣的帕西人群体。小保萨拉出生的那天正好是帕西新年，而且弗罗可这个名字在帕西人宗教团体里特别流行。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接受了传统的纳久特^[6]仪式加入拜火教，在古老的祷词和沐浴中受洗。

因为是高级公务员家庭，保萨拉一家在桑给巴尔市的老城区石头城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家里雇了佣人，包括一个照看大少爷和1952年出生的妹妹卡什米拉的阿娅（保姆）。“按照桑给巴尔的标准，他家算是上层中产阶级了，”一个家里的朋友回忆道，“对于这个收入的人群来说，雇些额外的帮手是很平常的。他们不能算大富大贵，但波密拿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的薪水，这意味着他能买得起英制奥斯汀微型轿车作为家用。”

弗雷迪本人会说他是在“被呵护着”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回忆起从前在坦噶尼喀近郊的达累斯萨拉姆，住在他叔叔的别墅里的优渥生活：“有仆人会来叫醒我。握着备好的橙汁，我一出门就是海滩。”事实上，弗雷迪的叔叔曼切肖·保萨拉曾在桑给巴尔电气电讯公司工作，也住在石头城。1974年接受采访时，莫库里也会阻止别人用“小时候养尊处优”这种说法，被问及个人生活时，他经常喜欢故弄玄虚：“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富裕啦，但我猜我给人一种看起来家境很好的样子。我喜欢这样。”

五岁的时候，弗雷迪上了当地的教会学校，他的音乐爱好初次闪光可能是在社交场合给家人和客人们唱歌。1955年初，他的生活将遭到第一次剧变。保萨拉家里觉得桑给巴尔提供的教育有限，于是将八岁的儿子送去了远在印度的一所寄宿学校。“我是个早熟的孩子，”莫库里说，“我父母认为寄宿学校对我有好处。”

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对波斯背景和印度那边的家族关系如此敏感，莫库里打断他说：“哎，你这个人，别问我这些。实在没什么好说的。”终其一生，他成年之前的细节都是模糊不清的。与早期所述不符的是，保萨拉家并没有举家搬到印度。只有弗雷迪独自一人坐船到了孟买，他的姨妈和姑妈家都在这座城市。

在印度上岸后，弗雷迪还要换乘火车往北168英里，到达在马哈拉施特拉省的新学校。根据记录，保萨拉于1955年在潘奇加尼的圣彼得男子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所学校成立于1902年，以传统的戒律治校，校训是拉丁文“Ut Prosim”（意思是“我愿获益”）。学校有着优良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达到就读英式大学的标准是该校的优势。尽管它欢迎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包括拜火教在内，但圣彼得学校本质上来说还是一所英国国教的教会学校。它沿用了英国公立学校的许多制度特点，如男孩子们统一住宿舍，学校分四个学院，弗雷迪成了艾什林学院的一员。1958年，保萨拉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艾什林学院的朋友们就像我的家人。”他与真正的家离得如此遥远，被安排在这个学院已算是幸运。

比弗雷迪高一届的一个学生记得，他是一个“害羞、胆怯的男孩，不得不戴着一副看上去挺疼的牙箍”，有时候自然会遭到同学们的无情嘲笑。莫库里后来说：“当然会有种种被迫离开父母和妹妹的感受——孤独的感觉，被抛弃的感觉——但你又不得不去做。所以明智的办法是充分利用现状。寄宿学校教给我的一件事就是要自力更生。”

在圣彼得学校，弗雷德和苏巴希·沙阿成了好朋友。沙阿是学校里仅有的另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男孩。“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我的父母认识他的父亲，但我们俩住在石头城时从未见过面。”如今沙阿回忆道。有时学校放假，在回家的漫长旅程上两个人会结伴同行。“我们一起坐过那艘船两次，它在塞舌尔、蒙巴萨岛、桑给巴尔停靠，最后开往南非。”为了打发船上的时间，两个孩子没完没了地打乒乓球，这时候的弗雷迪是乒乓球高手。“有一次，船长注意到我们一起坐船的孩子都是同一所学校的。”沙阿说，于是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在这里经历了他的第一次升级。“我们大多数人都坐三等舱，但船长破例让我们加入了二等舱和头等舱的旅客中，于是我们可以享受特权和玩些更好的游戏。”

在另外那些不能坐船回家的假期，弗雷迪要么留在圣彼得学校，要么住在孟买的外婆家或者姨妈家，或者和学校的朋友待在一起。正是他的姨妈希茹注意到他可能有些艺术天分，给他买了一套油画颜料。她还发现他对音乐越来越感兴趣，就建议他的父母在学校给他报了一门钢琴课。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弗雷迪师从一位爱尔兰老钢琴家，根据当时一个学生的说法，这位教师“十分宠爱他”。

最初的几个学期下来，弗雷迪和艾什林学院的四名学生成了亲密的好朋友：布鲁斯·默里，法朗·伊拉尼，德瑞克·布兰切和维克多利·拉那。“我们那时听收音机里的流行榜单歌曲，”布鲁斯·默里回忆说，“有一档牙膏公司赞助的音乐节目，我们听完歌，弗雷迪就走去钢琴前一首首地演奏出来，居然弹得完全一样，他仅仅听过一遍而已。他喜欢小理查德^[4]，‘胖子’·多米诺^[5]，克里夫·理查德……”苏巴希·沙阿补充说，“他对印地语了解有限，但他也能听印度歌曲，而且以某种方法在钢琴上再现相同的节奏。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非常专注的。”弗雷迪加入了大部分朋友都在的学校合唱团，这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能与来自附属女校的女孩子们交流。“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只要你能唱，你就可以加入合唱团。”默里说。

虽然本性害羞，但这个将来会成为弗雷迪·莫库里的男孩已经在圣彼得学校展露了他不止一面的戏剧表演天赋。在学校排演的十九世纪滑稽剧《烦躁之解药》（*Cure for the Fidgets*）中，他扮演一个医生，某次演出时被另一个演员不小心用剑戳到后背。他怒了，扇了那个同学一巴掌，冲下舞台。“他的性格中是有狂躁的一面，”德瑞克·布兰切回忆说，他把十几岁的弗雷迪的行为比作迪恩·马丁的搞怪喜剧搭档杰瑞·路

易斯，“手乱舞，脚乱走”。

在潘奇加尼，男孩子们虽然被古典乐和印度音乐环绕，但西方流行乐才是他们的心爱之声。如布鲁斯·默里所言，“因为我们都想成为猫王。”在学校相处三年后，弗雷迪、布鲁斯、法朗、德瑞克和维克多利组了自己的乐队，起名为狂热乐队^[10]。乐队占据了新宿舍附近的艺术教室，作为新手的鼻音和重击声让艺术老师感到很是分心。默里主唱，布兰切弹吉他，拉那打鼓，法朗·伊拉尼则模仿当时流行的英国即兴摇滚乐^[11]，用一个茶箱、一根木棒加上一条金属线充当临时拼凑的单弦贝斯。弗雷迪负责弹奏学校的立式钢琴。

在一个极度缺乏真正乐队表演的环境下，狂热乐队成了学校各个系部的明星，表演时观众里还有隔壁女子学校来的热情粉丝团。“她们会站在前排尖叫，”德瑞克·布兰切回忆说，“她们听说现在外面世界的女孩开始在偶像面前这样做，她们也表现得一样。”不过这会儿弗雷迪很乐意让布鲁斯·默里成为焦点人物。“弗雷迪似乎一点也不像天生的主唱，”布兰切说，“他满足于默默地待在背景里。”

“我是主唱，因为我是几个人里长得最帅的，”默里笑了，“我们表演过‘沿海航行者’乐队^[12]的《吵吵闹闹》（Yakety Yak），很多猫王的曲子，迪翁^[13]的曲子，可能还有一些瑞奇·尼尔森的。弗雷德虽然也唱唱和声，但他主要还是弹钢琴。他还有种在舞台上怪异的走步方式，有一点后来在皇后乐队的影子。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外面表演过，除了有一次，我去孟买看望我姑姑，在街上碰到了弗雷德。他到我家里来，我唱歌时他在一边弹钢琴。很多年过去，我姑姑还会问起那个‘弹钢琴的龅牙男孩’。”

狂热乐队表演时的老照片展现了一支典型的六十年代青少年学生乐队形象。标准的白衬衫、黑领带，笔挺的长裤，抹油的头发，有意识地 and 乐器一起摆造型；法朗·伊拉尼似乎要从他那笨重的茶箱上跃起，茶箱上用蜡笔模糊地涂着乐队名字。保萨拉看起来比他的队友们更没有明日之星的样子，他仍是个笨拙的男孩，因为口腔后部多长了四颗槽牙造成前牙外突，照片上笑着的他龅牙都露在外面。

布鲁斯·默里笃定地说没有人当着弗雷迪的面喊他“龅牙”（“否则我们会对付这些人”）。但其他人记得他确实是到处被叫这个绰号，或者说，是苏巴希·沙阿印象中的“龅牙仔”（Buckwee）^[14]。同样地，布鲁斯·默里说大家都知道弗雷迪是他使用的英文名字，但苏巴希·沙阿记得在

潘奇加尼他只用原名弗罗可。

十二岁那年，弗雷迪以优秀的学业成绩和体育成就获得了学校的年度青少年全能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了能力不错的板球运动员（尽管他后来声称讨厌这项运动）、曲棍球球员和轻量级拳击手。在拳击台上，他的朋友们进一步见识到了这位同学的骨气和专注力。“我没跟他对打过，因为我们的体重级别不同，”沙阿回忆，“但是那些和他打过的人只能用技巧击倒他。因为牙齿的关系，他的嘴一旦被打到就会血流不止。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会狠狠地攻击对手。”

布鲁斯·默里曾目睹了一场鏖战。“弗雷迪的嘴在流血，流得满脸都是。我是他的助手，站在拳击场一角拿着毛巾。我不停地说，‘你看，弗雷迪，放弃吧。你都受伤了’。但他是不会停下来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看着你的时候仿佛能直接把你看透。后来我们在英国再次见面时，我又看到了这样的表情。那种‘去他妈的，我就要做’的神态……”

到了在圣彼得学校的最后一年，他的成绩下滑了。也许是因为音乐和艺术分散了精力，他现在的成绩只能算平均水平。弗雷迪还在世时，官方的说法是他考过了“几门O-Level^[5]科目，包括英国文学、艺术和历史。”事实上，他在潘奇加尼并未通过任何课程。另一种分心的可能性是青少年的荷尔蒙作祟。弗雷迪有几个隔壁女校的好友，但没和她们中任何一个产生恋爱关系。当时的女校学生吉塔·巴茹恰（后随夫姓琼克斯）据说是他的第一个暗恋对象。“假如那时他真的喜欢我，他也没告诉过我，”吉塔在2000年的采访中说，“但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单纯，男孩和女孩就只是见个面，拉拉手。”

有老师回忆起当时比较让人惊讶的事情，是弗雷迪开始使用“亲爱的”称呼其他男生了，后来皇后乐队的成员都知道他有这个口头禅，但此时似乎已有一丝踪迹。根据一些人的说法，是有人曾取笑过他的娘气，但更多时候不是人们注意不到，而是如一个朋友所说，“弗雷迪就那样”。当时圣彼得学校的同龄人里，有人说他是明显的同性恋，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明显。“我没看出什么迹象。”布鲁斯·默里坚持说。不过德瑞克·布兰切特持另一种看法，他说：“圣彼得学校和其他寄宿制的公立学校一样，住校的学生，包括弗雷迪，在青春期来临时都要经历一段困惑期，身体开始产生和理智冲突的信号。”

各种关于弗雷迪·莫库里学生时代的传闻浮出水面，又自相矛盾，

特别是在他去世之后。一个故事说他和学校里某个年长的男生交往过；另一个故事则说他是和孟买的一个男孩相恋。2008年，一位潘奇加尼的退休老师在接受《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采访时提到，弗雷迪的一段同性关系被发现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的父亲应该被通知到了，而且我敢说是感到非常失望。他家里几代人都保持严格的家教环境，而且琐罗亚斯德教是完全禁止同性恋的。”莫库里自己近乎揭露真相的一次是1974年接受《新音乐速递》（*New Musical Express*）杂志采访：“他们说的所有（关于寄宿学校的）事都是真的……有个古怪的男老师追过我。我并不惊讶。我迷恋上了一位男教师，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被问到他是不是“人人都想睡的漂亮小男生”时，莫库里说：“说来有趣，还真是……我应该是被当成基中翘楚了吧。”采访者以七十年代中期的说法问他是不是被“掰弯”了，弗雷迪回答说：“这么说吧，我也有过年轻青涩的时候。那种青春期男生的经历，同学之间的胡闹也有我的份儿，但我不会详述。”

1962年，弗雷迪离开圣彼得学校，回到桑给巴尔的家中。他在学校拍过的最后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十六岁少年，斜躺在宿舍外面的长椅上。照片里，弗雷迪戴着一副大墨镜，竖起的额发梳得很有型。那年某个朋友的毕业签名簿上写着这样一段离别赠言：“现代绘画就像女人，如果你试着去理解她们，就不能好好欣赏她们了。——你永远的伙伴，F. 保萨拉。”

1979年，弗雷迪的母亲婕尔把儿子的照片和其他纪念品捐赠给圣彼得学校，这可能是弗雷迪在多年以后最接近于重返母校的举动了。1991年他去世后，圣彼得学校向那些希望挖到更多弗雷迪·莫库里童年事迹的电视工作者和记者们敞开了大门。学校的大部分场地都保持未变；狂热乐队演出过的学校礼堂几乎还和五十年代时一模一样。甚至连他弹过的那架钢琴都没有动过，一直到2002年毁于一场火灾。

至于狂热乐队的成员，法朗·伊拉尼在孟买开了一家餐馆，作为“弗雷德·莫库里印度求学之旅线路”的一站，他会和前来歇脚吃饭的人们聊聊当时的故事；德瑞克·布兰切和布鲁斯·默里都搬到了英国——布兰切成了一个演员，演了无数七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并参演了获得1985年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欢乐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erette*），默里进入了音乐管理行业。维克多利·拉那，狂热乐队的鼓手，后来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毕业，于1999年被科菲·安南任命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之后成为尼泊尔陆军总监。布兰切和默里后来都会再次与

弗雷迪相遇。不过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说：“我认为弗雷迪迫不及待地想要忘掉印度，进入他人生的下一个舞台。”

下一个舞台，是他回到家人身边，在石头城花一年努力完成学业。在这儿，他和苏巴希·沙阿又相遇了。沙阿因为有一门功课挂科，父母决定把他从潘奇加尼召回来：“弗雷迪走进教室，我很震惊，因为我以为他已经在渡过印度洋回潘奇加尼的途中了。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的父母把他从印度叫回来，我也没有问。”

在桑给巴尔就不会有什么“狂热乐队2”了。作为替代品，弗雷迪会从英语杂志中搜刮一切有关流行音乐文化的信息，这些杂志到他手上已经出版数周，甚至数月了。他收到一台录音机作为生日礼物，用它录下晚间英国节目中播放的流行歌曲。在学校里，弗雷迪、苏巴希和其他男生都必须坐在所有女生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一条分界线。“所有非洲裔阿拉伯女孩都戴着一种叫布布（bui-bui）的传统头巾，”沙阿说，“有一次我们全班到海滩上去，那时候扭腰舞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岛。我们第一次见到女孩子们摘下她们的布布。那场景，姑娘们疯狂地扭动着臀部，弗雷迪也在人群中做着同样的动作。”

到这个时候，短短一年前还激励过狂热乐队的克里夫·理查德、“胖子”·多米诺和小理查德，就要被取而代之了。1963年底的英国，披头士出道，马不停蹄地改变了流行音乐，滚石乐队亦在跟进。此时的桑给巴尔情况类似，一切都在改变，一场政治上的动荡将永久性地改变保萨拉一家的生活。

六十年代初，英国对该岛的殖民统治日渐削弱。1963年12月大选后，英国将权力移交给阿拉伯势力占绝对多数的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人民联合党^[4]。由非裔的非洲设拉子党^[5]为主力组成的反对党认为选举受到人为操纵，有舞弊嫌疑。为了维持秩序，新政府将一些反对党禁言，并把非裔警察驱逐出岛，此举激发了不满。1964年1月12日，数百名反对党成员，包括许多被驱逐的警察，在暴力抗议中走上街头。由自封“在野执政官”的约翰·欧克罗和大约四十人的核心叛军带领，他们占领了桑给巴尔市政府大楼，九个小时后取得了岛上的控制权。沙阿回忆道：“革命之后，事情就失控了。我们有个固定的习惯，我下午5点30分左右到弗雷迪家去喝茶，然后我们会四处走走，保证在7点半之前回家。岛上死了那么多人，我就问他：‘龅牙仔，你觉得你会活多久？’他说：‘不知为何，我脑子里出现了“45”这个数字。’然后他反问我我能活多久，我说：‘47吧。’这个问题不是刻意问的，仅仅是因为当下正

在发生的事，我脑子里过了个念头而已。”1996年，苏巴希·沙阿才发现他的朋友弗雷迪·保萨拉已经去世，享年四十五岁。“那天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我父亲发现了一张关于弗雷迪·莫库里的报纸剪报，里面提到这个人五年前就去世了，”他说，“我是听爵士乐的，对皇后乐队一无所知。我的父亲读着报道，才反应过来这位歌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从孩提时就认识的弗罗可·保萨拉。”

那年6月，沙阿和家人迁往美国俄亥俄州，他被肯特州立大学录取了并申请到奖学金。沙阿记得保萨拉家走得更早些，3月就离开了。波密持有英国护照，据说一家人带了两个行李箱能装下的所有财产，逃往英国。保萨拉家在费尔特姆的豪恩斯洛安顿下来，这是伦敦西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离他们抵达的希斯洛机场仅3英里多一点。当地居民布莱恩·梅对费尔特姆直言不讳的描述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地方”。先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后，保萨拉家买下了格莱斯顿大道22号的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排屋。波密找到了工作，是当地的餐饮公司的会计，婕尔也找了商店店员的工作。

一家人确实处于艰难时期：移民身份，条件普通，又生活在一个寒冷、陌生的国家。不过据他的家人说，弗雷迪很高兴能来到英国。在开头最困难的那几个月里，是他一直保持乐观，鼓励着父母并让他们相信这一步是对的。好像印度、桑给巴尔都已经是回忆，他弗雷迪再也不会回头。后来，当朋友哄着他讲些私人信息时，莫库里谈起出生地并无感情。“我会问他：‘桑给巴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吧！’”他的一个老友说，“他会回我，‘可脏了！污秽之地，亲爱的。’”

现在到了弗雷迪决定人生规划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或者会计，因为他的大多数堂兄弟都是，”婕尔·保萨拉说，“但是他会说：‘我没那么聪明，妈妈。我没那么聪明。’”苏巴希·沙阿坚持认为，因为桑给巴尔革命爆发，弗雷迪其实未能完成他的学业。到了英国，保萨拉不顾一切地想去念艺术学校，似乎有部分原因是当时许多英国的流行明星都是艺术学校出来的。然而，他缺乏学历资格是个问题。1964年9月，十八岁的弗雷迪开始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习基础美术课程。如果成功通过，他就能获得就读伊林艺术学院^[18]必需的A-Level^[19]资质，这所大学也是谁人乐队的吉他手彼得·汤申德的母校。

据莫库里的一个朋友说，“弗雷迪希望他的人生是从二十一岁在费尔特姆开始的”。支持这一说法的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采访中提到过艾尔沃思工艺学校这段往事。但是在这所学校短暂的两年却对他成年后的

生活至关重要。离家三十五分钟公交车车程的艾尔沃思工艺学校，让从前在几千英里外只读到过的音乐、电影、戏剧和时尚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实。弗雷迪的美术基础课程上还有其他八名同学，有阿德里安·莫里希、布莱恩·范宁和帕特里克·科诺利。“我们都在课前培训见过面，然后被分到一个班上课，”阿德里安·莫里希回忆道，“弗雷迪、布莱恩·范宁和我都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我对弗雷迪的第一印象是腼腆可爱，但很有亲和力。”

起初，弗雷迪因为衣着和发型在同学中显得很是扎眼。“他穿着奇怪的紧身裤，裤腿不够长，还有一件中年人才穿的夹克，稍微有点小，”阿德里安记得，“我想他可能是从桑给巴尔或印度把这些衣服带来的。他似乎不是很擅长交际，但很想融入新环境。”

“我记得他一开始是挺孤独的，”帕特里克·科诺利说道，“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敏感，会关心人，不像其他人那样自以为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有文化背景，只是在寻找适合他自己发展的方式。”同学们很快见识了这位新朋友的音乐才能。“课间休息时，我们会溜到礼堂去，”另一个前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生杰奥夫·莱特回忆，“弗雷德经常跑去弹那架立式钢琴。他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弹。他只要听过我们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就能原样弹出来。我喜欢冲浪音乐，尤其是沙滩男孩乐队^[20]。于是他为我弹《随便走走》（I Get Around）。他可以直接弹，不用谱子。”

“他还能把早上家里收音机里听到的流行歌曲，在上学时用钢琴弹出来，”帕特里克·科诺利补充道，“然后他会说，‘但我们可以这么弹，或者是像那样？’就开始即兴演奏了，他尝试着怎么让歌曲更好听。”

有趣的是，改名的话题再度出现。布莱恩·范宁坚称弗雷德（而不是弗雷迪）这个名字是在艾尔沃思被叫开的：“他的本名是弗罗可，但他觉得一个英国化的名字有助于融入新环境。我记得这对他来说似乎很重要。所以我们集体给他起名为‘弗雷德’。”

他们会在课上到一半时跑去当地的咖啡馆和酒吧，“弗雷迪和我会逐个评判最新的点唱机歌单，”范宁记得，“比如奥蒂斯·雷丁的《我的姑娘》（My Girl）。而阿德里安·莫里希有时干脆整堂翘课。有一次，我实在是被一个姑娘迷得神魂颠倒，决定不去文史通识课了。弗雷迪冲进学生休息室，手段粗暴，和其他几个人直接把我抬起来运进了教室。弗雷迪总是数落我。他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略带嗔怪的‘哦，阿德里

安！’。”

1964年圣诞节的时候，弗雷迪加入了学校的青年合唱团（布莱恩·范宁曾有一盘合唱团的录音磁带，可惜丢了），并在《厨房》里饰演了迪米崔的角色。“他很紧张和不安，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做这件事，”莫里希说，“他喜欢人们的关注，也喜欢登台演出，因为他很有自信。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他有展示自身的倾向。”

阿兰·希尔曾和弗雷迪一起出演《厨房》，后来又一起演了学校自制的作品《光谱》（*Spectrum*），“是一部戏剧评论”。希尔记得的是：“它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有一幕，我们应该在河里撑篙划船。另一幕，我们会以哑剧表现对某个女子的永恒爱恋。”莫里希和科诺利两人曾去过格莱斯顿大街的保萨拉家。“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播放唱片，聊那些青少年爱聊的事情，”莫里希说，“我记得他给我看了他父亲的集邮册，里面有印刷错误的少见邮票，很有价值。后来，我想它们被作为弗雷迪的收藏拍卖了，但我始终记得是他父亲的。”

弗雷迪也向帕特里克·科诺利透露了他的背景：“他告诉我以前家人在桑给巴尔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他如何住在一栋有象牙色钢琴的房子里。我想有时候他还是怀念曾经拥有的生活的。”他的回忆中也有黑暗的一面，“革命过后，弗雷迪说他父亲受到威胁，并被告知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叛军会把他的头砍下来”。

不过现在这些事已经是过去，弗雷迪急于参加学校之外的各种社交活动（“跳舞、夜店、派对，能去的都去。”阿兰·希尔回忆说），虽然有时候会因此和父母闹僵。他的妹妹卡什米拉·库克后来回忆，哥哥和母亲“常在这件事上拌嘴，但他就是决意要做他想做的事。有很多次摔门而出”。

“我有个朋友记得，某次我们开我朋友的车去弗雷迪家里接他去看演出，”莫里希说，“他父母看起来很不支持这件事，他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为了攒些社交生活的经费，弗雷迪通过阿兰·希尔找了份兼职工作。“我曾经为杂志《全国男孩俱乐部》（*National Boys Club*）做图文设计，”他说，“弗雷德想挣点钱，鉴于我的这层关系，我给他争取到一些做版式设计的工作。”然而，帕特里克·科诺利不确定他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老实说，弗雷德不是什么厉害的设计师。他完全没头绪。因为

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你也不需要非常出挑，你只要对学科感兴趣就行了。美术从来都不是他的最感兴趣的。弗雷德的兴趣点还是在音乐、唱歌和舞台表演上。”

1964至1965年间，伦敦特威克南的皇冠民谣俱乐部聚集着翻唱伯特·詹茨、约翰·任博和达斯特·班耐特的表演。鳗鱼派岛屿酒店^[24]曾经因为爵士乐和大热乐队知名，而现在唱主角的是初出茅庐的滚石乐队、新兵乐队^[22]和三叉戟乐队^[23]（其中有年轻的吉他手杰夫·贝克），还有嚎叫之狼乐队^[24]和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25]。过往的华丽建筑，现在已经破败失修（乔治·梅利^[26]曾称之为“像田纳西·威廉姆斯^[27]的小说里出来的”），它坐落在泰晤士河延伸段特威克南的一个岛上，只能通过人行天桥抵达。酒店离艾尔沃思不远，于是成了弗雷迪一帮人在星期日偶尔出没的场所。

“弗雷德和我们去过几次鳗鱼派，”布莱恩·范宁说，“有一晚我们去看洛·史都华，高个约翰·鲍德里和跳踢踏舞的单人乐队杰西·富勒。但那时候弗雷德走得都比较早，也没喝醉……或者相比之下不太醉。”那晚的鳗鱼派酒店里还有一位校外的朋友雷伊·珀尔。“弗雷德要回家练琴，他早早离开了鳗鱼派，”珀尔如今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安静、内敛，感觉文化背景和他的同学们很不一样。”从雷伊·珀尔1965年的日记中可以一窥弗雷迪·保萨拉的社会生活：“都是些这样的事，‘和布莱、阿德、弗雷德他们去国家美术馆，看了一个很棒的展览’或者‘和阿德、希拉（艾尔沃思同学）、弗雷德在豪恩斯洛看了部电影《诀窍》（*The Knack*），挺开心的！”

虽然他依然很听话，在酒吧喝酒、看乐队演出和频繁参加学校派对后，会早点回家练琴以安抚母亲，但如布莱恩·范宁所说，弗雷迪如同“一块好奇的海绵拼命吸收所有外界养分”。“弗雷德倒不是把精力集中在能让他自己受人瞩目的事情上，”范宁详述道，“他是在尽可能多地吸收这个他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新文化的方方面面。”弗雷迪同样渴望能看看比他身处的伦敦西郊一隅更大的英国。1965年复活节那个周末，范宁、莫里希和珀尔计划和他一起搭便车去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28]。但不知道是父母阻挠还是真的病了，弗雷迪告诉朋友们他得了流感，并未成行。

两个月后，布莱恩·范宁买了一台8毫米胶片摄影机带到学校。他用两天多时间拍摄了三分种的无声录像，其中有弗雷迪、阿德里安和其他一些在工艺学校里闲逛的人。因为胶片很贵，布莱恩为省钱就只拍了单

帧序列。弗雷迪出现在三到四个视频里，仍然穿着阿德里安·莫里希印象中的那件“中年人夹克”，但头发留长了，梳成类似披头士的样子。有一个场景中，他用上唇包在牙齿上把它们遮住；另一个场景里，他举起双臂的姿势，几乎和在皇后乐队表演时一模一样。但不管怎么看弗雷迪都不像是个明星。雷伊·珀尔说：“那个奔放的花蝴蝶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无论是阿德里安·莫里希还是布莱恩·范宁都不记得弗雷迪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曾交过女朋友。“但我也不记得他给人以同性恋的印象，”布莱恩称，“当然可能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样能接受。”然而，阿兰·希尔的记忆则不一样。“弗雷德对异性很感兴趣，”他说，“我曾经约过一个女孩，后来他也约过她。”

到1966年底，工艺学校的课程快要结束，弗雷迪已经将过时的衣服换成了更时髦的穿着。他刚来时的那种不善交际的感觉也有所减轻。“从艾尔沃思快毕业时他的打扮都变了，”希尔记得，“那时流行李维斯那样的牛仔夹克，街上尽是那种款式。我有一件白色牛仔夹克，他一直借去穿。我觉得他穿的次数比我都多。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总是要梳理打扮还要对着镜子往上捋头发。我们每次都要说，‘拜托，你看起来很好了，弗雷德，已经很好看了。我们走吧！’”

弗雷迪也再次表现出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帕特里克·科诺利记得有一个“醉心于吉他”、想要成为雕塑家的同学保罗·马丁，他们常在格莱斯顿大道家里见面，尝试写歌。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他的钢琴旁唱歌，”帕特里克说，“唱的是一首我们都喜欢的歌，你别不信，就是那首《神龙帕夫》（Puff The Magic Dragon，民谣三重唱组合彼得、保罗和玛丽1963年的金曲）。保罗是弹吉他的，我又不会唱歌，但弗雷德的热情把我们凑到了一起。他会鼓励我说，‘你看，帕特里克，你在唱歌呢，你可以做到的’。”多年后，婕尔·保萨拉讲起她曾发现儿子把歌曲的想法随手写在纸上，起床去上学之前把它们塞到枕头底下。（“他会跟我说：‘别扔掉了，妈，这些很重要的。’”）

1966年底，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生会在预订舞会的表演乐队。那一年请的是迈克科顿之声^[29]和格雷厄姆邦德组合^[30]在学校礼堂演奏。在帕特里克·科诺利和保罗·马丁的帮助下，弗雷迪决定招募乐手组一个自己的乐队。“我设计了一张海报，我们把它分发给那片区域所有的学院和

中学，任何我们能想到的地方，”科诺利透露说，“相对于音乐我其实觉得市场推广这件事更有趣，不过我们真的收到了不少回复。回想起来，在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出现的时代，那也算是个壮举了。”帕特里克记得当时有多达四十个想玩音乐的人出现，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一个房间接受了弗雷迪的面试。“当中有这么一个很惊艳的吉他手，我记得弗雷德真的很中意。是啊，当然了，多年后我常常在想那人是否就是布莱恩·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在艾尔沃思参与过此事的人都记不起后续发展了。“醉心于吉他”的保罗·马丁后来再没有出现在任何弗雷迪同学的生活中，帕特里克·科诺利也记不起招募后是否有组过任何乐队。

弗雷迪从艾尔沃思工艺学校毕业时拿到了进入艺术大学必需的宝贵的A-Level，但是取得的过程有那么一点不易。他有一科要求以耶稣受难场景作画的课程作业是在朋友的小小帮助下完成的。“结果有一些人物是我帮他画的，”帕特里克·科诺利承认，“也许我不该告诉你这件事。”

1966年的复活节期间，歌手达斯蒂·斯普林菲尔德的《你不必告诉我我爱你》（*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红遍酒吧点唱机，“弗雷德、艾德和布莱”三人组也曾在酒吧里度过了一些对音乐评头论足的午餐时光。三个月后，英国布鲁斯歌手约翰·梅奥尔将发布他的《布鲁斯破坏者乐队》（*Bluesbreakers*）专辑，其中展现了吉他手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惊人天赋。1966年12月10日，弗雷迪和朋友们参加了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圣诞舞会。那场舞会来演出的正是克莱普顿新组的奶油乐队^[31]。他们得到了600英镑的报酬，而且中场休息的时候被从附近的酒吧里拎回来，继续表演完下半场。

在毕业后到去艺术大学读书之前，弗雷迪和阿兰·希尔曾经陪着两个女朋友一起去参加一场艺校的舞会。到了地方之后，在喧闹的音乐和酒精的刺激下，弗雷迪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另一位女性来宾身上。他当晚的约会对象当然不太高兴。她把一杯啤酒劈头泼在弗雷迪身上，他仔细做过的发型被淋湿自不必说，激情也被浇熄了。“奔放的花蝴蝶”正在破茧而出。

12月16日，另一个巨大的影响闯入了弗雷迪·保萨拉的生活，那就是美国黑人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他在英国音乐电视节目《准备出发》（*Ready Steady Go*）上初次亮相。闭塞的英国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的原始力量。还是个无名小子的亨德里克斯来伦敦才三天，已经在地下酒吧俱乐部^[32]和驻场乐队一起演出了。在这里，他激情演绎了穴居人乐

队^[33]的金曲《疯狂的家伙》（Wild Thing），翻唱了民谣摇滚经典《你好，乔》（Hey Joe），歌曲里充斥着狂野的吉他独奏和咆哮的回授噪声。

不出几周，有关亨德里克斯震撼表演的消息就传遍了伦敦音乐界。亨德里克斯在伦敦招募了英国鼓手和贝斯手，组成了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乐队^[34]。那个夏天，杰夫·贝克、吉米·佩奇、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和其他音乐家一样，争相挤在布雷斯酒吧和指甲袋^[35]酒吧等伦敦夜生活场所里，观看亨德里克斯表演，引用一位在场人士的原话：“让所有人都感到身体被掏空。”10月，亨德里克斯和奶油乐队在伦敦摄政街工艺学校同台演出。上半年的时候，“克莱普顿就是上帝”这句话还被喷在伦敦北火车站附近的墙上。而那天晚上，用克莱普顿的话说：“亨德里克斯打败了我，毫无疑问！”

弗雷迪立刻就被吉米·亨德里克斯所吸引：他的演奏，他的服装，他的发型，他的肤色，他的音乐……关于吉米的一切都是迷人的。“他真的具备任何摇滚明星应该有的一切——台风，气场……”莫库里后来说，“他只要一出现，整个场子都燃了。他的活法就是我想要成为的全部。”

布莱恩·梅的房子并不是乡间小路上最惹人注目的。他的邻居比他招摇多了，那是一位阿拉伯酋长，宅邸两侧大门紧锁，装备了最先进的安保摄像头。梅的这栋十九世纪的田园寓所没那么壮观，它位于被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称为故乡的温德尔沙姆的萨里郡乡下。正如这位吉他手经常说的，“我不是很擅长当摇滚明星”。

现在是1998年6月，梅正在宣传他的个人专辑，但他依旧耐心地回答着那些关于皇后乐队，尤其是关于他们已故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的问题。时至今日，他坦白说，没错，他的确还会梦到弗雷迪，还能准确无误指出9路伦敦巴士上的那个特别座位，二十五年前他们的主唱定期往返录音室时就坐在那里。

走进他的家，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起居区域里到处都杵着吉他和功放，而且缺乏室内设计师所挑剔的“女性气息”。梅透露说，他的伴侣，女演员安妮塔·多布森^[36]，正离家“在演一部戏”，因此她极少到这处房子来。在一间邻近的工作室里，他手工自制的那把珍贵的“绝世

红”（Red Special）吉他，被拆开来重新组装；这个过程大概会让吉他手有些受伤。梅像从前一样穿着修身的牛仔裤，色彩亮丽的衬衫，当然也保持着标志性的发型。其他事情也没有改变。布莱恩一旦大步轻快地走进房间，他的开场白常是先抱怨一句着凉了（“我觉得有点感冒”）。过去他不止一次在接受采访时使用这样的借口。

但梅根本就是客气礼貌的模范，同样情况下弗雷迪可能会倾向于装腔作势，他则完全不同。但他又是个操劳命。作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的主音吉他手，他获得了赞誉、金钱、粉丝的崇拜和同行的尊敬，但你能感觉到他从来没有放松自己来享受这一切。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无法想象皇后乐队会和其他歌手重返舞台。但没有了皇后乐队，布莱恩·梅有时会感到些许迷茫。“我希望能被当作活跃的、有意义的存在，”他说道，表情很烦扰，“不是什么老古董。”

1966年12月，彼时弗雷迪·保萨拉离实现音乐梦想尚有较大差距，而时年十九岁的物理系学生、业余吉他手梅似乎离这个梦想稍微近一点。虽然他们都住在费尔特姆，距离仅有几分钟路程，但此时两人互不相识。不久之后，弗雷迪会嚷着“我要刷遍全国”，到处去看亨德里克斯的表演，这意味着，1967年1月29日亨德里克斯在伦敦萨维尔剧院演出时，他和皇后乐队未来的吉他手很有可能同在观众群中。

对梅来说，目睹亨德里克斯表演是人生中的关键时刻。“我那时已经在弹吉他，参加过几个乐队了。然后这个家伙就出现了，远远超过所有人，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在1991年时回忆说，“他虽然走在同一条道上，但远在我们前面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我看亨德里克斯之前，还觉得自己挺不错呢。”1967年底，他当时的乐队成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布莱米”（Brimi），体现了他对那位吉他手的热爱。

梅和保萨拉对亨德里克斯的共同喜爱是他们人生轨迹发生交叠的第一步。不过，成长在伦敦西郊的梅，他的童年经历和主唱截然不同。

布莱恩·哈罗德·梅，1947年7月19日诞生于肯特郡塞文欧克斯的格洛斯特护理院^[37]，比未来的事业搭档弗雷迪小将近一岁。他是父母哈罗德和露丝唯一的孩子。父亲是一位电子工程师，任航空部高级制图员，研究协和式飞机的盲着陆装置。此前，哈罗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无线电报务员。

梅的家位于沃尔沙姆路6号一条一头封闭的小路上，离格莱斯顿大

街上的保萨拉一家仅仅几百码^[38]远。布莱恩五岁时开始在汉沃思路小学^[39]读书；一年后，他迈出了学习音乐的第一步，因为父亲喜欢战时艺人乔治·福拜，开始教他用福拜标志性的尤克里里琴弹一些和弦。很快钢琴课随之而来，虽然梅声称自己仅仅是能忍受而不是享受学钢琴。

七岁生日那天，布莱恩一觉醒来发现“一把西班牙吉他挂在我床尾”。他的手还太小不能很好地弹奏，于是哈罗德帮忙把琴马改小。梅爸爸是出了名的足智多谋。布莱恩说，因为手头不宽裕，“我爸爸打造了一切。他是技术型公务员。所以他会摆弄修理各种设备。我们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做出来的：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

一天晚上，哈罗德回家时捎上了一张龙尼·多纳根的唱片。他在1955年的金曲《摇滚岛航线》（Rock Island Line）宣告了五十年代中期即兴摇滚乐的繁荣，常以自制乐器与本土音乐家共同演奏美国民谣、布鲁斯和流行乐的混合体。千里之外的印度，也是即兴摇滚乐促使弗雷迪·保萨拉的学校乐队队员做了自己的茶箱贝斯。

布莱恩听得入了迷。“我喜欢那种结合了吉他音、歌声和布鲁斯感觉的声音，”他解释说，“我曾经躺在被窝里，用我的小晶体管收音机听着卢森堡电台，听着所有这些感觉非常刺激、危险、禁忌的东西。我第一次听到巴迪·霍利^[40]的歌曲时，简直脊背发凉。”从这里开始，他一路喜欢上了埃弗利兄弟组合^[41]、布兰达·李、小理查德，还有他的初恋偶像康妮·弗朗西斯^[42]。

作为独生子，布莱恩既有时间也有空间来沉迷于他的兴趣。他把唱片按字母顺序归档，完好地保存着。作为一个热衷收藏的人，他存着奶酪标签、火柴盒、“飞行员丹·戴尔和老鹰”^[43]漫画书（很多年后，百代唱片公司的一位经理回忆，梅在皇后乐队巡演期间会收集酒店的纸夹火柴）。当梅发现了一本由科学家兼电视节目主持人帕特里克·摩尔所著的天文学书时，“永远地迷恋上了天文学”。作为两种消遣的结合，布莱恩写了一段关于恒星运动的独白，以古斯塔夫·霍尔斯特《行星组曲》（*The Planets Suite*）中的《土星：上古的使者》（*Saturn: The Bringer of Old Age*）为伴奏，在家人面前表演。不久后，他的收藏中又加上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副望远镜（当然了，是自制的）。

但这时音乐只是一种爱好，决不能妨碍学业。在汉沃思路小学，布莱恩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我以前是个学霸，”他承认说，“我申请了很多科目而且我喜欢把它们都拿下。”

1958年，他的勤奋得到了回报，顺利通过11-plus^[44]考试并拿到汉普顿文法中学的奖学金。这所学校在2006年时庆祝了建校四百五十周年，布莱恩在著名校友之列；名单里还有王室法律顾问、法官、奥林匹克运动员等，奇怪的是，十八世纪的大盗威廉·佩吉也赫然在列。

在汉普顿文法中学的第一年，同学戴夫·迪洛威听到了来自布莱恩那把西班牙吉他的声音。“我记得我在楼上侧翼的一个走廊里走着，听到这人在弹木吉他，唱着汤米·斯特尔的歌《吟唱布鲁斯》（Singing the Blues，1956年盖伊·米切尔、1957年汤米·斯特尔的金曲）。听起来不错，但我也没多想。”

一年后，迪洛威和梅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精英班2LA。“就是两个拉丁字母A的意思，”戴夫解释说，“这是快班，意味着你可以提前一年考A-Level，去面试大学的时候A-Level的考试成绩已经揣在兜里了。”当时，迪洛威正在学习弹他祖父的吉他，梅用的仍是自己的西班牙吉他。迪洛威说：“所以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兴趣攀谈起来。他住在费尔特姆，我住在惠顿，我们会在星期六下午去对方家里一起学曲子。”

这还是披头士之前的年代，他们学的歌曲是影子乐队^[45]、冒险乐队^[46]和莱斯·保罗^[47]的。“主要是些纯音乐，”戴夫回忆说，“可能现在听起来很不可思议，那时常常弹主音吉他的是我，布莱恩配节奏吉他，因为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配和弦比较难。”

由于很想模仿影子乐队吉他手汉克·马文的那种电吉他音色，布莱恩和父亲开始在西班牙吉他上鼓捣自制的拾音器。“我们是用磁铁和金属丝做的，”梅回忆道，“插到我爸的收音机上，听起来超棒。”

在学校里，两人不停地谈音乐。“布莱恩曾在德语课上教我弹和弦，”戴夫说，“我常常把衬衫袖口卷到胳膊上，手上画着吉他指板，我就是这么学弹和弦的：‘这个音按哪，布莱恩？’他就会告诉我手指在指板上的位置。好笑的是，我的O-Level德语科目没通过，他却过了，这家伙真的很聪明。”

除了上课和弹吉他之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布莱恩克服了自己天生的羞怯，成了学校辩论协会干事，并出演了一些学校戏剧，在其中的《孤岛历险记》^[48]和《情敌》^[49]中“异装”扮演女人（比皇后乐队在歌曲《我要挣脱一切》宣传视频中著名的女装扮相早了二十年）。多年后，梅经常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十几岁时没有安全感：“我会想，‘天啊，我不

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穿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谁’。”

演奏音乐似乎是一种心灵上的纾解。随着摇滚乐队组团热潮的开始，汉普顿文法中学里像梅和迪洛威这样心怀音乐梦想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是这样的场景，”戴夫说，“很多弹吉他的人纷纷带着小扩音器来学校，在午餐时间开演。”其他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在乐队中演出了：约翰·加纳姆，绰号“美洲虎”，有一把漂亮的德国霍夫纳·卡罗让玛吉他^[50]；皮特·“毛糙”·哈默顿曾有一把电视播音员^[51]电吉他，后来又换成了布莱恩特别羡慕的吉布森SG。弹过这把吉他，又摸过其他朋友的吉他后，梅开始对偏好的音质有了认知。因为买不起电吉他，他和父亲决定自行制作一把吉他。

1963的夏天，父子俩开始了从无到有的艰苦历程，从设计图纸开始打造电吉他。他们花了整整十八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但造出来的这把神器，成了梅接下来四十五年的标志物件。琴身以橡木和细木工板打造；琴颈用的是一块从朋友家里捞来的十八世纪壁炉上的红木（有两个虫眼，用火柴棍填上了）；指板上的标记点是珍珠母纽扣，来自梅妈妈的针线盒，经过了手工打磨；而摇把取自一根原本用于支撑自行车鞍的钢棍，布莱恩回忆说，“末端还套了一截我妈妈的塑料毛衣针”。两根从1928年产的黑豹牌摩托车上拆下来的气门弹簧用来调节琴弦松紧。

吉他上仅有的两个非自制部分是拾音器和品丝。因为布莱恩和哈罗德手工做的拾音器达不到他们想要的声音效果，布莱恩借鉴并安装了伯恩斯^[52]拾音器（这也是影子乐队喜欢用的）。“然后我从（伦敦）剑桥广场的一家叫克利福德埃塞克斯的店里买了品丝，”他回忆说，“但其他东西都是用收来的破烂拼的。”

二十四条品丝加上个性化的拾音器位置，给了这件DIY的乐器独一无二的声音和音调。主体完成后，再刷上深红木色的清漆，这把被称为“绝世红”的自制吉他诞生了。梅在制作吉他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照片，体现了他对细节的一贯关注。1998年，当绝世红终于被拆开进行重装时，布莱恩的吉他制作技艺得以再次展现，用的还是原来哈罗德·梅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同一套螺丝刀、品丝锯，甚至连木材着色剂都还是将近三十五年前用的那一罐。

还在1964年初的时候，借着同样的心灵手巧，布莱恩与戴夫已经开始使用两台卷轴式磁带录音机来试验多层音轨录音了；先用一台录音机把吉他录在一盒磁带上，然后在房间里放着这段磁带作为背景音再弹

录。迪洛威自制的贝斯也加入了混音。“通常布莱恩或我会弹贝斯，然后我随便找个能敲的东西——帽盒、麦卡诺（Meccano）拼装玩具的拼装条——当鼓声。没啥复杂的设备。”戴夫说。这对双人搭档录了简制版的波·狄德利的同名金曲，影子乐队的《阿帕奇》（Apache）和《FBI》，切特·阿特金斯的《风中的温暖》（Windy and Warm）等等。

不久后，两人开始在午饭音乐时段扫荡校园（梅：“我们过去经常在自行车棚弹，因为不准我们在学校里弹。”），寻找志同道合的乐手。很快他们组了一个临时小队，布莱恩弹吉他，戴夫弹贝斯，同学约翰·桑格弹钢琴，汉普顿高年级的学生比尔·理查兹负责主唱同时也弹吉他。

他们的保留曲目来自曼弗雷德·曼恩乐队^[53]，披头士乐队，还有忧郁布鲁斯乐队^[54]。理查兹在这个团体的任期很短暂，梅礼貌地告诉他，由于他的吉他没有达到标准，请他去买把新的，要不只能离开。“老实说，我觉得布莱恩是采用了迂回方式，没提我声音的问题，其实那时候是我唱得不行。”理查兹说。他的继任者马尔科姆·查尔德也被证明不可靠，没待上几天。不久之后，约翰·“美洲虎”·加纳姆加入了——带着他的霍夫纳·卡罗让玛吉他。

“我们和‘美洲虎’谈过，他已经参加过乐队并且比我们大一岁，”戴夫·迪洛威回忆说，“他还有车，有麦克风和柜子，这很重要。”

“我曾经在另一个队里和皮特·哈默顿演奏过，他的绰号是‘毛糙’——完全不知道为啥叫这个——这名字有点尴尬，”约翰·加纳姆回忆说，“他后来走了，于是我开始跟戴夫和布莱恩·梅一起演出。我本来比布莱恩高一届，但他不是特别聪明嘛，跳了一级。”

虽然加纳姆可以唱歌，梅和迪洛威在卧室录音的时候也录过歌声，但这个团队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主唱。星期六晚上的一次当地舞会令他们有所收获。“我们去惠顿的默里公园大厅看乐队演出，”戴夫说，“这支乐队叫‘克里斯和旋风’^[55]。我们感觉不错，因为主音吉他手的吉他很好看。看演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在学校见过的，也在舞台下面。他自顾自地坐着，但不时地会跟着乐队吹口琴。台上的乐队听不见，但我们能听到，他吹得很好。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唱歌，但还是邀请他一起来排练，看看他能做什么。”

他们的这位新成员就是来自特丁顿的蒂姆·史塔菲，也是汉普顿的

学生，十六岁，比戴夫和布莱恩小几个月。像约翰·加纳姆一样，蒂姆已经有过表演经验，并曾在一个叫“火车人”^[56]的本地乐队里唱过歌。和他的这些勤奋学习的队友不同的是，蒂姆的学业比较挣扎。三年前，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使他落下了功课，并“失去了很多”。不过，蒂姆对艺术很有兴趣，他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去艺术学院就读（这个决定将会对布莱恩·梅的职业产生深远影响）。他退出了“火车人”，带上装备加入了布莱恩和他的朋友们。

然而，这个乐队仍然缺少一个关键人物：鼓手。“于是我们写了一张卡片，说我们在找鼓手，贴在了特威克南的艾伯特音乐商店橱窗上。”加纳姆说。他们有了一个应征者理查德·汤普森，是艾尔沃思春林文法学校的学生，已经作为一个叫第五纵队乐队^[57]的成员在当地青年俱乐部演出过。

“理查德·汤普森骑着摩托车出现在我父母家门口，”迪洛威回忆说，“他是让哥们开着车一块来的，所以他还把自己的鼓件都带来了。看起来似乎很靠谱，就让他加入了。”

乐队开始定期在特威克南英式橄榄球赛场隔壁的查斯桥小学排练，因为那时里士满议会允许乐队以很少的年费租用当地的学校和青年俱乐部。“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惠顿俱乐部之节拍’^[58]的组织，”戴夫·迪洛威回忆说，“于是我们常在这的小学排练。乐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我，布莱恩，蒂姆，理查德，还有约翰·加纳姆的节奏吉他，约翰·桑格仍在外围，负责弹钢琴。”他们的曲目组合包括翻唱当时各种流行歌曲，还有如布莱恩·梅回忆的，“混合着搭配得上的灵魂乐歌曲，比如山姆和戴夫组合^[59]，奥蒂斯·雷丁等。”

乐队名也定了，叫“1984”，取自乔治·奥威尔的同名科幻反乌托邦小说。布莱恩和蒂姆都是狂热的科幻迷，这名字就这么来了。

几个月来，朋友们看着布莱恩在课间打磨吉他琴颈，现在“绝世红”终于完工了。“我最早看的时候它还只是纸上的一幅图，一片壁炉板，”戴夫·迪洛威笑着说，“一点没瞎说。所有那些关于他妈妈的针线盒和摩托车弹簧的故事都是真的。他们甚至连机床都没有；摩托车气门弹簧是用电钻弄的。但那就是布莱恩——永远的完美主义者。”

不久后，他们通过“惠顿俱乐部之节拍”的关系获得了演出机会。“我们被请去一家青年俱乐部演出，”戴夫·迪洛威说，“是我们认识

的人的朋友，他和他女朋友还是老婆订了我们去特威克南的圣玛丽礼堂演出。”1964年10月28日，当弗罗可·保萨拉还在适应艾尔沃思学校的生活时，1984乐队已经开了首场演唱会了，地点正好就在鳗鱼派岛屿酒店对面。

约翰·桑格作为键盘手也跟着演出。“这时还没有电子键盘，”戴夫说，“有的演出中，如果学校里有钢琴的话，约翰会弹奏学校礼堂的立式钢琴，麦克风粘在琴背后那种。但我们第一次演出时，他们没有钢琴，所以我们借用了一台簧风琴。问题是，这东西就像有键盘的放大版口风琴，而且开起来时声音吵得像一台胡佛马达。再经过麦克风一放大，你听到的就全是像风洞出来的那种噪声。”

后来，布莱恩会说“吉他是一面遮挡我的盾牌”，相比在舞池中“犹豫着该不该邀请某位女生跳舞”而言，这位少年无比想要在舞台上表演。“布莱恩似乎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融入社会，比如我和蒂姆。”理查德·汤普森说道。不过布莱恩这时有了女朋友帕特，是附近里士满女校的学生。他们的关系会一直保持到布莱恩上大学一年级。是帕特和她的朋友，也即蒂姆·史塔菲的女朋友，帮助1984乐队获得了下一个预订，11月4日在女校大厅演出。

“蒂姆和布莱恩的女朋友都是这个学校的，对，我们就是这样获得演出机会的，”戴夫回忆说，“但我们的曲库告急。我们预订的是两个小时，拖成了三个小时，所以歌曲可能要重复唱。”

约翰·加纳姆解释说：“我们为1984乐队做了一些歌，但没有真正的方向。布莱恩和戴夫喜欢披头士，我则更喜欢查克·贝里和节奏布鲁斯，我也关注一些灵魂乐。我总是说，‘我们必须做些能让人跟着跳舞的东西’，因为我喜欢跳舞也喜欢姑娘，而姑娘们喜欢跳舞。”

尽管在乐队里演出能够带来更多关注，但约翰坚称：“我们都不是那种满脑子想着姑娘的人。所有1984乐队的成员里面，最不像这种人的就是布莱恩。他后来确实是有帕特这个女朋友，但我不记得他带她去看演出，她不像我女朋友或者理查德女朋友那样穿短裙。”（戴夫·迪洛威：“约翰的一些女朋友真的漂亮。”）

这一年，乐队的曲目清单很照顾女性听众，从披头士的《救命！》（Help!）和《我感觉不错》（I Feel Fine）到小理查德的《露西尔》（Lucille），从龙尼·多纳根的《方块J》（Jack O'Diamonds）到鲁弗斯·

托马斯的《遛狗》（Walkin' the Dog），返场曲是桑尼·男孩·威廉姆斯一世的《鸟儿再见》（Bye Bye Bird）。不过如蒂姆·史塔菲所说：“这些歌曲是从各种风格里挖出来的。由于选的这些歌性质相似，我们近似于一个男孩歌舞团了。”

查斯桥的排练和偶尔获得的演出仍在继续，但约翰·桑格退出了，因为他要去曼彻斯特大学读书。“我并没有要成为音乐家的宏伟计划。”他说（不过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1984乐队）。乐队以五人形式走下去，蒂姆和布莱恩每周排练时要比赛一次，比谁唱的音更高。“他们的目标是看谁先唱得比约翰·列侬高。”加纳姆回忆说。

演出时，布莱恩由老爸开着标枪牌轿车送去学校大厅或者青年俱乐部，而年纪大些的“美洲虎”则自己开着他的宝马依赛塔迷你汽车，把能装下的乐队设备都塞进去。“我爸以前经常帮我把鼓都搬到车里。”理查德·汤普森回忆说。但有这么一次，乐队差点失去一件至关重要的设备。“某次演出前，我们安排布莱恩在普特尼桥等，”汤普森说，“我们接上他，开车去演出地点，等到了那儿，布莱恩突然想起来他把吉他给忘在桥上了，就是那把‘绝世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赶回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吉他还在原处没被动过，好好地靠在桥上。布莱恩也会有点丢三落四。”有几次演出，加纳姆和迪洛威甚至互换了乐器，“美洲虎”弹戴夫的自制贝斯。“但是它的声音有点闷，”加纳姆说，“不及布莱恩的‘绝世红’的质感。”

他们的“男孩歌舞团”亦面临着激烈的本地竞争。“我们那片还有一个受欢迎的乐队叫‘火焰’^[60]。”约翰·加纳姆记得。（火焰乐队的吉他手戴夫·兰伯特后来加入了草莓乐队^[61]。）“我们都紧盯着这些乐队的动向，特别是一个叫‘他人’^[62]的乐队”，1964年10月——1984乐队首演时——由五名汉普顿文法学校学生组成的他人乐队，其中三个人还和布莱恩、迪洛威一样大，已经发布了一首单曲《噢耶！》（Oh Yeah!），是波·狄德利的歌。“这让他们成了学校里的小英雄。”戴夫回忆说。加纳姆补充道：“他们也唱些早期滚石乐队的歌，比如《66号公路》（Route 66）……他们还是有点姿态的。”

“他人乐队那时很火，”布莱恩·梅记得，“他们是不屑学习的反叛代表。对我也有很大影响。我很嫉妒那些在学校里做音乐能做到半专业的团队，因为我背负的压力都是要好好继续学业。我父母认为我就该待在家里做作业……等二十岁出头了才能出去闯荡。我真的被管得有点严。”

他人乐队则完全是一副不受管教的形象。从一张当年保存下来的宣传照里，能看到五个年轻人留着布莱恩·琼斯^[63]式的刘海儿，打着他那样的细领带，表现出与滚石乐队第一张专辑封面形象相似的乖戾。《噢耶！》是一首比较做作的英式流行歌；犹如新兵乐队的学生版，有许多哀号的口琴声和虚张声势的歌词。虽然他人乐队最终没能留名排行榜（三年后短暂重组为沙子乐队^[64]），但他们硬朗的乐风与1984乐队正好相反。

梅崇拜着新兵乐队的那种“生猛与愤怒”，他人乐队已经找到几分感觉，但布莱恩自己还是羞涩的性格。“舞台上的他从来不是个外向的人，”加纳姆说，“在学校里布莱恩是高智商天才，是正派好学生。但他在早期的乐队里都表现得很安静。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到了皇后乐队演出的时候，他居然冲到舞台前面做彼得·汤申德那样的风车抡臂动作，俨然一位摇滚吉他大师。我就想：‘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嘛。’我认为布莱恩在加入皇后乐队后，外在性格发生了变化，但他的内里是保持不变的。”

“布莱恩总是很严肃认真，”戴夫·迪洛威表示同意，“他向来不是乐队的活力之源和灵魂所在。在1984里面，蒂姆和理查德才是最不羁的人，最有个性。约翰加入是为了好玩，我就只是个贝斯手……”他笑了，“我们没什么个性。”

由于不少汉普顿校园乐队的乐手逐渐完成考试迈向大学，其他人就入场顶替他们的位置。“大家开始穿插到其他团队里，让乐队能延续下去。”加纳姆解释说，他加入1984前的搭档皮特·“毛糙”·哈默顿又跑到他人乐队里去了。与此同时，出现了哈默顿和布莱恩·梅在本地青年俱乐部里互相较劲的场景；两个吉他高手都渴望胜过对方一筹。“我不想说谁更厉害，他俩的技术和弹速都比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戴夫·迪洛威说。

“有个比赛是看谁能最快弹出新歌，”布莱恩说，“所以新专辑一出来，我们都在家里疯狂地研究。”一支瑞典的器乐演奏组合斯普特尼克斯乐队^[65]带来了终极挑战——他们在1963年表演了蓝草乐经典《橙子花开》（Orange Blossom Special）以及稍后发布的单曲《快乐的亨德里克波尔卡》（Happy Hendrick's Polka）。“我们真是玩命地弹，手指都要弹出血来。”后来他们才发现，斯普特尼克斯乐队其实是在录音室里做了快进处理。

这种频频换人的情况使得布莱恩偶尔会到他人乐队里客串一下，1965年在谢珀顿划艇俱乐部^[66]，他和哈默顿还有过唯一一次的同台演出。“毛糙”担任主唱和吉他手，布莱恩换去弹贝斯，理查德·汤普森打鼓。除了翻唱披头士乐队和玛莎与维德拉合唱团^[67]的歌，还唱了他人乐队的《我要带她回家》（I'm Taking Her Home），三个人还演绎了试水版的谁人乐队的《我们这一代》（My Generation）；这首歌加上其他新兵乐队的歌，预示了1984乐队在接下来十二个月里音乐方向的转变。

不过，1965年秋季的时候，1984乐队和队中的明星学生也要进入下个阶段了。布莱恩·梅从汉普顿文法学校毕业，拿到10门O-Level、4门A-Level，分别是物理学、应用数学、理论数学和补充数学。此时去做个全职吉他手还为时尚早，于是梅投身天体物理学，被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和红外天文学系录取，接受三年制本科学位课程。理查德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约翰在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戴夫前往南安普顿大学学习电子，蒂姆则报了伊林艺术学院的平面设计课程。

此外，去帝国理工读书之前，布莱恩通过在费尔特姆制导武器研究中心做暑期工，攒够钱买了一个吉他功放。这个职位比上一份假期工作更适合他的科学家属性：之前是在一家灭火器厂制作挡风玻璃雨刷以换取一点工资。

1984乐队开始了一段用戴夫·迪洛威的话说“按字母顺序排练”的日子。不过，他们仍然利用大部分其他周末时间在伦敦西部郊区演出，出现在普特尼泰晤士河赛艇俱乐部、特威克南的诸圣教堂大厅、费尔特姆节奏布鲁斯俱乐部^[68].....一场在绍索尔白鹿酒馆^[69]的演出让他们第一次体验了醉酒暴力，观众群里发生了厮打，直到有人报警；另一场演出，他们在一位几乎全裸着与蛇共舞的女舞者身后演奏。之后，他们在三小时的演出里插入了一些插科打诨，在舞台上扔假砖头和剃须泡沫玩闹；总之就是尽量区别于其他唱相同歌曲的青少年乐队。

新兵乐队的《满腹衷肠》（Heart Full of Soul）和《我愿你》（I Wish You Would）现在已悄然加入歌单，观众不在跳舞的时候，布莱恩弹奏《快乐的亨德里克波尔卡》的无影手会让人目瞪口呆。“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小俱乐部看过布莱恩·梅演出，而且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后来皇后乐队的吉他手。”戴夫·迪洛威说。

这一年里大家还需要不断平衡好排练、演出和学习的时间。戴夫、约翰和布莱恩的父母能接受他们儿子的音乐爱好，但蒂姆的爸妈对这

种“乐队劳什子”并不看好。1965年底，在南安普顿大学读了一年的戴夫·迪洛威退学了，转到特威克南技术学院读电子高等教育。回到伦敦西郊的他能更快地在演出场地穿梭。

梅在帝国理工的人际关系也为1984乐队挣了一些预订场次，包括1966年的春季化装舞会。第二年，他们在帝国理工某个二楼房间里循环演奏歌曲，好让学生们一直跳舞，戴夫·迪洛威说：“主乐队在楼下大厅演奏。”中间休息时他们在两个房间来回跑，逃票混进楼下大厅，为了能听到一些对手乐队的歌单片段。

到本科第三年，乐队成员已成了鳗鱼派酒店和里士满车站酒店的常客，他们去看滚石乐队、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70]、三叉戟乐队和新兵乐队的演出。“我在大帐篷俱乐部^[71]看的新兵，杰夫·贝克那时刚加入不久，”梅回忆道，“埃里克·克莱普顿上来并在结尾时即兴合奏。我永远都忘不了。”克莱普顿的下一个乐队“奶油”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支三人乐队于1966年夏季首次亮相，秀出了他们准备在12月推出的第一张专辑《鲜奶油》（*Fresh Cream*）。奶油乐队与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并驾齐驱，随心所欲的声效和精湛的技巧催生了布鲁斯音乐的多样性演化。这两支乐队里的克莱普顿和亨德里克斯让梅大开眼界，让他看到了无限可能的音乐新世界。

布莱恩亲眼看到亨德里克斯在萨维尔剧院把谁人乐队比下去，不久之后，戴夫·迪洛威也在1984乐队的地盘——豪恩斯洛瑞奇提克俱乐部——近距离见证了吉米的演出。“那是个比本地村礼堂还小的俱乐部，”戴夫说，“扩音系统用的是一对4×12的喇叭加一个马歇尔^[72]音箱堆。难以置信。”很快地，克莱普顿和亨德里克斯的影响力就在1984乐队里体现出来了，后者的《自由之石》（*Stone Free*）加进了歌单。“布莱恩受到的影响明显从披头士乐队切换到了亨德里克斯和奶油乐队，”约翰·加纳姆回忆，“但我在1984时依然觉得我们应该唱些能让人们跟着跳舞的歌曲，像奶油乐队的《爱的阳光》（*Sunshine of Your Love*）就不算。我弹的是查克·贝里那种的噼里啪啦的风格。我弹不来埃里克·克莱普顿的花样，但布莱恩能弹，”戴夫·迪洛威补充道，“因为有了能演奏克莱普顿和亨德里克斯的吉他手，于是我们就这么随波逐流，裹挟在音乐潮流里往前跑。”

1967年2月，蒂姆满心欢喜地在本地报纸《米德尔塞克斯纪事》（*Middlesex Chronicle*）上找到一篇文章，宣称“迷幻音乐将长盛不衰”。为了跟上迷幻音乐时代，擅长电子设备的迪洛威尝试着做了一套

初级的灯光装置，灵感来自日渐崛起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但是1984成员那点奖学金根本买不起平克·弗洛伊德用的滑块和投影装置。“我们的照明设备非常原始。我们有想法也懂技术，但就是没钱，”戴夫笑着说，“我们买不起更大的灯泡！演出赚的都是小钱，但每一分我们都用在了乐队身上。布莱恩和我们一起的整个时期，我们都没有扩音系统：就只有两个AC30扩音器。”

也许真的像他们毫不介意地承认的那样，“1984终究是个不知名小乐队”，但在有布莱恩·梅的最后一个月里，乐队还是跌跌撞撞地迈出了接近音乐偶像的一步。戴夫·迪洛威在特威克南的课程让他认识了泰晤士电视台特丁顿录音室的实习技师们。录音室刚投资了新设备，需要一个乐队来试音。迪洛威便提了1984乐队。3月31日，乐队作为小白鼠在录音室待了一天（省掉了录音室应该要付给专业乐队的试音费用），录了不少歌曲，包括奶油乐队的《NSU》，山姆和戴夫组合的《坚持住，我就要来到你身旁》（Hold On I'm Coming），亨德里克斯的《紫色迷雾》（Purple Haze），埃迪·弗洛伊德的《祈求好运》（Knock on Wood）。今天听来，最突出的是梅的吉他演奏和史塔菲类似史蒂夫·温伍德的慵懒和充满感情的歌声。值得一提的是，史塔菲唱灵魂乐歌曲的声音听起来比唱《紫色迷雾》更舒服，而吉米的这首曲子自然更能让梅释放吉他。

1984乐队主唱和主音吉他手的不同音乐口味将成为后来的症结所在，但在1967年，蒂姆和布莱恩还是十分合拍，一起写了歌。那天的录音室记录下了梅和史塔菲共同创作的《践踏我》（Step On Me）的两个版本。“我那时并不知道布莱恩会尝试创作歌曲，甚至不知道他都已经有了概念了，”戴夫·迪洛威承认说，“我觉得我们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志向。”《践踏我》是1984乐队现场演出时唯一一首原创歌曲。除了优美的旋律和柔和的吉他独奏，这首歌最大的特点是精致的和声；有点像是梅后来在皇后乐队里全面运用的声效的早期雏形。

仅几周后，布莱恩又回到了录音室，这次是来给汉普顿文法学校的同学比尔·理查兹帮忙的。两年前，理查兹组建了一个名为“不当婚姻”^[73]的乐队，并于1967年1月私下发行了一张专辑。两个月后，理查兹作为作曲者，与百代旗下的阿德莫尔和比奇伍德^[74]音乐出版公司签约。理查兹想请梅帮忙增强乐队的声音。梅和乐队在特威克南的一间录音室里，为筹划中的迷你专辑（EP）录了四首歌曲。这张专辑后来没发成，但两个月后，阿德莫尔和比奇伍德公司付钱请他们做一次更高规格的录音。

这次，戴夫·迪洛威加入了，作为不当婚姻乐队的替补贝斯手。“我们被带去了艾比路录音室^[25]，”戴夫说，“那会正是披头士乐队的巅峰时期，所以可以说是非常令人兴奋了。”

比尔后来忆起，录音期间曾来过一个星探，但他没有被布莱恩的演奏所打动。未受影响的梅在7月份照旧参加了在伦敦摄政声乐录音室^[26]的第三次录音。不当婚姻乐队主唱亨利·希尔人声清晰，融合了奇想乐队^[27]的元素，但同时合唱的珍妮·希尔的唱腔更偏民谣。最终，比尔的作曲生涯未取得成功。但摄政声乐录音室的这段录音，被收录在不当婚姻乐队1993年的《疯狂的锁链》（*Crazy Chain*）专辑中，让皇后乐队的粉丝能够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吉他英雄尚且青涩的乐声；“绝世红”的音色点缀在一首首六十年代中期的古怪流行歌曲中，远不及皇后乐队里的壮丽。

在参加录音的间隙，梅还获得了一次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5月13日，1984乐队拿到了与“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共同在帝国理工演出的预订，这正好是后者发布首张专辑《你体验了吗？》的第二天。“布莱米”简直求之不得。但两支乐队之间其实并没有交流；除了吉米从更衣室出来，大步沿着走廊走过时问了一下蒂姆·史塔菲：“舞台是哪条道，兄弟？”那天晚上，布莱恩·琼斯也出现在亨德里克斯的随行人员中，他很快就要因为过度酗酒和吸毒被滚石乐队开除了。戴夫·迪洛威瞥见了有如鬼魅般的琼斯，尾随在亨德里克斯走向舞台的路上，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要虚弱病态。不到两个月后琼斯就死了。

1967年9月，1984乐队接到伦敦医学院的一场演出，被星探看上了，这促成了另一次与吉米的见面。“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迪洛威笑道，“这三个人说是要进入音乐行业打拼，在找经手的乐队。伦敦医学院的这场我们和另一个乐队演出重了。我猜他们可能看了那个团，然后决定还是选我们。”

约翰·加纳姆和理查德·汤普森也对这几个“有来头的人”的身份感到疑惑。不管怎样，他们的新赞助人观看了乐队排练，说他们需要提升一下形象。1984乐队早期的照片里，大家几乎都穿着瘦长的裤子，打扮成那时流行的伦敦切尔西帮派的感觉，蒂姆·史塔菲和约翰·加纳姆轮流戴一顶平顶卷边帽。有意思的是，看起来最不自在的竟然是布莱恩·梅；他一副郊区学生的打扮，穿着套头羊毛衫，抱吉他如同抱一卷舒服的毯子。蒂姆遗憾地说：“我从来都觉得布莱恩释放不出的那种危险气息，那时还挺需要的。”

乐队现在要学着拥抱时尚了。虽然史塔菲后来声称他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衬衫的嬉皮士“爱之夏”^[78]造型，但眼下他也只能和其他人一样与时俱进。9月9日，一番精品店购物之旅后，他们出现在克罗伊登顶级俱乐部^[79]参加一场乐队比赛，个个看上去都有点明日之星的样子，连布莱恩都打扮好了。

比赛是思高^[80]磁带赞助的，参赛乐队必须提交使用思高磁带录制的歌曲。1984乐队提交了两首歌：埃弗利兄弟乐队的《雨中哭泣》（Crying in the Rain）和马文·盖伊的《那不是很怪吗？》（Ain't That Peculiar?）。那天晚上，他们演了两回（第一次是给一位名叫丽萨·佩雷兹的不知名歌手当伴奏团），正式演完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比赛。“不过那就是个笑话，”戴夫笑着说，“得奖之后啥也没有。”

获奖乐队只收到一盒思高磁带以及每人一张质量粗劣的专辑，有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81]的《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被蒂姆·史塔菲哄去了），最差的一张爱尔兰乐队主创人汤米·马克姆的专辑给了戴夫·迪洛威。“就是这些，几张破专辑。”约翰·加纳姆说。

好在获胜乐队有拍照纪念，留下了一张1984乐队当年的形象。二十岁的布莱恩·梅的头发是按披头士的样子做的，穿了亨德里克斯同款军装夹克。蒂姆·史塔菲如今懊悔不已，他那天穿了一件带粉色波点的衬衫。

接下来乐队又参加了另一场所谓的比赛，一群人挤在理查德·汤普森的运货车上，长途奔波到伦敦东部的福里斯特盖特，到上勾拳俱乐部^[82]里为目前为止最多的观众表演。“这家俱乐部是拳击手比利·沃克开的，”汤普森说，“谁人乐队作的开场，我甚至都搞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比赛。我感觉只是一个吸引人群的噱头。那天晚上我们的观众有几千人。”

满口大话的经理人消失得就像他们出现的一样快。不过，这些人的忽悠能力竟然还是给乐队弄到了“地球圣诞延续不断”特别演唱会的演出机会。“地球圣诞延续不断”是12月22日在伦敦肯辛顿奥林匹亚举办的一场音乐盛会，十五场表演将持续一整个通宵，包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谁人乐队（根本没来），移动乐队^[83]，软机器乐队^[84]，以及头牌吉米·亨德里克斯。

演出前，乐队所谓的经理人打发他们去买些新服装。“我印象中是

蒂姆和理查德去卡纳比街给我们买了穿的东西，”约翰·加纳姆回忆说，“他们给了我一套黑色衬衫配银色马夹。”不过蒂姆·史塔菲记得的是，“经理给我们买了天鹅绒的守卫夹克，让我们化了浓妆。十分难看。”打扮一新之后，乐队开车去奥林匹亚，把车停在一条背街上，开始卸装备。

进了演出场地，他们被告知上台时间“非常晚”。乐队只好留在表演人员专用观看区俯瞰舞台。看了好几个小时无休止的试音之后，终于等到了移动乐队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表演。在舞台换布景的空档，他们到奥林匹亚的餐厅去，在那里又见到了吉米·亨德里克斯。“我记得我当时脑子里在想，‘哇，我们要发达了。’”约翰·加纳姆说。随后而来的是：“到凌晨1点，我们准备要上台了，有个家伙冲过来说：‘不不不.....’，于是又回来等了几个小时。”最后，根据乐队成员叙述的不同版本，1984乐队终于在12月23日凌晨4点半到6点的某段时间登台演出了。“舞台下面全是喝醉的、不省人事的观众，我们这才亮相，”蒂姆·史塔菲说，“我觉得那时候人们已经听够了，”约翰补充道，“我们只能专心表演并且期望不要出事，谢天谢地，没有被嘘下台去。”“因为我们不是正规签约的乐队，没有版权费用，我感觉我们有一段曲目被用到了电视节目上，”戴夫·迪洛威回忆说，“回想起来，那场演出很普通，只不过声音够大。”

糟糕的事情在后面。乐队回到更衣室后，发现他们的钱被偷了。然后，在奥林匹亚演出场地里耗了差不多十五个小时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12月底清晨寒冷的马路上，发现车子也被拖走了。据戴夫·迪洛威说，乐队仍穿着花哨的演出服装，“带着艳俗的化妆痕迹”，再艰难徒步走到4英里外的汉默史密斯警察局。付了罚款把车子取回来之后，筋疲力尽的他们还要恍惚地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想办法把圣诞礼物买好。虽然对乐队来说，奥林匹亚盛会是他们级别最高的一次演出，但它也预示着结束。

新年刚过几个月，布莱恩就从1984乐队退出了。他的本科到了最后一年，不得不全力认真学习了。他们做出了友好的分手决定。“我们没想着要改变世界，”戴夫·迪洛威耸耸肩，“我并没有料到布莱恩·梅想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乐队勉强延续，蒂姆兼任主唱和主音吉他手，但不久之后，他就会被布莱恩怂恿，回去继续和他一起搞音乐。

远离舞台和录音室的地方，另一个实际上更为重要的联系正在形成。史塔菲在伊林学院新认识的同学里，有一个人成了1984乐队的忠实

观众。“他是蒂姆的朋友，超级喜欢亨德里克斯，最爱那种场面，”戴夫·迪洛威说道，“他常常作为我们的演出帮工，免费进入演出场地。他从来没提过唱歌或者演奏，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他懂音乐。”这位帮工的名字，叫作弗雷迪·保萨拉。

枪炮与玫瑰乐队的前鼓手马特·索兰喜欢讲述皇后乐队罗杰·泰勒的一件逸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五岁的索兰和朋友们常在洛杉矶日落大道上消磨夜晚时光。一天晚上，这群人看见一辆劳斯莱斯在一家好莱坞夜总会外面停下来。车门打开，罗杰·泰勒闪亮登场。鼓手戴着墨镜，通身雪白的西装，一手拿着装有起泡酒的高脚杯，另一只手搂着漂亮的姑娘。从那一刻起，索兰说：“我就想要成为罗杰·泰勒。”

时间快进到2005年，泰勒此刻坐在伦敦领土剧院^[85]楼上无人的酒吧里，厅里正在上演皇后乐队出品的音乐剧《我们将震撼你》，这部剧已经在伦敦西区连演三年。他抚着自己白色的山羊胡子，相当羞涩地一笑。“我总觉得做人就是要开心享受啊，”他点头，然后笑出声，“哦，天哪，我是不是太俗了？”皇后乐队即将在时隔十九年后再次举办巡演。只不过现在乐队成员只剩下泰勒和布莱恩·梅，弗雷迪·莫库里的角色由保罗·罗杰斯担当，他是依然坚挺的布鲁斯摇滚乐队坏伙伴乐队^[86]的主唱，在此之前则是自由乐队^[87]的主唱。罗杰斯告诉评论家们，他可不会穿前任主唱的那种“连体紧身服”。应该说皇后乐迷、评论家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担忧看待这个新的组合。泰勒却完全对这次巡演充满信心，正如在皇后乐队生涯开端时的态度一样，他等着斥退那些唱反调的人。“取悦评论无异于找死，”他这么说，“这大概就是我们依旧存活的原因。”

1967年初，当身在伦敦的弗雷迪·保萨拉和布莱恩·梅为吉米·亨德里克斯惊羡不已时，十八岁的罗杰·美多斯·泰勒则自有打算。泰勒家住康沃尔郡的特鲁罗，他驱车160英里到了布里斯托尔，这是吉米的巡演离他最近的城市。泰勒立刻被折服了，连续看了三场亨德里克斯的现场。回到特鲁罗后，他自己的反响乐队^[88]便着手让声音更激进，不再翻唱摩城音乐^[89]和流行歌曲，努力模仿这种激动人心的新音乐，跟布莱恩·梅在1984乐队里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到了1967年夏天，泰勒离开特鲁罗到伦敦医学院学习牙科课程。反响乐队还在，不过罗杰搬去首都这件事，最终会导致这支曾被称为“康沃尔冠军”的组合解散。

罗杰·泰勒（“美多斯”是家族名）于1949年7月26日出生在西诺福克郡国王林恩医院^[90]，父母分别是迈克尔和威妮弗蕾德。迈克尔是英国食品部的一位管理者（任马铃薯市场委员会监管员），威妮弗蕾德可以算是有音乐基因，幼时曾演奏过手风琴。1953年女儿克莱尔出生后，全家从国王林恩搬到了美丽的集市小镇特鲁罗，它自封为康沃尔的“首府”。

罗杰就读于波斯维格花园小学^[91]，八岁时就在那里开始弹尤克里里琴。没过几个月，他就成立了一个即兴摇滚乐团，叫作开心冒泡男孩组合^[92]，他弹尤克里里琴，其他成员有几个弹吉他的，还有一个弹必不可少的自制茶箱贝斯。他们在学校舞会上表演过，但泰勒自称“演得很差劲，真的很差”。1960年5月，十一岁的他拿了特鲁罗教会学校^[93]的唱诗班奖学金；要求在所有场合参加演唱，并在礼拜天在学校唱诗团唱好几次。仅四个月后，他又拿到了有名的特鲁罗学校^[94]的奖学金，转学过去了。这时候，某位有丹赛特（Dansette）唱片机的表哥向罗杰介绍了猫王和杰瑞·李·刘易斯。很快地，他的新欢就从尤克里里琴换成了一把便宜的木吉他。罗杰接触了吉他的入门知识，旋即又被另一种更吵的乐器所吸引。

“我记得曾拿我妈的毛衣针敲打她的那些平底锅，”罗杰说，“然后我爸在单位的储藏箱里找到一个老旧的小军鼓。那就是我的起点。”1961年圣诞节，迈克尔·泰勒为儿子买了新的小军鼓和一个镲。不久后，他得了一套旧的阿贾克斯架子鼓：“有一个嗵鼓，一个低音大鼓，一个小军鼓和一个小镲。”这就足够他起步了。

1964年，由于父母分居，罗杰和妹妹克莱尔跟随母亲离开法尔茅斯路的旧家，搬到了贺兰路的一幢新房子，不止一位邻居仍能记起“那个吵得要死的小孩，总是开着车库门在那里敲鼓”。十三岁的罗杰再次被1963年的金曲《钻石》（Diamonds）刺激得蠢蠢欲动，这首由前影子乐队成员杰特·哈里斯和托尼·米翰创作的歌曲有着狂热的节奏感，击打着年轻鼓手的心。在出去念书前，他在一个三人团里负责打鼓，另外两位是特鲁罗的学生，贝斯手大卫·道丁和吉他手迈克·达德利。他们的名称变了几次，有“杰克表哥组”^[95]、“无限节拍团”^[96]，可能还叫过“猎鹰组合”^[97]，三个人在道丁父母位于特鲁罗附近新米尔斯的谷仓里排练；练习简单翻唱影子乐队的《阿帕奇》（Apache）和《FBI》（布莱恩·梅和戴夫·迪洛威也在同样的时间点做着同样的事），还有泰勒的拿手好戏——一首小军鼓鼓点很重的冲浪团^[98]乐队的《跌落》（Wipe Out）。

在这期间，一位主唱加入了三人组，他们开始在学校、私人聚会和

特鲁罗青年自由党募款场合上演出，募款这场是罗杰的校友、已故自由党议员大卫·彭哈利根组织的。“我经办了那场演出，赔了不少钱，这可能对青年自由党处境的一种反映吧。”彭哈利根回忆道。泰勒学生时代的其他同龄人回忆起这个男孩，都说他“为鼓痴狂”，带着彭哈利根口中所说的“想要成为明星的痴迷”。“我一直想成为摇滚乐队的一员，不一定非要是摇滚明星，”泰勒在1999年声称，“当然我以前听音乐看歌手表现时也想：‘我要来点这样的。’”

到1965年，无限节拍团已经不能满足泰勒和迈克·达德利的水平了。特鲁罗的音乐圈子从镇上的夜总会到福特音乐商店，延伸到老桥街的咖啡吧，于是契机出现了。本地乐手约翰·格罗斯，艺名约翰尼·奎尔，找到了罗杰和迈克，请他俩加入他的伴奏乐队。迈克·达德利将奎尔描述为“猫王/比利·弗里^[99]附身”，他梳着猫王的飞机头，试图唱得和他心目中的英雄一样好。

以约翰尼·奎尔和反响乐队^[100]为名头的组合里现有泰勒和达德利（目前弹键盘），贝斯手吉姆·克雷文，吉他手格雷厄姆·汉金斯和萨克风手约翰·斯内尔。最后一位绰号“艾可”，以此向偶像——演奏传统爵士乐的“单簧管大师”艾可·比尔克致敬。3月，经过几周的排练，他们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特鲁罗摇滚与节奏乐锦标赛，在特鲁罗市政厅^[101]首次登台演出，演奏了披头士乐队、罗伊·欧比森和猫王的曲子，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总共十五队参赛）。

特鲁罗学校的同学杰夫·“本”·丹尼尔当时在另一个乐队里演奏吉他。这些乐队来自西康沃尔和东康沃尔，所以也分成了两个派系，”他解释说，“竞争非常激烈。我觉得罗杰很气愤，因为那天他们没赢得冠军。他最喜欢说的就是‘我要当明星’。这句话他随时都挂在嘴边，大家都听腻了。”泰勒已经展示出远见和野心勃勃的企图。“他来看过我那个团在坎伯恩的演出，”丹尼尔回忆道，“第二天上学时他来找我，说：‘如果你在那个乐队待够了的话……’”

丹尼尔后来的确接受了泰勒的提议，不过那是下一年的事了。在此期间，约翰尼·奎尔和反响乐队整个夏天都固定在特鲁罗、彭赞斯和法尔茅斯演出。泰勒在家听的音乐里最受启发的是新兵乐队和谁人乐队，直到1966年听到《左轮手枪》（*Revolver*）专辑后才转向披头士乐队。舞台上他充满自信的打鼓风格是在效仿偶像，谁人乐队的基思·莫恩。“莫恩有独一无二的风格，”泰勒说，“他没有模仿任何人。谁人乐队就是如此爆裂：真实的能量，真正的艺术。”那个秋天，他的偶像在

坎伯恩室内溜冰场演出，泰勒带着女朋友去了现场，当莫恩把鼓棒甩给观众时他也去抢，没抢到。不久后，泰勒开始与特鲁罗文法学校^[102]一名叫吉尔·约翰逊的女孩交往。吉尔是女子三人民谣摇滚组合成员，曾取名做三杰乐队^[103]，迈克·达德利的女朋友也是这个组合的。特鲁罗的某处应该有这么一盘磁带，记录着罗杰为三个女孩伴奏的鼓声，是他罕见地涉足民谣的经历。不论台上台下，有没有固定女朋友，泰勒的金发和姣好面容都给他带来了许多女孩的青睐。迈克·达德利回忆说，错失摇滚与节奏乐锦标赛冠军后，罗杰转头就勾搭上了跟着获胜乐队来的啦啦队美女。

9月，一次口角之后约翰尼·奎尔愤而离开了乐队。由于对猫王十分崇拜，他特别要求每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要空出来，他好到特鲁罗广场去看猫王的电影。然而，乐队接受了一次演出预订，迫使作为专业人士的约翰尼只能放弃安排才能完成演出。他怒不可遏，立即辞职。乐队没有气馁，他们找到了接替者，一个兼职乡村舞会推广/唱歌、本职是肉铺助手的人，叫作罗杰·“桑迪”·布罗肯希尔。“桑迪”是个演出老手，拥有一头蓬乱的发型和许多华丽的舞台服装，自童年起就开始上台表演了。事实上，这名二十四岁的歌手和前任主唱是同一块料子，他彪悍的嗓音足够让他高歌詹姆斯·布朗的《我要疯了》（I Go Crazy）和雷·查尔斯的《我该说什么》（What'd I Say）了。“罗杰·泰勒不算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鼓手，”多年以后，布罗肯希尔回忆道，“但他人长得好看，而且很懂音乐。他以前常在我工作的肉铺外面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去演出。”

一位乐队成员回忆，布罗肯希尔常常带着“刚做完香肠的油膩”就来了，目前反响乐队的曲目既有高爆发的灵魂乐歌曲（如1984乐队也加入歌单的《我的姑娘》和《祈求好运》），也有时兴的摇滚乐，如滚石乐队的《满足》（Satisfaction），这首歌由泰勒边打鼓边唱主音。1966年3月，以新面貌出现的反响乐队（名字也从The Reactions调整成了The Reaction）重新参加了在市政厅举办的摇滚和节奏乐锦标赛。此时吉他手杰夫·“本”·丹尼尔已经加入。“自从‘古代中东国王本—哈达德’事件之后，学校里大家都叫我本，”他说，“我在宗教研究课上过于大声地念出他的名字，引起哄堂大笑。之后这个外号就叫开了。我觉得格雷厄姆·汉金斯和反响乐队的其他成员闹翻了，于是我在1966年初加入了。”

市政厅演出上，乐队以高领黑色毛衣亮相，泰勒的低音鼓皮上涂着很时髦的靶标图案，他们倾情演奏了威尔逊·皮克特的《午夜时分》（In

the Midnight Hour) 和雪莉丝^[104]乐队的《明天你依然爱我吗?》(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虽然罗杰·布罗肯希尔穿着花花绿绿的裤子和又粉又蓝的羊皮夹克,但没破坏他们的光彩表现。反响乐队领跑比赛,击败了特鲁罗的陌生人乐队、纽奎的另外五人乐队^[105]和法尔茅斯的康蒂基党乐队^[106]。据《西英及皇家康沃尔公报》(West Briton and Royal Cornwall Gazette)报道,他们赢得了比赛,并“淹没在年轻姑娘的包围中”。

作为竞赛获胜者,反响乐队的演出量增加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头衔:“康沃尔冠军”。他们在托基镇大厅^[107]为奇想乐队暖过场,在雷德鲁斯的弗拉明戈舞厅^[108]为盖瑞和领跑者乐队^[109]开场,并在特鲁罗一家叫PJ's的新俱乐部固定驻唱。当地小老板里克·埃文斯在一场婚宴演出上初识反响乐队。二十一岁的埃文斯不久前买了一家帐篷公司,正好为这场婚礼提供帐篷租赁。他和泰勒成了朋友。“那时候我只要接手婚庆都会订反响乐队去演出,”里克说。“他们是支很不错的乐队。鼓手兼歌手是很少见的,除了戴夫·克拉克五人组^[110],但罗杰那时候就已经唱得很棒了。”

一个周末,反响乐队要在托基市作为纳什维尔青少年^[111]组合的暖场乐队,但贝斯手吉姆·克雷文没法来,换成了里克·彭罗斯。彭罗斯在特鲁罗教会学校时就见过罗杰。他本来是陌生人乐队的贝斯手,在演出圈子里又和罗杰联系上了。托基这场,里克见识了反响乐队鼓手在泡妞上的手段。“演出结束后,罗杰用我们的车送几个姑娘回家。他下车带着人走了,再没回来。搞得我们不得不帮他把鼓一个个拆下来,然后拎着所有装备被扔在大街上。天知道他把我们晾在那里等了多久。”带着同样又好气又好笑的语气,里克又说起罗杰拼命保护架子鼓的事。“我们在普利茅斯技术学院演出过,那儿的舞台是抛光的木地板。因为罗杰打低音大鼓实在是用力,鼓一直在动。所以演出前,他找了些6英寸长的钉子,把鼓下面的支脚直接钉在了舞台上。”“这种事把人们气个半死。”迈克·达德利回忆说。

不管怎样,彭罗斯算是成为反响乐队正式成员,10月份时他和乐队及前主唱约翰尼·奎尔一起去了韦德布里奇的录音室录音。奎尔已经和百代制作人诺里·帕拉莫签了合约,要录一段小样给他。“诺里的一个朋友在经营这家录音室,”杰夫·丹尼尔解释说,“约翰尼想做一张他喜欢的音乐类型的迷你专辑,也就是猫王那样的风格。我们同意做他的伴奏乐团,但老实说,那天基本就是他自己在做主。”在陪同奎尔录了四首

音轨后，录音室工程师给开了个后门。“我们偷偷地塞给他几英镑，”丹尼尔说，“他让我们录了几首歌。”反响乐队即兴录制了《拥有你感觉太美妙》（I Feel Good I Got You）和《午夜时分》，罗杰主唱，这成了未来皇后乐队鼓手的第一盘专业录音带。

重听约翰尼·奎尔的迷你专辑，这个团队的一些不足显现了出来。“我们开除了约翰·斯内尔，因为他那该死的萨克斯风从来没在调子上，”迈克·达德利说，紧接着罗杰·布罗肯希尔也走了。“桑迪是很优秀的主唱，因为他特别有活力。他绝对是能表现的人，”里克·彭罗斯笑道，“倒不是背后说他坏话，但他太喜欢尖叫嘶吼了，还经常穿着那件搞笑的羊皮外套跑来跑去，感觉是在模仿桑尼·波诺……”到了鲍勃·迪伦《重返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的时代，反响乐队的演奏曲目加入了这张专辑里的三首歌，布罗肯希尔那种歌舞表演的风格已经显得不协调。“他和罗杰、迈克闹得不愉快，”杰夫·丹尼尔回忆道，“但我是置身事外的。”然而，其他人记忆中布罗肯希尔的退出有所不同：乐队的其他成员没去肉铺接他演出之后他才得到消息。布罗肯希尔没有在意，他改了个艺名叫“摇滚罗杰·迪”，此后三十年间一直在康沃尔郡的俱乐部圈子里演出。

和布莱恩·梅的学校乐队情况一样，反响乐队从1967年起出现了变化。“我们都迷上了奶油乐队和亨德里克斯，”杰夫·丹尼尔说，那年夏天他离开了乐队去上大学。泰勒的架子鼓更进一步移到了舞台中间前部，这个唱歌的鼓手（现在乐队里给他取了外号“大斑块”）成了反响乐队的队长，其他人都乐意跟随他。除了基思·莫恩，泰勒又多了一个崇拜的偶像，那就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乐队的鼓手米基·米歇尔。“罗杰总是很有远见，”里克·彭罗斯说，“任何乐队里总有人只是图个好玩，但罗杰是真的有野心的。”

从接管以来，泰勒一直尽可能地确保反响乐队拿到最好的演出，还在当地演出中介那里做了登记。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找预订更省钱，于是放弃了中介自力更生。舞台上，想要制造惊喜的他想出一招，结束演出的时候在镲的边缘喷上汽油然后点燃。同时，泰勒家祖传钢琴被他撕开木质外壳，喷上漆运送到演出的地方，在疯狂地演绎威尔逊·皮克特的《千舞之地》（*Land of 1000 Dances*）的同时，罗杰会用锤子猛锤钢琴。泰勒反反复复念叨的那句咒语，“我要当明星”，现在看起来更可信了。

不过反响乐队这种灵魂乐歌舞剧风格的表演没有持续太久。里克·

彭罗斯比泰勒和达德利大一岁，加入乐队的同时已经有一份全职工作。现在乐队缩减到了三人，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受奶油乐队和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乐队的启发，反响乐队更新了，迈克·达德利卖掉了旧琴，购入一把白色的吉米款斯特拉托卡斯特电吉他。罗杰和迈克听的音乐风格也在转变，他们爱听谁人乐队的《售罄的谁人》（The Who Sell Out），奶油乐队的《迪斯雷利装备》（Disraeli Gears），以及亨德里克斯的《你体验了吗？》。演奏曲目也跟着变了。“我感觉挺难的，”彭罗斯承认，“乐队有五六个人的时候，还是令人安心的。现在我们就三个人，必须更加努力。我参加乐队是出于兴趣，但那时乐队之外的压力在逼迫我离开。”

里克处于既要对乐队负责又要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两难中。1967年2月，去演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后，他才做出了决定。当时罗杰驾驶着乐队的福特泰晤士商人牌小货车。后面坐着里克、迈克·达德利和其他四个朋友，包括特鲁罗学校的学生兼演出工作人员尼尔·巴特斯比和彼得·吉尔-凯利。十七岁的泰勒刚刚通过驾照考试，原本的司机巴特斯比把车钥匙交给了他。

大雨和浓雾中开车经过康沃尔的印第安奎斯村时，泰勒没看到半路上停着一辆关了灯、无人看管的运鱼卡车，卡车和乐队的小车撞得各自翻倒，罗杰自己被甩出挡风玻璃。但有如神助般，竟然没受什么伤。但同车的里克·彭罗斯被撒下的玻璃碎渣割伤多处，迈克·达德利的鼻子和手都破了。然而受伤最严重的是彼得·吉尔-凯利，他肺部穿孔。虽然最终康复，但还是住院休养了好几个月。随后的保险索赔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解决，因为那辆卡车车主拒绝为这次撞车负责。这件事给所有当事人都留下了一道阴影。“那次可怕的事成了转折点，”里克·彭罗斯说，“本来人们就想让我离开乐队，接着又发生了这种事。这也太巧了。”

对于罗杰和其他人来说，还有个念大学的问题。泰勒后来声称他是一个“懒学生”，但是1967年夏天离开特鲁罗学校的时候，他依然拿到了7门O-level和3门A-level（分别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尽管他的A-level成绩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他的老同学大卫·彭哈利根后来开玩笑说：“我们总说因为他（罗杰）拉人进乐队，搞砸了起码四五个人的学业前途。”不过迈克·达德利是这个说法的反例，他后来去了牛津大学。在里克·彭罗斯的记忆中，泰勒那时面临着来自父母的沉重压力：“罗杰已经准备好去上大学，他妈交代他说：‘罗杰，不许你到那边之后又开

始搞什么乐队。””

泰勒只能把鼓都留在家里，1967年10月，他在怀特查佩尔区的伦敦医学院开始了牙医专业的第一学年。泰勒在辛克莱花园路19号找了一间位于一楼的公寓，和其他四个人合租，包括一个也是来自特鲁罗的男生莱斯·布朗。巧得很，布朗正好在帝国理工学院上学。泰勒开始他的本科课程的同时，布莱恩正在帝国理工埋头于第二年的学业，弗雷迪·保萨拉也在伊林艺术学院开始了大二课程。接下来在伦敦度过的这一年，泰勒遵照母亲的要求没有打鼓。无鼓可打，他便前往大帐篷俱乐部看别人打，很快辛克莱花园路的公寓里就回荡着前卫摇滚的重重声响，包括自由乐队的首张专辑《一把呜咽》（*Tons of Sobs*）、家庭乐队^[112]的《娃娃屋之声》（*Music in a Dolls House*）等。

1968年，罗杰回特鲁罗过暑假，又重新启动了反响乐队，只要当地可以用的乐手他都拉进来。受到伦敦演出市场的启发，泰勒与帐篷租赁公司的朋友里克·埃文斯达成了协议，办几场他们自己的演出。

以“体验夏日海滨之声”为名，这场活动由反响乐队提供现场音乐，里克聘请一个收门票的，收益平分（“门票是每人五先令”）。“我们把帐篷扎在康沃尔各处，”埃文斯说，“最棒的一次演出是在佩伦波斯海滩。那里的救生俱乐部有烧烤，反响乐队表演音乐。不幸的是，地方议会不允许我们在那演出，所以我们没再回去过。很多时候，我们就在一些小海湾边上搭个帐篷，甚至都不知道这片地方是谁的，泰勒他们插上电就开始演了，能赚一些门票钱。纯粹是跟着感觉走。”有一次，在圣艾格尼丝附近特弗拉斯港的隐蔽海湾上举办的活动正好遇上雷暴雨，只有寥寥几个付了钱的船夫来看。“我记得我就看到五个小混混，在水坑里跳来跳去。”里克·埃文斯笑着说。

随着假期的结束，反响乐队因为种种理由而永远解散了：妻子、家庭、正当工作、读大学都导致了它的终结。迈克·达德利回到牛津大学，虽有继续演奏音乐，但最终从事了保险业；里克·彭罗斯曾在一个歌舞乐团演出，后来成为一名摄影师；杰夫·“本”·丹尼尔担任工程顾问，后来搬去了香港。里克·埃文斯仍在特鲁罗经营着他的帐篷租赁公司。当泰勒在采访中被问及反响乐队的那些岁月时，他总是显得很不好意思。“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上学时组了一支乐队。它是在学校成立起来的，最后慢慢地从不怎么样的乐队变成了还不错的乐队，”他有次说，“我一直是领头人。我应该就是团队里的那个推动者。”

1968年秋季，回到伦敦医学院，泰勒的这种主动性将会让他脱颖而出。在特鲁罗再次演出让他意识到了生活中缺失的部分。此外，他对牙科课程也失去了兴趣。“我只是跳出了那种中产阶级的人生规划，”他说道，“你必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好好发展事业之类.....我找到了留在伦敦但又不用非要上班的办法。”他急切地想要组一支新乐队，甚至联系了里克·彭罗斯，邀请他来伦敦。“但我拒绝了，”里克说，“对此我并不后悔。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命运是注定的。”

要不了多久，泰勒就会找到他的新队友了。那年秋天，他的室友莱斯·布朗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布告板上看到一张钉着的卡片。要求很简单：“招募金格·贝克^[1]/米基·米歇尔风格的鼓手”。十九岁鼓手的人生新篇章由此开启。“在乐队里打鼓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多年后，泰勒坚持说，“我时刻想着要这么做，最终这件事也占了上风。我站出来应征，就是它了。”

[1] 出自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专辑《你体验了吗？》（Are You Experienced?）。

[2] 英文名为“Isleworth Polytechnic”。

[3] 弗雷迪（Freddie）是弗雷德（Fred）的异体，男子名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昵称。

[4] 英国现任女王每到圣诞节会对民众作节日致辞，此处用Queen一词有双关之义。

[5] 又称拜火教，祆教。

[6] 原文拼作“Naojote”。

[7] 英文名为“St Peter's Boys School”。

[8] 英文写作“Little Richard”，是理查德·韦恩·潘尼曼（Richard Wayne Penniman）的艺名。

[9] 他的真名是Antoine Domino Jr.，“胖子”是他的绰号。

[10] 英文名为“The Hectics”。

[11] “Skiffle”，又称噪音爵士乐。

[12] 英文名为“The Coasters”。

[13] 指的是迪翁·迪穆奇（Dion DiMucci），美国老牌摇滚歌手。

[14] “龅牙”（Bucky）的昵称。

[15] O-Level，相当于国内的中考。

[16] 英文名为“Pemba People's Coalition Party”。

[17] 英文名为“Afro-Shirazi party”，简称“ASP”。

[18] 英文名为“Ealing Technical College and School of Art”。

[19] A-Level，英国高中课程，也是英国大学入学必备资质。学制两年，包含七十多门课程，一般学生选择三至四门来学，通常在十五至十八岁就读并参加考试。弗雷迪来到英国后十八岁才开始学，算比较晚的了。

[20] 英文名为“The Beach Boys”。

[21] 英文名为“Eel Pie Island Hotel”。

[22] 英文名为“Yardbirds”。

[23] 英文名为“The Tridents”。

[24] 英文名为“Howlin' Wolf”。

[25] 英文名为“Butterfield Blues Band”。

[26] George Melly，英国爵士乐和布鲁斯乐歌手、评论家、作家、演说家。

[27] Tennessee Williams，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28] John o'Groats，位于大不列颠岛最北端的苏格兰小村庄。

[29] 英文名为“Mike Cotton Sound”。

[30] 英文名为“The Graham Bond Organisation”。

[31] 英文名为“Cream”。

[32] 英文名为“Speakeasy club”。

[33] 英文名为“The Troggs”。

[34] 英文名为“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

[35] Bag O'Nails，位于伦敦著名的卡纳比街区（Carnaby Street），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放异彩，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和后来的妻子琳达在该酒吧第一次邂逅，也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乐队首演之地。

[36] 两人于2000年结婚。

[37] 英文名为“Gloucester House Nursing Home”。

[38] 1码约等于0.9144米。

[39] 英文名为“Hanworth Road Primary School”。

[40] Buddy Holly，美国五十年代重要的前卫摇滚乐手，二十二岁不幸空难身亡。

[41] 英文名为“The Everly Brothers”。

[42] Connie Francis，美国五六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

[43] Dan Dare and the Eagle是1950年4月首次面世的讲述未来飞行员丹·戴尔冒险故事的科幻漫画书。

[44] 英国一些小学采用的升学资格考试。

[45] 英文名为“The Shadows”。

[46] 英文名为“The Ventures”。

[47] Les Paul，美国著名爵士音乐人、殿堂级吉他演奏家。他发明的实心电音吉他被摇滚乐手广泛使用，推动了电吉他的制作和发展。

[48] The Admirable Crichton，十九至二十世纪苏格兰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爵士的一部戏剧，巴利最有名的著作是《彼得·潘》。

[49] The Rival，英国十八世纪最有名的喜剧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立敦（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创作的著名风俗喜剧。

[50] Hofner Colorama，就是芬达·斯特拉托卡斯特吉他（Fender Stratocaster）的仿制款。

[51] 英文名为“Telecaster”。

[52] Burns，英国著名电吉他和贝斯品牌，由詹姆斯·奥莫斯通·伯恩斯（James Ormston Burns）和爱丽丝·路易丝·法瑞尔（Alice Louise Farrell）创立。

[53] 英文名为“Manfred Mann”。

[54] 英文名为“The Moody Blues”。

[55] 英文名为“Chris and The Wirlwinds”。

[56] 英文名为“The Railroaders”。

[57] 英文名为“The Fifth Column”。

[58] 英文名为“The Whitton Beat Club”。

[59] 英文名为“Sam and Dave”。

[60] 英文名为“The Fire”。

[61] 英文名为“The Strawbs”。

[62] 英文名为“The Others”。

[63] Brian Jones，滚石乐队创建人之一。

[64] 英文名为“The Sands”。

[65] The Spotnicks，瑞典一支器乐摇滚乐队，名字取自苏联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地球卫星。与影子乐队和冒险乐队一起被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器乐乐队。

[66] 英文名为“Shepperton Rowing Club”。

[67] 英文名为“Martha and The Vandellas”。

[68] 英文名为“Feltham R&B Club”。

[69] 英文名为“White Hart”。

[70] 英文名为“Fleetwood Mac”。

[71] 即著名的The Marquee Club，是伦敦六七十年代摇滚的经典集散地，但已在新千年关闭。齐柏林飞艇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之体验、新兵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谁人乐队、大卫·鲍伊、滚石乐队和皇后乐队均曾在这里演出。

[72] 英文名为“Marshall”。

[73] 英文名为“The Left-Handed Marriage”。

[74] 英文名为“Ardmore and Beechwood”。

[75] 即著名的Abbey Road Studios，披头士乐队有多首歌曲在此录制，1969年发行的《艾比路》专辑封面照片是四人穿过艾比路的斑马线，让这条马路和录音室成了摇滚圣地。

[76] 英文名为“Regent Sound”。

[77] 英文名为“The Kinks”。

[78] Summer of Love，1967年夏天旧金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爱”是那场运动的口号，故得此名。

[79] 英文名为“Croydon's Top Rank Club”。

[80] Scotch，属于3M旗下品牌。

[81] 英文名为“Simon and Garfunkel”。

[82] 英文名为“Upper Cut Club”。

[83] 英文名为“The Move”。

[84] 英文名为“Soft Machine”。

[85] Dominion Theatre，亦是弗雷迪·莫库里最后一次现场真唱表演的地方。

[86] 英文名为“Bad Company”。

[87] 英文名为“Free”。

[88] 英文名为“The Reaction”。

[89] 英文名为“Motown”。

[90] 英文名为“West Norfolk and King's Lynn Hospital”。

[91] 英文名为“Bosvigo School”。

[92] 英文名为“The Bubblingover Boys”。

[93] 英文名为“Truro Cathedral School”。

[94] 英文名为“Truro School”。

[95] 英文名为“Cousin Jacks”。

[96] 英文名为“Beat Unlimited”。

[97] 英文名为“The Falcons”。

[98] 英文名为“The Surfari”。

[99] Billy Fury （1940—1983），英国五六十年代著名摇滚歌手、演员，在英国取得过歌曲入榜332周的成绩。

[100] 英文名为“Johnny Quale and The Reactions”。

[101] 英文名为“Truro City Hall”。

[102] 英文名为“Truro Grammar School”。

[103] 英文名为“The Three Jays”。

[104] The Shirelles，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支美国节奏布鲁斯和灵魂乐女子乐队。

[105] 英文名为“The Other Five”。

[106] 英文名为“Kontiki Klan”。

[107] 英文名为“Torquay Town Hall”。

[108] 英文名为“Redruth's Flamingo Ballroom”。

[109] 英文名为“Gerry and The Pacemakers”。

[110] The Dave Clark Five，成立于五十年代的英国流行摇滚乐队，1970年解散，2008年入驻“摇滚名人堂”。灵魂人物戴夫·克拉克是鼓手兼主唱，后来成为弗雷迪·莫库里的密友。

[111] 英文名为“The Nashville Teens”。

[112] 英文名为“Family”。

[113] Ginger Baker，奶油乐队的鼓手。

第三章 幸运的巧合

一开始我就充分准备好挨饿。无论熬多久，必须要相信自己。

——弗雷迪·莫库里

我只想回家做个送奶工。

——米克·“米弗”·史密斯，莫库里的第一支乐队“野山羊”^[4]的鼓手

正是在伊林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谁人乐队的彼得·汤申德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砸毁电吉他的迫切需要。彼得是1964年毕业的两年制学生，在听到讲师古斯塔夫·梅茨格^[2]阐述自毁艺术理论的时候，他顿悟了。梅茨格是伊林里极少数能被汤申德赞赏为“思维狂野”的讲师之一。在伊林

讲师群体里与他气味相投的，还有一位罗伊·阿斯科特^[4]，他曾经把学生关在演讲厅里，用不断闪烁的灯光轰炸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学院门厅，在地板上铺满数以百计的弹珠。阿斯科特的目的是要制造挑战和迷失感。彼得·汤申德觉得，阿斯科特“真他妈是个天才”。

当弗雷迪·保萨拉在1966夏天进入伊林学院时，他心目中的“天才”更可能就是彼得·汤申德。那一年，艺术生变成摇滚明星的名单正在不断加长：汤申德，罗尼·伍德，基思·理查兹，查理·沃茨^[4]，吉米·佩奇^[5]，埃里克·克莱普顿.....

伊林学院坐落于伦敦西郊深处的伊林格林圣玛丽大道上，是一幢灰色砖砌的建筑，它的名气没有同类院校那么响亮。“坎伯威尔^[6]和切尔西^[7]在画家圈很有名，”前伊林平面系学生雷诺斯·拉威瑟斯解释说，“圣马丁^[8]和霍尔本^[9]的绘画和时装很不错。伊林的时装课程和工业设计课程还可以，但它的艺术系就一般。”

马克·莫尔登和弗雷迪·保萨拉相识于时装设计系，他俩是班上三十个人里仅有的两个男生。“弗雷德跟我们说他是波斯后裔，但他让我们以为他家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好几代了，”莫尔登说，“他讲话的时候，口音和发音就跟在英国受过私立学校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从一开始，弗雷迪就告诉马克他想学习平面设计，但又决定先尝试一下时装设计。然而，这门课程很少涉及他在高中考试拿到的A-Level的艺术知识，而是专注于纺织技术、织物印花和图案设计。两个人自制了很多时尚的扎染T恤，后来弗雷迪还在年底时装秀上充当莫尔登的模特，展示他设计的作品，一件十字纹真皮草夹克。

在班里，弗雷迪和马克与其他三个学时装设计的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吉莉安·格林、西莉亚·道森和格莉尼丝·戴维斯，又名“格莉小发夹”。这五人频繁光顾学校附近的城堡酒店酒吧^[10]，经常到学院剧院、德雷顿格林^[11]的配楼里看演出。弗雷迪和马克的足迹更远些，他们去了里士满的爬虫俱乐部^[12]，在那里见到了当时还没出名的艾尔顿·约翰；在海斯的一间学校礼堂，他们也看了伊林校友彼得·汤申德的谁人乐队的演出，目睹他在舞台上又砸了一把吉他。到周末，保萨拉有时候会跟着吉莉安、西莉亚一起去普特尼希思的绿人酒吧^[13]。

尽管弗雷迪还和父母一起住，但他希望能自己挣点钱，于是去了伦敦希斯罗机场当周末临时行李搬运工。（莫尔登：“我知道很难想象弗雷迪·莫库里从事体力劳动的样子。”）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一个更可观

的收入来源，为学院的夜校当人体模特。弗雷迪还介绍马克·莫尔登也来做这个，很快两人都能在几小时内挣上5英镑。莫尔登记得，他们需要为来上课的“很多老太太，几个老头儿”脱得赤条条的。

弗雷德在伊林就读的第二年，来自约克郡的两位想要成为艺术家的学生，克里斯·史密斯和保罗·亨伯斯通开始了他们的大一课程。这两位报的都是广告和平面设计课程。史密斯还是一名键盘手，正在自学攻读音乐学位。“我本来可以去音乐学院的，”他说，“但我报了艺术学校，因为基思·理查兹就是这么做的。”开学第一天他们在大学里探路的时候，两人拐到了时装系。“不是想显得大男子主义，但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时装系啊？肯定有很多好看的女孩子吧。’”保罗·亨伯斯通说，“于是我们把头探进门去，结果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黑发浓密的家伙：弗雷迪·保萨拉。”

1967年至1968年间，弗雷迪从时装设计系转到了平面设计系，与艾尔沃思的老朋友阿兰·希尔再度重聚。“我还是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阿兰说，“可能在考虑过做时装设计后，弗雷迪决定，不，他还是想做平面设计。其实他是觉得我们这边更好玩，聚会更多。”马克·莫尔登知道另有内情：“弗雷迪是被院长詹姆斯·德鲁踢出时装设计系的。”他还透露说：“但是他设法说服院长让他转到了平面设计系。我有时候想，他是不是故意的，为了能延长在大学里的时间，好决定他的人生到底想做什么”。

平面设计系课程类型大致分为平面设计、广告艺术和插画。弗雷迪和一群爱好音乐的学生玩在一起，其中包括克里斯·史密斯、奈杰尔·福斯特和1984乐队的主唱蒂姆·史塔菲。史密斯的记忆中，他们四个会“坐在角落里谈论音乐一整天，从吉米·亨德里克斯到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什么都聊”。午餐时间他们流连于学生休息室和食堂（阿兰·希尔：“弗雷迪和我曾经看上同一个女孩，我们常常坐在那里吃着午饭，等着她出现。”），也去城堡酒店酒吧和伊林大道上的吉他店。

蒂姆·史塔菲很快把他的新朋友们介绍给了1984乐队。克里斯·史密斯在伊林市镇大厅⁴看了乐队在学校圣诞舞会上的演出后，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马上跟蒂姆·史塔菲说：‘你和那个吉他手比其他人强太多了。’”他笑着说。弗雷迪同样也被他同学的乐队吸引，他的朋友关系从史塔菲延伸到了理查德·汤普森。“我住在豪恩斯洛，所以我离弗雷德家很近，”汤普森说，“我们过去经常一起玩。他和我一起搭车去看1984的演出，我也经常去他家里玩。他爸有一个老式立体声唱机，我们

会坐在家里听弗雷德买的披头士唱片。”

苏巴希·沙阿，那个他在印度和桑给巴尔的老同学，自从全家搬到俄亥俄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信给他。“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沙阿说，“所以我跟自己约定，如果在1968年前还没有回音，我就不写了。那一年，我写信告诉他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以及其他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回信。我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投入另一种文化，而且不希望有人再提起印度和桑给巴尔了。”

弗雷迪的精力显然已经被他周围发生的诸多事情占满了。史密斯、亨伯斯通和马克·莫尔登的说法印证了弗雷迪的艾尔沃思同学布莱恩·范宁的描述，他像“一块好奇的海绵拼命吸收所有外界养分”，特别是奶油乐队和他心爱的吉米·亨德里克斯，但其他人难以辨明他对此事的认真程度。阿兰·希尔和弗雷迪成了伦敦大帐篷俱乐部的常客：“我们一起去看奶油乐队，弗雷德总是想挤到前排，贴着音箱，然后开始弹他假想中的吉他。如果那会儿有空气吉他弹奏比赛，他肯定轻松夺冠。”

“在学校里，他会拿把尺子就开始模仿亨德里克斯。”亨伯斯通补充说。一把18英寸的标尺，有时候也可能是T字尺，就是他最喜欢的模仿道具。“那时候就是，你可能正在和弗雷迪谈什么严肃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嘣！尺子就来了，”克里斯·史密斯说，“而且他甚至是用左手在弹，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完全一致。经常这样，也挺让人抓狂的，但弗雷迪就是这个样子。”

据罗杰·泰勒所说，“弗雷迪曾连续十四晚在不同的酒吧里追看亨德里克斯。”虽然这位吉他手从来没有在酒吧连续演过十四场，但弗雷迪的全心投入是毋庸置疑的。“亨德里克斯就是詹姆斯·德鲁将弗雷迪从时装系开除的原因，”马克·莫尔登说，“他跟学校请了太多的假去看吉米。”莫尔登陪同弗雷迪去看了他的第一场亨德里克斯演出。“那是1966年底或1967年初在苏豪区的一个不知名的俱乐部，”莫尔登说（很有可能是国王大街上的指甲袋酒吧），“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当天很冷，弗雷迪买了一件前皇家空军的大衣去看演出。我觉得亨德里克斯很有趣，但没喜欢到弗雷迪那个程度。他是把那人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理查德·汤普森也和弗雷迪在大帐篷俱乐部看过一次亨德里克斯演出。克里斯·史密斯攒了一个学期的钱都拿去买新音箱了，无法看这些演出（“我买完之后穷死了”），但是他记得弗雷迪看完回来的第二天，会跟他仔细地描述演出的细节。阿兰·希尔则是在自己1970年的婚礼上

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保萨拉。这两个人在这之前已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弗雷迪来时还带着结婚礼物：一张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专辑。

史密斯认为蒂姆·史塔菲和那位吉他手是1984乐队里最强的看法，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1968年初，布莱恩·梅退出，很快蒂姆也跟着离队。他们计划成立一支新的乐队：由史密斯演奏风琴，梅演奏吉他，蒂姆·史塔菲负责主唱和贝斯。“我们在沃德街的惠灵顿公爵酒吧^[15]开了个会，”史密斯回忆道，“我们决定一起组队，但还差个鼓手，于是想到可以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布告板上贴广告。”

他们找到的“金格·贝克/米基·米歇尔风格的鼓手”就是罗杰·泰勒。梅在帝国理工学院的酒吧里和泰勒进行了会面，之后又给新鼓手写了一封概述他的音乐想法的信，这个举动体现了这位吉他手对细节的孜孜以求，他热爱做好计划。史塔菲、史密斯和梅抵达泰勒与莱斯·布朗合租的肯辛顿公寓时，发现罗杰的架子鼓还在康沃尔他母亲家里呢。罗杰凑合着用当时流行的嬉皮士装备——一对小手鼓进行了演奏，但依然给那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晚上我们和罗杰聊了一个小时，”史密斯说，“他还唱歌了，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艳。我记得蒂姆后来跟我讲：‘啊，他的嗓音比我好……而且长得比我还漂亮……’”

泰勒与布莱恩·梅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有着雄心壮志，但他的个性更散漫随和，跟史塔菲类似。“罗杰打起鼓来又强劲又耀眼，”史塔菲说，“他的性格也是‘爱秀’的类型。”能够很快和新乐队建立联系，泰勒也舒了一口气。“我参加过几次面试，都让我非常压抑：比如前面有十八套架子鼓摆在那里等着之类的。”

虽然弗雷迪仍然往返于费尔特姆的家和伊林学院之间，但他基本上已经把克里斯和保罗·亨伯斯通的公寓当成了第二住所（“弗雷迪过得跟吉卜赛人似的。”布莱恩·梅回忆说）。搬来伦敦后，史密斯和亨伯斯通曾住在埃尔沙姆路，正对着肯辛顿酒馆^[16]。后来，这两人又搬到了附近的艾迪逊花园街42b号。这帮乐手的社交圈子很快就围绕着肯辛顿、艾迪逊花园街和罗杰·泰勒在辛克莱花园的公寓展开。

现在泰勒的鼓也搬到了伦敦，他们开始利用帝国理工一切可用的地方排练，包括克里斯·史密斯说的“扫帚间里”。“布莱恩以前从来没见过真正懂得给鼓调音的人，”泰勒在2002年回忆说，“他甚至都不知道鼓还能调音。典型的吉他手嘛！但他和我一拍即合。他的吉他演奏相当漂亮。”

他们选用的乐队名字是“微笑”^[17]，蒂姆·史塔菲起的，他设计了性感嘴唇加雪白牙齿的经典微笑标志。帝国理工在大学演出圈里的地位让“微笑”成为暖场乐队的绝佳选择。但他们吉他手的学术生涯仍然是一个问题。蒂姆和克里斯在伊林的课程只剩一年了。罗杰将选择退出牙科课程，他只完成了学位的前半部分。他搪塞母亲说他只是需要休息一年，专注于搞音乐。（后面他的确有继续念书，但转学到了北伦敦理工学院^[18]学生物。）至于布莱恩，他已经完成了本科课程，但他想继续留在帝国理工读研究生，写一篇关于行星间尘埃运动的博士论文。梅成为一名天文学家的道路似乎已经铺好了：他在瑞士的天文台观测站里研究了一段时间的黄道光，毕业之后，又收到著名天文学家伯纳德·洛维耳爵士的邀请，让他去卓瑞尔河岸天文台^[19]继续进行天文研究。正如梅的一位教授的解读：“布莱恩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根本不可能去做摇滚明星。”

他的远大学术前程或许已经近在眼前，但此刻的梅却天天泡在大帐篷俱乐部里，观看乐队表演，尤其注意看他们的吉他手，并在脑子里做着笔记。有不只一位著名吉他手仍然记得那个瘦瘦高高的、头发如同皇家卫兵毛皮高帽一样的年轻人，他总是出现在演唱会的观众里，还会在演出结束后过来询问乐器设备的技术问题。梅人生中两股相冲的力量，在1968年的10月24日和26日几乎接踵而至。10月24日，布莱恩在父母的注视下，于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中从王太后^[20]手中接过理科学士学位证书。两天之后，微笑乐队在同一场地演出，为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开场。

蒂姆·史塔菲一直认为那场弗洛伊德的开场表演是微笑乐队的首演。不过，克里斯·史密斯虽然也同意乐队的首演是在帝国理工，但他记得是给穴居人乐队做开场。“我们进去时他们正在试音，”他说，“假如你听过《穴居人录音带》（The Troggs Tapes [一段记录乐队在录音室里争吵的录音]），他们完全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他们的鼓手好像都不能同时用两只手打鼓。我记得我们当时目瞪口呆地互相看着。这些人可是流行明星啊，他们唱了《疯狂的家伙》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凭什么我们是他们的暖场乐队？我们完全可以胜过他们！”

乐队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布莱恩的舞台服装。“那时布莱恩虽然有非洲黑人似的蓬蓬头，但他看起来还是很学生气，”史密斯谨慎地说，“他穿着一件尼龙衬衫，配一条四年前流行过的针织领带出现在演出现场。超级土。所以罗杰带他回自己公寓去换衣服。但是罗杰的号比

布莱恩小，所以他的衣柜里没多少布莱恩能穿的，除了一件紫色的马夹.....他把它穿在尼龙衬衫外面。”

史密斯记得，微笑乐队以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Toccat and Fugue in D Minor）片段开场，是他用自己的塞尔曼卡布里牌（Selmer Capri）风琴演奏的。“接着布莱恩弹出一段密集的吉他和弦，罗杰以繁复的鼓点跟进，我们就这样以盛大的即兴演奏切入大葡萄乐队^[21]的《不会这么糟》（Can't Be So Bad）。”但最让他震惊的，是四个人“以罗杰优美的男高音为首”的和声。“我惊讶于它竟然如此动听。现在想来，万事俱备：已经有布莱恩的吉他和罗杰的鼓在那里了。只欠一个厉害的人带着绝妙的想法出现.....比方说，弗雷迪。”

“我感觉微笑乐队是往重金属摇滚方向去的，”蒂姆·史塔菲说，“但同时又有种想要尽量展现艺术多样性的压力。”史塔菲提到的这种压力总结了微笑乐队在音乐上的潜在问题，他和键盘手克里斯·史密斯有同感，史密斯的塞尔曼卡布里牌风琴接下来几乎很少会在微笑乐队的演出里出现。

“我喜欢乐队的创造力，但从音乐上来说并不是我的菜，”史密斯说，“罗杰很有摇滚精神，这点我喜欢，但他对布鲁斯音乐不感冒。我们在他的公寓里第一次听齐柏林飞艇乐队或‘是’乐队^[22]的唱片，我在想，‘那么泥水^[23]、奥蒂斯·雷丁和嚎叫之狼乐队呢？’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着演奏那种带一点滚石乐队感觉的音乐。我想要的是关于忧郁、爱情和死亡的歌曲。我喜欢音乐中的严肃性，显然微笑乐队不是走这个风格的。”

蒂姆·史塔菲记得，1969年2月，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演出前一天，史密斯被要求退出微笑乐队：“我们说，‘克里斯，明天晚上我们更愿意三人组上台，’”他是这样告诉《唱片收藏家》（Record Collector）杂志的。史密斯对此表示异议：“我在埃尔沙姆路见过布莱恩，并且跟他说，‘我不会再回到乐队了’。我敢说这已经是明摆的事儿了，我不记得自己是被劝退的。”

2月27日，布莱恩重回艾尔伯特音乐厅，这次没有王太后，微笑乐队也没有了史密斯。这是一场慈善音乐会，为全国未婚母亲及子女关爱委员会^[24]筹款，由DJ约翰·皮尔主持。因为这场演出由帝国理工组织，微笑乐队设法获得了排在演出名单倒数第二的位置，他们前面有鬼牙乐队^[25]、乔·科克，以及首席演出的邦佐狗乐队^[26]，他们最近发了金曲《我

是城里的太空人》（I'm the Urban Spaceman）。在微笑乐队之前上场的是自由乐队，这支新组的布鲁斯摇滚乐队的主唱（很多年后皇后乐队的合作者）就是保罗·罗杰斯。

微笑乐队的开场不太顺，蒂姆·史塔菲冲到宽阔的舞台前方，却发现他的贝斯电线太短。他一不小心把贝斯插头扯了，只剩下布莱恩自己弹开场和弦。三人勉力演完了更金属、更激昂版的翻唱歌单：民谣歌手蒂姆·哈丁的《假若我是木匠》（If I Were a Carpenter），桑尼·特里的《我竟如此愚蠢》（See What a Fool I've Been）和汤米·詹姆斯和尚代尔^[27]乐队的《莫莉莫莉》（Mony Mony）。

与此同时，泰勒在牙医系的朋友彼得·阿比被任命为乐队经理人。阿比将一卷录音带交给了约翰·安东尼，当时他是水星唱片公司^[28]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安东尼曾是“地下酒吧”俱乐部^[29]的驻场DJ，这是伦敦玛格丽特街上一间摇滚明星爱去的酒吧，因谁人乐队的《售罄的谁人》专辑中的一句歌词“地下酒吧，畅饮、畅玩（Speakeasy, drink easy, pull easy）……”而知名。他还担任过齐柏林飞艇乐队早期巡演中某一场的主持人。

“我在水星公司的老板是卢·雷兹纳，他是芝加哥的唱片公司的巨头，”安东尼说，“当时卢手上有大卫·鲍伊，还有蓝眼睛乐队（后来演变成人类乐队）^[30]，彼得·汉米尔和特里·里德。我开始给卢打工的时候，第一个上门的客户就是罗杰在牙科系的这个朋友，他带来一盘微笑乐队的带子。”

那年3月到4月，微笑乐队在特鲁罗的PJ's俱乐部演了三场，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彼得·鲍顿是罗杰的朋友。泰勒的关系网络保证了乐队能够在周末找到在这家俱乐部和康沃尔其他地方的演出机会；有时候演出的标题写的是“由康沃尔的传奇鼓手罗杰·泰勒为您呈现”。在克里斯·史密斯的记忆中，“微笑乐队作为三人组在康沃尔演出时，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效仿奶油乐队。”

约翰·安东尼曾陪同乐队到特鲁罗演出。“不幸的是，后来我和当地青年打起来了，”他承认说，“我是一副伦敦来的音乐人打扮，留着长发，穿着怪异的服饰，这些家伙开始骚扰我，踩我的脚……”于是台下舞池爆发了打斗，安东尼用麦克风支架抵挡着攻击，跳上乐队的货车后车厢逃离。“这事结束后，我们驱车返回伦敦。我说我会帮他们找机会进录音室。”

4月份，卢·雷兹纳在伦敦看了微笑乐队的演出，当场跟他们定了一个仅限美国发行的单曲协议。“那就是个试水协议，”蒂姆·史塔菲回忆道，“水星公司只是花点小钱看看能有什么结果。”两个月后，微笑乐队被召集到伦敦的三叉戟录音室^[31]录音，约翰·安东尼担任制作人。“我眼中的微笑乐队有点类似‘齐柏林版的“是”乐队’，”他说，“因为他们既有‘是’乐队的和声，又有齐柏林飞艇的大段吉他连复^[32]。我很确定他们会有所成就，但不是以现在这种状况。老实说，我对蒂姆·史塔菲没什么信心”。

布莱恩当初决定离开1984乐队，部分原因就是他想写自己的曲子。蒂姆·史塔菲亦有同样想法，所以他从去年夏天起就和布莱恩一直在努力创作。微笑乐队目前的歌单包括在1984乐队时原创的《践踏我》，还有两首新歌《地球》（Earth）和《过得不错》（Doing Alright）（这首将收入到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中）。史塔菲对科幻小说的热爱体现在歌词中，虽然后来他对早期作品不屑一顾，称之为“矫揉造作的废话……都是胡扯”。

“《地球》是首好歌，”克里斯·史密斯坚持道，“那是个人类登月的年代，所以这首歌也十分有太空感。我记得蒂姆告诉我他写了一首歌，关于一个人可以选择坐火箭去往太空，但代价是再也不能回到地球。我还记得他说：‘如果我能出走太空永不归来，我是愿意的。’而我说：‘谢谢啊，我选择留下来。’”

三叉戟的这次录音，让微笑乐队制作了单曲《地球》，B面为《践踏我》（还把《过得不错》也硬塞进去了）。单曲设定在8月发布。中间这段时间，微笑乐队又回到康沃尔进行了几场连演。微笑乐队的夏季演出之旅随行人员增多了，有经理人彼得·阿比，货车司机理查德·汤普森，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以及不知道为什么也跟着去了的弗雷迪·保萨拉。

7月21日，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我们都围在罗杰妈妈家的电视机前看电视播报。”理查德·汤普森回忆道。威妮弗雷德·泰勒同意招待儿子的这群小团体住几晚，她还发现罗杰的某位潮人朋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尽管成天挤在货车后面在路上奔波，弗雷迪竟能设法保持完美无瑕的衣着标准。罗杰·泰勒说：“我母亲永远想不通，弗雷迪的裤子是如何做到如此笔挺的。”

回到伦敦后，微笑乐队在肯辛顿教堂街的朗多人才经纪公司^[33]进行

了登记。虽然朗多公司的其他客户比他们有名多了，比如尼克·德雷克和刚刚起步的创世记乐队^[34]，但这至少意味着演出预订会多一些。那个夏天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三人组为芝加哥巅峰布鲁斯乐队^[35]、家庭乐队和其他乐队开场，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84乐队的节奏吉他手约翰·加纳姆曾在一场演唱会上看到他们。“他们给一个叫‘时光之盒’^[36]的乐队做暖场，这支乐队有一首歌叫《在你眼中烘焙果酱卷》（Bake Jam Roll in Your Eye），歌名和歌曲本身一样烂。”他笑了。“微笑乐队上场，演奏了一首慢节奏金属版《假若我是木匠》，非常棒。”10月份，加纳姆在沃特福德学院^[37]替微笑乐队当演出工作人员，他的感触更深：“他们比品尝乐队^[38]（主乐队）还要好。就在那时我开始琢磨，‘没错，他们这样下去会成的’。”

加纳姆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从微笑乐队的第一次演出开始，他们就收获了一个既狂热又爱指手画脚的粉丝，弗雷德·保萨拉。“我想我们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弗雷德就在舞台侧翼。”克里斯·史密斯说，“每次演出结束后，他就开始了：‘你知道那个鼓加进来的地方吧？嗯，要不试下把它改成这样？’他的建议和想法多得不得了。我跟布莱恩说：‘弗雷德满心想加入乐队，你看出来了吧？’布莱恩却说：‘不行不行不行，蒂姆是主唱。这他没法接受。’”

布莱恩·梅不记得弗雷迪曾跟着1984乐队当过演出工作人员。他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未来主唱，是在微笑乐队的某次演出。“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但我记忆中的那个画面，他穿得特别像一个摇滚明星，”他在2005年采访里说，“还是那种你之前都没见过的摇滚明星——真正的华丽骚气，雌雄同体。他晃着一个绒球走来走去，看起来十分轻佻，说着：‘对，太棒了，太棒了，但是.....你们可以表演得更好，你们为啥不这么穿呢？’他从一开始就是全情投入的。”

在罗杰·泰勒的回忆里，“某天他和蒂姆一起过来，就成了圈子里的一员。他浑身都充满活力——飘逸的长长黑发，打扮入时又华丽。”

摄于1968年伊林学院的照片印证了保罗·亨伯斯通对弗雷迪的记忆，“他并没有格外妖娆”。马克·莫尔登也说弗雷迪在时装系上课的时候总是很害羞，而且从来没有提到过想成为一名音乐人。但是弗雷迪转到平面设计系的举动，可以看作是他从行为和志向上改变的一个标志。伊林学院最后一学年的时候，弗雷迪曾经爱穿的挺括衬衫和整洁牛仔裤已经换成了丝巾结和绸缎，还有某个同龄人印象中的“天鹅绒，许多的天鹅绒”。那年，同在平面设计系的学生托尼·卡提那尼得到一件定做的

黑色缎纹外套。“时装系的一个女生为我做的，”卡提那尼说，“看起来像一件殡葬员的长夹克。弗雷德看上了，他拿唱片跟我换了这件衣服。”

一次从卡纳比街购物归来后，克里斯·史密斯穿着新买的大红色裤子逛进学校。“弗雷迪在那儿，腿跷在桌子上，穿着蛇皮靴和压皱丝绒裤子，就像亨德里克斯一样。他正在看《流行音乐周刊》，看见我，往下扫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又败了。”

相比之下，微笑乐队依然还在穿着膝盖破洞的牛仔裤和圆领T恤衫。在舞台上，他们采取的是标准姿势，盯着地板，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布莱恩·梅说：“那时流行的是必须穿牛仔裤，而且必须背对着观众。弗雷迪却认为摇滚应该是一种表演，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想法。”

虽然弗雷迪对微笑乐队有种种宏伟计划，他自己仍然没有乐队，挫败感也越来越深。马克·莫尔登的弟弟奥布里也在伊林读平面设计，他是学生会的外联秘书。“弗雷德和所有我们预订来学校表演的乐队厮混，”奥布里说，“他和1984乐队的那些人总在一块，但有次我们在伊林市镇大厅的破布时装舞会订了自由乐队，我看到弗雷德和他们的吉他手保罗·科索夫进行了深入交流。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到处跟我们说他要成为流行明星。当然，我们听了都想笑。”

克里斯·史密斯曾多次见到弗雷迪弹奏学校里的钢琴。“他有一种断奏的风格，如同发疯的莫扎特。”他还发现这位朋友可以迅速记住一段音乐并演奏出来。但弗雷迪对自己的能力依然很谨慎。“如果有其他音乐家在场，他会很谦虚，”克里斯说，“通常他会说：‘噢，你弹吧，你比我强。’”托尼·卡提那尼补充道：“我记得他经常翘课。导师们问，‘弗雷迪在哪里？’然后你总会在公共休息室里找到他，正在弹钢琴。”

不久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唱歌。在班里，弗雷迪坐蒂姆·史塔菲对面，这两个人，有时再加上克里斯和奈杰尔·福斯特，会一起练习和声，同学们都听得很开心。“我们很喜欢听，鼓励他们唱，”雷诺斯·拉威瑟斯说，“他们有时会把吉他拿出来弹。我们常取笑弗雷迪：‘看看，总有一天你会成名的。’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做一名插画家还是音乐家中间摇摆不定。”蒂姆认为弗雷迪需要时间找到他的唱腔；克里斯·史密斯则说第一次听到弗雷迪唱歌时，他“被钉在了原地”。保罗·亨伯斯通还能生动地回忆起一段“听起来确实很像米卡^[39]的假声，就是现在收

音机里放的那个家伙”。

据史密斯说，尽管此时弗雷迪既能弹琴也开始唱歌了，但他还没能写出一首歌来，这仍然是他烦恼的来源：“布莱恩·梅和蒂姆·史塔菲已经写了一首像样的歌《践踏我》，听起来有点披头士的感觉。弗雷迪和我以前从来不认识写歌的人。感觉那是大神做的事，我等凡人不会。然后弗雷迪就说：‘也许我们能写写看呢。’他不能去找蒂姆，因为蒂姆在微笑乐队里，他那时和罗杰、布莱恩还不太熟，所以他就来找我。”

那时候，克里斯对歌曲创作只能算“依稀有点兴趣”，但他记得弗雷迪对此充满热情。“我有音乐部的钥匙，所以有时我们在那里见面。弗雷迪会带着他拼凑的一些歌曲草稿来。”学校之外，托尼·卡提那尼曾被邀请到格莱斯顿大街的公寓，他记得弗雷迪“摆弄着钢琴，总是哼着调子，努力想写歌。这是他的天性”。也在这期间，卡提那尼瞥见了弗雷迪的护照。“他在职业那栏写着‘音乐家’，”托尼笑道。“我说，‘你为什么写这个啊？’他说：‘因为我要进入音乐行业，成为音乐家。’现在回想起来，弗雷迪浑身都散发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差不多身体里都要迸发出火花来了——‘我们来做这个！我们来做那个！’”

弗雷迪写歌时火花再次闪现。1967年6月，披头士乐队发布了《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40]专辑。他们以《生命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有你，没你》（Within You, Without You）等歌曲，扩大了流行音乐的疆域。“于是弗雷迪也开始把不同的音乐片段连接在一起，”克里斯·史密斯说，“我们用的是《生命的一天》《醒过来，滚下床》（Woke Up, Fell Out of Bed）这两首之间的连接，因为我们发现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任意两首乐曲串起来。”但这始终是个费劲的过程，弗雷迪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弗雷迪会生自己的气。有些日子里他抱着头，绝望地说：‘为什么人家蒂姆和布莱恩能写，我们就写不出来呢？……我为什么这么废？’”

当然，其他情况下，他的热情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如果手边没有吉他，弗雷迪就会拖着克里斯去伊林大道附近的一家音乐用品商店。“我们会在午餐时间去那儿，弗雷迪从墙上拿把吉他下来，径直开始弹他刚写的东西给我听。店员实在是受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每周都在店里，弹他们的吉他，然后我们就买一个拨片走人。”

“保萨拉/史密斯”写歌二人组差不多快写成了一首歌。克里斯记得这首未完成的旋律叫作《牛仔之歌》（The Cowboy Song），神奇的是，

它开头第一句歌词是：“妈妈，我刚刚杀了一个人（Mama just killed a man）……”七年后，这句歌词成了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开场白。史密斯说：“我一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想道：‘噢，弗雷迪完成了他的歌。’”

哈罗盖特的一支节奏布鲁斯翻唱乐队聘用了史密斯，他们是在排练地附近的教堂里听过他练习管风琴后聘用的他。克里斯此时仍在伦敦学习教堂管风琴演奏，这是他的音乐学位中的一项。每周有三四个晚上他都在阿克顿的教堂里练习。“有时弗雷迪会要求和我一起去，”史密斯说，“他说可以在我弹琴的时候帮我翻乐谱。或者说原本计划如此。等我们到那，我安静地弹了一会儿后，他就开始了……‘来，克里斯，来弹一个《给我一点爱》（Gimme Some Loving）……弹一个《给我一点爱》’^[41]。”最终史密斯只能屈服，给他弹这首来自斯潘塞·戴维斯乐队^[42]的金曲，然后“弗雷迪开始在空荡荡的教堂里上蹿下跳，神经病一样，摆出他的那些姿势”。

到这个阶段，弗雷迪的绝望已经清晰可见。有一天早晨，史密斯遇到他坐在书桌前，眼神呆滞。“于是我拿手在他面前晃晃说：‘哎，弗雷迪，你神游啦。’他抬眼看我，说，‘我会成为巨星的！你们都想象不出来的那种超级巨星！’我说，‘是吗，像亨德里克斯那种？’‘嗯，对！’我就回，‘行吧，祝你好运。’”

每周二，学院会举办午休时间演唱会，邀请一些已经出道的新乐队来给学生表演。这些演出对这位要当“巨星”的同学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蒂姆，弗雷迪和我跑到入口处去见这些乐队，”史密斯回忆说，“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是学生会的，完全是编的。我们帮他们搬装备，套近乎，看看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可以学习借鉴的。来的乐队有霸王龙乐队^[43]，萨沃伊·布朗乐队^[44]，烤鸡小摊乐队^[45]等。”

那年年初，1969年4月29日，是微笑乐队与水星唱片公司签约的日子，也是弗雷迪和克里斯在午休演唱会上偶遇大卫·鲍伊的那一天。“一辆雷诺小车停住，鲍伊从车里出来，”史密斯说，“他带着一个小的WEM扩音柱，一把木吉他，一台录音机和一个麦克风支架。”进到学院的圆形剧场后，鲍伊很不高兴。“他说，‘舞台都没有！’”于是，两个月后就会发布突破性神曲《太空怪客》（Space Oddity）的大卫·鲍伊，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加上克里斯·史密斯，三人当场动手把桌子拼起来搭舞台。

此时此刻，弗雷迪羡慕的对象——微笑乐队还在等待着他们的重大突破。微笑乐队的单曲《地球/践踏我》悄然于8月在美国发布，之后石沉大海。尽管这首单曲没推成功，但水星公司含糊地提到了做张专辑，或者说更有可能的是一张迷你专辑。9月，微笑乐队进入金士威的德莱利亚录音室^[46]，由已故的弗里茨·福瑞尔担任制作人，录了两首原创歌曲和一首翻唱歌曲。《哄骗》（Blag）是一首紧张激烈的摇滚歌曲，其乐器演奏有奶油乐队的《N.S.U》和深紫乐队^[47]的《扭动脖子》（Wring That Neck）的气质；《北极熊》（Polar Bear）是混合了布鲁斯风格的轻柔摇滚乐，而悠扬的歌谣《四月女神》（April Lady）（由一位叫斯坦利·卢卡斯的人所作）是唱片公司提议的。无论他们还有什么不足，那歌曲中不断闪现的独特和声，梅的华丽吉他技巧，已经有了未来的轮廓。史塔菲如泣如诉的嗓音也跟弗雷迪·莫库里在皇后乐队早期专辑里的声音相差不远。最终，微笑乐队的迷你专辑并未面世，水星公司搁置了这些录音将近十五年，直到皇后乐队鼎盛时期才拿出来圈钱。

虽然如此，微笑乐队在同月进行的另一次录音将对他们的未来产生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特里·伊登此时在派录音室^[48]担任设备维护工程师，在来到伦敦前，他曾在家乡布莱克本的一家俱乐部担任DJ。有一晚他遇到一个学生，说是记得以前在俱乐部里见过他，并跟他提到一个叫“微笑”的乐队。“她说她在和吉他手约会，”伊登说，“她还说乐队很不错，说服我去看看他们。就那次，我想，‘好吧，看看也无妨？’”

特里不太确定，但有人认为那天晚上与他恳谈的就是克里斯蒂娜·马伦，布莱恩当时的女朋友，未来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家在英国北部，她目前在伦敦肯辛顿圣母升天师范学校^[49]就读，在学校里她和罗杰·泰勒的女朋友是好友。克里斯蒂娜与布莱恩初次见面就是在微笑乐队的演出上。

特里·伊登很想“在录音室自己试试手”，于是他在派录音室2号厅给微笑乐队安排了一次半夜录音。特里和派录音室的剪碟工程师杰夫·卡尔瓦监制了这次“违规录音”，制作了六张高保真硬质母碟，两面分别为《践踏我》和《北极熊》，正好在早班开始前做完。“我记得杰夫和我都被他们自己写东西这一点所打动，这在当时的乐队里是不常见的，”伊登说，“微笑乐队仍然需要打磨，特别是罗杰，但布莱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类拔萃了。我们制作完后，他们问：‘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吗？’但我们完全没有推广乐队的经验。我那时只是希望能在音乐制作上有所发展，所以才提供给他们这次机会。完全出于

自利，我只是想练练手。”特里没有往远处想，只是把母碟交给了微笑乐队。现在乐队手持可以和唱片公司接洽的高质量试听带了。两年后，伊登会再次和布莱恩、罗杰的生活产生交集，但如今他说：“我当时以为这事就结了。我没想过会再次见到他们。”

肯辛顿酒馆仍然坐落在罗素花园的埃尔沙姆路拐角处；从肯辛顿奥林匹亚步行可达，离牧羊林区和荷兰公园则有段距离。如今它是一家修缮一新的酒吧烧烤屋，外面有印着品牌标志的遮阳篷，桌上是午餐菜单和“免费无线上网”标志。在1969年，肯辛顿酒馆只是一间普通伦敦酒吧，四四方方的空间里充斥着香烟和酒精，楼上有爵士乐演出的空间，消费群体是附近的上班族和学生，他们从出租房、周边大学、时尚集散地波托贝洛和肯辛顿市场涌入这里。

1969年，微笑乐队及随行人员作为肯辛顿酒馆的常客已经一年多了。那年夏天，弗雷迪·保萨拉从伊林学院毕业，获得艺术文凭（他的论文写的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不过他对未来的职业另有打算。一天晚上，在肯辛顿酒馆，弗雷迪看到克里斯·史密斯走进来，便以手抱头，装得很绝望。问他因何事犯愁，弗雷迪回答说：“我再也不能成为流行歌星了。”克里斯当即以托尼·汉考克^[50]喜剧里的腔调回应：“你必须得当流行歌星啊，弗雷迪，你跟所有人都说过了。”弗雷迪听了缓慢地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姿态眉飞色舞。“我不会成为明星，”他宣布，“我会成为……一个……传奇！”终于，在长达两年之后，肯辛顿酒馆的一次偶然碰面让他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一点。

野山羊乐队是一支来自英国西北部利物浦圣海伦斯的三人组合，成员是吉他手迈克·伯辛，鼓手米克·“米弗”·史密斯和贝斯手约翰·“公鸡”·泰勒。就像1984乐队和反响乐队一样，这支乐队也是在学校里组起来的，成员都来自威德尼斯的韦德迪肯文法学校^[51]。泰勒和伯辛最开始是在一个叫作“色彩”^[52]的翻唱灵魂乐歌曲的五人乐队。1966年，受到克莱普顿和亨德里克斯的强烈影响，两人从乐队脱离。“其他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高年级学生，”“公鸡”·泰勒解释说，“迈克和我更喜欢布鲁斯和前卫摇滚。”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鼓手“米弗”，他提出了乐队的新名字“野山羊”。（“野山羊是啥？”泰勒思索道，“好像是一种非洲羚羊吧。”但起这个名字仅仅是因为“米弗”有一次说“我太饿了，能吃下一头野山羊”。我们就说，“哎好，乐队就叫这个名字吧。”）

5月份，野山羊乐队向英国广播公司1台的DJ斯图尔特·亨利以及披头士乐队刚成立的苹果唱片公司寄出了自己的录音小样。扯上了披头士乐队，足以让他们在《威德尼斯晚报》（*Widnes Evening News*）上扬名一回了（《野山羊乐队的思想：布鲁斯不是一种音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但苹果唱片并未录用。经过几次当地演出后，趁着在读大学和参加工作前还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野山羊乐队带上新加入的十七岁校友肯·泰斯蒂，决定去伦敦碰碰运气。

“我们想着可以去那里成名，”肯·泰斯蒂回忆道，“待几个月，看看会如何。”泰斯蒂有驾照，还有之前在威德尼斯及周边的学校推广舞会的经验。他天生就是一个组织者，很快就成了野山羊乐队非正式的经理人/演出工作人员/司机。“肯总是很有办法，”泰勒说，“是他把录音带寄给了苹果唱片和斯图尔特·亨利。我们在利物浦地区得到了一些认可，然后呢，什么也没有。所以是时候去伦敦了。”

关键在于，泰斯蒂的女朋友海伦·麦康奈尔正好在伦敦，和她姐姐帕特合住一间公寓，而她姐姐就在圣母升天学院上学。“特别好心又慷慨的帕特同意让我们一半人住在辛克莱路的这间公寓里，就在奥林匹亚后面，”泰斯蒂说，“另一半人被移交给她的朋友安·麦康米克，她在牧羊林路的帕图姆花园租了一个地方。”

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泰斯蒂就立马忙开了。他开着野山羊乐队的逗号牌货车停在公用电话亭旁，拿出号码本，开始一个个地打电话给唱片公司。“我给蝶蛹唱片公司☎打过去，要求和克里斯·埃利斯说话。电话那头的女人说：‘对，这儿就是克里斯埃利斯。’我们一头雾水。”现在看来，野山羊乐队的时机不算太好。学生都放暑假回家了，伦敦各大高校蓬勃的演出业务正处在休息时期。

帕特·麦康奈尔在圣母升天学院认识了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的女朋友们，她在帝国理工看了微笑乐队的表演。二十一岁生日前几天，她选择微笑乐队的地盘肯辛顿酒馆作为庆生地点。（肯·泰斯蒂说：“原因是她看过微笑演出之后，觉得他们很帅气，想见到他们.....尤其是罗杰。”）那天晚上实现了野山羊/微笑乐队的历史性会面。当晚，弗雷迪·保萨拉穿着一件紧身毛皮夹克，在他们周围飞来飞去。正如罗杰·泰勒穿着潮牌店“奶奶出游”（*Granny Takes a Trip*）里买的衣服，弗雷迪也已经有了摇滚明星的派头。“我们在他们旁边感觉就像北方的乡下人。”泰斯蒂笑着说。微笑乐队似乎已经获得多项成就：有正式的录音，当过“是”乐队和家庭乐队的暖场乐队.....“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们和水星唱

片合作的事情，我们就更佩服他们了。”

“布莱恩非常、非常有礼貌，”迈克·伯辛记得，“罗杰很有大明星的感觉，最友善的那种明星。”酒馆打烊后，生日派对转到帕特的辛克莱路公寓继续进行。布莱恩情不自禁地拿起迈克·伯辛未插电的吉他，开始了他的表演。“布莱恩盘腿坐在地板上，”泰斯蒂说，“我以为我对吉他手已经心里有数。我去看了所有六十年代来巡演的黑人布鲁斯乐手，我见过全部约翰·梅奥尔乐队出来的人……但是当布莱恩开始演奏时，我想我之前错过了一大篇章。他就是那么特别。”

很快，梅、泰勒和史塔菲开始表演微笑乐队的歌曲，某位朋友也提供了一点小帮助。“他们有一个关系很铁的朋友一起来，”泰斯蒂说，“那就是弗雷迪。他知道所有微笑乐队歌曲的歌词，甚至跟着唱和声。那一刻，我们都看出来他想加入乐队。但是当时微笑乐队不需要主唱。而野山羊需要。”

像微笑乐队一样，野山羊乐队也是音乐至上的。他们的偶像是奶油乐队、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十年之后乐队^[54]，并且，如“公鸡”泰勒承认的，和这些偶像一样，他们倾向于“没完没了地独奏，直到听众都他妈受不了，滚去吧台喝酒”。不止一次，“米弗”·史密斯的鼓独奏实在太长，落地鼓的鼓撑楔入了舞台板之间的缝隙中，以至于每敲一下，那鼓就沉下去一点，逐渐陷入舞台。

从形象上看，野山羊成员都留着那时必不可少的长发，只有迈克·伯辛是厚厚的黑人蓬蓬头，除此之外，每人都穿着喇叭牛仔裤和风衣。虽然“公鸡”·泰勒能自信地担任一部分主唱，并且在歌曲之间穿插讲话，但他和伯辛都不适合当主唱。弗雷迪很快就行动了。泰勒说是他们邀请了他到肯辛顿酒馆见面；迈克·伯辛记得是在某人地下室的住处进行了试唱，在“米弗”的印象中则是在帝国理工进行的。“后来我们才领会到的一件事是，弗雷迪很擅长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伯辛说，“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也愿意加入我们唱歌。”合作就此达成。

那年7—8月，微笑乐队和野山羊乐队穿梭于肯辛顿酒馆周围众人的公寓之间。大卫·鲍伊发行了《太空怪客》这张专辑，选择尼尔·阿姆斯特朗历史性的月球行走这个完美的时机，让这位处于挣扎期的创作者有了一首热门单曲。地球这边，滚石乐队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场免费音乐会，纪念前吉他手布莱恩·琼斯，他被发现死在家中的游泳池里。在辛克莱路，日常播放的音乐包括不可或缺的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专辑，谁

人乐队的《汤米》（*Tommy*）（“公鸡”·泰勒说：“那张被我们听太多磨废了。”），以及小岛唱片公司^[55]的合集《携手同行》（*All Join Hands*），集合了当时硬摇滚的明星们：自由乐队，鬼牙乐队，杰斯罗·塔尔乐队^[56].....

没多久，麦康奈尔姐妹公寓里这些进进出出的神秘长发青年就引起了房东的注意。“所以我们都搬到帕图姆花园的公寓去了。”肯·泰斯蒂说。在那里，三张床拼起来以容纳更多人睡觉。“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泰斯蒂笑着说，“她们都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绝对是品行端正的人。但毕竟只是短暂的私自占用房间.....我想‘米弗’那时不得不睡在浴缸里。”

从伊林学院毕业后，克里斯·史密斯去美国待了几个月。当他回到艾迪逊花园街合租的公寓时，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一大堆我不认识的人在里面开派对，”他笑起来，“有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谁？’我说：‘我住这里啊。’”聚众狂欢的人群里就有“米弗”。这位野山羊鼓手有狄更斯一样的连鬓胡子，他比这几位少年队友老成一些，没他们那么天真。他是被劝说放弃了威德尼斯送奶工的工作，来到伦敦追求摇滚明星梦。“公鸡”·泰勒说：“‘米弗’总是比我们几个更世故些。”被微笑乐队的一帮艺术生、未来的物理学家和半专业的牙科医生包围了几周后，“米弗”不禁悄悄靠近克里斯，无力地问道：“所以.....你是不是也拿了几个学位证？”

“米弗”和弗雷迪的相处模式，展示了野山羊乐队和他们新主唱之间的差异。“我们都有点粗野和急功近利，”肯·泰斯蒂承认，“尤其是‘米弗’。”相比之下，弗雷迪就像一个扮相完美的华丽异类。这个奇特的男子很快就和转行鼓手的利物浦送奶工之间互相挤对起来。“他们总是互相看不顺眼。”泰斯蒂说。过一阵子，弗雷迪给“米弗”展示了一幅他为鼓手画的素描，上面写着“娘娘腔”。

弗雷迪的讲究也是这群利物浦人的又一个话题。“弗雷迪也没钱，跟我们一样，”伯辛回忆道，“所以他只有一套外面穿的衣服：他总是穿着一件有宽腰带的T恤和裤子，晚上玩累回来睡觉之前，他会把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这样早上起来再穿依旧光鲜亮丽。当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南方人的做法，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好吧，北方男人不这么做，但南方男人是这么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雷迪在成为明星之前就是个明星了。”

野山羊的成员们很快就会发现弗雷迪有多大的偶像包袱。尽管肯·泰斯蒂依然很难争取到伦敦的演出，但乐队在其他地方获得了两场预定，8月23日在博尔顿镇的八角剧院有一场，第二天在镇上女王公园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又有一场。为了这次演出，肯·泰斯蒂从弗雷迪的朋友，前1984乐队的鼓手理查德·汤普森那里借了一辆卢顿（Luton）货车。“理查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一家公司工作，那是他公司的货车。”泰斯蒂承认。

“那是一辆阿巴克·史密斯联合公司的黄色货车，”汤普森记得，“我过去喜欢看乐队演出，于是我们会装上二十几个人在后车厢，开着车到处跑，去看演出，或者参加聚会。六七十年代做这种事经常容易得手。”这辆货车很快就载上了野山羊乐队、他们的乐器设备以及各种哥们儿、女朋友、非正式的工作人员，还有保罗·亨伯斯通。一时心血来潮，保罗带上了照相机，为演出路途增添了不少乐趣。在一张照片中，一群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在阿巴克·史密斯公司的货车前一字排开。那时候，理查德·汤普森已经从1984乐队的普通鼓手转变成了彻底的嬉皮士，长发过肩，留着酷似耶稣的长胡须，穿着凉鞋。正如迈克·伯辛记忆中的那样，弗雷迪看起来一尘不染，他那件领口有三个扣子的长袖T恤和他的鞋子一样洁白无瑕。

肯到皮克迪利广场的一家唱片店接上上完夜班的“公鸡”·泰勒，旅程从下半夜启程。但这段去北方的路程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长。“我有点太过小心了，”泰斯蒂说，“我们早上6点左右就到了，而剧院要10点才开门。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车停在八角剧院外的鹅卵石路上，坐在那里看着后视镜。我听到后车厢的卷帘门拉开，看到一帮子人纷纷跳下车来……”

第一个站到鹅卵石路上的是弗雷迪。泰斯蒂看着他们的新主唱为一身装扮操起心来：“他查看了发型，把夹克毛领上的毛抚平，然后仔细检查起裤子上的褶子。”然而没过多久，肯听到背景中传来一阵噪音。“喧闹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响……”很快就发现原来是“夜班刚刚结束”。这是工人们下班回家发出来的声音，他们的木底鞋噼里啪啦地踩在石头路面上。“这场景很完美吧，”泰斯蒂笑道，“一大群灰头土脸的工人走过去，弗雷迪·莫库里就站在中间，穿着他毛皮领子的夹克整理着发型。”

八角剧院的演出在星期六中午，这个场馆定期举办“布鲁斯学时”音乐会。午休期间，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和野山羊乐队开始了首次

表演。“公鸡”·泰勒认为他们的开场曲是弗雷迪建议的《监狱摇滚》^[57]（Jailhouse Rock）。果真是那首的话，表现的形式是有别于后来的。“帕特·麦康奈尔最近提醒我说，唱第一首的时候，弗雷迪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背对着观众的，”肯·泰斯蒂回忆道，“只有事后回想起来，我们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他第一次和乐队一起上台。他在学校里有过一些零散的表演，但后来就没有了。”弗雷迪当初在野山羊乐队面前的开场白为：“我是个还没有乐队的歌手”。“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泰斯蒂说，“开场唱得十分漂亮。唱完第一首歌后，他的羞怯褪去，表演得非常好。”

布莱恩·梅无法在周五下半夜与他们同去博尔顿，但他还是想赶上星期日的演出。乐队一行人计划星期六晚上演完后，到25英里以外的野山羊乐队老家利物浦歇脚。肯·泰斯蒂安排到莱姆街火车站接梅，他选择把车停在通往车站站台的一个坡道上。“我感觉我们大概停十分钟左右就好了，但这时一个级别很高的警察出现在视野里，走到了司机车窗附近。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开的是这辆是所谓‘借来的’货车，加上后面超载了那么多人，我大概会被绞刑处死、五马分尸吧。”

结果，看过了车厢上写的公司地址后，警察以为泰斯蒂在跑业务，并问他是不是在等从伦敦来的火车。“我说是的，于是警察说：‘得嘞，行，你其实不能把车停在这儿。我帮你把大门打开，你把车倒到停站台上。’”一群车站搬运工迅速过来打开了大门，肯把货车倒到了站台上。“布莱恩下车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况。值得称赞的是，他立刻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将吉他手安全地藏到车上之后，泰斯蒂火速逃离。

这一晚结束时，大部分人都在圣海伦斯麦康奈尔姐妹家里安营扎寨。在麦康奈尔家里，布莱恩坐在煤气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打瞌睡。“布莱恩人本来就高，还穿着厚底高跟鞋。”肯·泰斯蒂微笑着说。到了夜里某时，家里飘起一股橡胶烧焦的味道。“倒霉的布莱恩没注意到炉子的热度，直到他的一只鞋子鞋底被熔掉了。余下的周末他都只能穿着一边高一边低的鞋子跛行。”

弗雷迪和野山羊乐队的第二次演出在隔天下午的女王公园。这是一场叫“布鲁斯来袭”的露天活动。那天的演出名单上还有些过目即忘的当地乐队，比如胶靴史密斯^[58]和迷幻民谣乐队斯派罗吉拉^[59]。舞台架在公园中间的音乐台上面，有八角剧院的三倍大。“弗雷迪踏上舞台后满场跑，”“公鸡”·泰勒很确定地说，“我当时就想：‘操，太棒了！要的就是

这感觉。”迈克·伯辛补充说：“以前我习惯闭着眼睛弹吉他独奏，现在来了这么个人跪在前面，麦克风直冲着我。弗雷迪后来在皇后乐队做过的很多动作，第一次出现都是在我们乐队里。”

虽然弗雷迪在博尔顿的初演一炮打响，但野山羊乐队在伦敦的日子却屈指可数了。“还没过几周，夏天许过的承诺就开始分崩离析。”肯·泰斯蒂说。第一个走的是迈克·伯辛，他被利物浦的艺术学院录取了（“我答应过父母，夏天过完就要去读书了”）。虽然“公鸡”·泰勒选择留在伦敦，但“米弗”·史密斯似乎随时准备去做整个夏天都威胁要去做的那件事。如克里斯·史密斯所言：“每次只要情况不好，‘米弗’就会用那种酷似林戈^[60]的声音说，‘我只想回家做个送奶工’。”

泰斯蒂也在考虑去圣海伦斯的大学上学。9月8日，他搭便车返回利物浦。刚到就接了迈克·伯辛的电话。“野山羊接到一个利物浦的演出，迈克给其他人都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安排好借用一辆货车，问我能不能回伦敦开车载上他们和所有装备？”泰斯蒂说。

他无所畏惧地又搭便车回到M6高速，靠在路边搭顺风车，最终在当天晚上11点返回伦敦。第二天早上，微笑乐队的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开来了交通工具，肯把野山羊乐队的乐器装备装上去，其中大部分都存在帝国理工某个螺旋楼梯顶部的房间里。肯在狭窄的楼梯井费力地搬动音箱时，“弗雷迪帮着拿了一对沙槌和一个小手鼓”。货车塞满人和物之后，泰斯蒂爬上驾驶座，再开176英里返回利物浦。在后车厢里，有弗雷迪、“公鸡”·泰勒、“米弗”·史密斯、帕特·麦康奈尔，加上一堆吉他琴盒、音箱、架子鼓，挤在中间的，是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

那天晚上野山羊乐队将在哈德曼街的沉没俱乐部^[61]演出，这个潮湿的地下俱乐部据说是滚石乐队在利物浦的首演之地。在肯的记忆中，“罗杰、布莱恩和弗雷迪都穿着肯辛顿流行的那种潮流服饰——面料有很多的天鹅绒和皮草。这在利物浦是新奇事物。到俱乐部外面后，罗杰跟我们说他被一些当地年轻人调戏，显然他们对他的着装方式有异议。”泰勒说他把学校图书馆卡拿出来虚晃一下，假装是武术俱乐部的会员卡。“他说：‘看！我发功打死你们之前必须要给你们看一下……我是黑带三段……的……柔道手^[62]！’”肯咯咯地笑道：“据说那些青年真的被吓退了。”

泰斯蒂在学校的朋友、同时也是野山羊演出工作人员的杰夫·希金斯常常用磁带录下乐队的演出和彩排。有一盘他用Grundig TK14录制保

存下来的磁带，记录了野山羊乐队在沉没俱乐部的表演。杰夫站在舞台右边，把Grundig的晶体麦克风挂在一根生锈的钉子上，希望尽量录到些好的声音。这盘咔嗒作响的磁带里有野山羊演奏的奶油乐队的《我们错了》（We're Going Wrong），披头士乐队的《雨》（Rain），猫王的《监狱摇滚》和齐柏林飞艇的《交流中断》（Communication Breakdown）；专业技巧的缺乏，他们就用释放的激情来弥补。据希金斯说，沉没俱乐部的舞台太小了，弗雷迪不得不站到台子前面的空地上，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他做各种动作。现在听来，迈克·伯辛的高光时刻是演奏亨德里克斯/杰夫·贝克的布鲁斯版《摇滚我宝贝》（Rock Me Baby）；“米弗”·史密斯的闪光点在于其他人跑拍的时候仍然牢牢地稳着节拍，而弗雷迪唱《交流中断》时的“罗伯特·普兰特”^[63]式尖叫，是他在家花几个小时练习加上惊吓邻居的铁证。“弗雷迪对罗伯特·普兰特以及齐柏林飞艇的第一张唱片是真爱，”伯辛说，“他一刻不停地在屋里边晃边唱着里面的片段，特别是《宝贝我要离开你》（Babe I'm Gonna Leave You）里的‘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宝贝’（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onna leave you）那一段。”

“公鸡”·泰勒倒是不为所动：“我听到那盘录音的时候想，‘天哪，我们好差啊。’我们没法在台上好好听到自己的声音。弗雷迪不是史蒂夫·温伍德、史蒂夫·马里奥特或者乔·科克，他不是那种唱灵歌的人，当初他吼的高音很糟糕，但从一开始就很厉害的是他的表演。”遗憾的是，沉没俱乐部的这盘录音带里没有录到返场曲。杰夫·希金斯称，罗杰·泰勒和布莱恩·梅那晚也加入了野山羊乐队表演，但在此之前录音带就已经录到底，杰夫记得他们一起演唱了几首微笑乐队的歌曲。“所以那时四分之三个皇后乐队已经在场，”泰斯蒂回忆道，“只是我们无从得知。”

在布莱恩·梅记忆中，皇后乐队之前，那个“很害羞并将自己掩藏在这种舞台形象之下”的弗雷德，在沉没俱乐部的录音带中得到了证实。弗雷德在歌曲间报幕时声音很小很秀气，而且过分礼貌。舞台下也一样，本来尖锐机智、活泼戏谑的他，很容易就退回到羞怯里去，特别是有陌生人在场的情况下。不过，在与野山羊乐队相处的短暂几个星期里，弗雷迪已经在策划下一步。他施展妙计进行的第一项变动是乐队的名字。弗雷迪想重新命名乐队为“残骸”^[64]，但一开始有些受阻。“然后弗雷迪给在利物浦家里的我打电话，”迈克·伯辛说，“他说他给乐队里其他人打了电话，他们愿意改名为残骸乐队。我说如果其他人都觉得还好，那我也OK。后来我才发现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电话，说了一模

一样的话。”

他的乐队成员们同意此事也是必然：打电话之前，很明显弗雷迪已经把新名字烙在了野山羊的装备上。“很好的营销手段，挺可爱的，”肯·泰斯蒂说，“是个有计谋的人。”10月12日，弗雷迪和理查德·汤普森去学苑剧院^[65]看齐柏林飞艇的演出。“我想我在哪儿听过杰夫·贝克说，重摇滚乐队需要一个厚重的名字。比如齐柏林飞艇，”“公鸡”·泰勒说，“某个人，可能就是贝克本人，认为‘坚固的惠灵顿’^[66]这种名字是个笑话。这可能就是改名‘残骸’背后的原因，因为听起来更厚重些。”

改变名号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些演唱素材上的改变。虽然如《漂泊的流浪者》（Vagabond Outcast）这样相对慵懒厚重的布鲁斯歌曲仍然留在歌单中，但肯记得，“弗雷迪和迈克已经开始自己写歌曲。弗雷迪觉得可以和迈克一起合作”。现存的残骸乐队歌单上证实了有原创歌曲《绿》（Green）、《脑海中的毒瘤》（Cancer On My Mind）、《没有你，情人》（Without You, Lover）（皇后乐队歌曲《骗子》[Liar]的早期雏形）、《普遍主题》（Universal Theme）、《FEWA》（有人认为是“消失的情感”[Feelings Ended Worn Away]的缩写）、《另一辆列车》（One More Train）和《花言巧语的布鲁斯》（Blag-a-Blues）；绝大部分都没有录下来。迈克·伯辛对这些歌曲只记得大概，不过他解释说，“我们北方来的这些人做的是那种十二小节的歌曲，没有音调变化的。但弗雷迪说，‘不，不，不，必须要用黑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变调，这样听起来更有意思。’我们只知道音乐的现在，而弗雷迪却知道它会往哪里发展。”

虽然弗雷迪说服了乐队成员改队名，但是主唱和吉他手之间的地理距离又成了另一个障碍。过去的说法是，弗雷迪在担任野山羊/残骸乐队主唱期间，1969年10月左右，曾搬到利物浦待了几个星期，住在演出工作人员杰夫·希金斯家开在著名的潘尼巷^[67]酒吧里。肯·泰斯蒂委婉地表示反驳：“弗雷迪短暂地来过利物浦，但不知怎的，过个夜就被传成住了一整个夏天。其实没这事。”

可以肯定的是在10月的最后一周，残骸乐队失去了鼓手米克·“米弗”·史密斯，并在伊林艺术学院初试身手进行首演。这一信息记载在弗雷迪写给圣母升天学校的朋友席琳·戴丽的信中。信里弗雷迪大骂鼓手（“‘米弗’不跟我们一起了，那浑球有天早上起来就走了，说他去威德尼斯做送奶工了”）；并透露了他和“米弗”本来要去哈罗德百货做兼职；还说他给迈克·伯辛买了从利物浦来的火车票，让他来伦敦排练；顶替

史密斯的是前1984乐队鼓手理查德·汤普森（“练得很不错。理查德中途都快累趴下了.....”以及“《齐柏林飞艇II》（*Led Zeppelin II*）这张专辑太震撼了”）。正如信中所写，米克·“米弗”·史密斯在M56高速公路上做了一阵建筑工人后，确实回去做老本行了。理查德·汤普森显然会被请来接任，因为如他所说，“我已经熟知他们的所有歌曲。”

残骸乐队在伊林学院的一间“嘈杂公共休息室”里进行的首演并不是很顺利。马克·莫尔登已经毕业了，但他弟弟奥布里还在学生会里做事，所以看在弗雷迪的面子上帮忙预定了残骸乐队的演出。“他们很差劲，”他现在说，“我记得弗雷迪专门为演出买了一套白西装，但那次表演唯一的看点是他把麦克风从支架上取下来，仰卧在舞台上，号叫的时候把它一直伸到喉咙。公共休息室里人们在各干各的事，有些人在看演出，但其他人有的围坐在一起聊天，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玩桌上足球.....我觉得他们就是来搞笑的。”

残骸乐队在圣马丁艺术学校、帝国理工等其他地方只演出了十场左右。克里斯·史密斯看了他们的演出后表示不解：“我想我和蒂姆·史塔菲是在酒吧看的。弗雷迪摆着各种姿势，大步走来走去，我以前从未见他做过。但是这些让人惊奇的表演在酒吧里竟然也没引起轰动。不管怎么说，这需要十分的勇气。”2004年，布莱恩·梅在采访中回忆了类似的情景，委婉地描述道：“我们去看弗雷迪在他自己的乐队里唱歌。你简直跟不上他。他表现得非常有激情，声音也特别响，我们都不太看得懂。”

11月，“公鸡”·泰勒的妹妹帮残骸乐队在威德尼斯她学校的舞会安排了一场演出。根据皇后乐队的传说，这就是弗雷迪发现他标志物件的那一晚。“显然就是在那次演出的时候，他的麦克风支架底部掉了。一次幸运的巧合。”肯·泰斯蒂说。理查德·汤普森也说，当时支架的底盘掉下来了，弗雷迪继续唱，没有管它。“后来，皇后乐队来到我那时在读的圣海伦斯理工学院^[68]演出时，我是外联部秘书，”泰斯蒂补充道，“我在试音时看到这个半截麦克风架子的玩意，我说：‘弗雷德，这麦克风棍子，你确定吗？’他说：‘这是我的噱头，亲爱的。必须得有个噱头。’我说：‘弗雷德，你听起来怎么跟吉米·萨维尔^[69]似的。’然后他说：‘才没有呢。’”

但对于残骸乐队来说，一切会在圣诞节前结束。在女校表演完的两天后，乐队在里士满橄榄球俱乐部^[70]进行表演，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现实明摆着，这支乐队是成不了气候的，”迈克·伯辛解释

说，“弗雷迪努力让大家团结不懈，但我却没有那么专注于此。从一开始，成功的决心就是推动着弗雷迪的一股难以阻挡的力量。”弗雷迪回头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伯辛则退出音乐领域，到利物浦的艺术学院去读艺术预科班。这时候，这群租住在肯辛顿的乐手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活动地点：巴恩斯区的轮渡路40号。

“帕特·麦康奈尔和另一个叫丹妮丝·克拉多克的姑娘是原住客，”“公鸡”·泰勒说，“然后我搬进去了，接着弗雷迪、罗杰·泰勒和另一个男的也住进来了，我想那人是牙科学生。整个一楼都被我们住了。”

弗雷迪从费尔特姆的父母家搬出来时，他将要住进去的房子和保萨拉一家在郊区的舒适住宅可是相去甚远。（弗雷迪：“我跟父母说打算要做什么时，他们很是恼怒。”）这房子好久没有装修过了，还保留着以前住户的俗气风格。迈克·伯辛在残骸乐队快要解散的那段时间去睡过，记忆里那是个“恐怖的”地方。理查德·汤普森坚称：“轮渡路是个垃圾地方，但其实都是一样的，典型的学生公寓。”公共客厅有一张红色的化纤沙发，缝线已经迸裂，里面的马毛填料散到沙发垫子上了。厨房基本上是个无人区，就算有能吃的也只是茶和牛奶。

总会有些无家可归的留宿者可能在任一个早晨从任一间卧室里冒出来，而且，迈克·伯辛补充道：“我仍然记不起哪里有浴室。”“房东老太太住在楼上，”“公鸡”·泰勒记得，“希尔维亚·西姆斯，那个女演员，住在我们隔壁。老太太不喜欢希尔维亚·西姆斯。她经常说她是‘可怕的女人！戏子！……知道吧，不靠谱。’与此同时，我们住这边，玩着音乐，制造着吵死人的噪声。”

1969年10月，在残骸乐队的伊林学院首演之前，有一晚理查德·汤普森曾在轮渡路录过乐队排练的磁带：伯辛演奏着未插电的电吉他，泰勒用的是带扩音的贝斯，汤普森则拍打着他记得是“吉他盒”的东西。其中一首歌曲是保萨拉/伯辛创作的《绿》；这是残骸乐队唯一保存下来的完整录音歌曲。“录音带最后还有另一首歌，”汤普森说，“而且在录音带里，你可以听到有室友进来抱怨声音太大，已经凌晨1点了。你还能听到弗雷迪文雅地指挥队友的声音（‘注意听……别忘了……这两段后面’）。”

虽然轮渡路上抽大麻成风，弗雷迪却异常节制。他没有碰这些东西，习惯很早就起床，踮着脚迈过躺在地上醉生梦死的室友，安静地自己唱歌，轻轻地在新吉他上拨着谁人乐队的《弹球奇才》（Pinball

Wizard) 的和弦。“他就像一个游离的吟游诗人，”迈克·伯辛说，“招人烦。”

有一次，声音太大遭到投诉，来了两个警察，“公鸡”·泰勒出头“扮演友好的北方同胞”，端了一杯茶和一块蛋糕去跟他们说好话。“我以前常在卡纳比街买叶子，”泰勒说，“我曾给弗雷迪展示了一盎司叶子，他对这么大一包表示震惊。但如果你问他要不要，他常常说：‘哦，我已经经历过了。这些我都用过了。’”

轮渡路搞来的叶子常会混在茉莉花茶里。所以公寓里就得有一个人把茶叶和大麻叶分开。有一次，一包叶子来了，没有分拣就装到茶叶罐里，不明就里的弗雷迪自己泡了一杯。据目击者称，弗雷迪“飞大了”，听着弗兰克·扎帕的《我们只为金钱》(*We're Only in it for the Money*) 专辑，以为是《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里面加了一段唱针刮擦空白胶片槽的奇怪声音。弗雷迪大惊失色，他以为这张新欢唱片给刮坏了。“弗雷迪不喜欢抽大麻，”克里斯·史密斯证实，“后来，他曾给过我‘速度丸’^[24]。弗雷迪说：‘来一点，克里斯’.....我就试过一次，演出的时候感觉很好，但后劲太大很难受。”

这种所谓的“速度丸”应该是在肯辛顿市场搞上来的，弗雷迪和罗杰·泰勒目前在这个嬉皮商业区里有了一间自己的小铺子。随着这一年过去，弗雷迪通过在哈罗德百货兼职（如他给席琳·戴丽的信中提到的）以及偶尔作图来获得多一点的收入。“有次我下楼看见他在画女式内衣，”迈克·伯辛说，“他找了一份为报纸设计时尚广告的工作。”不久后，弗雷迪又和奥斯丁骑士设计事务所^[25]签约当插图画师，并被委托为童书画插画，不过此书并未出版。

肯辛顿大街上这栋别致的三层室内商场——肯辛顿市场，是音乐家、演员和艺术家的聚集地，也是弗雷迪和罗杰认识伦敦“潮人”的直接通道。起初，这两人每周付10英镑（是泰勒的助学金）租了一个摊位，卖一些弗雷迪学校朋友的艺术作品。“接着弗雷迪的论文卖出去了，是关于亨德里克斯的。”泰勒透露说。这件作品去向不明，但据罗杰说，“里面有不少好东西——比如他手写的《太阳的第三颗石头》(Third Stone From The Sun) 歌词.....现在这种东西可能值不少钱”。

蒂姆·史塔菲也在市场上开过几个月的摊位，出售艺术作品。但他厌恶那里被他描述为“自恋且风骚”的气氛。意识到画作不好卖，弗雷迪和罗杰尝试了不同的策略。“我们喜欢上了复古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的

服装，”泰勒解释说，“我们从一些来路不明的经销商那里买一大包丝巾，拿过来熨平，抖开铺好卖。”

“其实就是一堆地摊货，”肯·泰斯蒂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毛皮夹克，怪异的板球外套，还有些老式小姐的大衣裁剪修饰后做成的披风。”

弗雷迪不在乎经营规模多小，他跟所有人说他们是“绅士的服装店”，并且似乎抱着他对音乐一样热情地对待这份工作。“弗雷迪扛着这些大袋子回家来，”布莱恩·梅回忆说，“扯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说：‘看这些衣服多么美！可以卖很多钱的！’我会说，‘弗雷迪，那是块破布。’”

就在肯辛顿市场，阿德里安·莫里希撞见了艾斯沃思理工学院的老朋友。“我当时正在购物，突然听到那个声音：‘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他把我介绍给罗杰，请我去他的公寓里参加聚会，后来我们喝醉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他说‘你一定要来看我的乐队演出啊’，然后，当然了，我没去。我曾经肯定地以为，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成就来。”也是在这个市场，发生了真实性存疑的弗雷迪“卖衣坐车”事件，据说他不愿意坐公交车，在摊位上把罗杰的夹克卖了付出租车费。在1977年被《新音乐速递》（*NME*）记者问及此事时，弗雷迪拒绝承认也没有否认。

在给席琳·戴丽的信中，弗雷迪写道：“罗杰和我几乎到处拉客，花言巧语地推销。”证明他在这个蒂姆·史塔菲厌恶的“自恋且风骚”的氛围里活得挺滋润的。前伊林学院学生托尼·卡提那尼生动地忆起他和弗雷迪沿着肯辛顿大街散步时被人吹口哨调戏的情景。不过，在给席琳的同一封信中，弗雷迪也抱怨说：“‘米弗’这家伙跟每个人都讲，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基佬！”迈克·伯辛认为“虽然弗雷迪可能没有出柜，但他已经从钥匙孔里往外看了”。不过，据伯辛说，他在野山羊和残骸乐队期间，“仍然表现得从上到下都是个直男”。

“公鸡”·泰勒也说：“弗雷迪有一些很棒的女性朋友.....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有一个名叫夏洛琳的艺术生.....两个叫玛丽的女生.....还有艺术学院的同学约瑟芬（结婚前姓马斯顿，婚后随夫姓兰肯），这姑娘简直不得了，那时候看起来就已经像个艺术家。”这位当时大家都觉得“极具波西米亚风情”的约瑟芬，是弗雷迪的好闺蜜，把他介绍给了她的一位同性恋朋友。她记得弗雷迪“明显对同性恋有很大兴趣；同时

也有些畏惧”。

不过，保罗·亨伯斯通和克里斯·史密斯都记得那个和弗雷迪交往过的女学生。“她有一头很蓬松的红发，叫作罗斯玛丽。”亨伯斯通笑道。1995年接受采访时，约瑟芬·兰肯透露说，弗雷迪和罗斯玛丽是发生过关系的，但“听说他们只睡过一次，因为他在床上的表现，可以说很一般”。九年后，《泰晤士报》对弗雷迪的前女友罗斯玛丽·皮尔森进行了采访，此前她对这段关系一直保持沉默。

罗斯玛丽透露说，两人是1967年在伊林学院上同一门课时相遇的，并结下了友谊。“在食堂他会坐在我旁边，非常殷勤，像哥哥一样。”她解释说。两人一起“赶各种展览”，也去看演出和参加聚会。两年后，他们成了情侣，那是住在轮渡路的时期。罗斯玛丽与艺术界的联系让她进入了伦敦医生帕特里克·伍德科克的晚宴小圈子，这个圈子里有他的病人、朋友和知己，包括大卫·霍克尼、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德里克·贾曼和约翰·吉尔古德^[73]等。弗雷迪表现出了好奇，她说，“他想象和男人睡觉会是什么样子”，并且渴望被介绍给罗斯玛丽认识的这些同性恋朋友：“弗雷迪认为，如果他不和他们结识，他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最终，在1970年的某段时间，罗斯玛丽结束了这段恋情，她称内心深处知道弗雷迪是同性恋：“我认为弗雷迪确实是爱过我的，但我觉得那太模糊，太难辨性别。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有两种性别。”

弗雷迪从来没有对轮渡路的众人说起过自己的困惑。也许他说过，这些人没有说出来。尽管不断开着同性恋的玩笑和进行无情的揶揄，但如一个圈里熟人解释的，“嬉皮士圈子里，你不会去质疑任何人的性取向。因为不得体。”

克里斯·切斯尼，一位十七岁的吉他手，在1970年初成为弗雷迪圈子里的一员。残骸乐队解散后，弗雷迪开始翻看音乐广告，想找一个替代乐队，他回应了《流行音乐周刊》封底的一条“找主唱”的广告，是一个叫作“酸奶海”^[74]的乐队发的（名字来自披头士乐队吉他手乔治·哈里森在《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个乐队原名“西红柿城”，是由切斯尼（那时叫克里斯·达米特）和节奏吉他手杰瑞米·“橡皮”·盖勒普在牛津的圣爱德华公立学校^[75]组起来的，后者的商人父亲提供了资助。加上鼓手鲍里斯·威廉姆斯和贝斯手保罗·米尔恩，乐队在各种艺术实验场和“偶发艺术场”中表演过；据切斯尼说，那是一种“人们会扯掉衣服嘶吼诗歌”的场所。

威廉姆斯在1968年离开乐队，像嬉皮士那样去印度朝圣了（尽管多年后，他会再次在治愈乐队^[76]里出现），他的继任者是罗伯·泰雷尔，前查特豪斯公立学校^[77]学生，曾是片刻乐队^[78]成员，为创世记乐队的前身暖过场。到了1969年夏天，酸奶海乐队已经比较专业，为深紫乐队和品尝乐队都开过场。跟野山羊乐队一样，他们缺少一个主唱。“我们称自己为前卫布鲁斯乐队，”切斯尼说，“在公立学校时我们听的是约翰·梅奥尔的布鲁斯破坏者乐队，彼得·格林的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和奶油乐队。亨德里克斯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也自己写歌，我唱过主唱，但我真的很想专注于弹吉他。”他们的“找主唱”广告起了效果。面试在多尔金的一座教堂的青年俱乐部举行，切斯尼回忆说，除了大部分指望不上的，还是有几个有前途的歌手出现，包括民谣歌手布丽姬特·圣·约翰。不过，只有一个人能胜任这份工作。弗雷迪排场很大，他游说微笑乐队的工作人员约翰·哈里斯开车送他去试唱。（如肯·泰斯蒂所言，“我曾经问过弗雷迪为什么从来不学开车。他说：‘亲爱的，我不需要开车，总会有人载我的。’”）弗雷迪从车上下来，故意昂首阔步地走进青年俱乐部，哈里斯跟在后面几步，用一个木头盒子提着老大的麦克风。“他对着我们发动攻势，显而易见，他实在是太赞了，”切斯尼笑了，“他有着长长的黑发，身穿丝绒，而且十分大胆。”弗雷迪立马对他们用了在野山羊的那些招数。“他径直向我走来，在我独奏的时候做肢体上的接触，把麦克风戳向我。当时他唱得还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演出过很多次，但他会唱假嗓，这很不寻常，我很喜欢。”

克里斯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弗雷迪正式跟着酸奶海乐队在伦敦下沃德尔街的寺庙俱乐部^[79]进行了演出。“我想我们还为黑色安息日乐队^[80]开过场，在富勒姆路的红狮俱乐部^[81]演出过。”他补充说。4月18日，原定在微笑乐队主场、特鲁罗的PJ's俱乐部的一场演出被取消，由微笑乐队代替了酸奶海乐队。值得注意的是，弗雷迪加入乐队后的首演是1970年3月在牛津黑丁顿的高地教区大厅^[82]，《牛津邮报》（*Oxford Mail*）进行了采访报道。这场演出由流浪者慈善庇护所冠名，酸奶海乐队的少年吉他手是神学教授迈克尔·达米特的儿子，沾了一点关系。有趣的是，《邮报》记者让他们在文章末尾刊登一段“乐队之声”。这部分把歌词逐字印出来，用了弗雷迪的一首歌《情人》（*Lover*），开头是绝妙荒唐的两句：“你从没试过的美好/酸奶推销员来了……”（*You never had it so good /the yoghurt pushers are here...*）文章配的照片上，克里斯·切斯尼像小孩窝在送奶车上，和酸奶海乐队摆着姿势，“新主唱弗雷迪·保萨拉”自信地凝视着镜头。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切斯尼揭秘，“我们经理人接听试唱来电的时候，问了他的名字，他说：‘弗雷德·保尔。’他收住了要出口的保萨拉。对我们来说并没什么问题，但他总是很在意。弗雷迪从不谈论他的童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来自桑给巴尔。”

弗雷迪比克里斯·切斯尼大六岁，不久他就开始跟这位吉他手聊起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写的歌，他很感兴趣，但他会很直接地说：‘你这歌词我扔了，我自己来写。’我不在乎。我才十七岁，愿意接受指教。”在弗雷迪的助力下，酸奶海乐队开始转变。保罗·米尔恩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小说家的朱迪·阿斯特利对这种转变感到惊讶：“我在萨里郡野外看了排练，又看了一场演出，一眼就能看出来，克里斯和弗雷迪形成了绝妙的舞台组合。弗雷迪似乎释放了克里斯的能量，他的表演比以前更绚丽了。”

朱迪觉得弗雷迪“彬彬有礼，甜美迷人，风趣幽默，但不愿过多地谈起自己”。相比之下，保罗·米尔恩则是酸奶海乐队的“耍酷贝斯手”。“保罗打扮得非常炫酷，”朱迪说，“他在‘奶奶出游’店里买了很多天鹅绒衣服，又从黛博拉和克莱尔（Deborah and Clare）店里买了不少衬衫。他非常喜欢克里斯，我想，他对克里斯和弗雷迪相处甚欢有点不高兴。”

弗雷迪强烈要求乐队演奏他以前在残骸乐队的那些歌，还要翻唱摇滚歌曲《露西尔》和《监狱摇滚》。如克里斯所言：“他有一种当时不多见的娱乐意识。”和切斯尼一起，他开始写一些有着疯狂和弦变化的歌曲（“他写的和弦打破了所有常规”）。在舞台上，在各种带着性意味的转麦克风动作和风骚的厮混表演中，弗雷迪的幽默可见一斑：“他喜欢逗弄观众。所以唱完一首歌时他喜欢干一件事，他会说，‘多射……非常敢射^[83]’，然后你会发现观众里有人蒙了：‘他刚说的是谢还是射啊？’”

在台下，弗雷迪的不拘一格则让某些人感到不适。1996年接受采访时，杰瑞米·“橡皮”·盖勒普重述了一件事，有次弗雷迪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然后宣布：“我今天看起来好好看啊，你觉得呢，橡皮？”“当时我才十八岁，觉得这一点都不有趣，”他说，“所以我想，‘去你的！’”

几个星期过去，这些轻微的不满累积成了很大的罅隙，弗雷迪和克里斯站一边；“橡皮”和保罗·米尔恩在另一边。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是切斯尼接受弗雷迪的提议，搬入了轮渡路42号。“我成长在牛津的那种非常传统的中产阶级环境中，这些住在伦敦西区的人显然迷人和有趣多了，”克里斯回忆道，“所以那些依然留在郊区莱瑟黑德的人，整天臆想着我和弗雷迪在巴恩斯区密谋什么。于是就产生了很多猜忌。”

在轮渡路的日子，克里斯和弗雷迪“迅速拉近了关系”。音乐上，这位吉他手被他的主唱那广博的品位所吸引。房子里的唱片机播放着亨德里克斯的《电子女儿国》（*Electric Ladyland*）（“一切以此唱片为中心”），披头士乐队的《白色专辑》，行动乐队^[84]的《樱花诊所》（*Cherry Blossom Clinic*），还有（弗兰克·）扎帕的、谁人乐队的、洛·史都华的音乐……“弗雷迪非常喜欢齐柏林飞艇乐队，不过他也能很快发现新的流行音乐，”切斯尼说，“杰克逊五兄弟组合^[85]的单曲《我想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一发布，弗雷迪就迷上了。另外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大卫·鲍伊是完美的流行明星，即使当时鲍伊才刚有一首打榜的金曲《太空怪客》。他很有先见之明。”

这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涉及过性（“如果有，我也不会不好意思承认，但真没有”），不过作为弗雷迪关照的小弟，切斯尼很高兴能体验到成人的生活。在这里，他尝试了迷幻剂，惊讶于流连此地的众多微笑乐队的女歌迷，照看好自己尽量别去厨房危害健康（“最多能泡杯咖啡，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还和布莱恩·梅进行过即兴的吉他合奏（“我们把自己和几个AC30扩音器关在一个房间里”）。

切斯尼可能还看到了和弗雷迪在一起的罗斯玛丽·皮尔森：“他有一个女朋友，但不是玛丽·奥斯汀（不久的将来她会成为弗雷迪的正式伴侣）。两人经常一起消失在房间里。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他是同性恋。”弗雷迪常常跟大家宣布说他要去看“我的好基友们”，这总会引起微笑乐队的鼓手高声起哄：“罗杰喜欢开玩笑，而布莱恩人太有礼貌了，不会说什么。”同时，据切斯尼说，无论梅还是泰勒似乎都没想过弗雷迪成为微笑乐队主唱的可能性：“我感觉，他们觉得他其实有点搞笑。他用力过猛了。”

酸奶海乐队中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在持续发酵。弗雷迪的歌曲《情人》成了争论的焦点，因为米尔恩和盖勒普觉得它太矫情和商业化。他们觉得弗雷迪带入的音乐影响有害无益，让乐队远离了真实、非主流的声音。保罗·米尔恩是自由乐队的狂热粉丝，盖勒普解释说：“我们本来想做一个重布鲁斯乐队，但弗雷迪产出了特别多的和声。”

“保罗肯定地认为弗雷迪在领着他们往错误的方向上走，”朱迪·阿斯特利证实道，“他觉得弗雷迪只不过是他们雇来当主唱的，不该对决策指手画脚。”由于把老爸给的成百上千英镑都投在了乐队里，“橡皮”·盖勒普有理由感到愤懑。1995年采访时，盖勒普（他在2006年去世了）痛心地说：“我是很喜欢弗雷迪的。问题是，我把命都给了乐队.....为了乐队我都哭了.....克里斯是非常不错的主音吉他手，如果他不在，我觉得成功的机会要渺茫许多。”

不满逐渐积累，爆发了实质性冲突，即使弗雷德努力从中斡旋，但到了1970年春季，酸奶海终于干涸了。“‘橡皮’把所有的设备都拿走了，”切斯尼说，“我曾经有一把漂亮的SG标准电吉他，还有一套很好的马歇尔音箱。全都没了。后来有一天，我去莱瑟黑德，从排水管上滑下去通过浴室窗户爬进屋子里，把吉他顺走了。我竟然还以为得手了！当然没那么好的事，没过多久巴恩斯的住处就有人敲门，来了两个打手。”

弗雷迪昔日的乐队成员分道扬镳。盖勒普和罗伯·蒂利尔去另外组了一个乐队；保罗·米尔恩去东英吉利大学^[86]读书了，克里斯·切斯尼则在雷丁的亨帕饼干厂（Huntley & Palmers）拼命干活，好挣钱再买一把吉他。克里斯、弗雷迪和约翰·“公鸡”·泰勒曾经考虑过组乐队，但主要是没钱，切斯尼这里也没有吉他，组团无从谈起。后来泰勒找了一个给帕托乐队^[87]当巡演经理的工作，之后他创办了自己的管理公司，服务的艺人有已故的吉姆·卡帕尔蒂、丹尼·洛克里埃尔和乔·布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弗雷迪，”他说，“我还有一个装了我衣服的行李箱在他那儿.....我姐姐总是找我要，那是她的箱子。”

弗雷迪又变成了“没有乐队的歌手”，不过他一直想加入的那个乐队现在也开始摇摇欲坠。自微笑乐队为“是”乐队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开场，已经过去了两年，他们的进展缓慢得令人心塞。他们依然是不变的暖场乐队；不起眼的名字出现在《流行音乐周刊》上，但从来不是主角。1969年圣诞前两周，他们在伦敦的大帐篷俱乐部为奇平顿小舍乐队^[88]开场，尼克·罗伊当时在这个乐队，他作为词曲作者混迹于音乐圈，同样收益微薄。虽然水星唱片公司承诺这场演出能提升微笑乐队知名度，但依然一无所获。

布莱恩·梅再次在科学和音乐间分身乏术。1970年2月，弗雷迪大步挺进酸奶海乐队时，梅正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89]做研究。这是布莱恩目前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其中一项任务，他和帝国理工教授吉姆·林、肯·雷

伊等组成的小队到访特内里费岛天文观测台，这个天文台建在当地最大的休眠火山泰德上。布莱恩在圣克鲁斯买了一把迷你西班牙吉他。“我在山上观测星星，弹着这把吉他。肯教授可能觉得这事十分有趣。他说话时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显然，你到时候哪边都顾不上……’”

带着令人羡慕的度假晒黑的痕迹，布莱恩回到英国，蒂姆·史塔菲却早等着送上一个坏消息：他要离开微笑乐队了。“时间不断流逝，期待的成功迟迟未来，我就越来越不安。”史塔菲承认说。其实微笑乐队缺乏进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如同克里斯·史密斯体会过的，音乐方向也是一个问题。史塔菲被美国的灵魂乐、节奏布鲁斯所吸引，渐渐地对微笑乐队的极端英伦硬摇滚失去了兴趣。“我们甚至唱过一个版本的《假若我是木匠》，有香草软糖乐队^[90]的风格，一点都没有摇摆爵士的感觉了。”史塔菲抗议说。同时，看着那个晃着绒球跟进跟出的弗雷迪·保萨拉，蒂姆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微笑乐队想走戏剧性的道路，但我觉得我不会喜欢那样。我心目中的乐手是长头发，埋着头，盯着地板的那种。”尽管和史塔菲后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布莱恩·梅说微笑乐队的这位贝斯手“总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反向的力量，驱使他远离我们”。

令人惊讶的是，蒂姆·史塔菲的下一段音乐旅程却跟灵魂乐或节奏布鲁斯没有半点关系，他加入了前比吉斯乐队^[91]鼓手柯林·彼得森组的新乐队大锣乐队^[92]成为主唱。1970年8月，他们有了一首还不错的单曲《不要拖太久》（Don't You Be Too Long），甚至上了《流行之巅》节目，但随后就解散了，甚至没有一场演出。一年后，史塔菲在美国待了几个月，又回到了英国，加入了曲风恢宏的前卫摇滚乐队“摩根”成为主唱，该乐队包括前风流韵事乐队^[93]键盘手摩根·费希尔。摩根乐队重录了微笑乐队的歌《地球》，收在他们1972年的首张专辑《超新星与太阳》（*Nova Solis*）中。

后来摩根乐队停滞不前时，史塔菲考虑做独立歌手，甚至在大帐篷俱乐部开过一场个人演唱会。到七十年代末，蒂姆离开音乐界，转而投身于模型制作行业。他为电影和电视广告提供了大量作品，合作最久的是为儿童电视节目《托马斯坦克引擎》（*Thomas the Tank Engine*）创作了众多模型。1992年，他重回舞台，和罗杰·泰勒、布莱恩·梅在大帐篷俱乐部为微笑乐队的重聚演出唱了两首歌。2003年，他制作了一张个人专辑《朋友们》（*Amigos*），目前正在写科幻小说^[94]。

多年来，蒂姆·史塔菲一直和善地为那些好奇的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重述他在微笑乐队的时光，他坚持认为离开乐队并不是错失良

机。“弗雷迪能做到，我却没有那个天分，”他说，“我从来不是弗雷迪那样的表演者和歌曲作者。我为没能成为音乐家感到遗憾，但不为离开微笑乐队而后悔。”

1972年的一个晚上，在蒂姆·史塔菲的家里，蒂姆向摩根·费希尔介绍了一位朋友。“蒂姆说：‘对了，摩根，这就是微笑乐队里接替我的那个家伙。’然后这位气质非凡、带着异域风情的波斯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全身覆着犹如天鹅绒靠垫套般的服饰。他十分腼腆地笑了笑，几乎未发一言，极其轻柔地握了握我的手。”那正是弗雷迪·保萨拉。

[1] 英文名为“Ibex”。

[2] Gustav Metzger，德国出生的英国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提出了“自毁艺术”和“艺术罢工”概念。1964年，汤申德在伦敦哈罗区铁道宾馆酒吧的表演中砸了吉他，这件事被《滚石》杂志列为“改变摇滚乐历史的五十个重要时刻”之一。

[3] Roy Ascott，英国新媒体艺术先驱。

[4] 罗尼·伍德，基思·理查兹，查理·沃茨都是滚石乐队的成员，前两位为吉他手，后一位为鼓手。

[5] Jimmy Page，吉他大师，齐柏林飞艇乐队创建者之一。

[6] 指坎伯威尔艺术学院（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s）。

[7] 指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College of Arts）。

[8] 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校，目前是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9] Holborn，即在霍尔本有校区的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上述几所学院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致力于艺术、设计的学院。1986年，这几所学院与伦敦传媒学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和温布尔登艺术学院（Wimbledon College of Art）组建成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设计、大众传播以及相关技术的教育中心。

[10] 英文名为“Castle Inn”

[11] 英文名为“Drayton Green”。

[12] 英文名为“Crawdaddy club”。

[13] 英文名为“Green Man pub”。

[14] 英文名为“Ealing Town Hall”。

[15] 英文名为“Duke of Wellington pub”。

[16] 英文名为“Kensington Tavern”。

[17] 英文名为“Smile”。

[18] 英文名为“North London Polytechnic”，现为北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

[19] 英文名为“Jodrell Bank Observatory”。

[20] 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

[21] 英文名为“Moby Grape”。

[22] 英文名为“Yes”。

[23] 英文名为“Muddy Waters”。

[24] 英文名为“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Unmarried Mother and Her Child”。

[25] 英文名为“Spooky Tooth”。

[26] 英文名为“Bonzo Dog Band”。

[27] 英文名为“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28] Mercury Records，与弗雷迪·莫库里没有关联。

[29] 英文名为“Speakeasy”，出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禁酒期对于非法酒吧的叫法。

[30] 前者英文名为“Eyes of Blue”，后者为“Man”。

[31] 英文名为“Trident Studios”。

[32] Riff，爵士乐、摇滚乐、重金属乐中大量出现的电吉他即兴连续演奏重复乐段。

[33] 英文名为“Rondo Talent Agency”。

[34] Genesis，著名前卫摇滚、艺术摇滚乐队，其成员菲尔·柯林斯的个人演唱事业十分成功。菲尔的孩子是皇后乐队的歌迷，菲尔本人也在多个场合与皇后乐队同场演出过。

[35] 英文名为“The Climax Chicago Blues Band”。

[36] 英文名为“Timebox”。

[37] 英文名为“Watford College”。

[38] 英文名为“Taste”。

[39] Mika，1983年出生的黎巴嫩裔英国歌手，歌声高亢多变，舞台风格狂放，将弗雷迪·莫库里视为偶像，不少媒体称他与弗雷迪有诸多相似之处。

[40]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是披头士乐队于1967年6月1日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是乐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曾被《滚石》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五百张专辑”第一名。

[41] 十几年后的1986年，皇后乐队最后一次巡演的歌单中再次包含了这首歌。

[42] 英文名为“Spencer Davis Group”。

[43] Tyrannosaurus Rex，常被简写做T. Rex，著名华丽摇滚乐队。

[44] 英文名为“Savoy Brown”。

[45] 英文名为“Chicken Shack”。

[46] 英文名为“De Lane Lea studios”。

[47] Deep Purple, 1972年深紫乐队以瑞士蒙特勒一场火灾为灵感创作了热门单曲《水上烟雾》(Smoke On The Water), 后来皇后乐队成了蒙特勒高山录音室的主人, 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还与深紫乐队在此地共同翻录过此曲, 用作慈善目的。

[48] 英文名为“Pye Studios”。

[49] 英文名为“Maria Assumpta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50] Tony Hancock (1924—1968), 英国笑星, 于196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服药自杀。

[51] 英文名为“Wade Deacon Grammar School”。

[52] 英文名为“Colour”。

[53] Chrysalis Records, 成立于1968年的英国唱片公司, 品牌名取了创始人克里斯·莱特(Chris Wright)的名和特里·埃利斯(Terry Ellis)的姓, 合称为“克里斯埃利斯”, 读出来正好是英文单词“蝶蛹”。

[54] 英文名为“Ten Years After”。

[55] 英文名为“Island Records”。

[56] 英文名为“Jethro Tull”。

[57] 猫王的著名歌曲。后来弗雷迪在皇后乐队的演唱会上也唱过。

[58] 英文名为“Gum Boot Smith”。

[59] 英文名为“Spyrogyra”。

[60] Ringo Starr, 披头士的鼓手林戈·斯塔尔, 2018年受封爵士。他们都是利物浦口音。

[61] 英文名为“Sink”。

[62] 他糊弄别人的词其实是Origami, 日本折纸艺术。

[63] Robert Plant, 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主唱。

[64] 英文名为“Wreckage”。

[65] 英文名为“Lyceum Theatre”。

[66] 英文名为“Concrete Wellington”。

[67] 英文名为“Penny Lane”, 因披头士乐队在1967年发布的单曲《潘尼巷》而名声大噪。

[68] 英文名为“St. Helens Technical College”。

[69] Jimmy Savile, BBC著名电台和电视主持人, 曾担任音乐节目《流行之巅》(Top of the Pops)的主持。

[70] 英文名为“Richmond Rugby Club”。

[71] 英文名为“Speed”, 成分为安非他命。

[72] 英文名为“Austin Knights”。

[73] 都是同性恋和伟大的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是当今在世的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是著名作家，作品《单身男子》后来被搬上了大银幕；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是英国著名艺术导演，作品有《卡拉瓦乔》等；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之一。

[74] 英文名为“Sour Milk Sea”。

[75] 英文名为“St Edward's public school”。

[76] 英文名为“The Cure”。

[77] 英文名为“Charterhouse public school”。

[78] 英文名为“The Anon”。

[79] 英文名为“The Temple”。

[80] Black Sabbath，被誉为重金属乐队鼻祖的传奇乐队，他们的吉他手托尼·艾奥米后来与布莱恩·梅成为至交。

[81] 英文名为“Red Lion”。

[82] 英文名为“Highfield Parish Hall”。

[83] 原话是弗雷迪把“Thank you”故意说成了“Wank you, wank you very much”。

[84] 英文名为“The Move”。

[85] 英文名为“The Jackson Five”。

[86] 英文名为“East Anglia University”。

[87] 英文名为“Patto”。

[88] 英文名为“Kippington Lodge”。

[89] Tenerife，属于西班牙，靠近赤道，因为布莱恩研究的黄道光需要在赤道附近才可以观测到。

[90] 英文名为“Vanilla Fudge”。

[91] 英文名“Bee Gees”。

[92] 英文名为“Humpty Bong”。

[93] 英文名为“Love Affair”。

[94] 2018年，蒂姆·史塔菲与布莱恩·梅、罗杰·泰勒重聚，共同在录音室里为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重新混录了原声歌曲《过得不错》。

第四章 奇异的颤音

我加入皇后乐队的那段时间，没啥屁事好做。

——迈克·格罗斯，在皇后乐队担任了三个月的贝斯手

我以为他们没前途的。

——巴里·米切尔，在皇后乐队担任了六个月的贝斯手

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有漂亮的房子，美满的家庭，还有一辆好车.....但可能那样也不错。

——道格·博吉，在皇后乐队仅演出过两次的贝斯手

我刚加入皇后乐队时，那三个人天天打嘴仗，我只是围观。

——约翰·迪肯，自1971年2月起成为皇后乐队的贝斯手

1970年，电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映，但并非每个摇滚新人都喜欢这部电影。“我看了那部电影后感到震惊，意识到和我基本没什么相通之处，”布莱恩·梅承认说，“皇后不是那种嗑药嗑到昏迷，然后爬起来继续四处演出的乐队。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它的对立面。”在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看来，保萨拉、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三人一直都是理所当然在一起的音乐家组合。“我记得1968年，和他们三人一起走过伊林大道，我心里想：‘没错，这就是个乐队啊。’”克里斯·史密斯说。

一开始，微笑乐队的鼓手和吉他手对他们新找的主唱还持保留意见。“我记得当时想：‘他表演很棒，但唱歌还不好说。’”梅承认道。“弗雷迪有一种奇异的颤音，”罗杰·泰勒咯咯笑着说，“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不舒服。”就像在野山羊和残骸乐队里一样，弗雷迪的坚持不懈最终占了上风：“弗雷迪在那儿不停地说：‘我要唱这个，我要做那个。’”布莱恩说，“然后我们慢慢地就变成.....‘好吧’。”

蒂姆·史塔菲离开后，微笑乐队同时失去了贝斯手。他们招募了罗杰·泰勒的朋友迈克·格罗斯，他是PJ's俱乐部合伙人，以前微笑乐队和反响乐队都是这间特鲁罗音乐场所的常客。PJ's俱乐部面临倒闭，但格罗斯能弹贝斯，还拥有一辆大众货车和一个马歇尔功放。更妙的是，格罗斯曾经客串过一段时间反响乐队的吉他手，某次微笑乐队在PJ's的演出中，因为蒂姆和罗杰发生不快，他还临时顶替过贝斯手。

格罗斯搬到伦敦，在轮渡路上租了一间小屋。梅设法让他的帝国理

工教授们签了一张表，让乐队可以用一间讲堂排练。泰勒答应母亲，带微笑乐队去特鲁罗市政厅为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做表演。他们没告诉别人这已经是个不同于往日的“微笑”乐队了。6月27日，梅、泰勒、保萨拉和 Gros 在容纳八百人的大厅里，为两百来个观众磕磕巴巴地表演了一系列曲目，并获得50英镑酬劳。

“皇后”这个乐队名字的由来，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架子一样，有着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名字是从我这儿来的，”约翰·“公鸡”·泰勒坚称，“我以前经常叫弗雷迪‘老皇后’^[4]，而且我跟他说，如果他在残骸乐队之后又组了乐队，应该就叫它‘皇后’，然后他会说：‘噢，是吗？’”然而，迈克·Gros 记得是在轮渡路房子的花园里，大家坐下来开会，弗雷迪第一次提议这个名字。肯·泰斯蒂记得他是在一通从肯辛顿市场打来的电话中得知了乐队的新名字。“听到他和布莱恩、罗杰在一起，完全是顺理成章。早就该这样了。我跟他说真是好消息，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新名字：皇后。我说：‘弗雷迪，这名字起了可就完蛋了。’但他却说：‘不会，这名字多好，亲爱的，人们会喜欢的。’”

其他备选名字包括“自造船”（Build Your Own Boat）、“富小孩”（The Rich Kids）和“盛大舞蹈”（The Grand Dance，这个名字来自C. S. 刘易斯^[5]的科幻小说三部曲《来自寂静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但这些最后都落选了。“‘皇后’的概念是高贵而威严，”弗雷迪后来在《流行音乐周刊》采访时说，“我们要的是雍容华贵。我们要的是惊世骇俗。”

“这个名字是弗雷迪的主意，”1974年，罗杰·泰勒说，“这正是当时我们在肯辛顿市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那时候市场里的人们离经叛道，其中很多人是同性恋，也有很多人假装是同性恋，这个名字就很配当时的氛围。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名字，布莱恩也不喜欢，但是我们习惯了。我们想着等我们的音乐形象建立起来，会比名字更具有辨识度……”

那年春天，名字上的改变除了“皇后”，还有另一个。“弗雷迪写了这首歌《我的仙王》（My Fairy King），”布莱恩·梅说，“其中一句歌词是：‘噢，墨丘利神^[6]之母，你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4]就在那之后，他说：‘我要改姓莫库里了，因为这首歌里的母亲是我的妈妈。’我们说：‘你疯了吗？’”

虽然单边契据登记办公室^[7]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官方文件，但从现在

起，弗雷迪·保萨拉护照上的名字就变成了“弗雷德里克·莫库里”。从内向羞怯的移民男孩，到外向奔放的花蝴蝶，转变已经完成。“改变名字使他披上了一层假想的外壳，”梅说，“年轻的保萨拉还在里面，但对外界众人，他将成为这位神。”

然而过了没多久，迈克·格罗斯就厌倦了这种日子。梅、泰勒和莫库里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学生，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节衣缩食的环境中。二十二岁的格罗斯却喜欢挣钱，他觉得轮渡路上那些“空虚的日子”很是令人沮丧：弗雷迪是个习惯什么活也没有的艺术生；布莱恩和罗杰还有几个月的大学课程在读。但格罗斯习惯白天上班，晚上做演出。那年夏天，在巴恩斯区住处的花园里，他看着他的三位乐队成员嬉笑着谈论歌曲的想法，这些最后都会出现在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中。皇后乐队已经写了足够出一张专辑的音乐，还有一首新歌《父与子言》（Father To Son，它将开启《皇后II》[Queen II] 专辑）。格罗斯认为乐队有潜力，但他不想等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乐队，回到康沃尔，在一个叫“并非儿戏”^[6]的乐队里短暂地演了一阵子，奇妙的是，蒂姆·史塔菲当时是他的队友。之后他组建了一家运输公司，彻底退出音乐舞台。

迈克·格罗斯的接任者是通过一次在康沃尔的偶然碰面找到的。巴里·米切尔在伦敦西部的哈罗长大。1965年，他在一个叫“信念”^[7]的灵魂乐翻唱乐队做贝斯手，那时他们年轻的吉他手是阿伦·帕森斯。帕森斯后来曾任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专辑的录音师，他自己也组了乐队，叫阿伦·帕森斯项目^[8]。信念乐队在1967年改名为“地球”^[9]，制作过一张未发行的专辑，并在伦敦杰拉德街的棺材俱乐部^[10]长期驻场。

1970年8月时，米切尔已经在考虑全盘放弃音乐。他当时的乐队黑色^[11]（有一位酷似亨德里克斯的南非黑人成员）停滞不前，并且白天他还要在哈罗的索珀（Soper）百货公司工作。“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罗杰·克罗斯利，他是我同事，”米切尔说，“我们两个过去常在艺术学院晃悠，找漂亮姑娘搭讪。夏天的时候罗杰·克罗斯利去了康沃尔，遇到了罗杰·泰勒。他们聊上了，罗杰·泰勒说他在找贝斯手……于是我哥们就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了。”

米切尔打电话约好，坐地铁去肯辛顿，在帝国理工学院进行了面试。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乐队太走运了，有免费排演和放设备的地方。这两样是任何初创乐队都梦寐以求的。“我们合演了一些歌，”巴里记得，“有亨德里克斯的几首，有（威利·迪克森的）《善待我》（Do

Me Right），就这样，我入团了。”

三周后，皇后乐队在帝国理工有一场演出，观众是他们邀请来的朋友们。演出前几个小时，乐队在布莱恩的出租屋里集合。巴里发现他们在用公寓的单眼小煤气灶自制爆米花，并打算配上果汁分发给宾客。“那真是贴心又可爱，”他咧嘴笑道，“但是，人们会说这可不像搞摇滚的啊。”

皇后乐队这时候的歌单有几首老的摇滚歌，比如微笑乐队的《过得不错》，也有《冰冷坚硬的疯狂》（Stone Cold Crazy），这是弗雷迪在残骸乐队时期创作的一首歌，之后会被重制成皇后乐队的版本。他们的惊喜曲目包括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Big Spender）、克里夫·理查德的歌、影子乐队的《请勿挑逗我》（Please Don't Tease）（米切尔：“我记得我当时想：‘啥？’”）。前1984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加纳姆受邀来观看了帝国理工的这场表演，对他们的独创性印象很深，“中间那首克里夫·理查德的歌真是翻唱得酣畅淋漓”。加纳姆也被弗雷迪的个人表演所震撼：“他的声音和蒂姆·史塔菲其实没有特别不同。但蒂姆不算是优秀的主唱。因为他总是比较放不开，说着：‘哎，我没这么做。那我是应该这样，还是那样？’但弗雷迪就是勇往直前地展现自我。”那天晚上，约翰记得皇后乐队还试演了一首新歌《子女》（Son and Daughter）。他的判断，和许多看过那个时期皇后乐队表演的人们一致：“很有齐柏林飞艇乐队的感觉。”

观众中还有约翰·安东尼，他现在是卡里斯玛唱片公司（Charisma Records）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和制作人。“罗杰和我保持着联系，”他解释说，“每次都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安东尼与很多女性有染：“其中有人把阴虱病传给了我.....甚至都长到了眉毛上。但罗杰总是让我知晓他和微笑乐队在做些什么，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说他们找了一个新主唱，问我有没有兴趣。”

安东尼依稀记得之前在肯辛顿市场就看到过弗雷迪。“他既热情又夸张，但我不以为然。然而在舞台上，他的气场充满了整个空间，和以前的微笑乐队截然不同。他们基本上已经有了一种自己的声音，除了那个贝斯手不太行——他看起来更合适去重金属乐队。后来我对罗杰说：‘哎，看是看不出来，但是你们三缺一啊。’”

与此同时，皇后乐队的这位“重金属贝斯手”开始逐渐了解他的这些新乐队伙伴。“布莱恩是个友善到不真实的人，独一无二的吉他手，”巴

里·米切尔说，“罗杰比较毛头小伙子，虽然鼓声还算不错，但我觉得有点缺乏生气。弗雷迪非常甜，但很难深入了解，而且对他的牙齿特别敏感。”莫库里在帝国理工的演出上穿了一件贴身的黑色连体服（是之前的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的妻子温迪设计的）。他称之为“墨丘利神服”，因为脚踝和手腕部位都有小翅膀^[12]。罗杰·泰勒回忆道，“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哇，你小子，太有勇气了。’”

演出之前，巴里·米切尔吃惊地发现，他们的主唱在用烫发夹梳理头发，一只手的指甲上涂了黑色指甲油。“区别立刻显现。”他承认说。米切尔的扮相比较日常，牛仔裤、T恤衫和一头金色长发。“弗雷迪在那拿着他的夹子，我心里在想：‘我头发可不弄这个，我们赶紧上台吧。’”排练过程中，米切尔见证了乐队在细节上的十二分用心，而且他们喜欢花时间为这些细节争论不休：“分歧太多了。为了四小节音乐，他们就能浪费半个小时来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哈里斯充当了一个合适的调停者。去年夏天，经过帕特·麦康奈尔的介绍，哈里斯认识了梅和泰勒。此时彼得·爱德蒙兹已不再担任微笑乐队的司机和演出工作人员，哈里斯加进来，成为他们的演出经理，他也是电子设备能手、音响工程师和“乐队第五人”。“他人很好，开一辆长货车，而且真的很会照顾我们。”米切尔说，“排练的时候他总是在场，而且他很会在争论的时候插进来说：‘哎呀，说个屁啊！说这么多就争四个小节，醒醒吧！’”

尽管米切尔有种种担忧，至少皇后乐队已经运作起来了。帝国理工的演出后，他们接着又在伦敦瑞士屋一所美国私立学校进行了演出，在这个地方，罗杰向巴里津津乐道了自己的浪漫求爱故事：“罗杰喜欢上一个住在肯辛顿学生宿舍的女孩，他竟然翻了两三个阳台爬到人家房间去。”

1970年9月18日，诺丁山撒马尔罕酒店^[13]，吉米·亨德里克斯被发现死在他女朋友的房间中。在距离他逝世地点只有一箭之遥的帝国理工，皇后乐队放弃了自己的歌单，加入了亨德里克斯的《狐媚女郎》（Foxy Lady）、《巫毒娃娃》（Voodoo Child）、《紫色迷雾》等歌曲。克里斯·史密斯正在去帝国理工的地铁上，看到报纸标题写着吉米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都震惊了”，他记得，“我沿着走廊去讲堂找他们，一路听到他们在弹奏吉米的《自由之石》”。

为了悼念亨德里克斯，莫库里和泰勒的小铺子停业一天。虽然表达了敬意，但他们其实都快付不起租金了。弗雷迪的插图工作完全是零碎

的。“他找了一份工作，给一本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的书画插图，”理查德·汤普森记得，“于是我把我收集的《航空画报》（*Air Pictorial*）借给他。我记得他画了一些，但好像他后面就放弃了，因为太体力活了。”此外，皇后乐队赚到的那点钱只能仅仅维持开销。他们需要一份正常的工作。

艾伦·梅尔在肯辛顿市场也经营着一间时装店面，开在弗雷迪和罗杰的铺子的正对面。“他们俩都很可爱，但他们的摊位从来没什么起色，”他如今回忆道，“那条过道上的竞争一日比一日激烈。你进了一批带白色毛皮领的牛仔夹克，别人就开始做麂皮的夹克衫，但这两个人就卖那几条喇叭裤，没什么特别的。”

莫库里和泰勒的利润不断减少的时候，梅尔的店铺生意却越来越好。他开始自己找工作室制作皮靴，然后拿到市场上销售。不久后，他就雇用弗雷迪帮他一起照看摊位。午餐时间他们常同去肯辛顿广场的灰狗酒吧^[14]，三人关系不错。梅尔知道弗雷迪和罗杰有个乐队，但这两位不知道，其实梅尔曾在一个叫作“节奏跟踪者”^[15]的六十年代格拉斯哥乐队中弹贝斯。“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我的公寓里发现了节奏跟踪者乐队的周边，于是我开始被邀请去观看皇后乐队的每场演出。”

大卫·鲍伊的导师肯特·皮特是节奏跟踪者乐队的经理，这个乐队也翻唱了一些鲍伊早期的歌曲。有一天，鲍伊本人亲临市场，径直来了艾伦的摊位。梅尔提出要送鲍伊一双靴子（“《太空怪客》已经大红了，但他说他没挣到钱。音乐行业的典型行情啊！于是我说：‘没事，我送你。’”）。弗雷迪帮鲍伊试穿靴子。这可能是自莫库里在伊林学院帮鲍伊搭演出台子之后，两个人再度碰面。“就这样，助理店员弗雷迪·莫库里，交给穷明星大卫·鲍伊一双他买不起的靴子。”

10月，梅尔和“肯辛顿市场里的所有人”都出席了皇后乐队在肯辛顿房地产管理学院^[16]的周末演出。“并不是很好，”艾伦说，“弗雷迪身上带着某种紧张的压力，推挤着他的声音，整场都唱得很尖。他在舞台上的动作有点不协调，不太有节奏感。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热情地邀请市场里所有人去看，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说：‘哦，还行吧。’弗雷迪和罗杰说：‘就这一句？’”米切尔也承认说，他在皇后乐队的时候，莫库里的声音仍然需要更进一步：“不是很有深度。”

演出随后暂停，因为布莱恩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他又要去特内里费天文台观测了。回来后，皇后乐队在利物浦的关系将他们松懈的现状提

了一把。肯·泰斯蒂仍在圣海伦斯大学任外联部秘书，通过朋友、刚出道的演出推广人保罗·康罗伊（他后来成了维珍唱片公司董事总经理）预订乐队演出。泰斯蒂为皇后乐队拿到了两场演出：10月30日，在圣海伦斯学校做暖场乐队；第二天，在洞穴俱乐部^[17]演出。

离洞穴俱乐部开场还有几个小时，皇后乐队跑到一家当地电影院打发时间，看了一部小成本情色电影。据巴里·米切尔讲，情节动作和对白实在太拼了，他们看着看着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就被人赶了出来”。作为披头士的精神家园，洞穴俱乐部依然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那是个地下室，天花板很低，到处都是汗味，”米切尔说，“但它仍然是个标志性的地方。”肯·泰斯蒂的想法则有所不同：“洞穴的DJ比利·巴特勒不太待见皇后乐队。有乐队来演出似乎影响到他播放自己的唱片了。我那时就很讨厌洞穴俱乐部，现在也是。”演出的这段时间，皇后乐队住在圣海伦斯的市场酒店酒吧^[18]，是泰斯蒂家里开的。“很有面子，”肯说，“对一个北方小伙来说，把这些来自伦敦，穿着奇装异服的朋友带回家介绍给妈妈，而他们的举止又是那么得体，真是太棒了。”肯的妹妹，当时大概四五岁，仍然记得她坐在弗雷迪·莫库里的腿上，他教她玩井字游戏。两周后，哈特福郡的一家师范学校有演出预订需求，乐队决定赌一把，要求涨演出费。涨价的理由？因为他们在洞穴俱乐部演出过，和披头士站的是同一个舞台，好像身价应该更高一点。他们遭到了拒绝。

1970年的圣诞节匆匆而过。1971年1月，皇后乐队在大帐篷俱乐部为艺术摇滚乐队“观众乐队”开场，巴里·米切尔在满是涂鸦的化妆间墙上找了个地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近乎分水岭的时刻，他已下定决心要离开。梅、泰勒和莫库里有共同的经历和社交圈，而米切尔住在伦敦北部的金斯伯里，离肯辛顿很远。许多个演出结束后的早晨，他不得不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去上班，白天他是一个公园管理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的音乐不是我想做的，”他说，“我想要更偏布鲁斯、灵魂乐的东西，有铜管乐器的那种。”目前为止，皇后乐队已经演奏过几首会收在首张专辑里的歌曲，包括《活出精彩》（Keep Yourself Alive）、《骗子》（Liar）和《大鼠王》（Great King Rat）。“但听起来都有点不着边际，”巴里承认说，“我不喜欢那些玩意儿，他们仍然很像齐柏林飞艇和‘是’乐队的结合体。我觉得他们还没找到自己的魔法。”听上去像是奇怪地重复着先前蒂姆·史塔菲对微笑乐队的疑惑。

1月9日，皇后乐队在尤厄尔技术学院^[19]为凯文·艾耶斯和创世记乐队

作开场，这也是米切尔最后一次随队演出。跟迈克·格罗斯情况类似，是他自己想走，不是因为队友要他走。演出后在更衣室，创世记乐队的主唱彼得·盖布瑞尔接近罗杰·泰勒，给了他一个提议。创世记乐队那时处于解雇鼓手的边缘，且还未发现菲尔·柯林斯，所以他们急需一个接任者。罗杰动心了吗？“我跟罗杰说，他应该接受他们的提议，”巴里笑了，“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他完全忠于皇后乐队。”当时，约翰·安东尼刚刚打造了创世记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入侵》（*Trespass*），但现在安东尼坚决否认曾企图引诱泰勒脱离皇后乐队。

1971年春季，巴里·米切尔出现在“击垮的管家”^[20]三人组合中，不久后这个乐队更名为“老虎”^[21]，但他们的街头形象和粗野的硬摇滚出现得太早了，要差不多四年后才刮起朋克之风。后来，他又拒绝了另一个工作，那个乐队就是后来的闪耀乐队^[22]。一年后，巴里去看了皇后乐队为琥珀摩特乐队^[23]做的暖场表演，他并没有感到不满或遗憾。《波西米亚狂想曲》风靡之时，他正经营着一家电器商店。歌声响起时，他告诉手下那些感到难以置信的员工，他曾经在这个乐队待过。米切尔记得，在去利物浦的洞穴俱乐部演出的路途中，布莱恩摆弄着一个新的照相机，对着他们这些挤在货车后车厢的朋友们不停试拍。“但是一张我在舞台上的照片也没有。”他耸耸肩说。缺乏证明性的照片，作为那段时光的纪念，依然令他有点惆怅。

米切尔要离开皇后乐队时，是弗雷迪的女朋友来努力劝说他改变主意。她就是玛丽·奥斯汀，已经是乐队十分熟悉的存在，之后还将成为皇后乐队的主唱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据弗雷迪说，两人相遇于1970年，当时十九岁的玛丽在位于肯辛顿大街的时装精品店碧芭（Biba）担任接待员。碧芭的灵感源泉来自服装设计师芭芭拉·胡兰尼姬，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那里一直是伦敦时装界的核心地带。“碧芭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女店员都太漂亮了，”布莱恩·梅承认，“所以我们常常进去欣赏美景。”

到碧芭工作之前，玛丽曾做过实习秘书，她是一对聋哑父母带大的，从小就需要学习手语。其实是布莱恩·梅先约的她，那是某次帝国理工的演唱会后。他们出去约会过几次，但关系没有再升级。不久，弗雷迪开始向布莱恩打听关于她的事。“他那时会到碧芭来，通常和罗杰一起，路过我这里时微笑着打招呼，”玛丽记得，“这样持续了五六个月后，他终于约我出去了。五个月后，我们住到了一起。”

起初，玛丽误以为这位“外表狂野”的歌手是对她的朋友有好感。那

年夏天，弗雷迪带她去看琥珀摩特乐队在大帐篷俱乐部的演出，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弗雷迪非常有信心，而我从来就不自信。”她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和罗斯玛丽·皮尔森一样，玛丽也谈到了和弗雷迪在一起时的安全感：“我们知道可以互相信任，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故意伤害对方。”

“弗雷迪和其他女孩交往过，”梅解释说，“但是，现在看来，他并没有很动心。但他跟玛丽就很般配，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很害羞的人。”

弗雷迪从他和罗杰合租的富勒姆公寓里搬了出来（泰勒：“我们过去常常等着他妈妈每周一次来给我们改善伙食”），他和玛丽，带着他们的两只猫“汤姆”和“杰瑞”，搬到了肯辛顿维多利亚路2号的一间很小的三楼公寓里。弗雷迪搬去的小型唱片收藏里有谁人乐队的《汤米》、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齐柏林飞艇I》、披头士乐队的《白色专辑》和漂亮东西乐队^[24]的《S. F. 悲伤》（*S. F. Sorrow*）（玛丽是漂亮东西乐队吉他手迪克·泰勒当时的妻子梅利莎的朋友），以及莱莎·明奈利^[25]的《歌厅》（*Cabaret*）电影原声。约翰·安东尼说：“《歌厅》是弗雷迪最喜欢的电影。他反复地看。我一直觉得他是学莱莎·明奈利涂的指甲油。”这间公寓离肯辛顿市场很近，每周租金10英镑，他们和另一对情侣共用浴室和厨房。

肯·泰斯蒂那时回到了伦敦，他帮助这两人搬了家。“当时我开迷你库柏（Mini Cooper），”泰斯蒂说，“所以我往返了几次，帮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公寓里。几天后，我们被邀请去吃晚饭。玛丽和弗雷迪穷得响叮当，但是他们居然舍得花钱买那些漂亮的盘子！因为没有厨房，他们只做了沙拉。”这真是个值得记住的场景：“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们那儿就没吃过这么多沙拉。”

对于肯和其他人来说，玛丽出现在弗雷迪的生活中，打消了任何关于他性取向的疑问：“那时候他们是百分百的情侣。”巴里·米切尔也一直认为弗雷迪的骚气和阴柔只是一种伪装，“是一种表演，就像给乐队起名‘皇后’一样”。不过，不管处境多么窘迫，弗雷迪的穷讲究和造场景的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一天早晨，迈克·伯辛探望了这对情侣的宝贝公寓，他从两人的床就看出了弗雷迪的少爷做派：“我对那张床的印象是，第一，超级大；第二，蓬乱庞杂地装饰着各种华丽的饰品。正常来说不该是这样的，但这就是有了弗雷迪之后的效果。”

巴里·米切尔这一走，皇后乐队发现他们竟然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

间里，需要第三次寻找贝斯手。他们找到的这位贝斯手将成为乐队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注脚。在乐队的半官方传记书《皇后乐队：起源》

（*Queen: As It Began*）中，巴里·米切尔继任者的名字仅被简单地记录为“道格”。他仅仅和乐队演出了两次，就因为舞台上的表现被解雇了。“他在台上蹦跶的样子太不协调了。”布莱恩·梅埋怨说。

这个一直以来被称作“道格·未知”或是被错记为“道格·艾武德”的神秘贝斯手，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实习电话技术员，名叫道格拉斯·博吉。“我那时在连续不停地面试，”道格拉斯现在说，“我在《流行音乐周刊》看到一则广告，通了电话，把我的电视播音员贝斯装在帆布背包里，坐716绿线公交车去了，我还记得，从韦伊桥站到艾尔伯特纪念像站。”

这次面试自然又是在帝国理工进行的，博吉记得：“弗雷迪漫步进来，身边有一个相当好看的女孩子，应该就是玛丽，他穿着那件标志的灰色兔皮夹克。”在约翰·哈里斯的帮助下，道格接下来花了几天学习皇后乐队的歌，这些大部分都会收在即将制作的首张专辑中。“我惊讶于罗杰声音里的力量和活力，”他回忆说，“他真是太牛了。作为杰夫·贝克组合的歌迷，我可以说，他比洛·史都华^[26]还厉害。”几个小时后，道格拉斯就在艾伦·梅尔的靴子店里和弗雷迪一起混了，“就这样持续了几周，我觉得一切都进行得挺顺利的”。遗憾的是，并没有。

2月19日，皇后乐队在漂亮东西乐队之后亮相伦敦的霍恩西市政厅^[27]。隔天，皇后乐队为“是”乐队在金斯敦理工学院^[28]开场。“我们的首演配了一个W-Bin功放，皇后乐队跟我说是从铁蝴蝶乐队^[29]那儿收来的，”道格拉斯记得，“我还以为我表现得不错。这些人比我年长，我年轻气盛，跳来跳去……不幸的是，没人告诉我，弗雷迪想要的其实是一个站在后方静静弹琴的贝斯手。”

道格拉斯记得，演出后，为了避免让他难堪，弗雷迪在车子后面演了一出所谓“我不想干了——我们解散算了”的谈话，“弗雷迪一直在说什么‘这场演出太可怕了，全世界都看我不顺眼，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干了……’之类的话，我猜他可能看我是个新人，年龄又小，不想直接对我说狠话，同时又让其他人明白他才是舞台中心人物，需要抚慰和开解”。这样的障眼法加上没发生正面冲突，道格拉斯·博吉确实在这场演出后就退出了。

1973年，道格拉斯·博吉开始做音响工程师。两年后，他与林戈·斯

塔尔的林欧唱片公司（Ring'o Records）签了一次性的合同，出了一首叫《道格·博吉上校》的小单曲（“哈里·尼尔森喜欢这首呢”）。后来，他在爱丁堡当工程师时，A&M公司签下了他的新乐队RAF（“意思是致富出名，Rich And Famous”，他笑着说，“我们的声音很像皇后/外国人乐队^[30]的赝品。”）。RAF制作了两张专辑，“太成功了导致再也没人要我们出第三张”。1980年RAF在伦敦的空气录音室（Air Studios）制作第一张专辑时，博吉曾撞见了布莱恩·梅。

“我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和皇后乐队的往事，”道格拉斯现在说，“被抛弃是很难堪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心酸，而且我觉得少数几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可能也认为我在胡说八道编故事。”这当然不是故事。后来，成功的视频制作以及“丰富的吉他收藏”成了“道格·未知”的事业。

有句话叫作“每个伟大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有趣的是，这句话也适用于皇后乐队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在圣母升天师范学院的女性朋友那些奇妙的关系，皇后乐队的历史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1969年，在那里上学的布莱恩·梅的女朋友曾用甜言蜜语说服了录音工程师特里·伊登，让他去看了微笑乐队，并帮助他们录制免费的样带；同一年，麦康奈尔姐妹在微笑乐队和野山羊之间牵线搭桥，并带给弗雷迪·保萨拉第一次做歌手的机会。此时距离皇后乐队和道格拉斯·博吉的继任者上台做现场演出还有五个月时间，又一次，圣母升天学院那些“信仰天主教的好女孩们”帮助乐队找到了他们要的人。

1971年2月下旬，布莱恩·梅、罗杰·泰勒和约翰·哈里斯在学院里参加了一场迪斯科舞会。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被介绍给约翰·迪肯，这位十九岁的学生就读于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31]电子工程系。迪肯曾在家乡莱斯特郡奥德比的一个男孩乐队中弹过贝斯，但他搬来伦敦后就退出了。因为内心依然受到音乐梦想的驱使，他开始找各种面试，但一次都没成功。去年10月，那场在房地产管理学院的演出，为数不多的观众中就有约翰·迪肯，而那时弗雷迪还处于让艾伦·梅尔脸部抽搐的演唱水平。（迪肯后来说：“他们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1970年11月，他和室友兼吉他新手彼得·斯托达特，加上几个志趣相投的学生，组了一个翻唱乐队，在切尔西学院演出。宣传单上需要印乐队的名字，他们就干脆写了“迪肯”乐队。这可能是这位谦逊的贝斯手唯一一次把自己名字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迪肯乐队只演出过一次。而

皇后乐队却终于找到了他们缺失的最后一环。

约翰·理查德·迪肯的故事始于1951年8月19日，他出生于莱斯特郡的圣弗兰西斯私立医院^[32]，父母名叫亚瑟和莉莉安。他的父亲在诺维奇联盟建筑协会^[33]工作，约翰十岁那年，父亲去世。迪肯九岁之前都生活在埃文顿，之后随父母及妹妹朱莉搬到了附近的奥德比，这是一个郊区城镇，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缓慢发展。一家人定居在希科克路54号的一座独栋房，约翰进入了当地的朗莫尔初中^[34]学习，后来考入加尔崔高中^[35]。

迪肯喜欢电子设备，他花了许多时间鼓捣家里的自制收音机，并用卷轴磁带录音机录下收音机里的歌曲。奈杰尔·布伦是约翰在朗莫尔初中的同学。十三岁起，两人开始演奏音乐。听了披头士乐队的《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后，约翰通过送报纸攒钱买了一把便宜的木吉他。奈吉尔会打鼓，于是两人开始合作制造噪音。

促成他们组乐队的是理查德·杨。1965年夏天，他在当地的高地公园遇见了迪肯和奈杰尔·布伦。杨年纪大些，他已经十六岁，曾先后就读于木岸私立学校^[36]和斯卡伯勒学院^[37]，刚开始打理父亲的电器批发业务。1996年接受采访时，布伦形容理查德是“骑高档自行车的男孩”。

“在斯卡伯勒学院的时候我就成立过一个组合，”杨说，“我已经在我爸的公司打工，所以可以为组乐队提供资金。其他成员都还在上学。”杨凑出了一支乐队：自己做主唱和吉他手，布伦是鼓手，迪肯做节奏吉他手，另一个打扮很潮、叫克莱夫·卡斯尔待的本地小伙子弹贝斯。

在布伦家的车库里排练过后，新乐队于9月在卡斯尔待父母的聚会上首次亮相。杨说：“我已经不太记得克莱夫家的聚会了，但那次让我明白，很遗憾，最弱的其实就是克莱夫。”乐队起名为“反对派”^[38]，于10月在加尔崔高中演出，随后12月在恩德比合作社大厅^[39]进行了一场更大的演出。这时候，理查德·杨决定改弹键盘。“我的声音还可以，但我已经意识到一个好主唱的重要性，”他解释说，“我同时还弹吉他，但我觉得我其实不擅长。”杨开始上钢琴课，位置自然也移到了舞台一侧。

通过和奥德比威格斯顿推广商合作，反对派乐队可以在附近的教堂大厅和青年俱乐部接到2至4英镑/晚的预订。但问题没有解决：克莱夫·卡斯尔待的贝斯演奏依然没有长进。“他常常迟到，我觉得他更想有个

在乐队里的名头，而不是真的想好好弹贝斯。”（“我被泡妞和骑车分心了。”多年后，卡斯尔待承认说。）

虽然克莱夫介绍理查德和女朋友帕特丽夏认识有功（“克莱夫、他女友、我和帕特一起去莱斯特郡体育馆看了披头士的‘救命’演唱会”），但这位贝斯手还是被劝退了。迪肯从节奏吉他转为贝斯手，理查德·杨出钱，带他到莱斯特国王大街的考克斯乐器商店，买了一把价值60英镑的EKO贝斯，“莱斯特郡周围有很多乐队。能够脱颖而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出好音乐，而好的音乐就需要有好的设备”。

1966年7月，吉他手戴夫·威廉姆斯加入，阵容再次调整。威廉姆斯是迪肯在加尔崔的同学，曾在一个叫作“外部极限”的乐队里演奏过。这个乐队的成员较为年长，街头青年打扮，比较类似于布莱恩·梅在1984乐队时所崇拜的前辈他人乐队，外部极限乐队也是他们的效仿对象。

那年夏天，迪肯和布伦转学去了波尚文法学校^[40]，他们继续和反对派乐队一起表演，尽管约翰的母亲坚持不准他去酒吧里演出。理查德·杨在1966年9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小迪肯不能去，所以只好让格伦之声乐队^[41]（当地的另一支乐队）的布莱恩代班了。”昵称为“随和迪肯”的他清心寡欲、害羞内向、不慌不忙，已经显露出在皇后乐队里那种著名的性格特质。

乐队现在更名为“新反对派”，主唱由皮特·“佩德罗”·巴塞洛缪担任，他们常常出现在莱斯特赌场^[42]，翻唱塔姆拉摩城唱片公司的歌曲。年底，“佩德罗”离开，他们又新找了一位吉他手罗恩·切斯特，他的特点是总戴着一顶福尔摩斯式的猎鹿帽。切斯特加入后，《莱斯特水星报》（*Leicester Mercury*）曾为反对派乐队（“新”字又被拿掉了）拍过照片。“我们在‘中部地区节拍锦标赛’上进了决赛。”理查德·杨说。决赛本来要在莱斯特的德·蒙特福德大厅^[43]举办，但是由于发起人卷款跑路而泡汤，“那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音乐行业狗屎的一面”。《莱斯特水星报》的照片上，乐队的形象风格介于六十年代盛行的节奏摇滚和渐渐渗入的迷幻摇滚之间。威廉姆斯的大翻领绸子衬衫是一种风格，外面穿的粗花呢夹克又是另一种。

现在性格外向的威廉姆斯成了乐队的主唱，反对派乐队一度招到了伴舞女团，叫作夏尔曼和珍妮。（杨说：“伴舞女团主要是为了助兴……以免音乐缺乏新鲜感。”）他们的歌单逐渐偏向重摇滚，乐队形象也开始嬉皮化。1968年3月，反对派乐队改名为艺术乐队。波尚文法

学校的仲夏舞会上，戴夫·威廉姆斯搞了个大事件，在唱《亚瑟·布朗的疯狂世界》（*The Crazy World of Arthur Brown*）专辑的金曲《火焰》（*Fire*）时，引爆了一颗自制的烟幕弹。那年年底，理查德·杨的年度喜好名单是银色乐队^[44]、深紫乐队、肖邦和巴赫。

第二年，艺术乐队在韦灵伯勒的录音室自费做了一张碟。除了翻唱一些灵魂乐歌曲，他们还搞定了自己谱曲的一首纯器乐曲子《3号交通线》（*Transit 3*）。跟其他人一样，这是约翰·迪肯第一次进录音室。那张胶碟只有两个拷贝保存了下来，但不在理查德·杨手里（“我并没有拿到艺术乐队的碟”）。据传其他人在排练时把理查德的那张拷贝当成烟灰缸了。

1969年8月是迪肯最后一次和艺术乐队表演。一个月后，他搬到了伦敦，在女王门附近租了公寓。他把贝斯留在了奥德比。艺术乐队解散，但布伦、威廉姆斯和杨依然活跃在原创或者翻唱乐队中。反对派乐队的创始者和出资者杨，现在在奥德比经营着一家钢琴店，距离迪肯在希科特路的老家只有300码远。“想想还是有些神奇，我的第一支乐队里有个人成了大明星。”他承认道。

布伦偶尔会去伦敦看望迪肯，当约翰跟他表达了想再次加入乐队的意愿时，布伦很惊讶，他以为迪肯已经放弃音乐，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大学课程了。他以前的乐队成员都没有想到，迪肯竟然真有从事音乐行业的志向。1996年接受采访时，布伦回忆说，迪肯告诉他，他已经回应过一些《流行音乐周刊》上的招人广告，但“他发现那些人是徒有虚名，又打了退堂鼓”。理查德·杨坦言，“当年我们在那间阴冷透风的车库里练习时，谁又能想到，那个腼腆、低调，还在攒零花钱慢慢把贝斯钱还给我的男孩子，最后竟会闻名天下”。

圣母升天学院初见后的几天，迪肯带着贝斯和一个练习用的小扩音器来到了帝国理工学院。他的面试包含一段很长的布鲁斯音乐混弹，以及三首皇后乐队的歌曲，包括《子女》。布莱恩·梅回忆说：“在经历了许多闹腾喧天的贝斯手后，这个安静内向的人出现了，当他把贝斯声线加到我们音乐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找对人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酸奶海乐队前吉他手克里斯·切斯尼。那时候弗雷迪曾有过扩大皇后乐队阵容的想法，他想增加一个吉他手。“我曾在帝国理工看过他们和那个金头发的（巴里·米切尔）一起演出，”切斯尼说，“演出后弗雷迪来找我，说：‘我想让你加入乐队。’”之前皇后乐队

曾做过叉骨骨灰乐队^[45]的暖场，那支被定义为前卫布鲁斯的摇滚乐队以拥有两位主音吉他手而闻名。也许灵感来自于此，又或许更可能的是，弗雷迪感觉布莱恩的相对静态不及以前克里斯的视觉映衬效果。谈到个人演奏方面，“布莱恩的吉他技术比我强”，切斯尼说，“但我想我在表演感觉上更好一点”。因为克里斯自己没有吉他，他不得不借用“绝世红”试音。“简直是噩梦。”他承认说。由于用不习惯这把自制吉他的超大琴颈和特殊指板，切斯尼想要正常演奏十分困难。“弗雷迪能考虑带我玩还是挺好的。”他笑了。

不久之后，切斯尼就离开伦敦去念大学了。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英国，正好避开了朋克风潮。随后他进入视频和电视广告制作行业，同时也涉足翻唱乐队、临时演出，并为佩西·斯莱吉和本·E. 金等歌手做过音乐伴奏，一直和音乐界有所联系。在与皇后乐队那次不甚成功的试音之后，直到1987年他才会再次与弗雷迪相遇。

1971年7月2日，“随和迪肯”在萨里郡的一所大学完成了加入皇后乐队后的首次演出。他没有任何“不和谐的行为”令乐队感到尴尬，而且作为一个学生，也不会因白天需要工作受到束缚。他的贝斯演奏非常出色（克里斯·切斯尼回忆说，迪肯面试那次一个节拍都没有弹错），在电子设备方面的专长更是额外的好处。不过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罗杰·泰勒的观点是，“我们三人太熟悉了，各个都锋芒毕露，我们觉得他特别安静沉稳，比较适合融入而且不会引出太多事端。”迪肯后来也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争起来的时候，我吼的次数远少于其他几个人。”

约翰·安东尼被邀请来观看皇后乐队的新面孔。“我去看了他们和约翰一起排练。老实说，我觉得他有点不伦不类，”他说，“他总是让我想起七十年代电视喜剧《求求你先生！》（*Please Sir!*）里的一个角色。剧里有个校园恶霸见谁都欺负，他身边跟着一个怂恿滋事的帮凶，总是叫着‘来啊！来啊！’约翰·迪肯就长那样。”当时，安东尼正准备与三叉戟录音室的工程师罗宾·杰弗里·凯博、罗伊·托马斯·贝克成立自己的公司——海王星制作公司（Neptune Productions）：“我告诉皇后乐队，我接下来九个月已经预约了给其他乐队当制作，但我真的想和他们一起合作点什么。”

与此同时，约翰·迪肯跟着去了康沃尔，继续他的新人历练。乐队在德文郡租了一间小屋，在郡里演了十一场。有时候，演出海报上写的是“康沃尔的传奇鼓手罗杰·泰勒……及皇后乐队”。他们穿着华丽的舞台服装，弗雷迪做着夸张的姿态，四个人列队进入卡尔德罗斯皇家海军

航空队集满士兵的大厅。在某间酒吧的演出，因扩音器音量问题发生了争吵，乐队被愤怒的当地人追在屁股后面赶出了城。当然演出总是多多益善。罗杰的老朋友里克·伊万斯在特鲁罗附近的特里戈乡村俱乐部^[46]举办户外活动，皇后乐队为雄风乐队^[47]和亚瑟·布朗暖场。

回到伦敦后，“康沃尔的传奇鼓手”勉为其难地回去继续念书。因为泰勒的一年休息期已经结束，他报入了北伦敦理工学院的生物系。由于要坚定地保证读书不耽误皇后乐队的事业，罗杰只好放弃打理市场摊位的兼职。泰勒不在的时候，弗雷迪就把铺子关了，继续为艾伦·梅尔打工。两家店距离很近，所以主唱可以继续霸占市场的公用电话亭，当作他的私人办公室。“你随时拨那个电话过去找弗雷迪，他都会接起来。”肯·泰斯蒂说。

尽管皇后乐队在现场演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依然没有机会录制唱片，这点甚至比不上曾经的微笑乐队。两年前，派录音室的设备维护工程师特里·伊登曾在凌晨时段替微笑乐队录了一盘样带。这年秋天，伊登接到了布莱恩·梅的电话。这是继微笑乐队之后他们第一次通话，这表明，梅为了让皇后乐队能有哪怕一点点突破用尽了办法。“布莱恩跟我说，他现在有一支新乐队，蒂姆走了，但他们找了个特别好的新主唱，问我能不能帮忙？”伊登说，“时机简直不能更巧了。”

金士威的德莱利亚录音室刚好关闭，搬迁到了伦敦北部温布利的一座新楼，随之搬过去的还有包括伊登在内的录音室团队。这个录音室存在问题。录音工程师路易斯·奥斯汀直言不讳地说：“德莱利亚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差到可怕。假如一个乐队在1号录音棚录音，你在2号和3号录音室都听得到，反之亦然。”

为了完善隔音设施，走廊里又加装了一层夹层，里面塞了甲醛碎片。（伊登说：“就是用来给尸体防腐的那种材料。”）现在录音室的人需要找一支摇滚乐队来现场测试，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记得当时想，‘找谁呢？’”特里·伊登说，“在派录音室的时候，我和奇想乐队、小萨米·戴维斯等等都合作过。但我心想：‘这些我一个都请不到。’而布莱恩正好在这时候打电话来。我一想：‘就这么办。’”路易斯·奥斯汀记得，皇后乐队来的时候“带着可以制作一整张专辑的全部歌曲。这让我们印象深刻”。谈好的条件是乐队充当小白鼠试音，然后录音室给他们制作专业的样带作为报酬。“他们说请我们去制造些声音，他们好做声学测试，同时帮我们做几个专业的样带。”布莱恩·梅回忆道。

“回想起来，我们把他们折腾得够呛，”伊登说，“一周里面我们让他们把设备在录音室之间搬来搬去。然后录音时，又发现新的磁带机出了问题，所以每隔两分钟我们就要打断他们，然后再接着录。”

皇后乐队在2号录音室的迷你圆形剧场进行了现场演出排练，工程师们为他们租了100瓦的马歇尔功放组，弗雷迪在其间大摆造型。“弗雷迪没办法在唱歌的时候不表演，”伊登说，“即使是在录唱片的时候。我想路易斯很烦他总是脱开麦克风。”路易斯·奥斯汀经常跟那些心急火燎的初创乐队合作，并且刚刚参与制作了瘦丽兹乐队^[48]的首张专辑。“但皇后乐队异常自信和坚定。我确实觉得他们能够成功，但不是通过我，当然更不会是在德莱利亚这里。”

皇后乐队在这次录音中收获了可以录制十六条音轨的2英寸母带，录了五首原创歌曲：《活出精彩》、《骗子》、《耶稣》（Jesus）、《大鼠王》和《夜色降临》（The Night Comes Down）。它像一枚时光胶囊，记录着1971年底皇后乐队的声音。他们后来的标志性声音大部分都在其中显现出来了：无论是《骗子》中的密集轰炸，还是《活出精彩》中的急速重金属演绎，还有在声势浩大的《耶稣》中，莫库里展现出的创作恢宏叙事型歌曲的能力；《耶稣》这首歌像是把塞西尔·B. 戴米尔^[49]的圣经史诗浓缩成了三分半的歌曲，又像是把弗雷迪A-Level考试的那幅耶稣受难画作转化成了音乐。

录音结束时，特里·伊登再次经历了相似的桥段。“他们又一次说：‘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吗？’而我们都说：‘对不起了，小伙子们，我们这儿还忙着重建工作室呢。’但是，大多数新乐队还只是用格伦迪希录音机自己制作粗糙样带，他们则已经带走了专业的样带。”

“我们认为机会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的，”布莱恩·梅说，“你得等待时机出击，成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说：“机会来临时，我们要把所有事情都排练好，知道舞台表演的每个细节，整件事情都应该是专业的。”

约翰·安东尼带来了一丝希望。在他的推荐下，海王星公司合伙人罗宾·杰弗里·凯博和罗伊·托马斯·贝克过来德莱利亚录音室，观看了皇后乐队的录音过程。“我一听到《活出精彩》，”贝克回忆说，“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首金曲。”贝克带走了一盘样带。

这个时候，乐队还得靠其他方式赚钱养活自己。莫库里还依赖着玛

丽·奥斯汀的收入，以及他在市场摊位上赚到的每一分钱；泰勒和迪肯靠他们的助学金，而布莱恩·梅的论文没做完，他的助学金却已经领完了。很快地，吉他手采取了激进的做法，他在南伦敦的斯托克韦尔庄园^[50]中学找了一份正常工作，当数学和科学课老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回忆说，“只有学生对你所教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们才会来好好上课。我的优势是比较年轻，能够用他们的语言来教他们。”不过，有一次他让学生用剪刀在纸上剪形状，结果出了大事。“才半个小时他们就拿剪刀对打起来——血和纸片飞得到处都是。”

不管怎样，现在皇后乐队有专业的样带可以拿去展示给唱片公司了，很有经营头脑的肯·泰斯蒂又回来帮忙。泰斯蒂正在设法进入音乐行业，他现在住在伦敦，和演出推广人保罗·康罗伊、林赛·布朗合租一间公寓，同时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兼职。皇后乐队为手持样带感到兴奋的同时，还有一个难处：他们都没有能播放样带的机器。“那时候盒式磁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泰斯蒂说，“所以每次他们想听自己的样带，还得找一个有播放机的人。亲爱的玛丽·奥斯汀有个朋友住伦敦北面，他有卷轴磁带机。后来我们又听说有人在国王大道上找房子，我想那人好像是创世记乐队的键盘手（托尼·班克斯），他也有一个卷轴磁带机，他们让我们去那里听。但我渐渐有点着急，因为这帮人光在那听磁带，完全没有尝试去接触唱片公司。”

肯第一个就去找了他的室友康罗伊和布朗：“他们合租一间，尽管经常嗑药嗑得脑子不清，但还是很专业的。他们在房间里进行了讨论，然后出来说：‘是这样，我们不觉得市面上还需要第二个齐柏林飞艇乐队。’这句话就像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

在特鲁罗，罗杰·泰勒也会受到类似的打击。“我和我老婆的公寓里有一个卷轴磁带机，”瑞克·伊万斯记得，“罗杰来放了皇后乐队的样带，我说，‘很不错的乐队啊，罗杰，但是我对你们主唱不太有信心。’简直就像在说披头士不行。”

沮丧的肯开始盲打电话去唱片公司尝试：Polydor，MCA，CBS，A&M，小岛唱片……“神奇的是，我竟然约到了百代和迪卡（Decca）唱片公司。弗雷迪和布莱恩跟我一起去的。他们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听后没有被打动，这倒有趣，因为后来百代不知道在皇后乐队身上花了多少钱。”

唯一有意向的公司是B&C唱片，这家是卡里斯玛唱片公司的分支机

构，成立刚两年，已经签了一系列前卫摇滚乐队，包括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51]，奈斯乐队^[52]和创世记乐队。卡里斯玛唱片的创始人托尼·斯特拉顿-史密斯，大部分人都叫他“斯特拉”，是一个声色犬马的享乐主义者，喜欢音乐、赛马和酒精。卡里斯玛公司签了邦佐狗乐队，不久后又接手了《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电影原声。1971年的皇后乐队张扬怪异、天马行空，正对了公司的胃口。

肯·泰斯蒂记得，“卡里斯玛唱片开出价码，好像是25000英镑。乐队回去考虑，之后答复说.....他们决定拒绝。”保罗·康罗伊帮忙约到同斯特拉顿-史密斯的这次会面，他听了很震惊。“保罗觉得他们是在吹毛求疵，”肯说道，“但皇后乐队的看法是，如果他们跟卡里斯玛唱片签约，那他们永远会成为创世记或者其他几支乐队的二流陪衬，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想法。我很理解，如果他们觉得不适合，那就不要签。而且我觉得我们既然能钓到这家中型公司，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上钩。”

“刚起步的时候，自大是件好事，”很多年后，莫库里说，“这等于对你自己说，要做就做第一，绝不做第二。”

与此同时，罗杰·泰勒也在打电话给约翰·安东尼，告诉他关于卡里斯玛唱片的这件事。“卡里斯玛唱片想要他们一点也不奇怪，”他回忆道，“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乐队跟我说卡里斯玛唱片提供了他们去比利时巡演，还有一辆新的货车。我说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我就直接去找了三叉戟录音室的诺尔曼·谢菲尔德，跟他们说必须签下这个乐队，要不我就把他们给别人了。”

三叉戟录音室位于圣安妮宫，在沃德街上的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它位于苏豪区音乐文化的中心地带，步行可达大帐篷俱乐部、大船酒吧^[53]和狩猎俱乐部^[54]。诺尔曼·谢菲尔德和巴里·谢菲尔德兄弟在1967年成立了这间录音室。三叉戟的强项是其先进的操控台，还有那台著名的贝希斯坦钢琴，披头士就是用这台钢琴录制了《嘿，裘德》（*Hey Jude*）（肯·泰斯蒂：“哈利·尼尔森可以专程飞到英国来，就为了能用这台钢琴。”）。三叉戟的客户包括艾尔顿·约翰、乔治·哈里森、滚石乐队和自由乐队。1970年，大卫·鲍伊在这里制作了《佳作》（*Hunky Dory*）专辑，到了1972年中期，他又在这里对《Z字星尘和火星蜘蛛》（*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做最后的润色。“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录音室，”约翰·安东尼坚称，“所以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订满的状态。”

谢菲尔德兄弟还创办了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通过签下乐队，提供优越的录音室条件，然后由他们安排乐队和著名的唱片厂牌谈发行分销协议。海王星制作公司充当了皇后乐队和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的中间人。“我见识了克里斯·莱特和特里·埃利斯是如何运作蝶蛹唱片的，”安东尼解释说，“我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一家制作公司，制作的艺人销售的唱片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就可以变成一个厂牌。这就是我想要海王星或者三叉戟做成的事。任意一家都行。关键是制作的音乐的质量。罗伊·贝克和罗宾·凯博都去德莱利亚看过皇后乐队，他们跟我一样信服。”

如果皇后乐队期望1972年能比1971年顺利些，那他们的开年第一次演出就让希望落空了。1月份的时候，他们到贝德福德学院^[55]演出，是约翰·迪肯推荐的，结果只有六个人买票来听。3月10日，保罗·康罗伊救了他们一把，给他们在国王学院医学系找了一场暖场演出。两周后，皇后乐队在伦敦南部的森林山为医院舞会做演出。

“我很确定那是一所护士专科学校。”安东尼说。据他说，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向托尼·斯特拉顿-史密斯发出了逐客令。“诺尔曼·谢菲尔德听过皇后乐队的录音带，他要哥哥巴里去看他们。我对巴里说：‘开大车去，都穿黑西服，再抹上百利发乳。’我们都是大块头，每人都一米八几，还带了一个保安。然后我们隆重出场，搞得像克雷双胞胎^[56]一样，当时皇后乐队正和卡里斯玛唱片的人站在吧台上。乐队看到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舞台上，乐队唱了《子女》《夜色降临》《活出精彩》，还有《我竟如此愚蠢》（这是微笑乐队的歌，后来收在了皇后乐队的单曲B面）和《刽子手》（Hangman），这首重摇布鲁斯从来没有出现在皇后乐队的专辑中（泰勒说：“这首完全是在自由乐队的风格上改的。”）。三叉戟的人被演出打动了。“我们看了演出，他们唱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时，巴里简直惊呆了，”安东尼说，“他马上就说：‘好，我们要了！’”

可以使用录音室是三叉戟音频制作公司提供给皇后乐队的诱饵。他们能够用上国内最好的录音设备，而且三叉戟还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功放和设备。然而，这个协议也意味着三叉戟将包办他们的录音、制作、管理和歌曲发行。尽管皇后乐队坚持要求谢菲尔德兄弟为每个环节都出一份子合同，但依然把自己置于受到三叉戟全面控制的状况中；这对任何一个乐队来说都有潜在的风险。

森林山这一场就成了皇后乐队八个月来表演的最后一场。他们还没有和谢菲尔德兄弟签约，而是花了很多时间仔细研究合同，同时等待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公司邀约。“我叫他们沉寂一阵，”约翰·安东尼说，“我希望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音乐，然后回到市场去做更大型的演出。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在小俱乐部演出上呢？”

在肯·泰斯蒂这边，三叉戟的出现意味着他和皇后乐队之间的关系就要结束了。他离开了租住的瑞恩公园公寓，暂时住在罗杰·泰勒的地方。那时，他的父母离婚了，家里需要他回去。“于是我回到了圣海伦斯，在那有个卖地毯赚了很多钱的朋友.....然后我接到了电话。皇后乐队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私人经理。我心想：‘那正是我原本的人生方向啊。’但我不得不拒绝了。我必须对家人负责，必须做我应当做的事，虽然不无遗憾。”泰斯蒂的企业家精神将会带着他重返音乐界，成为失聪学校乐队^[57]的经理，同时他也是利物浦埃里克俱乐部^[58]的合伙人，这个俱乐部输送了如回声乐队^[59]、兔人乐队^[60]以及“弗兰基去好莱坞”^[61]这样的乐队。

因为还没有接到唱片公司的购买合同，谢菲尔德兄弟便让皇后乐队使用三叉戟录音室制作一张专辑，然后再把它兜售给唱片公司。但这当中是有猫腻的：皇后乐队只能在其他艺人不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才可以录自己的唱片。就像所有巡演经理人遵循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一样——“抓紧时间，等待进场”——皇后乐队只好徘徊在附近的大教堂街上，在大船酒吧喝点酒，或者在星星咖啡吧^[62]喝茶消磨等待进场的时间。

“给他们使用的那段时间叫作‘暗点’，”约翰·安东尼解释说，“这时候工程师可以自行制作一些他喜欢的乐队的音乐，端茶送水的小工也会被用作磁带操作员。问题是，三叉戟全天都是被订满的。所以皇后乐队的暗点时间经常是晚上11点或者凌晨2点才开始。”

按商量好的，安东尼和罗伊·托马斯·贝克将会联合制作皇后乐队的专辑。皇后乐队对安东尼说，他们觉得他为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专辑《兵卒之心》（*Pawn Hearts*）的制作很不错。“接着，弗雷迪给我看了一本《女王》（*Queen*）杂志（即被称为时尚圣经的芭莎杂志英国版《哈泼斯和女王》[*Harpers & Queen*]）。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这种图片、文章、整个的风格.....我们的唱片就要这样——有不同的主题和别致的照片。’他的脑海里已经都想好了。”

那年夏天，卢·里德正在三叉戟录制他的《变革者》（*Transformer*）专辑，大卫·鲍伊是制作人。“我们会接到电话说鲍伊或者其他人提前录完了，所以凌晨3点到早上7点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也是清洁工进来清场的时间。”布莱恩·梅嘟囔说。“毫不夸张，他们从地下录音室走上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从楼梯上擦肩下去。”罗杰·泰勒记得。后来在开玩笑的情况下，鲍伊跟某个记者说莫库里曾请他帮忙制作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不过乐队很快就回应没有此事。

鲍伊出现在三叉戟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刺激。也许皇后乐队曾经都是鲍伊的忠实歌迷，但现在他们忙着操心没有唱片公司接手，就无法有更大的知名度，而且那些人，包括鲍伊本人，都有可能占他们的便宜。7月份，罗杰开着他的迷你库柏车载着莫库里，一起去艾尔斯伯里的修士俱乐部^[63]，观看了鲍伊化身Z字星尘后在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我是在《佳作》专辑时期第一次在修士俱乐部见到他，”泰勒说，“他居然打扮成了一个女人！然后我们又去看了几次，一开始我们只能看到舞台上乐队的剪影，和那种外星人一样的发型。”一个月后，梅在彩虹剧院沮丧地注视着台上的鲍伊：“我当时想，‘他做到了，他已经出名了，而我们还在努力挣扎着出一张唱片。’”

那年夏天，皇后乐队时断时续地制作着他们的专辑。不久后约翰·安东尼也没法跟进了：“我那时在给‘家’乐队^[64]和艾尔·斯图亚特录音，还要凌晨两三点赶到三叉戟.....都是在皇后乐队的事情中间挤时间来做的。”终于在一天晚上，安东尼倒在了录音室里。他被诊断为单核白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受到艾波氏病毒感染的疾病，医生命他立刻休息。“我去了希腊，吃健康食物，不沾酒，纯粹疗养。于是罗伊接手了。”

罗伊·托马斯·贝克曾为迪卡唱片的实习工程师，1969年加入三叉戟公司。他协助制作了如霸王龙乐队的《冲刺》（*Get It On [Bang A Gong]*）和自由乐队的《现在好了》（*Alright Now*）等金曲。三叉戟工程师小组还包括他在海王星的合伙人罗宾·杰弗里·凯博，以及鲍伊的长期合作工程师肯·斯科特；这三位都将参与皇后乐队首张专辑的制作。全部工作人员就更多了。“所有相关的闲杂人等，包括我自己，都被叫来操作磁带，”格伦·菲密斯特说，当时他在三叉戟当磁带操作工和泡茶小弟。有一个表明三叉戟对乐队很有信心的故事，如菲密斯特回忆的，“三叉戟取消了戴安娜·罗斯^[65]的录音.....以便皇后乐队可以做更多的样带”。

尽管他们此时处于弱势，但皇后乐队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改用麦克风环绕吉他扩音器和鼓，向老板们表达出不顺从的态度。“我们希望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录音室现场，就在你面前演奏，”布莱恩·梅在接受《魔力》（*Mojo*）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奋力争取，把鼓从鼓室里全部拖出来，放在录音室的正中间，然后整个房间都摆满麦克风。”三叉戟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音效，而如梅所说：“我们要的恰恰相反。”

贝克在迪卡公司录制古典音乐的经验帮助梅做出了他想要的吉他录音。“我们从来没有像大多数吉他手一样，认为电吉他是一种很糙、很噪的发声物件，”贝克解释说，“它应该被看作管弦乐乐器。”最终出来的效果是一种很悦耳、很有层次感的声音，有富丽堂皇的王者气概，像乐队的名字一样。但是这位制作人并没有高高在上，用布莱恩·梅的话说：“用技术来迷惑我们。”乐队认为鼓声听起来不够浑厚，贝克保证说在最后的混音中，这部分会被处理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不大可能。我并非指责罗伊。他做出了不少好东西，但是我们和他来来回回争了很多次。”

肯·斯科特愉快地回忆道，皇后乐队“聪明敏锐，朝气蓬勃，一丝不苟”，而且弗雷迪“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惊世骇俗了”。莫库里在艺术学校的老同学克里斯·史密斯去旁听过几次录音，他被录音室轻松幽默的氛围所感染。“他们录好一个版本，弗雷迪转过来对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你觉得如何？’贝克答：‘哼，我觉得你马上会有名到懒得跟我讲话。’”三叉戟录音室都被莫库里的活泼和骚气感染了。没过多久贝克学到了弗雷迪的口气，气氛就像一位三叉戟工作人员回忆的那样，“突然之间大家走动打照面的时候，都管对方叫‘亲爱的’”。后来，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差点命名为“我的天哪”（*Dearie Me*）^[66]，这是贝克那个时候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皇后乐队和三叉戟之间的角力可以从完成的专辑中听出端倪。皇后乐队不喜欢新录的《夜色降临》，他们坚持要使用德莱利亚录音室的旧版本。另一首歌《疯狂之猪》（*Mad the Swine*），由于贝克和乐队对最终混音未能达成一致，直接从专辑中拿掉了。甚至在专辑制作完成后，贝克和梅还执着于再做一次混音，以便进一步优化他们听出来不完美的地方。梅说：“我和罗伊两人全程都在争斗，以找到一个完美的点，既能做到声音的无瑕同时又保留住真实。”

不过，约翰·安东尼记忆中的最后混音不太一样：“我从希腊回来一看，大伙儿都处于游离焦躁的状态。让我吃惊的第一件事是专辑的组合

非常精神分裂，而且排序都是错的。”他说，“罗伊走了之后，弗雷迪、布莱恩和我又进到棚子里，几乎整张都重新再混音。”

迈克·斯通也加入了混音，作为三叉戟的跑腿和泡茶小弟，他刚刚被提拔上来做这个。根据约翰·安东尼的说法，斯通差点就要被解雇了，是他介入提供了帮助：“我对迈克说，‘要让专辑听起来像是演唱会现场录制’。所以我把所有的衰减器调到最小，按照录现场演出的方法来混音。我希望它能展示出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的力度和能量。”

对安东尼来说，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活出精彩》的版本。“他们的叠录录在了错误的原带上。那盘听起来像是早上4点没睡醒录的，特别是罗杰的鼓声。所以我们重新录了原带，再重新排了音轨。”迈克·斯通当时也在场，根据布莱恩·梅的说法，他的《活出精彩》混音版本最终被选入了专辑。“我们和迈克相处得很融洽，很快我们意识到这栋楼里他对音乐的辨识力最好。”梅说。工作关系就此开始建立，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还会为皇后乐队制作五张专辑。

也许皇后乐队现在会挑剔他们首张专辑的许多方面（比如泰勒，免不了要说一句：“我不喜欢里面的鼓声”），但它保留着的那种男孩子气的能量，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烂漫的气质，今后几乎不会再出现。《大鼠王》《骗子》和《子女》展现了管弦乐般的吉他声，层次分明的和声和变化灵活的唱腔，皇后乐队的独特风格已经初具轮廓。格伦·菲密斯特回忆道：“我刚听到了这宏大的制作，声音来回震荡，和声如此洪亮……难得的是，听完第一首后，诺尔曼（·谢菲尔德）说：‘嗯，我认为完全没有过度制作。’”

专辑中的异数有《耶稣》，在德莱利亚的版本上进行了重录，但内容依然令人困惑；还有一首新版的微笑乐队的《过得不错》，蒂姆·史塔菲终生享有这首歌的部分版权费；以及一分十秒长的《七海雷耶国》（Seven Seas of Rhye），完整版本将出现在下一张专辑中。那个夏天，梅和莫库里十分高产，写了不少他们渴望录制的新歌。第一张专辑刚做完，在皇后乐队眼里，它就已经过时了。专辑封套背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此专辑包含皇后乐队至少三年的音乐作品。”

在第一张专辑录制过程中，弗雷迪·莫库里还被请去录了一些个人歌曲。罗宾·杰弗里·凯博一直在三叉戟录音室里晃悠，尝试着做沙滩男孩乐队的金曲《我能听见音乐》（I Can Hear Music）的翻唱版。凯博听过莫库里在皇后乐队里的功力后，觉得他是理想的翻唱人选。而弗雷迪

马上就开始提建议了：为啥不这样做呢？为啥不用那个呢？没多久泰勒和梅也加入了伴奏。他们的劳动成果，再加上另一首只有弗雷迪参与的单曲《回归》（Goin' Back），一年后将被百代作为单曲发布，歌手署名为拉里·卢勒克斯（这个假名是戏仿当时走红的华丽摇滚歌星加里·格利特尔^[67]）。这首歌曲成绩惨淡，但比皇后乐队的首支单曲早发行两周。

虽然谢菲尔德兄弟能够快速发掘艺人的音乐潜力，但他们的想法和自己的艺人却大相径庭。约翰·安东尼和巴里·谢菲尔德故意穿成大佬，出席皇后乐队秀实力的首次演出，这类策略突显了谢菲尔德兄弟和乐队之间的巨大差异。大卫·鲍伊的制作人托尼·维斯康蒂在2010年回忆起这两兄弟，形容他们“像是来自狂野的美国西部”。当时和皇后乐队同在三叉戟的词曲作家马克·艾什顿说：“巴里和诺尔曼是两个硬汉，非常老派的那种。”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地成立了电影和视频公司：三叉戟视频制作公司。“我和诺尔曼一起录视频，我记得他总是在侧翼大声喊，‘他妈的，这要花我们多少钱？’”艾什顿笑着说，“他们挺专业的，你可糊弄不了他们。”

9月，三叉戟为皇后乐队四个人开出了20英镑/人的周薪。“这引来了第一场争论。”约翰·安东尼记得，“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音响工程师（约翰·哈里斯）也能拿到工资。我说：‘不行。你们要用他，就得自己付钱给他。’”皇后乐队已经很多个月没有演出了，而且仍然没有经理，全靠自治。1972年9月18日，地下杂志《国际时报》（*International Times*）上刊登了一则分类广告：“皇后乐队！找演出！摇滚的！电联罗杰4285617。7点后”。这个时候，泰勒从生物学系毕业，拿到了本科学位，迪肯也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他准备留校继续念研究生）。与此同时，梅还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全职授课和乐队演奏之间辗转腾挪。他先是向斯托克韦尔庄园中学提交了辞呈，同事们大为惊讶。帝国理工大学很快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梅的博士论文，用他教授的话说，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全部手打出来，等着装订，”布莱恩回忆道，“我把它拿给我的导师看，他说我还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我就回去继续做。然后我把它再拿回来，他又说还要时间。我就觉得，‘到此为止了。’乐队已经起步了，我记得当时想：‘如果我再不做个了断，给乐队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后悔的。’”

“我感觉布莱恩对放弃工作和学业倍感烦恼，”约翰·安东尼说，“我记得罗杰、我和他有一天在大船酒吧，他又接到去某处研究星星的机

会，我突然冒出一句荒唐的话：‘你看，布莱恩，你可以去研究星星，也可以自己成为一颗新星！’罗杰不禁大笑。”

唱片录好之后，三叉戟的计划是向唱片公司兜售皇后乐队，同时打包出售他们旗下的另外两个艺人，一个是爱尔兰歌手兼作曲家尤金·华莱士，他被吹捧成“下一个乔·科克尔”，另一个是由马克·艾什顿组的墓碑乐队^[68]，在此之前他还是稀有鸟类乐队^[69]的鼓手。这支乐队在1969年曾发行过金曲《怜悯》（*Sympathy*）。墓碑乐队和华莱士都在三叉戟录音室录了首张专辑，分别为《坏习惯》（*Bad Habits*）和《危险》（*Dangerous*）。“把乐队打包提供给唱片公司并不少见。”约翰·安东尼坚持说。

然而，安东尼在尝试把皇后乐队签给大唱片公司时，遭遇了和肯·泰斯蒂一样的挫折。“罗伊和我带他们去小岛唱片，那边根本不要。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表示有感觉，但当我说我们需要3万英镑作为灯光和服装费时，他们就拒绝了。还有人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同性恋？’因为我跟他们说乐队的名字叫‘皇后’……”

与此同时，皇后乐队的专辑发行由B. 费尔德曼联合公司接手，海王星公司参与分成。“费尔德曼是深紫乐队的发行公司，”安东尼说，“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做好硬摇滚乐队宣传的。”费尔德曼的董事总经理罗尼·贝克成了皇后乐队坚定的盟友。也在这时候，谢菲尔德兄弟雇了一个美国人杰克·内尔森，让他帮助皇后乐队搞定唱片合同和物色业务经理。不过没多久，内尔森就亲自担任了乐队经理的职位。11月，皇后乐队与三叉戟正式签约，公司在国王大道时髦的鸡舍酒吧^[70]里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发布会，这个地方曾举办过俄罗斯舞蹈颁奖礼。尽管在嘈杂不利的环境中有三叉戟和费尔德曼鼎力相助，但仍然没有一个艺人开发经纪人出席。不过，还是吸引到了一些感兴趣的东家。比如杰克·内尔森就成功地引起了百代的艺人开发部总监约普·威瑟的注意。

之后费尔德曼的工作由百代音乐发行公司接管，皇后乐队找唱片公司的事就更有眉目了。内尔森同时也在积极为乐队找北美的买家。哥伦比亚唱片的三份合同草案已经有了。然后伊莱克特拉（*Elektra*）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雅克·霍茨曼（曾经手的成功乐队：爱乐队^[71]和大门乐队^[72]）听到了皇后乐队的带子，他被惊艳到了。“简直完美，像一枚切割好的钻石摆到了我的桌子上。”他说。

约翰·安东尼以前曾和雅克·霍茨曼合作制作过林迪斯芳乐队^[73]：“雅

克曾跟我说，如果我有乐队了，记得打电话给他，”安东尼称是他帮助皇后乐队获得了霍茨曼的青睐。然而，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杰克·内尔森回忆说：“我从伦敦去加利福尼亚卡梅尔的路上，在纽约做了停留，交给雅克·霍茨曼一盘带子，告诉他我已经在和哥伦比亚唱片谈了。”1998年，在为霍茨曼的新书《追随音乐》（*Follow the Music*）做采访时，内尔森回忆说，哥伦比亚的合同因为技术条款陷入停滞，让霍茨曼获得了插手的机会。“雅克在洛杉矶.....日本.....澳大利亚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必须签下他们。’”这一头，内尔森逐渐怀疑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艺人开发团队是否真的有上心：“他们当中有个人称皇后乐队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听过的最好的乡村乐队’。搞得我极为紧张。”

三叉戟又为皇后乐队安排了一场演出增加曝光——12月20日在大帐篷俱乐部，为流落伦敦的美国艺术摇滚乐队火花乐队^[74]做开场。雅克·霍茨曼专程从美国飞来，但他后来写道：“特别失望。我看到舞台上的他们不如录音带里那么有劲。不过音乐感觉还是在的。”约普·威瑟同样不感兴趣，但通过罗尼·贝克的努力，他尝试性地同意与皇后乐队签一个制作协议，不过威瑟对“五位数”的预付款表示犹豫。这时候火花乐队也记住了皇后乐队的这位吉他高手，未来他们还向他发出过入伙邀请。

到新年的时候，皇后乐队终于时来运转了。2月，费尔德曼的电台宣传员费尔·里德说服英国广播公司为皇后乐队录一期歌曲，放在DJ约翰·皮尔的《七十年代之声》（*Sounds of the Seventies*）节目中播出。莫库里去了伦敦西区英国广播公司的朗翰1号录音室，在三叉戟做好的四首歌的音轨基础上，复录了人声部分。《过得不错》《我的仙王》《骗子》和《活出精彩》都将在次周的电台节目中播出。这次电台的公开播放很有益处。

与此同时，罗尼·贝克在法国南部参加年度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的时候，认识了百代的艺人开发部执行总裁罗伊·费瑟斯通。费瑟斯通正在推出新的厂牌“百代唱片”，他后来说博览会上被塞过来的几百份录音带所淹没，“从家里老母亲到狂吠的狗，唱什么内容的都有.....但没有一份让我满意的”。因为他很想找到不同的音乐，贝克便强行推荐了皇后乐队。他听过之后来了兴趣。贝克撒谎说已经有其他公司在考虑了。布莱恩·梅回忆说：“于是我们接到了百代头号人物罗伊·费瑟斯通的口信，他听过样带之后发了一封电报来说：‘和我谈之前你们先别动。我想让乐队用我的厂牌。’”

然而，三叉戟继续采取强硬手段，拒绝了百代公司首轮过低的报

价。谈到最后，百代同意延期付款。他们打包接收了尤金·华莱士和墓碑乐队（两者都没红起来），于1973年3月与皇后乐队签约，签约金额据说有30—40万英镑。

后来成为百代董事总经理的鲍勃·默瑟当时担任公司艺人开发部门总监。他看到了皇后乐队的潜力，也看到了这个交易的隐患。“这支乐队没有短板，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默瑟说，“常见的乐队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诸如贝斯手不行，鼓手太烂之类。但皇后乐队不是。而且他们还有那么惊为天人的声音，听得你动弹不得。但皇后的这个协议还不是一般的艺人开发协议。它不是那种我们的人和乐队晚上在俱乐部喝到醉醺醺之后谈出来的。它是直接从谢菲尔德兄弟那里提出的。对谢菲尔德兄弟来说这是一次投机交易的协议，我们和皇后签约的时候，他们和谢菲尔德正处在一种困难到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的关系中。”

4月，与百代签订协议的一个月之后，雅克·霍茨曼再次来到大帐篷俱乐部观看皇后乐队的演出，这次他从伊莱克特拉唱片公司带来了正式的合同。约翰·安东尼在演出结束后的路上遇到了他，霍茨曼请安东尼给布莱恩·梅提一点建议：“雅克说，‘我们愿意做这笔交易……但是你跟吉他手说，要做出很难弹的样子。年轻人喜欢联想到贝多芬。’”

尽管理论上拉里·卢勒克斯出的单曲已经先发制人，皇后乐队还是在7月6日通过百代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活出精彩》。歌词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别让那些混蛋碾压你（很契合皇后乐队挣扎的现状和莫库里正在经历的自我重建）；分段的重度吉他连复简直就是齐柏林飞艇的翻版，和声则十分流行乐风格，泰勒在间奏的段落中使用了他在中学时的灵感，冲浪团乐队《跌落》里的非洲鼓。“如果皇后乐队看起来有他们听起来的一半好，他们应该会大红的。”《新音乐速递》写道。不过关键没人在听。这首单曲没有上榜，而且多年后，布莱恩还在为最终的混音版本感到烦恼：“它从未展现出它应有的魔力。”

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名为《皇后》（*Queen*），于7月13日这天终于面世。专辑封面颇具深意。封面照片是莫库里站在舞台上的英姿，由罗杰·泰勒在康沃尔的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摄影师道格拉斯·帕迪福德拍摄。“弗雷迪其实是想表现一种‘古代帆船船头雕像’的感觉。”布莱恩·梅说。封底装饰着莫库里设计的皇后乐队的纹章，覆盖着许多照片剪辑，其中一张是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的家，点缀着许多华美的碧芭装饰品。显然，百代唱片的创意执行经理认为这个自制的封套简直是“垃圾”。但是这些设计最后还是付诸印刷了。这个时期就已经能看出皇后

乐队不愿妥协的迹象了。

封底文字说明把约翰·迪肯写成了迪肯·约翰，写了泰勒的全名“罗杰·美多斯·泰勒”，使得乐队有一种更贵族的感觉。同时还写着接下来十年里，皇后乐队坚守的使命宣言：“.....不使用任何声音合成器”。罗伊·托马斯·贝克解释说：“我们会花四天的时间叠录一段真实的吉他独奏，然后某个唱片公司的白痴进来听到会说，‘那段合成器出来的声音我喜欢’。”

像单曲一样，专辑销量缓慢，在英国榜单仅到达第三十二位（不过两年后皇后乐队取得突破时，这张专辑冲到了更高的排名）。媒体界给出了一些积极的评论。“一张雄心勃勃、活力四射的处女作。”地下杂志《休闲时刻》（*Time Out*）称。也有不那么积极的。“如同一桶陈年老尿。”《新音乐速递》如是说。由此引发的音乐媒体对皇后乐队的恶意评价将会持续他们的整个音乐生涯。

皇后乐队好不容易出了唱片，可现在他们又开始担忧这张唱片可能已经过时了。“在甜蜜乐队^[75]和大卫·鲍伊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华丽摇滚了，”布莱恩·梅接受《流行音乐周刊》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担心我们可能出道太晚了。”这一行竞争太激烈。雌雄莫辨的年轻男子穿着异域风格的服装，在摇滚和流行界俨然已经成了必备的社交风范。那年春天，鲍伊发行了《阿拉丁·塞恩》（*Aladdin Sane*），洛克希音乐乐队^[76]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取悦你》（*For Your Pleasure*）。洛克希音乐乐队也是艺术生班底，披着羽毛长围巾，一年前就已经在手与花酒吧^[77]上演了处女秀，该地离肯辛顿酒馆只有一箭之遥。洛克希音乐乐队还坐拥一首金曲和一张热门专辑。“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跟风模仿他们。”梅说。

那年夏天，伦敦的9路公交车承载过许多次关于皇后乐队前景的热烈讨论。梅、莫库里和其他朋友们坐在这辆双层巴士上，穿行在肯辛顿大街，途经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和肯辛顿市场，开进伦敦西区。克里斯·史密斯回忆说，皇后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布后没多久，他和莫库里坐在9路公交车上聊天。“弗雷德变得有点绝望：‘天啊！我希望我们乐队能成。要是还没有出路，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我不想在艺术工作室里终老。’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当然了，最终我真的成了那个在艺术工作室上班的普通人。”

“如果你乘坐9路公共汽车，上二层，走到左前方，那就是我和弗雷

迪当年坐的位子，”布莱恩·梅说，“我们常常乘这趟车去三叉戟敲打那些人，追问他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推广我们的唱片。”

那个夏天也有好消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音乐节目《老灰哨》（*The Old Grey Whistle Test*）的制作人迈克·阿普尔顿收到了一张未打标的皇后乐队专辑复录带。这盘带子上既没有写皇后乐队的详细介绍，也没有他们的照片。阿普尔顿听了之后很喜欢，尤其是《活出精彩》。由于他不知道皇后乐队是何许人也，也不知如何联系乐队，他自己为这首歌制作了一部动画和电影小短片，借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竞选中使用的卡通形象。这部短片最先在《老灰哨》里播出。百代和三叉戟大怒，急忙联系英国广播公司，但乐队却因为这次意外的宣传感到精神一振。

8月，为了拍《活出精彩》和《骗子》的宣传视频，莫库里剃了胸毛。后来发现白剃一场。乐队退回了视频，他们不喜欢打光，还有其他种种，两个月后又在圣约翰伍德的一间录音室里重新拍摄。最终的视频成品里，皇后乐队的成员画了眼线，穿着黑色绸缎服装，梅戴了一条华丽的项链，样子很像通常会在埃及法老墓里找到的那种，甚至连“随和迪肯”都穿上了及膝的长筒松糕跟靴子。莫库里精心打扮，闪闪发光，表演途中做了一个把铃鼓扔到舞台边上的动作。他的表现无懈可击。

为了让花出去的钱能够有更好的回报，三叉戟替他们请了一名公关人员。此人叫托尼·布莱斯比，二十八岁，戴眼镜，瘦的像根竹竿。他烟酒不沾，曾是滚石乐队青少年时期的好友，客户名单上有保罗·麦卡特尼、琥珀摩特乐队和卡特·斯蒂文斯等等。他在伊迪丝格罗夫的豪宅既是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室，是诸多流行歌星、作家、演员、模特和门客的圣地。

布莱斯比看过皇后乐队的演出，很欣赏他们可以在一群漠不关心的大学生面前仍然自信表演的功力。他立刻被弗雷迪·莫库里的风格吸引了（“他几乎每讲一句话的都会带上‘亲爱的’，或是‘我的亲’”），他还记得这位主唱的过去永远是个谜（“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原来的姓是保萨瓦”）。布莱斯比说，莫库里“擅长让人去看他、听他，却不会让人了解他”。

自从布莱斯比接了皇后乐队这个客户之后，他就感到了来自音乐媒体的敌意。“他们被写成‘搔首弄姿的娘炮’，”1997年，他回忆道（布莱斯比于2000年去世），“并遭到诬陷，说他们找乐手来顶替录音，因为

人们觉得太难以置信了，这些人看起来年轻秀美，却这么有才华。”大多数他们同时代的乐队展现出来的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皇后乐队却大大方方地表现出了他们聪明的头脑、良好的背景和清晰的思路。梅和泰勒会认真地描述着他们的未来大计，尤其是泰勒，他常常会大叫：“我们真他妈是支好乐队啊！”

1973年的夏天，后来为《滚石》杂志撰稿的史蒂夫·罗森身在伦敦，努力想要成为一名音乐记者。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托尼·布莱斯比。这位公关人士很同情罗森，因为他没有住处只能睡在海德公园，托尼收留他暂时住到伊迪丝格罗夫的家。为了帮助这位有抱负的记者，托尼提了一个建议。“他问我是否愿意采访皇后乐队，”罗森如今回忆道，“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名字有点夸张。托尼有一张他们首张专辑正式投产前用作测试的白板片，而我出于无比的愚蠢，竟然拒绝了。他说：‘我可以让他们四个人来办公室，而你将成为第一个采访他们的人。’我说：‘谢谢您，但是，不了吧。’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刻。”

尽管连最穷困潦倒的评论家都对乐队表示怀疑，布莱斯比注意到乐队还是有坚定的追随者的，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些人会扩大成为一个比传统摇滚歌迷年龄要大很多的群体（“家庭主妇、中年妇女——曾经还有一个老太太给我打过电话”）。很快地，皇后乐队将会请泰勒的特鲁罗老乡帕特·约翰斯通和苏·约翰斯通姐妹来管理粉丝俱乐部，因为他们的粉丝正在迅速增长，大量涌入的邮件让百代公司再也无力处理。

与此同时，但布莱斯比也不遗余力地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皇后乐队。他的推广文案很简单：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华丽美好，吉他手的乐器用百年壁炉的材料制作而成。就算皇后乐队可能会被各种批评他们不是严肃乐队的声音所激怒（洛克希音乐乐队的鼓手保罗·汤普森曾公开抨击他们“太做作”），但是10月份的时候，他们还是接受了《米拉贝尔》（*Mirabelle*）杂志的采访，讨论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喜好和厌恶等。莫库里的愿望是“上《莱莎·明奈利访谈秀》”，泰勒的则是“成为超新星！”，“高大、小麦肤色、英俊”的布莱恩·梅喜欢的东西有“猫咪、赫尔曼·黑塞^[78]和明虾鸡尾酒……”。

8月，由于皇后乐队渴望录制新歌，他们很快回到三叉戟录音室，开始制作第二张专辑。这一次，他们坚持要求并争取到了白天工作的时间。罗伊·托马斯·贝克、罗宾·杰弗里·凯博和迈克·斯通被保留下来。“杰克·内尔森很客气地来跟我说，我们得去见一见这群男孩子，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做第二张专辑了，”约翰·安东尼解释道，“于是我去了哈弗斯

托克山，他们在那儿排练，我说：‘祝你们一切顺利。’一切都很平和。不管怎么说，我竭尽全力地工作过。我还是会去看他们排练，并且给他们提些现场表演上的建议。”

泰勒告诉《唱片镜报》（*Record Mirror*）：“只要我们没有自负过头，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不会有事的。”后来的情况证明这句预测是对的。皇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几乎可以被命名为“怎么过头怎么来”。莫库里很快让乐队成员和贝克一瞥他心中的想法，他领着一群人到泰特不列颠美术馆^[79]，向他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理查德·达德的画作《仙女费勒的神来之笔》（*The Fairy Feller's Master-Stroke*）。“那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画之一，”泰勒说，“它包含着大概五十个不同的场景，都是一个人画的，而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个疯子。”画家达德，相信自己接收到了埃及神灵奥西里斯的指示，杀死了父亲，被伯特莱姆皇家医院以精神病人收治，在被囚禁的九年期间完成了这幅画作。画里展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林地场景，童话里的生物在其间潜伏游荡，有的掩藏在灌木丛后面，几乎看不见。莫库里的同名歌曲和这些生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弗雷迪以前常常邀请理查德·汤普森在周末一同去画廊参观，但屡遭谢绝。但这位前残骸乐队的鼓手依然记得莫库里对一幅画作特别着迷。“有一次，我和玛丽·奥斯汀在他家，弗雷迪从泰特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仙女费勒的神来之笔》的明信片，”汤普森说，“弗雷迪很生气，因为明信片上的画印反了！”罗伊·托马斯·贝克又特地去泰特仔细瞻仰了达德的大作，莫库里跟他的制作人说了一句话：“任何你想尝试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乐队和贝克充分利用了三叉戟的十六道音轨设备。泰勒说，“我们尽力打破人们认为录音室能做出的效果的极限”。六个声部的和声在录音时司空见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无合成器”，于是钢琴、哈蒙德风琴、响板和管钟琴等等全部加入混音中（贝克：“这就是张厨房水槽里的大杂烩专辑。”）。梅和制作人将第一张专辑中管弦乐吉他的想法发扬光大，在《列队曲》（*Procession*）和《父与子言》中，创造出一种华丽恢宏的声效，听起来像伦敦交响乐团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在合奏。“皇后乐队势不可挡，”贝克说，“他们有无穷的主意。”到最后，整张专辑唯一简单的东西只剩下标题——“皇后II”。

3月以来，除了7月有几场演出，8月8日在纽卡斯尔的梅菲尔为刻薄乔乐队^[80]暖场，皇后乐队就没有其他演出了。“在微笑乐队的时候，我们

马不停蹄地在各地酒吧和小俱乐部之间奔波演出，折磨得筋疲力尽，”梅抱怨说，“我们不想再来一遍，那太让人沮丧了。”不过日子还长着呢。9月13日，他们在伦敦的戈尔德格林剧院^[81]为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做了一场演出，试演了大部分《皇后II》专辑中的歌曲。一个月后，作为专辑的宣传路演，他们首次来到欧洲大陆，在德国波恩，以及卢森堡的爆炸俱乐部^[82]演出。

9月4日，皇后乐队的处女专辑在美国发布。《滚石》的激情评论印证了雅克·霍茨曼的欣喜之情，它通篇都在说莫库里是多么“自负，高贵，骄傲”，并将“迪肯·约翰”比喻为“一座巨大的火山，喷薄出的声音令地球颤抖”，最后给出结论：“皇后乐队是猛兽。”皇后乐队要下一年才会到美国演出，但这个开头还不错。

他们即将作为琥珀摩特乐队的暖场乐队参加巡回演出。作为热身，皇后乐队在帝国理工定了两场演出，并邀请摄影师米克·洛克在11月2日到现场为他们拍照。洛克是在肯·斯科特的建议下，在三叉戟和皇后乐队见面的，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平克·弗洛伊德迷失的主唱西德·巴勒特的密友。他为大卫·鲍伊和卢·里德都拍过照片，《变革者》专辑封面照片就是他拍摄的，刚刚发布的鲍伊的《海报尤物》（*Pin-Ups*）专辑封面也出自他手。“肯·斯科特说，‘皇后乐队很喜欢你的作品，特别是你为大卫和卢拍的那些’。”洛克回忆说，“他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帮他们拍摄。”

初次见面，洛克很快就被莫库里和泰勒的魅力所折服，同时也被这支乐队的绝对自信所感染。他还注意到，不止一次，乐队总是想要知道所有事务，杰克·内尔森永远在被问问题，洛克说：“他们想要整个世界，而且在周五的茶点之前就要。”洛克听了《皇后II》的示范片后，同意接下来为他们拍摄专辑封面。但是首先三叉戟要求他为接下来的巡演拍一些宣传照。洛克镜头下的第一张皇后乐队照片，是其他三人环绕着莫库里，他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权杖。但队内有人觉得这个王室造型太惹眼了（“布莱恩不喜欢，他们当时就没有发表这些照片”）。洛克接着建议乐队赤膊上阵。裸露上身的这一组照片出格且媚俗，但是莫库里还挺喜欢的。“他们想要一些耸人听闻的，能够给人制造话题的形象。”洛克说。这组半裸照片很快会在《米拉贝尔》和《新音乐速递》上刊登出来，招致媒体更多的敌意。但这样计划就奏效了。洛克回忆说：“他们可是给自己挣了不少曝光率。”好消息是，他们在帝国理工的演出票全部售罄，并收获了一段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评价之一，来自《发烧碟》

(*Disc*) 杂志的罗斯玛丽·霍丽德：“他们被迫返场了三次，直到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实在是精疲力竭了。”

与此同时，在琥珀摩特乐队接下来的英国巡演中，百代唱片破天荒地为暖场的皇后乐队支付了演出费。杰克·内尔森认识摩特乐队的经理，此人也是美国人，叫鲍勃·赫希曼，他回忆起公司为这次演出掏了3000英镑。百代的鲍勃·默瑟则声称付了9000到10000英镑：“百代第一次为巡演暖场乐队付费就是皇后乐队这次，后来就成了惯例。琥珀摩特乐队当时红得一塌糊涂，我们正是想把皇后乐队展示给他们的观众。”

为了准备这次巡演，皇后乐队预定了富勒姆的曼蒂克录音室^[83]进行排练，这间由电影院改造的录音室刚刚被超级三人组合艾默生、雷克和帕尔默^[84]买下。那是11月，录音室里开着喷气式暖气，包厢上挂着降落伞布，以防止热量散失。

彼得·“阿鼠”·辛斯彼时是琥珀摩特乐队的巡演工作人员，后来他成了皇后乐队巡演团队工头。皇后乐队来的时候，辛斯和他当时的雇主已经在曼蒂克里面了。“那天天气很冷，所以摩特乐队的人穿着牛仔裤、皮衣，戴着围巾，”辛斯回忆说，“然后皇后乐队来了，居然穿着全套的绸缎舞台服装，只是个排练而已啊。我们就在那边说：‘这个叫弗雷迪的是谁啊，跳来跳去，只戴一只手套，还拿着半截棍子的麦克风。弗雷迪听起来就不像个明星的名字。’”辛斯同时觉得布莱恩·梅的吉他拨片也很有意思，竟然是一枚六便士硬币，梅的确更喜欢用它做拨片，可能是因为边缘有锯齿的缘故。“他的吉他是自制的，一个小AC30扩音器放在椅子上，还用六便士硬币弹琴……我想，‘哦，可能他没什么钱吧……’”鲍勃·默瑟想要突袭排练现场，却被堵在门外。“我并不想打扰他们或者告诉他们应该演奏什么歌曲，我就只是很好奇。但他们不准我进去。”默瑟想看演出，得等到利兹市政厅的开场演出了。

琥珀摩特乐队1969年成团，一度到了分裂的边缘，他们的超级粉丝大卫·鲍伊说服他们免于解散。他写的歌《所有的年轻人》(All the Young Dudes)在1972年意想不到地让摩特乐队给唱红了。一年后，新吉他手阿里尔·本德加入，一头染成银色的头发，让摩特乐队逐渐跟上了时下流行的华丽摇滚风潮。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观众产生了亲和力，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而不是不可接近的超级明星。正如布莱恩·梅所说：“摩特乐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1973年的金曲《从孟菲斯一路走来》(All the Way from Memphis)里有一句歌词，写的似乎就是弗雷迪·莫库里的现状：“你看起来像个明星，但你仍在领失业救济金。”

这次演出，皇后乐队的歌单包括还未发布的《皇后II》里的歌曲，以及《活出精彩》《刽子手》，还有一些摇滚歌曲串烧，包括他们那个风骚版本的《挥金如土》。巡回演出中，观众对皇后乐队的激烈回应引起了不同的后果。约普·威瑟记得巡演到后面时，皇后乐队基本上已经抢了琥珀摩特乐队的风头。鲍勃·默瑟回忆说，某场演出中，“弗雷迪上台唱了《挥金如土》，观众都疯狂了。”事后在后台，默瑟记得，他和一个琥珀摩特乐队的熟人因为皇后乐队太受欢迎发生了争吵。“他把我抵在墙上，说：‘不能再让他们跟巡演了。我们乐队都快顶不住了。’我说：‘不好意思，小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皇后乐队在这儿演出，我是付了钱的。’”

不过，琥珀摩特乐队键盘手摩根·费希尔^[85]的看法有所不同：“观众对皇后乐队的反应每晚都不太一样。一半的时间反应很好，另一半时间则很冷漠。”费希尔在侧翼观看着皇后乐队的表演。他认为他们肯定会成功，但他的想法也有所保留：“皇后乐队有别于其他的乐队。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太碧芭风了。不过他们很想要调动观众，感觉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当时整个乐队比后来要疯狂得多。就是这种狂乱让我有些厌烦。摩特当时已经出名，所以我们没必要全场都使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皇后乐队是全力以赴地想要成功，我有时觉得他们太用力了。”

这两支乐队乘坐同一个火车车厢去巡演，费希尔沉浸在一支成功乐队能享受到的那些福利中（“那些时候我喝得有点多”），取悦随行的痴迷观众。“我买了一本《古恩秀》^[86]的剧本，实在是很好看，我觉得我不能自己独享。所以我就站在车厢前面，把一整集都读出来。”他读剧本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皇后乐队太痴迷于工作了，他们需要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一下。”八年后，费希尔会成为皇后乐队巡回演出的键盘手。“我觉得是车厢的表演帮我获得了后来的那份工作。之后，弗雷迪也放开了，他的幽默让人眼前一亮。”

在利物浦体育场的演出之前，迈克·伯辛到后台探望了皇后乐队，他发现他的老主唱正在为不知道跟观众说什么而感到焦虑不安。利物浦之后会成为皇后乐队的忠实拥趸，但这次来的是摩特乐队的观众，他们自然会对一支突然冒出来的、穿着黑白绸缎衣服的伦敦乐队感到困惑。弗雷迪拿到一张《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上面有一篇利物浦足球队通过凯文·基冈攻入制胜一球取得胜利的报道。几分钟后他冲上台，冲着观众喊“好球，凯文”。“整场欢呼雷动。”伯辛说。

不过也不是每晚都很顺利。一个星期后，在伯明翰市政厅，莫库里闪亮登场之后，只听到一声响亮的回应：“滚你妈的犊子，你这个贱逼！”伯明翰这地方民风一向彪悍。几周前，洛克希音乐的暖场艺人在同一个场地进行演出，也被观众疯狂羞辱。唱作人里奥·塞耶打扮成小丑模样出现时，一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到一个男粉丝站在高层看台，对着塞耶的方向撒尿。慢慢地，皇后乐队的演出制服了暴动的观众，包括一些挤在舞台前方的摩特死忠粉。接着弗雷迪一个高踢腿动作没做好，一屁股摔到舞台上。主唱明显痛到喘气，但他装作这是表演的一部分，继续躺在地上唱完了歌。一个在场的人回忆说，“从那一刻起，弗雷迪又成了那些讨厌他们的观众的众矢之的。”最后遭遇终极侮辱——人群中突然扔来一个热狗，直接砸在歌手的脸上，香肠和番茄酱溅得到处都是。

值得安慰的是皇后乐队和摩特乐队相处得很好。尽管彼得·辛斯对他们的最初印象一般，但后来他的印象就改观了：“皇后乐队真的非常有自信，而且作为暖场乐队，他们确实能努力地争取想要的东西。他们那种华丽夸张的风格，绝对让我们没法把他们当摇滚乐队来看，但是他们的表演真的很有意思。”某晚结束演出后，乐队回到停车场，发现大巴积灰的车窗上被粉丝潦草地写了一句话：“摩特已死，皇后万岁。”

12月14日，乐队巡演到伦敦，在哈默史密斯音乐厅连演两场。由于公众的需求，第二晚的演出又增加了夜场。直到午夜，狂欢的人群都还没有散去，音乐厅的管理员不得不把大幕降下，当时摩特乐队还在台上扭动演奏。那天晚上皇后乐队的表演被认为是他们在巡演中的最佳表现之一。在这两场演出中，他们的观众人数加起来达到了破纪录的七千人，梅的父母哈罗德和露丝也在观众当中，甚至还一脸茫然地应粉丝要求签了名。

“和摩特一起演出的这次机会很棒，”莫库里说，“完成巡回演出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就英国来说，下一个明星乐队就是我们了。”然而，布莱恩·梅却在担忧：“我们在全各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应，心里想着，‘是啊，我们终于有进展了。’但同时我们的单曲和专辑根本上不了榜。”乐队急火攻心，而他们的公关却束手束脚。托尼·布莱斯比的一位同事说：“皇后乐队那时可能只是一支暖场乐队，但他们已经有了明星的心态。”

作为这一年工作的结尾，乐队在英国广播公司又录了一次音，再次在约翰·皮尔的《七十年代之声》节目中播出。除了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以外，他们还录了《食人魔之战》（Ogre Battle），一首叫人头脑发胀的重金属歌曲，即将在《皇后II》专辑中发布。不过这张专辑还要等上长长的三个月才会与公众见面。离新年前夜还有四天的时候，皇后乐队在利物浦的“头牌”俱乐部^[87]与老友相见，寻求慰藉。他们和当地的10cc乐队一起，为好日子乐队^[88]进行了暖场，这是迈克·伯辛和肯·泰斯蒂的新乐队。

也许皇后乐队此时只能在脑海里把自己想成明星，但某个乐队之外的人也适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米克·洛克一直在思考如何拍《皇后II》的封面，他找了一系列照片，其中一张是女演员玛琳·黛德丽在1932年的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中的剧照。照片里，黛德丽的眼睛看向上方，脸上呈现出庄重高贵的表情，像蜘蛛腿一样张开的双手交叉扣在肩膀上。也许皇后乐队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但他们模仿后拍出来的照片却非常有明星气。米克在琥珀摩特乐队的巡演后台抓到了皇后乐队，他挥舞着照片喊：“快看！我知道一定就是这张了！”皇后乐队的其他三个人正目瞪口呆，莫库里却很开心。他只是简单地地下了一条指令：“我来做玛琳。”

[1] Old queen，英国人对妖娆、爱打扮、可能有同性倾向的男子的戏称。

[2] C. S. Lewis，被誉为西方奇幻文学之父，以《纳尼亚传奇》闻名于世。

[3] 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宙斯与女神迈亚所生的儿子，罗马十二主神之一。水星以这位神的名字命名。为作区别，本书将Freddie Mercury的Mercury译作“莫库里”。

[4] 此处布莱恩在采访中口误，说歌词为“墨丘利神之母亲，你对我做了什么”。

[5] Deed Poll，单务契约，单边契据（由一方签立，尤为更改姓名）。

[6] 英文名为“No Joke”。

[7] 英文名为“Conviction”。

[8] 英文名为“The Alan Parsons Project”。

[9] 英文名为“Earth”。

[10] 英文名为“Coffin Club”。

[11] 英文名为“Black”。

[12] 传说中墨丘利头戴翅帽，脚穿飞鞋，手持顶端有一对天使翅膀的神杖，日行千里，穿梭如飞。

[13] 英文名为“Samarkand Hotel”。

[14] 英文名为“Greyhound pub”。

[15] 英文名为“Beatstalkers”。

[16] 英文名为“Kensington's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17] The Cavern Club, 有“天下第一俱乐部”的美称, 1957年作为爵士俱乐部开张, 六十年代起作为披头士乐队早期常年驻唱的酒吧俱乐部, 声名鹊起。虽已经几易其址, 但今天仍在营业, 依然位于利物浦马修街。因许许多多著名歌手和摇滚乐队都在这里表演过, 成了全球摇滚乐迷必去的朝圣地之一。

[18] 英文名为“Market Hotel bar”。

[19] 英文名为“Ewell Technical College”。

[20] 英文名为“Crushed Butler”。

[21] 英文名为“Tiger”。

[22] 英文名为“The Glitter Band”。

[23] Mott The Hoople, 下文简称时作摩特乐队。

[24] 英文名为“The Pretty Thing”。

[25] Liza Minnelli, 全能型女艺人, 集歌剧演员、歌手、演员、主持人等于一身, 获得过奥斯卡奖、托尼奖、艾美奖、格莱美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

[26] 洛·史都华曾为杰夫·贝克组合的主唱。

[27] 英文名为“Hornsey Town Hall”。

[28] 英文名为“Kingston Polytechnic”。

[29] 英文名为“Iron Butterfly”。

[30] 英文名为“Foreinger”。

[31] Chelsea College, 后并入国王学院。

[32] 英文名为“Francis' Private Hospital”。

[33] 英文名为“Norwich Union Building Society”。

[34] 英文名为“Langmore Junior School”。

[35] 英文名为“Gartree High School”。

[36] 英文名为“Woodbank private school”。

[37] 英文名为“Scarborough College”。

[38] 英文名为“The Opposition”。

[39] 英文名为“Enderby Co-operative Hall”。

[40] 英文名为“Beauchamp Grammar School”。

[41] 英文名为“The Glen Sounds”。

[42] 英文名为“Leicester Casino”。

[43] 英文名为“De Montford Hall”。

[44] 英文名为“Argent”。

[45] 英文名为“Wishbone Ash”。

[46] 英文名为“Tregye Country Club”。

[47] 英文名为“Hawkwind”。

[48] 英文名为“Thin Lizzy”。

[49] Cecil B. De Mille, 美国导演和制片人, 被公认为美国电影业的奠基人之一, 一生拍过七十部电影, 既有默片也有有声影片, 影片类型丰富, 以宏大的叙事场景和成功的商业运作闻名于世。弗雷迪说过: “我们的音乐就要像塞西尔·B. 戴米尔的电影一样宏大。”

[50] 英文名为“Stockwell Manor”。

[51] 英文名为“Van Der Graaf Generator”。

[52] 英文名为“The Nice”。

[53] 英文名为“Ship pub”。

[54] 西文名为“La Chasse”。

[55] 英文名为“Bedford College”。

[56]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臭名昭著的黑帮双胞胎兄弟。

[57] 英文名为“Deaf School”。

[58] 英文名为“Eric's”。

[59] 英文名为“Echo”。

[60] 英文名为“The Bunnymen”。

[61] 英文名为“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62] 英文名为“Star Café”。

[63] 英文名为“Friars club”。

[64] 英文名为“Home”。

[65] Diana Ross, 六十年代摩城唱片组合The Supremes的主唱, 后发展为独立歌手、演员, 事业成功, 荣誉等身。此时皇后乐队还名不见经传, 她已经是大明星了。

[66] Dearie和弗雷迪的口头禅“亲爱的”(dear) 发音相近。

[67] 拉里·卢勒克斯(Larry Lurex) 与加里·格利特尔(Gary Glitter) 不仅读音相近, Lurex也是金属丝织物的意思, 正好与Glitter(华丽闪耀) 意思相近。

[68] 英文名为“Headstone”。

[69] 英文名为“Rare Bird”。

[70] 英文名为“Pheasantry pub”。

[71] 英文名为“Love”。

[72] 英文名为“The Doors”。

[73] 英文名为“Lindisfarne”。

[74] 英文名为“Sparks”。

[75] 英文名为“The Sweet”。

[76] 英文名为“Roxy Music”，也是著名的华丽摇滚乐队。

[77] 英文名为“Hand and Flowers pub”。

[78] Hermann Hesse，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

[79] Tate Britain Gallery，位于伦敦，前身是英国国立美术馆，主要展出英国当之前的艺术品和画作。现在泰特在英国拥有四所艺术馆，两所在伦敦，一所在利物浦，一所在康沃尔。

[80] 英文名为“Vinegar Joe”。

[81] 英文名为“Golders Green Hippodrome”。

[82] 英文名为“Le Blow Up club”。

[83] 英文名为“Manticore Studios”。

[84] 英文名为“Emerson, Lake & Palmer”。

[85] Mogan Fisher，此摩根并不是和蒂姆·史塔菲组团的那个摩根·费希尔（Morgan Fisher）。

[86] The Goon Show，英国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广播喜剧。

[87] 英文名为“Top Rank”。

[88] 英文名为“Great Day”。

第五章 那帮蠢货们

你的梦想是？

约翰·迪肯：“湿的屌。”

布莱恩·梅：“人与人之间的充分理解。”

罗杰·泰勒：“富有、出名、开心、受欢迎。”

弗雷迪·莫库里：“永远都是那个非凡的、性感的我。”

——1975年，皇后乐队回答日本音乐杂志的问题

“滚回英国老家去，你们这些娘炮！”人群反应越发激烈，这一句可能还不算最难听的。皇后乐队曾经面对过野蛮的观众，但还没在离家3万英里的地方有过这样的遭遇。1974年1月28日，乐队飞到澳大利亚，在桑伯里摇滚音乐节（Sunbury Rock Festival）上首次亮相，这个为期三天的音乐嘉年华在墨尔本的一片630英亩的农场上举行。不知怎的，皇后乐队被安排到星期六傍晚时分上场，而且底下的观众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是一连串的误会造成的。”多年后，布莱恩·梅轻描淡写地说。

桑伯里音乐节于1973年推出，由喜剧演员保罗·霍根主持，他后来因喜剧电影《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而出名。1974年时，音乐节的演出名单上都是些当地明星，如巴斯特·布朗，酷老爹乐队^[2]和茜草色乐队^[3]；虽然这些乐队在澳大利亚以外不出名，但在本土都有着强大的知名度和忠实的粉丝群体。由于皇后乐队一贯对细节十分注重，他们带了自己的灯光装置过去，并坚持让自己的团队操作，这立刻引起了当地工作人员的不满。为了达到灯光装置的最佳效果，皇后乐队尽力要求天黑之后再上台，这又得罪了其他的乐队。

最后，皇后乐队和澳大利亚的酒吧摇滚乐团茜草色乐队都想在落日时分上台，双方发生了争吵。两个乐队的演出工作人员抢着同时装设备。“澳大利亚的舞台人员不高兴了，和我们的演出工作人员打了起来。”梅说。很快节目主持人也介入了这场争端：“各位，你们是想看一群英国混蛋，还是澳洲摇滚乐团？.....我们这来了一些英国混子，他们可能啥都不会。”虽然皇后乐队遭到敌对，但至少有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澄清说，他们并没有被嘘下台，甚至还返场了一次。下台之前，莫库里大声宣布：“我们再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

回到英国后，来自音乐媒体的一些好消息给了他们些许慰藉。虽然遭到种种批评蔑视，皇后乐队仍被《新音乐速递》的读者提名为“最具潜力乐队”第二名（次于荷兰摇滚乐队金色耳饰^[4]，这支乐队在去年有一首大热单曲《无线电波的爱情》[Radar Love]），以及《声音》（*Sounds*）杂志评选出的最佳新乐队第三名，前面两名是苏格兰摇滚乐

队拿撒勒^[6]，和苏格兰流行乐队蓝色^[6]，后者签的是艾尔顿·约翰的火箭唱片公司（Rocket Records）。

2月19日，大卫·鲍伊的一次缺席为皇后乐队提供了机会。当时鲍伊的单曲《叛逆叛逆》（Rebel Rebel）的宣传视频还没有准备好，没法上《流行之巅峰》节目，制片人打给了罗尼·福勒。福勒为皇后乐队做宣传热情不减。传说中，他的宣传开销高达2万英镑；以乐队的名义请各类音乐界业内人士吃饭、喝酒，奉承拍马。空出来的这个位置，福勒推荐了皇后乐队，尽管此时他们的下一首单曲《七海雷耶国》还未发布。

《七海雷耶国》的歌词中，莫库里的歌声仿佛是一位赤裸的复仇之神，对抗着吉他和钢琴的狂啸。出乎意料的是，这首歌的结尾用了1907年的歌曲《我想来到海边》（I Do Like to be Beside the Seaside），是一首音乐厅演出的标准合唱曲，皇后乐队的版本迷离又独特，临时组建的合唱团中混着肯·泰斯蒂的声音。这也首次出现了后来皇后乐队专辑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弗雷迪和我都是听着收音机长大的，”梅后来告诉《魔力》杂志，“我们都听过一个节目，星期六早上的《麦克叔叔的童谣精选》（Uncle Mac's Children's Favourites）。这个节目播过《大象奈莉》（Nellie the Elephant），《爱笑的警察》（The Laughing Policeman），还有曼托瓦尼的轻音乐。节目里那些新颖的歌曲，大人们听的变化丰富的音乐，很受孩子们欢迎。所以我们脑海里时常回荡着这些旋律。”

根据当时的百代电台推广人、后来成为足球经纪人的埃里克·霍尔说：“弗雷迪说，‘我不要上《流行之巅峰》，垃圾节目。’”但乐队的其他成员说服了他。根据音乐家协会的不成文规定，《流行之巅峰》节目的规则是所有乐队都必须重新录制歌曲，镜头前对口形假唱。皇后乐队去了巴特西，在谁人乐队的蓝帕特录音室（Rampart Studios）录《七海雷耶国》。霍尔知道乐队向来细致，对此事又十分烦躁，他称自己已经偷偷把歌曲的原始版本交给了录播代表：“那人完全蒙在鼓里。”

残骸乐队前鼓手理查德·汤普森在录音室里目睹了弗雷迪的花招。“弗雷迪在录音室里不停弄这弄那，等着那家伙走。他对我说：‘我们不会真的录下来的。但是我们装着很努力的样子，他会以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制作呢。’”

两天后，《流行之巅峰》节目播出了皇后乐队的电视处女秀。那天晚上，肯辛顿大街上的路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有一群长发青年挤在

一间已经关门的电器商店前。那是皇后乐队的小团队，望着商店橱窗里一台电视机，等着看他们自己。“他们是在蓝幕前拍的，”理查德·汤普森记得，“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前方有一群跳舞的人，那是电视台的人加进去的。”

三叉戟迅速做出十张未打标的《七海雷耶国》，赶紧送去英国广播公司。罗尼·福勒的天价应酬有了回报。不过，单曲刚一播出，莫库里就听出来用了错误的版本，命杰克·内尔森立刻去电台取回所有的唱片，替换成正确的版本。如理查德·汤普森所说：“弗雷迪有种远见，他一定要对的东西。”付出有了收获，《七海雷耶国》一上榜便拿到第四十五名的成绩。罗尼·福勒完成了使命。当他跳槽去伊莱克特拉唱片公司时，当年皇后乐队的宣传开销故事正式成为业界奇谈，被戏称为“斯皮尔伯格式的科幻大片”。

皇后乐队的团队里，热衷于花百代公司钱的不止福勒一个人。随着演出预订的增多，莫库里决定要给观众带来一些视觉上的冲击。百代的艺人开发部总监鲍勃·默瑟常常公费请他们吃饭（“他们需要吃点好的，因为他们总是穷得一文不名”），但弗雷迪打电话来要求单独见他的时候，他有点不安。“我有种大事不妙的感觉，”他承认说，“但他不是自己来的，还带了一个人，是女装设计师桑德拉·罗德斯。”

桑德拉·罗德斯当时是一名三十四岁的时装设计师，喜欢采用大胆前卫的纺织面料。1969年她在富勒姆路上开了一家精品服饰店，备受好评，离肯辛顿市场只有几英里远。目前，皇后乐队的舞台服装都是由温迪·埃德蒙兹和弗雷迪本人负责设计。自从发现桑德拉·罗德斯为马克·波伦^[4]设计的一些作品之后，皇后乐队便邀请她为他们下一次巡演设计服装。

“和桑德拉的会面很愉快，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聊天，”默瑟解释道，“最后弗雷迪让桑德拉先走，他和我私下交谈。我说：‘你看，我们花了不少钱才让你们跟摩特乐队去演出——这次又要多少？’弗雷德说：‘5000英镑。’我说：‘真他妈见鬼了！’但他太有说服力了。最后，我同意了，部分原因是为了能把他请出办公室。但我也让他想办法开发票给我，名目写点其他的东西，别写什么‘新袍子’。”

罗德斯记得，莫库里和梅在伊林制片影棚（Ealing Film Studios）进行演出排练时，常在排练间隙来到她在帕丁顿的工作室。莫库里尤为特别。“在为女士们量身定做了那么多礼服后，为男性设计服装的感觉很

奇妙，”她说，“弗雷迪会把衣服比在胸前，满屋子荡来荡去。和他一起工作非常有趣。”最终，二人选中了一组男女混穿的束腰长衫（“很有希腊风情。”摄影师米克·洛克回忆说），有两大片丝绸蝙蝠袖。成衣交付的那几天，莫库里穿着他的服装，米克·洛克又为他拍了一组照片。

“弗雷迪让布莱恩穿那套衣服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克里斯·史密斯说。史密斯在巡演之前去了一趟肯辛顿市场，看到弗雷迪穿着他的新舞台服装站在摊位后面，手臂张开呈现一种耶稣的姿势，有个女人跪在下面弄着褶皱的翅膀。“她站起来，原来是桑德拉·罗德斯，”他说，“这时弗雷迪戏很足地叫道：‘布莱恩也有一套哦。’”对克里斯和蒂姆·史塔菲来说，这让他们再次回想起已经退出的世界：“我跟蒂姆说，‘咱们不用穿这种服装，你会不会觉得挺庆幸的？’”新的巡演也意味着弗雷迪盘踞肯辛顿市场的时代结束。因为现在他太忙了，忙着当明星。

虽然巡演已定，但新专辑还没有影子。1月，响应英国煤炭工业工会的要求，英国政府实行了“一周三天限电”制度，限制电力的使用。这导致了《皇后II》专辑发布的第一次延误；第二次是乐队发现成品封套上有拼写错误（值得庆贺的是，“迪肯·约翰”还原成了约翰·迪肯，在皇后乐队今后的生涯中不会再变动）。这位皇后乐队的贝斯手在专辑发行和巡回演出即将到来之际，也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在录音室里电子工程师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年后，迪肯告诉一位采访者，“但是我要和皇后乐队在一起，走多久是多久。”

《皇后II》终于在3月8日发布，此时他们从布莱克浦冬园^④开始的巡演已经进行了一周。被罗伊·托马斯·贝克称为“不知疲倦”的皇后乐队的这份作品正式公之于众。歌曲《白皇后（情之所起）》（White Queen [As It Began]）和《食人魔之战》已经在现场表演过，后来又在三叉戟进行了重制。这张专辑在前一张的基础上再次升级，具有更紧密的内在联系，一首歌中的意境和听觉刺激会延续到下一首。他们采用了一种先锋的做法，唱片胶片做成了一面白一面黑。由梅作曲的伤感情歌《某日一天》（Some Day One Day）封装在白面；莫库里的哥特大作《黑皇后进行曲》（March of the Black Queen）则放在黑面。第一张专辑中祭出处女作《现代摇滚》（Modern Times Rock 'n' Roll）的泰勒，在这张专辑中创作了《最终输家》（Loser in the End）——可能是专辑中较弱的歌曲之一——其中地震般的鼓声是对齐柏林飞艇的约翰·博纳姆的致敬。“英国有了谁人和齐柏林飞艇，就有了世界上最好的两支摇滚乐队。”他宣称。

《皇后II》专辑以《七海雷耶国》的完整版本结束。不过莫库里那首令人倍感惊奇的《仙女费勒的神来之笔》似乎成了黑面的主打；他对理查德·达德同名画作的迷恋最终让他写出了同样壮丽非凡的音乐作品。专辑的插页中称赞联合制作人贝克演奏了“技术精湛的响板”，并强调“没有使用任何合成器.....再说一遍”。米克·洛克拍摄的乐队群像典雅高贵，作为这张专辑的封面简直不能更适合了。

本质上，皇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里回响着谁人乐队的《汤米》，齐柏林飞艇的第四张专辑，以及更早的亨德里克斯、漂亮东西乐队、“是”乐队和杰斯罗·图尔乐队^[4]；所有那些三年前在轮渡路公寓里，每个醉酒嗑药的夜晚响起的音乐声。然而，许多评论家抓住这些效仿痕迹不放。在美国，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销售已趋于稳定，《滚石》杂志对第二张给予了不温不火的赞赏，同时批评这张专辑很多方面都“不如创世记乐队那般高明和复杂”，并说它“借用了‘是’乐队最叫人厌烦的风格元素”。在英国本土，《唱片镜报》形容它为“华丽摇滚的渣滓.....如果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光明希望，那么我们的摇滚乐正在自取灭亡”。批评的声音自然听得刺耳。“我们在这张专辑上花费了许多工夫，也许实在太多了，”罗杰·泰勒那时说，“它一下子收到那么多的差评，我把它带回家听了一遍，然后想：‘天啊他们当真的吗？’我们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对于这些音乐媒体来说，接受皇后乐队的最大障碍，也许是《唱片镜报》声称的“这个乐队的形象太夸张了，音乐紧跟其次”。现实中，莫库里执着的性格驱动着《皇后II》的创作。“我们就这么四个人，要唱如此多的声部，弗雷迪却似乎压根没为这事烦恼过，”泰勒说，“我们真的在努力突破录音室里能做的事情的极限。”但是，皇后乐队那些由罗德斯设计的华丽服饰，以及他们执意把控所有宣传照的拍摄与发布，有时会正中评论家的下怀。弗雷迪在一份出版物中抓到一张未经同意就刊登的乐队照片，他逮到了作者：“你瞧瞧我的手臂看起来有多粗！”他抗议道，“我的手臂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之后，皇后乐队巡演中的一次试音环节被推迟，因为莫库里最爱的银蛇手镯丢了。直到找到手镯，试音才继续进行。

至少在巡回演出上，乐队的努力不会白费。但是第二天晚上在艾尔斯伯里的修士酒吧，出现了后来发展出大问题的前兆。演出时，布莱恩·梅感到手臂疼痛，弹奏吉他时有些不便。1月份乐队飞去澳大利亚参加桑伯里摇滚音乐节之前，他曾接受过疫苗注射。梅的右臂肿了起来。原

来注射的针头没有消毒，他感染了坏疽。虽然可以治愈，但随着巡回演出的推进，感染会进一步影响吉他手的健康。

3月3日，在普利茅斯会馆^[40]，皇后乐队的演出由纳茨乐队^[41]开场，这是一支来自利物浦的硬摇滚乐队，同样倾向演奏大量高分贝吉他连复，主唱是有着长卷发的戴夫·劳埃德，长得像是罗伯特·普兰特的复刻版。两个乐队之间有着双重联系：纳茨乐队刚刚发行的处女专辑是由约翰·安东尼制作的，而乐队成员正好来自默西塞德郡，和弗雷迪的老乐队野山羊是旧相识。据纳茨的贝斯手基思·穆霍兰德说，布莱恩·梅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我听说你们很摇滚。”穆霍兰德和纳茨的鼓手约翰·梅莱特在普利茅斯舞台的侧翼观察皇后乐队。“我们看着弗雷迪，想道：‘好吧，他真会搞事情。’”穆霍兰德说。随着演出的继续，“事情”也越搞越大，“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天马行空”。

就像之前的野山羊乐队一样，纳茨乐队在音乐和舞台表演的风格上比皇后乐队普通。戴夫·劳埃德这么描述道：“皇后乐队看起来非常敏感纤细.....而我们四个都是粗糙耿直的利物浦人。”基思·穆霍兰德注视着弗雷迪在试音时随口演唱《白皇后（情之所起）》，在乐队的小钢琴上进行即兴奏乐。基思既被主唱的音乐才华所震撼，又被他的浮夸所逗乐。“弗雷迪是个相当腼腆的人，”这位贝斯手说，“但也非常戏剧化。总能听到他说‘哦，是的，亲爱的’。他绝对与众不同。”通过野山羊的演出工作人员杰夫·希金斯的介绍，关于弗雷迪有多么与众不同，纳茨乐队已经被提前教育过了。“杰夫跟我们讲过弗雷迪那条压皱的天鹅绒喇叭裤的故事，”穆霍兰德说，“正常人都是找条裤子穿上整理下就行了。但杰夫说，弗雷迪会长久地站在镜子前，确保裤缝全部抻直。”

“那次巡演中途，纳茨乐队回了一趟家，”肯·泰斯蒂回忆说，“那时他们开始告诉我弗雷迪表现得有多像同性恋，我并不相信。我说：‘那是你们不认识玛丽·奥斯汀’。但戴夫·劳埃德说：‘肯，信我这次。’”基思·穆霍兰德不记得当时具体情况了。“我认为女性可能比男性更早发现这种事情。他没有‘出柜’，但他可能已经有点‘透明柜’了，”他笑了，“我们才不在意，我们都喜欢他。”

这次巡回演出既有着舞台上的高潮，也有舞台下的低落。在切尔滕纳姆市政厅^[42]演出后，皇后乐队解雇了他们的灯光工程师。三叉戟找来艾尔顿·约翰的灯光大师詹姆斯·达德接管，但在整个巡演中，他们的照明设备仍然处于难以驾驭的状态。在克罗伊登的灰狗酒吧演出后，莫库里相信自己“已经崩溃，太累了”。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新音乐速递》的

一位记者，他因为生气向随行人员扔了一个玻璃杯，还有一天晚上在更衣室里，泰勒的发胶喷到了梅脸上，鼓手和吉他手“爆发一场大战”。

不过，尽管弗雷迪喜欢在巡演中上演这种被某位工作人员称为“垂死天鹅的戏码”，但在真正面临逆境时他总会保持乐观。到达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13]时，巡演人员发现那其实是一场学生舞会，一支钢鼓乐队已经被先预订了，皇后乐队要等午夜过后才上场。戴夫·劳埃德在酒店遇到莫库里，开始抱怨时间。“弗雷迪只是说：‘噢，戴夫，你真是叽歪。今晚我们会表现得很好的。’”

随着《七海雷耶国》和《皇后II》在榜单上爬升，这次巡演时机刚好，弗雷迪回忆说，“突然之间，一切都升级了”。在诺福克郡乡村和埃塞克斯郡坎维艾兰的小演出开始变得有些大材小用，不少场馆经理人当场来问乐队是不是可以接受预订，演唱他们的热门单曲。斯特灵大学^[14]的演出便体现了规模上的改变。“那个场地可以容纳五百人，”基思·穆霍兰德说，“《七海雷耶国》上榜后，推广方售出的票子超出了容纳人数。我们一走上舞台，就感受到了众人的巨大热情。然后我看到这些人从场子的酒吧那儿回来，手里都拿着7品脱的大听啤酒。这事情组合在一起就麻烦了。”

穆霍兰德甚至可以感觉到舞台在动，因为众多身体合力在推挤它。同时间，巡演工作人员蹲在后面，支撑着音箱不要倒下。皇后乐队刚出现，一罐啤酒就飞向舞台。“弗雷迪用他的麦克风支架，像打棒球一样，”穆霍兰德说，“把它打回了人群。”之后，啤酒罐如冰雹般砸落在舞台上。再后来，最后一次返场后观众仍然拒绝离开会场。皇后乐队在后台设置障碍物保护自己，叫了警察，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歌迷和巡演工作人员都有受伤。

原定第二天晚上在伯明翰芭芭丽娜俱乐部^[15]的演出被推迟。一周后，巡演到达马恩岛的道格拉斯丽都宫^[16]。演出结束后的派对在酒店举行，聚满了一屋子精神亢奋的人。喝过一些让人冷静下来的饮料之后，穆霍兰德开始清晰地意识到皇后乐队对待这个行业的方式是多么不同。“有一晚我们和弗雷迪聊天，他解释了他们为何不让唱片公司来后台，以及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如何保护乐队的每一位成员，”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回头看，他真是懂行。其他乐队是不会这么想的。”

为期四周的巡演将于3月31日星期天在伦敦彩虹剧院^[17]结束。这个位

于芬斯伯里公园可容纳三千五百人的场馆，正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在1967年首次点燃吉他的地方。摩城唱片的“从神童到放克巨星”的史提夫·汪达几周前也在这个剧院演出。下午试音时，弗雷迪又发了一通脾气。基思·穆霍兰德记得很清楚，这场争论始于泰勒对舞台服装的选择：“罗杰穿了那天晚上弗雷迪想穿的上衣。弗雷迪大发雷霆，麦克风一扔就冲了出去。我想他可能是走到车里去坐着了。布莱恩把麦克风音量开大，哄道：‘弗雷迪，亲爱的，快回来啦，你这老皇后。回来我们做试音吧。’”现在回想起来，一件衬衫的争吵可能是为了掩盖更大的问题。尽管在舞台上无所畏惧，但戴夫·劳埃德回忆说，在普利茅斯第一次演出前，他曾看见弗雷迪很难受。基思·穆霍兰德也记得：“他在演出前确实很紧张，紧张到呕吐。不过每个人在演出之前都会经历各自的状况，有他们自己的方法。”

然而一到晚上上台，莫库里便藏起了所有紧张的迹象。这是目前为止皇后乐队作为主乐队最大的一场演出，主唱选择在这场演出中，首次穿着桑德拉·罗德斯设计的翅膀袖束腰外衣亮相。演唱《大鼠王》《活出精彩》《骗子》时，莫库里迈着他惯常使用的捕食式猫步，从舞台的一边滑到另一边，贴到布莱恩·梅身边甩动头发，又跑到约翰·迪肯旁边做同样的动作。在梅进行吉他独奏时，弗雷迪从舞台上消失更换衣服，重新出现时他穿着胸前深V开口的黑色上衣（也许，是泰勒穿走他的第一选择后的备选服装），结束表演时，他把一束束鲜花扔向观众。

“他是个令人着迷的表演者，”《流行音乐周刊》的科林·埃尔文写道，“是成为偶像的材料。”但像其他人一样，埃尔文也接受不了莫库里那种疯狂的表演。那天晚上，约翰·安东尼站在侧翼观看，他看出了主唱的紧张。“弗雷迪越来越慌，”他回忆道，“他走到舞台边上，我念着‘冷静点，弗雷迪，冷静点……’鼓励他。我说：‘弗雷迪，今晚你看起来就像尼金斯基^[18]，可他妈高贵了。’他说，‘哦，谢谢你，约翰小妮妮。’”演出结束后，在后台，莫库里得到了目前为止最好的赞誉。“彼得·汤申德的弟弟西蒙来看演出了，”安东尼说，“十三岁的小汤申德被击中了。他对弗雷迪说：‘你们比我哥的乐队好多了。’弗雷德欣喜若狂。”

在芭芭丽娜俱乐部的演出被重新安排到彩虹剧院后两天举行，成为巡演的终场。这家位于伯明翰坎伯兰街上的俱乐部后来成为朋克和新浪漫主义兴起时的热点。芭芭丽娜的舞台有一个T台，表演当晚，莫库里好好地利用了一番。当主唱又一次昂首阔步地朝着人群走去时，戴夫·

劳埃德和几名皇后乐队工作人员跟在他身后，在舞台上疾驰而过。起因是罗杰·泰勒跟纳茨的主唱和团员赌一瓶香槟，看他们敢不敢在皇后乐队表演时裸奔。“然后他们赤身裸体地跑到舞台上，撅起屁股冲着观众，”基思·穆霍兰德记得，“弗雷德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转身来看。后来他说，他就知道不对劲，因为‘这是第一次，观众竟然没在看我！’”

到4月时，《七海雷耶国》冲到了第十位，《皇后II》达到第五位，顺带着首张专辑也回到了前五十。但此时他们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皇后II》在美国发布，并进入了榜单的前五十名，乐队将会跟琥珀摩特乐队到美国进行巡演。做过主乐队之后，再重新给另一支乐队做开场多少有点不开心，但想想能够去美国，又是和摩特乐队重聚，也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

巡回演出于4月在科罗拉多丹佛的瑞吉斯学院^[19]开始，接着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连续演五场，场地多为大学场馆和市政剧院。不到一个月前的英国巡演中，皇后乐队的忠实观众会在最后一首歌结束后，自发地唱起英国国歌^[20]。但来到美国，在俄克拉荷马，就不能期待有这样的回应了。摩特乐队的伊恩·亨特可以感受到莫库里的不耐烦。“他不明白，为什么皇后乐队没有立刻大受欢迎，”亨特说，“我记得他走来走去，说：‘为什么那帮蠢货们就是感受不到呢？’但美国跟英国不同；你得多巡演几次才行。”

4月26日，巡演抵达波士顿。当地乐手比利·斯奎尔后来会成为红极一时的独立歌手，并在1982年皇后乐队的美国短途演出中作为嘉宾出场。1974年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在自己的乐队响尾蛇^[21]里担任主唱。“当时我认识我们这里WBCN电台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DJ，马克安妮·萨托利，”斯奎尔说，“她是美国最早播放皇后乐队首张唱片的DJ之一。”斯奎尔借着萨托利的关系，被邀请参加了一次有皇后乐队在场的唱片公司晚宴。比利已经观摩和听过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并惊叹于弗雷迪那些涂着指甲油的照片。在餐厅里，他将会直观地感受到莫库里有多么注重形象。

“我正好坐在弗雷迪旁边，”斯奎尔回忆道，“他穿着一条白色绸缎裤子，非常紧身，搭配一件织锦夹克。我脑海里还有那个画面，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他偷偷地环顾四周，似乎在确认没人看他，然后悄悄解开裤子落座。我才意识到他的舞台服装其实让他很难舒服地坐下来。”

斯奎尔后来的经理是比尔·奥库安，他的客户包括吻乐队^[22]，这支以脸部涂着漫画般油彩著称的乐队也在那年夏天见证了皇后乐队随摩特乐队的演出。他们逐渐拥有了特定的观众。“皇后”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在不走寻常路的美国音乐界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布莱恩·梅回忆说：“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离经叛道了，但在美国碰到的很多人，连我们都感到惊讶——有那么多穿着异性服装的艺术家，比如纽约娃娃乐队^[23]，安迪·沃霍尔——这些人的新潮似乎让过去的常规都形同虚设。”

对梅来说，就像之前来过的许多英国音乐家一样，皇后乐队的第一次美国巡演是一次“震撼三观的经历”。虽然这实现了他自小就有的梦想，但这种体验的强度也让他感到不安。“我还不懂得巡演的技能，”他承认，“我想，我更多是在挣扎适应，而不是顺其自然。我们可能看起来挣得盆满钵满——实际却捉襟见肘，酒店房间是合住的，能够去经理房间打电话回家都算是他请客。”

由于渴望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蜿蜒行进美国的演出中，皇后乐队和伊莱克特拉唱片通常都会在演出后举办派对。某个狂欢后的早晨，摩特乐队的键盘手摩根·费希尔目睹了摇摇晃晃、宿醉未醒的弗雷迪·莫库里，一脸栽进面前摆放的早餐煎蛋中。在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的农场体育馆^[24]，空中铁匠乐队^[25]作为第二暖场乐队，加入了演出名单。空中铁匠是一支反传统的华丽摇滚乐队，主唱史蒂芬·泰勒也是个摆造型高手。

两支乐队的经办人员很快就为谁先上台爆发了争吵。布莱恩·梅迫切想从吵闹中脱身，他和空中铁匠乐队的吉他手乔·佩里攀谈起来，乔顺手开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摩根·费希尔吃了一惊：“布莱恩总是那么绅士，我从来都没看过他酗酒。”结果到了演出时间，这两个吉他手都喝得醉醺醺的。梅后来称他在整场演出中完全凭记忆在弹吉他，发誓以后在演出前就算要喝也不能“超过1品脱啤酒”。皇后乐队的其他人却喜闻乐见，纷纷称赞他那天晚上的表演劲头十足、激情四射。梅又在心里默默记下：以后要“多做一些肢体动作”。

不过，吉他手的心里还装着其他事情。新奥尔良的一次邂逅，令他对路易斯安那城终生难忘，皇后乐队下一张专辑中，有一首歌隐晦地提到了在这里发生的那段浪漫缠绵的爱恋。“我在新奥尔良坠入爱河。”1998年，梅承认说。在这个远离伦敦，也远离女友克里斯蒂娜·马伦的地方，人们只知道布莱恩的新恋爱对象的代号是“蜜桃”。她的确被写入了《我既在此》（Now I'm Here）的歌词中，这首歌记载着他们第

一次美国巡演时的纯真与疯狂。

在纽约尤里斯剧院^[26]连演六晚，让琥珀摩特乐队成为第一支在百老汇演出且售罄的摇滚乐队。这些演出也让他们的暖场乐队有机会在全美最嬉皮的观众面前证明自己。约翰·安东尼正在加拿大，为“地狱天使”摩托车帮的一支名为北安大略天堂骑士的乐队^[27]当制作人（“也是种经历嘛”），他抽空前去纽约看望他的老队员们。这时候，争抢风头的感觉在皇后乐队和摩特乐队之间已经十分明显。“在尤里斯剧院，布莱恩穿了桑德拉·罗德斯的服装，”安东尼记得，“他们的做法是，当他弹奏大段的和弦并做出彼得·汤申德式的风车臂时，灯光师就知道要给他打一束追光灯，照出他绸缎上衣的褶皱影子。效果十分美丽。摩特的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点，他开始乱搞灯光操作台，所有灯光开到最大，让布莱恩的效果无法呈现。”制作人的火气就上来了。“于是我抓到那个家伙，拿了把晃眼的大手电筒直射到他脸上，叫他别碰灯光操作台。”之后，莫库里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一篇关于纽约演出的评论，这篇出自女性评论家之手的文章中“不仅说出了我的宗教信仰.....连我没穿底裤都知道”，“这些人事无巨细到你屁股上的疙瘩都不会放过，亲爱的”。他对撰稿人卡洛琳·库恩说。

乐队接着去了波士顿，下一晚将在那里演出。但演出日早晨，酒店房间里的梅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动弹。他努力挪到浴室，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皮肤因为黄疸已经发黄。受感染的手臂、糟糕的饮食、熬夜和巡演的压力让他的免疫系统丧失了功能。梅患上了肝炎。皇后乐队立即飞回英国，吉他手遵照医嘱卧床休息六个星期。乐队的其他成员、工作人员，以及任何和梅有密切接触的人都接种了疫苗。莫库里回到英国，也得了病：不是什么“屁股上的疙瘩”，而是一肚子气。

《七海雷耶国》5月底作为单曲在美国发行，但由于乐队此时无法宣传，未能进入榜单。公关托尼·布莱斯比发了一篇新闻稿，表示皇后乐队对取消美国剩余巡演“感到苦涩的失落”，但乐队将会在7月初继续回录音室录音。梅在医院疗养期间，莫库里、迪肯和泰勒开始为下一张专辑构思。在皇后乐队待了三年后，迪肯终于摆脱了他所说的“局外人”的感觉。他后来告诉采访者，直到此时，皇后乐队开始录制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他才确信乐队会有笃定的未来。

新专辑将在多个录音室制作，包括伦敦的三叉戟、威塞克斯（Wessex）、艾尔（Air）、萨姆（Sarm），以及蒙默思郡的洛克菲尔

德（Rockfield），罗伊·托马斯·贝克和迈克·斯通再次共同担当制作人。梅的身体刚刚好转，就赶到洛克菲尔德录音室加入乐队，但他经常会离开录音间出去呕吐。8月，在三叉戟，他再次倒下，被送往国王学院医院，诊断出十二指肠溃疡，才知道是他青少年时期留下的病根。他接受了手术，再次被勒令住院卧床。此时他胡思乱想害怕“乐队要把我换了”，便开始躺在病床上写歌。

梅缺席的时候，迪肯证明自己也是个得力的节奏吉他手，同时弗雷迪频繁地去医院探望布莱恩，给他打气加油。但由于吉他手再次出状况，原计划推迟进行的美国巡演只能彻底取消。“布莱恩必须要照顾好自己，”莫库里担忧地对《新音乐速递》杂志说，“我们都要确保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等梅重回录音室，为赶上进度他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吉他部分、和声部分，以及数不清的叠录。“感觉很奇特，”他说，“因为我第一次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乐队，这让人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吉他手不在，录音变得零碎，但皇后乐队对下一张专辑有着清晰的想法。“《皇后II》非常有层次，但大众理解起来有难度，”梅说，“它太复杂了，以至于在制作下一张时，我们想最好还是做一张亲民一点，能讲清楚我们在做什么的专辑，这样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罗伊·托马斯·贝克对项目的理解也很简单明了：“好，让我们来搞几首热门大金曲。”

梅刚离开医院过来录音室的时候，正好碰上一首打磨中的“大热门”：《绝代艳后》（Killer Queen）。这首歌是莫库里的心血，配合着优美的钢琴，有着二十年代初诺埃尔·考沃德^[28]和科尔·波特歌曲作品的特征。“这是一首那种戴着圆顶礼帽，穿着黑色吊带裤唱的歌。”莫库里称，表明他受到心爱的电影《歌厅》中的另一些影响。曲中的内容眼花缭乱，既有充满力量的重金属和弦鸣奏，也有提到酩酊香槟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29]的歌词。

“我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写了《绝代艳后》，”莫库里说，“这是一首关于高级应召女郎的歌。尊贵优雅的人亦可以是娼妓。”写歌可能很快，但录音花的时间就长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梅一点都没有被他描述成“粗糙的和声伴唱”所打动；所有这些都必须重做。泰勒记得“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录，出来的音准必须完全正确才行”。有一晚，乐队吃过晚饭后，贝克要求莫库里回到录音室继续处理这首歌。“但是弗雷迪不肯，”这位制作人说，“他说：‘我坚决不离开这把椅子，亲爱的！’结果工作人员把他连人带椅子抬起来搬到钢琴前面。《绝代艳

后》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除了贝克和斯通，皇后乐队的录音师团队又多了两位新人：威塞克斯录音室的磁带操作员杰夫·沃克曼，一个冷幽默的利物浦人，他将会继续担任皇后乐队《爵士》（*Jazz*）专辑的工程师；以及东萨姆录音室的年轻助理工程师盖瑞·兰根。专辑成品中布莱恩·梅只贡献了四首歌，但其中的《布莱顿摇滚》（*Brighton Rock*）和《我既在此》都将成为皇后乐队歌单中的经典。两首歌皆在萨姆录音室完成，在那里盖瑞·兰根经历了与皇后乐队的初次合作体验。罗伊·托马斯·贝克现在成了调动乐队的专家，兰根亲眼看见：“罗伊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外向的人，”他说，“再看到他和弗雷迪·莫库里在一起……他可以用一种打击乐队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潜力。他会说：‘亲爱的，简直太差了。这么可怕的东西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他继续说道，“一天要做十四至十五个小时。可能从中午12点或1点开始，一直搞到凌晨3点，整个过程都是全神贯注的。这都是流血流汗的努力啊。”兰根记得《我既在此》里的那段一呼一应的唱段，需要用几台1.25英寸的磁带机，用不同的速度运转，使得“整个房间都在嗡嗡作响”。《布莱顿摇滚》的最终版本由兰根、贝克、斯通、莫库里、梅和泰勒挤在控制室共同监听，兰根说，那真是激动大叫“神了！”的时刻。

9月，看起来仍然体弱的梅和皇后乐队一起，在纽约演出之后首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为了庆祝《皇后II》唱片销量达到十万，乐队在伦敦皇家咖啡^[30]的宴会厅被授予银唱片。托尼·布莱斯比以他对拍照宣传机会的敏锐眼光，预订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特型演员简内特·查尔斯，让她为乐队颁发银唱片。一个月后，《绝代艳后》单曲在英国发布。这是一张双A面，另一面是新歌《轻抖手腕》（*Flick of the Wrist*），但最终只有一首能被电台播放。之后布莱恩·梅又开始对《绝代艳后》作为单曲发布产生疑虑，担心有的粉丝可能会觉得它太轻佻了。但是，如他后来承认的：“这首歌是个转折点。它成了大金曲，一如我们渴求的。”《绝代艳后》在排行榜上冲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性感流行偶像大卫·埃塞克斯的《我要把你变成明星》（*I'm Gonna Make You a Star*）。梅的疑虑打消了：“去他妈的！一击命中，金曲就是金曲。”

那个夏天，弗雷迪在艾尔沃思工艺的同学阿德里安·莫里希，在《流行之巅》节目中看到了演唱《绝代艳后》的皇后乐队。那个穿着假毛皮束腰上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弗雷德·保萨拉，他在“当”弗雷迪·

莫库里。“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这种形象，”莫里希说，“我知道他加入了一个乐队，但没想到他竟然都这么成功了。”就在同一天晚上，弗雷迪在狂热乐队的老队友布鲁斯·默里，正在伦敦南部的一家出租车办公室工作，他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等着叫单。“皇后乐队的这个主唱有点不对劲，”他回忆道，“虽然他已经留长了头发，但他身上有些东西让我感到熟悉……我突然认出来了：‘天哪，那是弗雷德·保萨拉。’我打电话给德瑞克·布兰切，说：‘你在看电视吗？快去把电视打开！’”

皇后乐队的第三张专辑《绝对心脏暴击》（*Sheer Heart Attack*），于11月1日发布，同时乐队开始准备他们本年度的第二次英国巡演。米克·洛克再次为他们拍摄了封面照片，但这次的照片与《皇后II》的风格迥异。“我们要看起来像孤立无援困在荒岛上的样子。”弗雷迪告诉他。洛克应承下来，他采用了俯拍，乐队平躺成一圈，他们的脸上和裸露的胸膛上涂了凡士林，并喷了模仿汗水的水珠。之后罗杰抱怨头发没拍好，便在最终的成片里给他做了接发的效果。虽然弗雷迪那必不可少的黑色指甲油仍然显眼，但比起之前，乐队的穿着没有那么花哨了，形象上也没有特别华丽了。“我们是在向人们展示，我们可不是一群没用的花哨基佬，”莫库里说道，“我们的才能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

封面的风格和装在里面的音乐相得益彰。这是目前为止皇后乐队最简洁的一张专辑。梅创作的热闹的《布莱顿摇滚》和《我既在此》分别是第一面的开场和结束曲，也是整张专辑中最长的两首歌曲。《布莱顿摇滚》里的音乐早在《皇后II》中就以某种形式或状态存在了，而且多重音轨的吉他独奏录音法，可以追溯到微笑乐队录制《哄骗》的时候。与吉他声不分伯仲的，是莫库里的高音女假声。《我既在此》把皇后乐队的美国历险记转化成了音乐，歌词中提到了琥珀摩特、布莱恩失落的爱人“蜜桃”，以及弗雷迪的劝导“加油，加油，小皇后”（go, go, little queenie），这是直接从查克·贝里那里借鉴来的。梅的另外两首作品《亲爱的朋友》（Dear Friends）和《她造就了我（穿细高跟的风暴兵）》（*She Makes Me [Stormtrooper in Stilettos]*）虽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却能从中窥见作曲家此时纷扰繁杂的心境。《亲爱的朋友》由梅弹奏钢琴，莫库里唱着这首爱与救赎的抒情诗；《她造就了我》当中，梅唱主音，在缓慢悠长的旋律里他恳求这个世界“治愈他的心病”。

甚至约翰·迪肯也被逼着写歌。贝斯手的处女作《熄火》（*Misfire*）是一首欢快的流行歌曲，以区区一分五十秒的长度被选入专辑中。泰勒不甘示弱，献上了他目前为止最棒的一首歌曲。《公寓谐

星》（Tenement Funster）是这位鼓手又一次大力歌颂摇滚人生，这类曲子他似乎永远也写不够。他赞美那躁动的音乐，“出色的吉他”和“我楼里的姑娘们”。但还是莫库里在《绝对心脏暴击》中绝对出类拔萃。

《轻抖手腕》作为一首狠毒的硬摇滚，可与第一张专辑风格并肩。乐队共同创作的《冰冷坚硬的疯狂》是一首狂热兴奋的重金属歌曲，源于弗雷迪在残骸乐队时候的灵感。与之相反，《神的旨意》（In the Lap of the Gods）是一首壮丽的摇滚歌谣（同名的重奏版歌曲是整张专辑的结束曲），歌曲中率先出现了《我们是冠军》里那种令人振奋的大合唱。值得一提的是，它一直在皇后乐队的现场表演中作为终场曲，将全场情绪调动至高潮，直到四年后，被效果更强烈的《我们是冠军》取代。

《绝对心脏暴击》里最奇特的歌曲也来自莫库里。《带回那个莱罗伊·布朗》（Bring Back That Leroy Brown）是一首杂耍表演般的大拼盘，梅弹奏了尤克里里班卓琴，迪肯使用了低音提琴拨弦，而主唱再次描绘出他童年记忆中，《麦克叔叔的童谣精选》里那些新奇歌曲留下的印象。“感觉我们可以尝试任何风格，”梅说，“而且完全不会感到任何不妥。”《铃兰》（Lily of the Valley）是一首精致的钢琴小调，暗示着作者内心的纷乱。二十五年后，布莱恩·梅给出了自己对这首歌的内容解读。“《铃兰》是绝对真情实感的作品，”他说，“那是（弗雷迪）望向他的女朋友，却意识到他的身体要走去不同的方向。”

1974年末，主唱仍与玛丽·奥斯汀同住，但当媒体提及任何关于自己私生活的问题时，他都熟练地以俏皮话一句带过（“我就如水仙花一样鲜艳^{blue}，亲爱的”）。他说正和司机处在暧昧关系中，他在玩“双性关系.....因为很好玩”。莫库里去世后，前百代电台推广人埃里克·霍尔曾开玩笑地宣称《绝代艳后》是脱胎于弗雷迪对他的单恋：“他说：‘我为你写了那首歌。我是皇后，你是那个绝代杀手，因为我无法拥有你！’”据霍尔说，这段对话发生在一间假日酒店，当时皇后乐队准备到卢森堡电台录音。“弗雷迪半夜里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爱上了我，能不能和我一起睡？”霍尔说。霍尔同意坐下来并“握住他的手”，但他坚称拒绝了莫库里的进一步要求，弗雷迪也接受了拒绝。

约翰·安东尼也表示，在皇后乐队第一次英国巡演期间，有一晚他曾被叫到弗雷迪的酒店房间中。安东尼乘坐乐队的巡演巴士从伦敦去桑德兰。某次演出结束后的晚上，皇后乐队在众多女粉丝的簇拥下一起回到了酒店。约翰上床睡觉后，电话铃声响起，那头是惊慌失措的弗雷迪，叫他马上到他的房间来。“弗雷迪坐在床上，穿着睡衣，戴着睡

帽，有两个女孩围着他站在房间里，”安东尼说，“弗雷迪说：‘把她们弄走，约翰小妮妮。’所以我跟她们说明天对弗雷迪来说很重要，他很累，她们最好先走吧。”当只剩他们两人时，莫库里跟安东尼说，他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并问他是否愿意替他告诉玛丽·奥斯汀。约翰没答应。

巡演第三晚，乐队到了利物浦帝国剧院^[32]，与今年第一次巡演时为他们开场的纳茨乐队短暂重聚。戴夫·劳埃德还在等着罗杰·泰勒兑现他赌输的那一瓶香槟，贝斯手基思·穆霍兰德加入了演出后的派对，与皇后乐队随行人员在酒店吧台喝酒。“弗雷迪的出场十分壮观，”穆霍兰德回忆道，“他显然在演出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冲洗过了，头发也重新弄了，非常贵气。我和布莱恩坐一张桌子，他在喝杰克丹尼，杰克·内尔森在斟香槟。我说了句：‘你们乐队越来越上道了啊。’杰克说：‘岂止上道？我们要直奔世界之巅。’”

借着《绝代艳后》的成功，《绝对心脏暴击》专辑在销售两周后就爬到了比《皇后II》的第五位更高的位置，摘得亚军（冠军位置被艾尔顿·约翰的《金曲精选》[Greatest Hits]所占据）。甚至有一些评论帮他们说话了。“一场听觉盛宴，毫不含糊，有四首歌完全可以单曲循环。”《新音乐速递》赞美道，特别称赞了《我既在此》《绝代艳后》《轻抖手腕》和《神的旨意》。

这四首歌现在都加到了乐队的演出歌单中，保留曲目是《食人魔之战》《骗子》，以及返场联合串烧曲目《挥金如土》《监狱摇滚》加《现代摇滚》。莫库里成功地运用舞台上越发大胆酷炫的表演，压下了任何演出前的紧张不安，“皇后乐队又回来了。你们怎么想？”在利物浦，他问观众。部分演出中，弗雷迪会穿一套白色舞台服装，左手佩戴锁链手套，如同一个华丽摇滚的驯鹰者。之后他会更换服装重新出现，从头到脚都穿黑色，左手戴黑色皮手套，手指尖带着鹰爪（“你们喜欢我的爪子吗？”）。当然了，舞台之下，乐队一如既往地斗嘴不停（“哦，亲爱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婊气的乐队，就喜欢互掐。”莫库里对《流行音乐周刊》说）。但在舞台上，他们有着令人敬畏的专注力，雄心壮志昭然若揭。

利物浦之后，在利兹大学^[33]的演出中，泰勒的监听器失灵了。回到更衣室，鼓手气得踢墙，结果脚伤得厉害，以至于被送到医院做X光检查。也在这场演出中，歌迷在台前扭打推搡，使得莫库里不得不暂停了一会儿。一周后，在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34]，主唱自己被拖进人群，还

好保安手快把他拽回安全区。

最后一场在伦敦彩虹剧院的门票售罄，他们又增加了第二场演出。两个晚上的演出都进行了摄录，原本计划出一张现场录音专辑，但未能实现，现场录像经过剪辑成片，一年后在影院中公映。这部《皇后乐队：彩虹现场》（*Queen Live at the Rainbow*）会在伯特·雷诺兹主演的犯罪片《活跃》（*Hustle*）前进行加映。^[35]它保存了一段优美的时代印记：记录着皇后乐队作为小众摇滚乐队的最后时光，之后，《波西米亚狂想曲》就要横空出世，永久性地改变他们的人生。

演出结束后，在彩虹剧院外面，弗雷迪·莫库里的司机递给他一张刚收到的纸条。是布鲁斯·默里递来的。“我设法通过司机给弗雷迪捎个信，”默里笑了，“透过车窗，我俩大眼瞪小眼。弗雷迪说：‘你他妈在这里干什么？’我大笑，说：‘我来这里见你啊，混蛋！’”

默里坐着莫库里的豪车，来到伯克利广场的一家俱乐部，两人自印度一别后第一次交谈。“他告诉我，他身无分文，”默里说，“他们做了这么多场演出，却没有拿到钱。”后来，默里在诺伯里的出租专车办公室上班时，接到过弗雷迪的电话。“他说：‘我得去参加一个聚会，但是我没钱，你可以载我去吗？’”一天晚上，默里开车送他的这位朋友去参加艾尔顿·约翰举办的派对。“弗雷迪说：‘来啊，进来吧……’但我谢绝了，那不是我的圈子。我不想成为名流的跟班。”

尽管皇后乐队的演出场场爆满，主唱在音乐媒体的版面上风光无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声。自1966年从艾尔沃思工艺学校毕业后，帕特里克·科诺利还未碰到过他的朋友弗雷德·保萨拉。一天下午，科诺利走过梅费尔的克拉里奇酒店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是弗雷迪在叫他。“他让我进去喝杯茶，”科诺利回忆说，“那天晚上皇后乐队在伦敦有一场演出。他的变化之大，令我感到惊讶。”在艾尔沃思时，帕特里克曾帮弗雷迪设计过乐队招募海报，还帮助他通过了艺术科A-Level考试，但由于他对流行音乐不感兴趣，竟完全没有关注到弗雷迪目前的成功。“我只好跟他承认说：‘弗雷迪，我真不知道。’他笑着说：‘噢，帕特里克，你是唯一一个不知道的人吧！’”

那一年，皇后乐队将再一次经历演出对象从忠诚粉丝到漠然路人的转换。11月，他们开始为期两周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加欧洲巡演。在慕尼黑的一场演出前，皇后乐队到达场地时，发现下面坐满了来自附近

美国空军基地的美国大兵。当时皇后乐队与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Lynyrd Skynyrd）交替做主乐队。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是一支来自美国南部的硬摇滚乐队，他们的《亚拉巴马甜蜜的家》（Sweet Home Alabama）一曲刚刚挤进美国榜首前五名。这支乐队完全就是皇后乐队的对立面，而且美国大兵很喜欢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我下台之后，感觉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天，”布莱恩·梅发着牢骚，“下面观众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仅观众的冷漠让人激情消退，两个乐队之间还感到了文化上的冲突。“我们四个化好妆，穿着很女性化的衣服粉墨登场时，斯金纳德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罗杰·泰勒回忆道。据泰勒说，皇后乐队演出时，斯金纳德乐队的唱片公司MCA的代表正在观众当中。“他们打一些条幅出来，写着‘好屎！’或者‘皇后乐队烂透了！’这种标语。”他回忆说。这难免让人想起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里的场景，里面那支虚构的倒霉摇滚乐队遇到了他们之前的暖场歌手杜克·费姆（Duke Fame），并讲到曾有观众“在我们上台之后还在嘘他前面的表演”。诚然，泰勒的回忆佐证了与大部分同时代乐队相比，皇后乐队的确独树一帜，也表明了乐队决心要证明“你们眼里这四个女里女气的男人其实是（斯金纳德的）实力派竞争对手”。

在汉堡参加了德国行第三场之后，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便退出了巡演。短短一周后，皇后乐队作为主乐队，演唱会开到了巴塞罗那六千人的体育宫^[36]。二十四小时内，票全部售罄，这也是目前他们做过的最大一场演出。

只不过，回到英国，乐队成员的银行存款和生活条件根本还未达到明星的水平。泰勒仍然租住在里士满邱园路一个靠河的单间。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租的公寓看起来地段很好，在肯辛顿荷兰路100号，但仅仅是看起来而已。弗雷迪的钢琴兼做他和玛丽的床头板，很是奇特。这对情侣在碧芭商店买的那些小摆设也不足以掩盖湿气的侵蚀、墙皮上的霉斑。迪肯准备结婚了，但他还在帕森斯格林租单间。更糟的是，迪肯向三叉戟请求借款4000英镑做买房的首付，被拒绝了。（“你知道1974年的4000英镑多值钱吗？”诺曼·谢菲尔德抗议道。）布莱恩·梅的生活条件似乎是最差的：他和女朋友克里斯蒂娜一起住在伯爵宫的合租单间。“我们基本上就靠袋装鳕鱼和冻鱼条生活，”他在2009年回忆道，“我们的煤气灶是单眼的，除了走廊上的公共浴室外也没有自来水。”更惨的是，据说走进家门时，梅还必须穿过这栋楼的地下锅炉

房。

这个时候，百代的鲍勃·默瑟让皇后乐队和哈博特尔和刘易斯律师事务所（Harbottle & Lewis）的律师吉姆·比齐取得了联系。比齐拿来皇后乐队与三叉戟签订的合同进行研究，开始寻找出路。默瑟自己同三叉戟的关系也变得棘手起来。“谢菲尔德兄弟跟罗伊·费瑟斯通有关系，他是乐队的签署人，”他解释说，“乐队跟他说‘我们希望你不再和谢菲尔德兄弟交涉’，这就引起了某种争端。罗伊觉得这是他签乐队的工作方式，到后来我和他在这件事情上硬碰硬地对着干起来。”

这边他们的律师正在抽丝剥茧地慢慢让皇后乐队从合同里解脱出来，另一边百代在1月发布了《我既在此》，作为皇后乐队的新单曲。这首歌自带戏剧化的效果，现在已经是皇后乐队现场演出的固定开场曲，不过对大多数电台来说，它作为平日播放的歌曲太噪了，好在它还是在榜单上取得了不错的第十一名。单曲发布后第二天，约翰·迪肯迎娶了女友维罗妮卡·特泽拉夫。这对新婚夫妇交往了三年多，是在圣母升天学院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维罗妮卡以前在那里念书。这场天主教的婚礼在肯辛顿教堂街的加尔默罗修道院^[37]举行。维罗妮卡当时已怀有两个月身孕，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罗伯特。

迪肯的伴郎是他的老同学、前反对派乐队鼓手奈杰尔·布伦，当弗雷迪·莫库里张扬高调地出场时，布伦看得一脸震惊。皇后乐队的主唱乘坐一辆豪华加长轿车来，围着夸张的羽毛围巾，一手挽着一个美女^[38]。“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新娘呢。”布伦承认说。反对派乐队的成员看过皇后乐队的现场表演，但现在他们可算见识到上过《流行之巅》节目的乐队的后续效应了。婚礼前，迪肯回莱斯特郡探亲，他同前反对派主唱戴夫·威廉姆斯一起去喝酒。有人在酒吧点唱机上放了《绝代艳后》，不出几分钟“随和迪肯”就频频被要签名的人所打扰。

差不多同一时期，克里斯·史密斯在肯辛顿市场遇到布莱恩·梅，带他一起去灰狗酒吧。“有了这首《绝代艳后》金曲，他也变得有名气了。”史密斯说，“酒吧里挤满了人，我前脚走进去，布莱恩跟在后面，后脚就听到人群开始窃窃私语：‘他是那个乐队的……’我让他找个角落坐下，我去买喝的，我记得我脑子里想着：‘原来这就是出名的感觉。’我回来坐下，布莱恩说：‘好久没人帮我买酒了。’我说：‘嗯，下一个就是你啦。你请下一轮，老规矩。’我觉得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被正常地对待了。我认为弗雷迪和罗杰能应付名气这种事情——他们似乎喜欢成名。但我不确定布莱恩能不能应付得来。”

迪肯度完蜜月后就重返阵地，皇后乐队集合起来准备下一次美国巡演。《绝对心脏暴击》已在美国发行，最好成绩达到第十二名。继上次中途流产的美国巡演之后，那儿还有许多失地需要收复。“我们确信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可以顺利拿下，”罗杰·泰勒跃跃欲试，“但人家跟我们说，不要对南方和西部地区抱太大期望。”“起了‘皇后’这种乐队名，第一印象都成问题。”琥珀摩特乐队当时的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说，“特别是在美国。假日酒店的女服务员会说：‘天耶，你们真了不得.....你们都是基佬吗？’”

皇后乐队在纽约进行了一周的排练，测试了新的扩音系统和灯光装置。巡演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开始，之后直杀克利夫兰、底特律和波士顿，马不停蹄地连演两晚或三晚。三周后，费城演出结束，莫库里失了声。医生诊断他的声带可能有结节。弗雷迪被告知需要休息，但隔天他仍然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39]进行了演出，并超出预期地像往常一样地把高音都唱上去了。

不过，也有人对皇后乐队的主唱没那么有好感。之前皇后乐队从摩特乐队美国巡演撤出后，他们的位置由本土摇滚乐队“堪萨斯”顶替。这个乐队将在1975年的皇后乐队巡演中做多次暖场。主唱史蒂夫·沃尔什赞赏主乐队的表演，却不喜欢他们的主唱。“弗雷迪·莫库里是个混蛋，”沃尔什说，“他特别自命不凡。”莫库里的高姿态以后还会相继导致一些身边的人远离他。

由于声音的问题，莫库里变得越来越心烦意乱。华盛顿演出之后，他倍感疼痛，之后的六场演出立即取消。疑似结节的症状最后发现是喉炎和喉部拉伤，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并命他如无必要就别开口讲话。尽管遭遇这些挫折，但当巡演再次在芝加哥续航时，莫库里的精彩表现一如既往。《流行音乐周刊》的美国特约记者阿尔·拉迪斯看过演出后，被主唱玩弄麦克风架子的技巧迷住了：“他拿它当吉他一样弹，又把它像步枪一样指向观众瞄准.....继而他又用它作手杖、作武士刀一样挥舞，甚至假装把它放在膝盖上一折两段，像一个宣战的阿帕奇战士。”

在洛杉矶圣莫尼卡城市体育馆^[40]的两晚演出之前，梅和泰勒放假一天，去附近可容纳一万八千人的论坛体育馆^[41]看了齐柏林飞艇乐队的演出。“我们以为在伦敦彩虹剧院演出后，就算成功了，”梅说。“然后我们在论坛体育馆看到齐柏林，又想：‘我的天啊，要是我们能做这种演出.....’我们的经理当时也在，他说：‘不出几年，就会轮到你们了。’”

1975年的洛杉矶日落大道是所有摇滚乐队的必经地点。沿着英国摇滚乐前辈的足迹，皇后乐队去西好莱坞臭名昭著的彩虹烧烤酒吧朝圣。彩虹酒吧名流出没，常来的有甜蜜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谁人乐队的基思·莫恩等，还有随着他们一起来的女粉丝。“我心想：‘我的天，这地方也算是人间奇观了。’”梅说。不过泰勒很喜欢这种氛围。约翰·安东尼坚持说：“罗杰一直想成为流行明星，并享受当明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让人泄气的是，这次巡演并没有善始善终。莫库里的声音还是有问题，更多的场次被取消。在旧金山的温特兰^[42]完成一场演出之后，乐队飞到加拿大，成功拿下三场演出，然后被迫取消在波特兰的终场，打道回府。美国的巡演再次因为乐队其中一位成员的健康问题而折戟沉沙。

此时吉姆·比齐仍在皇后乐队艰涩的合同里跋涉，乐队则在夏威夷短暂休假后飞到日本匆匆完成了八个晚上的巡演。尽管皇后乐队在其他地方似乎进展迟滞，又因与三叉戟的合约风波心情郁闷，但没想到他们在世界第二大流行音乐市场——日本俨然已经是流行巨星了。

4月17日，乐队抵达羽田机场，罗杰·泰勒回忆说，他们被“成千上万的粉丝，真的有几千人以上”夹道欢迎。（迪肯：“成百上千吧。”）他们挥舞着专辑的封套、从音乐杂志上撕下来的照片，以及自制的横幅（“爱皇后乐队”“欢迎罗杰皇后”等）。这趟巡演的终场在14200人的武道馆举行，两晚的演出全部售罄。第一场演出，莫库里不得不中止表演，以防止过度兴奋的歌迷在舞台前方发生踩踏。第二场部分演出有当地电视台录像，镜头捕捉到梅和莫库里的互动，他们身上穿着已经在多个演出场地出现过的桑德拉·罗德斯的长衫。“动静实在是大，”约翰·迪肯回忆道，“此起彼伏的尖叫和向舞台上抛各种礼物。”“在日本仿佛触到了某个点，”梅说，“突然间我们成了披头士。”

演出之余，他们每人被指派了一名私人保镖（莫库里：“我的保镖名字叫伊丹。他人超好，送我一个美丽的日本灯笼”），参加了Star一千零一夜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乐队还盘腿席地而坐，接受了日本传统的茶道款待。面对镜头自我介绍时，他们显得既礼貌又有些迷惑。布莱恩·梅在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了……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国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带着赠予他们的日本和服，皇后乐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布莱恩·梅口中“住在寒酸地下室”的惨淡现实。“我们遇到的是披头士粉丝般的狂热，”泰勒告诉《魔力》杂志，“我们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武道馆演出之后，我又回到了

里士满的单间。我们仍然一周只拿到60英镑薪水。”

日本巡演回来后不久，克里斯·史密斯曾到梅家里拜访。“布莱恩整个人还处在巨大落差当中，”克里斯记得他说，“我刚刚经历了披头士一般的待遇。我们收到热烈的欢迎，连机场都挤满了人。现在呢，我从那里到了这儿。”然后他带我到浴室去看，墙上全是霉斑。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根本没有钱。””克里斯走到梅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十几只企鹅玩偶。“布莱恩曾在接受某家杂志采访时说他喜欢企鹅，于是粉丝们纷纷给他寄来了这些。就这样，发霉的墙面，狭小的房间，却摆满了企鹅——小的，大的，6英尺那么高的……一大堆的企鹅玩偶。”

“就是这一次日本之行后有了变化，”马克·艾什顿说，“皇后乐队的表现太优秀了，公司里传言乐队对杰克（·内尔森）很生气，尤其是弗雷迪。以前我常在办公室里听到弗雷迪的声音，他数落着三叉戟的过失，声音很大，非常愤怒。”时至今日，杰克·内尔森在采访时谈及他与三叉戟和皇后乐队的这段过往，只是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整个经历真是很有意思”。内尔森之后回到美国，在百代公司任职。后来继续担任夏卡康^[43]和黑街乐队^[44]的经理人。“我们友好地结束了合作，”他说，“布莱恩和我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1974年5月，美国摇滚乐队火花有了一首英国排名第二的热门单曲《这小镇不够同时容下我们俩》（This Town Ain't Big Enough for the Both of Us）。皇后乐队和火花乐队曾在大帐篷俱乐部一起演出过，火花乐队的准歌剧摇滚风格和皇后乐队的作品也有相似之处。时隔一年，火花乐队感觉可以乘虚而入了。“他们找到我说：‘你看吧，皇后乐队明显是难以为继了，如果你想的话，我们挺乐意在乐队里给你一个位置。’”梅回忆说，“而我回应说：‘嗯，我觉得我们离结束还有点远呢。’”

但梅的内心其实深感沮丧。“出了三张专辑之后，人们以为我们应该过上了坐劳斯莱斯兜风的日子，”他后来告诉《Q》杂志，“那时候我们开始感到愤慨。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我们的管理公司同时也是我们的唱片公司，所以没有一个真正代表我们去和唱片公司谈判的人。这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局面。每个环节都会产生摩擦。”

不仅如此，在拿出任何可分配的利润之前，赚到的钱还要先填平三叉戟的投资资金。诺曼·谢菲尔德指出：“三叉戟在皇后乐队身上投资超过20万英镑，可能是有史以来对新人乐队最大规模的投资。”所以实际

上，皇后乐队必须先偿还三叉戟投资费用。用最好的录音设备，去最好的表演场地，样样都是顶尖的，这些都是有代价的。据说《绝对心脏暴击》制作费花了3万英镑。当皇后乐队终于有几首热门单曲时，他们以为会有钱进账，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三叉戟的账单。“我们债台高筑。”梅说。

“我不认为这场交易是错的，有问题的是对交易安排的理解，”制作人肯·斯科特说，“三叉戟在那支乐队上花了一大笔钱，其中有一部分是拖欠款项。有的项目，艺人以为是内部经费，但其实是收费的。艺人看过之后就会说：‘这部分不是我们付啊。’这是个经久不衰的问题，行业里发生过一次又一次。”

就像故意煽风点火一样，5月12日，《绝代艳后》在美国升至前二十名。一周后，弗雷迪·莫库里因这首歌曲被授予英国“艾弗·诺维洛”原创音乐大奖（Ivor Novello award）。

据报道，美国巡演时，皇后乐队会见了已故的唐·阿登，他是黑色安息日乐队和E.L.O乐队的经理人，这位音乐界的著名经纪大佬因为作风蛮横，被称为“摇滚界的阿尔卡彭^[45]”。（阿登的女儿莎伦后来成了奥兹·奥斯本的经理，并在电视行业取得全球性的成功。）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阿登称他去见过谢菲尔德兄弟，并花了一小时说服他们解除和皇后乐队的合同。三叉戟表示原则上同意，皇后乐队随即签了一封授权信让阿登代表他们行事。然而，到了某个阶段，双方又改变了主意。约翰·安东尼记得他“恳求皇后乐队不要与阿登签约”。不知道是不是听了他的劝告，乐队和阿登的全部合作很快中止，乐队说是“双方达成了一致”。尽管阿登名声在外，但未听说他的爪牙有采取过任何报复行为。

差不多也在这段时间，皇后乐队的经理人候选者名单上列出了一系列名字：10cc乐队的经理哈维·林斯伯格，谁人乐队的巡演经理彼得·鲁吉，还有已故的彼得·格兰特，他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经理，也是齐柏林飞艇的天鹅之歌唱片公司联合创始人。如果和格兰特签约，任何合同中都会包含一条皇后乐队与天鹅之歌绑定的规定。皇后乐队也清楚地意识到，在一套包含齐柏林飞艇乐队、坏伙伴乐队的管理体系中，他们的地位排序不会乐观。

最后，接任皇后乐队新经理角色的人是约翰·里德。里德的经理人生涯始于四年前，当时他接手了一位年轻的歌手兼作曲家，受洗名字是

雷吉·德怀特（Reg Dwight），也就是今天的艾尔顿·约翰。“我们知道，管理方面我们有困难，但总体上我们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布莱恩·梅解释道，“所以我们四处打听走动，跟所有能搭上的人见面，而唯一一个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人，真的，就是约翰·里德。”

1975年8月，皇后乐队与三叉戟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他们从所有交易中剥离。皇后乐队的发行权现在交到了百代发行公司手中（从费尔德曼公司处接管过来）。唱片制作方面，英国由百代负责，海外由伊莱克特拉负责，都不再经过三叉戟的处理。达成这些协议，必然有不可避免的代价。三叉戟收到一笔10万英镑的终止合同补偿金，由百代发行公司提前垫付，并保留皇后乐队未来六张专辑1%版税的权利。

皇后乐队和三叉戟的这桩纠葛带来的余波多年未散。就在本书写成两年前，肯·斯科特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休息室候机，看到了约翰·迪肯。“于是我走到他跟前，说：‘嗨，约翰，你还记得我吗？三叉戟的工程师，叫肯·斯科特的？’约翰不假思索地回应：‘记得，而且我无论如何都跟那些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了！’”

[1] 约翰的原话与问句连起来为wet dream，即梦遗。

[2] 英文名为“Daddy Cool”。

[3] 英文名为“Madder Lake”。

[4] 英文名为“Golden Earring”。

[5] 英文名为“Nazareth”。

[6] 英文名为“Blue”。

[7] Marc Bolan，霸王龙乐队的主唱，华丽摇滚的代表人物之一。

[8] 英文名为“Blackpool Winter Gardens”。

[9] 英文名为“Jethro Tull”。

[10] 英文名为“Plymouth Guildhall”。

[11] 英文名为“Nutz”。

[12] 英文名为“Cheltenham Town Hall”。

[13] 英文名为“Aberystwyth University”。

[14] 英文名为“Stirling University”。

[15] 英文名为“Barbarella's”。

[16] 英文名为“Douglas Palace Lido”。

[17] 英文名为“Rainbow Theatre”。

[18] 著名的俄罗斯男芭蕾舞演员，被誉为“舞蹈之神”，是弗雷迪的偶像。

[19] 英文名为“Regis College”。

[20] 英国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字面的双关为：“天佑皇后乐队。”

[21] 英文名为“The Sidewinders”。

[22] 英文名为“Kiss”。

[23] 英文名为“New York Dolls”。

[24] 英文名为“Farm Arena”。

[25] 英文名为“Aerosmith”。

[26] 英文名为“Uris Theater”。

[27] 英文名为“The North Ontario Paradise Riders”。

[28] Noel Coward，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导演、制片人。

[29] 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上。

[30] 英文名为“Café Royal”。

[31] 提的问题是“Are you gay？”，弗雷迪巧妙地利用gay这个词的多种含义（同性恋、鲜艳的、欢乐的……）糊弄过去了。并且，水仙花的名字源自希腊神话中自恋的美男子，隐晦地有爱慕同性的意味。

[32] 英文名为“Liverpool Empire”。

[33] 英文名为“Leeds University”。

[34] 英文名为“Glasgow Apollo”。

[35] 2014年，皇后乐队发行了《1974年彩虹剧院演唱会》（Live at the Rainbow' 74）CD、DVD、蓝光SD和黑胶，收录了修复过的这两场演唱会以及当年3月份《皇后II》巡演时在彩虹剧院的演出。

[36] 原文为“Palacio de los Deporte”。

[37] 英文名为“Carmelite Priory”。

[38] 一个是玛丽·奥斯汀，另一个是他妹妹卡什米拉。

[39] 英文名为“Kennedy Center”。

[40] 英文名为“Santa Monica Civic Auditorum”。

[41] The Forum，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英格伍德（Inglewood）。

[42] 英文名为“Winterland”。

[43] 英文名为“Chaka Khan”。

[44] 英文名为“Blackstreet”。

[45] 芝加哥黑手党头目。

第六章 秃鹫的胯裆

幻想？也许我会想成为鲁道夫·努里耶夫^[4]。

——弗雷迪·莫库里

……完全是让巴勒姆业余歌剧协会来演唱《班战斯的海盗》^[2]时那种精神错乱的狂放。

——1975年，《流行音乐周刊》评价《波西米亚狂想曲》

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前身是一座劳动农场，外观看上去变化不大。它藏身于蒙默思郡附近的瓦伊河谷中，1963年，原先的谷仓和棚屋被改建为录音设施。农场老板查尔斯·瓦尔德和金斯利·瓦尔德曾经组过自己的乐队，他们意识到在家录制唱片比长途跋涉到伦敦去要便宜。瓦尔德兄弟继而将外围建筑物改建为居住区，于是洛克菲尔德录音室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包含住宿的录音室。七十年代中期，这里诞生了首支热门单曲——戴夫·爱德蒙兹的《我听到你的敲门声》（I Hear You Knocking），之后许多主流重摇滚乐队纷纷慕名前来。

1975年8月初，前往洛克菲尔德录音前，皇后乐队在赫里福郡附近找了一幢乡间别墅，在那里驻扎了三个星期进行排演。小说家蒂芙尼·默里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钻石星环》（*Diamond Star Halo*）中记载了皇后乐队的这段停留。为了补贴家用，默里的母亲在七十年代曾将房子出租给摇滚乐队，“有着性感嘴唇和飞扬秀发”的弗雷迪·莫库里总是起得最早，他一人占用着钢琴，给当时六岁的蒂芙尼弹了一首新曲子，那首歌正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喜欢吗？”他问。“太棒了！”我说。“就是有点儿长。”他回应道。）

如果只允许列出一首让皇后乐队名垂青史的歌曲，那就是这首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是英国史上销量排行第三的单曲，1991年弗雷迪·莫库里去世后，全球销量激增，当时就卖出了两百多万张。然而，1975年8月24日，乐队进驻洛克菲尔德录音室开始制作第四张专辑《歌剧院

之夜》(A Night at the Opera)^[4]的时候，他们对接下来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他们来的时候，约翰·安东尼新指导的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正好结束了录音期。乐队住在录音室边谷仓改造而成的联排小屋中，蒙默思郡镇上唯一的酒吧老马头^[4]离他们有不短脚程，故分心的事情少之又少。

“他们空闲时常常在录音室外的大院子里玩飞盘，”金斯利·瓦尔德记得，“弗雷迪也会去以前用来放马具兼喂食的房间里，弹我们的老式立式钢琴。”后来，罗杰·泰勒在这个房间里摆上了他的架子鼓，长长的电线从房间里延伸出来，穿过院子接到录音室里。

瓦伊河谷的宁静生活让皇后乐队在动荡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一丝喘息。随着他们与三叉戟的合同终止，杰克·内尔森离开，又一次美国巡演被取消了。“打击异常沉重。”罗杰·泰勒承认说。那个夏天，新经理约翰·里德简单地交代皇后乐队说：“业务的事情由我来操心；你们尽力发挥把专辑做到最好就行。”

皇后乐队即将在洛克菲尔德开始工作之际，罗伊·托马斯·贝克也给三叉戟打了一通私人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再替他们打工……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接到他们回电。”1982年他说。贝克自己也和约翰·里德的公司签约了。没有商业上的扯皮分散他的精力，他可以更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早在五年多前，在弗雷迪和克里斯·史密斯一起在伊林学院晃荡时的半成品里，《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有了萌芽；那首史密斯的记忆中有着歌词“妈妈，我刚刚杀了一个人”的歌曲，被弗雷迪命名为《牛仔之歌》。1975年初，罗伊·托马斯·贝克去弗雷迪的公寓时，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两人本来打算去吃晚饭，但莫库里坚持要给他弹一点“最近一直在做的东西”。“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奏了第一部分，说：‘这一段是和弦。’接着是过渡间奏，听起来感觉后面会是一首舒缓的歌。他又弹了一些，然后突然停住，说：‘这里进入歌剧部分。’我们俩都笑出声来。”

作为迪卡唱片公司录音室出来的人，贝克曾协助德·奥利·卡尔特歌剧团^[4]录制音乐，这是一个以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演出而闻名的合唱团。在录制《波西米亚狂想曲》时，这段经验正好可以用上。“皇后乐队想了非常多的主意，”他说，“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想法组织起来，让它们得以实现。”他还多了一个信条：“创新不是难题而是挑战。

我绝会说：‘那是不可能的。’”

贝克这种决不放弃的态度简直是天赐之福。这时候，皇后乐队的工作模式已经建立，每个乐队成员都会先单独写歌，然后把这些歌曲的想法抛出来给其他几位，由他们建议、改进，甚至拒绝。罗杰·泰勒说，写歌的过程可能会“很孤独”。在录制《歌剧院之夜》期间，这种模式的不足变得越发明显。某些时候，乐队成员会两两分开工作，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录音室工作。“有种集体感缺失的感觉，”1975年梅告诉《流行音乐周刊》，“我能指出来这张专辑中哪些地方由于我们没全体同时聚集在一处，而作者一个人的责任又太重导致的问题。”

因此，当莫库里带着《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想法突袭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时候，他的队友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弗雷迪在父亲波密的会计工作笔记簿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初稿。“不是标准乐谱，”布莱恩·梅回忆道，“而是大写的A调、B调、C调，整张纸上像布满了四处穿梭的公共汽车。他脑海里似乎已经把整个曲调都谱好了。”

这首歌的最终版填进了一段清唱和声，一段舒缓的歌谣，一段铿锵的重金属和一段过渡的歌剧，这部分据称叠录了一百八十次。基础伴奏部分是在洛克菲尔德录的，如泰勒所说，“由弗雷迪指挥”。在开场唱诗般的人声合唱后，第一部分非常简单，仅由钢琴、贝斯、吉他和鼓做伴奏。这段录完后，贝克在卷轴磁带上预留了三十秒长度的带子，留着录“歌剧部分”时使用，此时他还没料到下个部分将会耗费大量精力。然后他们先录了歌曲尾部的重金属部分，梅需要演奏一段莫库里给他写的降E调为基准调的吉他连复；这个调子对任何吉他手来说都不好弹。但是，要记得贝克的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

“他要如何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我们都有点参不透。”梅承认说。1969年时，弗雷迪借鉴了披头士乐队在《生命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中使用的器乐间断的方式，将自己写的《牛仔之歌》中的不同部分连接起来。这一次，他将会谱写出伪歌剧的过渡唱段（他称之为“模拟歌剧”），歌词中提及十七世纪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丑角“斯凯拉谟修”（Scaramouche），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间舞蹈方丹戈

（fandango），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以及罗西尼和莫扎特合著歌剧中的角色费加罗。为增加不同的文化内容，他还放入了阿拉伯语名词bismillah^[6]，这是伊斯兰教的祈祷词。这是莫库里第一次在为皇后乐队写的歌里，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民族背景。1996年接受采访时，皇后乐队的公关人员托尼·布莱斯比说：“弗雷迪会不惜一

切代价避免提及桑给巴尔。他就是觉得和他的形象不符。”乐队成员对他演唱内容的含义就更讳莫如深了。“我们从来不互相讨论歌词的含义，”梅承认，“咬文嚼字太尴尬了。”直到今天，任何跟乐队相关的人都没有透露过这首歌的标题是怎么来的。

在数字时代之前，乐队在录音时只有二十四条模拟音轨可以用。然而，在录主唱人声前先录伴唱人声的操作，在这种条件下难度倍增。“常规做法不是这样的，”贝克说，“但是如果不出此下策，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音轨来录制丰富的和声伴唱。”罗杰·泰勒说，当“弗雷迪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Galileo’”时，录制的过程就变得更为复杂。

“每次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就要在卷轴上再加一段胶带。”贝克说。同时，由于贝克反反复复地播放磁带，带子在转动时开始出现一条“嗖嗖掠过的斑马线”。经过无数次的回放，这首歌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越来越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皇后乐队的又一个传说了，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支架的来历故事一样。

按照录音室工程师的说法，录制这首歌的每条和声的真正流程是，要把每段和声都“碰”到另一条音轨上去。布莱恩·梅解释说：“原始带子已经完全磨薄。人们以为这是讲故事的人夸张，但真的，你把磁带举到灯光下一看，都透明了。每次磁带通过磁头，都会磨损掉更多表面的氧化物。”磁带被匆匆转录为胶碟，梅后来吐槽说，“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们就要丢掉一点别的东西。”

9月，皇后乐队离开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重摇滚乐队客户并未间断，接着前来进驻的是前雄风乐队的贝斯手莱米，带着他的新乐队摩托头^[4]。虽然皇后乐队这张专辑距离制作完成还早，但乐队已经找到了潜在的专辑标题。据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一次在洛克菲尔德度过特别紧绷的一天之后，他劝说乐队到他租住在附近的房子里放松下。贝克那儿有最早的录像带播放机，几杯酒下肚之后，乐队一起观看了1935年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主演的喜剧电影《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考虑到专辑里有那首史诗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标题简直太贴切了。”

回到伦敦后，皇后乐队开始在东萨姆^[8]和天蝎录音室^[9]没完没了地进行叠录。萨姆录音室的助理工程师盖瑞·兰根在《绝对心脏暴击》专辑时就已经认识皇后乐队了（盖瑞·里昂斯也一起参与了这张专辑的部分录制，但制作《歌剧院之夜》的工作再次让他大开眼界）。东萨姆是伦

敦东区砖头巷尽头的一间小录音室。日复一日，录音室里塞满了乐队工作人员，莫库里、贝克和迈克·斯通（兰根：“碎布刺猬、标签鼠和短尾兔团”^[10]）几乎在“三叉戟-B”音控台旁边生了根（这个台子后来作为“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混音的音控台”以天价售出）。

“布莱恩移步进来时弗雷迪才走，”兰根说，“其他时间他就坐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手指头在台面上打着节奏，穿着他的黑色绸缎裤子，最上面的一颗纽扣开着。”兰根惊讶于即使在录音室里工作的时候，莫库里也会精心打扮。其他人也记得弗雷迪的发梳总是放在他面前，就在混音台上。

盖瑞在萨姆录音室目睹了同样完美主义的梅。“人们总说迈克尔·杰克逊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录一段鼓的音频，而我会告诉你布莱恩·梅一整个星期都花在吉他独奏上的故事。”他说。乐队的氛围也让兰根觉得有趣，“我觉得所有乐队都是由不同的化学反应组成的。在皇后乐队里，有罗杰·泰勒这位野孩子，也有完全相反的‘有条不紊先生’布莱恩·梅。我常会帮忙泡茶或者咖啡，在房间里问一圈，弗雷迪、罗杰、迈克或者其他随行人员都会直接报需求，然后我问布莱恩他想喝什么。先是一阵停顿，然后他会问：‘你要泡几杯茶？几杯咖啡？……两杯？……三杯？那你方便再泡一杯茶还是再泡一杯咖啡？’然后就这么纠结上十分钟。他本意是为我减轻工作量，但到最后我通常会嚷道：‘布莱恩！你就直接告诉我要喝啥！’”

直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每个部分都结合在一起后，包括莫库里在内的所有人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什么。对盖瑞·兰根来说，第一次听到完整六分钟版本的那天是一个“值得标红纪念的日子——我下巴都惊掉了”。而其他人都是一头雾水。伊恩·亨特此时离开了琥珀摩特乐队，他顺道来录音室探访，打算从皇后乐队里拉人帮忙客串他的下一张个人专辑。

“他们用四个大喇叭放给我们听，”他回忆道，“那种盛大恢宏，让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像刚被卡车碾过一样。弗雷迪问：‘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本说不出话来。他又说：‘你有没有听出来第二节中的第三段和声？那里稍微有点变化的。’我只能一脸惊愕地看着他说：‘你让我缓缓。’他没意识到我们是初次听，他在录音室里已经连续待了三天了。”

莫库里毫不犹豫地宣布《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作为皇后乐队的下一

首单曲发布。乐队其他成员一致支持，或者说几乎一致支持（“其他人也曾想把它砍掉一点”）。在一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采访中，已故的彼得·布朗说，约翰·迪肯曾反对将这首歌作为单曲完整发行，认为需要剪辑短一点。据报道，约翰·里德把《波西米亚狂想曲》拿去给艾尔顿·约翰听，他的反应是：“你他妈的疯了吗？”

不过，尽管弗雷迪说“我们乐队什么事情都要吵一番的——因为共同呼吸的空气都要吵”，但面对百代公司他们口径完全一致。这股勇气的背后，他们也清楚自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当口：被三叉戟的交易大伤元气，美国巡演又遭取消，接下来的新歌必须要有很大作为才行。“还有哪支乐队做过歌剧单曲，”莫库里问道，“我觉得没谁了。”

罗伊·托马斯·贝克引用理查德·哈里斯1968年的金曲、将近七分钟的《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为《波西米亚狂想曲》辩护，但是百代公司没有被说服。“他们的论调是，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播的，因为当时歌曲的标准长度是三分半钟。”

百代公司国际部总经理保罗·瓦茨也表示怀疑。“我期待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他说，“然后他们放《波西米亚狂想曲》给我听，我的反应是：‘这他妈是啥？你们有毛病吗？’”和瓦茨一样，皇后乐队在百代的另一位坚强后盾埃里克·霍尔也建议为了电台播放把歌曲改短，但遭到皇后乐队的断然拒绝。

埃里克·霍尔说，他把这首歌的拷贝偷偷带给了肯尼·埃弗雷特，此人是伦敦首都广播电台（Capital Radio）的名嘴。罗伊·托马斯·贝克也说，他曾邀请埃弗雷特到伦敦尤斯顿路的天蝎录音室听这首歌，征求他的意见。埃弗雷特（已于1995年去世）显然大受震动，他告诉乐队这保证是一首大热金曲。他索要一份拷贝，乐队应允，并装模作样地交代他不能在广播节目上播放。第二天，埃弗雷特在节目里播了几秒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吊着观众的胃口，说只能放这么多了。之后他又播放了更多的片段，直到最后播出了整首歌——不多不少五分五十五秒——并在那个周末循环播放了十四遍。

前1984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加纳姆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通过收音机。跟伊恩·亨特类似，他也不确定做何反应。“我打电话给布莱恩说：‘你们弄这乱七八糟的是要干吗？’”加纳姆笑道，“这体现了我的偏好。因为在1984乐队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演奏一些人们可以跟着跳舞的歌曲。而《波西米亚狂想曲》比亨德里克斯或者奶油乐队的歌

还要更不像这种类型。我当时理解不了它。”

第二天早上，前去店里购买的粉丝们才知道这首歌尚未发布。百代公司被挟持了。因为埃弗雷特循环播放了这首歌，唱片公司关于《波西米亚狂想曲》对电台来讲太长的说法不攻自破。百代做出让步，10月3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皇后乐队的第五支单曲发布。一上榜就到了第四十七位。十天后，单曲上升到第十七位，再到第九，皇后乐队此时意识到这首歌没办法做现场演绎，就联系了导演布鲁斯·高尔斯，请他拍摄一段可以放到《流行之巅》节目上播放的音乐视频。

高尔斯曾是皇后乐队彩虹剧院演出现场拍摄的导演。1975年的时候，流行歌曲宣传视频的预算通常不超过600英镑。高尔斯说，拍《波西米亚狂想曲》花了3500英镑；按今天的标准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超支大发了。

高尔斯和团队来到埃尔斯特里电影摄制棚^[4]，皇后乐队在这里为他们的下一次巡演排练。拍摄的要求很简单：就拍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歌曲的样子，并将《皇后II》的封面照片影像化，把四个人的面部动作变成动态视频，莫库里摆出他的玛琳·黛德丽姿势。尽管这部视频的多角度拍摄和梦幻视觉效果手法已经超前于时代，但拍摄仅用了三个小时。“我们从7点半开始拍，”高尔斯说，“10点半收工，10点45已经在酒吧里坐着了。”

在那一个个“Scaramouche”“bismillah”“Galileo”之外，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波西米亚狂想曲》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库里一如既往地闪烁其词，他坚持说“人们应该自己去听，自行玩味，然后你来决定它意味着什么”。泰勒说：“它的意思很明白啊。”梅对这首歌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而且就算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说出来。一首伟大歌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会将它与你生命中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我觉得弗雷迪的确是在和他的人生难题作战，他可能曾经想要把这些经历写到自己的歌里面。但我认为那个节点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实际上他后来又决定晚些再说。我们最好还是永远留着这个谜题吧。”1975年底，莫库里的个人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他无意公开。这段时间，从《绝对心脏暴击》开始合作的百代公司媒体宣传部负责人马丁·内尔森仍在管理皇后乐队的演出和采访事宜。11月，巡演即将开始，内尔森被派去找一间录音棚，里德和乐队将在那里会面，并播放《歌剧院之夜》的最终版本给他们听。“我订到了利物浦的电台城^[4]录音室，”马丁回忆道，“我们拿到一间用电缆传声的录音室，结果这间录

音室还在建造中，没人告诉我设备布线还没有完全弄好。早上11点，约翰·里德从伦敦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来，我们聚集在一起。录音室里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地板上。然后磁带机开始播放，只出来单声道，所以只有一个扬声器有声音。大概是听一张新专辑最糟糕的场景了吧。约翰被激怒了。”所幸内尔森躲过了乐队经理的大发作，因为约翰·里德走到外面看到他的车时，被别的事情转移了怒气，“我算走运。录音室在斯坦利街，那边有点乱。有人偷了约翰车子的轮毂，他又被这件事气到了”。

11月14日，皇后乐队在利物浦帝国剧院演出两晚，拉开二十四场巡演的序幕。为了匹配他们华丽壮观的新单曲，舞台布景的灯光装置、闪光镁粉和制雾干冰用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泰勒的打击乐器套组里多了一面巨大的锣（像齐柏林飞艇的约翰·伯纳姆一样），在鼓独奏的时候，他的小军鼓鼓面上会倒满淡啤酒，敲击的时候好似喷泉。

演唱会用他们的好友肯尼·埃弗雷特的录音开场（女士们，先生们.....歌剧院之夜），接一段《波西米亚狂想曲》歌剧部分音频，然后乐队奔入舞台表演此曲，但不包括最后的那一段尾声。在演完《食人魔之战》《轻抖手腕》《绝代艳后》等歌曲后，《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会再表演一遍。这一次《波西米亚狂想曲》会演奏完整版本，中间播放歌剧部分时乐队离场（布莱恩·梅：“此处给我们一个空档换服装”），然后返回演完整首。

这次巡演中，弗雷迪的舞台服装有带翅膀的墨丘利套服，开胸贴身黑色连体服，甚至还有一套紧得令人瞠目的白色绸缎短裤（“不得体？我故意的，亲爱的。”他告诉《流行音乐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及一件价值200英镑的日式和服。在考文垂剧院^[3]的三晚演出中，和服的腰带丢在观众堆里消失了，彼得·布朗被派去找替代品；莫库里只能拿一条真丝丝巾代替。约翰（错印成约恩）·英厄姆在《声音》杂志中写道：“弗雷迪在观众面前如同一个特别情绪化的女演员——好比葛洛丽亚·斯旺森，或是扮演贝蒂·戴维斯时的霍莉·伍德劳恩。在布里斯托尔第二场演出的高潮部分，他在鼓台高处停下来，回头看向人群，以一种全然动情的姿态，纤细的手指轻触唇边，做出一个飞吻.....”

琥珀摩特乐队的前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现在加入了皇后乐队的团队，他负责照料莫库里和迪肯。很快地，彼得就领教了弗雷迪的完美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弗雷迪会马上要求一个新的，”他回忆说，“样样都必须是最好的，能够完全发挥效用的。”

这种对细节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雇佣一位名叫史蒂芬的个人按摩师，他曾经是鲁道夫·努里耶夫的兼职理疗师。此时乐队已不需要托尼·布莱斯比为他们工作了。布莱斯比称第一次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刚刚有了新生儿的爸爸”。他曾打理乐队三年，但是随着管理人员变动，约翰·里德公司的公关卡洛琳·布歇接任了布莱斯比的位置。“皇后乐队非常随和、愉快，有决心，有热情，”卡洛琳说，“那时候艾尔顿·约翰正好跌入吸毒阶段，所以合作起来皇后乐队比艾尔顿省心不少。但是如果事情不顺遂的话，弗雷迪也会闹脾气，因为他是如此完美主义的一个人。”

11月20日，《流行之巅》播出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宣传片。那天是皇后乐队在加的夫和汤顿演出之间的一个休息日，他们和暖场乐队大先生^[4]一起聚集在酒店房间里观看了电视画面。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看到宣传片的成片。“简直太欢乐了。”布莱恩·梅回忆，一群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注视着自己的动作，四张悬在空中的脑袋“唱着”歌剧部分，连约翰·迪肯都开口了，他是皇后乐队录音时唯一不唱歌的成员，舞台上他的麦克风也是常关状态。

“我很喜欢那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棒。”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杰夫·佩因说，他的艺名是蒂肯（Dicken）。1977年，大先生乐队将会收获一首进入榜单前五名的热门单曲《罗密欧》（Romeo）。1975年这个时候，他们由负责琥珀摩特乐队的鲍勃·赫希曼管理，此次做暖场是为了推广他们的首张专辑《甜蜜的沉默》（Sweet Silence），这张专辑的风格比他们后来的金曲要重金属得多。“弗雷迪跟我们说他非常喜欢《甜蜜的沉默》，尤其是里面的一首歌《赞比亚》（Zambia）。我们一起坐车去演出的路上，他们经常会持续放着这张专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要了，弗雷迪，放《绝对心脏暴击》吧……’”

巡演开始前夕，两支乐队在埃尔斯特里碰面。“皇后乐队在台子上乱来一气，听起来很不行，”蒂肯说，“我们在边上看着，心想：‘啊，我们会在舞台上出尽风头的。’然后等我们到利物浦，皇后乐队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我站在侧翼，内心只剩‘啊！’”

11月21日，《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流行之巅》节目亮相的后一天，百代正式发行《歌剧院之夜》专辑。尽管已经有那首史诗般的单曲耀眼在前，但专辑的其他歌曲却未显黯淡，仍然能配得上整体的宏伟壮丽。在很多年里，摇滚乐队形容一张专辑很重要，常说“这是我们的《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种用法已经说滥了，但是布

莱恩·梅说“希望《歌剧院之夜》是我们的‘佩珀军士’”却再合适不过。这张专辑在六间不同的录音室制作，一度曾有三间录音室被同时使用。它的估计制作成本达到了前所未闻的4万英镑，导致有传闻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专辑（后来被乐队否认）。而乐队不断对专辑里的歌曲精打细磨，导致无法按计划在巡演前发行。乐队刚结束在伦敦圆屋录音室^[15]的《歌剧院之夜》媒体见面会首播，罗伊·托马斯·贝克就拿着带子奔回录音室继续微调。“这张专辑兼具了《皇后II》的离经叛道和《绝对心脏暴击》的优美曲调，”莫库里告诉媒体，“里面有史上最好的歌。”锦上添花的是，专辑的封面绘制着一个非常美丽高贵的纹章，狮子、仙女和凤凰^[16]环绕于乐队的Q标志四周。“我在广告艺术设计上的一面得到了体现，”莫库里解释说，“我们把封面设计看作是市场计划，是推广的一个项目。”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足够离谱。莫库里写的这首《人型死神（献给……）》（Death On Two Legs [Dedicated To...]）咒骂着吸血的水蛭、下水道里腐烂的老鼠，似乎影射着某些坏人。直到专辑内页制作出来，一位百代的高层读到这些歌词时，公司才开始紧张（保罗·瓦茨：“有人问‘你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这首歌的歌词是如此怨毒，以至于莫库里说梅“唱着会感到不适”。不过《人型死神》这首歌倾注着主唱的心血。“录音室里，弗雷迪坚持要把耳机声音开特别大，以此来飙高音，他的耳朵都充血了。”盖瑞·兰根回忆道。（莫库里自己则跟记者说是他的喉咙唱到充血。）

欢快俏皮的《懒洋洋的周日下午》（Lazing On A Sunday Afternoon）则是穿插其中的轻松调剂，《海滩幽会》（Seaside Rendezvous）和《好伙伴》（Good Company）亦带着同样的属性。专辑中其他歌曲无不彰显着乐队不拘一格的歌曲创作特性。莫库里写的《一生挚爱》（Love of My Life）是一首极致优美的情歌，展现出他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竟然逼着梅为这支歌曲弹奏了竖琴；弹奏过程困难重重，因为这件乐器一直在很不配合地走调。

在谱写了《绝对心脏暴击》专辑中那首不甚出众的《熄火》之后，约翰·迪肯此次的新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You're My Best Friend）听起来像是出自一位完全不同的作曲家。与《波西米亚狂想曲》正好相反，这首歌是一首简单明了的流行歌曲，献给他的妻子，作者本人还负责电钢琴演奏（泰勒：“弗雷迪不屑弹，他认为电子钢琴远逊于钢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既不像任何皇后乐队以往的歌曲，又完

全让人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作品；在未来许多年里，乐队将会一次又一次成功使用这招。

约翰·安东尼相信罗杰·泰勒是皇后乐队中最有巨星相的人，在《歌剧院之夜》中，他的这种信念似乎得到了佐证。泰勒的《爱车狂人》（I'm in Love with My Car）灵感来源是乐队音效师约翰·哈里斯——罗杰·泰勒说他是“终身赛车手”——凯旋TR-4跑车是他的骄傲和乐趣之源，不过歌里录进去的车子引擎声其实来自罗杰自己的阿尔法罗密欧。这首歌最终被定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为鼓手赚到大把版权费。布莱恩·梅解释说，“那些时候，我们总是会在歌曲中互相合作改进，但涉及版权时，提出歌曲最初想法的人就会说：‘我他妈的写了这首歌，当然署我的名字。’很多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在歌曲创作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B面。《波西米亚狂想曲》卖出一百万张，而罗杰和弗雷迪分得同样的版权费，因为B面的《爱车狂人》是他的。这件事也争了很多年。”直到1981年金曲《压力之下》（Under Pressure）发行时，皇后乐队才改了这个规则。“明智的决定，”泰勒说，“因为钱方面的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分歧。”

除了相对单一的《甜蜜女郎》（Sweet Lady）之外，布莱恩·梅在《歌剧院之夜》里的创作和他的队友们一样丰富多彩。纯正的民谣《39年》（'39）由梅演唱，其灵感据推测是受到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赫尔曼·黑塞的启发。“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科幻故事，”梅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人员，“故事说一个人出征太空，远离家乡，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才老了一岁，而家里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位吉他手不止一次地在歌曲中表达离开故乡和家人的愁绪。

然而，梅最大的颠覆是《先知谣》（The Prophet's Song），一首超过八分钟的歌曲。“那是一首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莫库里告诉肯尼·埃弗雷特。梅自称这首歌由一个梦激发，触动了他对人类的恐惧：缺乏同情心和情感互动。“人与人之间没有足够的接触。”他解释说。它具有瓦格纳歌剧式的连复，圣经般的氛围，过渡段的清唱有着数不清的多重叠音，这首歌的格局和《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宏伟，只是没有流行风格。《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后，专辑以皇后乐队演绎的缩短版国歌《天佑女王》结束。在媒体播放会上播放到这里的时候，不出所料地，莫库里跳起来，要求媒体人也照做：“起立啊，贱人！”

在舞台表演时，主唱变得越发机智敏锐。一次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4]的演出，莫库里遭到咒骂（“你这死玻璃！”），他指使一束聚光

灯打到这位出言不逊者身上（“你再说一遍，亲爱的”）。11月25日，《流行之巅》播出视频后第四天，新闻称《波西米亚狂想曲》已经拿到了榜单冠军。“那时我们刚刚在南安普顿演完，”蒂肯记得，“那一刻对他们来说真是美好。”某日难得休息，皇后乐队、大先生乐队等人一起去看放克乐队热巧克力^[18]的演唱会。该乐队的热门单曲《性感的你》（*You Sexy Thing*）正冲击榜单，但最终止步第二名。“他们的主唱埃罗尔·布朗结束演出后，走过来跟布莱恩说：‘你们这些混蛋！本来我就要有一首圣诞季的冠军单曲了。’”

回到巡演途中，在高涨的情绪下，大先生乐队的一位成员买了一架木头飞机，把它大卸八块丢在酒店的电梯间里。“我记得是在伯明翰吧，”蒂肯说，“他做这事的时候，被住在同家酒店的喜剧演员迪基·亨德森看到了。迪基向酒店管理人员投诉，搞得我们被禁止入住。弗雷迪就有点龙颜不悦。”蒂肯看到，莫库里情绪不佳的时候，他会疏远所有人。“我们坐长途汽车演出的路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的助理以及玛丽·奥斯汀待在一起。我和我们乐队鼓手约翰·伯利普可以进入他的化妆间，但整个乐队只有我们两人被允许。”遗憾的是，原定在伦敦汉默史密斯体育馆连续五晚的演出，由于大先生乐队的主唱意外跌入舞台乐池，行程受到影响。“我砸到一个摄影师身上，”他解释说，“把吉他弄坏了。”

几天后，演出车队行驶至纽卡斯尔到邓迪中间路段时，被警察拦停。因为之前有一名乐队工作人员被开除，应该是他打了一通匿名电话，告发车上藏有毒品。部分工作人员被查出携带少量安非他命，但皇后乐队和大先生乐队成员身上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发现，仅有一瓶金馥力娇酒，一包阿司匹林。虽然要不了多久，弗雷迪就会开始使用可卡因，但彼得·辛斯回忆说，“那个时期，毒品还是乐队的绝对禁忌。”一名警官询问弗雷迪是否有嗑药，穿着毛皮大衣、画着眼线、花枝招展的弗雷迪回答说：“休得无礼，你这个愚蠢的小家伙！”

此次巡演原定以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的两晚演出作为结束，但推广人梅尔·布什又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剧院增加了一次平安夜专场。这场演出由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和《老调重弹》节目现场直播。^[19]

《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榜单上停留了十七周，其中有九周都是第一名。不过，对拍摄了宣传视频的导演布鲁斯·高尔斯来说，这次成功来得有些虚妄。1973年，高尔斯曾与萨尔瓦多·达利^[20]本人合作，导演了艾美奖获奖纪录片《水瓶座：你好，达利！》（*Aquarius: Hello*

Dali! ），“但是没人找我，电话从来没有响过。”他说。接着有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做了这个蹩脚的六分钟小视频，找我的电话再也没有停过。”高尔斯后来成为美国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导演。

对于百代的马丁·内尔森来说，皇后乐队的成功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我和他们在巡演路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四个人塞在我那辆公司的小福特车里，布莱恩的座椅必须往后调一些，因为他的腿太长了。他们认真地完成了一切要求。也许弗雷迪后来变得离经叛道，但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专业歌手。设法让《波西米亚狂想曲》在首都电台播放真是绝妙的一招，之后其他的DJ就觉得这首歌是可以放的，但必须要肯尼·埃弗雷特先尝试过。”百代的鲍勃·默瑟承认说：“功劳都是皇后乐队的。百代唯一明智的地方就是点头说‘好的’。”

一些媒体抨击乐队在《歌剧院之夜》上花了过量的钱和太多的录音时间。“听起来好像制作团队在录音室玩得有点太开心了。”《流行音乐周刊》写道。《新音乐速递》的托尼·斯图尔特得出结论：“如果说它是有史以来最昂贵专辑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专辑。上天保佑。”有了雄踞榜首的单曲，《歌剧院之夜》在三周后也随之爬到了排行榜首位。批评性的怀疑论调依然存在，但在未来几个月里，所有音乐报刊的读者都会在“英国最佳单曲”“最佳乐队”等评选时提名皇后乐队。

新年之后，他们将迎来下一次美国巡演，于是《歌剧院之夜》在12月预先在美国发行。《滚石》的撰稿人克里斯·尼科尔森称赞道，“皇后乐队即便失败也愿意不断尝试”，总结说“在所有的重金属摇滚团体中……皇后乐队无疑就是这个领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张专辑在美国榜单上有十周进入前十名，最高达到第四位。

英国这边，莫库里因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又获得一座艾弗·诺维洛奖杯，同时单曲销售正好超过一百万张。但是收到《歌剧院之夜》的金唱片纪念盘时，他起了疑心。莫库里认为百代的当权者比较吝啬，不太相信他们会提供真家伙，他感觉裱好的纪念盘不是自己的那张专辑。于是他把它撬开，取出唱片放在唱机上播放，惊讶地发现真的是《歌剧院之夜》。

这种疑心和古怪的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弗雷迪·莫库里”人格的一部分。因三叉戟公司受到的伤害，弗雷迪甚至比乐队其他人都更加对人对事存有疑心。毛皮外套、飘飘长发、黑色指甲油的外表之下，藏在那些

不离口的“亲爱的”“我的亲”背后的，还是那个弗雷德·保萨拉。“我似乎创造了一只怪兽，”那时莫库里说，“表演的我是一个完全外放的人，但内心的我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

虽然有公开的女友玛丽·奥斯汀，但此时莫库里的内心正经历着性取向上的挣扎。1975年春天，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认识了二十五岁的唱片公司高管大卫·明尼斯。明尼斯是保罗·麦卡特尼的员工，最近刚刚接手一个名叫埃迪·豪厄尔的唱作人。一天晚上，在国王大道的一家俱乐部喝酒时，莫库里亲吻了他的脸颊。明尼斯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但他还是很惊讶，一位男性著名歌手会在公众场合对另一个男人表现出这样的亲密。（不过，百代的马丁·内尔森回忆说：“我妻子记得弗雷迪也曾亲过我的脸。他就是会这么做的人。”）

大卫·明尼斯被邀请到录音室，一起听《波西米亚狂想曲》。不久后，大卫和弗雷迪成了情人。“弗雷迪非常可爱，”2004年明尼斯在某次采访中说，“他性欲旺盛，而且只倾注在你一人身上。”不过，弗雷迪在分享个人家庭生活信息方面有所保留。明尼斯被介绍给玛丽·奥斯汀，他相信她与弗雷迪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但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回到荷兰路公寓，大卫看到只有一间卧室时，大为震惊：“显然，这段关系里有比他可以告诉我的多得多的东西。”

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回忆说，早在第一张皇后乐队专辑发行后，莫库里对她的态度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一切都变样了，”她说，“我们的关系冷却下来。我下班回家时，他通常不在。他很晚才回来。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功后，这对情侣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进一步拉开。皇后乐队还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玛丽是养家糊口的人。现在，莫库里有钱了，知名度和名气都大了。一日他和妹妹卡什米拉在约克郡外出，被一群学生认出来一路尾随。同样地，私底下他也不能再隐藏自己了。到了某个时点，莫库里向玛丽坦白了一切。奥斯汀回忆说：“他说，‘我想我是双性恋’。我告诉他，‘我觉得你是同性恋’。之后再无它话，我们只是拥抱了彼此。”

布莱恩·梅认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反映了莫库里的人生挣扎，这一说法在莫库里的个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这里也得到佐证。彼得陪伴他的时间贯穿八十至九十年代。“仔细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写法，它描述了弗雷迪人生的三个部分，”弗里斯通说，“同玛丽一起生活，逐

渐接受自己对男性的渴望，以及真正与男人睡到一起。”米克·洛克向来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他认为这首歌具有更多的暗示：“《波西米亚狂想曲》改变了一切，此刻他把所有的疑虑都抛进了风中。”

通过新男友的关系，莫库里开始了第一次皇后乐队之外的工作。明尼斯的客户埃迪·豪厄尔刚作为作曲人被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签下，1975秋季，豪厄尔在肯辛顿的星期四俱乐部^[2]演出时，莫库里正坐在观众席中，尤其被他的一首叫《来自曼哈顿的男人》（The Man From Manhattan）的新作打动。他询问说是否可以当这首歌的制作人。

结果，莫库里和迈克·斯通在东萨姆录音室制作《歌剧院之夜》的时候，也顺便一起制作了这首曲子。弗雷迪在这首歌里铺了钢琴，布莱恩·梅也贡献了吉他独奏。豪厄尔惊奇地发现，莫库里采用的是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用过的那种特殊的乐谱，创作了同样错综复杂的和声。而且，虽然录音室收费每小时60英镑，他对制作开销似乎毫不在意。他想用一个铃音来作为这首歌的结尾，却发现没有合适的铃（豪厄尔：“正确的音调是D，但是录音室里没有D调的铃”），于是派了小工去外面找合适的乐器。经过数个小时，加上价值数百磅的额外时长费用，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来自曼哈顿的男人》的灵感，歌词上来源于马里奥·普佐的畅销小说《教父》；音乐上则来自奇想乐队。不过，在莫库里的指引下，这首歌生出了皇后乐队的风格，即使放进《歌剧院之夜》也不会显得突兀。“这当然很好，但我确实有尽量让约翰·迪肯和罗杰·泰勒不要参与进来，”豪厄尔说，“他们本来愿意加入的，但我希望这首歌能保留一些我自己的风格。”

弗雷迪给豪厄尔的临别赠言——“如果这首歌没红，你应该起诉华纳兄弟”——没起到什么作用。1976年此歌发布时，因为发现来自美国的贝斯手在录音期间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未得到推广宣传，跌落到榜单之外。《来自曼哈顿的男人》会成为皇后乐队日后巡演时试音的曲子，后来被收录到2000年皇后乐队出的特别合集套装中。同时，与乐界“皇族”短暂合作后的埃迪·豪厄尔回归低调的职业，继续担当雇佣作曲人。

1976年1月底，“歌剧院之夜”巡演北美之行开始，《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美国排行榜上已停留三周有余，逐渐上升到第五十九位。那个被

肯尼·埃弗雷特用电台地毯式轰炸的周末，美国广播电台RKO组织的节目总监保罗·德鲁正好身在伦敦，听到这首歌。德鲁拿到一盘这首歌的录音带，开始在美国播放。就像几个月前的百代一样，皇后乐队此时在北美的厂牌伊莱克特拉/庇护所（Asylum）也只好被迫把它作为单曲发行。“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情节，”莫库里说，“六分钟的单曲？你开玩笑吗！哦，也不过就是在英国侥幸播出罢了。”

这次巡演历经康涅狄格的沃特伯里、波士顿、费城的剧院，之后在纽约的灯塔剧院^[22]进行四晚演出。到纽约后，他们在电子淑女录音室^[23]与伊恩·亨特、罗伊·托马斯·贝克碰头，莫库里、梅和泰勒在罗伊制作的下一张专辑《美国外乡男孩》（*All American Alien Boy*）的一首歌^[24]中客串。杰克·内尔森走后，皇后乐队找来曾为吉米·亨德里克斯服务的盖瑞·史迪克斯作为演出经理，罗杰·泰勒也有了自己的鼓器技师克里斯·“水晶”·泰勒。私人助理彼得·布朗目前的职责范围扩大到给玫瑰花拔刺，因为演出时弗雷迪总会抛花给观众；他还需要在唱《我既在此》时，扮成弗雷迪上台。当这首歌里一唱一应的部分出现时，布朗伴随着闪光出现在舞台的一侧，接着莫库里本人出现在舞台的另一侧。不过，打扮成莫库里、为玫瑰去刺，都是布朗在这次巡演中遇到的小问题了。应付主唱的明星架子才是更大的挑战。

这次美国之行，皇后乐队的级别比十二个月之前来的那次已经高得多，但演出结束后以乐队名义举办的聚会仍然要求他们本人出席。皇后乐队的其他成员表现出愿意走过场的态度，而莫库里一看到唱片公司老板、各类闲杂人等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像大卫·明尼斯回忆的“脚跟一转，扭头就走”。据明尼斯和其他随行人员说，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控场。如果是弗雷迪自己办的派对，他很乐意当那个周到的主人。而在为他举办的派对上，他表现得会像十八岁的弗罗可·保萨拉第一天到艾尔沃思工艺学校那样腼腆和寡言。跟十几岁学生时代不同的是，莫库里现在发脾气不用考虑父母的感受。他是主唱，是明星，是得到纵容的。

然而，在纽约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却是莫库里回答问题，乐队的其他成员安静地坐在他旁边。“这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摇滚乐的走向？”采访者问道。主唱摆弄着头发，回了一句：“没什么未来的信息，我没有要传达任何事情。”他咧嘴一笑：“就是摇滚啊。”

伊莱克特拉/庇护所公司为皇后乐队安排了两支不同的暖场乐队。不管是南方来的双人灵魂乐组合卡特兄弟^[25]，还是底特律的摇滚乐队鲍勃·塞格与银弹^[26]，都跟主乐队的风格很不一样。虽然美国媒体被这

种“双重风格”搞得有些困惑，但这次巡回演出没发生什么骚乱，也没有重复去年和莱纳德·斯金纳德乐队同台时的冲突。

舞台上的莫库里丝毫没有沉默的迹象。“我要一直唱，直到喉咙像秃鹫的胯裆。”他事先对一名记者这么说。歌曲之间，他把无刺的玫瑰抛向人群，手持香槟向他们敬酒。一场演出中，有位女歌迷冲到舞台前方，在歌曲间隙不断地向他挥手。最后，莫库里小心翼翼地走近，居高临下地问道：“好吧，亲爱的，你想要干吗？”弄明白她只是想摸他一下后，他优雅地牵了牵少女的手，耳语道：“轻轻的一触，献给你。”

巡演的最后几场在圣莫尼卡市民礼堂^[27]举行四晚，结束于圣地亚哥体育馆^[28]，媒体盛赞皇后乐队的“最纯粹硬摇滚”，并预测乐队下次巡演时将会是万人场次级别。到巡演结束时，《波西米亚狂想曲》进入了榜单前二十名，最终定格在第九位。美国对这首歌的热爱可能永远也无法与英国媲美，至少直到莫库里去世后此曲重新发行前。《滚石》杂志的史蒂夫·特纳惊讶于歌曲的叠录和歌词，“既凶残又神秘”，但依然有说法认为皇后乐队只是在欧洲走红，莫库里的那种“舞台女王范”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美国的人气。

在英国，皇后乐队的彩虹剧院现场录像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上映，乐队此时也开始了日本的八场巡演。这次他们得到比第一次来访时更为热烈的欢迎，也让莫库里有了沉迷购物的机会。“日本人称之为‘疯狂血拼’，”他解释说，“我像花衣魔笛手一样一路走着，后面跟着一群人，大声喊：‘疯狂血拼！’”在日本承办商家属的陪同下，莫库里的购物狂欢在空旷的百货商场里展开，这些商场为了让他尽兴，在打烊后专为他开放。之后，把各种古董椅子、衣服、艺术品和日本木刻运回英国的任务就落到彼得·布朗头上。

“彼得是很棒的巡演经理，”卡洛琳·布歇说，“但他有很大的阅读障碍。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管理所有那些文件、行程和时间的……尤其是在日本。显然，他是通过记住每个乐队成员酒店房间钥匙的形状，来分辨哪间房间是谁的。”

盖瑞·兰根在伦敦也目睹了类似的“疯狂血拼”情节。“我想皇后乐队终于从三叉戟那里拿到版权费了。”他回忆道，莫库里先是扫荡了哈罗德百货，出来路过国王大道上的克里斯托弗维恩家居店，又买走一套蒂凡尼的灯具。“他回来时说：‘亲爱的，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买的了！’”

“弗雷迪确实很享受他的财富，”罗杰·泰勒赞成说，“但他也夸大了自己的开销，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容易让人羡慕嫉妒恨。他故意这样做的。”多年的收藏经营，每一件珍品，每一把路易十四的椅子，都是对批评家们、谢菲尔德兄弟们、伊林学院的嗤笑者们的反击。

日本之后，仅用了一周时间调节时差，皇后乐队在4月短暂造访澳大利亚。这是自两年前那次糟糕的桑伯里音乐节以来，他们对澳洲的再次出征。那次演出后，莫库里向观众宣称，皇后乐队再临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此次虽然情况不完全如此，但《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歌剧院之夜》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卖得很好。

皇后乐队在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演出的绝大部分座位都售空了。在悉尼的霍登馆^[29]举行演唱会之前，莫库里发了一回暴风脾气。演唱会的场馆地点正好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集市，汽车无法开进去。乐队被建议步行一小段以通过集市场地，莫库里拒不听从。他非要让他的豪华轿车在人群中慢慢挪动，自己坐在后座上，抿着香槟，无视车外面的辱骂和不满之声。到了化妆室里，怒气冲冲的主唱拿起镜子砸在彼得·布朗的头上，玻璃碎片溅了一屋子。1996年，布朗在复述这次事件时，简单地解释说：“他只是要把火气发在某个人身上，而那次刚好是我。”彼得·辛斯也记得这件事，他指出当时要是砸的是一面大镜子，布朗可能真的会受伤的：“我相信弗雷迪后来又让彼得把玻璃碴清扫干净了。”

“有些时候彼得·布朗自己就是一点就燃的脾气，”卡洛琳·布歇说，“但我觉得他很善于随时检查和维护乐队的情绪。他的兄弟史蒂夫是艾尔顿·约翰的第一任制作人，这两兄弟都来自有救世军宗教组织的家庭背景。这肯定培养了他极大的耐心和坚韧度。”

5月份，在三个月的休假期间，布莱恩·梅与女友克里斯蒂娜·马伦在巴尼斯的圣奥斯蒙德罗马天主教堂^[30]完婚。此时，他已离开那间令人沮丧的伯爵宫单间，夫妇俩在巴尼斯萨福克路买了一幢普通的半独立住宅。他的队友们的生活条件也终于改善了。迪肯买了房，和妻子维罗妮卡、儿子罗伯特住在帕特尼的维多利亚半独立公寓。因为有《波西米亚狂想曲》的B面《爱车狂人》的版权费，罗杰·泰勒的腰包很快鼓了起来，有更多的钱可以支配的他搬到了富勒姆的高档住宅区，后来又在萨里添置了一栋乡村别墅。

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的关系发生了永久性

改变。弗雷迪从他们同住的公寓搬出来，住进荷兰公园斯塔福特排屋12号。随后莫库里在附近给玛丽买了一套价值3万英镑的公寓，作为分手的礼物。玛丽说，“我从自己的浴室就能看到弗雷迪的公寓。我心想，‘噢，我永远都逃不出他的生活。’”玛丽会继续在弗雷迪新成立的公司鹅制作公司（Goose Productions）为他工作。

莫库里和奥斯汀的情侣关系，几乎比他与任何一任男友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尽管情况改变，他们的友谊却持续了一生。对媒体和公众来说，他们还是一对儿。莫库里越发娴熟地装腔作势，巧妙地挡开那些刺探他个人生活和性取向的问题。1976年，被问及他到底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时，主唱回答：“我和男人、女人、猫睡觉，随你列举……”

6月，百代发布了单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英国榜单达到第七名，之后在美国达到十二名。一位百代内部人士分析说，“这首歌和《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两个极端。优美动听的小情歌，没有什么歌剧唱段，长度适中可控，不太会出什么差错”。

皇后乐队一如既往地不知疲倦，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下一个项目了。7月，他们预订了维珍唱片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持有的牛津郡的庄园录音室^[4]，开始创作新专辑。罗伊·托马斯·贝克与皇后乐队的四张专辑制作合同已经到期。双方协商同意，皇后乐队将自行制作他们的第五张专辑，由盖瑞·兰根和迈克·斯通负责音响工程。

“罗伊自信心爆棚，”兰根笑着说，“于是他去了美国。”贝克那时已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签约，忙于制作如伊恩·亨特等人的作品。不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常常会造访皇后乐队，看看他们的进展并提供建议。这两边的关系，像是一位家长操心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始靠自己在世上打拼。“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我们有好处，”莫库里说，“罗伊很不错，但我们觉得此时再不放开就没机会了。”

皇后乐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支能产出热门专辑和金曲的乐队。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成功，而且不能重复以前的创意。罗伊·托马斯·贝克的那句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似乎恰恰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口号。

“皇后乐队从容地应对着《歌剧院之夜》的成功，”盖瑞·兰根说，“这可不是足球队的那种情况，你带出了明星球员，付他们一大笔

工资，然后他们就开始脱离轨道。皇后乐队都是聪明人，他们天资很高，所以处理得很好。”尽管如此，制作一张皇后乐队专辑的高压环境仍然让人难以应对。“有几日吵得非常凶，”兰根说，“弗雷迪是脾气最大的——极度的愤怒，但全部都是关于音乐的。”

那个夏天，人们也看到了主唱的另一面。一天下午，大家在庄园录音室，莫库里要求赶回伦敦去看望生病的玛丽。他的常用车和司机都没在，彼得·辛斯同意借用一辆录音室的车载他回去。在伦敦西部的一个环形交叉口附近，刹车失灵了，汽车撞到路边工地旁的一堆排水管道上。弗雷迪没受伤，他从车里爬出来，大步走去最近的房屋请求借用房主的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站在路边的样子，”辛斯说，“他两天没刮胡子，穿着白色木屐，蓝色牛仔裤，披着一件背后写着‘Queen’的日本和服。”这家住户看见门口台阶上站着皇后乐队的主唱，自然惊讶不已，让他用了电话，还想泡杯茶招待他，但刚好投币式煤气表欠费，又让辛斯讨来几个硬币才烧上水。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听皇后乐队的人说，莫库里后来安排人换了几百英镑的零钱送去那户人家，以示感谢。

经过一个月的制作，乐队意识到他们落后于进度，计划在夏季发布专辑是不可能了。他们推迟了一整个巡演计划，只同意做两场露天演出和两场剧院演出。户外的这两场将于9月在加的夫城堡^[32]和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他们先到爱丁堡剧场^[33]进行了热身表演，这个地方现在由约翰·里德投资，他为自己的艺人包场一周，包括艾尔顿·约翰。在此之前，莫库里在国王大道的一间歌舞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生日聚会，庆祝三十岁生日，每位客人的邀请函都由他亲自手写，一百五十名来宾受到鱼子酱、龙虾和水晶香槟的款待。

加的夫城堡的演出嘉宾有曼弗里德·马恩的地球乐队^[34]、弗兰基·米勒和安迪·费尔韦瑟-卢。跟电影《摇滚万万岁》类似，前深紫乐队吉手里奇·布莱克莫尔的新乐队彩虹原本计划要来，但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安装35英尺高的巨大彩虹装置，未被允许。这次演出中，皇后乐队首演了两首刚刚在庄园录音室录好的新歌。一首是莫库里的《你带走了我的呼吸》（*You Take My Breath Away*），钢琴和歌声戏剧化地交织，歌词已经十分明显地描绘出了那种他正在经历的纠葛感情。布莱恩·梅的《管好你妈妈》（*Tie Your Mother Down*）也是第一次进行公开演出。这首歌的吉他连复雏形产生于他在特内里费天文台工作的那个夏天，“那时我在山顶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弹着一些连复片段，脑海里出现了歌词”。他说。“我以为这标题很差劲，但弗雷迪说这句话对他

有某种意义，只有他知道答案，我怎么争得过他？”《管好你妈妈》在未来的巡演中成为皇后乐队歌单的固定歌曲。

一周后，海德公园的免费演唱会定在吉米·亨德里克斯逝世六周年当日举行，由理查德·布兰森本人组织。1968年，布莱恩·梅曾在公园里目睹平克·弗洛伊德开创了免费演唱会的先河。一年后，滚石乐队也举办了一场。这次皇后乐队作为主乐队，将进行一个小时的演出，其他阵容包括琪琪·蒂、史蒂夫·希拉奇，以及一支来自利物浦的放克乐队超级电压^[35]。这只乐队的吉他手莱斯·卡斯基是弗雷德·保萨拉在伊林艺术学院的同学，但卡斯基在后台遇到弗雷迪·莫库里的时候，却没认出他来（“他比以前变化太多了”）。

超过十五万人涌进公园，首都广播电台的皇后乐队忠实粉丝肯尼·埃弗雷特和其他电台的DJ一起，直播同评这场演出。对罗杰·泰勒来说，海德公园这场演出有一个更大的吸引点：理查德·布兰森那美丽的私人助理多米尼克·贝朗。他将会与她开展一段恋情。

弗雷迪被装在一辆洗衣车的后车厢，偷偷运进公园，他的演出前紧张综合征又犯了。很快他就开始训斥后台的不速之客，要求他们滚去前台看演出。大卫·明尼斯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弗雷迪是在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战，好让肾上腺素爆发。”表演时，皇后乐队将《你带走了我的呼吸》加入歌单，但整场演出延长了三十分钟，过了宵禁时间后被叫停。警察警告莫库里，如果他再上台就会遭到逮捕。演出经理盖瑞·史迪克斯叙述道，虽然弗雷迪因为不能返场而暴怒，但是他并不想“穿着紧身衣蹲局子”。

《唱片镜报》回顾加的夫城堡演出时写道：“皇后乐队不担心竞争，不担心任何事。”他们完全不因观众数量如此之多而烦恼，而是大力拥抱这样的巨型演出。他们想要的更多。“我们总是说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乐队，”罗杰·泰勒说，“事业目标就该是这样。不然怎么说？难道说想成为第四大的乐队吗！”

罗伊·托马斯·贝克对皇后乐队第五张专辑不甚褒奖：“我认为明显有续作的感觉。倒不是说失望，”这位前制作人称，“只是一种观点。”不过，产生这样的对比也是皇后乐队一手造成的。1976年12月，《赛马场之日》发布，和前作《歌剧院之夜》一样，名字同样是取自马克斯兄弟

的电影^[36]，封套上使用的依然是相似的纹章和排版。乐队总是有理由可讲，但布莱恩·梅后来说：“某些方面我希望《歌剧院之夜》和《赛马场之日》是同一时间推出的。这两张专辑是同时写的。所以我认为它们完全平起平坐。”

《赛马场之日》里尽量避免出现《波西米亚狂想曲》或《先知谣》那样的歌曲。它基本上是一张轻快活泼、大制作的流行摇滚乐（“它花的钱和之前那张唱片差不多”，罗杰·泰勒透露说），里面的歌曲可以轻松加入电台播放清单，和E.L.O乐队、洛·史都华、翼乐队^[37]的歌曲一起放。

作为神气活现的开场曲，《管好你妈妈》最大化地印证了弗雷迪说的“不传达什么信息，只是摇滚”，它重现了查克·贝里/埃迪·科克伦式的歌曲氛围：叛逆的青少年，什么都不同意的父母，再加一点点的性。负责节奏的两位成员每人贡献了一首歌：迪肯的《你与我》（You and I）很欢快，但不太可能胜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泰勒的《瞌睡》（Drowse）则是一段躁动不安的童年回忆，幻想着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现在不同寻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鼓手的歌声听起来有一种奇异的幻灭感。

布莱恩·梅的幻灭感则在《远距离》（Long Away）里表露无遗。再一次地，吉他手听起来像是皇后乐队里具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人忙着开香槟和买劳斯莱斯的时候，却追求着更大层面上的人类的互相理解。不过，尽管是出于全然的好意，梅的歌曲《白人》（White Man）却无意中造成适得其反的优越感；大家不想听弗雷迪·莫库里控诉美国土著人民的困境。专辑的最后，他的《让我们携手前行》（Teo Torriatte [Let Us Cling Together]）是一首哀婉动听的情歌，歌曲里竟然出现了日语歌词，这是对日本歌迷表达的谢意。

看起来莫库里似乎沉浸于购物和开香槟，但这些浮光掠影的背后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赛马场之日》里有一些巴洛克式的大作，”梅后来跟《魔力》杂志说，他补了一句，“基本上都不是我写的。”且不说梅是过度谦虚，但莫库里确实超越了自我。

《百万富翁的华尔兹》（The Millionaire's Waltz）的灵感来自约翰·里德，根据弗雷迪的指令，梅花了好几个星期创作出管弦乐团般的吉他声。（布莱恩：“弗雷迪在曲子里加的那些东西让我惊讶不已。我都记不起是怎么达到要求的。”）《你带走了我的呼吸》中，主唱一个人就

是一个唱诗班，而《传统好情郎》（Good OldFashioned Lover Boy）则是一首俏皮的散板爵士乐，外界所不知道的是，它是唱给男友大卫·明尼斯的小夜曲。

《赛马场之日》的功劳不仅仅来自乐队内部。“迈克·斯通就是声乐高手。”罗杰·泰勒说。“迈克是座基石，”盖瑞·兰根证实说，“那些层层叠叠的歌声都是他的作品。罗伊·托马斯·贝克有办法带人们越过障碍，而迈克作为工程师，他的能力是让这些行动成为现实。”

专辑中最盛大、最震撼心灵的歌曲当属《找个人来爱》（Somebody to Love）。这是一首起伏连绵、有着密集钢琴声的灵魂乐曲，如此无与伦比，让人不禁想到雷·查尔斯（梅和泰勒就是弗雷迪的和声伴唱团^[38]）和弗雷迪最喜欢的艾瑞莎·富兰克林^[39]。六年前，在那间住满嗑药的谁人乐队歌迷的房间里，酸奶海乐队的吉他手克里斯·切斯尼曾听见弗雷德·保萨拉正大肆称赞杰克逊五兄弟。《找个人来爱》实现了主唱对灵魂乐的热爱。对媒体来说，皇后乐队唱福音音乐——这个想法听起来太可怕；但在录音室里，它就这么做出来了。

11月，《找个人来爱》作为新专辑的预热，以单曲形式发布。三周内达到了榜单第二名。肯尼·埃弗雷特在电台播放了整张专辑，中间穿插着对莫库里的戏谑采访，同时《赛马场之日》在肯普顿公园赛马场举办了一场提供免费酒水和食物的晚会。八十六岁的格劳乔·马克斯^[40]在彼得·布朗的邀请下，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乐队（“我听闻你们的唱片大获成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专辑名选择上比较明智？”）。布鲁斯·默里参加了一场《赛马场之日》的播放会，遇到了玛丽·奥斯汀。这是默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的昔日校友弗雷迪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知道他是同性恋，但我也不知道，”默里说，“就在当晚，玛丽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开了。她说：‘布鲁斯，我觉得我们假装太久了。’”

12月1日，皇后乐队本来预定要上晚间电视节目《今夜格伦迪秀》（Today With Bill Grundy）。莫库里突然意外地要去看牙医（十五年来第一次），乐队只好取消出席，这让百代的推广人埃里克·霍尔很是犯愁。由于皇后乐队的缺席，霍尔只好提名百代刚签下的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The Sex Pistols）。^[41]节目上他们喝了很多酒，加上格伦迪在旁煽动，这帮人像高中小混混一样大放厥词。造成的后果是历史性的：节目收到的投诉破了纪录，甚至有一名利物浦卡车司机气到砸了电视机。格伦迪的电视生涯结束了，而性手枪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第二天,《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头条大字标题是《污秽与暴怒》,文章问道:“这些朋克青年是谁?”音乐上,他们的风格参照了谁人乐队、滚石乐队和美国车库摇滚:歌曲短小、尖锐,带着虚无主义的讯息。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朋克的反时尚:剪短的头发,撕破的衣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性手枪的形象和想法都是由他们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和他的女朋友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一手打造的,诞生于他们的时装店“性”(SEX)。这家商店位于国王大道,和弗雷迪喜欢出没的同性恋酒吧乡村老表^[42]只隔着几栋楼,但性手枪的主唱约翰尼·罗顿那漂白的头发和放空的眼神,和弗雷迪的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摇滚乐从三分钟长的单曲变成了四十分钟长的专辑和实验性音乐。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风向又转了回来。朋克不需要一百八十个声部叠录,也不需要艺术大师级别的吉他手,他们的宣言是要成为现实生活的镜子。1976年,英国陷入经济危机,失业率普遍上升,通货膨胀率达到13%。1977年的情况更糟糕。朋克时代的许多乐手后来都变得富有、出名和自满,反倒势利盛行,而一支唱着《百万富翁的华尔兹》、演唱会上举着香槟向人群敬酒的乐队,被有些人认为不合时宜,甚至感到无礼冒犯。皇后乐队辩解说他们的音乐让人“消遣避世”;批评家们则认为他们“脱离现实”。11月,皇后乐队发布单曲《找个人来爱》的时候,性手枪乐队发布了单曲《大英无政府主义》(*Anarchy in the UK*)。

皇后乐队和音乐媒体本来就互相不待见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新音乐速递》周刊这时拥有大概二十万读者,它的写手们吹捧朋克有一段时间了。遭到笔伐的对象有齐柏林飞艇、平克·弗洛伊德这样的乐队,而皇后乐队是被黑得最惨的。《新音乐速递》的尼克·肯特写了一篇文章,公开把《赛马场之日》贬为“一等一的怪物”。肯特最看不上的是主唱:“几乎所有带有弗雷迪·莫库里名头的玩意儿都散发着矫揉造作、孤芳自赏、自命不凡的气息。”

八年前,在伊林艺术学院时,弗雷德·保萨拉痴迷和声唱法,曾让一些布鲁斯爱好者表示不能理解。一年后,当他在自己组的乐队里演唱时,他坚持要在歌单里加入几首小理查德的老歌翻唱,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也是很多年里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必备的一首歌曲。一切早已有了迹象。莫库里喜欢出人意料,绝不拘泥于摇滚乐的限制。早些时候,他曾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一名记者,说“比起齐柏林飞艇,皇

后乐队的风格更像莱莎·明奈利”。他在《赛马场之日》里的歌曲和表演充分体现了这种特性，那里面夹带着肖邦、莫扎特、吉尔伯特与沙利文^[43]、诺埃尔·考沃德。他们创作的不仅仅是摇滚乐。《赛马场之日》比皇后乐队之前的所有专辑都更能说明，为什么在将近三十年之后，莫库里的音乐可以在伦敦西区音乐剧舞台上演。但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过头了。

得寸进尺的《新音乐速递》将皇后乐队斥为“绣花枕头”，而莫库里似乎有意火上浇油，他宣称他的音乐是用完就可以扔的，就像Bic牌一次性剃须刀，甚至是使用过的卫生棉条。“可别从字面上理解，”布莱恩·梅说，“这就像弗雷迪第一次被问及是不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说：‘我就像水仙花一样鲜艳，亲爱的。’它巧妙地回避了整个问题。事实上，他说他的歌曲是一次性的，便抵消了任何自负的说法，也不必再就歌曲谈论下去。我太他妈的了解弗雷迪了，我清楚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也知道他歌曲中的深意。不要被他敷衍的自谦误导了。即便是轻描淡写和开玩笑也隐含着情绪的暗涌。”

虽然有《新音乐速递》和性手枪的这些糟心事，皇后乐队还是以英国专辑排行榜第一名的成绩迎来了新年。1月，皇后乐队飞往密尔沃基，拉开美国巡演的序幕。他们的暖场乐队是瘦莉兹乐队。两者的结合火花四溅。瘦莉兹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手菲尔·林诺特在都柏林组建，风格偏硬摇滚，也创作民谣、布鲁斯和凯尔特小调。一年前，瘦莉兹乐队有了一首榜单前十的金曲《男孩们又回来了》（The Boys Are Back in Town），他们刚发行了新专辑《狐狸强尼》（Johnny the Fox），但是他们的吉他手布莱恩·罗伯森在非法经营酒吧的打闹中受伤，乐队的前进就踩了刹车。

由于罗伯森暂时离队，乐队重新找来了他们的老吉他手盖瑞·摩尔，及时加入底特律科博厅^[44]的演出。莫库里此时显然春风得意。他的随从团包括一个体重两百多斤的美国保镖，一个按摩师，还有私人助理保罗·普伦特（此人由约翰·里德的公司任命，后来成为弗雷迪的私人经理），男舞者戴恩·克拉克，他被莫库里挑中，现在作为发型师领薪水。

瘦莉兹乐队的巡回演出经理克里斯·奥唐奈对所见所闻感到惊讶：“他身边围着一群小团体，开口闭口都是‘好的，弗雷迪’，‘不行，弗雷迪’。”他说。“戴恩·克拉克帮他准备好服装，带他去车上，把他送上飞机，然后下来再上另一辆车，再送去场地试音。大多数乐队会在5

点左右试音，然后和工作人员一起在后台用简餐。而皇后乐队是演出后坐下来吃一顿豪华服务的大餐。过了一阵子，布莱恩和罗杰就吃不消了，演出后他们请求和我们一起到俱乐部里去玩。弗雷迪自己被晾在那儿，面对着昂贵的山珍海味独自生闷气，觉得他被乐队抛弃了。他的观念是完成第一晚之后一定要吃正式晚餐.....然后他决定每天晚上都这么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程度的事情。”

1月28日，巡演抵达芝加哥，碰到了零下低温，冰天雪地。从上一场运送设备过来的卡车延迟到达了。尽管天气寒冷，莫库里仍旧无视演出承办商的请求，拒绝让外面排队等候的观众进入会场，直到乐队做完长时间的试音。“其他人没办法，因为是弗雷迪掌控整场演出。”奥唐奈回忆说。后来，演出中，皇后乐队被扔了十几个鸡蛋，梅在表演《百万富翁的华尔兹》时滑倒，莫库里之后怒骂观众（“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并取消了惯常的第二次返场。

在后台，菲尔·林诺特深受皇后乐队的这位同行的行为影响。“弗雷迪让菲尔开始变得很难搞，”克里斯·奥唐奈说，“菲尔脑子里的想法是，你如果不难搞，就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你作为暖场乐队的时候，难搞和要求多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别人也将就不了你。”

巡演路上的诱惑也终结了莫库里与大卫·明尼斯的关系。在美国，这位歌手能够比在英国更自由地放纵自己。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明尼斯承认，“弗雷迪明显和其他人好上了。”在巡演期间，他搭上了一位名叫乔·法内利的二十七岁厨师。

“我们在美国巡演期间，忽然跟着他回酒店房间不是女生而是男生，”布莱恩·梅说，“我们就想‘嗯.....’，但仅限于此。我一直有很多同性恋朋友，只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弗雷迪也是其中一员。”

“问题是，我还记得皇后乐队之前的弗雷迪，”奥唐奈补充说。“看着他发展出雌雄难辨的个性真是很有意思。老天，他这个骗子。在肯辛顿市场厮混，和玛丽·奥斯汀做伴，发展恋爱关系.....没有哪一点能看出来弗雷迪是同性恋。直到他与约翰·里德的公司签约，跟着艾尔顿进入了那个圈子，他才变得越来越花哨，在同性恋群体中更多地表现自我。”

百代的宣传负责人布莱恩·索萨尔陪同一群记者到纽约，为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45]售罄的演出做报道，之后又飞往锡拉丘兹和波士顿跟

进。“我确信弗雷迪在乐队内部‘出柜’了，”索萨尔说，“1977年的时候，他是同性恋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但这肯定也不是个问题。总体上其他人的态度都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弗雷迪做他该做的’。”索萨尔回忆说，乐队“仿佛是足球队打比赛一样一起参加演出”。其余的时间他们各管各的：“布莱恩和克里斯蒂娜在一起，他出国时总是带着英国茶和饼干，还经常收集纸板火柴盒。布莱恩不太寻欢作乐的。”除了纸板火柴盒、茶和饼干之外，布莱恩还带着一张美国地图，上面层层叠叠地标记着巡演路线，包括航班、酒店详细信息和停留时间。

约翰·迪肯也和妻子、儿子一起巡演。“我和约翰一起去一家日本餐馆，”索萨尔记得，“他买了一块高级的精工牌电子表，自带计算器，让他可以汇总皇后乐队在四个不同国家的版权费。皇后乐队的人，尤其是约翰，对业务情况总是很有兴趣。我记得当时想，‘马克·波伦从来都不会这样……’”

有一晚出去玩，索萨尔陪同菲尔·林诺特、罗杰·泰勒去了CBGBs俱乐部，这是纽约朋克的枢纽之地。“和罗杰出去玩总是花花世界，但也总会在酒吧里被问这问那。罗杰是派对狂，布莱恩和约翰不是，弗雷迪是他自己的派对狂。”虽然巡演中基本没有毒品出现，但莫库里已经开始吸食可卡因。嗑过之后，弗雷德·保萨拉能够更容易地“化身”为弗雷迪·莫库里。

布鲁斯·高尔斯飞往迈阿密，为他们拍摄单曲《管好你妈妈》的宣传片。两周后，皇后乐队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的两晚演出均售罄。在演出之间，他们拜访了格劳乔·马克斯，把代表《歌剧院之夜》和《赛马场之日》销量的金唱片赠予他。这次见面合影的时机刚好，五个月后，格劳乔就去世了。

旧金山演出之后，莫库里的喉咙再次出现问题，上次美国巡演的时候他就饱受困扰（“我要少喝点红酒了”，他对一位记者说）。一些演出场次被取消——不过最终巡演得以继续进行，到温哥华和阿尔伯塔完成收尾。皇后乐队和瘦莉兹乐队互相尊重，也互相挑战。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夜晚是属于皇后乐队的；而拿骚体育馆^[46]是瘦莉兹乐队占上风……不过克里斯·奥唐奈承认说：“不管瘦莉兹表现多么好，一旦皇后乐队状态全开上场，大多数晚上他们都只能望而兴叹。”在美国榜单上，《赛马场之日》排到了第五名，《找个人来爱》排在第十三名。

这次巡演，还让弗雷迪和一位皇后乐队组队之前的老友重聚。伊林

艺术学院的马克·莫尔登自1969年后一直生活在加拿大。他买了皇后乐队在蒙特利尔论坛体育馆^[47]演出的票，经过数小时的等待，设法见到了阔别八年的朋友。莫库里很惊讶能见到他。“演出结束后，我接到戴恩·克拉克的电话，说：‘我们在楼下大厅的酒吧，弗雷迪想请你来喝一杯。’”莫尔登说，“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但弗雷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哎，马克，你想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啊。’他说：‘每个学校的同学来找我都有所求。有一个想让我给他们的衣服做模特.....我只能拒绝，然后他们就不高兴.....’说到这里，我发誓说我绝对不找他要任何东西。”

莫尔登能够看出他的朋友承受着压力，也目睹了他是如何被一群助手、跑腿和随从团团包围，“问题就是人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这让他对谁都有戒心。但是，对我来说，他不是弗雷迪·莫库里。我还是把他当成弗雷德·保萨拉。”然而，随着皇后乐队越来越成功，了解弗雷德·保萨拉的人也越来越稀少。

皇后乐队回到英国时，国家正处于一段精神分裂的时期。那年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登基银禧年，为了庆祝她在位二十五年，全国的商店热销王室纪念马克杯、盘子和茶巾，几乎每一种可出售的小玩意儿上都印着女王那蒙娜丽莎一般的微笑头像。全国各地都计划在那年夏天组织街头欢庆派对。而另一方面，百代签下的“叛逆小子”乐队性手枪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第二支单曲《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48]，这首歌发布后，5月份在排行榜上冲到第二位，有人认为是被有意拖下第一的位置，以挽回处于大庆之年的王室的一点颜面。

《管好你妈妈》3月份发布，但只能算稍微有些热度（勉强跻身美国榜单前五十名）。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失利，他们不仅输给了性手枪及同期崛起的新朋克乐队，还被大卫·鲍伊、布莱恩·费瑞和皇后乐队曾经的暖场乐队——大先生乐队甩在身后。大先生乐队的《罗密欧》这个月成了排名前五的金曲。

皇后乐队继续上路，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演八场，随后在英国演十一场。莫库里依然如鱼得水。他每场必用香槟向观众敬酒，把康乃馨抛向前排。他不断变换着舞台服装：包括连体功夫服、丝绸的超短热裤搭配和服，还有和苏联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一模一样的芭蕾舞服。他的身后，是队友狂风骤雨般的演奏，诸如《人型死神》《布莱顿摇滚》《骗子》和《活出精彩》这种华丽而夸张的重金属歌曲，在大型场地听起来特别爽。

在伯爵宫的演出中，皇后乐队启用了他们目前为止最炫目的舞台道具：一个皇冠形状的特制灯光装置。在大量干冰制造的烟雾中，它会在演出开始时冉冉升起，演出完成后又沉沉降下。装置重达2吨，花掉账户里可观的5万英镑。除了能够打造视觉奇观，这全套装备也算是给诋毁者兜头一句“去你妈的”。幕后，一位百代的高管回忆，他曾在格拉斯哥阿波罗剧院演出后跟莫库里见面：“他跟我说他搞不懂朋克这回事。对他来说，那就不是音乐。”这位高管认为朋克“能够在音乐市场上立足，只是年轻人告诉你他们的诉求”。也难怪，弗雷迪·莫库里在舞台上自信无畏，他似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疑虑。

6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包含《传统好情郎》和一些从前的歌曲：《白皇后（情之所起）》《人型死神（献给.....）》《公寓谐星》。让乐队欣慰的是，它在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七位。与媒体针锋相对时，莫库里依然保持着戏谑轻蔑的姿态。那年夏天，接受《新音乐速递》的托尼·米切尔采访时，他力推皇后乐队的广泛音乐风格（“我喜欢芭蕾”），解释对歌迷不够热忱的态度（“你期待什么？到处走动，和前排观众喝茶吗？”），并回应了批评《赛马场之日》是《歌剧院之夜》狗尾续貂的说法（“我们的灵感才没有枯竭呢！”）。

仅仅十二个月前，也是在《新音乐速递》上，托尼·米切尔对《歌剧院之夜》满是溢美之词。而现在他觉得主唱的态度很疏远人。“我曾认为皇后乐队是一支具有开创性的摇滚乐队，”几年后，米切尔说，“但是弗雷迪·莫库里十分轻蔑地对待我。他彻底与现实脱节了。”

《新音乐速递》的这篇采访刊登出来了，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标题：《弗雷迪·莫库里：一个大傻逼？》。

[1] Rudolf Nureyev，苏联男芭蕾舞家，被誉为“芭蕾之王”，1993年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

[2] 英文名为“The Pirates of Penzance”，1880年在伦敦首演的传世歌剧。

[3] 下文中同名电影的中文译名为《歌声俪影》，与皇后乐队的这张专辑译名不同。

[4] 英文名为“Old Nag's Head”。

[5] 英文名为“D'Oyly Carte”。

[6] 它是古兰经的第一个词语，意为“以真主之名”。

[7] 外文名为“Motörhead”。

[8] 英文名为“Sarm East Studios”。

[9] 英文名为“Scorpio Studios”。

[10] 英文名为“Rag, Tag and Bobtail”，是BBC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播放的手套木偶儿童剧，由三只动物做主角。

[11] 英文名为“Elstree film studios”。

[12] 英文名为“Radio City”。

[13] 英文名为“Coventry Theatre”。

[14] 此为英国摇滚乐队Mr. Big，非美国同名乐队。

[15] 英文名为“Roundhouse Studios”。

[16] 原文是天鹅，但实际是凤凰。

[17] 英文名为“Free Trade Hall”。

[18] 英文名为“Hot Chocolate”。

[19] 2015年11月20日，皇后乐队发行了重新录制和修复版的该演唱会现场CD、DVD、SD蓝光和黑胶，名为《剧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deon）。

[20] Salvador Dali（1904—1989），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21] 英文名为“Thursday Club”。

[22] 英文名为“Beacon Theater”。

[23] 英文名为“Electric Lady Studios”。

[24] 他们为《令我疲惫不堪》（You Nearly Did Me In）伴唱和声。

[25] 英文名为“The Cate Brothers”。

[26] 英文名为“Bob Seger and the Silver Bullet Band”。

[27] 英文名为“Santa Monica Civic Auditorium”。

[28] 英文名为“San Diego Sports Arena”。

[29] 英文名为“Horden Pavilion”。

[30] 英文名为“St. Osmund's Roman Catholic church”。

[31] 英文名为“Manor studio”。

[32] 英文名为“Cardiff Castle”。

[33] 英文名为“Edinburgh Playhouse”。

[34] 英文名为“Manfred Mann's Earth”。

[35] 英文名为“Supercharge”。

[36] 马克斯兄弟的另一部电影《赌马风波》（A Day at the Races）。

[37] 英文名为“Wings”。

[38] The Raelettes，是美国女声合唱团，专门为雷·查尔斯伴唱。

[39] 雷·查尔斯被称为“灵魂歌王”，艾瑞莎·弗兰克林被称为“灵魂歌后”，两人都是伟大的灵魂乐歌手。

[40] 马克斯兄弟喜剧组合的弟弟，哥哥奇科·马克斯已于1961年去世。

[41] 2017年，布莱恩·梅做客性手枪乐队吉他手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主持的电台节目《琼西的点唱机》（Jonesy's Jukebox），提到这次事件时表示，皇后乐队缺席这期节目的原因也是他听说的，不知是真是假。

[42] 英文名为“Country Cousin”。

[43] Gilbert and Sullivan，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名的歌剧作曲家组合，著名作品有《班战斯的海盗》等。

[44] 英文名为“Cobo Hall”。

[45] 英文名为“Madison Square Garden”。

[46] 英文名为“Nassau Coliseum”。

[47] 英文名为“Montreal Forum”。

[48] 一首大肆讽刺王室和女王的歌曲。

第七章 嘞——嘞——嘞！

我去后台了，可能要来一次口活……

——1978年10月31日，弗雷迪·莫库里于新奥尔良城市大礼堂^U

在人们想象中，我们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其实不然。

——1978年11月1日，第二天早上，罗杰·泰勒说

三十五层楼高的中点大厦^U坐落于伦敦查令十字街，这座高耸的建筑落成已经超过四十五年，一直以来，旅游观光客们从托特纳姆宫路地铁站冒出来，眨着眼睛抬头张望时，会将其当作辨别方向的标志性建筑。它的对面伫立着领土剧院。1957年秋天，朱迪·加兰曾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月的现场表演。2010年时，皇后乐队的音乐剧《我们会震撼你》在这里进入演出的第八个年头。

剧院大门上方，树立着一尊皇后乐队已故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雕

像，它是如此庞大，显得音乐剧本身的金色标志十分小巧。这座雕像复制了雕塑家艾琳娜·塞德莱卡位于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原作。遗憾的是，雕像的脸部似乎随机选取了不少有一字胡的二十世纪名人作为参考，包括约瑟夫·斯大林、萨达姆·侯赛因，甚至是演员汤姆·塞莱克。不过，塞德莱卡的雕像再现了弗雷迪那标志性的姿势，右手高举握拳向天，左手握着带短架子的麦克风。只要不仔细看脸部，姿势本身已经足够以假乱真。

如果回到二十世纪，弗雷迪·莫库里的雕像竟然能作为西区地标，和中点大厦正面呼应，似乎让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会震撼你》现在已经是领土剧院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了。你不禁想象，当年伊林艺术学院的学生弗雷德·保萨拉低头溜去苏豪区大帐篷俱乐部看演出的路上，曾有多少次抬头看过领土剧院的广告围板？后来，在皇后乐队的早期，莫库里和布莱恩·梅一起乘坐9路公共汽车，从肯辛顿到三叉戟录音室的途中，他们也曾经路过剧院，瞥见上面贴着的《骗中骗》（*The Sting*）、《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等当时各种好莱坞大片的海报。

《我们会震撼你》，这首后来用作音乐剧名字的歌曲录制于1977年夏末。在完成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程后，罗杰·泰勒急于继续工作，为策划中的独立项目制作四首曲目的样带。其中之一是翻唱百乐门乐队^[3]在1967年的歌曲《（我要）证实》（[I Wanna] Testify）。泰勒演唱的版本由迈克·斯通共同制作，8月份作为个人单曲发布。这首歌花了泰勒5000英镑，未能上榜，但泰勒解释说“只是图个乐”。当然了，他现在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

此时泰勒正与多米尼克·贝朗谈恋爱，不过还没有像他的两位队友那样关系升级到结婚生子阶段。维罗妮卡·迪肯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到年底，布莱恩和克里斯蒂娜·梅也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莫库里复杂的爱情生活里，美国人乔·法内利取代了大卫·明尼斯，莫库里的一个朋友说，法内利是一个“可爱、天真的男孩，被连根拔起，卷入弗雷迪的生活漩涡”。一方面，特别是梅不愿很快回去搞巡演，觉得这对他的家庭关系造成压力，另一方面泰勒和莫库里却巴不得再次出去浪。

“我们变得孤僻、封闭、自我保护，”一年后鼓手承认说，“我想我们手头的时间太多了。我们被困在英国，不开工的时候我们就处于一种极度抑郁的状态。我们有点厌烦，也缺乏灵感。”

公开场合中，皇后乐队依然维护着《赛马场之日》和《歌剧院之夜》，但在私下，布莱恩·梅承认说“这两张可能是有点制作过度了”。就像吉他手说的那样，下一步的计划是“做一张更顺其自然的专辑”。他们并不在意音乐的流行趋势或媒体的批评蔑视，而是尽可能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罗杰·泰勒坦白说，“我认为《赛马场之日》是我们做过的最杰出的一张专辑，但它的销量并没有《歌剧院之夜》好，其实不应该如此。”至少泰勒自制的样带里，有一首歌正指着未来的方向。

除了《（我要）证实》，泰勒还录了三首歌：单曲的B面《打开电视》（Turn on the TV），以及《内部抗争》（Fight From the Inside）和《绝对心脏暴击》。最后这首，正如歌曲标题已经说明的，早在1974年皇后乐队发布同名专辑时就有了想法。新完成的《绝对心脏暴击》是一首节奏爆裂的摇滚歌曲，有着朋克的神韵和活力，但其实想法比那些乐队早了将近四年。尽管据说莫库里跟百代高管表述过他对朋克的反感，但他的队友似乎稍微能接受一些。二十八岁的泰勒对反映青少年叛逆歌曲的喜爱，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他跟采访者说，他喜欢“性手枪乐队及粗犷的摇滚形式”，但对大肆炒作持怀疑态度。同样，梅也赞扬了性手枪的“激情与能量”，但他有些担忧这种音乐中的自毁倾向：“也许我比较受到庇护吧，我对他们衍生出来的那些东西不是很理解。朋克精神整体上有点装腔作势，我始终没有太当真。”

约翰·迪肯呢，一如从前，什么意见也没有表达。不过，一年后贝斯手突然换了一个极短的发型，让他获得了“鸟人”的外号，这是来自电影《阿尔卡特兹的鸟人》（*The Birdman of Alcatraz*）里面那个由伯特·兰卡斯特饰演的剃头囚犯“鸟人”。他就好比滚石乐队的查理·沃茨——后者是乐队里最不像嬉皮士的人，在滚石乐队刚刚发布的专辑《遍体鳞伤》（*Black and Blue*）中他也抛弃了飘逸的长卷发。和沃茨一样，迪肯是皇后乐队里永远的务实派。他回避着公众视线，似乎很不喜欢音乐产业的浮华和虚伪，只要能玩音乐和赚大钱就很满足了。在皇后乐队的下一次巡回演出中，迪肯会穿着衬衫和细领带上台，就像他曾经在反对派乐队里穿的那种。奇怪的是，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打扮让他看起来倒是果酱乐队^[4]的成员，他们是朋克狂潮中最受乐评界好评的新晋乐队之一。

有了泰勒的鞭策，皇后乐队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期限，必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推出一张新专辑。同时，预定在11月举行的美国巡演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时完成录音。录音过程将从7月开始，到9月结束，分

别在西伦敦的巴辛街录音室^[4]和北伦敦的威塞克斯录音室进行，后者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间教堂改制而成。工作节奏的加快，似乎也让弗雷迪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花在古玩购买和苏富比行拍卖上。

这张新的皇后乐队专辑将被命名为《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据称格劳乔·马克斯拒绝了他们想要再次使用电影《鸭羹》（*Duck Soup*）当新专辑名字的请求。“据传，格劳乔给他们拍了电报，”百代的鲍勃·默瑟说，“说他不希望下一张皇后乐队专辑名用《鸭羹》，而且他还开玩笑说：‘我倒是希望你们考虑用我的下部电影的名字来命名，它叫作《滚石乐队金曲精选》。’”

那年秋天，英国专辑排行榜上是芭芭拉·史翠珊、瑞典流行巨星组合ABBA和前卫摇滚乐队“是”乐队这样的奇特组合，“是”乐队还曾是皇后乐队早期的灵感来源之一。前十名里只有扼杀者乐队^[6]的上榜代表着朋克的日益普及。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鲍勃·马利的哭泣者乐队^[7]刚刚在巴辛街完成了他们的《出埃及记》（*Exodus*）专辑，同时，皇后乐队所谓的强敌性手枪乐队就在威塞克斯录音室的B房间，进行他们的首张专辑《管他什么扯淡（这儿是性手枪）》（*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的最后润色。

后来成为伦敦首都黄金电台（Capital Gold radio）节目导演的安迪·特纳，在1977年夏天时年方十八，刚刚开始威塞克斯公司做助理音响工程师（“基本上我就是皇后乐队的泡茶小弟”）。上班的第一天，他被告知接下来两个月他将跟着皇后乐队工作。“我是粉丝来的，”特纳如今说，“我在《老调重弹》节目上听过《活出精彩》之后，就很崇拜布莱恩·梅。”虽然嘴上说着要做一张“顺其自然”的专辑，但在皇后乐队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顺其自然的。“开工第一天，一辆卡车载着罗杰·泰勒的架子鼓来了。我们把它们卸下来搬进录音室A房间，然后接下来两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鼓调音。罗杰坐在那儿，和他的鼓器技师一起，挨个儿给每只鼓敲过去调音……那天是星期一，而乐队其他人要星期三才来。我记得当时心想：‘我去！每小时收费200英镑，就用来干这个啊。’”

和《赛马场之日》一样，皇后乐队仍然计划与工程师迈克·斯通共同制作专辑。“威塞克斯从来都是用内部制作人，所以这么做很不寻常，”特纳回忆说，“于是这位‘美国来的大制作人’加入项目里面，就有了很多额外的事情。”斯通来了之后的第一个改变是带来一套全新的录音室扬声器。“我没觉得之前的那套有任何问题。但迈克却弄爆了一

套。再说了，我觉得皇后乐队也负担得起……”

每小时付200英镑的金主皇后乐队也获得了其他特权。“我为弗雷迪服务的职责之一，是每天早上在他来之前，去达尔斯顿大街的面包店给他买些吉卜林（Mr Kipling）牌的杏仁酥来配茶。”安迪说。有一晚录音录至深夜，莫库里邀请特纳和录音室年轻的设备维护工程师霍华德一起去参加聚会。两人礼貌地谢绝了，不过在录音期间安迪享受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特权。“本来呢，弗雷迪告诉我乐队其他人不允许吃他的杏仁酥，但是我可以吃。老实讲，我觉得弗雷德就是随口说说罢了……”然后一天下午，布莱恩·梅踩了红线。“布莱恩问也没问就拿了一片杏仁酥吃，结果爆发了一场小争吵。弗雷迪高声宣布：‘谁都不准碰我的杏仁酥，谁都不行……除了安迪！’”

回到新专辑制作上，罗杰·泰勒的《绝对心脏暴击》很快完稿，鼓手演奏了除吉他独奏之外的全部乐器。泰勒的另一首新歌《内部抗争》较弱，歌词听起来像是在敲打某种不持久的音乐趋势，当然不必说，指的就是朋克。然而不久之后，皇后乐队就会与摇滚乐界的头号公敌打照面了。工作人员彼得·辛斯记得，1976年皇后乐队在威塞克斯录音室制作《赛马场之日》时，曾见过性手枪乐队的约翰尼·罗顿（真名约翰·莱顿）。（彼得：“他看起来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啊，那些流言都哪儿来的？”）去年6月，莫库里接受《新音乐速递》的采访时（就是《一个大傻逼？》那篇），曾谈论对芭蕾的喜爱。

据辛斯说，性手枪乐队的贝斯手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原名约翰·里奇）撞进威塞克斯的控制室，醉醺醺地问莫库里：“你想给大众推广芭蕾舞，有成功吗？”“然后弗雷迪接口说‘你是叫希坦利·凶残什么的对吧’，就把他推出去了……”不同人讲的版本不一样。其他人记得的是，莫库里讽刺地呛声道：“是啊，凶残先生，亲爱的，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呢。”另一个可能虚构的故事是，维瑟斯或是罗顿曾在莫库里弹钢琴时，手脚并用地爬进他的录音室。

“我们那时常常在走廊里碰到他们，”布莱恩·梅说，“我和约翰·莱顿聊过几次，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们聊些和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不太记得弗雷迪与席德有过那段历史性的对话。但我记得席德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刚刚从学校出来的那种。”

罗杰·泰勒回忆说，皇后乐队和性手枪乐队从前“用非常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彼此”，直到他们在吉他手史蒂夫·琼斯和鼓手保罗·库克身上找到

了共同点。“他们是脚踏实地的人，”泰勒说，“但是约翰尼非常有感召力。”除了发型、服饰和银行存款数目不同，两支乐队的主唱其实有很多他们自己不屑承认的共同点。就像“弗雷迪·莫库里”一样，“约翰尼·罗顿”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形象。莱顿和保萨拉其实本质上都是内向的男孩，为了掩饰种种不安感，他们都创造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舞台人格。

皇后乐队的前任经理杰克·内尔森曾说过：“当我和乐队进入机场时，一个人会停住，一个人右转，一个人左转，还有一个人径直往前走。”《世界新闻》是皇后乐队第一张真正凸显出这些差异的专辑。多样性曾是皇后乐队的卖点；而现在多样性产出了一张不算特别融合的专辑。其中几乎能与《绝对心脏暴击》分庭抗礼的是布莱恩·梅的《为时已晚》（It's Late），一首大鸣大放的摇滚歌曲，波折起伏的歌词写了一段三角恋情史。（梅：“是关于我经历过的各种事。”）通过这首歌，吉他手的信念“《世界新闻》将帮助皇后乐队找回根本，重新焕发活力”得到了体现，但专辑里并不是每一首歌都很成功。

约翰·迪肯相对老套的《谁需要你》（Who Needs You）（被音乐报刊描述为类似“卡门·米兰达四十年代的那种音乐剧”）和莫库里《我的忧郁蓝调》（My Melancholy Blues）虽然都很好，但不够有特色。迪肯更出色的作品是洒脱的流行歌曲《展翅高飞》（Spread Your Wings）。梅创作的两首歌，含有管弦乐式吉他的《死了，都死了》（All Dead, All Dead）比伪布鲁斯歌曲《睡在人行道上》（Sleeping On The Sidewalk）要好。“那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首歌”，吉他手说，但它也最快被遗忘。

莫库里的《躺下，做爱》（Get Down, Make Love）则好得多。点缀的钢琴和放克的律动体现了纽约同性恋酒吧里的那种节奏布鲁斯和舞曲风格。歌词唱着纵欲的欢庆（“纽约这个罪恶之城。我一到那里就会很放荡。”弗雷迪说）。同时，为了坚持“不使用合成器”的乐队策略，布莱恩·梅用“绝世红”和一块音效踏板，为这些描述刺激性事的歌词配上了魔幻噪声。

10月份，皇后乐队因《波西米亚狂想曲》被授予大不列颠奖，同时此曲与普罗科尔·哈鲁姆的《一抹苍白的浅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并列称为“过去二十五年的最佳英国单曲”。同月，他们将《世界新闻》前两首歌作为双A面单曲发布：《我们是冠军》以及《我们会震撼你》。摇滚乐队宣称自己天下无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极少有乐队

将这种无敌确凿地写成了歌。

“《我们是冠军》是我写过的最自负的歌。”弗雷迪承认。他说，受到足球比赛中人群大合唱的启发，他想写点东西，献给皇后乐队演唱会上他称之为“普罗大众”的观众。“我觉得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弗兰克·辛纳屈的）《我的人生路》（My Way）的莫库里版本，”他补充说，“我们成功做到了，当然并不容易。”

“我听到歌词时惊呆了，”布莱恩·梅告诉《魔力》杂志，“我记得我说，‘你不能这么搞啊，弗雷迪。你会被生吞活剥的。’弗雷迪说：‘不，我们可以的。’”他是对的。在莫库里的自信推动下，《我们是冠军》从开场的优美抒情一路高歌到结尾的极致澎湃。整首歌曲中，他的声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怀疑。皇后乐队在新伦敦剧院^[9]为这支单曲拍摄了宣传视频，弗雷迪身着他的尼金斯基芭蕾舞服，在将近一千名受邀歌迷面前，引领他们一起合唱。过了一遍之后，歌迷的反应就好像这首歌他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跟《活出精彩》或者《七海雷耶国》一样。

歌词中那句无畏的宣言“没空理输家”（no time for losers）似乎是皇后乐队对批评家们的讽刺（“他们在赚钱的优势上确实是冠军”，《滚石》杂志的巴特·特斯塔写道，似乎是在举手投降。）泰勒和梅在谈论这首歌时，总是坚持说莫库里写的时候是带着玩笑意味的，鼓手还说，“这里的‘我们’是一个笼统的群体概念，我们都是冠军。”

即使听众觉得自己被看低了，在销量上倒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是冠军》在英国榜单达到第二名，在法国拿下冠军（并破纪录地持续了十二周），在美国排到第四名。正如布莱恩·梅所说，这首“一开始让我们笑倒在地”的歌曲后来竟成了“体育界、政治界……所有领域的国际性圣歌”。

单曲的另一面由布莱恩·梅写就，同样是一首自信满满的歌曲。“我们在斯塔福郡宾利音乐厅^[10]进行了一场盛大演出，走下舞台后，观众们还在一直唱着歌，”梅回忆道，“隔天早上醒来，《我们会震撼你》的灵感出现在我脑海中。特别是考虑到，弗雷迪和我都认为，写一首能让听众参与的歌曲一定很有趣。”除了最后一段出现摩擦短促的吉他独奏外，整首歌曲几乎只有莫库里的歌声，加上他自己、乐队成员，以及录音那天碰巧在威塞克斯录音室的所有人的拍手声和跺脚声。“伴奏里面没有鼓声，”梅透露说，“全部都是拍手和在木板上跺脚的声音，然后用简单的延时机器在录音机上反反复复地叠录多次。”

“《我们会震撼你》真是展示了迈克·斯通的创造性。”安迪·特纳说。斯通把威塞克斯录音室能找到的人都叫上，录了大约十五遍，仅用这些人的两次跺脚和一次拍手就构成了整首歌的节奏。“那天傍晚，他们把我，霍华德，还有住在录音室隔壁出租房里的泡茶阿姨贝蒂叫上，让我们都站到鼓台上，”特纳笑着说，“我们就站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嘞——嘞——嘞’。”

那年，在百代的秋季销售大会上，布莱恩·索萨尔充分利用了这两首歌曲。“大会用《我们是冠军》和《我们会震撼你》做主题，于是我们给每个人发了类似足球比赛周边的围巾。”他说。为了营造相同的氛围，索萨尔聘请了体育专家、《大赛》（*The Big Match*）节目的主持人迪基·戴维斯为大会友情出场。“然后我们放出两首歌，所有人都站起来，全场都燃了。”

《我们是冠军》在美国单曲排行榜上盘桓了超过六个月，后来被纽约洋基棒球队定为队歌。距离伦敦千里之外的北卡罗来纳州，接下来许多年里，潘奇加尼的校友苏巴希·沙阿在观看喜爱的棒球队比赛时，会一次次在加油助威中听到皇后乐队这首《我们会震撼你》。沙阿是爵士乐迷，对流行音乐不太感兴趣，直到莫库里去世后，他才知道自己耳熟能详的歌声，竟是来自童年好友，“龅牙仔”保萨拉。

皇后乐队依旧我行我素，他们回绝了百代，不同意在《世界新闻》的专辑封面上放乐队照片。相反，他们聘请了美国艺术家弗兰克·凯利·弗雷亚斯，请他创作一个类似于1953年的《惊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杂志封面的作品。弗雷亚斯更新了原作中面容阴郁的机器人，让它用机械手臂抓住并托起皇后乐队的成员。作为噱头，百代开发了宣传用的机器人形大钟。“是那种很重很沉的老爷座钟，”布莱恩·索萨尔说，“特别贵，但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每一分钱都要用掉。原则就是：‘我们能花多少钱让乐队和我们都感觉不错？’”

到了1977年，百代的索萨尔和鲍勃·默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如今的皇后乐队和他们七十年代早期遇到的所有乐队完全不同。“皇后乐队会为同一个目的来参加市场会议，”默瑟笑称，“他们是团体捕猎动物。”布莱恩·索萨尔认为，专辑封套图片的争执正是时代发展的象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时点，唱片公司就管控不住旗下艺人了。你可以归因于《月之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这张专辑。所以那是皇后乐队利用这一点的最佳时机，当然他们完美地用到了极致。就像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一样，皇后乐队自己出专辑，自己做专辑封

面，你的工作就是像工蚁一样好好卖专辑就行了。他们是为七十年代而生的完美猛兽。”

一次午餐时间，索萨尔和营销助理带莫库里去百代办公室附近曼彻斯特广场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那是一家很棒的餐馆，食物很美味，但我记得弗雷迪就要了一份生菜，”索萨尔轻笑道，“午饭后，天气很好，弗雷迪决定要步行回办公室。大概就沿着曼彻斯特广场边缘走50码的距离。但他的豪华轿车司机必须驾驶陪同，用步行速度跟着，车门打开以防弗雷迪走累要坐车。弗雷迪是明星，但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明星都要大牌。”

11月，虽然有百代的机器人老爷大座钟和响彻街头巷尾的《我们是冠军》，《世界新闻》专辑在英国榜单只取得第四名，这是自《皇后II》以来的最低排名。风水轮流转，位居榜首的是同在威塞克斯录音室制作的性手枪乐队的首张专辑。那时，皇后乐队正在美国做巡回演出，《世界新闻》成了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张榜首专辑，于是英国的打击便显得不那么沉重。“那个年代，任何说他们不想争上游的乐队都是在撒谎，”罗杰·泰勒说，“我们一直都是，‘妈的，我好希望我们能达到齐柏林的地位’。或者是，仰望‘是’乐队这样的乐队，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

3月的那次巡演，皇后乐队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门票全部卖光后，他们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打破“是”乐队在同一场馆售罄三晚的纪录。1977年12月，他们售罄了两个晚上。“我们永远在努力更上一层楼，”梅说，“今年卖一百万张专辑，明年就要卖两百万张；这一次麦迪逊广场花园卖空一晚，下一次就要卖空两晚……”

对布莱恩来说，这场演唱会也是他的一次私人胜利。梅的父亲哈罗德一直纠结于儿子的职业选择，即使皇后乐队有了畅销单曲和专辑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在航空部的工作项目是设计协和式飞机的盲着陆设备。那年约翰·里德安排乐队的朋友和员工乘坐雷克航空的空中列车飞机飞往纽约观看演出，梅则做了更棒的决定，“我给爸爸买了协和飞机的机票，请他来看我们演出。他一辈子都在为协和飞机工作，却从来没有真正乘坐过。他来看了我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唱会，演出结束后，他走到我跟前说：‘好，行吧。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刻真是美好。”

舞台表演上，皇后乐队依旧执行着他们的策略，用弗雷迪的话说就

是：“越大越好——所有东西都是。”梅和莫库里以《我们会震撼你》开场。排山倒海、震耳欲聋的节奏轰炸着广阔的场馆，乐队其他两位成员强力加入，一起演奏这首歌加速的、几乎就是朋克摇滚的版本。此时，皇后乐队那个60英尺的“皇冠”装置从舞台上缓缓升起，笼罩于上方，在浓厚的干冰烟雾中，它放射出炫目的光芒。四个月后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电影观众也会看到类似的效果。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弗雷迪·莫库里穿着纽约洋基队棒球服在台上游走，引起高声欢呼。在波特兰，观众集体大合唱《一生挚爱》。在圣地亚哥演唱会之前，喝醉的约翰·迪肯的手砸破了厚玻璃窗，之后他打好了绷带，继续上场表演。大多数晚上，皇后乐队都翻唱了《监狱摇滚》，向当年8月突然去世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致敬。

《滚石》杂志的切特·弗利波在纽约看了第一晚之后，写道：“你无法定义皇后乐队的歌曲，到底是谁人、齐柏林飞艇、披头士那样的，还是冗长诵经般的格里高利圣歌。从吸引观众上看，他们的工作干得不错。我只是没明白到底是个什么工作。”在美国，皇后乐队仍然被认为是一支重摇滚乐队，有着异于寻常的戏剧般表演风格的主唱。他们在某些音乐上的癖好，比如带有过去“麦克叔叔”的《童谣精选》和七戒合唱团^[4]风格的歌曲现场，并没能像录音室版本那样被很好地传达。弗吉尼亚州诺尔佛克的乡亲们更愿意被《我们会震撼你》《布莱顿摇滚》或者《我既在此》这样的歌曲轰炸。皇后乐队的新奇歌曲《睡在人行道上》开场演过一次之后，便在接下来的巡演中被搁置。

台下，前狂热乐队的主唱布鲁斯·默里在阿拉丁剧院^[5]见到了莫库里：“我母亲住在拉斯维加斯，我看到皇后乐队要去那里演出就去了。”不过，在后台，默里能看出来他的老友现在过着多么不同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一个跟班，”他说，“弗雷迪那时满心都是同性恋的事，说实话，我感觉到后台有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分隔。”两人友好地告别，而这成了默里与弗雷德·保萨拉最后一次见面聊天。

表演时，莫库里和往常一样卖力。美国媒体将这位歌手形容为“骚得让人又讨厌又喜欢”，他此时剪了一个稍短一点的时髦发型，舞台服装也多了一件皮制摩托夹克。弗雷迪会以“谢谢大家，和你们做生意真是愉快”来结束演出，这句俏皮话让一些批评家很不满，认为太见利忘义。伊恩·亨特在多伦多枫叶花园^[6]看了一场演出，被一个意外逗得大笑。“布莱恩·梅的扩音器炸了。”亨特回忆说。吉他手赶紧冲过去告诉

莫库里，他正坐在钢琴前，没意识到麦克风开着，观众可以听到他说的每一个字。亨特说：“弗雷迪挥手赶开布莱恩，说：‘哎呀，你就随便蹦蹦跳跳两下，底下这些蠢货听不出来区别的。’”

12月22日，皇后乐队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演出。这是他们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也是连演三场中的最后一场，有6.4万人来看了他们的演出。乐队返场时演唱了临时排练的《白色圣诞节》（White Christmas），保镖打扮成圣诞老人，经理约翰·里德扮成小精灵，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都扮成驯鹿。一天后，他们飞回英国。不管莫库里在美国还有多少“放荡”的事情要做，他心里也惦记着别的事：“我要是不回家过圣诞节，我妈会杀了我的。我还没有落下过任何一年呢。”

“跟同性上床没什么不对。我认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双性恋。”

1976年10月，艾尔顿·约翰在《滚石》杂志的采访中坦诚了自己的性取向。作为主流明星，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一年后，艾尔顿宣布停止现场演出，并与作词家伯尼·陶宾分道扬镳，退出公众视线，计划下一步行动。

为公众所不知的是，艾尔顿私底下也正在试图结束他与约翰·里德之间紧张的情侣关系（里德也是他的经纪人）。从工作上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里德的前公关卡罗琳·布歇解释说：“弗雷迪和艾尔顿相处得很好，但一个人无法同时管理好弗雷迪和艾尔顿。”

“很明显，结局肯定会悲伤，”鲍勃·默瑟补充说，“如果约翰·里德在我的办公室里，和弗雷迪在一起，那么艾尔顿肯定会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和她⁴⁴做什么？’”另一位知情人士回忆说：“如果艾尔顿有巡回演出，这就是里德的首要任务，而皇后乐队那边又有这几位性格不同的大爷，你可以想象事情会如何发展。”

在律师吉姆·比奇的协商下，1977年美国二度巡演前，皇后乐队与约翰·里德名下公司开始分家。里德因管理合同提前终止而获得丰厚的补偿金，并可获得已经发行的皇后乐队专辑15%的版税。皇后乐队这时还在按一定比例支付三叉戟部分版税；只有到下一张专辑发行时才会停止。

皇后乐队与约翰·里德的合作关系让双方都颇有收获，但他们对再找一位经纪人签约持谨慎态度。里德把解约文件送到罗杰·泰勒的乡村别墅后花园给相关人员签字。当时，皇后乐队正在那里拍摄《我们会震撼你》的宣传视频，顺便也拍了下一首单曲《展翅高飞》的视频，严寒的天气下他们在积雪的场地里对着口形，弗雷迪喝下去大半瓶白兰地暖身。乐队四人挤在莫库里的劳斯莱斯的后座上，签署了文件。

起初，他们决定自己管理自己，由彼得·布朗和保罗·普伦特做协助。不久后，他们的境况又会发生变化。皇后乐队的律师吉姆·比奇放弃了他在哈博特尔和刘易斯律师事务所的职位，很快被任命为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请我出去吃午饭，告诉我他想成为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鲍勃·默瑟记得，“我非常支持。我一直在整个‘弗雷迪·莫库里—约翰·里德—艾尔顿·约翰’的三角关系里挣扎，这事完全吃力不讨好。”两年后，布莱恩·梅会承认：“在约翰·里德这件事变得非常棘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有解散的危险。”

吉姆·比奇成立了三家新公司：皇后制作有限公司，皇后音乐有限公司和皇后影视有限公司；最后一个是针对流行音乐宣传视频的趋势而创建的。皇后乐队将出资自己拍影片，并保持对授权许可和视频版权的控制。不出所料，正是约翰·迪肯带领乐队成员处理这些事情。“约翰对我们的业务非常清楚，”莫库里告诉《马戏团》（*Circus*）杂志，“他知道所有正在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只有约翰说可以，我们其他人才会去做。我们都成了商人啦，虽然这有悖于我们的初衷。”

当被问及在肯辛顿市场上经营摊位时，弗雷迪是否有管过账，罗杰·泰勒回答说：“见鬼了，不管啊！让他管就是一场灾难。”1978年的时候，泰勒声称皇后乐队主唱对“钱和它的价值，或任何东西的价值完全没有概念”。即便如此，吉姆·比奇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新和百代公司谈判皇后乐队的协议条款。一位公司内幕人士称，这笔交易“高达几百万英镑，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然而，到1978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政府颁发了新的征税条款，对劳动性收入征收83%的最高税率，非劳动性收入征收98%的最高税率。罗杰·泰勒抱怨说，“我们不得不考虑离开国土。”皇后乐队将效仿其他明星、乐队近年来的做法，例如滚石乐队、大卫·鲍伊和坏伙伴乐队等，加入海外避税一族，即每年在英国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183天，并且通过在海外巡回演出和录音来规避收入纳税。

尽管被弗雷迪·莫库里赞誉为“目前为止约翰·迪肯的个人最佳歌曲”，《展翅高飞》在2月发布后仅勉强跻身前三十名。那个月的消息是迪肯的第二个儿子迈克尔出生。4月，作为新税年的开头，皇后乐队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三周巡演的首场演出。在鹿特丹，他们的庞大照明设备发生故障。“发生了爆炸，烟雾弥漫，”布莱恩回忆道，“皇冠的一边雄伟地升起来，另一边雄伟地掉了下去。算是挺活跃气氛的开场了。”三天后，皇后乐队第一次在法国演出时，情况有所改善。《我们是冠军》和《我们会震撼你》已经打榜好几个星期，但是直到那时，法国人才放下了对乐队的戒心。在巴黎会展馆^[15]的成功表演之后，有人听到莫库里说：“好的，巴黎搞定了。”

英国的演出定在5月，两晚在斯塔福郡宾利大厅，三晚在温布利帝国体育馆^[16]。现在，皇后乐队巡演的日均花费大约需要4000英镑。《每日邮报》披露，只有在美国巡演时他们才能盈利，因为那里的场馆能够容纳两万人。《每日邮报》的记者蒂姆·洛特对莫库里进行了一次采访，他一反常态地坦率直言。虽然没有像艾尔顿·约翰那样在《滚石》上公开地谈论性取向，但他宣称：“我的性冲动特别强烈，我充分地享受生活。”并且他承认已经和玛丽·奥斯汀分手（“在七年半的关系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玛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莫库里喜欢口吐妙语（“做个小贱人我挺开心的”），但他也承认自己有着“各种疑虑害怕妄想”，说他不能忍受一个人独自去任何地方，必须要有人陪着他。

弗雷迪的同性恋圈子为他提供了需要的常年陪伴。有的人会时时为他着想，把他挂在心上；而有的人会滥用他的信任，其中某个人更是最终背叛了他。在和肯尼·埃弗雷特宣传《赛马场之日》的采访中，莫库里说了一句有暗语的致谢词：“献给莎伦，百丽儿，菲丽丝，瑟丽塔.....所有这些可爱的人。”弗雷迪口中的这些“可爱的人”，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起了个女人的花名：“莎伦”是艾尔顿·约翰，“百丽儿”是约翰·里德，“菲丽丝”是洛·史都华。莫库里自己的花名是“梅莲娜”（Melina，取自希腊女演员和政治活动家梅莲娜·梅尔库丽 [Melina Mercouri]），罗杰·泰勒是“丽兹”（Liz），布莱恩·梅是“麦琪”（Maggie）^[17]。有趣的是，约翰·迪肯从来没有被取过花名^[18]，而搞笑的是，玛丽·奥斯汀则被称作“史蒂夫”，取自电视剧《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里的男主角英雄史蒂夫·奥斯丁。“我的天，皇后乐队和那些女花名，”布莱恩·索萨尔叹息道，“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布伦达或贝丽儿是谁，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瑟丽塔”曾经占据过莫库里生命里的一段时光。它是为彼得·斯特雷克起的花名。彼得是一位出生在牙买加的歌手兼演员，曾是音乐剧《毛发！》（*Hair!*）的原班卡司成员。1977年，莫库里成立自己的鹅制作公司之后，自掏2万英镑为斯特雷克做首张专辑，并请了罗伊·托马斯·贝克共同制作。彼得的音乐一面走着逐渐式微的华丽摇滚风格，又带点西区音乐剧的味道。这张叫作《这轮我请》（*This One's On Me*）的专辑在1978年发行，但几乎没有销量。

索萨尔认为，彼得·斯特雷克是百代放任旗下明星的另一个例子。“在那个年代，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你的艺人要求这么做。”他解释说。“因为大卫·吉尔莫^[19]的要求，百代签下了凯特·布什，这是一桩好买卖。但之后鹅制作公司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位彼得·斯特雷克。愿上天保佑彼得，他其实很有喜感。我记得我们送他去做一场大巡演，到了伯明翰剧院，就卖出三十张票。我们都说，‘别去了彼得.....’，但是他偏说：‘不，不，亲爱的，我必须撑下去.....’他表演时围着羽毛围巾，穿着高跟鞋，在翻唱《那种黑魔法》（*That Old Black Magic*）的时候随身带着黑魔法牌黑巧克力.....那天晚上，他带着一袋狂欢牌巧克力豆去的.....”

斯特雷克的音乐生涯时断时续，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都处在莫库里的核心朋友圈子中，那里的常驻人员是乔·法内利（花名“莱莎”^[20]）和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花名“特里克茜”）。和大卫·明尼斯开始交往的时候，莫库里已经二十九岁了。如他以前的某位随从所言，他“非常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弗雷迪也许渴望的是伴侣和爱情，但他的名望和金钱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关注和性邀约。弗雷迪的密友大卫·埃文斯在1992年的书中写道，莫库里三十几岁的生活是“狂热的、夜夜笙歌的、欲求不满的”。1978年时，弗雷迪已经拥有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一天晚上，在伦敦一家餐馆，朋友的生日聚会上，弗雷迪突然中断了谈话，抛出一个词“烟”。几秒钟时间，许多包香烟就递到了他的面前。之后，莫库里又停了下来：“尿尿。”片刻之内就有人开路带他去洗手间。

在布莱恩·梅的世界里，情况则完全不同。那年6月，梅和妻子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詹姆斯。莫库里向《每日邮报》吹嘘说“过去三年花了10万英镑”时，梅却过着相对节俭的生活。“我偶然拜访了布莱恩在巴尼斯的家，”他的老队友约翰·“美洲虎”·加纳姆说，“我以前没去过，当时也不知道他外出巡演去了。他家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独栋房，我记得当时心里想，‘钱都花哪儿了？’房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布莱

恩的爸爸哈罗德出来，我说：‘您还住在费尔特姆吗？’他说：‘哦，是啊，小虎，我们还住在那。我们不让布莱恩为我们花钱，最多是买机票，这样我们可以去看他的演唱会。’”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皇后乐队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和以前的校友、队友维系关系将变得更加困难。正如克里斯·史密斯所说：“我从来都不了解弗雷迪·莫库里。我的小伙伴是弗雷德·保萨拉。”在利物浦帝国剧院演出后，肯·泰斯蒂说服皇后乐队去他新开的俱乐部Eric's聚一聚。迪肯、泰勒和莫库里都去了，和这位差点成了他们经理的老朋友叙旧。但泰斯蒂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他们来去都是三辆豪华轿车，各坐各的。1978年7月，罗杰·泰勒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生日聚会，庆祝二十九岁生日。据说正是人生得意、要什么有什么的弗雷迪·莫库里够到玻璃水晶大吊灯上荡起了秋千，并对着目瞪口呆的围观者说：“我就是忍不住嘛。”

“传说中的侏儒、光头和可卡因都不是真的啦。”罗杰·泰勒坚持说，语气带着令人狐疑的轻笑声。他想了一下又说：“其实吧，有可能是真的。”此时是2008年的夏天，泰勒坐在车里，由司机开着兜过英国的湖区。他被拉去参加皇后乐队和保罗·罗杰斯的一系列专辑和巡演的宣传活动。车子驶在英格兰最美丽的乡村景色之中，鼓手举着手机贴在耳朵上，耐心地回忆着三十年前那场皇后乐队最穷奢极欲的派对之一。

那是1978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夜，皇后乐队在新奥尔良庆祝他们的第七张专辑《爵士》正式发布。午夜时分，一支迪克西兰的铜管乐队走进费尔蒙酒店的宴会厅，那里挤满了三百多位客人，尽情享受由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奉上的生蚝、鲜虾什锦和香槟酒。皇后乐队的四位成员跟在吹着小号的乐团身后进场，他们刚刚在城市大礼堂^[4]结束了座无虚席的演出。举办派对之前，皇后乐队的公关人员被派往波旁街的法国区，搜寻所有酒吧和俱乐部里“能请到的能人异士”，邀请他们来为聚会助兴。

皇后乐队到场后，一群异装者、吞火表演者、伴舞女郎、耍蛇者和穿着修女制服的脱衣舞女从两侧鱼贯而出。伴随着音箱中震耳欲聋的滚石乐队迪斯科金曲《想你》（Miss You），许多纵酒狂欢的女性在舞池里宽衣解带。一周后，英国《太阳报》上刊登了弗雷迪·莫库里的照片，身着背带裤和格子衬衫的他（这是当时美国同性恋圈的必备装

扮），被拍到正在一位几乎全裸的女人的屁股上签名，新闻大标题是《在那遥远的裸体奥尔良》。狂欢一直持续到天亮，据说骨肉皮们在暗屋里为音乐界的大人物口交，还有一个喝高的姑娘脱光了衣服，用私处“抽”一根香烟。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经过三十年的发酵，传说已经演变成了传奇故事，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奇葩版本：公开场合的性交，光着身子的泥地摔跤，用装生肉的大托盘呈上来的裸女，还有最广为流传的“侏儒”，有些故事里甚至说是“阴阳人侏儒”，据说他们全是秃头，头顶托着盘子，上面放的是可卡因……“你看，要真的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罗杰·泰勒最后说，“但我必须说，那天晚上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夸张。”

百代的鲍勃·默瑟专程飞到新奥尔良参加这次聚众狂欢。“派对确实是很疯狂的，”他承认，“但是关于侏儒和可卡因的那些是虚构的。据我所知，我才是唯一一个吸了（可卡因）的人，因为整个晚上不断有人拍我肩膀找我有事，我只好一次次地领着别人去房间……”

凌晨3点左右，默瑟记得他陪同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去了“法国区里更乌烟瘴气的地方”。莫库里也在同一个地区“四处扫荡”，皇后乐队的前公关托尼·布莱斯比和《声音》杂志的记者西尔维·西蒙斯陪着他，他和西蒙斯互相抢着在人群中定位帅哥（“他是我的！”）。然而，梅记忆中的那个晚上却和其他人不同。吉他手急切地想摆脱那些被某位现场人士称作“主动献身的粉丝和明星崇拜狂”的纠缠，他离开了派对，去进行一场徒劳的搜寻。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周围一片欢腾，许多很棒很美妙的事正在发生，而你的心里却有一个大洞？”1998年，梅在采访时说。“所以一切都很好，很疯狂，但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却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布莱恩去找“蜜桃”了，那个皇后乐队第一次来美国巡演时，他在新奥尔良遇到的女人。“几年前，在新奥尔良，我坠入爱河。我希望能再见到她，但她已经不住那里了。我没有找到她，直到后来，她才找到了我。”2008年，再次回忆起当年的那场派对时，梅的声音里依然有种梦呓般的惆怅。“新奥尔良，狂欢之城，我和这个地方有着强烈的情感羁绊。每次我来到这座城市，仍然能感到心弦为之一颤。”

新的一天到来时，也带来了一张20万美元的账单，还有宿醉后遗症。早上6点，坚守娱乐至上的鲍勃·默瑟回到酒店房间，发现房间被人翻过了。“以前我有一个人们称为‘娘炮包’的小包，”他解释说，“那时候

男人都喜欢把随身物品装在这种小包里，因为我们的裤子太紧了，口袋里什么都放不进去。我打开我的包，钱没了，信用卡没了，护照也没了.....而我本来要飞到纽约，去赶下一班飞机回伦敦，和凯特·布什一起去荷兰参加一个唱片颁奖仪式。说来你不信，我最后还是回去了。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啊，我就像一个大晚上被扔到丛林中央的海军陆战队员一样，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找路子回去呗。”

默瑟设法逃离新奥尔良时，睡眠惺忪的皇后乐队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那场派对本来就是极尽狂欢之能事，”梅后来说，“既是为了我们自己好好享受，也是为了让朋友们享受.....怎么好玩怎么来。”不过泰勒的一句话道出了危机，“问题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会享乐了。”

四个月前，《爵士》专辑的录音制作已经开始。为了避税，录音分别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高山录音室^[22]和法国尼斯的超级熊录音室^[23]进行。由于迈克·斯通缺席，皇后乐队再次和罗伊·托马斯·贝克团聚。“迈克就像是乐队的一员，”布莱恩·梅解释说，“但是我们开始录《爵士》的时候，迈克正在谈恋爱，然后又花了好一段时间经历分手。”斯通后来会和旅行与亚洲乐队^[24]合作，他们很好地利用了斯通在皇后乐队身上首创的层叠人声录音与和声技术。遗憾的是，斯通于2002年去世，他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和皇后乐队一起工作。

1978年夏天，罗伊·托马斯·贝克正沉浸在他刚做完的项目的胜利之中，那是汽车乐队^[25]的首张专辑。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汽车乐队的风格被唱片公司市场部门称为“新浪潮”；他们是更适合在电台播放的、接替朋克的新风潮。埃尔维斯·科斯特洛、金发女郎乐队^[26]和警察乐队^[27]的时代就要来了。“罗伊是带着高涨的自信心回来的，”梅说，“汽车乐队的这张专辑他做得飞快，他说，‘哦，我两个星期就把它搞定了，然后它一下子就火了！’”

皇后乐队想延续《世界新闻》的那种顺其自然性，但又不想做一张明显是续作的专辑。贝克在为汽车乐队当制作人的时候，结合了大量的和声和较少的背景声轨。皇后乐队在做《爵士》时将会采用相似的技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做专辑，”布莱恩·梅说，“原本的想法是在国外没什么可分心的，但结果当然是分心的东西只会更多。不过是类型不同罢了。”梅说，弗雷迪·莫库里的心被环法自行车赛勾走了：“弗雷迪突然对比赛很起劲，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久后他就带着一首悦耳的作品回来了。”

这首悦耳的歌曲就是《自行车赛》（Bicycle Race），歌词当中提到了《大白鲨》（Jaws）、《星球大战》（Star Wars）、可卡因、超人、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就像这些还不够似的，这首歌还有着神经病一样的节奏，人声完全走的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剧团的那种风格，还包含着梅所说的“大概十万个和弦”，整首歌骚气冲天。“我不是说谁谁在什么时候上床了”，梅坚持说，但传言一致认为《自行车赛》是莫库里与一位环法自行车赛选手约会之后谱写出来的。“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弗雷迪的私人生活也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渗透到他的作品中，促成了那些戏剧化的部分，”罗伊·托马斯·贝克认为，“他的视野很宽广，而同性恋身份更是一件他可以额外利用的事情。”

布莱恩·梅写的《大屁股妞》（Fat Bottomed Girls）是《自行车赛》的完美搭档。“写的时候我想着弗雷迪的视角，”他说，“你要是有一位超棒的主唱，他喜欢大屁股的女人或者男人，你也会这么写的。”这首歌的开头是让人拍大腿打节奏的乡村摇滚风格，之后又切换至重金属，莫库里唱着他的性启蒙始于一位“大屁股奶妈”。《大屁股妞》展现的是如同唐纳德·麦吉尔^[28]笔下的海边低俗情色明信片的画面，又好似一部经典的《继续前行》（Carry On）系列喜剧电影，海蒂·雅克饰演的强势护士长正要饿虎扑食地拿下傻乎乎的肯尼斯·威廉姆斯。

皇后乐队将《大屁股妞》和《自行车赛》作为双A面单曲发行，重回英国榜单前二十名。但乐队内部对《爵士》这张的态度却不一样。1984年接受采访时，约翰·迪肯形容这张专辑时用的是“一张我不喜欢的专辑”。罗杰·泰勒也觉得印象平平。“那张专辑不会列入我最喜欢的名单，”他后来承认说，“《爵士》的创意很有想法，但我不觉得它实践了那些想法。双A面的单曲不错，但是我从来都对《爵士》里面的声音不满意，让人兴奋不起来。”

2005年接受采访时，罗伊·托马斯·贝克却坚持说：“我觉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很不错。我认为他们的歌曲创作和以前一样好。”对贝克而言，这次专辑的制作亮点之一是与弗雷迪·莫库里的再度合作。高山录音室的监控房间和录音房间不在一层楼，让主唱感到很心烦。“我们安装了闭路电视，”贝克解释道，“以前弗雷迪和我一起工作时，我不坐录音台后面，而是坐在录音台和演唱间的窗户之间，这样弗雷迪可以从我的面部表情来判断，某段是否唱得好。现在弗雷迪要一部摄影机对着我的脸，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用这种方式合作。”贝克发现莫库里仍然“很激烈，很强势，但和他一起工作感觉很好。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一张张

纸片上，这样他能够保持专注，然后他会放小段的录音给我听，比如某些唱片里的击打铜钹声，说：“这种声音我们怎么录？”

在专辑的开场曲《穆斯塔法》（**Mustapha**）中，主唱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首歌里，莫库里罕见地肯定了自己的出身背景，用拟声唱法唱着阿拉伯语和零碎的英文词，配以鼓、贝斯、吉他和钢琴的狂乱伴奏。这首歌曲和乐队以前的任何曲风都不一样，它以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毫不妥协的、具有惊人独创性的方式为专辑开了篇。“我觉得这首歌很棒，”梅简短地说，“本质上很难入耳，但很精彩。”

莫库里在《爵士》里写的其他歌也表现出他的反差个性：既可在流行抒情歌曲《嫉妒》（**Jealousy**）中演绎饱受折磨的多情，又能在光怪陆离的硬摇滚歌曲《让我取悦你》（**Let Me Entertain You**）中大声嘶吼，兜售性感。罗杰·泰勒说皇后乐队越来越擅长享乐，看起来乐队里有一个人尤为擅长。莫库里沉浸于“享乐”的海洋中，甚至专门写了一曲表达自己心情的颂歌——《此刻别让我停下》（**Don't Stop Me Now**）。到了二十一世纪，这首歌将会成为吉百利巧克力的广告曲，被多个电视选秀节目的选手反复演唱，并被英国广播公司的汽车发烧友节目《疯狂汽车秀》（**Top Gear**）的观众评为“有史以来最适合开车时听的歌”。莫库里在歌里形容自己是老虎，是原子弹，是一台时速100英里的性机器，暗示了歌曲的两大灵感来源：性和毒品。在2010年的采访中，布莱恩·梅承认，尽管这首歌曲非常阳光，但“从歌词上看，它展现了弗雷迪那时正在经历的事情，而我们认为当中有些对他正造成危害”。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梅在《爵士》中的创作也是两极化，从粗粝的重摇滚《按时死亡》（**Dead On Time**，其中包含一段在蒙特勒录的雷雨声），到摇曳轻盈的爵士舞曲《梦者舞会》（**Dreamers Ball**），似乎这首歌在录音室里引起了梅和泰勒的激烈争吵，因为泰勒不喜欢这首歌。“录《爵士》专辑的那段时间，我们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是很看得上别人做的东西，”梅承认说，“老实说，有的时候只要离开舞台，我们甚至都没办法忍受彼此了。”在《离家不容易》（**Leaving Home Ain't Easy**）一曲中，梅用迄今为止最直截了当的歌词，写出了作为一个游历世界的摇滚明星的困顿。另外，他还在约翰·迪肯的歌曲《如果无法战胜他们》（**If You Can't Beat Them**）中演绎了一段史诗般的吉他独奏，几乎可以说是那首歌最好的部分。迪肯创作的另一首歌《仅仅七天里》（**In Only Seven Days**）则继续采用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那种中庸派的流行歌

曲风。

罗杰·泰勒在抱怨《爵士》的时候，总是把最狠的话留给自己的两首歌，《玩乐》（Fun It）和《更多的那种爵士》（More of That Jazz）。“我的歌就是拼拼凑凑，”他说，“听过就忘。”《玩乐》是皇后乐队第一次涉足舞蹈音乐，还使用了合成鼓，这种电子小玩意将在未来十年内短暂改变许多流行音乐的声音。泰勒的第二首作品是相对愤怒的《更多的那种爵士》，其中穿插着专辑中其他歌曲片段的重奏，但作为专辑的终曲不免有些沉闷。“我觉得当时我们已经不太像一个集体了，”他说，“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

乐队成员从各自的出租房出发，乘坐公交车赶到伦敦市区三叉戟录音室一起工作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7月，儿子刚出生后不久，梅就因避税原因被迫离开英国。他飞往加拿大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蒙特勒与乐队汇合。迪肯现在有两个孩子，他的家庭责任和梅一样重。杰克·内尔森以前形容乐队四人进入机场的状态（“一个停住，一个右转，一个左转，一个直走”）似乎更加应验了。《爵士》听起来有一种碎片感，好像每一首歌曲都不属于整体，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在1982年的采访中，贝克回忆起录音期间，做音乐的时间比去当地夜生活的时间要少，“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去街角的俱乐部，那里的脱衣舞娘一级棒，所以我们必须在11点钟结束录音，去看脱衣舞，看完再回录音棚”。

贝克的联合制作带给《爵士》一种又脆又冷的声音，和他为汽车乐队做的东西差不多。合唱的部分还是和以前一样宏大，但是其他的东西感觉都减少了，就像被浓缩过，尤其是泰勒的鼓声。它的声音听起来更现代，却和《皇后II》《歌剧院之夜》相去甚远，而这两张专辑里那种夸张和华丽的感觉是他们以前一直追求的。正如罗杰·泰勒所说：“《爵士》令人失望……我觉得和罗伊合作不太行得通。”

那年夏季，一年一度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Montreux Jazz Festival）上的明星人物是比利·考伯汉姆和吉尔伯特·吉尔。离开录音室，皇后乐队在音乐节里泡了一段时间，专辑名称应运而生。单色的封面插画是罗杰·泰勒的主意，想法来自他在柏林通过查理检查站时看到的一幅涂鸦。百代想在封面上用乐队照片的请求再一次被拒绝。

“我们最失望的就是封面，”布莱恩·索萨尔坦承道，“这个封面实在怪异，就像标题《爵士》一样，我们觉得这些可能会造成一种忽然跳到

爵士乐的错觉，误导听众。”等百代听完整张专辑后，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特别是听到《此刻别让我停下》这一首。但是当他们得知《自行车赛》和《大屁股妞》单曲宣传视频的拍摄想法时，才放下去的心又提了起来。

9月12日，皇后乐队安排了一共六十五名女模特来到伦敦西南部的温布尔登体育场，拍摄她们全裸骑车绕赛道快速环行的镜头。皇后乐队请来的这些裸体“赛车手”涵盖了各类身形、身高和肤色。拍摄时的影像不仅放在宣传视频中，也作为《自行车赛》单曲的封面，还被印成海报，凡购买专辑就可免费获得一份。“这个主意也太有趣，”索萨尔说，“和一大群骑着自行车、一丝不挂的女士们待一天是很享受。此事在媒体中间激起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强烈的抨击。”

第二天，乐队工作人员把租赁的自行车还给哈尔福德商店时，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他们被告知，出于卫生原因，必须要支付更换六十个鞍座的钱。百代对专辑封面印一位女性后背全裸十分犹豫，皇后乐队稍微妥协了一点，给她画上了一一条黑色的短裤，以遮住敏感的臀部。但是那张印着一排裸露的乳房和臀部的免费艳照海报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美国版《爵士》专辑中这张海报被撤下。“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喜欢看裸体的女人吧。”莫库里打趣道。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索萨尔笑着说，“让美国的伊莱克特拉操心去吧。”但是百代在英国也碰到问题，这个视频没办法在《流行之巅》或者星期六早上的儿童电视频道里播放。而皇后乐队呢，他们当然不会为这种“小事”而烦恼，在想要做的事情上他们永远也不会妥协。最后，《自行车赛》在英国榜单排到十一名，在美国排二十四名。

《爵士》专辑于11月10日在英国发布，比美国发行时间晚了四天，这个时候，皇后乐队已经在美国开始进行下一场巡演了。《爵士》收到大量批评，甚至比《世界新闻》还多。戴夫·马什在《滚石》杂志的文章中对专辑进行了猛烈抨击，批评这种所谓的精英主义，总结说：“皇后乐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的法西斯摇滚乐队。整件事让我好奇，为什么会有人纵容这些可怕的人和他们的污浊的思想。”而英国仍处于普遍失业的困境中，“左倾”的音乐媒体自然不会放过一群避税者，指责他们为了自己高兴，花钱请女人脱光衣服，骑着自行车现眼，还在新奥尔良举办花费20万美元的派对。种种批评他们性别歧视的声音持续不下，专辑的音乐当然也没有收到什么好话。《新音乐速递》建议读者，除非“家里有人聋了”，否则就别买《爵士》。皇后乐队里最敏感纤细的

布莱恩·梅后来承认，确实被这些评论伤了心（“我们是铺张浪费了，但是以一种完全无害的方式啊”）；罗杰·泰勒会同意说，对，是很刺耳，但没关系，因为“人们还是不断地在买我们的唱片”。《爵士》在英国排到第二名，美国排名第六。

到这个时候，皇后乐队在美国的巡回演出已经不再有暖场乐队，而且为了最大化地提高票房销售和利润，演出尽量安排在超大型的场地。莫库里的嗓音仍然有问题，他归咎于早期巡演时就困扰他的声带结节，但也有其他人说是他的生活方式加重了嗓音的问题。2005年，一位前巡演经理告诉《原片》（*Uncut*）杂志说：“大约是1978到1979年间，皇后乐队如日中天的时候，弗雷迪的胃口也随之大增。性和毒品如影随形。演出前，演出后……甚至在演出当中。返场之前，他可能会溜到后台喝两口，嗑一点可卡因，让才认识没多久的某个家伙给他来一发快口，然后跑回舞台完成演出。他的精力实在是旺盛。”可能是夸大其词，不过一位旁观者形容莫库里确实是“如同火山喷发般释放被压抑的能量”。“天哪，弗雷迪莫名地精力充沛，”罗杰·泰勒承认说，“和他待着特别开心和快乐。”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中，表演《大屁股妞》的时候台上出现了九名骑着自行车的半裸女性。莫库里唱歌的时候，女孩们骑车围着他转，不停地按着自行车铃铛。媒体抱怨道：“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不仅仅是骑自行车的美女穿着皇帝的新衣，皇后乐队到底还要过分到什么程度？”

1977年皇后乐队进行美国巡演时，布莱恩·梅的自制地图已经扩展了不少，一位记者回忆说“那是一本可滑动的日程表，巧妙地利用了纸板和订书钉，包含了行程时间表和中途停留站点的细节”。到了1979年，梅的滑动日程表简直就像一部希思·罗宾逊装置^[29]。那一年大部分时间，皇后乐队都在路上巡演，推广《爵士》专辑。圣诞节两周后，他们从德国开始了为期六周的欧洲巡演，接下来去了荷兰、法国、瑞士、西班牙，并第一次去往南斯拉夫。当他们按照避税允许的停留天数回到英国时，弗雷迪那首写给无节制生活的颂歌《此刻别让我停下》已经位居排行榜第九。

在1979年的这次巡演中，莫库里的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缀满亮片的连体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皮革摩托车夹克、帽子和裤子，以及一条沉甸甸的大链子。这是主唱的“超级阳刚”造型（最初这种形象被称为“卡斯特罗款”），发源于旧金山卡斯特罗区，在美国同性恋群体中广受欢迎。当年1月，皇后乐队在欧洲演出时，纽约的迪斯科乐队乡下人

乐队^[30]推出了一首超级火爆的流行歌曲《Y.M.C.A.》，歌里隐含着赞美某个同性恋猎艳之地的信息。该乐队的成员，已故的格伦·休斯（也就是乐队中的“摩托车手”），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形象是更为典型的卡斯特罗款，有一晚他和弗雷迪曾在纽约的一家硬核同性恋俱乐部“铁砧”^[31]打过照面。

如果要挑选一个皇后乐队1979年巡演的经典场景，那就是穿着皮衣的莫库里咆哮着那首虚无主义的《让我取悦你》。弗雷迪扮相凶悍，乐队其他成员则保持优雅。梅还是长长卷发，穿着白色的小背心；泰勒永远是金发碧眼的彼得·潘；至于迪肯，他静静地站在鼓台上看着，穿一件衬衫，打着领带，仿佛他是来修理影印机似的。他们的头顶上是皇后乐队的新灯光装置，闪着耀眼的红光、白光和绿光，并辐射出相当高的温度，以至于工作人员纷纷把它称为“比萨烤箱”^[32]。

1979年的巡演将是彼得·布朗最后一次做皇后乐队的演出协调员。他在欧洲巡演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四位乐队成员的住宿条件完全一致，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布朗说，“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布朗最终成了一位喜剧经纪人，成立了“对讲系统”制作公司^[33]。遗憾的是，1993年他死于脑出血。

4月，皇后乐队前往日本进行了十七场演出，包括在东京武道馆连演三晚。在经历了英国和美国媒体界的枪林弹雨之后，日本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为了向日本致敬，《让我们携手同行》加入了演出歌单。皇后乐队在日本的地位是如此稳固，其他乐队几乎仅仅是通过与他们联合出演就能打开市场。美国硬摇滚乐队廉价伎俩^[34]曾在美国“世界新闻”巡演时为皇后乐队做开场，他们给飞去美国报道巡演的日本记者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六个月后，廉价伎俩乐队就在武道馆开出售罄的演出。

6月，百代发布了《绝世现场》（*Live Killers*），这张专辑由皇后乐队欧洲巡演现场音乐拼接而成。自1974年录制彩虹剧院演出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做一张现场专辑，但又担心现场专辑的质量比不上录音室做出来的那般精细。确实没有。但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后乐队的同行都发布了现场专辑：比如齐柏林飞艇的《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瘦丽兹的《危险现场》（*Live and Dangerous*），还有创世记的《助手离场》（*Seconds Out*）。“做现场专辑真的是躲不开的一步，”布莱恩·梅说，“每个人都必须弄一张。”由于在《爵士》之后没有立即跟进出新专辑的计划，百代也想在他们再进录音室之前，做一张皇后乐队的产品，继续绑定听众。

《绝世现场》有两张黑胶，四个面刻录着未经修饰的皇后乐队现场收音。它很吵，也很凌乱。在演出时，皇后乐队会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段离开舞台，观众们在闪烁灯光和重重烟雾中听着歌剧部分的音频，扩音器将声音传遍全场。现场这样做没问题，但没有了视觉上的盛宴，光从唱片里听就有些平淡。虽然布莱恩·梅坚持说整张专辑未经过叠录修饰，但《绝世现场》缺乏的精致感完全被散发的能量弥补了。“我还是觉得它挺特别的，”罗杰·泰勒说，“我们四个人竟然他妈的能弄出这么多的噪音来。”如今看来，《绝世现场》成了皇后乐队七十年代现场最后时光的印记。接下来的十年，乐队将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猛兽。

8月份，当皇后乐队作为德国萨布鲁肯音乐节（Saarbrücken Festival）演出阵容的头号明星重聚时，高产的约翰·迪肯又有了一个女儿劳拉。而罗杰·泰勒在演出那日早上去染头发，由于漂染过度染出了一种奇异的颜色。本来是为了巩固皇后乐队在德国的形象，他们难得同意参加这种仅一晚的一次性演出。在他们的大名下面，有爱尔兰的吉他大师罗里·加拉赫（此人的老乐队品尝乐队曾经是微笑乐队演出时的主乐队）、十年之后乐队和海军准将乐队^[35]。弗雷迪开开心心地看着顶了一头几近翠绿色头发的泰勒完成了整场表演。

1979年的夏天，泰勒和莫库里享受着有钱有势的摇滚巨星所能享受到的特权。比约恩·博格赢得温布尔登男单决赛时，他们也在现场观战。几天后，皇后乐队的工作人员联系英国网球俱乐部，询问是否可以在温布尔登中央网球场做一场演出，遭到拒绝。之后，泰勒和多米尼克·贝朗到法国南部度假，在驶往圣特罗佩斯的路上，泰勒的新法拉利跑车的引擎爆炸，车子翻滚并撞毁（后来他的阿斯顿马丁跑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9月，莫库里又举办了一场慷慨盛大的聚会，庆祝三十三岁生日，同时他也开始策划职业生涯的下一步。

皇后乐队的主唱要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了。

[1] 英文名为“New Orleans Civic Auditorium”。

[2] 英文名为“Centrepont”。

[3] 英文名为“The Parliaments”。

[4] 英文名为“The Jam”。

[5] 英文名为“Basing Street Studios”。

[6] 英文名为“The Stranglers”。

[7] 英文名为“The Wailers”。

[8] Vicious有邪恶凶猛的意思，下文弗雷迪故意叫他“凶残先生”（Mr. Ferocious）。

[9] 英文名为“New London Theatre”。

[10] 英文名为“Stafford Bingley Hall”。

[11] 英文名为“The Temperance Seven”。

[12] 英文名为“Aladdin”。

[13] 英文名为“Maple Leaf Garden”。

[14] 艾尔顿故意使用“她”代指弗雷迪。

[15] 原文是“Pavillion De Paris”。

[16] 英文名为“Wembley Empire Pool”。

[17] 均取自洛·史都华的歌曲《麦琪·梅》（Maggie May）。

[18] 据彼得·辛斯介绍，约翰·迪肯的花名是贝丽莎（Belisha），取自Belisha Beacon，指英国路边橘色的路灯。

[19] 百代旗下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吉他手和主唱。

[20] 取自莱莎·明奈利。

[21] 英文名为“Municipal Auditorium”。

[22] 英文名为“Mountain Studios”。

[23] 英文名为“Superbear Studios”。

[24] 英文名为“Journey and Asia”。

[25] 英文名为“The Cars”。

[26] 英文名为“Blondie”。

[27] 英文名为“The Police”。

[28] Donald McGill，英国著名绘画家，因设计创作海边为背景的低俗情色明信片而闻名。乔治·奥威尔曾发表文章《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讨论他的作品及社会现象。

[29] William Heath Robinson，全名为威廉·希思·罗宾逊，英国著名插画家，因其在漫画中创造了大量复杂而诡异的机械，它们常常只是用来达成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导致“希思·罗宾逊装置”被收入词典，指那些纷繁复杂、稀奇古怪但华而不实的玩意儿。

[30] 英文名为“Village People”，是一个全员同性恋乐队，每位成员都扮成同性恋流行的幻想角色，如士兵、建筑工人、印第安酋长、摩托车手、牛仔、警官等。

[31] 英文名为“Anvil”。

[32] 红、白、绿是比萨故乡意大利的国旗颜色。

[33] 英文名为“Talkback”。

[34] 英文名为“Cheap Trick”。

[35] 英文名为“The Commodores”。

第八章 一山有四虎

弗雷迪的胡子新造型大概是为了去富勒姆路餐厅应聘兼职服务员吧。

——1980年12月，《晚间新闻》（*Evening News*）

去他娘的成本啊亲爱的！活得洒脱点！

——弗雷迪·莫库里

1979年10月7日，星期日，伦敦大剧院^u。皇家芭蕾舞团迎来了一名新舞蹈演员：弗雷迪·莫库里。据说他的步法基础很差，但先天不足的部分，他用热情和投入来弥补。剧院外的音乐世界里，警察乐队和金发女郎乐队正在单曲和专辑排行榜上节节攀升，齐柏林飞艇乐队刚刚结束了最后一场英国演出，之后二十八年里他们都不会再有国内演出。而在剧院内部这个高雅的古典舞世界里，皇后乐队的主唱即将与全球最顶尖的芭蕾舞团之一共同在将近两千五百名观众面前首次起舞。

莫库里此次是受到皇家舞团的首席舞蹈家之一维恩·伊格林的邀请，参加慈善晚会表演。为了加大这场演出的宣传力度，伊格林想要跨界请一位表演者客串。凯特·布什谢绝出席后，有人推荐了弗雷迪·莫库里。主唱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不过他后来承认说：“我觉得他们是疯了！”去男爵宫排练室进行第一次排练时，莫库里华丽登场，敬业地换好了全套芭蕾紧身衣和舞鞋。“等我发现跳舞到底怎么回事之后真是吓坏了，”他说，“他们让我练各种舞步。几天时间，我要努力尝试做一些他们练了很多很多年的动作，我跟你讲，简直是谋杀。没两天我身体就各种酸痛，而且痛在一些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的部分。”

莫库里要在慈善晚会上表演《波西米亚狂想曲》和皇后乐队的新单曲《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他的短发光滑服帖地梳往脑后，身穿一件V字形领露胸的连体舞服，由三位裸着上身的男舞者扛在肩头，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开始表演并唱歌。在歌曲的盛大结尾处，莫库里再次上

台，赤着脚，浑身包裹着一套银光闪闪的连体衣，在舞伴的帮助下直直翻转360度，最后头朝下唱完了最后一句歌词。“我又不是巴里什尼科夫^[2]，作为一个有点年纪的初学者还算不错了，”他说，“不然让米克·贾格尔或者洛·史都华来试试看啊。”

罗杰·泰勒当时就坐在观众席上围观。“全世界只有他敢做这种事情，”他回忆说，“弗雷迪是在一群非常刻板的皇家芭蕾舞团观众面前表演，这些人平均年龄大概得有九十四岁吧，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一坨在台上被扔来扔去的银色东西。我觉得做这件事特别有勇气，而且着实太好笑了。”反正，莫库里日后还会多次穿着芭蕾舞鞋和紧身舞服出现在舞台上。

那一年夏天，皇后乐队流连于伦敦、日内瓦和慕尼黑。瑞士高山录音室综合体正在出售，皇后乐队飞去日本演出前，他们的会计师代表乐队约见了录音室的股东。考虑到近年的重税法案，他们认为乐队拥有自己的录音室会比较明智。交易将在年底完成，皇后乐队会同时接手高山录音室的常驻工程师大卫·理查兹。

不过6月初的时候，乐队仍然驻留在慕尼黑的音乐园录音室^[3]。他们处于避税期中，需要身在国外，又没有制作下张专辑的明确计划，只是在日本之行后顺便预订了一段时间。音乐园录音室由意大利制作人乔吉奥·莫罗德建立，综合录音设施位于地下。德国制作人赖因霍尔德·马克（人人都叫他“麦克”）收到要与皇后乐队在音乐园共事的消息时，正身处洛杉矶，和吉他手盖瑞·摩尔一起录制曲目。他打电话去录音室确认，但好像大家都搞不清楚情况。一时心血来潮，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慕尼黑。

“《爵士》之后，我们感觉需要开辟新的疆域了，”布莱恩·梅说，“我们问音乐园的人他们手头有谁，他们说有麦克。结果证明真是找到宝了。”麦克抵达音乐园录音室，看到一屋子的大箱子、音响和行李箱，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还有三位皇后乐队的成员：莫库里、泰勒、迪肯。“他们还没有制作专辑的计划，”马克说，“但是弗雷迪对我说：‘要是你准备好了的话，我脑子里其实有个想法。我们快趁布莱恩还没来把它录了。’”于是莫库里拨动琴弦，弹出了《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的前奏。

这首歌在几个小时前刚成形。彼得·辛斯陪着莫库里从伦敦飞到慕尼黑：“弗雷迪从来不会独自旅行。一定要有人和他一起。”希斯洛机场

正好遇上罢工，导致所有航班延误，莫库里特别焦虑，因为根据英国税法，他可以逗留国内的时间已经快要用完了。终于到达慕尼黑后，两人入住希尔顿大酒店。莫库里进屋去洗澡，没多久他就在里面叫辛斯：“阿鼠！阿鼠！快给我拿把吉他来！”莫库里从浴室冲出来，围着浴巾，拿起吉他就开始边哼唱边拨和弦。他不想错过灵感时刻，于是两人立即前往音乐园录音室。

在莫库里把整首歌从头到尾顺一遍的时候，马克悄悄地录了下来。主唱问他可不可以开始录制，马克却主动提出把他刚才弹唱的旋律回放给他听。对皇后乐队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在迪肯和泰勒的伴奏下，莫库里唱人声，同时弹原声节奏吉他。“我写《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大概就花了五到十分钟吧，”莫库里说，“因为我只会弹几个和弦，调子被限制住了。但这个限制很好，我必须在这个很小的框架里作曲。”有限的框架让皇后乐队有了一首与《绝代艳后》《波西米亚狂想曲》《自行车赛》截然相反的歌。《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是一首诙谐的摇滚小调，很像是弗雷德·保萨拉某天早晨，走在格拉德斯通大街听到收音机里猫王的歌声后，在大学公共休息室里用钢琴重奏出来的那种曲子。

莫库里临走时留给马克一句话：“布莱恩肯定不喜欢。”等梅到达音乐园后，弗雷迪真的说中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首歌。”马克并不了解皇后乐队平时工作时信奉的权力均衡和处世之道，他要求梅放弃使用他那把宝贝吉他“绝世红”，也不用AC30扩音器，而是使用电视播音员吉他做独奏（是从罗杰·泰勒那里借的），然后他使用梅萨-布吉乐（Mesa-Boogie）音响做功放，而不是用布莱恩喜欢的AC30。这么做可以让歌曲听起来更有乡村摇滚的感觉。“我很不情愿，”梅承认说，“我竭力反抗，但看得出来，那确实是对的作法。”只用了短短的四个小时，皇后乐队便录制出了这首将成为他们的第一首美国榜单冠军的歌曲。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音乐园继续录了三首曲子，但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只是为未来制作新专辑准备材料。“我们想要跳出一成不变的套路：录专辑、英国巡演、美国巡演……”梅解释说。其中一首是罗杰·泰勒的《即将到来》（Coming Soon），他在《爵士》录音期间就开始构思了。这是一首流畅的、现代的强力流行乐，带有一点马克的上个客户E.L.O乐队的影子。另一方面，梅创作了《拯救我》（Save Me）和《扬帆去吧，亲爱的姐姐（献给未能成为我姐姐的你）》（Sail Away

Sweet Sister [To The Sister I Never Had])^[4]，两首十分浓郁的抒情歌曲，是对皇后乐队过往风格的致意。

“我的特长之一是工作做得特别快，”马克解释道，“而皇后乐队的工作节奏非常缓慢。我一开始都不知道竟然这么慢。我要改变他们，不然他们会卡在自己的方法里。”按照皇后乐队的旧规则，背景声轨会反复复录到完美为止。连乐队自己也觉得成品可能会过于枯燥乏味和太抠细节。“我就说，‘你们不用非要那么做，’”马克解释道，“我可以把全部声音都加进去，假如半分钟就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剪辑调整，然后继续进行，你们只需要跟着节奏做下去。”

“我们当时觉得是开玩笑呢，”梅承认说，“但是按照马克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半天之内完成一个完整的伴奏声带。”因为对《爵士》的许多方面都感到不满意，泰勒对乐队需要什么很清楚：“马克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要听起来新鲜、简单，不要使用太多的麦克风。我们希望他能让我们听起来再次像一个团体。”

《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让百代眼前一亮，10月份莫库里和皇家芭蕾舞团首次表演过这首歌两个星期后，百代便急忙把它做成单曲发布。回到英国后，皇后乐队在伦敦苏豪区的兆音乐室^[5]拍摄了宣传片。他们全新的形象就如同这首歌曲本身一样引人注目。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皮衣，理过了头发（甚至布莱恩的头发都剪过了），弗雷迪跨坐在一辆摩托车上，与一群男女舞蹈演员尽情摇摆，他们的舞步由阿琳·菲利普斯精心设计，她后来成为BBC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评委，不过那时候则是电视舞蹈团八卦新闻（Hot Gossip）的老板。

莫库里和舞蹈演员们沿着T台一路舞动，台子上面留有洞口，手可以从里面伸出来跟着节奏击掌（由皇后乐队在场的随行人员临时出演）。为了进一步增强表演的张狂和魅力，莫库里的T恤上故意剪出几个洞，塑料裤子外面绑上了滑板护膝。“滑板运动在那时十分流行，”彼得·辛斯说，“弗雷迪会从各种流行趋势中找灵感。”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流行之巅》的观众就会亲眼看见皇后乐队的主唱从《我们会震撼你》时期华丽摇滚的阴柔，切换到了卡斯特罗款的阳刚。

“观众要么惊恐，要么激动，反正他们看弗雷迪，总有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时候，”泰勒说，“但我们就是由着他。虽然经常拌嘴，但我们团队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我们的态度就是：只要他是真的想做，就去做吧。”到月底，《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最高冲到榜单第二名，仅屈

居于胡克博士乐队^[4]的民谣流行情歌《当你爱上一个美人》（When You'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之下。皇后乐队戏仿猫王的歌曲几乎在一夜之间扩大了歌迷的范围。“突然之间，有了很多年纪更轻的人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布莱恩·梅说。

皇后乐队的“疯狂”巡演将于11月到12月进行，在英国演出十八场。两年前，皇后乐队在国内的演出常常在大型体育馆。而这次，巡演经理盖瑞·史迪克斯却被要求去找更小的场所。“人们指责说我们太铺张，”罗杰·泰勒承认，“那我们就换一种贴近观众的方式，同时也为了向评论家表示：‘去你妈的，我们在一千四百个座位的地方照样演。’”这次巡演的名字不仅仅与单曲有关，也是“因为这么做本来就疯狂”，罗杰补充说，“我们明明可以在温布利球场演几晚的”。

巡演从都柏林和伯明翰的大型场馆启幕，然后便开始了布莱恩·梅所说的“胡闹场次”。12月13日，皇后乐队进驻伦敦学苑剧院，发现他们的灯光设备和仅有两千座的剧院有些不配套。“学苑的屋顶太小了，装不上我们所有的灯，”泰勒回忆道，“所以我们问剧院经理是否可以在上面打两个洞。他说没问题，只要我们付钱。然后我们接到保罗·麦卡特尼的电话，说他的翼乐队下周也要去那里演出，而且他们也需要在屋顶打洞，所以要不他们付一个洞的钱？我们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支卖给保罗·麦卡特尼一个洞的乐队。”

不过，虽然贴近观众到几乎可以看清他们的眼白，炫酷的摇滚乐队装备和位于郊区克里登珀利的蒂凡尼舞厅^[4]的简陋环境还是无法匹配。此时已经加入莫库里随行人员团队的前皇家芭蕾舞服装助理彼得·“小雀”·弗里斯通，在他的书《谁愿永生：弗雷迪·莫库里传》（*Freddie Mercury: An Intimate Memoir*）中写道：“珀利的蒂凡尼？我觉得弗雷迪只知道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那个蒂芙尼珠宝。”

不过，在学苑剧院的舞台上，莫库里一定能够感受到他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十年前，1969年10月12日，弗雷德·保萨拉曾在同一地点观看过齐柏林飞艇乐队的演出。那时候他刚从大学毕业，在哈罗德百货做兼职付房租，还在野山羊乐队里做着摇滚明星梦。当时，他的性取向还是个秘密。现在，在布莱顿中心剧院^[4]的演出结束后，莫库里在一家同性恋俱乐部看上一位名叫托尼·巴斯汀的金发摩托车手，把他带去大饭店自己的套房。尽管在美国夜夜笙歌，莫库里最亲密的那些朋友都坚持认为，他真正想要的还是一段稳定的长期关系。莫库里被二十八岁的巴斯汀迷住，尽管不能完全保持专一，莫库里还是让他搬进斯塔福德排

屋，之后几个月他在此居住。

“疯狂”巡演在伦敦的亚历山德拉宫结束。不过，四天后的节礼日，皇后乐队又在汉默史密斯音乐厅加演一场。当时这里正在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为饱受战争蹂躏的高棉（现在的柬埔寨）人民筹集资金。保罗·麦卡特尼牵头邀请皇后乐队作为第一天的演出嘉宾，之后演出的还有谁人乐队、冲击乐队^[9]、伪装者乐队^[10]、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等。皇后乐队似乎毫无巡演疲劳的迹象，他们贡献了当年最好的表演之一，莫库里在唱《绝对心脏暴击》时砸烂了监控器，唱《我们会震撼你》时，他骑在打扮成超人的工作人员的肩头出场。

虽然这次巡演大获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盖瑞·史迪克斯在学苑剧院筋疲力尽，身体垮了。事实证明，既要顶着乐队严苛要求的压力，还要试图违抗物理定律，把皇后乐队的舞台装置塞进狭窄的小型剧院里实在是太难了。而史迪克斯甚至忽视医嘱，坚持监督完成剩下的巡演。“他们花钱请我来就是干这个的，”他说，“来创造奇迹。”

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爱车狂人》的灵感来源，音响工程师约翰·哈里斯，曾被布莱恩·梅称为“皇后乐队的第五位成员”，在“世界新闻”巡回演出结束后患病。美国人特里普·哈拉夫成为他的继任，并会跟随乐队直到最后。哈里斯为皇后乐队尽心尽力，他甚至破例签了协议，可以从乐队现场演出中抽成。“疯狂”巡演期间他有回来过，但身体状况迫使他于年底再次离开。乐队曾想请哈里斯经营高山录音室，但他谢绝了。“约翰被一种疑难杂症压垮了，这种病恰恰让他行动不便，因此他的巡演生涯只能终结。”2009年，布莱恩·梅说。

而此时的皇后乐队自然没空反思过去的巡演经历。美国电台DJ正在播放《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就像之前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伊莱克特拉公司本来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单曲发布。但厂牌不得不让步，到1979年圣诞节，它已经成了冠军单曲。这一成绩令人欣慰，尤其是之前《此刻别让我停下》甚至未能突破前五十名。但这也预示着音乐风潮的变化。皇后乐队的上一首前五单曲是《我们是冠军》。现在他们重回榜首的单曲却是一首欢快的乡村摇滚曲。“毫无疑问，总有人讨厌新单曲，喜欢我们过去的歌，”梅谨慎地措辞道，“我认为这种情况总会发生，除非你的风格完全一成不变。有得必有失。”1月，更贴近皇后乐队传统风格的抒情歌曲《拯救我》以单曲的形式发布，在英国榜单达到第十一名。

两首单曲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继续工作的压力。2月，皇后乐队返回慕尼黑，开启为期四个月的录音。这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为一张专辑工作最长的时间（项目名称：“爱情游戏”[Play The Game]）。“1979年到1984年间，我在慕尼黑希尔顿住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一整年。”彼得·“阿鼠”·辛斯说。“阿鼠”是约翰·迪肯的“贝斯”部的一员。“绅士”部由莫库里和随行的不同人员组成。“吉他”部是梅和他的技师布莱恩·“乔比”·泽利斯，“鼓”部则包括罗杰·泰勒和他的技师克里斯·“水晶”·泰勒。“各个部门之间存在一些对抗、玩笑和竞争——既有工作上的，也有社交上的。”辛斯说。

皇后乐队在慕尼黑异常高产。据称他们录制的歌曲多达四十首，最终有十首歌曲入选，打造成新的专辑，起名为《游戏》（*The Game*）。据马克观察，“有两个歌曲创作阵营：弗雷迪和布莱恩。弗雷迪这边很容易。我们用同样的思维一路想，然后他花十五到二十分钟想出来一些精妙绝伦的东西。另一边呢，布莱恩则会先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然后就迷失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中。在这两种不同个性的工作方式下，大多数时候保持专注非常困难。”

马克上次请求梅在《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里使用电视播音员吉他，只是他们两人针锋相对的一个例子。“是发生过一些冲突，”梅承认，“我和他在如何录制吉他声音方面有很多争辩。我只是想用我一直用的方法来录，甚至都没想过其他办法。但是马克就会说：‘来，试试我的方法吧。’最终我们双方达成妥协，取得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布莱恩·梅谈皇后乐队录制《爵士》时，曾回忆说乐队出于避税原因在国外录音，认为这样也能避免“分心”。然而，在慕尼黑期间，乐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分心。“我们做《游戏》的时候，一切都那么有趣、新鲜、闪闪发亮，”梅记得，“但是问题来了，‘啊，录完我们去喝一杯’，虽然刚开始还挺好的……”

音乐园的日常变成每个部门的代表在晚上6点集合，布莱恩·“乔比”·泽利斯开始调鸡尾酒。鸡尾酒之后是晚餐，晚餐时会喝更多的酒，然后就去夜店。莫库里和“绅士”部的人经常去慕尼黑伦福德大街上一间热闹的同性恋酒吧亨德森老夫人（Old Mrs. Henderson，简称Henderson's）。皇后乐队其余成员，比如“水晶”、“乔比”、“阿鼠”、马克等，通常会去被泰勒称为“世界最劲迪斯科舞厅”的糖棚俱乐部^[4]。

“大家把糖棚唤作‘办公室’，”马克笑着说，“录音室工作完后，我们

起码每隔一天就会去那里。”很多时候，夜店打烊之后，夜生活却没有结束。“从糖棚出来，我们会去刚刚开市的集市喝一瓶香槟，”辛斯记得，“然后回到慕尼黑希尔顿酒店，和弗雷迪碰面。”在酒店里，狂欢继续，要么是在泰勒的套房（代号HH，Hetero Hangout，直男窝），要么在莫库里的套房（代号PPP，Presidential Pouff Parlour，总统软包会客厅）。“然后我们上床睡觉，下午起床吃早餐……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整年。”

一天晚上，从糖棚出来后，乐队返回录音室制作一首新歌《猛龙袭击》（Dragon Attack）。这首歌甚至在歌词里加入了糖棚“the shack”。“布莱恩只喝伏特加兑奎宁水，”马克笑称，“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嗑药。但是布莱恩喝高之后会完全掉线。”《猛龙袭击》是酒精作用下耗时半个钟头做出来的成果。也许乐队处于眩晕之中，但这首歌并没有掉线。它和滚石乐队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某几首偏放克风格的歌曲一样，拥有摇摆迷幻的节奏。梅揉出一段强劲的电吉他独奏，莫库里使用了类似罗伯特·普兰特的那种高潮式呻吟。那些不喜欢艳俗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的皇后乐队歌迷，可以在这首歌曲里找到安慰了。

除了娱乐之外，糖棚还有隐藏吸引点。“工作后我们会带着录好的音乐带子来，放到他们的音响系统上播放，听听在那儿是什么效果，”梅说，“有节奏感、空间感的曲子听起来都不错。”俱乐部里，只要一放就很受欢迎的曲子有坏伙伴乐队的金曲《想要缠绵》（Feel Like Makin' Love），主唱是离开了自由乐队的保罗·罗杰斯。“在糖棚里，坏伙伴乐队听起来特别棒，因为歌里有很多的空间感。我们放了一些自己的歌，比如《管好你妈妈》，听起来就不行，因为它里面东西太多，留白不够。那之后我们就执迷于在音乐中留出空间，做出在糖棚里听起来很棒的歌曲。”

不过，最终通过“糖棚测试”并获得高度赞誉的是约翰·迪肯的新作。在录音环节，泰勒、莫库里和梅会分享他们对歌曲的看法，通过哼唱和声、演奏旋律调子等方式寻求其他人的反馈。只有迪肯喜欢在作曲时保持沉默，搞得莫库里给他起了个绰号“鸵鸟”。“他就像一只鸟儿一样，静静地憋着，直到下出一个完美的蛋。”马克说。在《游戏》专辑里，迪肯产出了截至目前最好的一只蛋：《又一个人倒下》（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美国摇滚乐队别致乐队^[4]的已故吉他手伯纳德·爱德华兹记得，1979年别致乐队在录制专辑《过火》（*Risqué*）时，迪肯曾到纽约电站录音

室^[43]拜访过。这次录音让别致乐队收获了一首超级热门单曲《好时光》（Good Times）。跟《好时光》类似，《又一个人倒下》也是同样由斯线串起的律动舞曲。当然，迪肯写这首歌的灵感可以一路追溯到他在反对派乐队翻唱摩城唱片的日子里。“在学校的时候我听了很多灵魂乐，”他说，“我想写《又一个人倒下》这样的歌曲已有时日，但我只想出一些基调和贝斯连复。”

“我必须承认，”梅说，“迪小肯^[44]刚开始做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过之后这首歌曲在乐队其他成员的帮助下逐渐成形。布莱恩·梅说，毫不意外地，罗杰·泰勒最抵制这首歌：“我记得罗杰很不喜欢，‘这不是摇滚乐，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鬼？’他不想让皇后乐队变得很放克。”2008年接受采访时，泰勒坚持说他反对的不是这首歌曲，而是把它作为单曲发布：“它不符合歌迷的口味，而且我们是第二次涉足迪斯科音乐。我在（《爵士》专辑里的）《玩乐》上已经试过，无功而返。”

迪肯与泰勒一起合作背景伴奏声。迪肯希望鼓声听起来尽可能地干涩。这简直是完全颠覆皇后乐队的通常做法，但泰勒勉强同意了，他用毯子填到鼓里来消音。“罗杰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循环鼓声，”梅解释说，“对他来说，这声音太不一样了，因为他一向喜欢那种很宏大、很有氛围感的鼓声。我倒无所谓，因为我的任务是把零散的吉他杂音插入到迪小肯那一下下叩击的贝斯连复中。”

迪肯包办了节奏吉他，仅让梅添加一些修饰，马克则将背景钢琴声、击打铙钹声和拍手声融入乐曲中。最终的点睛之笔来自弗雷迪·莫库里。“弗雷迪对舞曲很有感觉，”梅说，“他开始喜欢上那种唱法。我们在做《又一个人倒下》的时候他特别投入，一直唱到喉咙充血。”

除了《又一个人倒下》之外，这次还有另一个常规被打破。经过多年的抵制，皇后乐队终于屈尊降贵开始使用合成器。“估计是我的错，”泰勒说，“我买了一个奥伯海姆复音合成器。拿给弗雷迪看，他马上就说：‘哟，亲爱的，这不错……’”奥博海姆OBX合成器在几首歌曲中都有使用，包括泰勒的《摇滚起来（摇摆主调）》（Rock It [Prime Jive]）。泰勒将这首歌称为自己“最基本的曲调”。这一首，和他的另一首歌《即将到来》，两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摇滚乐。但是《摇滚起来》引起了录音室中的分歧。泰勒想唱主音，但马克想要莫库里唱。最后录了两个版本。听完后，梅投票给莫库里，但迪肯又倾向泰勒的版本。最终版本的折中方案是，莫库里唱前奏部分，然后泰勒从第一节接下去唱完

全曲。

鼓手还想把《即将到来》作为单曲发布，并且将他创作的另一首歌《人之身躯》（A Human Body）取代这首放到专辑中。乐队的其他成员不同意，《人之身躯》只能搁置下来，后来会作为B面发布。“罗杰是探索新声音的那个人。”马克说。他也是和马克合作最密切的人，总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被团队拒绝进入《游戏》的诸多歌曲，最终会收录到他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自《世界新闻》之后，泰勒对朋克的态度已经有所改观。1980年，他在接受音乐媒体采访时，曾热情谈论冲击乐队的最新单曲《伦敦召唤》（London Calling），以及伪装者这样的新乐队。不过正如布莱恩·梅所说：“皇后乐队在录音室里，最好的情况下你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大的不合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和罗杰之间了，”梅说，“作为乐队的两位初始成员，我们亲如兄弟。然后我们总是能找到各种暴力撕逼的理由，但绝大部分都是因音乐而起。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表达不出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也没人听。”

据称，在慕尼黑录音期间梅有过几次出走：“我曾经在气头上脱团过几次。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们都这么干过。吵到最后往往只是纠结在一个音符。”

“录音室里面爆发过多次大吵，”泰勒同意说，“通常是关于布莱恩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他是在吃煎蛋吗？我们都互相把对方逼疯了。”

莫库里言简意赅地描述了皇后乐队的状态：“一山有四虎，画面太美！”

可能因为曾经学物理的缘故，梅认为录音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布莱恩会花很长时间把音乐做正确，”彼得·辛斯回忆道，“然后呢，继续，做得更正确。”有时候，其他人经受不住糖棚的诱惑，纷纷离开音乐园，录音室里却依然会见到梅的身影，他说这是“对完美的永恒追求”。一种孤独的坚韧。“我就是那个凌晨3点坐在录音室，想办法让事情正常运转的人。”他回忆说。这张专辑中，梅在他自己创作的《扬帆去吧，亲爱的姐姐》中做主唱，这是一首情绪相对低落的歌曲，伴有感情丰富的合唱。

遗憾的是，某些时候，弗雷迪·莫库里听起来好像被慕尼黑的夜生

活过度分散了精力。他创作的《不要自杀》（Don't Try Suicide）是一首油腔滑调的乡村摇滚乐，在《游戏》中算是最薄弱的一首歌。专辑的开场曲目《爱情游戏》则好很多。它是一首瑰丽的情歌，据说灵感来自莫库里与托尼·巴斯汀之间的爱恋。要不是合成器的使用给它打上了1980年的标签，它听起来感觉更像1975年的作品。约翰·迪肯的《又一个人倒下》不用说是最出彩的，他的另一首《今夜需要你的爱》（Need Your Loving Tonight）就是标准的大众化流行摇滚乐，在最终专辑排序中，被夹在两大主力单曲“又一个人”和“疯狂小事”之间。

《游戏》专辑于1980年6月发布。就像《爵士》和《世界新闻》一样，由于四位词曲作者都在争取各自的空间，它的音乐在多种风格中摇摆跳跃。但这种风格各异很快成为皇后乐队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游戏》专辑仅第一面就有充满力量的抒情曲、重摇滚、迪斯科、流行乐和乡村摇滚乐。“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乐队发挥良好，”泰勒说，“《游戏》比《爵士》更出色，我们在歌曲创作上好得多。”

百代也终于争取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专辑封面：皇后乐队用《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的扮相，拍摄了黑白集体照片。这种风格和《皇后II》完全相反，他们试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把皇后包装为流行乐队卖力宣传。虽然有媒体弱弱地对《游戏》和两首已经发行的单曲抱怨了几句，但丝毫不影响销量。两周内，它就成了皇后乐队在英国的榜首专辑。十周后，它在美国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滚石》杂志用不屑的语气讽刺道：“当然了，《游戏》至少没有皇后乐队前几次的作品那么令人讨厌。”

“我们玩得挺开心的，还打赌最后能排到榜单第几名。”罗杰·泰勒告诉《声音》杂志。让争强好胜的泰勒最高兴的是，《游戏》的销量超过了滚石乐队的最新专辑《感情用事》（*Emotional Rescue*），后者比《游戏》早发布十天，但在英国只排到第九名。除了皇后乐队的公事，泰勒还有值得庆祝的私事。5月份，他加入了梅和迪肯的行列，成为一名父亲，女友多米尼克生下大儿子卢瑟·菲尼克斯。

与此同时，弗雷迪·莫库里在好友肯尼·埃弗雷特的电视节目中出镜，这是一部滑稽哑剧短片，在片中他扑向主持人并把他拽倒在地。难得见到他在皇后乐队之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与此同时，他放纵自己进行了另一个“疯狂血拼”。海外避税期间，弗雷迪已经交代玛丽·奥斯汀为他在肯辛顿区寻找房源。她为他找到了“花园小舍”（Garden Lodge），这是一幢位于洛根场路1号的乔治王朝风格宅邸，有八间卧

室，附带四分之三英亩花园，高高的砖墙环绕四周，将尘世的喧嚣隔离在外。莫库里一见倾心，立刻付了50万英镑现金，眼皮都没有眨一下。“我一看就爱上它了，不到半个小时它就是我的了，”他说，“屋子里面满是大理石地板和桃花心木楼梯。我称它为城市里的庄园。我不是很喜欢乡下的那种空气和牛粪味儿。”几乎片刻之间他就请了一位建筑师，开始对房子进行大面积的装修和改造。

新单曲《爱情游戏》不像《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那么快流行并受电台欢迎，但依然在英国榜单拿到不错的第十四名。比起这首歌，公众更感兴趣的是莫库里的最新扮相。主唱蓄起了浓密的上唇胡须，完成卡斯特罗款的最后一步。乐队的办公室被歌迷寄来的剃须刀片淹没，这是他们表达抗议的方式。“有趣吧，也许他光着身子在牛津街上走一圈，引发的媒体曝光还不及他蓄小胡子来得多。”罗杰·泰勒说。

皇后乐队的下一次北美巡演将于6月底在温哥华开启。此时谁人乐队正在美国演出途中，他们的暖场乐队叫作唯一之人^[4]，这个乐队的贝斯手恰好是以前在肯辛顿市场开过商铺的艾伦·梅尔。梅尔曾经的雇员弗雷德·保萨拉如今已经是弗雷迪·莫库里，家财万贯的摇滚明星，但是艾伦在巡演时有一瞬间难得地见到了仿若当年的弗雷迪。

“前两年我一直和皇后乐队保持着联系，后来我加入了唯一之人乐队，我记得那时再见到弗雷迪，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知道是喝了还是嗑了什么。”梅尔回忆道。谁人乐队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演出时，梅尔看到皇后乐队来到后台。“我一开始本能地想走过去打招呼，但我想起上次见到弗雷迪时，他简直是个混球，于是我把目光移开了。”梅尔离开人群，走向乐队的拖车。“突然，我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是弗雷迪。他看见我转身离开了。他非常友善，问我为什么要避开，他说：‘是不是因为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像个贱人似的？’我说：‘没错，弗雷迪，就是因为这个，而且你确实是。’……他就笑起来。那之后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皇后乐队自己的巡演开始时，莫库里嘴上的小胡子招来了更多的关注。有时候，粉丝们甚至往舞台上扔剃须刀片。随着巡演继续，莫库里开始询问观众对他新形象的看法，在一片欢呼、嘘声和喝倒彩的喧闹中，他神经兮兮地坏笑着。“女生们，你们喜欢我的小胡子吗？……男生呢，你们喜欢我的小胡子吗？……好多人都恨死了。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同时，那些不确定到底是谁在皇后乐队里面打鼓的，只要看看罗杰·泰勒的低音鼓鼓皮就行了，那上面十分实用地印着他的一张脸部特

写。（“万一他得了健忘症，只消看眼鼓皮就知道自己是谁了。”鼓技师“水晶”说。）

《游戏》中有六首歌曲时不时被放进歌单，开场曲用的是猫王的《监狱摇滚》。增加了《又一个人倒下》现场版本，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演唱。因为录音室里干涩的鼓点很难在现场复制，而且这首歌的放克风格让一些皇后乐队的歌迷感到不快。“他们觉得这首歌‘不是很摇滚’。”布莱恩·梅承认说。一年前，底特律电台的DJ史蒂夫·达尔发起了“迪斯科去死！”的运动，抗议电台歌单中舞曲音乐逐渐挤掉了摇滚乐的份额。这项运动在芝加哥的一间棒球场达到顶峰，人们疯狂地烧掉了比吉斯乐队、别致乐队、乡下人乐队的唱片。不过，这场运动也挑明了美国在摇滚和舞曲上由来已久的界线，实质上它暗含的是白人音乐和黑人音乐之间的分歧。奇怪的是，纽约舞曲电台WBLS无意间播放了《又一个人倒下》，他们并不知道皇后乐队的背景，只是把它挑选进了歌单。“他们还以为我们是黑人乐队呢。”梅说。听众反应热烈，于是其他电台纷纷效仿播放此曲。那时候《爱情游戏》在美国榜单只拿到一个水土不服的第四十二名，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曝光对乐队自然没有坏处。

据“水晶”·泰勒说，是乐队的工作人员在音乐园录音室听过之后，建议将它作为单曲发布：“但是乐队只是瞪着我们，叫我们再去调些鸡尾酒。”罗杰·泰勒的记忆有所不同。7月份皇后乐队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演出的四场中，有一晚迈克尔·杰克逊造访后台。“我记得迈克尔和他的几个兄弟在更衣室里，不停地谈论着《又一个人倒下》，”泰勒说道，“他们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单曲发行。”

唱片公司又一次屈服于外界的压力。这首歌的宣传视频趁着乐队在达拉斯试音时拍摄完成。一周后，单曲在美国发行。八个星期后，皇后乐队收获了第二首美国榜首金曲。在英国，《又一个人倒下》的成绩是第七名，排在警察乐队、疯狂乐队^[16]和猫王的歌曲后面。但在其他地区，如阿根廷、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全部拔得头筹。布莱恩·梅承认说，“假如不是约翰和弗雷迪的胁迫，罗杰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朝着那个音乐方向前进。”“我从来都没想过它会是太热单曲，”泰勒承认说，“我真是大错特错。”

《又一个人倒下》取得了多重白金唱片，也是伊莱克特拉厂牌史上第一首销量超过三百万张的单曲。但是别致乐队的伯纳德·爱德华兹对这首歌有着复杂的感情。约翰·迪肯开诚布公地承认说，《又一个人倒下》确实是从别致乐队的歌曲《好时光》里借鉴了贝斯线。“借鉴OK

的，”爱德华兹告诉《新音乐速递》，“不OK的是，媒体居然说是我们在拙劣地模仿他们。《好时光》发布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哎，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黑人音乐家竟然具有这种创新能力简直不可想象。就是这帮搞迪斯科的傻逼抄袭了这首摇滚歌曲。”

乐队之外，泰勒不仅喜得贵子，还有另一件分散注意力的喜事。在巡演期的三周休假间隙，他飞去高山录音室创作一张个人专辑，即后来发行的《太空游乐》（*Fun in Space*）。从1979年做《游戏》以来，泰勒就一直在点滴积累专辑的各种构思。那年，皇后乐队休息停工后，他自己回到高山录音室整理出十首歌曲，本人包办主唱并演奏全部乐器，音响工程师大卫·理查兹负责增加合成器声效。这个皇后乐队规避已久的设备，将在《太空游乐》专辑里扮演重要角色，并大量出现在皇后乐队的下一张录音室专辑中。

那年的美国巡演于9月初在密尔沃基重新起航，皇后乐队正享受着拥有大热榜首单曲的荣耀。莫库里像往常一样裸露着胸膛，或者身穿紧身背心和PVC材质长裤，依旧用小胡子的事情刺激着观众，在唱《大屁股妞》之前他说：“我不喜欢瘦干干的小妞……胸越大越好！”

当然，私底下，一本叫作《斯巴达克斯指南》（*Spartacus Guide*）的全球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名录决定着他在每个城市的夜生活。在纽约停留期间，莫库里和一位名叫索尔·阿诺德的男护士擦出了火花。他在《此刻别让我停下》里高唱的那种“好时光，好时光”也在继续进行。“我们都知道谁和谁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罗杰·泰勒轻笑道，“我们的生活彼此交融。”9月28日，泰勒将实现自己的梦想，皇后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追平了“是”乐队的演出记录，在此连演三个晚上。演出中莫库里向前排观众喷洒香槟，欢快地叫他们“小贱人”。最后一晚结束后的欢庆派对上，光着上身、只穿黑色长筒袜和高跟鞋的女服务员招待男客人，而女宾则由穿着健身短裤的光膀子男服务员招待。一位当事人说：“因为皇后乐队不希望被说成有性别歧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完成了四十六天的美国之行后，皇后乐队竟然直接回到录音棚，10月至11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将在这里继续工作。一年前，电影导演迈克·霍奇斯就联系过乐队，请他们为即将上映的科幻电影《飞侠哥顿》（*Flash Gordon*）创作原声。乐队表示同意，霍奇斯向电影的意大利制片人迪诺·德·劳伦蒂斯提供了皇后乐队的资料。而迪诺对摇滚乐不甚感兴趣，他的第一反应是：“娘娘们？这些人是谁啊？”

《飞侠哥顿》是基于漫画的超级英雄，诞生于1934年。泰勒和梅都是科幻小说和漫画书爱好者，尤其是泰勒十分热衷于让皇后乐队接触新的媒介。“我们要成为第一个做摇滚电影原声的乐队。”他说。“还没有人在电影中使用过摇滚乐，除非是像《春风得意》（*The Girl Can't Help It*）这样本来就是讲音乐的电影。也许在今天这是常态，但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起的头。”

皇后乐队观看了二十分钟的电影片段。在制作《游戏》时，他们在慕尼黑已经出了一些初步的样带。“然后，迪诺·德·劳伦蒂斯听过样带后表示，‘不行，不适合我的电影！’”布莱恩·梅回忆道。“但迈克·霍奇斯坚持要用，并说服他效果会很棒。”德·劳伦蒂斯的不满源于他想打造一部重量级的科幻史诗，而霍奇斯却更倾向创作庸俗一点的作品。皇后乐队的样带是按照迈克·霍奇斯的版本来定制的。

两个月的时间里，布莱恩·梅和马克辗转于伦敦的多个录音室制作配乐。“完全是凭感觉来。”梅承认说。至少请作曲家霍华德·布莱克一事就是这样，他是最后一刻被临时请来编排管弦乐谱的，原本聘请的是鲍伊的弦乐编排作者保罗·巴克马斯特，但他认为会被当成皇后乐队创作的陪衬于是请辞。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当时已经进录音室，布莱克加入时没剩下什么时间了。他在十天内完成了九十分钟乐谱的创作，最后四天根本没有睡觉。“我记得弗雷迪·莫库里用他的高音假声唱出了《开往阿伯瑞亚》（*Ride to Arboria*）的曲调，”布莱克说，“我向他展示如何扩展成完整的管弦乐用在电影里。”布莱克在录音室指挥管弦乐队演奏了三天，因疲惫和压力引起慢性支气管炎病倒了。

结果，泰勒在制作《游戏》时热衷使用复调合成器的热情在这张专辑中得到延续。霍华德·布莱克康复归来后，发现大部分管弦乐部分都被皇后乐队用合成音乐取代了。“有些失望。”他淡淡地说。最后还是梅坚持把项目做完：“其他人都被别的事情转移了注意力，而我因为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项目，所以这摊事最终还是由我收拾。”“简直是技术噩梦，”马克补充说，“就我和布莱恩两个人，面对着超级多的录音机、录音带、磁带，里面充斥着零碎的电影对白……”

“我们想做一张听起来就像是正在看电影的原声专辑，”梅说，“所以我们把对白和音效都编织进了原声之中。”1994年，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的精彩原声大量加入了电影对白，不过十五年前，皇后乐队在《飞侠哥顿》的原声上就已经首次使用这种技巧了。最终，当他们把完成的配乐和电影样片同步时，德·劳伦蒂斯表

示很满意。迈克·霍奇斯成功地把夸张的漫画转化成了真人电影。它有着浮夸的场景和台词设计；有穿着金色热裤的莎士比亚舞台剧演员布莱恩·布莱斯德；有英格玛·伯格曼的爱将马克斯·冯·叙多夫饰演的明皇帝；还有美丽的奥内拉·穆蒂饰演的奥拉公主，被绑在桌子上用鞭子抽打。它的这种不太正经的冷幽默和突如其来的SM情节，符合皇后乐队的特质，而皇后乐队也跟它一拍即合。

《飞侠主题曲》（Flash's Theme）成了11月榜单的前十单曲。歌曲中的合唱如儿歌般简单，刺耳的节奏恰如其分地烘托了电影中步步逼近的氛围，让人想起了五年前电影《大白鲨》中鲨鱼的接近，除此之外还大量使用了嘹亮的吉他声。同时，布莱恩·布莱斯德饰演的乌尔坦王子的对白在歌曲中时隐时现，尤其是那句经典台词：“哥顿还活着！”“这是一部非常做作的电影，”泰勒承认道，“但我感觉，我们的音乐很好地契合了电影的各种浮夸媚俗。”

皇后乐队飞往苏黎世，开始准备欧洲巡回演出的排练，这一次他们带上了新装备：合成器。演奏此设备的任务落在布莱恩·梅身上，他将在歌单中演奏三首《飞侠哥顿》里的歌曲：《英雄》（The Hero）、《飞侠主题曲》、《战斗之歌》（Battle Theme）。他们此次巡演的暖场演出乐队是西伦敦的酒吧摇滚乐队直排八汽缸乐队^[17]，这支乐队目前签在彼得·汤申德的鳗鱼派唱片公司下面。鳗鱼派公司砸了一大笔钱，3万英镑，才给直排八汽缸乐队争取到这次巡演机会，却似乎没有引起皇后乐队太多的关注。

“布莱恩很有魅力，很友好，他给了我们很多赞赏和建议，”直排八汽缸乐队的吉他手里克·卡斯曼如今回忆道，“约翰·迪肯几乎见不着，然后我记得弗雷迪在整个巡演中都没有对我或是我们乐队说过一句话。从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弗雷迪相当冷淡。他总是单独坐豪华轿车来，身边跟着他的随从们。但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完美无瑕的。罗杰·泰勒有点像弗雷迪，因为他似乎也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每次演出带着自己的人来。我感觉他和弗雷迪两人都很大牌。”

这次巡演中包含德国的六场，其中一场在柏林的德国馆^[18]，这个九千座的体育馆为1936年奥运会而建。“那是他们曾经举行纳粹集会的地方，”卡斯曼回忆道，“真的很超现实。我的眼前本来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所有的观众举起打火机，形成一片巨大的火光海洋。太赞了！”弗雷迪当时返场唱《我们会震撼你》的新造型，是要坐在打扮成《星球大战》的反派达斯·维德的工作人员肩膀上登台。《星球大战》创始人乔

治·卢卡斯听到风声，发出侵权起诉威胁，迫使皇后乐队放弃了这一行为。

12月，“游戏”巡演抵达英国。在伯明翰新建的一万六千个座位的国家展览中心体育馆^[19]，直排八汽缸乐队成了第一支在这里演出的乐队。但是暖场乐队始终无法超越主乐队。“皇后乐队用的是老伎俩，把扩音器音量调到我们表演时的两倍大，”卡斯曼说，“这样一来，他们立刻就显得比我们更宏大、更狂野。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专业人士，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利用整个舞台，并且尽量让表演效果看起来比真实的还要宏大。”

在伯明翰，莫库里又有惊人之举，返场重新出现时，他的身上穿着一条迷你的不能再迷你的皮短裤。后台工作人员纷纷打赌裤子会不会裂开。“舞台上的弗雷迪全身心地放射着活力和魅力。”卡斯曼说。但他不免注意到，私底下的弗雷迪相当不同。“他似乎很疏离，甚至对乐队成员也是如此。我从来不记得他们在试音时有过玩闹或者开怀大笑过。”

12月8日晚，约翰·列侬在纽约的公寓大楼外被枪杀。第二天正是皇后乐队在温布利体育场的演出日，他们迅速排练并加唱了列侬的《想象》（Imagine）。莫库里唱错了一点歌词，梅也忘了部分和弦。离开现场不可一世的表演，莫库里在任何采访中都会贬低自己歌曲创作的重大价值，而列侬时不时地会被他当成标杆。“我并不认为我能够写出有深刻意义的歌，”他说，“约翰·列侬可以，我不行。”

12月8日，皇后乐队的《飞侠哥顿》原声大碟发布。在英国，它和单曲一样排进了前十位，但在美国止步于前二十位。它的封面上写着皇后乐队的名字，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皇后乐队专辑。然而，更奇怪的是，它却引来了一些以前没有过的媒体好评（“嘞！啪！咚！一张真正的史诗专辑！”《唱片镜报》热情地赞美道）。《飞侠哥顿》里只有两首完整歌曲：《飞侠主题曲》和《英雄》，其余的都是简短、零碎的配乐；是电影的完美搭配，但没有电影同步视觉效果下，让人很难保持注意力。而且，似乎乐队里不是每个人都有泰勒和梅对《飞侠哥顿》的热情。某次深夜饮酒时分，皇后乐队的一位工作人员播放了这张专辑，约翰·迪肯精神一振，含糊地嘟噜了一句：“这谁的？”

德国巡演的最后一场结束后，直排八汽缸乐队被邀请参加在柏林黑猫俱乐部^[20]举办的演出后派对。对于来自伦敦牧羊林区的酒吧摇滚乐队来说，这是一段新奇经历。“那是一家非常硬核的脱衣舞俱乐部，”里克

·卡斯曼回忆说，“有那种极其颓废的氛围，酒精和毒品满天飞。”一位《花花公子》杂志的插页模特被邀请参加，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忍不住想和她跳个舞，”卡斯曼承认，“想象下漫画《兔子罗杰》（*Roger Rabbit*）里走出来女郎，和我这个干瘦颓废的朋克摇滚乐手一起跳舞的画面。然后还没三分钟，罗杰·泰勒走过来，招手就把她叫走了。”台子上男女脱衣舞者当众做爱，舞池当中，直排八汽缸的工作人员（“一位来自伯明翰的壮小伙”）在狂欢过度之后昏倒在地，被人抬出场地。

皇后乐队就像是心生厌倦的罗马皇帝，多年的耳濡目染让他们对种种放纵场面感到麻木。那天晚上，大部分乐队人员都沉浸在黑猫俱乐部的下流狂欢中，莫库里却身在别处享受着自己的另类冒险。他们有太多值得庆祝的事情。截止1980年末，皇后乐队在全球卖出两千五百万张单曲、四千五百万张专辑。他们还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英国薪酬最高的公司董事（报道称每人年薪为70万英镑）。随着《游戏》专辑拿了五次白金专辑，皇后乐队坐拥全世界。但布莱恩·梅带着疲惫，承认说：“放纵的元素开始渗入到音乐中。”

1981年，皇后乐队以《飞侠哥顿》在日本的首映开启新年，之后在东京武道馆举办了五晚演唱会，还顺手捡到一位流浪至此的英国流行歌星。加里·纽曼的合成流行歌曲有大卫·鲍伊的影子，1979年以来他已经拿下了一系列榜单的热门金曲。纽曼在摇滚乐队日本乐队^[21]的邀请下飞到了东京。“我本来要和他们一起上台表演，”他说，“但我到了之后，发现一切都是误会，他们根本没想叫我一起。”纽曼临时兴起，搞到一张皇后乐队在武道馆首演的门票。“肯定有人认出我来了，因为之后皇后乐队的保安过来邀请我去后台。”

皇后乐队邀请纽曼和他们在东京最豪华的餐厅之一吃晚餐。“但我非常拘谨，吃得也很简朴。”他承认说。他被日本食物吓到了，还不能用刀叉，只能用筷子，只好坐着不动。“然后弗雷迪注意到这点，问我想要吃什么。我只好告诉他说：麦当劳。”莫库里把他的司机叫来，和餐厅经理商量了一下，十五分钟后纽曼就在大嚼芝士汉堡包和炸薯条了，同时皇后乐队继续享用他们的寿司，莫库里用他的风流韵事活跃整桌气氛。几个小时后，弗雷迪在东京著名的涉谷西武百货商场给信用卡练了练身手，全店闭门谢客，好让他安安静静地购物。不过，不久之后，皇后乐队将会花比这多得多的钱来摆平麻烦。

在沃纳·赫尔佐格1982年拍摄的电影《陆上行舟》（*Fitzcarraldo*）中，主人公菲茨卡拉尔多是一位橡胶大亨和歌剧迷，他前往秘鲁丛林的中心地带，想要寻找一片尚未开垦的橡胶作物地，希望借此发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歌剧院。菲茨卡拉多沿着河边跋涉到尽头后，他招募当地人帮忙拖着船穿越丛林，迈过秘鲁山脉。这是一个缓慢、艰巨到异乎寻常，但又奇异到令人叹服的任务。1981年，皇后乐队的巡演工作人员将经历他们自己的“陆上行舟”，他们需要通过空路、海路和陆路运送老板们的那些超过100吨的演出装备，甚至需要穿越南美洲的丛林。几个月后，他们还会重返南美大陆进行第二轮巡演，而那一次他们能全身而退就已经算幸运了。

经过九个月的精心策划，皇后乐队终于在1981年2月首次到访南美洲。“南美洲已经被提议了多次，”彼得·辛斯回忆说，“不过皇后乐队的公司里总有人提议去各种不同寻常的地方；莫斯科是另一个选择。乐队一直都很跃跃欲试，但这次他们因为《游戏》的成功而格外振奋。这个时候，皇后乐队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了。”

1981年，许多启发过他们的乐队要么解散，要么处于崩溃的边缘。1980年鼓手约翰·伯纳姆去世后，齐柏林飞艇乐队解散；在没有基思·莫恩的情况下，谁人乐队跛足前行，最终在出了一张专辑后放弃（尽管只是临时性的），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迷墙”巡演将成为他们在接下来六年里的最后一次现场演出。朋克和新浪潮的到来掀起了评论界的猛烈抨击，但皇后乐队却幸存下来。

1980年，吉他手彼得·弗兰普顿和放克乐队“土·风·火”乐队^[2]曾在巴西和阿根廷演出过。不过两者的演出规模都比较小，并且是在室内场地进行的。《又一个人倒下》在阿根廷和危地马拉都出人意料地拿到榜单第一名，现在皇后乐队已经正式成为南美洲唱片销量最高的乐队。皇后乐队的计划是带着自己的最大演出阵容，到国家级的室外体育场进行演出。巡演经理盖瑞·史迪克斯和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比奇先到南美大陆进行了几次踩点，并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一间临时制作办公室。

这是一片在很多方面都处于未知的领域。正如辛斯回忆的：“涉及的人太多了，你都不知道谁是负责人，到底发生了什么。”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何塞·罗塔被任命为这次巡演的一级推广商，指定由他负责皇后乐队办公室和南美大陆其他地区的当地推广商之间的联络；这个过程充满了困难，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家推广商无法给乐队支付保证金。演出日期定下来又取消，排了又排。

皇后乐队的制作经理克里斯·兰姆提前飞抵阿根廷，又在海关遇到麻烦。因为携带了一罐火药，他遭到怀疑；但这个其实是舞台表演必需的烟火装置。他还带着一包工作人员证和后台通行证，上面印着两个袒露上身的女人和一根香蕉的图片。据说为了获得许可通过海关，兰姆只能用记号笔把通行证上违规的部分都涂掉。“我觉得很正常的，”辛斯说，“付钱给某个人让他们放你过去。一切都用美元完成，皇后乐队办公室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周转。”

日本演出结束之后，乐队成员有一个星期进行休假放松，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曲折复杂的操作，他们要把位于东京的20吨、位于迈阿密的40吨设备运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准备在萨斯菲尔德足球场^[23]的首场演出。一架DC8包机从东京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行时间为三十五小时，巡演工作人员则从东京经纽约飞往阿根廷。刚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辛斯和其他工作人员就接到严格的指示：“基本上，我们被告知，‘好了，你们可不是来到了什么毒品天堂，这里的法律非常严格，请牢记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除了装备之外，皇后乐队还必须提供一百卷人造草坪，以覆盖南美洲巨大足球场里珍贵的草皮。“这都不算麻烦了，”布莱恩·梅说，“不然你去试试看，拿一个允许观众站在真正草皮上的许可。”在去往萨斯菲尔德的路上，一辆运送设备的卡车翻倒了。他们花了四十八个小时，才找到一台足够大的起重机来清理卸货。与此同时，在体育场里，皇后乐队多达六十个人的巡演团队在当地工人的帮助下，在27℃的炎热天气里，负责从头开始建造一个约30米高、43米宽、12米深的舞台。

“我在空荡荡的体育场地面拍摄了第一块木头和卷尺的照片，”彼得·辛斯说，“即使是那些协助我们的当地工人，都不相信这次演出真的会发生。他们觉得整件事会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所以我们大家全程都悬着一颗心。”

工作人员的心态可以理解。据彼得说，皇后乐队曾暂时安排过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和巴西贝洛奥里藏特进行演出（辛斯：“最后都不知何故取消了”），还计划要去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他们特别想做一场马拉卡纳体育场的演唱会，毕竟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但计划搁浅，因为里约总督宣布这个场地只能用于体育、宗教或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活动，1980年教皇和弗兰克·辛纳屈的露面是可以的，但1981年皇后乐队来访不属此列。最后，皇后乐队定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三场，在马德普拉塔和罗萨里奥各演出一场，在巴西圣保罗演出两

场。

皇后乐队（“第一名的超级乐队！”《太阳报》用西班牙语写出大标题）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接待。在层层保安和一名政府官员的护送下，他们离开飞机，迅速通过海关关口。“我们走进机场大楼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弗雷迪·莫库里说，“他们停止了所有的机场广播，在播放我们的音乐。”陪伴着皇后乐队的是来自音乐媒体和综合性媒体的一小群记者，其中包括《流行音乐周刊》的雷伊·科曼和《太阳报》的妮娜·米斯科。不过，从乐队踏上阿根廷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当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如影随形。

皇后乐队从机场赶去参加记者招待会，然后入住喜来登大饭店，再前往演出场地，繁忙的行程中他们乘坐的都是装甲加固过的汽车。“它们是一种像战舰一样的载人工具，全副武装的机枪从金属车体的洞里伸向外面，”妮娜·米斯科写道，“警察的摩托车队一路护航，鸣笛开路。”通过成为第一支在新大陆进行大型摇滚演出的乐队，皇后乐队渴求超越同行取得自我胜利，同时他们此行也成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罗伯托·维奥拉将军正在成为阿根廷实质上的总统，就是他安排了皇后乐队的机场接待环节。皇后乐队的这次来访被维奥拉用成了个人政治公关运动。身处这个笼罩在严密军事统治和动荡政治气候下的国家，阿根廷国家安全机构必然会密切监视着乐队的行踪。

在萨斯菲尔德体育场演出之前，推广商何塞·罗塔曾被安全局的特工带到一旁问话，如果恐怖分子在演出期间用枪指着弗雷迪·莫库里的头，命令他喊出纪念阿根廷前领导人贝隆的话“贝隆万岁！”，怎么办？“因为观众数目特别巨大，有人担心这件事会沦为一次政治事件，”莫库里打趣道，“所以他们求我别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

最终，皇后乐队进场时，舞台被武装士兵团团包围。然而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观众的热烈反应。此时皇后乐队的每张专辑都位居阿根廷榜单前十，他们演奏的每首歌都像返场曲一样引起轰动，语言上的差异并未阻4.5万名观众回应每一句歌词。尽管酷暑难耐，莫库里还是穿着他的皮制摩托车夹克完成了一部分演出，里面穿的背心印着伦敦同性恋俱乐部“天堂”^[24]的标志。（南美演出时，他的同伴是一位男模特，同时也是天堂俱乐部的保安。）萨斯菲尔德的第二场演出将通过电视直播，超过三千万的阿根廷和巴西电视观众收看了演出。在后台，乐队被介绍了阿根廷的足球英雄迭戈·马拉多纳，五年之后，马拉多纳将会以

一记手球将英格兰足球队淘汰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与本国的体育明星拍照是游戏规则的一条；另一条则是和维奥拉将军共进晚餐。国际特赦组织于早些时候估计，在阿根廷军政府的命令下，有一至两万人被处以酷刑或遭到绑架。但是，最终除了罗杰·泰勒拒绝外，其他皇后乐队的成员还是在维奥拉家里用了饭。

由于在萨斯菲尔德的演出大获成功，皇后乐队将在一周后返回，进行第三晚演出。现在他们窝在里约热内卢等待下一步行动。由于科尔多瓦的演出被取消，工作人员需要收起人造草皮，移到马德普拉塔市和罗萨里奥市的体育场去，观看人数将超过76000人。皇后乐队还是一心想在81000人的马拉卡纳体育馆演出，他们提议向里约热内卢州长夫人中意的慈善机构慷慨捐赠，被拒绝，之后谈判宣告破裂。“那是个‘既要赶快行动又要苦等结果’的情况，”辛斯回忆道，“我们能演……又不能演了……能演了……不能演。”

另外两场，3月20日和21日在圣保罗的莫伦比体育场^[25]的演出确认可以进行。乐队从里约热内卢撤离，巡演工作人员开始再次执行菲茨卡拉尔多式的“陆上行舟”任务，穿过公路和丛林，把一百多吨设备运到巴西。在巴西边境，海关官员决定要检查每一件物品（执行这个过程意味着两场演出都得取消）。之后不知怎么达成了交易，大概过程中少不了美元打点，所有卡车在第一场演出开始仅剩三十六个小时的时候被放行。在圣保罗，约翰·迪肯的私人保镖自我介绍曾经杀过两百多人。皇后乐队的保镖都是从巴西令人闻风丧胆的“敢死队”抽调来的。“他们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厉害的警察，脱帽的瞬间就可以干掉一个人，”莫库里回忆说。“有人拍过一张约翰和那位‘杀人专家’的照片，”彼得·辛斯说，“迪小肯在那儿，旁边站着个重型机枪插在裤管里的大块头。”

莫伦比第一晚演出前的后台，厉害如盖瑞·史迪克斯也终于心态崩溃。因为一部能用的电话都找不到，过于恼火，他从墙上扯下来一个扔出了窗户。之后来了警察，皇后乐队被迫留在化妆室里，直到演出前几分钟才可以出来。最后，他们在巴西的两晚演出观众超过了二十五万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装备外，当地组织者还额外借了一些聚光灯给他们。仔细检查后，他们发现这些设备上涂着“土·风·火”乐队的字样，原来是去年他们来演出的时候被扣留下来的。

工作人员担心皇后乐队的装备也会被没收，于是采取了紧急措施。当体育馆的工作人员忙着收拾乐队的人工草坪时，皇后乐队的工作人员

砸开舞台，赶紧设法把所有的设备运输去机场。“我们在洛杉矶的货运代理公司租用了一家叫‘飞虎队’的公司的巨型喷气式飞机，”辛斯回忆说，“它有一层顶层甲板，飞机的内脏已经掏空变成一个舱。但是很不走运，我们把所有装备运过去的时候，又发现他们没有合适的托盘承托设备。”辛斯在机场逗留了十八个小时，守着这些昂贵的货物，之后才辗转从波多黎各飞回美国。虽然每天运营成本高达2万至2.5万英镑，皇后乐队的南美探险之旅还是在账上赚取了350万美元，并取得了公众形象上的重大胜利。“南美洲倒下^[26]！”行业杂志《音乐周刊》宣称。“也许皇后乐队像一台无情的庞大机器，”《流行音乐周刊》写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做到了。”七个月后，他们会再次进发南美，结果却有很大不同。

原本计划推出的《皇后乐队最佳金曲》（*Greatest Hits*）专辑推迟到了1981年末发布，于是罗杰·泰勒便先推出了个人专辑中的单曲《未来管理》（*Future Management*），完整专辑《太空游乐》将在4月份发布。专辑封面用的图画是一个泡泡眼的外星人。这个形象是由泰勒在微笑乐队的老队友蒂姆·史塔菲创作的，双方都不知情。“我当时不知道那幅画用于什么目的，直到几年后才发现，”史塔菲说，“实在是奇特。”

《未来管理》逐步上升到英国前二十名时，泰勒上了一期《流行之巅》，节目里他弹着一把电吉他不自在地对口形。“天啊！”2008年采访时，他抱怨道，“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个节目。”这首歌有警察乐队的白人雷鬼乐的影子，整张专辑体现出泰勒对当下音乐的喜好，不过没能在排行榜上造成很大动静。《太空游乐》第一次证明，皇后乐队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大于其中每个人的总和。

5月，克里斯蒂娜·梅诞下女儿路易莎。仅几周后，布莱恩就去了高山录音室，与乐队和马克汇合。类似做《游戏》第一阶段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完成一张新专辑的压力。莫库里正忙着和约翰·迪肯合作制作一首叫作《酷猫》（*Cool Cat*）的歌曲，这首歌比《又一个人倒下》还要偏离七十年代皇后乐队的风格。作为皇后乐队中的摇滚良心，布莱恩·梅感到这个阶段标志着一段特别有挑战性的时期的开始。“不容易，”他说，“太不容易了。”

7月带来了又一届蒙特勒爵士音乐节，也带来了和大卫·鲍伊的邂逅。高山录音室的工程师大卫·理查兹曾为鲍伊制作过《英雄》

（*Heros*）专辑，此时鲍伊在高山再次预定了一些录音时段，用以制作歌曲《猫人（扑灭火焰）》（*Cat People [Putting Out Fire]*）。皇后乐队

录音的时候，他自然会时常来访。“有天晚上大卫过来，我们一起弹一些别人的歌，纯粹是唱着玩，”罗杰·泰勒回忆道，“后来大卫说：‘我们傻了，干吗不自己写一首歌呢？’”1985年，弗雷迪·莫库里谈到这首皇后乐队/鲍伊合作的《压力之下》（Under Pressure）时，说随后的录音持续了将近二十四小时，靠“几瓶酒和其他东西”撑着。马克的回忆更清晰：“吸了不少（可卡因）。 ”

1984年接受采访时，约翰·迪肯将《压力之下》的大部分功劳都归于莫库里和鲍伊，他称是鲍伊创作了现在经常被用来举例的歌曲中的贝斯线。（迪肯：“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学会的。”）罗杰·泰勒说，它完全不是在录音室里写出来的那种歌曲，而且原本想的歌名是“街上的人们”。另一首在同时期录音但未发行的皇后乐队曲目《想要》（Feel Like），其中有一段钢琴用在了《压力之下》里。

“我们凭着感觉先拼出来一条完整的背景伴奏音轨，”布莱恩·梅回忆道，“做好之后，大卫说：‘OK，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进到录音间里面，按自己想要的旋律唱——脑海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然后我们从这里再编出曲调来。’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其中的一些即兴创意，比如开头莫库里那段令人难忘的拟声高音，最终的确用在了成曲上。鲍伊还坚持要求，莫库里和他不能互相听对方唱什么，唱完一个小节换给对方，这样能够给歌曲制造出一种“剪切—复制”的感觉。^[27]

“过程很煎熬，”2008年梅承认说，“因为我们四个本来就是想法很多的大男孩，现在再加上大卫，他的想法够我们四个受的。创作激情碰得火花四溅。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极少能够按照我自己一个人的方法来。大卫脑子里有一幅清楚的规划图，他狂热地接管了这首歌。”

鲍伊还决定这首歌不能叫“街上的人们”，而应该叫“压力之下”。听到他们合作的消息，百代和伊莱克特拉公司两眼放光。两周后，鲍伊、莫库里和马克在纽约电站录音室重聚，试着就最终混音版本达成一致。“罗杰也在那儿，主要是打圆场，”梅回忆说，“我就不去了。”

“我和鲍伊开始混音，他就在那边盯着，我在里面干活，”马克笑着说，“事情进展不大顺利。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鲍伊要求着‘做这个’‘做那个’。后来我打电话给弗雷迪说‘快来帮帮我’，于是弗雷迪过来从中调解。”

“我没有搅和进去，控制室已经成了一锅粥，”梅透露说，“这首歌本来就是即兴拼凑出来的，经过一次监控混音就作为单曲发布了，过程中涉及大卫和弗雷迪的激烈角力。”某天鲍伊想要重新制作这首歌；改天他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单曲发布了。最后，《压力之下》终于在10月发布，一举为皇后乐队和鲍伊拿下英国榜单冠军。“《压力之下》对我们来说是一首重要的歌曲，”2008年布莱恩·梅说，“因为有大卫的参与，也因为它的歌词内涵。以前要我这么说有难度，但我现在可以承认了.....不过总有一天，我还是想自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做一个我的混音版本。”

《压力之下》的录制过程伴随着混乱，此时提出9月重返南美洲巡演，是众人在疲惫的录音之后都愿意接受的放松。莫库里就更没意见了。出行前，他在纽约伯克希尔广场酒店举办了五天的派对，庆祝三十五岁生日。聚会上人们喝掉了价值3万英镑的香槟。莫库里还准备在这个城市购置一套公寓。宿醉刚刚消退，他就飞去新奥尔良和其他人汇合排练，然后乐队飞往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他们将在加拉加斯室内体育馆演出三晚。

然而，他们到达委内瑞拉的时候，前总统、民族英雄贝当古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奄奄一息。三场演出准备一切顺畅，之后皇后乐队受当地电视台邀请，于9月28日上一档流行音乐直播节目当嘉宾，但不做表演。莫库里断然拒绝，其他人同意出席。梅、泰勒和迪肯既不会说西班牙语，听得也不是很懂，节目中一名播音员突然冲上舞台宣布贝当古去世，要求集体默哀两分钟，他们看上去十分困惑。随着画面继续播出，仅一分钟后，第二个播音员又进来宣布是误报：贝当古还活着。后来，这位“委内瑞拉民主之父”于当天晚些时候去世，整个国家陷入了集体哀悼。“这意味着两个星期不可以有音乐表演。”彼得·辛斯解释说，皇后乐队在委内瑞拉的演出立刻被取消，导致当地推广商就费用起了争执。

下一阶段的巡演将于十天内在墨西哥进行。乐队退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休憩，同时，一个配备了十八人的前哨小队前往得克萨斯州拉雷多，从这里通关进入墨西哥边境。“正常情况下，你用美国驾照就可以进入墨西哥，”彼得·辛斯说，“但是整个团队被告知需要签证才能通关。”更麻烦的是，他们发现签证局每天只能发放六张签证。“签证上的官方规定写着，我们是在‘协助墨西哥技术人员’。我现在还留着那张签证申请，上面写着一些简直难以置信的东西：需要一张正面照，一张侧

面照，指纹，母亲结婚前的名字，眼睛的形状等等，都是借口，其实就是某些人想捞点钱。”

等签证和钱的数目谈妥之后，工作小组被送到边界外的一个无人居住区，要求他们在那里等着。“我和一个同事觉得很无聊，逛着走过一个大门就进了墨西哥，买了一个冰激凌又回来，”辛斯笑着说，“最后他们让我们过了，我们开了快100公里才到达另一个检查站……到了那边又要交更多钱。”

皇后乐队将在墨西哥蒙特雷56000人的大学体育馆^[28]进行演出，这个场馆又被称为“火山”。“直到开演前两天门票才开售，而且他们是通过超市卖票，”彼得·辛斯说，“组织得太糟糕了。”演出结束后，人群离开体育场时，场外的一座桥塌了。虽然没有造成死亡，但有一些歌迷受伤。“于是警察封锁了体育场大门，不准我们离开。又来了，很明显又有什么人想收钱。要不是盖瑞·史迪克斯想办法，我们可能根本没办法把装备运出去。”

“火山”的第二场演出随即取消。一周后，皇后乐队抵达墨西哥普韦布洛，他们将在22000人的伊格纳西奥·萨拉戈萨体育场^[29]演出两晚。2008年，当布莱恩·梅接受《魔力》杂志采访时，问及皇后乐队的墨西哥之行，他说：“发生太多我甚至不愿详谈的麻烦。”罗杰·泰勒说：“我们能做到也算是奇迹了；那里存在某些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传言说蒙特雷演出之后推广商遭到了绑架。但根据1992年出版的“与皇后乐队合作撰写”的《皇后乐队：起源》一书所述，“乐队的推广商在普韦布洛演唱会前一天被捕并入狱，他们必须支付25000美元保释他出来，演出才能继续。”

演出本身的情况更糟。“那个体育场是为奥运会建的，已经年久失修了，”辛斯说，“球场上堆满了垃圾，能用的厕所也没有。”更糟糕的是，工作人员被安置在城里最糟糕的酒店（“你冲马桶的时候，大便会反着漫出来”），多人发生食物中毒，得了痢疾。来到体育场的观众几乎是场地容量的两倍，而且其中许多人“带着嗑完迷幻仙人掌和喝过龙舌兰酒的嗨劲”，演出前的氛围已经很危险和紧张了。皇后乐队上台之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不少观众带着大的卡带式录音机来边听边录盗版，入场时竟然没有人管。电池用完之后，他们取出来往乐队方向扔。没多久，舞台上就铺了一层电池、石头、泥巴，甚至还有鞋子。“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皇后乐队，”辛斯谨慎地说，“只是对他们来说，摇滚演唱会成了不受控制尽情疯狂的借口。”皇后乐队努力撑完全场，但莫库

里被激怒了：“再见了，朋友们，他娘的王八蛋！”^[30]

“演出结束之后，乐队气得不行，”辛斯回忆着，“他们说，‘到此为止，我们这就回家’。盖瑞让他们冷静，跟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明天有一场演出，然后休息一天，还有一场.....如果明天不演，我们很难把装备运出这个国家。你们都别想再看到这些东西了。把明天这场演了，然后休息的那天我们就走。’”

第二天晚上，所有观众进场之前必须由警察搜查，没收携带的酒精饮料和卡带式录音机的电池。等进了场地，工作人员发现警察竟然设立摊位，把没收的电池和龙舌兰酒又卖回去。尽管如此，第二晚的演出还是相对安全一点。但由于某些外部因素，后来归咎于“税收和货币问题”，皇后乐队当晚演唱会没有演出费。随着更多的美元转手，舞台被拆除，设备装上了卡车，他们迅速撤离，乐队的装备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从普韦布洛开往得克萨斯。第三场演出就这么被遗忘了，推广商很愤怒，但是皇后乐队和所有工作人员得以全身而退。

回到慕尼黑，大家经历了彼得·辛斯称为“灵魂拷问”的过程。乐队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据估计大约有100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辛斯说，“这件事让皇后乐队回到了现实。”正如布莱恩·梅的说法，“我们以为能够复制南美洲的成功，但事实却是千钧一发之际才逃回来。所有人都是。”

经历了墨西哥的创伤之后，10月《压力之下》的大获成功给乐队带来了慰藉。同时，百代公司忙于发行《皇后乐队最佳金曲》和相应的宣传视频精选合集《最佳影像》（*Greatest Flix*）。这两部作品的发布标志着皇后乐队成立十周年；乐队剔除了成团后与其他贝斯手合作的一年，将正式开始的年份定为1971年，即约翰·迪肯加入的那一年。11月，乐队飞往加拿大，在蒙特利尔论坛体育馆演出两晚，演出录像将首次被制作为演唱会视频发行，命名为《我们会震撼你》^[31]。《皇后乐队最佳金曲》专辑封面使用的乐队肖像，由玛格丽特公主前夫斯诺登勋爵拍摄，到月底时专辑销量已在英国冲到第一名^[32]。

圣诞节前，皇后乐队回到慕尼黑，完成新的录音室专辑。新歌中，有迪肯和莫库里的心水单曲灵魂乐《酷猫》和《回嘴》（*Back Chat*），后者由约翰·迪肯创作，是他的又一次放克风格尝试。如同《游戏》那

张一样，大部分新歌都要通过布莱恩·梅所说的“糖棚测试”。这一次，莫库里的音乐方向偏离得更远。“弗雷迪的观点是：少即是多，少些内容，少点吉他。”梅说。专辑名定为“白热空间”，听起来也很符合这种想法。

新年之后，《白热空间》（*Hot Space*）的录制过程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82年3月。除了由来已久的音乐风格上的差异外，他们还要对付更多的东西。“慕尼黑几乎成了另一个家，一个我们过着不同生活的地方，”梅说，“感情上来说，我们都在慕尼黑遭遇困境，无人幸免。”乐队的业余消遣已经上升到严重影响工作的地步。“我们录音之后就出去玩，通宵到早上8点才回来，”梅埋怨说，“所以第二天也做不了多少事情……没多久又到了出去喝酒的时间。”连罗杰·泰勒也在2008年的采访中承认：“那时候我们已经相当颓废了，尽是在一些诡异的时间才开始工作。白天流逝到无尽的夜生活循环中。”

此时，糖棚俱乐部的墙上挂着《游戏》的金唱片，店里来来往往的许多摇滚乐手、体育明星和模特，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乐队中某些人。“慕尼黑后期的日子浸淫在伏特加之中，”梅回忆道，“我自己不用药，不过身边尽是嗑药的人。”醉生梦死的间歇，梅回到音乐园录音室，录完了《熄灭火焰》（*Put Out The Fire*）的吉他独奏，这是《白热空间》里少数几首摇滚歌曲之一，似乎在这些曲子中他才能暂时摆脱目前的樊篱。

在《回嘴》一曲上，梅再次力争，要求约翰·迪肯在歌曲的纯放克声音上做一些调整。“《回嘴》写的是关于人们的争论，它应该有种狠劲，还不够愤怒。”吉他手说。最终，迪肯被说服了，允许梅加一点“激烈的东西进去”。但他俩之间的争辩并未停止。“我记得约翰说，我弹的吉他不是他在歌里想要的那种。我们两人苦苦缠斗。”

莫库里则要应对他的新感情问题。这次是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名叫比尔·里德的男人，和弗雷迪的关系异常紧张，经常爆发冲突，甚至有时在录音室也不消停。“弗雷迪是唯一一个可以站出来说：‘好了亲们，现在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快他妈开工吧！’总是很有效，”布莱恩说，“作为一个出了名的有着‘亲爱的，我们决不妥协’态度的人，在录音室里他却特别擅长调解矛盾。他总是能用幽默来化解所有问题：‘哎呀我的天，傻不傻啊你们！’”彼得·弗里斯通回忆起，在制作《白热空间》期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梅不断要求加大音量，莫库里失去了耐心。“他突然喊道：‘你他妈到底要什么？一大群羚羊冲过来那种声音

吗！”

马克记得当时几个人“在所有事情上都吵得热火朝天，整个快要崩溃”。部分原因归结于每个人现在的工作行程都不一样。“制作完《游戏》后他们四个就再也没有同时出现在录音室。好像总是感觉一个录音室只有这两个人，另外两个人在别的录音室。某天你走进去一问：‘咦，罗杰去哪了？’有人就会说：‘哦，他滑雪去了。’”马克对专辑拖拖拉拉的制作感到十分糟心，他甚至用妻子英格丽怀孕来比照。“我跟皇后乐队说，‘从怀孕到生完小孩都比做完这张专辑来得容易’。”专辑完成前一周，英格丽生下了大儿子约翰·弗雷德里克^[33]。马克很快请弗雷迪当孩子的教父。

4月，新单曲《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的发布，首次揭示了《白热空间》在新音乐方向上的大胆尝试。歌里再次响起《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里打响指和拍手的声音，但是它那种合成出来的放克节奏和经过处理的鼓声，听起来比《又一个人倒下》走得还要远。此外，就算布莱恩·梅参与了这首歌的演奏，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歌曲视频里，镜头全是莫库里和一群摇摆肢体的舞者，梅看起来似乎都不想直视摄像机。单曲的专辑封套上描绘着紧贴的双人裸体彩绘特写，在美国引起一片哗然，不过并未阻挡此曲上升到榜单第十一名。《肢体语言》在英国却停在前二十名之后。

“我还记得我和弗雷迪曾有过争论，因为他写的一些东西太同性恋了，”谈到《肢体语言》时，梅说，“我记得我说，‘这些东西最好能够有普适性，因为我们认识的人们拥有各种不同的信仰。’让大家感同身受是好事，不好的是刻意划定人群。这首明显的同性恋赞歌，让我有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我觉得很难用其他的方式来接受。”

就在《白热空间》预定发布时间前几天，皇后乐队收到了大卫·鲍伊的紧急信息。除了《压力之下》，鲍伊还在《酷猫》中伴唱。皇后乐队告诉他这首歌会出现在《白热空间》专辑之中后，他坚持要求他们撤下来，称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不巧的是，这都到专辑发行前一天了，他才告诉我们。”梅说。皇后乐队当时的官方摄影师丹尼斯·奥雷根回忆说：“鲍伊和皇后乐队录音后，我跟着他做巡演拍摄，他对这段经历的印象不佳，巨头相遇，摩擦很大。”没有鲍伊歌声的版本迅速被替换进去。但这一推迟，意味着皇后乐队欧洲巡演已经开始一半，专辑才得以发布。

这次巡演将会有一位老友加入，琥珀摩特乐队的前键盘手摩根·费希尔。“我当时住在比利时，”费希尔说，“我那时已经不做音乐了，但是我需要重操旧业赚点钱。”费希尔写信去问一些朋友和联系人，包括布莱恩·梅。“你看，布莱恩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看巡演吗？’而我给好几个布莱恩都去了信，所以我想：‘这是哪个布莱恩啊？’”

几天后，一盒皇后乐队的磁带寄到，费希尔开始练习起来。不久后，他在洛杉矶参加试音。“其实只有两个人参加面试：我，和来自托德·朗德格伦的乌托邦乐队^[34]里的罗杰·鲍威尔。罗杰是合成器使用大师，比我厉害多了，但他不是琥珀摩特的啊，我是靠这个才拿到这份工作的。”

因为《白热空间》推迟发布，皇后乐队需要在演出中表演观众尚未听到的歌曲。他们特别主播放克歌曲《持久力》（*Staying Power*），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请到了艾瑞莎·富兰克林的著名制作人阿里夫·马丁，在纽约的录音室里录制铜号演奏部分。舞台表演时，梅加入了更多他认为录音室版本里缺少的“愤怒和激烈”。皇后乐队较保守的歌迷不是很喜欢。在法兰克福韦斯特法伦大厅^[35]，唱这首歌时观众喝倒彩，莫库里冲着这些人喊：“不想听就他妈滚！”私底下，弗雷迪和以往一样过着挥霍的生活，他仅仅为了理个发，就让自己的理发师，在伦敦时髦发廊“斯威尼”工作的丹尼·戈德伯飞来德国乌兹堡，之后又邀请他留下来玩，随便待多久。

皇后乐队的暖场乐队本来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新接手的朋克流行乐队嘞喔喔乐队^[36]。有些滋事者往舞台上扔酒瓶，这个乐队的人就把东西捡起来又扔回去。他们立刻被更换，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信基督教的乐队火焰之后乐队^[37]。布莱恩·梅觉得很惊讶。“我们有一些观众觉得嘞喔喔乐队挺潮的。”他在《唱片镜报》采访中说。考虑到皇后乐队的某些新歌曲引发的反应，他又补了一句，“可能我们大部分歌迷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偏保守吧。”

摩根·费希尔也遇到了麻烦。“我弹键盘是专业的，”他说，“但磨合不太顺。”皇后乐队和费希尔原本都期待着对方没有改变，还像1974年琥珀摩特巡演的时候一样，“问题是我已经不是当年他们认识的那个摩根·费希尔了，那个人脾气不好，还会大声读《古恩秀》的剧本。我离开音乐界好一段时间，人平静很多，修炼印度式的灵性，每天做冥想。皇后乐队也不一样了。弗雷迪还和以前一样惊世骇俗，但其他人都有小

孩了。演出时酒店里住的是带着小孩的爸爸妈妈们。一切都变得很冷静，很有计划，很职业化。”不过，一天晚上，费希尔下台时往下瞥了一眼，看见工作人员在他的凳子旁边用粉笔画了一个大箭头，写着“东面”。

在这么大的场馆里演出，《波西米亚狂想曲》放录音带的部分和布莱恩吉他独奏时，他们已经不够时间从舞台走去主化妆室。皇后乐队的工作人员在舞台附近搭了一个临时的迷你化妆间，叫它“小帐篷”或者是“娃娃屋”，用黑色布料挂在脚手架上做的。梅的一段长吉他独奏是所有皇后乐队表演的固定节目。“布莱恩每次都会据理力争地坚持让吉他独奏保留在演出歌单中，我觉得他每次都会获得一种胜利的感觉。”布莱恩·索撒尔说。梅在台上独奏的时候，其他人会聚集到这个临时小屋里。

当时过着清心寡欲生活的摩根·费希尔回忆说，“问题在于布莱恩的独奏有时候会长达十五至二十分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弗雷迪坐在里面，实在受不了了，他翻个白眼，大牙外露，手突然向前一挥，喊道：‘我的神啊，我们去购物算了！带我出去！’”

幕后，商业经理吉姆·比齐重新商定了皇后乐队的合同。现在乐队与百代重新签了一个包含六张专辑的合约。《白热空间》最终在5月21日发布，赶在英国演唱会之前。这是目前为止皇后乐队最具实验性的专辑。迪肯和莫库里的灵魂乐、放克乐占据了专辑前半面的大部分，梅的创作被降级靠边。

值得注意的是，四个乐队成员加上马克都在演奏合成器一栏署名。之前的歌曲如《躺下，做爱》和《此刻别让我停下》中，莫库里欢庆着他高涨的性趣。《白热空间》里的《肢体语言》和《持久力》也是一样。“执迷于低俗恶搞的自恋。”《声音》杂志的桑迪·罗伯逊写道。

在《人生如此真实（献给列侬）》（Life is Real [Song For Lennon]）一曲中，莫库里表现得相对克制。泰勒写了一首自我陶醉的流行歌曲《召唤所有女孩》（Calling All Girls），听起来更适合放在《太空游乐》专辑中。不过，有史以来第一次，专辑中没有任何泰勒或梅领唱的歌曲。所有歌曲都由莫库里唱主音。梅创作了《舞者》

（Dancer）和《熄灭火焰》两首歌，尽量把专辑往硬摇滚上靠，然后他又回归到《赛马场之日》的风格，做出了专辑中最接近乐队旧日传统的歌曲《爱的言语》（Las Palabras De Amor）。这首带有英语副标题“爱

的言语”（The Words of Love）的歌曲，将作为下一首单曲发行。这是一首摇旗呐喊的赞歌，但其中如篝火般热情的吉他声和西班牙语的标题带来一丝西班牙马拉加太阳海岸的气息，甚至还奇怪地让人联想起ABBA乐队的热门歌曲《费尔南多》（Fernando）^[38]。令人惊讶的是，皇后乐队在《流行之巅》上表演了这首歌，这是五年来他们第一次在这个被罗杰·泰勒贬为“垃圾”的节目上露面。

媒体报道方面，《白热空间》收到的评论褒贬参半。《滚石》杂志指出“皇后乐队总是注重声效而不是内涵”，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则称赞这张专辑那“令人着迷的炙热迪斯科”。然而，对于许多歌迷来说，这张专辑方向改变过大了。“《白热空间》不容易，”梅说，“但我还是支持这张专辑的。是它让我们摆脱了老一套，进入新的天地。”罗杰·泰勒仍对专辑的封面和里面的音乐感到不悦。泰勒和莫库里想让《白热空间》的封面设计模仿他们看过的某张摩城老唱片，但最终结果又跑偏了。“那是我们最糟糕的封面，”他说，“绝对是一坨屎。”尽管有如此多的保留意见，《白热空间》还是在英国拿到了榜单第四名。专辑发布六个月后，皇后乐队的粉丝迈克尔·杰克逊将带着他的《战栗》（*Thriller*）重现江湖，这张专辑和《白热空间》很类似，风格融合了放克、流行和摇滚。杰克逊跟梅说过他很喜欢《白热空间》。马克指出，“《白热空间》是被大大低估的，它的音乐性超前了大约九个月。”

回到家乡主场，皇后乐队的巡演也遭遇不少问题，他们连续收到伦敦北部的阿森纳球队体育场和曼联球队的老特拉福德体育场的拒绝。有趣的是，理由是因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在英国出行，征用了所有附近可用的流动厕所。同时，原计划在伦敦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一场演出也被取消，在这个微笑乐队曾最早演出的地方之一，因为场地管理者看过皇后乐队的照明设备规模后，担心会损坏这幢历史保护建筑。

最终，皇后乐队只有四场演唱会成行，包括利兹联盟足球队的埃兰路球场和最近建成的米尔顿凯恩斯国家碗体育场。泰恩提兹电视台（Tyne Tees）录制了米尔顿凯恩斯全场演出，后来作为官方演出DVD发行。^[39]如今看来，1982年的皇后乐队无论是形象还是声音都是如此不同和独特。舞台后方的罗杰·泰勒顶着蓬松的刺猬头，系着红色印花丝质方巾，像是警察乐队的一员；舞台前方的布莱恩·梅仍然保留着七十年代吉他英雄的造型，仿佛自《绝代艳后》之后他就冻龄了；穿着花哨绿松石色牛仔裤和T恤衫的约翰·迪肯显得光彩照人，看起来像星期五上

班不用穿正装的工程师；弗雷迪·莫库里好似一位华丽的马戏团骑师，统领全场表演。音乐什么风格都有，有壮丽的摇滚（《拯救我》），也有福音（《找个人来爱》），还有重金属（《绝对心脏暴击》），再到奇特的白人放克《压力之下》。更奇特的是，这个歌单效果好极了。

莫库里唯一放松警惕的时候是介绍《白热空间》里的歌曲：“你们大致都知道了，上周我们发了新的歌.....所以我们会唱一些黑人放克类型的歌，随便你们怎么叫这种类型.....人们为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就是一张破专辑嘛。”不过，舞台上梅将会给《持久力》和《回嘴》注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持久力》，特别适合演现场。”他说。

然而，在米尔顿凯恩斯体育场，暖场乐队在皇后乐队那些容忍度不高的乐迷面前遭遇抵制。琼·杰特和黑心乐队^[40]唱了一些比较容易被接受的硬摇滚，而利物浦的迷幻流行乐队泪液爆破乐队^[41]则遭到奇怪的对待。“我们表演的时候观众很生气，”主唱朱利安·寇普说，“从头到尾我们都被那些重金属混小子们无情地扔瓶子，他们冲着我们喊：‘滚你妈的，死基佬！’哟，他们欣赏弗雷迪先生却冲着我喊基佬？”

经历暴力的不仅仅是泪液爆破乐队。莫库里和男朋友比尔·里德在演唱会前扯着喉咙大吵一架，最后里德狠狠地咬在莫库里的左手上。因为演出，伤口随即匆忙包扎。主唱和里德之间痛苦折磨的感情既让人担忧，又让人好笑。摩根·费希尔仍然记得，每次演出后的晚宴上都会听到同样的争吵。“每天晚上，我们坐在餐厅里，都会听到弗雷迪的男朋友叫他：‘弗雷迪你不准再抽烟了。’然后每次弗雷迪都会凶巴巴地说：‘哎呀你闭嘴！’接着点燃一支烟。就这么没完没了。”令人费解的是，莫库里直到1980年才开始吸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抽，”彼得·辛斯说，“也许是压力太大的缘故，是另一种可以使用的道具。但弗雷迪抽烟从来不像基思·理查兹那样，不像个摇滚明星。他抽烟的方式更像一个女学生。”莫库里自己则会对任何问他为何吸烟的人说，他是为了弄出他极为欣赏的其他歌手的那种“沙哑的嗓音”。

皇后乐队的美国之行将于7月开始，但米尔顿凯恩斯演出将成为摩根·费希尔最后一次与乐队共同巡演。也许是因为他的每日冥想，或是滴酒不沾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了，”他回忆道，“于是我先去度假，躺在海滩边，收到了皇后乐队办公室的电报：‘非常抱歉，摩根，美国巡演我们不需要键盘手了。’我气坏了。我们需要表演的所有歌曲都在磁带里。于是我回去把它们堆在地板上，跳上去踩烂，弄得地上铺着几百米长的磁带条。然后我去确保演出费一分不少。”

事实上，皇后乐队从来都需要带一个键盘手去美国巡演的，只不过他们已经找到了费希尔的继任者。来自加拿大的自由乐手弗雷德·曼德尔接到聘请，参加这次“美国摇滚”巡演。“皇后乐队实在是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了摩根，感觉不太对，我们想换别人了’，”费希尔笑着说，“我从来没问过他们到底为什么，我太他妈压抑自己了。”

弗雷德·曼德尔曾与艾利斯·库珀乐队^[42]合作，共同创作了1980年的专辑《冲走时尚》（*Flush the Fashion*），而且这张专辑是罗伊·托马斯·贝克制作的。“我被邀请去日落大道的办公室见盖瑞·史迪克斯，”曼德尔说，“我们坐下来聊了大约两分钟，然后盖瑞说：‘好，你来吧。’我说：‘啥？你都不用听我弹一下琴吗？’他说：‘不用，没关系，我只是要确保你好相处。’星期天我去了蒙特利尔，有两天的时间排练。星期三，我在蒙特利尔论坛体育馆的化妆间第一次见到了弗雷迪·莫库里，接着我们走出去，马上要在七千人面前表演。”

“我有一周的时间学习如何演奏一种新的合成器，”他补充说，“有几首曲子是约翰弹节奏吉他，所以我还要弹贝斯。像《回嘴》和《肢体语言》这样的歌曲很有挑战性。跟学习弹一些流行歌曲不是一回事。换到今天我肯定不太敢接类似这样的活儿了，但那时我真是拥有无知者无畏的幸运。”

皇后乐队在波士顿花园体育馆^[43]举行演出时，波士顿市长宣布当天为“皇后乐队日”^[44]，并将象征开启城门的钥匙授予他们。在纽约，他们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两个晚上（比上次“游戏”巡演少一晚），还罕见地同意了一次商场签售会，出现在一家叫“疯狂埃迪”^[45]的电器商店。媒体拍出来的乐队照片里，他们身边围着电视机和《白热空间》的宣传海报，从肢体语言上看不是很适应环境；皇后乐队并不习惯这样的专辑宣传方式。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后派对又是纸醉金迷的一晚，现场又有女子泥地摔跤表演。但其实一切并不美好，《白热空间》销量表现不佳。对美国摇滚电台来说它的舞曲元素太多了，所以电台不怎么播。它最高只达到第二十二位，即使有专门巡演，最终还是从榜单上滑下来了。

皇后乐队的开场嘉宾是比利·斯奎尔，当年和琥珀摩特乐队来美国巡演时在推广晚宴上认识的。马克为斯奎尔制作了《动态情感》（*Emotions in Motion*）专辑，于是两边再次搭上了线。斯奎尔是个帅气的歌手，和皇后乐队一样做的也是繁复的硬摇滚，大量使用和声且风格多变。仿佛是伤口上撒盐似的，《白热空间》在榜单上跌得有多快，

《动态情感》上升得就有多快。“不管皇后乐队的成员们是否感到失落，他们从来没有对我露出丝毫不快，”斯奎尔坚持说，“事实上，我记得波士顿演出结束后，罗杰·泰勒还专门来到我的房间，感谢我‘在这次巡演中帮了大忙’。”泰勒回忆说：“我那时突然意识到，我们不像以前那么能镇得住观众了。”

尽管如此，斯奎尔本身其实是狂热的皇后乐队粉丝，崇拜弗雷迪·莫库里。“以前我常常站在那里看着他，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到底如何才能做到如此无畏？’皇后乐队仍然唱着《我既在此》《管好你妈妈》和《我们会震撼你》，也有新东西，如《肢体语言》《持久力》，还有弗雷迪的小胡子。”

“这些年来，皇后乐队之所以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早早地建立了自己在摇滚乐上的名气和信誉，”斯奎尔说，“他们持续保持着健康的传统摇滚乐占比，同时又在音乐世界里探索一切。《白热空间》打破了这种平衡，美国听众搞不清楚他们在听什么，而且弗雷迪戏剧性的形象变化无疑加剧了乐队的困境。《白热空间》出来时，社会上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恐同氛围。皇后乐队的男性听众可能会觉得遭到背叛，或者是上当受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销售不佳的专辑外，还要与其他问题斗争。三十六岁的莫库里和他的乐队成员之间的距离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他仍然过着二十六岁时的生活，而他的队友们都有了老婆、女友、小家庭。“美国摇滚”巡演在四个月内完成了三十三场。正如布莱恩·梅所说：“我总是试图寻找工作/生活的平衡，这是一场持续的生死战。”梅认为巡演是一种会造成情感错乱的经历，他之前还告诉乐队，有可能的话他不想再乘坐私人飞机去演出了。在新泽西演出时，“绝世红”琴弦断了，他换了一把吉他，琴弦又断。梅少见地赌气把吉他扔到了舞台侧翼。

在后台，弗雷德·曼德尔能听到不少被他委婉称为“讨论”的对话，关于某些歌演得怎么样。“我的恶趣味是走进化妆室说：‘嘿！我真的觉得今晚那首歌演得不错。’然后退出去听他们吵起来。皇后乐队还是很摇滚的，但不是枪炮与玫瑰乐队的那种——总是喊着要来第五杯杰克丹尼威士忌。跟皇后乐队一起，你经常会发现他们在争论一些如同蝴蝶翅膀鳞片那么小的细枝末节。”

然而，莫库里越来越厌倦巡演，时不时爆发无理由的脾气。某天晚上，弗雷迪和比尔·里德又吵了一架之后，突然把矛头指向盖瑞·史迪克

斯，跟他说那天晚上前排的观众太丑了。“行吧，他见不得皇后乐队的演出中前排出现太丑的观众，”彼得·辛斯回忆说，“他说，我们让观众进来之前，需要挑选长相。还认真地说了一分钟。”

伊林学院的校友马克·莫尔登在蒙特利尔开场演出当晚到化妆室拜访了莫库里。莫尔登仍生活在加拿大，两人自1977年再次相遇以来一直保持联系。但这次见面很不一样。“化妆室里灯光很暗，弗雷迪换了衣服，他的随行人员都和他穿得一模一样，”莫尔登说，“他说话的那种感觉，很明显我不是在和弗雷迪说话，而是在和‘弗雷迪·莫库里’说话。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样，我很震惊。”之后情况也没改变，莫库里插手坐着，一个助手端着碗用勺子喂他意大利面。“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像变了一个人。”后来莫库里说了一句尖刻的话，莫尔登转身就走。

仿佛再现两年前艾伦·梅尔和莫库里见面的那段经历，莫尔登也听到身后走廊传来脚步声。“来的人是弗雷迪。我停下来转过身去。他走到我跟前说：‘对不起，马克。我不是故意的……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们再见面吧。’我望向他的身后，看见保罗·普伦特站在化妆室门口，脸上带着得意的笑。”普伦特对莫库里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他控制欲极强，牵着弗雷迪的鼻子走，”莫尔登这么想，“弗雷迪身边有太多利用他、附和他的人，太多从中牟利的人。”

“摇滚美国”巡演最后两场在毗邻洛杉矶的论坛体育馆进行，下面的观众里坐着伊丽莎白·泰勒和迈克尔·杰克逊。尽管有着显赫的嘉宾，但皇后乐队的运气并没有改善。他们在英国发布的最新单曲《回嘴》停留在前四十名之外，而美国的单曲《召唤所有女孩》在六十名止步不前。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论坛体育馆的这次竟然就是皇后乐队和弗雷迪·莫库里在美国最后的演出。

像往常一样，皇后乐队总能够在日本找到安慰，在那里《白热空间》的接受程度高很多。10月，皇后乐队成功地在日本演出了六场，虽然弗雷德·曼德尔不幸产生严重的时差反应，他甚至打电话跟妻子确定地说自己病了。“那是我第一次跟着乐队出国，”他笑着说，“我们到成田机场后，其他人都去俱乐部玩，只有我在酒店躺着睡觉，一个小时后浑身汗水湿透。”不仅仅只有曼德尔压力山大。大阪的演出中，莫库里在钢琴上弹出《展翅高飞》的前奏，然后就停了。因为他忘记和弦了。巡回演出终于结束，乐队成员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布莱恩·梅后来承认说：“我们确实是互相厌恶了一段时间。”

[1] 英文名为“London's Coliseum Theatre”。

[2] Mikhail Baryshnikov, 生于苏联的传奇男芭蕾舞家, 舞蹈编导, 1974年脱离苏联前往美国, 曾任美国芭蕾舞剧院艺术总监, 获奥斯卡提名, 并在美剧《欲望都市》中出演俄罗斯大艺术家。

[3] 英文名为“Musicland Studios”。

[4] 在梅出生之前, 母亲曾经产下一个女性死胎, 这首歌是怀念梅的这位“姐姐”。

[5] 英文名为“Trillion Studios”。

[6] 英文名为“Dr. Hook”。

[7] 英文名为“Tiffany's Ballroom”。

[8] 英文名为“Brighton Centre”。

[9] 英文名为“The Clash”。

[10] 英文名为“The Pretenders”。

[11] 英文名为“Sugar Shack”。

[12] 英文名为“Chic”。

[13] 英文名为“Power Station”。

[14] 迪肯的昵称“Deaky”或“Deacy”。

[15] 英文名为“The Only Ones”。

[16] 英文名为“Madness”。

[17] 英文名为“Straight Eight”。

[18] 英文名为“Deutschlandhalle”。

[19] 原文为NEC, 实际上当时的名字叫伯明翰国际体育馆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Arena)。

[20] 英文名为“Black Cat”。

[21] 英文名为“Japan”。

[22] 英文名为“Earth, Wind & Fire”。

[23] 原文为“Vélez Sársfield football stadium”。

[24] 英文名为“Heaven”。

[25] 原文为“Morumbi Stadium”。

[26] 原文是“South America bites the Dust”, 显然是对迪肯的歌名“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做了发挥。

[27] 但是据马克描述, 大卫偷偷过来听了弗雷迪演唱, 并在弗雷迪唱完后无缝接着唱下去, 让弗雷迪大为震惊, 询问他怎么做到的。马克: “他过来听了呗。”弗雷迪: “操!”

[28] 原文是“Estadio Universatario stadium”。

[29] 原文是“Estadio Ignacio Zaragoza”。

[30] 原话前两句用西班牙语，后面一句改用英文。

[31] 这两场演唱会的具体时间为1981年11月24日和25日，整整十年后，弗雷迪·莫库里去世。据皇后乐队称，此次发行是拍摄演唱会的导演个人行为，并未经过乐队授权。2007年，乐队重新制作修复了当年拍摄的视频，以《皇后乐队震撼蒙特利尔》（Queen Rock Montreal）的名字发行了CD、DVD、DVD蓝光及黑胶版本。其中特别DVD版还收录了皇后乐队1985年在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上的完整表演。之后，这部当年用电影胶片拍摄的演唱会电影在英国各大院线上映。

[32] 2014年，此张精选集成为英国史上第一张销量超过六百万张的专辑，至今保持着英国史上专辑销量最高的记录。

[33] 这个孩子是以约翰·迪肯的“约翰”和弗雷迪全名“弗雷德里克”命名的。

[34] 英文名为“Utopia”。

[35] 德文名为“Westfallenhalle”。

[36] 英文名为“Bow Wow Wow”。

[37] 英文名为“After the Fire”。

[38] 费尔南多是西班牙语名字，这首歌曲是一首回忆美国与墨西哥战争往事的歌曲。

[39] 2004年，皇后乐队以《皇后合唱团——火线悍将现场演唱会全纪录》（中国内地发行CD中文译名）（Queen on Fire—Live at the Bowl）为名发行了这场演唱会的CD和DVD。中国内地和香港发行的CD中删掉了《躺下，做爱》和《大屁股妞》两首歌。

[40] 英文名为“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41] 英文名为“Teardrop Explodes”。

[42] 英文名为“Alice Cooper”。

[43] 英文名为“The Garden”。

[44] 1982年7月23日。之后每年都会庆祝这一天。

[45] 英文名为“Crazy Eddie's”。

第九章 高耸的假胸

接下来二十年我要做什么？我都死了吧，亲爱的！你在想啥呢？

——弗雷迪·莫库里，1984年接受《流行音乐周刊》采访

时间倒回到1966年，艾尔沃思和伊林大小酒吧里的点唱机中，

回响着西蒙和加芬克尔的《59街大桥之歌（感觉超棒）》（59th Street Bridge Song [Feelin' Groovy]）的歌声。当时十九岁的学生弗雷德·保萨拉根本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住在一间能够俯瞰歌里唱到的大桥的公寓里。1983年初，弗雷迪·莫库里在纽约东5街425号的“君豪”楼买了一套位于四十三层的公寓，从阳台上就可以俯瞰59街大桥。

纽约和慕尼黑一样，如今也成了莫库里的游乐场。住在曼哈顿期间，他会在四位男性朋友的陪同下在俱乐部和酒吧间摆渡，这四个人被他称为“我的纽约女儿们”。和比尔·里德分手后，莫库里很快投入到另一段暴风雨般的感情中，这次的对象在慕尼黑，是一位叫维尼·基什伯格的餐馆老板。

1983年伊始，皇后乐队已经享受了几个月什么工作都不用做的奢侈。不久后，除了约翰·迪肯之外的乐队成员都开始着手做个人项目。慕尼黑这里，乔治·莫德找到莫库里，请求他为1926年的科幻电影《大都市》的重制版做配乐，莫德已经拿到了版权。莫库里同意了，两人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爱伤人》（Love Kills），后来变成基本所有乐队成员都参与了演奏。3月，罗杰·泰勒回到高山录音室，继《太空游乐》后，他开始制作第二张个人专辑。一个月后，布莱恩·梅入驻洛杉矶的录音工厂录音室^u，做自己的专辑。此时迪肯在忙其他的事情：他的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约书亚。四人皆向外界统一口径，坚持说皇后乐队没有解散，只是暂时休息。莫库里开玩笑说：“快四十岁了再组新乐队也太傻了吧。”

除了可以自由创作个人专辑之外，作为皇后乐队的成员还有其他好处。198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乐队的形象担当，罗杰·泰勒还有一个非官方的工作。他参加了英国的电视节目《流行大擂台》（Pop Quiz），带着一支答题小队打败了由大卫·吉尔莫带领的另一支小队。出于对赛车的热爱，他发展出了新的爱好：赛汽艇。不过，他去摩纳哥观看国际汽车大奖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泰勒带着自己的鼓技师“水晶”泰勒，与现状乐队^u的吉他手里克·帕菲特一起，参加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讲的是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德里克·沃里克和布鲁诺·西亚科梅利，好处是报销全程奢华旅行。

制片人想在拍摄大奖赛的镜头里出现几个摇滚明星；作为回报，片方承诺明星们可以坐利尔喷气式私人飞机到尼斯，一路享用香槟和鱼子酱，然后再乘直升机去摩纳哥。结果这些待遇没有兑现，他们从伦敦比金山机场起飞，经过连续飞行，又在法国境内长途驾车了一段，最后喝

醉的泰勒和帕菲特被误抓进了局子又很快放了出来。

这一边，较为清醒的布莱恩·梅则和苏格兰重金属摇滚乐队爱抚乐队^[4]共事了一段时间，这支乐队是波利多唱片公司培养的下一个威豹乐队^[4]。梅和马克为这支乐队打造了首张专辑《放轻松》（*Lettin' Loose*）。专辑销量欠佳，但是这支乐队和威豹乐队一样，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七十年代听着皇后乐队的歌长大。进入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新乐队涌现，他们点名皇后乐队，尤其是布莱恩·梅是自己的启蒙者。

1982年底，皇后乐队与伊莱克特拉唱片的海外业务关系开始破裂。他们拒绝续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1983年春季，日本也不签了。皇后乐队与百代签署了上述三个地区，只有美国的合约还继续留在伊莱克特拉。莫库里尤其不满伊莱克特拉在《白热空间》上的处理（虽然年内泰勒还告诉采访者“《白热空间》这一张是选错了方向”）。私底下，主唱跟其他几位成员说他不会再为伊莱克特拉制作专辑了。吉姆·比奇开始谈判皇后乐队剩下的合约，同时谈的还有一份莫库里和英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的一次性个人合同。10月，皇后乐队和百代在美国的子公司国会（Capitol）唱片公司签约，并支付100万美元给伊莱克特拉作为解约金。

国会公司和皇后乐队合作的第一张有关联的专辑是一张迷你专辑，叫作《星星舰队项目》（*Star Fleet Project*），作者署名为“布莱恩·梅和朋友们”。封套上写着：“这不是皇后乐队的专辑，也不是个人专辑。这是一次特别行动。”该专辑源于5月份的一次录音，当时参与者有键盘手弗雷德·曼德尔、贝斯手菲尔·陈和鼓手艾伦·格拉泽（后面两位都来自美国摇滚乐队REO快速马车乐队^[5]）。梅邀请的特别嘉宾是吉他手埃迪·范·海伦，他的同名乐队吸取了部分皇后乐队的前卫风格，主唱戴夫·李·罗斯和弗雷迪·莫库里一样擅长舞台造型。

《星星舰队项目》是布莱恩从儿子吉米喜爱的同名儿童动画片得到的灵感。专辑只收录了三首曲目：一首是这部动画片主题曲的摇滚版本，一首是梅的新歌《放我出去》（*Let Me Out*），还有一首是《布鲁斯破坏者》（*Blues Breaker*），所有参与者共同署名了这首内容繁复的作品，它是对约翰·梅耶尔在1966年的专辑《布鲁斯破坏者和埃里克·克莱普顿》（*Bluesbreakers with Eric Clapton*）的一次致敬；梅和埃迪·范·海伦，一个是家住伦敦费尔特姆的青涩少年，另一个则成长于大洋彼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但这是他们当年共同的必听专辑（“在录音

室里绝对听不到这帮人说的两个词是：‘钢琴’和‘独奏’。”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梅强调，本来没打算把这张迷你专辑公开发行。但因为有皇后乐队的关系网络在，最后还是走了商业化的运作。《星星舰队项目》的销量普通，但它是一份给吉他爱好者的礼物。

同年，弗雷迪·莫库里的超级明星朋友则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可惜二人短暂合作的作品并未在他们在世时正式发布过。那年春天，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杰克逊家中的录音室，莫库里录制了三首曲子。杰克逊的《战栗》专辑是1982年年底发行的。作为同样混合了放克、流行和摇滚的专辑，《白热空间》遇到滑铁卢，而《战栗》却大获成功。还不到一年，它仅在美国就卖出超过两千九百万张。录音时莫库里的私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也在场，据他说，“弗雷迪很尊敬迈克尔”，他拼命抑制住烟瘾，不想破坏主人家里不吸烟的规矩。两人共同创作了三首歌曲，并打算改天完成制作。然后发生了什么？“好像我们俩处在同一频段的时间总是很短，不够把这些事情做完。”莫库里语焉不详地说。1987年的时候，弗雷迪的前任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会向《太阳报》爆料，说杰克逊在休息室抓到莫库里卷着百元美钞吸可卡因，之后录音就取消。相应地，莫库里只是说他和杰克逊在《战栗》专辑出来后就渐行渐远：“他只是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我们曾经一起去俱乐部玩，很开心，但现在他不再迈出自己的堡垒，真令人难过。”

“这里面有一些故事，”2008年时，布莱恩·梅承认说，“反正我知道弗雷迪整体来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他和迈克尔做的一些东西被杰克逊兄弟拿过去了，把他排除在外。”一起录的三首歌，《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Than This*）将出现在莫库里的首张个人专辑，而《胜利》（*Victory*）和《震惊状态》（*State Of Shock*）两首则出现在杰克逊兄弟乐队^[4]1984年的回归专辑《胜利》中。在《震惊状态》的发行版中，杰克逊找了米克·贾格尔作为合唱伙伴。^[4]

莫库里和杰克逊在美国合作，是因为当时他正在洛杉矶准备一张皇后乐队的专辑。起初是乐队接到了做第二张电影原声的请求：托尼·理查德森将约翰·欧文的成长小说《新罕布什尔旅馆》（*The Hotel New Hampshire*）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莫库里和迪肯与理查德森见了一次面，同意了这个项目。后来，做这部电影原声的唯一作用是促成了皇后乐队的再次团聚。他们在唱片工厂录音室鼓捣了八个星期，然后理查德森透露说电影的预算可能不够买皇后乐队的原声，这个项目就被搁置

了。莫库里原本为电影创作的歌曲《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Keep On Passing The Open Windows），将会收录进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作品》。

分别了十八个月后重逢，几个人的情感关系回暖，但工作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和过去一样。据布莱恩·梅说，若不是皇后乐队和美国国会唱片签约，也难把莫库里再拉回录音室：“弗雷迪对伊莱克特拉造成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再来做专辑。”但一到录音室，莫库里就进入了状态。“每张皇后乐队出品的专辑，我们都会写一大批歌曲，再把最好的选进去，”弗雷迪说，“比如，如果我写了五首歌，都比罗杰的一首歌好，我们就不会用他的这首歌。罗杰这次写了三四首歌，从我这里来看，还不够好。”莫库里吩咐泰勒再写更好的。据他所说，就是这样催生出了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收音机嘎嘎》（Radio Ga G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是个文字游戏。鼓手回忆说，因为孩子他妈多米尼克是法国人，三岁的儿子卢瑟·菲尼克斯有一天在爸妈打开收音机后说了一句“ca ca”（法语，泰勒说就是“从你屁股里拉出来的那东西”）。罗杰对当代广播电台的忧虑正好和这句童言对上了。

一开始，梅和泰勒一起创作这首歌，后来他们又分开，梅把他的想法运用到了另一首歌《机器（回归人性）》（Machines [Or Back to Humans]）里。泰勒回忆说，他和一台合成器、电子鼓在录音室里关了三天。“罗杰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放到专辑里去的一首歌，”莫库里说，“但我马上感觉出歌曲中有某种东西——某种很棒、很强烈、很能传播的流行性。”就像年轻的弗雷德·保萨拉在听过一遍之后，就能在大学钢琴上弹出《四处走动》（I Get Around）和《平装书作家》（Paperback Writer）那样，莫库里在音乐上的天资开始发挥作用。据说，泰勒写完就甩手去滑雪了，走之前跟主唱说：“交给你随便处置。”心想广播电台应该不会播一首叫《收音机粑粑》的歌曲，于是乐队修改了歌曲的标题，但歌词里还是保留了这句童言。“你仔细听，我们唱的其实还是‘收音机粑粑’。”泰勒说。

《作品》专辑里使用了林（Linn）牌电子鼓和合成器，是当时最新潮的技术。《机器（回归人性）》在歌词和音乐上都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主题，歌曲中，传统的鼓声、电吉他声与电子鼓声、费尔莱特合成器的声音穿插抗衡。“我们都太在意新技术了，”罗杰·泰勒承认说，“八十年代的时候，随时都有新机器出来，六个月左右它们就过时

了，只能当咖啡桌用。”

同时，新专辑有意识地与《白热空间》的放克和灵魂乐风格保持距离。“《又一个人倒下》让我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们走得太远了，”在一次电台采访中，泰勒说，“现在乐队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也许布莱恩·梅的感触是最深的。他的新作《撕碎它》（*Tear It Up*）的歌词和歌名一样微妙，梅把上次巡演中现场演出《大屁股妞》时的即兴吉他连复段放进了这首歌里。另一支作品《一锤定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重金属歌曲，探讨社会问题。歌词描绘出梅在孩提时期，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产生过的核毁灭恐惧感。比较不同寻常的是，这次梅和莫库里共同署名了一首抒情歌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Is This the World We Created?*），弗雷迪在创作时将它设想为新的十年中堪比《一生挚爱》那样的歌曲。

“录音室里的弗雷迪充满创意和发散思维，”梅解释说，“但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他的巅峰状态只在某个时段涌现，如果能抓到这个状态下的弗雷迪，做一个小时，他绝对是稀世珍宝。然后你会听他说，‘啊，亲爱的你看！我做完了。我得走啦。’你就知道弗雷迪魔法时刻结束了。”

莫库里自己贡献了三首歌。《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专为《新罕布什尔旅馆》电影定制，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强力的节奏驱动感，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原声中常见的励志赞歌风格。《徘徊之人》（*Man on the Prowl*）本来是一首听过即忘的乡村摇滚，但结尾部分由弗雷德·曼德尔演奏的华彩钢琴是一大亮点。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允许其他音乐人进到录音室，做署名的演奏。“弗雷迪和我都弹了《徘徊之人》，”曼德尔说，“然后弗雷迪对我说：‘要不你接着后面弹吧，摇滚的那段。你弹得比我好。而且，他们都会以为是我弹的，亲爱的！’我无所谓，反正拿钱办事。”

主唱最精彩的创作留给了《艰难人生》（*It's a Hard Life*），这是一首类似《爱情游戏》《绝代艳后》那样既恢宏壮丽又悠扬动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开头根据鲁杰罗·莱翁卡瓦洛的歌剧《丑角》（*Pagliacci*）中一首咏叹调改编而来^④。“这是弗雷迪写过的最美的歌曲之一，”2003年，布莱恩·梅说，“它饱含着发自内心的情感。”梅与莫库里密切合作，两人并肩坐着“花费无数个小时，尽全力把这首歌曲做到最好”。不难看出梅对这首歌曲有多喜爱。莫库里不再吹嘘他的性能力（《持久力》），或是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此刻别让我停下》），而是歌唱着他对真

爱的渴望。莫库里从来不会这样承认，“但我相信，世界上几乎所有词曲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梅说，“所有的情感和想法都会悄无声息地蔓延其中，弗雷迪也不例外。”

弗雷德·曼德尔在《收音机嘎嘎》和《一锤定音》中都有演奏，不过在《作品》中，他最历久弥新的贡献在另一首歌曲上。皇后乐队里常年“鸵鸟”状态的约翰·迪肯，又下了一个金蛋。《我要挣脱一切》（“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泰勒开玩笑说）有力地证明了弗雷德·曼德尔的话，“约翰·迪肯是皇后乐队的秘密武器”。就像《又一个人倒下》那样，他又写了一首再简单直白不过的流行歌曲。

迪肯一反常态，让弗雷德·曼德尔用合成器演奏这首歌的乐器独奏部分。“这么做多少有点问题，因为通常只有布莱恩才可以弹独奏部分，”曼德尔回忆道，“但是乐队出去吃晚饭了，所以我就动手了。我没多想，以前跟艾利斯·库珀乐队做专辑的时候也这么操作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好像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事挺大的。”迪肯要求保留这部分合成器的独奏，后来真的留在了成曲中。几年后，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巡演时，在一家乐器商店看到一台新的罗兰德合成器。“它有一个预置按钮，上面写着‘梅的吉他’。我才反应过来，罗兰德公司可能听了《我要挣脱一切》中的独奏，以为是布莱恩弹的吉他，没想到那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做出来的，结果他们复制了这种声音，加到了新的合成器上。”

制作《作品》期间，乐队内部关系和《白热空间》那时一样令人担忧。“不过我们最后都会回到一点，就是乐队大过我们中任何一人，”梅解释说，“它比我们大部分人的婚姻还要持久。”梅的另一首重金属歌曲《我疯了》（I Go Crazy）被乐队拒绝加入专辑。“他们三个特别讨厌它，以演奏此曲为耻。”他承认说。这首歌最后成了《收音机嘎嘎》单曲的B面。三比一的情况下，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不能放到《作品》里的决定。“内心深处，他们都是理智的人，”弗雷德·曼德尔补充说，“我觉得皇后乐队就像四个火枪手：无论如何都要为团体着想……”

有了马克当联合制作人，他们就不缺调解者了。“马克就像第二个罗伊·托马斯·贝克，”曼德尔说，“他在皇后乐队后半段职业生涯起到的作用，和罗伊在前半段的作用同样重要。马克和罗伊是工程师，是那种趴在录音室地上知道怎样接电线的人。不是每个制作人都有这种背景。他们既是技术人员，又有创造性的想法。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马克有能力达到皇后乐队的高要求。”

不过，有的时候，即使是马克也需要避难所。“去录音室的路上有一个脱衣酒吧，”他说，“后来变成我和约翰·迪肯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能稍微得到一点安宁。”特别是莫库里，洛杉矶成了又一处他可以随心所欲玩耍的游乐场。“洛杉矶的同性恋圈子太不可思议了。”马克咯咯笑起来。在西好莱坞“男孩城”流连的放纵之夜，让莫库里遇到了一个外号叫“酒保文斯”的摩托车手。文斯搬进了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租的豪宅，但他不肯放弃酒吧的工作，陪莫库里一起去皇后乐队下一轮巡演。破天荒第一次，竟然有人拒绝这个请求。从此在主唱的朋友圈子里，提到文斯，总是被称为“逃出魔爪的那位”。

“弗雷迪租的房子原来的住户是伊丽莎白·泰勒，”马克记得，“有一天，弗雷迪拿张桌子砸穿了玻璃门。”为了庆祝三十七岁生日，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家里举办了聚会，整个宅邸被百合花覆盖，邀请的宾客有洛·史都华、艾尔顿·约翰等人。以莫库里过去的标准，这次派对算是比较低调的，但皇后乐队在洛杉矶的大肆开销又引出一些问题。“会计说他从来没见过谁像这样烧钱的，”马克笑着说，“他开始问：‘为什么你们只有八个人，要租十九辆车？’”

为了完成《作品》，皇后乐队及随行人员回归慕尼黑，回到了被梅称为“意乱情迷”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到录音室，看到约翰在他的贝斯上留下一张字条，”梅回忆说，“就写了一句话：‘去巴厘了。’”贝斯手大概再也不能忍受，他逃去太平洋的海岛求清静。“他没有在贝斯上留纸条啦，”彼得·辛斯辩驳道，“对，他确实去了巴厘，是因为一些我不想说的个人原因。是我亲自送他上飞机和接他回来的。”“我们觉得OK，”梅继续说道，“因为我们都有崩溃的时候。约翰这个人的不可预知性很神奇：大多数时候他都安静腼腆，突然他就爆发了，你完全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这时候，莫库里本来就复杂的情感生活变得更加复杂。1984年1月，他和现已过世的奥地利裔女演员、模特芭芭拉·瓦伦汀开始交往。金发碧眼的瓦伦汀曾是电影导演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御用女主角之一。她比莫库里年长六岁，被誉为“德国的简·曼斯菲尔德⁴”。两人通过慕尼黑的夜店圈子认识。“芭芭拉和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强过六年来任何一任情人跟我建立的关系，”莫库里在1985年曾这么说，“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跟她深入交谈，袒露自我，这很难得。”两人后来在慕尼黑俱乐部聚集中心地汉斯萨克斯大街合买了一套公寓。虽然莫库里和瓦伦汀睡到了一起，但他依然和维尼·基什伯格分分合合、纠缠不清。基什伯格

一心不愿被富有的摇滚明星男友控制，经常折磨莫库里。

“维尼很粗犷，是弗雷迪喜欢的那种卡车司机一样的类型，”1996年，瓦伦汀说，“他们之间闹得很厉害，两人都会找些不合适的人好让对方吃醋。”但瓦伦汀与莫库里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疯狂。他们的关系中包含着亲密而珍贵的友情，但作为慕尼黑夜店的常客，少不了互相怂恿对方放纵：喝更多的酒，嗑更多的药，打更多的炮。两人互相做，也和其他人做。有一次，莫库里在公寓里失去知觉，据说是因为摄入过量酒精和可卡因。他对这桩事故一点也不在意，继续沉溺其中。还要过一些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健康状况的真相。

1月23日，皇后乐队发布《作品》的抢先体验单曲《收音机嘎嘎》，歌曲浸淫着罗杰·泰勒对音乐行业的失落和伤感。“它唱的是收音机曾经有过的辉煌。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是它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他说，“而今天看来，似乎摇滚乐的视觉效果已经变得比音乐本身更重要了。”

不过，泰勒的忧虑并没有妨碍皇后乐队为这支单曲也做了一部宣传视频。导演大卫·马莱特为《收音机嘎嘎》拍摄了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视频，它使用了弗里茨·朗的科幻默片《大都市》的场景，皇后乐队四人坐在一辆颇有未来感的飞车中穿行在都市丛林。泰勒是这辆太空时代飞行器的驾驶员，但视频里的他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在努力保持着严肃脸。他的身后，是一个看起来坐得不太舒服的梅，和一个同样不适应的迪肯，顶着他新烫的蓬蓬卷发。只有莫库里看起来很自在，像个贵妇一样浮夸地表演着，或许是因为喝了藏在车子里的伏特加兑汤力水，精神振奋。这部视频中最壮观的一幕在松木摄影棚^[10]拍摄，皇后乐队召集组织了多达五百名粉丝俱乐部成员集体拍手。《魔力》杂志的大卫·托马斯后来写道：“看起来真是怪诞可怕，像是重现了莱尼·里芬斯塔尔电影里纳粹的夜间集会。”

滑稽的是，一首哀叹影像视觉超过广播听觉的歌曲，却是用大制作的视频进行宣传的，尽管这无可厚非地对它的传播或销售有利。《新音乐速递》迅速撰文批评视频里的军国主义形象，指责《收音机嘎嘎》是“嚣张的乱弹琴”。然而两周内这首单曲就在英国冲到了第二位。这么多年，看着三个队友为乐队写出那么多的火爆金曲，泰勒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首。

《作品》于2月1日发布。因为莫库里喜爱老派好莱坞风格，他请了

摄影师乔治·赫雷尔来为乐队拍摄一张艺术手法美化的专辑封面。赫雷尔是业内资深人士，曾经为玛琳·黛德丽、玛丽莲·梦露和葛丽泰·嘉宝等人拍过照片。没多久，《作品》就追随着单曲《收音机嘎嘎》的攻势，冲到榜单第二位。一个月后，皇后乐队做了一次“现场表演”，这是继1982年之后的第一次。他们出现在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同台的还有文化俱乐部乐队4等，通过电视转播对口形激情表演了《收音机嘎嘎》。私底下，乐队成员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最后导致梅和泰勒的争吵，用彼得·辛斯的话说叫“小分歧”。“布莱恩和罗杰经常斗嘴，”他说，“但从来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上升到肢体冲突。我记不起在圣雷莫他们是吵什么了——好像是谁的酒店套间更大吧。”

《收音机嘎嘎》在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和瑞典都为皇后乐队拿到了榜首冠军。在美国，经受过《白热空间》的打击后，皇后乐队的运气似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滚石》杂志宣称《作品》是“一场没有劣质金属余味的硬摇滚盛宴”，但专辑却销售缓慢，最终仅达到第二十三位。《收音机嘎嘎》单曲稍微好些，在美国慢慢爬升到第十六位。但短暂的好景很快就会破灭。

“我们赔了100万美元才从华纳旗下的伊莱克特拉公司转到国会唱片，”布莱恩·梅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没多久国会唱片就陷入了美国独立唱片发行人受到腐败指控的争议中。国会断绝了和独立电台推广人的全部联系。作为还击，推广人们就直接报复在当时所有出唱片的艺人身上。他们很不高兴，于是停播了《收音机嘎嘎》。那一周它立刻石沉大海。”到达第十六名之后再五个星期，这首单曲已经滑落到第一百名边缘。

皇后乐队自己内部还有别的问题。“照顾弗雷迪的这个人，非常擅长管好弗雷迪的利益，却践踏着其他所有人的权益，”梅在2008年的采访说，“任何美国的新闻记者和推广人都被他轻蔑地对待，而这些人还以为是弗雷迪干的。我们一路巡演过来，弗雷迪失去了很多朋友，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同时，电台的人也被告知，‘弗雷迪不想跟你聊’。”虽然在采访中，梅绝对不会指名道姓地说是谁，但这个人无疑就是莫库里的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普伦特的恶劣态度造成的后果让皇后乐队与美国广播网络的关系雪上加霜。“普伦特可以很能干，他确实为乐队争取过一些独家机会，”彼得·辛斯说，“但这个人也很难搞，很善变，而且有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4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作品》专

辑的第二首单曲《我要挣脱一切》。皇后乐队再次与导演大卫·马莱特合作，创造出一部名留青史、甚至可媲美《波西米亚狂想曲》的MV。“拍摄绝大多数音乐宣传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过是烦琐无趣的工作，”罗杰·泰勒说，“唯一让我们全程很享受而且笑得停不下来的就是拍《我要挣脱一切》的视频。”皇后乐队全员换上女装，扮成电视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中的造型，这个提议是罗杰当时的伴侣多米尼克提出来的。

皇后乐队的女版古怪家庭里，约翰·迪肯扮演一家之长老祖母；布莱恩·梅穿着丝绸睡裙和毛绒拖鞋，长发裹着发卷；罗杰·泰勒化身为一位赏心悦目到令人发指的金发小女生（泰勒：“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变装的样子也非常震惊呢”）；弗雷迪·莫库里则扮演失意的家庭主妇，造型可能是戏仿《加冕街》里俗气的酒吧女招待贝特·林奇，他穿着皮革的迷你裙，紧身粉色上衣，里面戴着一对假胸。弗雷迪还有额外的道具，他推着一个真空吸尘器在房子里转悠，其他三人看着他走来走去。笑点在于，莫库里穿女装时留着标志性的胡须，但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和从《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里借来的皇家芭蕾舞团成员一起表演时，却剃掉了胡须。

《我要挣脱一切》在英国轻松拿下第三名。在英国的《继续前进》喜剧电影和许多情景喜剧里，绅士们经常女装出境，耳濡目染下英国观众对男扮女装早就习以为常。“希望人们能知道，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不可一世。”泰勒解释说。一直以认真正经形象示人的皇后乐队，突然风格大变，不过同时也抓住了让乐队保持鲜活的那种乖张和矛盾冲突。一位知情者解析说：“虽然在皇后乐队内部，他们常年互相吹毛求疵，但如果乐队外部有人这么做的话就等着倒霉吧。”

在美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美国人讨厌这个视频，”梅告诉《魔力》杂志的米克·沃尔，“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很惊恐。他们就是没懂这个梗。对他们来说，男人打扮成女人简直不可思议，更别说还是一支摇滚乐队。美国的一些电视台拿到录影带的时候我在场，很多人都不愿意播放。看得出来他们很尴尬。”

“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理解，”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对我来说，这就像是班尼·希尔^[4]的喜剧，是典型的英式幽默。我乐意看到罗杰扮成一个女学生，还特别喜欢看弗雷迪做家务的样子。”尽管如此，强势的美国音乐频道MTV还是没有播放此视频，《我要挣脱一切》在美国仅仅排到第四十五名。“美国中部的人觉得弗雷迪大概是同性恋，而

这个地区的市场很重要，”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说，“问题就在这里：在纽约或洛杉矶，你可以有艺术范儿，但你去堪萨斯试试。”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拿自己开起了玩笑，”莫库里吐槽说，“但是美国这些人却说，‘我们的偶像居然穿裙子，他们在搞什么？’”“皇后乐队被要求重新拍《我要挣脱一切》的宣传视频，”彼得·辛斯说，“人们跟他们说：‘这个在美国行不通，你们能不能再拍一个表演视频？’他们回应：‘不能。’其实他们还是应该拍的，因为这个视频在美国害死他们了。”

辛斯陪同约翰·迪肯、罗杰·泰勒在全球做《作品》专辑宣传。“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有做宣传，通过电视或广播。他们好像也飞去纽约待了一周，在另一个城市做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但他们似乎并不想在美国做新闻发布会。当然了，人人都想采访弗雷迪，但是弗雷迪什么采访都不接。普伦特到处晃，说什么‘我让《收音机嘎嘎》和《我要挣脱一切》成了金曲’。皇后乐队对美国的态度是，去他妈的，没他们也一样。这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他们刚和百代美国分公司签约。可能他们觉得百代会有什么魔法搞定吧。”

“弗雷迪不想回美国，去比我们以前演出场子小的地方，”2005年梅承认，“他只是说，‘我们先等等，总会再去巡演，到美国的大型体育场开演唱会的。’然而这成了众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情之一。”

1984年春天，弗雷迪·莫库里回到慕尼黑，和马克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张个人单曲《坏人先生》（*Mr. Bad Guy*）。一个月后，泰勒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陌生边疆》（*Strange Frontier*）。据说鼓手在专辑中放弃了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与新制作伙伴，高山录音室的常驻工程师大卫·理查兹合写了几首歌。

作为一个以无忧无虑、放浪不羁著称的摇滚明星，泰勒的新专辑听起来却非常低沉深刻。专辑里的歌曲内容涉及社会的反人道现象、核末日威胁，甚至还有一首叫作《消磨时光》（*Killing Time*）的歌，描绘了一位百无聊赖的风流摇滚明星，在享乐中任由生命流逝。尽管专辑中翻唱了鲍勃·迪伦的《战争贩子》（*Masters of War*）、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街头赛跑》（*Racing in the Street*），整体曲风稍微柔和了些，但《陌生边疆》仍然是值得正视且严肃的一张专辑。它只进入了英国榜单

前三十名。音乐媒体界的评价中，《声音》杂志下了一个比较直白但可能也算得上有道理的结论：“他能写歌，却不能像弗雷迪那样唱出来。”

更让泰勒笑不出来的事情，是接下来皇后乐队汇合拍下一首单曲《艰难人生》的宣传视频。这个视频在慕尼黑拍摄，莫库里招来了许多朋友和夜店熟人当临时演员，包括芭芭拉·瓦伦汀。视频的场景设置十分奢靡，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婚宴现场加上《色情狂》（*Sex Maniacs*）电影中的舞会。“我不喜欢。”有话直说的约翰·迪肯表示，不过贝斯手的出境程度不高，相对比较能置身事外。其中有个场景，泰勒套着紧身裤，戴着古典褶皱圆领，看起来非常尴尬（“我试过叫他们把我的镜头剪掉。”他后来承认说）。另一个场景，可怜的布莱恩·梅举着一个骷髅头吉他摆着造型。

同时，莫库里穿了一件点缀着长羽毛和二十六只眼睛的夸张的鲜红连体紧身衣，造型仿照法国感伤情歌女歌手米斯廷盖特曾经的装扮。很不幸，按梅的说法，这套行头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肉感的大虾”。他说，“那是我最喜欢的弗雷迪的歌之一，记得他说要穿这套服装的时候，我特别失望。”^[4]美国人可能同样不买账，《艰难人生》跌落榜单，在英国则拿到第六名。

另外，拍摄中最需要担心的还不是莫库里的滑稽服装。他在慕尼黑一家叫“纽约”的酒吧跟人起了冲突，导致右膝韧带受伤。“有个疯子踢了我，”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解释，“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得不减少一些精心编排过的华丽舞台动作了。”

莫库里打了一段时间的石膏。不过，当皇后乐队在他们熟悉的布鲁塞尔国家森林馆开始巡演时，他看起来已经好了。弗雷德·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做演出去了，键盘手换成了布姆镇鼠乐队^[4]的兼职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他是“水晶”泰勒在伦敦一家夜店偶遇后招募来的。艾德尼飞去慕尼黑与乐队见面，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清晨4点，我们还在糖棚俱乐部玩，”他说，“到6点，我们回到罗杰的酒店套房，继续在那儿豪饮香槟……”

“作品”巡回演出的舞台场景仿照弗里茨·朗的《大都会》设计，动用了皇后乐队迄今为止最宏大的照明设备，一条长长的延展台供弗雷迪走位摆造型，舞台背景是两个电影风格的巨大齿轮。考虑到1984年的数控技术还不够好，乐队决定用手摇发动机操作齿轮更保险，于是巡演工作人员晚上又多了一项工作。“作品”巡演地点有欧洲大陆、英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以及备受争议的南非，就是没有美国。“傲慢占了上风，”彼得·辛斯试着解释，“是一种‘我们才不需要去美国巡演’的赌气。我知道盖瑞·史迪克斯很努力地请他们再考虑下。”

与“白热空间”时期巡演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次的演奏曲目选了许多皇后乐队的传统重摇滚歌曲。以《机器（回归人性）》开场，然后是《撕碎它》，很快接《管好你妈妈》。一些现在已经显得久远的皇后乐队老歌，如《骗子》《大鼠王》《冰冷坚硬的疯狂》的片段联唱组合将会在演出一半的时候表演。在都柏林的演出中，莫库里忘了《一锤定音》的歌词，不过更多的时候，让他心烦的不是忘词，而是他声音的问题。医生怕他的声带结节毛病又复发了。莫库里却担心如果做手术切除，会对他的声音产生不良影响。

更糟心的事情是，弗雷迪的一些私生活被《太阳报》披露出来，爆料的是他从前的手下。“是弗雷迪以前的司机，被开除的，”彼得·辛斯叹息道，“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弗雷迪有时候超级强硬、无情、恶劣，但他又会放纵某些人，让人不禁想问，‘混蛋，弗雷迪，为啥啊？’”爆料故事写了好几版，公布的时间正好与皇后乐队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做四晚演出、莫库里的三十八岁生日之际重合。爆料称弗雷迪每周在伏特加和可卡因上花费1000英镑。就算主唱心里真在意此事，表面上也看不出来。返场的时候，莫库里会戴着假发和假胸出现，和在《我要挣脱一切》视频里一样。他环顾四周，估摸着乐队里哪个人最不想被这对乳房蹭到，悄悄地向约翰·迪肯靠过去。假发加假胸成了此次巡演的保留节目。台下接受采访时，弗雷迪谨慎地回避着那些关于他是不是同性恋的问题。“如果是新人，当个同性恋还不错，”他对《流行音乐周刊》说，“但我要是这么说，人们多半会打着呵欠说：‘天呢，你看弗雷迪·莫库里，说自己是同性恋，因为现在时兴同性恋吧。’”

两周后在汉诺威，莫库里前段时间在慕尼黑酒吧里弄伤的那条腿出了状况。《一锤定音》表演到一半，他在走伸展台楼梯的时候腿伤复发。“我做了错误的动作，跌倒在聚光灯下，他们还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了。”莫库里被抬到钢琴椅子上，又唱了两首歌，表演提前结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老啦，摇滚不动了”。

9月，继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艰难地开发自己的个人项目之后，莫库里也发布了处女个人单曲《爱伤人》，由莫库里和莫德共同作曲，作为《大都会》重制版的原声。有趣的是，后来发现其实梅、泰勒，甚至

迪肯都参与了歌曲的演奏，让人不禁推测它可能原本就是从皇后乐队里出来的。但歌曲中那强劲的舞曲节奏、虽男性化但仍然骚气的背景和声，让成品听起来更像是受束缚、肆意发挥的莫库里的创作，而不是典型的皇后乐队风格。^[15]《爱伤人》打破了皇后乐队成员做个人项目遇到的颓势，榜单上到第十名。皇后乐队的新单曲《一锤定音》同时期发布，排在第十三位。巡演的舞台上，莫库里开始告诉观众，皇后乐队并没有要解散的意思。一个月后，乐队造访南非，回来之后有人觉得他们还不如散了好。

10月5日，皇后乐队在太阳城举办首场演出。太阳城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豪华酒店及赌场度假区，他们将在这里连续演出数晚。太阳城区域被视为“只准白人进入的拉斯维加斯”，是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地。早在1957年，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出现之前，英国音乐家工会就告诫会员不要在南非进行演出。皇后乐队另有想法。“我们考虑过社会道德问题，但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布莱恩·梅在“作品”巡演启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是不谈政治的乐队，不带任何政治意图，我们不过是为所有来听音乐的人表演。”皇后乐队在太阳城演出的附带条件之一，是要求面向多样化的观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后来坚持说：“去听他们演唱会的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演出的场地是太阳城中六千两百座的超级碗剧场^[16]。座位票太抢手，很快又出售一千张站票。但是，好景不长，莫库里的声音又出问题了。第三场演出中，挣扎着唱完《压力之下》后，他的声音完全哑了，当晚提前结束。医生专程飞来诊治，给莫库里注射了类固醇药物，并嘱咐他进行休息，接下来的两场演出也取消了。莫库里和维尼·基什伯格窝在酒店套房养病，等着重回演出的这段空档，布莱恩·梅被邀请去索韦托出席“黑色非洲”颁奖典礼。同时间，他们决定通过百代南非公司发行一张皇后乐队现场专辑，将其版权收入都捐赠给当地一所聋哑儿童学校。然而，这些做法没有改变反种族隔离群体对乐队的看法，他们抗议南非政府利用皇后乐队的到访作为政治资本，认为他们去演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对这种政权的支持。在英国本土，皇后乐队遭到媒体的集体炮轰，他们的宿敌《新音乐速递》誓要和这支去了南非、在《收音机嘎嘎》视频里拍摄了“邪恶的法西斯场景”的乐队划清界限。

从某个层面上说，皇后乐队决意去南非演出又是一个他们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到今天，依然有说法是他们到访南非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不准去，而且他们坚持想要不分地域地为所有人表演音

乐。布莱恩·梅在音乐家工会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乐队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但仍然维护乐队的这种做法。“至少他们大体上的回应是：‘感谢你前来，现在我们理解你们南非之行的目的了。’”他说，“但他们还是照罚不误，因为我们违反了规定。”^[17]

一年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乐队里的“小史蒂夫”，史蒂夫·范·赞特成立了“音乐家反种族隔离联盟”。他们出了一首单曲《[决不会去演出的]太阳城》（[Ain't Gonna Play In No] Sun City），批评那些去过的明星，例如洛·史都华，1985年1月，他步皇后乐队的后尘也去了太阳城。“我相信因为此事，很多人仍然认为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梅对《Q》杂志坦陈，“不好意思，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们的良心都还清白。”

这一年的结尾，收录198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演唱会的《我们会震撼你》演唱会实录发行，并发布一首贺岁单曲《感谢上帝，圣诞终于来了》（Thank God It's Christmas），似乎是对过去这不顺的一年的总结。饶是如此，好像除了那些忠实的皇后乐队粉丝，想买这支单曲的人寥寥无几。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首歌已经跌出前二十名。这个时候，1984年的圣诞大热单曲是“乐队援助”（Band Aid）项目中群星演唱的《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有感于电视中铺天盖地的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新闻报道，布姆镇鼠乐队的鲍勃·格尔多夫和超级噪音乐队^[18]的米吉·厄尔召集了男孩乔治、U2乐队的波诺、菲尔·柯林斯和斯汀等歌手，组成慈善巨星团，录制了这首歌曲，为救助受灾家庭进行筹款。

“我们是很愿意参加‘乐队援助’唱片录制的，”莫库里说，“但我人在德国的时候才听说这件事。”有人难免会犯嘀咕，是不是因为太阳城事件，皇后乐队被故意排除在外。莫库里呢，他明知道“乐队援助”里面有三十多岁的菲尔·柯林斯，也有来自同时代的现状乐队的一半成员，但是他跳出来讲了一句近来经常讲的玩笑话。“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算上我，”他假惺惺地说，“毕竟我年龄有点大了嘛。”

虽然皇后乐队经历过一次“找罪受”的南美之行，但南美洲依然对他们散发着吸引力，反之亦然。1982年5月，《压力之下》在阿根廷榜单排到第一，而当时阿根廷和英国正在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开战。阿根廷领导人加尔铁里将军立即禁播了皇后乐队的音乐。一年后，皇后

乐队办公室再度找当地主办方商量，想要在南美大陆做巡演，包括去觊觎已久的里约马拉卡纳体育场。不过，这个希望又一次落空。“一切都准备好了，”罗杰·泰勒解释说，“但是推广方恰好就在临开始前破产了。”

弄来弄去，到1985年1月的时候，钱的事情终于办妥，皇后乐队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历时十天的“摇滚里约”音乐节（Rock in Rio）出现，做开场和闭幕两晚的压轴表演。音乐节在巴西巴哈德提虎卡举办，场地可容纳二十五万人，由巴西广告业巨头专门为音乐节修建，耗资约1100万美元。其他大牌明星有AC/DC乐队，乔治·班森等，还有皇后乐队的老相识“是”乐队和洛·史都华。即便是写在音乐节海报演出阵容稍下面一些的，也是大有来头的八十年代摇滚明星：铁娘子乐队^[19]、白蛇乐队^[20]、蝎子乐队^[21]、奥兹·奥斯本.....据估计，十天的音乐节共吸引了大约300万人参加，让“摇滚里约”立刻打破了1973年沃特金斯峡谷夏日即兴音乐节（Watkins Glen Summer Jam）创下的纪录，超过当时去看感恩至死乐队^[22]和“乐队”组合^[23]演出的六十万人，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不仅如此，巴西环球电视台（Globo TV）也进行了全程直播，皇后乐队的完整现场都有被记录。“摇滚里约”音乐节正符合皇后乐队一向追求的“更大、更好、更多”的宗旨。两者是天作之合。

莫库里下榻在科帕卡巴纳海滩酒店的总统套房，随行团里既有芭芭拉·瓦伦汀，又有维尼·基什伯格，据某位巡演随行人员说，他一刻不停地享受着自己的“弗雷迪时间”。首晚演出前，皇后乐队直到最后时刻才上台。据传，是因为布莱恩·梅得了流感，《太阳报》称此事导致皇后乐队“在临开场最后时刻”才坐直升机抵达现场。意外事件增加了戏剧性，不过皇后乐队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些了。《唱片镜报》的罗宾·史密斯报道说，皇后乐队“如歌剧般雄伟壮观的音乐和台风，点燃了热辣的拉丁美洲人的激情”。他们此次在“作品”巡演歌单的基础上重新安排，全场适当地编排了大量热门金曲。为了让三十几万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形象，全员着白色服装。泰勒的装备是一件凯瑟琳·哈姆内特^[24]设计的T恤，上面印着呼吁全球核裁军的口号；莫库里穿的是包裆紧身裤，一道红色的闪电图案自大腿延伸而下；梅穿着白色弹力裤，配一条鲜艳的红色腰带。表演歌单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压力之下》《活出精彩》《收音机嘎嘎》.....

然后是《我想挣脱一切》。他们感觉在英国和欧洲的观众面前行得通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应该也能奏效，于是莫库里又带着假发，穿着

他的粉红色无袖上衣出场。《人物》（*People*）杂志在文章里描述道，他挺着那对“高耸的假胸”。布莱恩·梅最近表示：“有一个从不言悔的主唱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弗雷迪不敢做的事。”《人物》的报道说：“三十五万人的群体开始往台上扔石头、啤酒罐和其他各种东西，几乎引发骚乱……”后来接受采访时，音乐节的翻译玛利亚·卡埃塔罗解释说：“这首歌在南美洲有着崇高的含义，因为我们觉得它表达了对独裁统治的抗争。”皇后乐队实在不知，这个“迪小肯的金蛋”竟然会在南美洲衍生出深层次的意思来。演唱会的视频片段显示，其实没有“几乎引发骚乱”，不过人群中出现的敌意还是让莫库里意识到，他可能对观众的情绪有些误解。“他有点惊到，”彼得·辛斯回忆说，“他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脑子里可能快速闪回了一些墨西哥的惊悚片段。”

主唱伴着《我们会震撼你》再次上台时，他的双臂打开，拉着国旗作披风，展示出红白蓝三色的英国米字旗。然后他转身面向罗杰·泰勒，将披风的背面秀给观众，那是黄、绿、蓝相间的巴西国旗。之前的误会得到谅解。表演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莫库里果然没把它当回事。“（里约热内卢的）观众很棒啊，我喜欢他们对情绪的表达，”他说，“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兴奋过度，我就会抖一抖威风，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掌控者。我也不懂，我打扮成一个女人他们那么兴奋干吗？这里本来就有很多异装者啊。”

第二天，百代公司在附近的科帕卡巴纳皇宫酒店为皇后乐队举办派对，在场谈笑风生的还有洛·史都华、斯潘多芭蕾乐队的加里·肯普和杜兰杜兰乐队成员等。据说，莫库里和史都华似乎玩起了摇滚明星耍大牌的游戏，有意装着看不见对方。然而，也有人说莫库里根本没出席，或者说仅仅简短出现了一下，就像他的朋友大卫·埃文斯所说，他又有“权力被架空”的感觉了：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派对，而是为他举办的派对，那些往日的的不安全感统统会浮上来。狂欢当中，有几位光着上身的桑巴舞女因为喝得太醉站不稳被送回家，因此表演的时候少了几对甩动的胸。极少在公众场合做傻事的布莱恩·梅，竟然全身穿着衣服跳进了酒店的游泳池。热闹的酒店外面，迷恋他们的歌迷聚集在海滩上，用一千五百支蜡烛在沙滩上拼出乐队的名字。梅下楼去见他们，显然，梅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待在派对舞池和花花人群的时间要长。

在里约接受电台采访时，可能因为身边有美女环伺，莫库里称赞着围绕着他的“美丽的棕色身体”，并说了一句后来常常被引用的话：“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儿，每天早上起来挠挠头，想想看今天要干谁。”皇后

乐队在里约热内卢逗留期间，尽管随时需要保安人员陪同，而且几乎只要公开露面就会引起歇斯底里的热潮，使得他们即使离开酒店都很困难，莫库里和他的随行人员仍造访过当地的同性恋俱乐部。有人说，其实把人带给弗雷迪·莫库里还容易些。后来，里约热内卢的一位“应召”男，即这个城市对年轻男妓的称呼，爆料说，他和其他男人被保罗·普伦特请到了莫库里的酒店套房里。进去后，他们都发了可卡因，然后按他所说，每人都和莫库里发生了性关系，过程中主唱是受的一方。这次冷漠的相遇，让他们见到的似乎是一个多金的摇滚明星，厌倦了身边拥有和发生的一切事物，只是机械地做着运动，普伦特则扮演那个在一旁煽风点火的人。“保罗对性、药、酒都有着惊人的需求，”彼得·辛斯告诫说，“而且他一喝醉就喜欢吹牛：‘哎，我今天上了七个男人！’有的时候他真的很恶心，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马克·莫尔登曾在多伦多与莫库里的随行团一起去同性恋酒吧。“那次有弗雷迪、我、戴恩·克拉克和保罗·普伦特。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天我们去酒吧不是为了弗雷迪或者戴恩，当然更不是为了我。我们会在那儿，都是因为保罗。保罗指挥豪华轿车司机往哪开。保罗在酒吧里勾搭男人，而不是弗雷迪。他统领局面，控制着事情发展。弗雷迪在做音乐的时候非常强势，但在生活中他却没有那么强。”

皇后乐队返回巴哈德提虎卡，进行闭幕当晚演出时，里约已经下过几天暴雨，现场十分泥泞。在环球电视台的同步拍摄下，皇后乐队的演出流程和歌单与一周前没有变化。但是当唱到《我要挣脱一切》的时候，莫库里已经将假发和假胸留在酒店房间里了。他只是脱掉了上衣，一条毛巾搭在肩上。两个晚上的演出有超过六十万人到场观看，再次巩固了皇后乐队无人不知的地位。某次采访时，弗雷迪直率地承认：“南美洲的市场巨大。如果能突破这个市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回到伦敦，拿着丰厚回报的约翰·迪肯花钱买了一辆新的保时捷。他去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看菲尔·柯林斯的表演，开车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下，要求做酒驾呼吸检测。结果测出是醉酒驾驶，被罚款150英镑，吊销驾照十二个月。几天后，布莱恩·梅上首都电台DJ罗杰·斯科特的节目，要他选几首最喜欢的歌播放。梅选了一首史提夫·汪达的《不要醉酒驾驶》（Don't Drive Drunk），语气搞怪地说：“献给约翰，可能有人听说了，最近他在车子上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皇后乐队飞往新西兰，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举办九场巡演，这一段的状况就没那么轻松好笑了。第一晚演出位于新西兰奥

克兰的斯玛特山体育场^[25]，演出之前，新西兰电视台主持人、音乐记者，已故的迪伦·泰特邀请四个人做了一次电视采访。几乎都是莫库里在说话，梅低头研究指甲，泰勒全程戴着墨镜。除了梅之外人手一支烟。当泰特问到钱的问题时，迪肯脸上露出他常有的那种竭力抑制住不笑的表情。“我们几个都特别有钱，”莫库里说，“这个问题非常微妙，你得单独问我们每个人……财富催生了许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麻烦。我们挣了这些钱，也跟着来了许多问题。”

如果莫库里讲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含糊不清，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喝酒。演出当日下午，弗雷迪和斯潘多芭蕾乐队的主唱托尼·哈德利在一起玩。这支新浪漫主义流行乐队去年发行了畅销白金唱片《游行》（*Parade*），正处在巅峰时期，他们恰好刚结束澳大利亚的巡回演出，在没有安排的假期中无所事事。哈德利和莫库里闲着无聊，开了一瓶伏特加，喝精光，又开了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到了快演出的时候，弗雷迪已经躺平，靠着乔·法内利的帮助才穿上舞台服装。当莫库里登上可容纳三万人的斯玛特山体育场的舞台时，他开始不受控制地满嘴跑火车：“我的嗓子稀烂。”他跟观众说，而他前面还信誓旦旦地宣布要给新西兰人民“巨他妈爽的一晚”。之后，介绍布莱恩·梅的那首适合大型摇滚场合的《一锤定音》时，他说“接下来要让你这些重金属粉听到射出来”！稍后，同样喝醉了的哈德利上台加入乐队，表演《监狱摇滚》，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哈德利记不起歌词，便开始唱小理查德的《图蒂·弗鲁蒂》（*Tutti Frutti*）。许多皇后乐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看到莫库里在演出之前喝醉。

到了悉尼，乐队在娱乐中心^[26]的四晚演出全部售罄，寻欢作乐也没有断过。他们在一艘租来的游艇上纵酒狂欢，一名巡演工作人员和人打赌，从甲板上跳了下去，最后不得不出动海岸警卫队才救起来。这起事件造成悉尼港进出交通延误，皇后乐队被罚款5000美元。“‘作品’巡演途中发生了很多管理松懈的事情，”彼得·辛斯承认说，“因为钱大把地流进来，人们各种滥用，一切都失去控制。”

悉尼的演出有艾尔顿·约翰作为嘉宾，在其中一晚与莫库里和泰勒同台演出。莫库里跟朋友们说过，皇后乐队早期有困难的时候，艾尔顿曾经特别支援过他们，泰勒和迪肯后来也友情客串了艾尔顿1985年的《火上冰》（*Ice On Fire*）、次年的《皮夹克》（*Leather Jackets*）专辑的乐器演奏。后来，艾尔顿说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做的那些专辑是最糟糕的，主要归咎于沉迷可卡因。他在接受《原片》杂志采访时，回忆起过

去的疯狂：“弗雷迪·莫库里玩得比我还大，这就厉害了。我们俩通宵作乐，上午11点还坐在那，人依然嗨着。皇后乐队应该要赶飞机去下一处了，弗雷迪还在说：‘哦，他妈的，再吸一条吗，亲爱的？’他这个胃口真是难以抑制。”

不过，莫库里确实有值得庆祝的事情。4月29日，皇后乐队在悉尼演出的最后一晚，哥伦比亚公司发布了弗雷迪的首张个人专辑《坏人先生》。这是莫库里花了两年时间，与联合制作人马克倾力打造的作品。皇后乐队的巡演键盘手弗雷德·曼德尔在一些曲子里负责弹钢琴，玛丽·奥斯汀的新男友、贝斯手乔·博特等多位临时乐手负责其余的乐器演奏。莫库里还打破了皇后乐队的一条常规，在专辑同名歌曲《坏人先生》中使用了交响乐团伴奏。在专辑封底的备注文字中，弗雷迪致谢“布莱恩、约翰和罗杰，因为他们没干涉我”，也谢了另外三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玛丽·奥斯汀，芭芭拉·瓦伦汀（“奶子大，胡作非为”）和维尼（“提供食宿”）。《坏人先生》整体风格上更偏向于《白热空间》，而不是《作品》。封面上的弗雷迪穿着运动背心，戴着太阳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里面的音乐也有同样的迷思。《坏人先生》光鲜亮丽，完全是时下流行的风格。它那强劲的迪斯科和放克节奏，离《绝对心脏暴击》《皇后II》时期那种身披羽毛、臂上戴着银蛇环的华丽金属仿佛隔了一辈子。“它非常有节奏感，”莫库里对《唱片镜报》说，“是一张很自然的专辑。”

其实，其中的一些歌曲，比如《人造天堂》（Man Made Paradise）和《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早在《游戏》专辑的时候就已经有雏形了。雇来的吉他手保罗·文森特在《人造天堂》中弹奏的吉他独奏段，与皇后乐队十分相似，让人不免好奇，为何莫库里不干脆就让布莱恩·梅来演奏。总体来说，《坏人先生》的情绪很跳脱，从开篇自夸自嘲的歌曲《坏人先生》，跳跃到结尾真情外露的舒缓情歌《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Love M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这首歌是专门为芭芭拉·瓦伦汀写的。莫库里不是不清楚他在作曲上的两极性。“我写的大多数歌曲都是情歌，讲述的是悲伤、折磨和痛苦，”他说，“但同时它们又轻佻放浪，不能尽信。基本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4月，抢先发布的单曲《我生来就是为了爱你》（I Was Born To Love You）在英国取得不错的第十一名。《坏人先生》以第六名的成绩登上英国排行榜，并在两周的时间里保持在前十以内。到了美国却不行，排到第一百五十九位。“《坏人先生》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莫

库里后来解释说，“我想在这上面尝试所有在乐队里做不到的事情。”由于既不打算为这张专辑做巡回演出，也很少接受新闻采访，不难料到，它很难复制皇后乐队专辑的那种成功。弗雷迪的“毒友”艾尔顿·约翰会兢兢业业地记录自己每首单曲和每张专辑在榜单的位置，然后仔细研究数据，但莫库里对业务成绩好像没那么较真。一位百代内部人士解说道：“如果一张唱片没火，就再出一张。没有哪一首歌曲独特到会让他说：‘就这样了……我再也不可能做得比这个更好了。’”莫库里也知道他在什么状况下发挥最佳。“我不会和乐队分家的，”他坚定地说，又补了一句，“没有其他人，我什么也不是。”

“作品”巡演结束后，迪肯跟泰勒去了西班牙，到伊比萨巴利阿里群岛上的别墅休息，鼓手之前在那里买了房产，供养他的新爱好赛汽艇；梅和家人留在澳大利亚度假；而莫库里回慕尼黑，回到他纠缠不清的感情关系中。除了周旋于维尼·基什伯格和芭芭拉·瓦伦汀的两头牵拽，弗雷迪又有了新的缘分。两年后，他在伦敦南肯辛顿的同性恋酒吧可可班纳遇见一位名叫吉姆·哈顿的爱尔兰理发师。1985年3月，两人又在天堂俱乐部相遇。哈顿根本不知道莫库里的身份，他回忆说，初见时莫库里的开场白是：“你鸡巴有多大？”吉姆顶回去，叫弗雷迪“收起你那假美国口音”。这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发展出一段出乎预料的持久关系，直至莫库里离世。

尽管皇后乐队在美国发展受挫，但到“作品”巡回演唱会结束时，他们几乎已经成功到很难再进一步了。“摇滚里约”感觉像是长久冲刺后的最终胜利。就如约翰·迪肯所言：“我们起步的时候，对未来有着宏大的构想。我们想做许多事，去许多地方。我们想让专辑在世界的这里、那里、每个地方都获得成功。然而，等我们真做到了，在那么多的国家都实现了目标，动力就减少了。”

迪肯此言既出，此时鲍勃·格尔多夫打给皇后乐队商业经理吉姆·比奇的一通电话，实在是再及时不过。它为皇后乐队带来了新的挑战。“乐队援助”慈善唱片大获成功之后，鲍勃·格尔多夫和米吉·厄尔准备再组织一场全明星慈善演唱会，以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非洲的饥荒救济。和做“乐队援助”一样，格尔多夫需要招揽尽可能多的知名人士加入这场演出，他极尽所能地恳求、说服、哄骗和打感情牌，拉来了诸多平时骄奢惯了的摇滚明星。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肯尼迪体育场将同步进行两场名为“拯救生命”的演出，时间也已经确认，定在7月13日，同时悉尼、科隆、莫斯科和海牙也将举办类似的慈善演出。据说，格尔多

夫最先找的是布姆镇鼠乐队的兼职队友、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他请艾德尼帮忙试探皇后乐队的意向，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参加温布利的表演。“在新西兰的时候，我找到一个机会问他们，”他说，“他们回答说：‘他为何不直接来问我们呢？’我只好解释说，因为他担心会被拒绝。”

艾德尼没说之前就猜到皇后乐队会拒绝，他建议鲍勃·格尔多夫直接打电话给吉姆·比齐。1990年，格尔多夫回忆起他们之间的谈话，说：“我一直追着吉姆，甚至他在某个小海滩的度假村休假时我还给他打电话，我说，‘拜托，真的要命，他们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吉姆说：‘哎呀，你懂的，弗雷迪很敏感的。’然后我就说，‘你跟那个死基佬讲，这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事情。’”后来比齐同意再劝说皇后乐队。一开始他们是拒绝的。约翰·迪肯后来回忆起，在日本某场演唱会后的晚宴上，他们改变了主意。布莱恩·梅则回忆说格尔多夫曾在英国唱片协会颁奖典礼的晚宴上直接来找过乐队。“我以为他说的这件事是很难凑成的，”梅说，“但我跟他说，我们有兴趣。然后他打电话来，说需要我给一个承诺。”其实在完成“作品”巡演后，皇后乐队已经计划要休长假了。“我觉得我们五年内都不会再演出了——也许再也不演了。”泰勒告诉《魔力》。“我想那次巡演结束的时候，乐队是有一点要解散的可能性，”彼得·辛斯说，他还记得，“确实是好说歹说才让弗雷迪愿意参加‘拯救生命’。”

同时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急于要在莫库里的一次性投资上收到回报，他们又推出了一张单曲唱片。这首叫作《来自天堂》（Made in Heaven）的抒情歌曲气魄宏大，视频导演大卫·马莱特为它拍摄了一部同样张扬的宣传片。弗雷迪挥舞着薄到透明的猩红色披风，站在18米高的地球顶端俯视众生，他的脚下匍匐着众多扭动翻滚着肢体的半裸舞者。整个场景看起来既魅惑又超现实，有着希罗尼穆斯·波希^[27]式的画风，但单曲在英国销量一般。

弗雷迪少见地接受了一次宣传采访，同意参加英国广播公司1台由DJ西蒙·贝茨主持的节目。有两个条件：一是采访必须在莫库里的主场——皇后乐队的办公室进行，二是不允许提关于莫库里父母的问题。虽然主唱的性取向在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他始终没有对父母直说过。“保萨拉家是非常传统的帕西家庭，”莫库里的前私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说，“弗雷迪本能地知道他的家人能够接受多少程度的现代观念。他在照顾家人上非常小心，不希望他们勉强和妥协。而且他觉得他

们知道得越少，就越能避免面向公众去讲述。”不过布莱恩·梅记得，莫库里会在演出前宣布，“嘿，母亲今晚来听演唱会，我要多讲几句脏话。”莫库里的父母去“花园小舍”探望儿子时，他的男朋友吉姆·哈顿会被简单介绍为家里的园丁。

原本敲定的采访日期被莫库里取消，他说身体不适。后来采访终于约成，过程中莫库里伸出舌头展示自己生病的迹象，DJ有些惊讶。“他这舌苔像毛呢外套一样粗糙，”贝茨告诉听众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健康的样子了吧，很明显他的病还没有好全。”莫库里承认“我是有点夸张了”，不过他又告诉贝茨，既要自己做自己的个人专辑，又要对皇后乐队负责，他有些体力耗尽。

几杯伏特加兑汤力水下肚之后，莫库里精神活跃了不少，对某些问题的回答也令人惊讶地坦率起来。他同意“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舞台形象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不过人们被蒙蔽了双眼，以为他台上台下都是这个样子。他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是“难搞”，认为想要在音乐行业取得成功，就不可能太友善。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和皇后乐队早期比起来，现在的观众已经越来越难被惊艳到。“现在要离经叛道需要付出更多。”他说，把人们对男孩乔治的态度作为例子，他是风靡全国的流行乐队文化俱乐部乐队的主唱，喜爱变装。被问及皇后乐队之前的生活时，莫库里最远只谈到伊林学院。“很久以前的事了……布尔战争^[28]那时候吧。”他开玩笑说，完全没有提到印度或是桑给巴尔。采访结束前，他跟贝茨说，“拯救生命”是皇后乐队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他们不用依靠夺人耳目的舞台装备也照样能演。难得一次，莫库里露出了一丝他强大盔甲下的柔软。贝茨做完采访后的印象是，莫库里“真的很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

鉴于大卫·鲍伊、艾尔顿·约翰和谁人乐队等老友加老对手都已经确认参与“拯救生命”，皇后乐队的好胜心和较真的专业精神被激起来了。7月10日，他们预订了伦敦北部的肖恩剧院^[29]，用三天时间进行精心排练。休息的间隙，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请他们四位做了一个问答式电视采访。四人同时出现在画面上，让人想起当年早些时候在新西兰电视台的采访。弗雷迪依旧不安地吸着烟，几个人肢体语言也有点僵硬。泰勒坐着动来动去，不时揉揉鼻子；约翰·迪肯面露神秘的微笑，但一句话都没说。这一次梅和莫库里共同担任发言人的角色。

当问到皇后乐队是因为支持赈灾救济，还是因为“拯救生命”不容错过而答应出演时，弗雷迪回答说，“两者都有一点儿吧。”莫库里坚

称，“拯救生命”是件好事，皇后乐队也很愿意参加录制“乐队援助”单曲。不过他也直率地说，这场演唱会“邀请了世界各地最大最著名的乐队，我们为何不去？”单纯从利己的层面看，他们应该也希望通过参与这个活动，修复“太阳城事件”之后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乐队的关系日渐疏远，这件事也许真的像罗杰·泰勒所说，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当被问及这么多乐队参与表演，是否会暗自互相较劲时，四人都笑出声来。“哦，来参加的都会尽力想超越其他人的吧，我觉得。”莫库里说。你们会演哪些歌曲？记者问道。“我们还在争论呢。”主唱咧嘴一笑。泰勒接口说，“我们必须找那种世人皆知的，远到.....土耳其都熟悉的那种。”第一步，乐队列出一份歌曲清单，思考怎么把这些歌曲串联起来，并缩短某些曲目，以便能够再多放一些歌。第二步，确保全部唱完的时间不超过限定的二十分钟。

“于是我出去买了几个电子钟，”彼得·辛斯介绍，“把它们插上电源，安装在排练台前面，这样就可以随时看时间有没有到。皇后乐队做事情就是这么一丝不苟。大家的态度是，OK，我们要怎样做到最好？舞台上没有干冰烟雾，没有灯光装置，而且上台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晚上。那我们就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热门金曲。”

四天后，7月13日中午时分，身着浅色西服的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加上鼓技师“水晶”泰勒，在温布利球场的VIP区域就座，他们身边坐着大卫·鲍伊、鲍勃·格尔多夫、乔治·迈克尔和艾尔顿·约翰等人。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理查德·斯金纳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伦敦时间中午12点，费城时间早上7点，‘拯救生命’全球慈善演出现在正式开始。”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入场，舞台上的皇家卫队军乐团奏出王室出场曲，伴着乐声，两人在皇后乐队的前一排落座。几秒之后，苏格兰风笛声消失，电吉他声响起，现状乐队以他们的金曲《摇滚全世界》（Rockin' All Over the World）的吉他连复热闹开场。舞台之下，七万人潮开始涌动。

大约二十分钟表演后，前果酱乐队的主唱保罗·韦勒带着他的新乐队风格议会乐队^[30]登场，演奏乐队热门歌曲《你是最好的》（You're the Best Thing），以更小资的巴黎咖啡馆流行风格代替了现状乐队的阳刚硬朗摇滚。1点钟时，鲍勃·格尔多夫离开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席，这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敦促电视观众认捐，现在轮到他上场带领自己的布姆镇鼠乐队表演。他们演了两首热门单曲和一首新的非热门单曲。这件事开了个头。几分钟后，亚当·安特上台疾呼“全世界都在注目，让我们慷慨

相助”，然后他有点破坏气氛地表演了自己的新单曲《摇滚万岁》（Vive Le Rock）。

无论参与表演者在音乐上的私心是否实现，到1点的时候，演出已经筹到4万英镑。除了在现场全情投入的观众，每户人家、商店和酒吧里的电视似乎都在播放这场演唱会。演出持续了整个下午，斯潘多芭蕾乐队上台了，布鲁斯大师B. B. 金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表演，因主演八十年代喜剧《看守者》（*Minder*）出名的伦敦喜剧演员丹尼斯·沃特曼在温布利的后台游说，并鼓励电视机前的观众“捐出你的一份”。此时的舞台，斯汀和菲尔·柯林斯合演了经典歌曲（柯林斯随后飞到费城，在美国的“拯救生命”现场表演了自己的歌曲），布莱恩·费瑞唱了几首沉闷的普通金曲，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大卫·吉尔莫为他助阵弹主音吉他。

在后台，布莱恩·梅承认，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在“拯救生命”时这样紧张。假如当天真的有可以抢皇后乐队风头的，那只能是U2乐队的表演了。杰克·尼科尔森在费城报幕说“有请来自伦敦、心在都柏林的U2乐队”，这支源于爱尔兰的摇滚乐队从金曲《血色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开始表演。这一天，U2乐队被视为可以与老牌明星，如恐怖海峡乐队、鲍伊、谁人乐队——以及皇后乐队一较高下的新生力量。成军于八十年代的他们是一个拥有自己特色、值得尊敬且认真的团体，主唱波诺还同时具备老前辈们的那种镇住全场的气势。有趣的是，皇后乐队几年前曾拒绝U2乐队作为暖场乐队，据彼得·弗里斯通后来所说，莫库里受不了乐队的风格，尤其是波诺的说教。

不管怎样，《血色星期天》作为开场是不错的，可当他们开始表演第二首歌《坏》（*Bad*）后不久，波诺扒到舞台边缘的围挡上，叫一个在观众席里的姑娘上台来加入。不知道是保安人员无法还是不愿配合，这个举动遭到阻止，波诺索性越过舞台和人群之间隔着的围栏地带，进入观众当中，拉走了另一个年轻女孩。他用手臂环着她，带着她缓缓起舞，每一个动作都被记者手中闪光的照相机和摄影师的镜头捕捉下来。全国都目睹了他的表演。但是，因为这段即兴发挥，他们剩余的歌单无法完成。波诺完事后回到台上，已经没有时间再唱乐队去年夏天取得第五名成绩的流行金曲《骄傲（以爱之名）》（*Pride [In The Name of Love]*）了。U2乐队只好下台，波诺认为自己的行为给乐队抹了黑。事实上，他的这段围栏华尔兹不失为一个小小的放松，毕竟观众已经被紧锣密鼓、中规中矩的表演轰炸六个小时了。

此时，无论是在费城的沙滩男孩乐队，还是在伦敦温布利的恐怖海峡乐队，都不能期望再出现如此随性的表演。回到电视导播镜头前，疲惫不堪的格尔多夫已经开始对着摄像机用恳求的语气说：“援助的金额还不够.....立即拨打电话捐款！我们要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电话捐款凑足100万英镑。赶紧拿起电话！”

皇后乐队登台前一个小时，弗雷迪·莫库里坐着豪车抵达后台，他的喉咙依然有感染，在西蒙·贝茨采访中提到的病痛并没有痊愈。“医生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不能表演，”英国广播公司“拯救生命”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身体完全不行，但他就是坚持要上。”喜剧明星梅尔·史密斯和格里夫·瑞思·琼斯从台上下来，他们穿成警察的样子，在舞台侧翼等着上场为“女王/皇后乐队”报幕。人群看不见的地方，布莱恩·梅也在向外偷偷张望。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清楚地看到台下观众了，因为皇后乐队常年演出时间都不是在白天。然而皇后乐队决定不等最后压轴上台的好处此刻却显现出来了。“到六点的时候，有的观众在台下已经待了七个小时，”彼得·辛斯回忆说，“他们需要刺激，他们的兴致正在衰退。”

皇后乐队一直在旁观，他们就担心一件事：声音不够大。“我们没办法做试音，”罗杰·泰勒说，“但是我们派出我们优秀的音响工程师去检查声效系统。”冲在前面的是皇后乐队的音响师崔普·哈拉夫，他偷偷地开大了音量控制按钮，获得了戏剧性的效果。“我们比‘拯救生命’的其他任何人都要响，”泰勒说，“在体育场做演出，必须要盖过人群。”

傍晚6点40分，皇后乐队走上舞台。温布利体育场楼上办公室里，鲍勃·格尔多夫接起电话，他们收到来自一位阿拉伯商人的100万英镑捐款。通完话，还没回神的格尔多夫突然又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那是他当天第一次能够将乐队的音乐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说：“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是谁把这声音搞出来的？’”接着他听到观众齐声合唱，外面像一台巨型点唱机，金曲一首接一首地喷涌而出，他的第二个反应是一阵震惊：“这他妈到底是谁在唱？”

[1] 英文名为“Record Plant”。

[2] 英文名为“Status Quo”。

[3] 英文名为“Heavy Petting”。

[4] 英文名为“Def Leppard”。

[5] 英文名为“REO Speedwagon”。

[6] 此时杰克逊五兄弟乐队已更名为杰克逊兄弟乐队（The Jacksons）。

[7] 2014年，皇后乐队与迈克尔·杰克逊遗产委员会达成协议，发行了莫库里与杰克逊合唱、皇后乐队伴奏的《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收录在皇后乐队精选集《皇后乐队隽永情歌》（Queen Forever）中。莫库里和杰克逊合作的《震惊状态》和《胜利》至今尚未发行。文中说《胜利》这首歌出现在杰克逊兄弟专辑《胜利》中，是错误的。这张专辑仅用“胜利”作为专辑名，并未发行《胜利》这首歌。

[8] 这首咏叹调为《穿上戏装》（Vesti La Giubba），同时也是皇后乐队借用为专辑名的同名电影的电影插曲。

[9] 好莱坞五六十年代的性感电影明星。

[10] 英文名为“Pinewood Studios”。

[11] 英文名是“Culture Club”。

[12] Benny Hill（1924—1992）是英国的老牌三俗笑星，表演过多个女装造型，曾与创世记乐队合作过。

[13] 如今，梅再看这部MV时，表示其中的场景正是莫库里当时生活状态的反映，也就理解了。

[14] 英文名为“The Boomtown Rats”。

[15] 2014年，由梅和泰勒重新制作的皇后乐队版本的《爱伤人》发行，收录在精选集《皇后乐队隽永情歌》中。

[16] 英文名为“Sun City Superbowl”。

[17] 皇后乐队同意接受罚款，但条件是款项必须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18] 英文名是“Ultravox”。

[19] 英文名为“Iron Maiden”。

[20] 英文名为“Whitesnake”。

[21] 英文名为“Scorpions”。

[22] 英文名为“The Grateful Dead”。

[23] 英文名为“The Band”。

[24] Katharine Hamnett，获得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英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以设计政治宣传口号的服装闻名。

[25] 英文名为“Mount Smart Stadium”。

[26] 英文名为“Entertainment Centre”。

[27] 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来自天堂》的视频场景的确让人有几分想起他的名作《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28] 发生于十九世纪。

[29] 英文名为“Shaw Theatre”。

[30] 英文名为“Style Council”。

第十章 晚安，好梦

当你获得了一切，还有什么好实现的呢？

——弗雷迪·莫库里

更多同样的成功！

——罗杰·泰勒

“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从温布利的舞台冲下来，汗流浹背的弗雷迪·莫库里到化妆车里灌下一大口伏特加。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是，艾尔顿·约翰跟着跑进去，嚷道：“你们这些混蛋！抢了所有风头！”“拯救生命”的公关伯纳德·多尔蒂后来说，“我当然记得，弗雷迪在他的活动房车里接受人们的赞美，人人都径直过来祝贺他——‘亲爱的，你太棒了！’——鲍伊、保罗·麦卡特尼他们，摄影师们拍照时，琳达·麦卡特尼在拍摄影师拍照的场景……”

大家在后台忙着向皇后乐队表达祝贺的时候，温布利和费城的现场正用大屏幕播放着米克·贾格尔、大卫·鲍伊的新单曲《大街上跳舞》的视频。那是一个特别欢脱、感情强烈的视频，冲天的骚气几乎都快赶上莫库里的表演了。几分钟后，鲍伊真人出现在舞台上，吟唱出他的《TVC15》，但这首歌终究无法像《收音机嘎嘎》那样唤起观众的热烈回应。

鲍伊演完之后，伪装者乐队、谁人乐队纷纷上场，接着比利·康诺利上台对着话筒宣布“这场演唱会正在全球95%的电视上播放”，然后介绍艾尔顿·约翰出场。全国人民接着观看。但在随后的岁月中，皇后乐队的那二十分钟似乎让人们淡忘了其他的任何表演，甚至包括晚上布莱恩·梅和弗雷迪·莫库里两人再次上台演唱的那段。

后台，有人看到罗杰·泰勒和演员约翰·赫特^[4]在一起。晚上9点42分，赫特登上温布利的舞台，介绍接下来由莫库里和梅表演木吉他清唱《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吗？》。这首来自《作品》专辑的温情歌谣，展示了皇后乐队在激昂的《我们是冠军》和《我们会震撼你》之外的另

一面，但音效出了些小问题。几分钟后，由保罗·麦卡特尼起头，包括莫库里在内的群星上台大合唱“乐队援助”的《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为伦敦的演出画上句号。

英国广播公司继续直播费城的演唱会直到凌晨4点。莫库里一行人事先躲过了演出后的聚会，和约翰·赫特一起回到肯辛顿的家观看演唱会的视频。“弗雷迪很苛刻地看着那天所有的表演，”约翰·赫特后来在《泰晤士报》采访上说，“他也非常争强好胜。我记得我们在他家看‘拯救生命’的录像带，杜兰杜兰乐队上台时，他说：‘看看他们这个摇摇晃晃走台步的样子！’言辞中并无敬意。”不过，莫库里的确赢得了嘲讽其他竞争对手的权利。即使是经常自我批评的布莱恩·梅也承认说，“‘拯救生命’证明我们不需要舞台背景或是在夜幕的掩映下就能演出。我这辈子都会铭记‘拯救生命’的那一天。”

两周不到的时间里，《作品》专辑又重新进入了英国榜单前四十名。“拯救生命”之后，皇后乐队从一支有着过往辉煌的摇滚乐队，迈向成为更受欢迎的流行团体的未来。他们找到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第二天，新闻报道称“拯救生命”为饥荒救济筹集了超过5000万英镑。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也纷纷报道这场演唱会。《每日邮报》的首页大字写着“摇滚的巅峰时刻”，配图是温布利看台上的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子抬起的手臂下方，是往外看的罗杰·泰勒。

皇后乐队随即停工休整六个星期。莫库里带着包括吉姆·哈顿在内的团队去伊比萨度假。迪肯与艾尔顿·约翰合作了一首歌^[2]。（彼得·辛斯：“艾尔顿说，迪小肯是他合作过的最优秀的贝斯手之一。”）罗杰·泰勒去找大卫·理查兹，为制作人团队充电。作为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粉丝，泰勒新打造了一支名为弗吉尼亚狼^[3]的摇滚乐队，乐队成员包括齐柏林飞艇乐队约翰·博纳姆的儿子杰森。第二年，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但这支乐队最后没有红起来。

9月，莫库里回到慕尼黑，庆祝三十九岁生日。他包下亨德森夫人俱乐部，花钱重新装扮，打造成生日会的主题：“黑白变装舞会”。他邀请了三百多名客人飞到德国来，请他们入住慕尼黑希尔顿酒店，前后总共花了近5万英镑。派对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天亮之后，莫库里带着一群舞者和变装者又回到俱乐部，以这里为场景拍摄自己下一首单曲的视频。“我发现我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也能活。”弗雷迪在西蒙·贝茨的采访上说。

《独自生活》（Living On My Own）是《坏人先生》专辑里的第四首单曲。这是一首包含了弗雷德·曼德尔的灵巧钢琴独奏，描绘弗雷迪起起落落的生活方式的舞曲/流行歌曲。视频由奥地利电影制片人鲁迪·多莱扎尔和汉尼斯·罗斯萨赫导演制作，这两人是忠实的皇后乐队粉丝，自称“鱼雷双人组”。宣传片里呈现出生日派对的种种景象，有一些应该是当晚用隐藏摄像机记录的，并加上了第二天的摆拍。结果，里面的变装者和光屁股实在是太多了，哥伦比亚公司接受不了，这个视频在美国从未发布过。即使在英国，这首单曲也仅仅够到第五十名。

和以前一样，莫库里没时间计较这些失败。9月的时候，梅、泰勒和莫库里已经在慕尼黑音乐园录音室重新集合开始工作，迪肯随后加入。他来的时候，另外三个人已经写出一首新歌。这首歌标志着乐队迈向了非同寻常的民主之路，它将从某种程度上促使皇后乐队最终不再经常就版权分配问题争执。新歌的名字叫作《一个愿景》（One Vision）。泰勒回忆说，歌词的灵感来自马丁·路德·金，表达的是反抗体制的立意（原来的歌词里有一句“同一个该死的宗教”，最后成曲中没有采用）。据说莫库里和梅在歌词上做了编辑和更换。《一个愿景》的最终版表达的是呼吁和平、爱和团结的普世价值观，似乎来自“拯救生命”的启发。歌曲由四人合力完成。它以合成器声音开场，合唱段很适合广播反复播放，又加入了重金属吉他连复段。在《一个愿景》中你可以找到皇后乐队音乐的每个不同的方面，还带着一点点随性的幽默。歌词的最后一句，莫库里把“一个愿景”（one vision）换成了“炸鸡”（fried chicken）。

乐队还打破了另一个常规，同意把录音过程拍摄成一部实景纪录片。“鱼雷双人组”进驻音乐园，跟随乐队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真的有种他们绝对不会走开的感觉。”泰勒抱怨说。“拍纪录片把整个事情搞得很扯，”梅说，“每个人都意识得到摄像机在拍——所以大家都有点对着镜头在表演。”

记录下来的录音室部分场景放到了《一个愿景》的宣传视频里，全部镜头则编辑到了皇后乐队的纪录片《魔力岁月》（*The Magic Years*）中。尽管梅和泰勒对无处不在的摄像机微感不适，但它们让外界难得一瞥乐队工作时的样子。那些笨重的模拟磁带录音机、闷浊的香烟烟雾是1985年前后录音室里的真实影像。继弗雷迪后，约翰·迪肯也从去年起开始抽烟了。（彼得·辛斯：“可能也是压力太大。”）影片有一些故意为之的穿帮元素（有一段，莫库里取笑摄影师的麦克风像“一根又大又

粗的屁”），但除去搞怪的部分，可以直观看到四个乐队成员是如何互动工作的。

镜头里，活力四射的弗雷迪在听完一段鼓之后评头论足，又抱怨和声太多了，“搞得这首歌像他妈安德鲁·韦伯的音乐剧似的”，他还即兴发挥了低俗版歌词：“同一坨屎，同一摊粪，两个乳头，约翰·迪肯！”这部片子里还能看到镜头前很少出现的赖因霍尔德·马克：沉默，坚忍，一直在抽烟……

皇后乐队原先的大休计划也搁置脑后了。他们在音乐园见面后不久，另一份制作原声的邀请就来了。音乐视频导演出身的拉塞尔·穆尔卡希需要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长片《高地人》（*Highlander*）配原声，这是一部由肖恩·康纳利、法国万人迷克里斯托夫·兰伯特主演的奇幻动作片。穆尔卡希曾为艾尔顿·约翰、斯潘多芭蕾乐队和“走路打晃”的杜兰杜兰乐队拍过视频。“我一直都很喜欢皇后乐队，所以主动找了他们，”他说，“我剪了一段二十分钟的片段，用电影中的多个场景拼接而成。他们看过后答应合作。”皇后乐队立刻开始构思歌曲，运用《高地人》中的情节作为音乐的起点。有意思的是，《一个愿景》没有被使用在这部电影里，而是成了悉尼·弗里导演的动作片《铁鹰战士》（*Iron Eagle*）的配乐。

布莱恩·梅看完《高地人》的剪辑片段乘车回家时，哼出一段旋律，他用便携式磁带录音机录了下来。这段旋律最后谱成了歌曲《谁愿永生》（*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高地人》的主角发现自己成了不死之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2003年，梅接受采访时解释道，“他知道自己一旦恋爱，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他当然还是不顾一切地坠入了爱河。他爱的那个女孩最终老去，死在他的怀里。这打开了我情绪洪流的阀门——让我想到第一段婚姻的终结以及其他事。”

那时梅的婚姻出了问题，他正在乐队、“感情困境”和家庭生活中进行着所谓的“生死挣扎”。同样，约翰·迪肯也面临着平衡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的困难。同样受到《高地人》剪辑片段的启发，他写了一首叫作《一年之爱》（*One Year Of Love*）的情歌，其中加入了萨克斯手史蒂夫·格雷戈里的独奏，听起来和他为威猛乐队^[4]去年的金曲《无心低语》（*Careless Whisper*）中的那段独奏没多大区别。并且，这两首歌里都加入了弦乐的演奏；乐队以前不是很愿意让其他乐手加入录音，这次他们又打破了传统。拉塞尔·穆尔卡希拉到皇后乐队后，下一步大手笔是聘请现在已过世的迈克尔·卡门，他是著名编曲和电影配乐作曲家，曾与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合作过电影《迷墙》（*The Wall*）。卡门将担当指挥，带领英国国家爱乐乐团为《谁愿永生》伴奏，增加戏剧效果。

这张皇后乐队的新专辑从1985年9月开始制作。两个月后，作为这段空档的补缺，《一个愿景》单曲发布。它在英国达到第七名，在美国只拿到第六十一名。有评论口出怨言，认为皇后乐队应该把这首歌曲的版税捐给格尔多夫的慈善机构，因为听说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拯救生命”。“我在新闻上读到这条的时候简直太受打击了。”泰勒气呼呼地说。好像嫌他们不够烦似的，媒体还要求乐队发表声明，保证不会再去南非演出。事实上，皇后乐队仍在低调地将《艰难人生》B面单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吗？》获得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英国救助儿童慈善基金会。然而，他们在太阳城的事显然没那么容易被媒体忘记。

跟往常一样，莫库里不理睬这些兴风作浪的舆论，他参加了在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慈善时装秀”（*Fashion Aid*），这场时装秀的目的也是为埃塞俄比亚饥荒救济筹款。演出中，他穿着伊丽莎白和大卫·伊曼纽尔（*Elizabeth and David Emanuel*）品牌的婚礼新郎装，挽着穿婚纱的女演员简·西摩^[4]进行时装走秀。不久后，他为朋友戴夫·克拉克的西区音乐剧《时间》（*Time*）完成了两首单曲《时间》和《我的辩护》（*In My Defence*）。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再试运气，挑了莫库里的个人单曲《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发行，这次它甚至连英国榜单的前五十名都没有进。

莫库里的《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是献给芭芭拉·瓦伦汀的，时间走到1985年年底时，莫库里与这位女演员兼模特之间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前一分钟，我们还在一起形影不离，然后关系突然就断裂了。”瓦伦汀对作家莱斯莉·安·琼斯^[4]说）。莫库里放弃了他和瓦伦汀在慕尼黑共享的公寓，搬回伦敦的花园小舍，回到此处他花了多年时间打造的肯辛顿静养之地。虽然以前吉姆·哈顿常被用作让奥地利情人维尼·基什伯格吃醋的对象，但莫库里和这位爱尔兰理发师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亲密。不久后，莫库里邀请吉姆搬进来同住。

2002年2月瓦伦汀去世，在此之前，她提过离开慕尼黑是莫库里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公开场合，主唱还可以像过去一样无惧无畏，但私下他再也不能忽视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了。1981年，纽约的医生率先在几名同性恋男性身上发现了卡波西氏肉瘤，这是一种感染致命癌症的症状。几乎同时期，纽约和洛杉矶都有医生观察到，男同性恋者群体中出现异常高比例的卡氏肺囊虫肺炎，而且常规治疗无效。由此美国人开

始注意到后来为公众所知的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一种由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疾病。这种病毒在个体间传播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在猜疑重重和错误信息的环境下，小报头条甚至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瘟疫”。

1985年10月3日，美国男同性恋演员洛克·哈德森成为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名人。到1985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已有20303起病例。一年前，莫库里的朋友、美国DJ和广播主持人保罗·加巴奇尼曾在伦敦的天堂俱乐部遇到过他。加巴奇尼在纽约目睹过艾滋病的阴影笼罩俱乐部的情形，他问莫库里是不是要在性行为上有所收敛，弗雷迪回答：“亲爱的，我的态度是和任何人做任何事。”后来加巴奇尼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弗雷迪·莫库里会死的。”

莫库里离开慕尼黑之前，芭芭拉·瓦伦汀就已经注意到他的健康状况逐渐下滑，比如他不断复发不明原因的嗓子问题。艾滋病患者中普遍存在的免疫缺陷症状之一，是念珠菌病或口腔鹅口疮的极端病例，这让人不禁想起DJ西蒙·贝茨曾说主唱的舌头像“毛呢外套”一样粗糙。有人猜测，莫库里是在1985年底首次接受了HIV检测。即使他没去做检测，他身边也肯定有人去做过了。彼得·辛斯还记得某次在后台，一名莫库里的随行人员走进更衣室，很高兴地表示HIV检测结果是阴性。“弗雷迪和保罗·普伦特对此事的反应是完全沉默，”辛斯说，“我当时还有点惊讶。”

随着“拯救生命”的成功，《一个愿景》保持热度，百代在1985年结束时隆重推出《皇后乐队：作品全集》（*Queen: The Complete Works*），这是一套印花盒装合集，售价70英镑，包含迄今为止发行过的每一张皇后乐队唱片，加一张从未发行过的歌曲的特别合辑，还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皇后乐队演出过、征服过的疆土。

1986年1月伊始，皇后乐队继续新专辑的制作，接下来三个月他们会在音乐园和高山录音室来回跑，还有一些时间在伦敦的西萨姆、汤豪斯^[2]和红房子^[8]录音室工作。乐队成员分头和两位制作人合作：莫库里和迪肯在音乐园跟马克一起；泰勒、梅则在高山录音室与大卫·理查兹开展同步的工作。对马克来说，相比他的第一个皇后乐队项目，现在的状态和让《游戏》专辑取得成功的“四剑客”方式正好相反。“现在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录音室，自己做自己的。”他叹了口气。

到这个时候，专辑原本的创作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本来我们所有

的音乐都是为电影创作的，”迪肯解释说，“然后到开始制作专辑时，我们重新编排了很多曲目，使它们变得更长，加入更多歌词，把它们做成成熟的歌曲。”“迈克尔·卡门和乐队之间的合作非常精彩，”穆尔卡希回忆道，“他们并不是说电影拍完了，配首歌就好。在历时几个月的剪辑和后期制作期间，皇后乐队都非常投入。”

完成的专辑命名为《一种魔力》（*A Kind of Magic*），包含九首歌曲，其中与专辑同名的主题曲和另外五首歌被用在了电影《高地人》中。有一首评价不错的罗杰·泰勒的歌《凡人天堂》（*Heaven For Everyone*）未收录在专辑里，之后他会让自己的副业项目——十字架乐队^[4]录制这首歌。除了迈克尔·卡门和史蒂夫·格雷戈里外，参与专辑制作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专职跟巡演的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歌手兼作曲家琼·阿玛特拉丁和弦乐编曲家林顿·奈夫。

除了自己写的《一年之爱》，约翰·迪肯还和莫库里搭档写了一首灵魂乐歌曲《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Pain Is So Close To Pleasure*）；布莱恩·梅巧妙地称它为“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的歌。吉他手更喜欢的是迪肯和莫库里合作的另一首可以摇旗合唱的歌：《朋友就是朋友》（*Friends Will Be Friends*）。同时间，大卫·理查兹也在高山录音室协助梅和泰勒准备他们的歌曲。除了史诗般的《谁愿永生》，梅还写了库根主题曲《抢夺战利品》（*Gimme the Prize*），这首歌曲是为电影里的反派库根写的，充满毛骨悚然的声音效果，也有一段顶级的吉他独奏。音乐园录音室这边，莫库里重拾皇后乐队的旧日风格，写出了《宇宙的王子们》（*Princes Of The Universe*），他已经很久没有写这种让人胸腔共振的摇滚乐了。

作为高山录音室鼓部的代表，罗杰·泰勒有两首歌收录在完成的专辑中。《别失去神智》（*Don't Lose Your Head*，琼·阿玛特拉丁参与唱背景和声）是一首程式化的合成器摇滚曲，歌词教导人们神志不清时驾车的危害，灵感也许是来自贝斯部某人醉驾呼吸器测试没过那件事。泰勒的另一首《一种魔力》则优秀得多。标题直接来自《高地人》中的一句台词。该曲的另一个版本被用于电影结束后出字幕的背景音乐，但专辑里的这个版本会成为皇后乐队最纯粹的流行歌曲之一。虽然《一种魔力》署名作者是泰勒，但莫库里在成曲上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弗雷迪自有一套奇思妙想，他（对罗杰）说：‘你不用管，我来打造一首热门金曲。’”2010年，布莱恩·梅说。莫库里回忆道：“我知道他要去洛杉矶一个星期，我把它拿过来，把整首曲子彻底地改造了一

遍。”就像《收音机嘎嘎》一样，主唱接管了鼓手的歌，在其他人都没发觉之前就看到了它的巨大商业潜力。“我们是有意在做一张流行乐专辑，一张商业唱片。”泰勒说。

1986年3月，《一种魔力》单曲发布，在英国冲到第三名，一并推出的还有拉塞尔·穆尔卡希为他们拍摄的音乐视频（皇后乐队为《高地人》制作原声，导演以此视频表示谢意）。视频中，三位乐队成员扮演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身怀魔力的魔法师弗雷迪·莫库里把他们变成了潇洒的摇滚明星。听到歌词时，去年曾为皇后乐队做过暖场的太空竞赛乐队立刻感到一丝熟悉。“我们的专辑叫作《光束》（*Shaft of Light*），”吉他手劳瑞·曼斯沃史说，“‘作品’巡演的时候，弗雷迪说他喜欢这个名字。他说，这个标题用作歌词挺不错的。”果然，在《一种魔力》的第一节中，莫库里唱到“一缕光束指引着方向”。同时，由于《高地人》电影会在美国先上映，皇后乐队选择《宇宙的王子里》作为美国回归单曲，《高地人》的男主演克里斯托弗·兰伯特也在歌曲宣传视频中出演。但美国人没买账，单曲甚至未能突破前五十名。

美国国会唱片与皇后乐队之间的谜样关系仍在继续。乐队老相识比利·斯奎尔要推出下一张专辑《够了》（*Enough is Enough*），由莫库里与他联合制作曲目。“弗雷迪和我合作了两首歌，”斯奎尔说，“当时我们都签在国会唱片，他们听说我们要合作似乎都兴奋不已。艺人开发部的负责人甚至专程飞到伦敦来表达他对咱们这个小项目的激动之情。”

斯奎尔在肯辛顿莫库里家里度过了一个高产的夜晚，他们一起创作了歌曲《吹次中音萨克斯的女子》（*Lady With A Tenor Sax*）和《爱是英雄》（*Love is the Hero*）。“天快亮的时候，弗雷迪坐到钢琴前，为《爱是英雄》弹奏出一段新的开场旋律，让我沉醉不已，”斯奎尔说，“然而，我提交唱片时，唱片公司的高管们却决定不放这段进去。”歌曲的开场部分出现了莫库里特有的高亢华丽、极具戏剧性的声音，“他们那时候说了些‘会搞晕我的听众’之类的话”。

当时斯奎尔自己也有麻烦，起因是他在1984年为单曲《今夜让我摇滚》（*Rock Me Tonight*）做的宣传视频。斯奎尔模仿汤姆·克鲁斯早年电影《乖仔也疯狂》（*Risky Business*）中的夸张表演，跳了一段舞蹈。然而比利的恶搞却让观众不满。“他们从前看我的形象就是一个端着吉他正经唱摇滚歌曲的人，这让他们极为厌恶，”他承认说，“我总觉得国会唱片对弗雷迪的形象问题有些顾虑，加上粉丝对《今夜让我摇滚》的反应，他们担心他会更彻底地把我拖下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世界上

最顶尖的明星之一，借了一点他的非凡才能给我的专辑，多好的事情啊。”

新单曲已经上榜，专辑接近完成，皇后乐队又走起了往四个不同方向消失的老路。莫库里为戴夫·克拉克的《时间》完成了歌曲录音，并出席了这部音乐剧在伦敦领土剧院的首演。中场休息时他玩心大起，装成工作人员向观众兜售冰激凌。没一会儿，他就开始随意地把冰激凌丢给顾客，钱也不收。莫库里的一位跟班说：“弗雷迪没办法找零钱给他们。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1英镑硬币长什么样子。”

克拉克跟莫库里提过参演《时间》音乐剧的事。虽然莫库里自己说，大卫·鲍伊最近在纽约的《象人》（*The Elephant Man*）音乐剧中的表演让他觉得很赞，但他也清楚自己的极限。“他拒绝了，”克拉克解释说，“他说：‘亲爱的，首先，我下午3点才起床，所以没法做下午场的演出。再一个，我要做表演，就是拿生命唱满三个小时，之后就气绝身亡。所以音乐剧一周做八次表演这种是不可能的。’”

同时期，泰勒和大卫·理查兹担任摇滚乐队大酒瓶乐队^[11]的联合制作人，该乐队风格受到皇后乐队的影响；约翰·迪肯则组了一个叫“不朽之人”^[12]的三人组，为一部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飞行英豪的电影《消失的战线》（*Biggles*）制作了一首明快的流行歌曲原声《不能回头》（*No Turning Back*）。不过这首单曲或是电影本身都不怎么出名。也是在这段时间，布莱恩·梅将会在伦敦贝弗利山庄酒店举行的好莱坞喜剧《落魄潦倒》（*Down and Out*）的首映式上，偶遇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演员安妮塔·多布森。当时，多布森正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热门肥皂剧《东区人》（*East Enders*）中扮演热情火辣的酒吧老板娘安吉·瓦茨。首映式上，梅和妻子克里斯蒂娜入座时正好从安妮塔身边路过。布莱恩是被克里斯蒂娜带着看《东区人》的，结果他也成了剧迷。“我（对安妮塔）说，‘打扰你了，我觉得你演得很棒，’”后来梅告诉《超级金曲》（*Smash Hits*）杂志，“我问她想不想到温布利体育场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她说：‘呃，多谢好意。’”

那年6月，皇后乐队将在温布利体育场连演两场，其他户外演出地点还有都柏林的斯莱恩城堡、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公园^[13]和曼彻斯特的缅因路球场^[14]。门票几乎瞬间就售罄了，主办商哈维·戈德史密斯决定8月份在斯蒂夫尼奇的内布沃斯公园^[15]再加一场，七年前这里曾是齐柏林飞艇乐队在英国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地点。这场“魔力”巡演还会覆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最后在爱尔兰、英国和西班牙做高

潮收尾。

5月11日，乐队在瑞士蒙特勒的金玫瑰流行音乐节（Golden Rose Pop Festival）上再次亮相，对口形演出了新专辑中的歌曲。莫库里一觉醒来，看到《每日镜报》刊登了一张自己在台上表演的照片，文章标题是“赘美的弗雷迪”。“弗雷迪向来对自己苗条的腰线引以为傲，”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说，“但这张照片上，他身子歪着，挤出了一点小赘肉。”当然，不知是哪位《每日镜报》的编辑想到这个标题的。文章由评论员雷·科尔曼执笔，写的是皇后乐队的卓越不凡、高贵和大气。因为他算是皇后乐队在《每日镜报》的熟人，自然会遭到乐队的责难。雷特别紧张，他找到报社的人，让他们赔礼道歉，这样他才重新被皇后乐队接纳。

5月，皇后乐队在温布利的一间排练室安营扎寨，为接下来的巡演做准备。虽然年近四十，但莫库里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他在“拯救生命”上穿过的背心和紧身牛仔裤。不过，他还是请来了朋友兼服装设计师戴安娜·莫斯利，为整个乐队设计巡演服装。（“对皇后乐队要慢慢来，”她回忆说，“不能一味强推。布莱恩就要哄哄才行。”）莫斯利的设计作品包括一套王冠和带白色貂毛滚边的长袍，莫库里打算在乐队谢幕时穿。

表演的歌单加入了《一个愿景》《谁愿永生》《朋友就是朋友》和《一种魔力》。此外有一小段现在看来已经很久远的《神的旨意（重奏）》，还有中间的一段不插电即兴清唱，有小理查德的《图蒂·弗鲁蒂》，瑞奇·尼尔森的《你好玛丽·露（心儿已飞走）》（Hello Mary Lou [Goodbye Heart]）——这首歌曲莫库里最早在印度和狂热乐队表演过，以及杰瑞·雷柏和迈克·斯托勒的《（你真怪）宝贝我不在乎》（[You're So Square] Baby I Don't Care）。

考虑到要抓住整个体育场观众的注意力，“魔力”巡演的舞台设置极尽宏大，主舞台长约19.5米，左右延伸出各12米的侧舞台。“我们要在温布利搭起最大的舞台进行演出。”罗杰·泰勒兴奋地说，女友多米尼克恰好在巡演开始前几天生下了女儿罗莉。鼓手踏上巡演之路前表示，皇后乐队新演出的壮观程度，“会让电影《宾虚》（*Ben Hur*）看起来像《布偶电影》（*The Muppets*）”。盖瑞·史迪克斯和巡演工作人员要分别负责管理三个舞台，被戏称为“三级跳”：一个舞台正在使用，下一个舞台正在搭建，下下个舞台在运输去场地的途中。

巡演首站在瑞典。开场前，皇后乐队的第十一张录音室专辑《一种

魔力》在英国和美国正式发行。得益于后来被乐队称作“‘拯救生命’效应”的热度不减，专辑仅第一周就卖出十万张，超越创世记乐队的《触不可及》（*Invisible Touch*）和简单红^[16]乐队的《图画书》（*Picture Book*），在英国和爱尔兰夺下冠军。

此时，美国的销量却进一步下滑。“《一种魔力》听起来像是徒有其表的硬摇滚。”《滚石》杂志的马克·科尔曼写道。专辑止步于第四十六名。美国再次消失在皇后乐队的巡演地点名单上。而在家乡，《泰晤士报》称赞“弗雷迪将《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唱出了戴安娜·罗斯的感觉”，但对《一种魔力》的总体评价是“像墙上画着一群会飞的鸭子那么违和”。“如果说我不会因为批评而受伤，那是谎话，”莫库里承认说，“但世界就是这样啊。以前，我真的有气到揪头发的冲动，但现在我已经不会再为这些夜不能寐了。”

也许是这张专辑模棱两可的出发点造成了听觉体验上的不均匀。就算是莫库里，在解说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些含糊：“乐队既是在制作电影原声，又是在制作皇后乐队的专辑，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尽量让人们听下来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张原声带，因为里面也有其他的歌曲……”更令人困惑的是，1985年就发布的单曲《一个愿景》（它已经在电影《铁鹰战士》中作为原声出现）又放到了这张专辑里做开场曲。与《高地人》中不死之身的英雄相照应，专辑中只有《一种魔力》和《谁愿永生》展现出比普通流行歌曲更长的寿命。就像从《爵士》开始的每张专辑一样，《一种魔力》整体一般，但巧妙地加入了两三首有大热金曲潜质的单曲。“有一点勉强凑数的感觉。”马克干巴巴地说。

现场演出时，皇后乐队盛大出场，从台上缭绕的干冰烟雾中现身，直接开唱《一个愿景》和《管好你妈妈》。新歌曲穿插在热门金曲之间，《一种魔力》后接着就是《压力之下》。演唱会的最后部分，他们聪明地照搬了“拯救生命”上演过的六首歌曲。最能显示出他们一贯超自信作风的，是把即将发布的新单曲《朋友就是朋友》插在经典返场曲《我们会震撼你》和《我们是冠军》之间。“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有这种操作。”多年后，布莱恩·梅重新回忆歌单时喃喃说道。

斯德哥尔摩的开场演出之后，戴安娜·莫斯利接到莫库里的电话。那天体育场外聚集着反种族隔离抗议者，当然让人心情难以放松，但是主唱对演出本身更担忧，他需要一点“特别的东西”。莫库里要求戴安娜把新做好的貂皮长袍和王冠准时带去法国，赶上一周后在巴黎竞技场^[17]的亮相。演出前，莫库里花了一个下午在皇家蒙梭酒店试穿新衣，他披

着拖地长袍在走廊里上上下下地转悠。演唱会上的结束时分，伴随着乐队不间断地奏出《我们是冠军》结尾处高亢的音乐，莫库里从侧翼缓缓阔步上台，皇袍披在肩头，长长的下摆曳地而行。他摘下皇冠，向台下的臣民挥动致意。比利·斯奎尔从舞台侧翼观看了全场演出。“那感觉真是伟大，”他说，“不久前我才和弗雷迪在伦敦合录了歌曲，现在我就站在他那架大钢琴后面，在前台看不见的地方，目视着我的朋友在庞大的人群前展现他的荣光。”这也是斯奎尔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莫库里。

余下的巡演中，莫库里的盛大谢幕时刻必会出现皇冠和貂皮皇袍。从始至终，他都是演出的焦点，不知疲倦地在巨大的舞台上尽情发挥。“他是一切的中心，”布莱恩·梅真诚地说，“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弗雷迪传递出来，所以我们负责照顾好他。”“那时候弗雷德马上就满四十岁了，”彼得·辛斯还记得，“他仍然抽烟，仍然喝伏特加，做着种种对他健康不利的事情，但是每个晚上他仍然能够开足马力跑完两个小时。”某些瞬间，岁月的痕迹似乎依稀显露。皇后乐队的巨型灯光装置照亮了莫库里的头发，发量好像稍微有所减少（“亲爱的，那是我头顶的两个旋。”弗雷迪会抗议说）。后台，莫库里的蒸汽呼吸器不离手，他担心声带结节的问题可能随时爆发。也许他的健康还承受着其他原因的折磨，但他谁也没说。

英国摇滚乐队马瑞利昂乐队^[18]是巴黎竞技场演出的暖场乐队之一。这支乐队的主力是苏格兰主唱德里克·迪克（又被叫作菲什），他们也签在百代，刚刚以专辑《错位的童年》（*Misplaced Childhood*）拿下榜单冠军。“在伦敦混夜店的时候我和罗杰·泰勒就认识了，”菲什说，“我们常去大帐篷俱乐部，我俩好像还和同一拨女孩子一起约过，不过其他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巴黎演出后的派对上，令他的队友不爽的是，他被单独叫走，和皇后乐队全体成员、杜兰乐队的约翰·泰勒、尼克·罗兹共享“华丽主桌”。“弗雷迪很迷人，很友善，还很风趣，”他回忆道，“布莱恩和我就南非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们因为太阳城演出遭受不少打击，布莱恩的睿智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老实说，‘迪迪’有点怪。我们的贝斯手跟他打过照面，一直走过来想和他聊聊用的什么贝斯装备。约翰·迪肯不停地躲，躲了大约三四次之后，他转过身来，说：‘你他妈的是谁啊？’很好笑的。第二天早上他道歉了。”

在德国曼海姆的演出，皇后乐队邀请菲什登台合唱《图蒂·弗鲁蒂》。“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他妈怎么搞？’”他说，“之前我和我的

乐队上台表演的时候，弗雷迪曾让我用他的无线麦克风，这对任何歌手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而且他会从舞台侧翼观看我们的演出。他们在台上唱《图蒂·布鲁蒂》的时候，他欢迎我加入，然后真的把我拉到合适的位置上。不是那种很难看的做法，完全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应有的展现方式。他拥有整个舞台。他就是那个大哥。换我绝对做不到。”

四天后，在柏林，皇后乐队唱了一段齐柏林飞艇乐队的《迁徙战歌》（Immigrant Song）。然后他们又完整地唱了一遍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十四年前，正是在森林山的演出中唱了这首歌，让三叉戟的老板们对他们刮目相看。斯宾塞和戴维斯组合的《给我一些爱》，那首当年弗雷德·保萨拉缠着大学同学在教堂用管风琴演奏的曲子，这次也加入了现场演唱歌单。皇后乐队的过往回忆，在此次巡演中纷至沓来。

某些方面，过去的生活没有现在这样错综复杂。在荷兰短暂休息期间，梅订了录音室为安妮塔·多布森制作唱片样带（“她是个非常摇滚的人。”他兴致很高地说）。然而，英国家中，克里斯蒂娜·梅即将发现再次怀孕。7月5日，因天气恶劣、人群发生暴力冲突，皇后乐队在都柏林斯莱恩城堡的演唱会效果大打折扣。一位地方议员说这次演出是“大规模骗钱，虚无、低俗且反社会”。据说莫库里在后台发誓再也不来爱尔兰演出。

台下，皇后乐队当时的业余活动是玩桌游，一群人激烈地争夺拼字游戏“Scrabble”和问答游戏“Trivial Pursuit”的冠军，不过他们也少不了一些“虚无而低俗”的追求。“八十年代初，巴黎出现了夜总会百合表演。”一位巡演内部人士回忆说，“1986年在德国，皇后乐队在风月场所举办了一场演出后派对。我听说里面所有的姑娘都已提前付费，真是不敢相信……当然了，只有单身人士才可以参加。”当时还在举行世界杯。摄影师丹尼斯·奥雷根和莫库里一起看电视，德国队击败了墨西哥队。“比赛结束时，弗雷迪跳起来叫：‘就这么着！我要出去找个德国人来操我！’”

“我们开始说想做户外大型场地演唱会，推广商还不太确信能不能把票卖光。”盖瑞·史迪克斯说。然而，哈维·戈德史密斯公司请邮政部门配送温布利首场演出门票后，72000张门票仅几次配送就全部售光。最后，演出变成6月11日和12日两晚，皇后乐队将为十五万人表演。罗杰·泰勒实现了他对歌迷的承诺，他们在有史以来最大的舞台上表演；事实上，视频屏幕太大，以至于舞台地面和体育场屋顶之间放不下。盖瑞·史迪克斯说：“搭建的计划出了问题，屋顶的距离和计划里写的不一

样。”经过一番狂躁的电话沟通，像一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史迪克斯“启动紧急按钮”，他们租来一架起重机，再次违反物理定律，找到了把大屏幕塞进去的方法。

在温布利的第一晚演出是星期五，被突发的暴雨浇个湿透。周六天气转晴，十五台摄影机严阵以待，全程记录演唱会并在泰恩提兹电视台播出。后台可以看到米克·贾格尔随着人群进入了VIP包厢。“米克坐在舞台一侧，他说他觉得台子太大了。”后来史迪克斯回忆说。贾格尔其实也在评估对手。三年后，滚石乐队将在温布利举办自己的“铁轮”（Steel Wheels）豪华演唱会。

这个时候的皇后乐队观众，带着明显的“‘拯救生命’效应”：男粉丝和女粉丝数目均等，有一部分是新加入的年轻流行乐歌迷，他们最先接触的歌曲是《收音机嘎嘎》和《我要挣脱一切》。那一周皇后乐队在榜单上的表现同样强劲：《朋友就是朋友》排名前二十，《一种魔力》保持前五名。不过，很明显，当皇后乐队演唱《神的旨意（重奏）》时，这首从前乐队现场演出必备的关键曲目，却让一部分新观众觉得完全不知道在听什么。

“我会在街上遇到一些粉丝说：‘我喜欢你们早期的作品，不喜欢你们现在做的音乐，’”莫库里说，“但同时又有人喜欢我们的新作品，但听也没听过我们五六年前的东西。”这次演出还有一个有趣的元素。

《一种魔力》的封面由乐队四人的夸张彩色卡通形象组成。这些形象被做成充气模型，填入氦气。演唱《一种魔力》的时候，模型被放出在人群上方飘荡。其中三只都被温布利的群众抢到，只有“弗雷迪”那只越飘越高，最后落在几英里之外埃塞克斯切姆斯福德的一个花园里。

温布利演唱会的录像后来做成了录像带和DVD发售。它拍摄了乐队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舞台，记载着乐队的胜利。然而，当时谁会想到，这竟是弗雷迪·莫库里的最后一次巡演。多年来，主唱一直喜欢在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加入一些随性的挑逗话语，此次“魔力”巡回演出中他似乎比从前更放飞。有时候他宛如歌剧女主角，双眼紧闭，身体因情绪激动而颤抖，但下一秒他就会精神一振，轻松地对观众抛起媚眼来。他的脸上常常带着一抹戏谑的微笑，总在和观众撩拨互动。“毕竟，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他说，“认真的游戏。”

之后，皇后乐队在“肯辛顿屋顶花园”举办了一场耗资8万英镑的派对，庆祝温布利的两晚演出成功。当晚五百余位宾客中，一位参与者回

忆说，那是“又一个酒池肉林的夜晚”，裸身的男女服务员身上涂着像制服一样的彩绘，还有每逢派对必会出现的异装者、袒露胸部的模特。

《太阳报》第三版小模特出身的流行歌星萨曼莎·福克斯、七十年代华丽摇滚歌星加里·格利特尔^[19]和马瑞利昂乐队的菲什，共同与莫库里上台唱了《图蒂·弗鲁蒂》和《约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他们还给这个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迪基哈特和领跑者”（Dicky Hart and The Pacemakers）。

吉姆·哈顿被告知要远离镜头，因此派对上抓到的合影是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公众场合下，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直男形象。《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大卫·威格是为数不多的得到莫库里信任的记者之一，他写过一篇报道，称奥斯汀曾要求弗雷迪，想为他生个孩子。对外宣称依旧是单身的弗雷迪表示，他宁愿再买一只猫。

此时吉姆·哈顿和莫库里共同住在装饰一新的花园小舍。他的角色定位有时会让人有点琢磨不透：既作为弗雷迪的家用园丁领着薪水，晚上又和雇主睡在一张床上。莫库里很清楚他给自己任何一位伴侣带来的压力。而更诡异的是，为皇后乐队集团工作的玛丽·奥斯汀，自然就负责支付哈顿每月600英镑的工资。“就像经典的好莱坞故事一样，那些优秀的女演员们无法保持一段长久的关系，因为她们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莫库里说，“我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我无法让事业的车轮停转，而把自己投入到爱情中去。车轮必须保持转动，这样任何人想要和我一起生活并感到幸福就变得很难。”

随着英国各地体育场的演出结束，皇后乐队将继续前往欧洲大陆进行室外场地演出，其中包括奥地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他们的老朋友艾尔顿·约翰已经在布达佩斯演出过，但皇后乐队是第一支去演出的国际顶级摇滚乐队，百代的宣传口号是“铁幕之后的首场大型摇滚演出”。

乐队乘坐水翼船沿着多瑙河到达匈牙利，罗杰·泰勒穿着一件航海风的运动夹克，莫库里开玩笑问匈牙利议会大厦有多少间卧室，是否出售。皇后乐队匆匆从聚集在码头上的粉丝、报纸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中挤开道路，车子载着他们径直开往英国大使馆，这里为他们的到来准备了一场欢迎仪式。对于匈牙利政府来说，在布达佩斯举办一场西欧摇滚乐队的演出，可以拿出来作为东西欧关系改善的一个例证。皇后乐队的动机则简单得多。“我们喜欢去有挑战的地方，”布莱恩·梅说，“布达佩斯的情况和南美洲一样。有人来跟我们说，‘你们在某地非常非常

火，干吗不去办一场演唱会呢？”同时，拥有五千名成员的皇后乐队官方歌迷俱乐部匈牙利支部负责人却抱怨说，粉丝群里只有一百人拿到了演出的门票：“皇后乐队现在只想要钱。”他告诉《声音》杂志的记者。

对于皇后乐队管理团队来说，这次到访也可以看作是向媒体界抛出的橄榄枝。伦敦几大报业的记者和《新音乐速递》的记者大卫·昆蒂克都收到了邀请。很快，昆蒂克就和莫库里交谈上了，尽管他被告知主唱不会接受任何采访。“我不应该跟你讲话的。”弗雷迪自己抗议说，然后他又不管不顾地继续说下去，还邀请大卫和乐队共进晚餐。

“我们去了一个叫‘猎人餐厅’的地方，”昆蒂克说，“弗雷迪跟他的经理人说：‘什么好吃就点什么，给所有人都点好多好多的肉！’”罗杰·泰勒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时髦，但也喝得非常醉的金发美女。过一会儿，莫库里盯上了她。“弗雷迪俯身过去，”昆蒂克回忆说，“‘你别又来！’罗杰喊道，‘不准开口！’嗯，他真的又来。‘你的逼有多大，亲爱的？’弗雷迪问，‘能不能大到套下你的头，亲爱的？’”众人大笑，特别是乐队的翻译，金发女郎比出生气的手势，莫库里退缩了一下——“开个玩笑，亲爱的”——然后递给她一支香烟。之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行李传送带，等候在此的皇后乐队公关人员过来问昆蒂克，是不是可以把他的采访稿交给乐队的管理团队看后再发。他谢绝了。

演出当晚，八万人容量的匈牙利莱普特体育场^[20]座无虚席，还有约四万五千名没买到票的歌迷守在外面听，其中一些人甚至从敖德萨和华沙远道而来。此前，政府公布了“观众行为放宽限制政策”，但饮酒和吸烟是不允许的。莫库里和梅用三天时间排练了一首匈牙利民歌《春风吹河水涨》（Tavaszi Szél Vízét Áraszt），准备当晚进行表演。“弗雷迪把歌词写在手掌上，”摄影师丹尼斯·奥雷根说，“表演的时候，他手指轻轻动着，低头看歌词。”然而，这成了整场演出的转折点。“唱之前，观众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布莱恩·梅说，“然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是来真的了。那一刻观众的回应真他妈震耳欲聋。”这段经历记录在《魔力：皇后乐队在布达佩斯》（*Magic: Queen in Budapest*）^[21]中，这是一部次年发布的八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加演唱会实录。他们又征服了一个国家，或者用莫库里的话说，“搞定”。

不到一周后，皇后乐队飞往西班牙，进行四场室外演出。在接受一档电视艺术节目的采访时，莫库里顺口表露了对西班牙歌剧演唱家蒙茨拉特·卡巴耶的喜爱。莫库里是狂热的歌剧迷，他在洛杉矶和伦敦皇家歌剧院都看过卡巴耶的表演。他说的这句话最后会传到卡巴耶那里，虽

然当时她正在外地演出。几个月后，两人将会开始合作，创作出莫库里最有野心的一张专辑。

“魔力”巡演结束于8月9日，乐队为内伯沃斯公园的十二万观众进行了表演。这时候，巡演设备数字已达到了传说级别：五千个扩音器，13.6公里长的电缆，高6米、宽9米的大屏幕.....皇后乐队的暖场乐队体现了他们广博的品味：既有当红的流行歌星贝鲁斯·桑姆（他有一首金曲《想象力》[Imagination]），又有杰出的凯尔特摇滚乐队大国乐队^[22]，还有罗杰·泰勒的老酒友瑞克·帕菲特和他的现状乐队。皇后乐队分别乘坐两架直升机抵达后台，其中一架机身上绘着和新专辑封面一样华丽的卡通彩绘。

舞台上的皇后乐队运作得像钟表一样精准。然而，这次和之前的演出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片绵延不绝、似乎没有尽头的人海。单个体育场的观众是可控的。而在内伯沃斯，洋洋洒洒挤着十二万人，越过场外的快餐车、饮料帐篷，一直站到远在地平线上的树林里。舞台附近某个乐队看不见的地方，一名二十一岁的男歌迷在醉酒斗殴中被刺死。不幸的是，现场人数多到救护车无法在他流血致死之前开进来。舞台上，唱完《收音机嘎嘎》之后，约翰·迪肯摘下贝斯扔向了扩音器。

“约翰在另一场演出中已经砸了他平时用的那把贝斯。”彼得·辛斯揭露说，他当时就站在侧翼目睹这次发脾气。辛斯把乐器捡回来，还好没坏，他又重新调了音。“返场前关灯的黑暗中，约翰向我走来，开始道歉。我说：‘没事的，约翰，没事.....我已经修好了。’他不是生乐器的气，也不是生我的气。我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那次巡演中约翰的举止很怪异；他做了一些不符合他个性的事情。”“约翰把贝斯砸到舞台边上的时候，我的确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丹尼斯·奥雷根说，“有一种终结感。”

“我正在经历人生中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阶段”，当时，迪肯坦白道，他把自己的情绪波动归结为“在音乐行业和乐队中的不安全感”。迪肯的一位老朋友后来解释说：“过去的种种压力让他有点不舒服。（迪肯）结束巡演回来后，没法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魔力’巡演之后，皇后乐队再次如日中天，”彼得·辛斯补充说，“约翰对这一点是感激的，但我认为他在皇后乐队结束之前很久就已经受够了：也许就在《白热空间》之后，甚至还不到他们开始做《作品》的时候。但是又出了这首轰动的单曲《我要挣脱一切》，他再次受到鼓舞。接着‘拯救生命’就来了.....但是约翰似乎跟每个人都唱反调。他同时又在埋头苦干，和会计

师照看着皇后乐队的商业利益，思考着‘下一步干什么？’这种问题。”

表演结束时，莫库里身披皇袍，头戴皇冠，对着人群大声说“晚安，好梦”；这成了他在皇后乐队演唱会上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后台，庆祝演出成功的活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照样是有泥地摔跤、露天游乐场，参加的闲杂人等更多，喝掉的酒、嗑掉的药也更多……没多久，弗雷迪就坐直升机离开，他回伦敦了。皇后乐队的“魔力”巡演吸引了超过四十万观众，总收入超过1100万英镑。但在回家的航班上，那起刺伤致死事件让一切庆祝胜利的活动都平息了。

很多年后，布莱恩·梅回忆起在西班牙发生的一件事，就在内伯沃斯演出前几天，“约翰和弗雷迪稍微有点意见不合，弗雷迪说：‘呵，我也不会一直在这里的。’”，起初吉他手并未在意这句话。事后看来，这是莫库里不想再进行巡演的第一个信号。很快他就说得更明白。“巡演结束的时候，弗雷迪说：‘这事我再也不想做了。’”梅说，“听起来有点不像他，因为他对任何事都很积极，而且又那么强大。我们以为他可能正在经历某种心路历程，或者，也许真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我记得当时后面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但又被我挥到一边。”

“内伯沃斯演出之后，我有一种感觉，皇后乐队再也不会做现场演出了。”彼得·辛斯说，他已经辞去了巡演工作，将作为摄影师开展新职业。“我认为弗雷迪不想成为自己的拙劣模仿。我想他还是会做音乐和拍视频，但他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笑话。”尽管在温布利和内伯沃斯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皇后乐队还是没被说动，再去一次美国。“盖瑞·史迪克斯已经和美国的承办商谈过‘魔力’巡演的大致日期，”辛斯说，“他希望他们能在洛杉矶、纽约做室内演唱会……巡演期间，盖瑞打电话给那些承办商，告诉他们这次巡演在欧洲做得有多好。”之后，在英国，皇后乐队的下一首单曲《谁愿永生》发布，排到第二十四位。然而，在美国，莫库里那首“唱出戴安娜·罗斯感觉”的《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却未能进入榜单。

9月，庆祝完四十岁生日之后，莫库里飞往日本度假。回来后，他看到《世界新闻报》上一篇报道，声称他曾在哈雷街的一家诊所做过秘密的艾滋病检测。几天后，《太阳报》上刊登了莫库里从“豪掷25万英镑的日本购物之旅”返回希斯罗机场的大幅照片。配以大字文章标题：《我看起来像是得了艾滋要死掉吗？气得冒烟的弗雷迪》。莫库里告诉《太阳报》的记者，他“健康得很”。虽然否认曾进行检测，但他不可能继续无视周围发生的事情。弗雷迪的前男友、据说是歌曲《爱情游戏》

灵感来源的托尼·巴斯丁感染了艾滋病，于11月去世。

此时，梅正在计划另一张个人专辑，排解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烦恼。他将会和坏消息乐队^[23]合作，这是一支由喜剧演员里克·马雅尔、奈杰尔·普莱纳和阿德里安·埃德蒙森组成的恶搞重金属乐队。莫库里紧随其后。11月，他预订了伦敦汤豪斯录音室录制一首新单曲：翻唱五黑宝合唱团^[24]1956年的金曲，《伟大的伪装者》（The Great Pretender）。这首歌完美地诠释了莫库里。莫库里和迈克·莫兰共同担任制作人，迈克是他在《时间》音乐剧工作时认识的键盘演奏家和编曲家。莫兰曾是一位流行歌星，他的歌曲《最低点》（Rock Bottom）作为英国参赛作品参加了1977年“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后来莫兰成为莫库里合作无间的帮手和亲近的朋友。

大卫·马莱特为《伟大的伪装者》拍摄宣传视频，罗杰·泰勒、莫库里的老朋友彼得·斯特拉克和他本人全部以女装出镜，泰勒的一身打扮很像是浓妆版的蒂娜·特纳。弗雷迪重现了一些他最出名的视频造型，包括《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我要挣脱一切》。他剃掉了胡子，穿着粉色的西装，登上一座好莱坞老电影里的那种大楼梯，楼梯上立着一百个真人大小的纸板，全是他穿着粉色西装的样子，这一幕是视频的结尾。

克里斯·切斯尼在现场注视着他的表演。1970年，还叫作弗雷德·保萨拉的青年曾短暂地加入过切斯尼的酸奶海乐队。克里斯后来仍然涉足音乐，但是他现在是大卫·马莱特影视制作公司艺术部门的员工。“我觉得要是接了皇后乐队的活，被认出来实在很尴尬，”他说，“我不想被人看成是一个失败者，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混得很糟糕。所以我保持远离的状态。”

但切斯尼无法抑制好奇，还是偷偷溜到了《伟大的伪装者》的拍摄现场。“我躲在阴影中，尽量不引人注意。弗雷迪站在那个又高又长的大楼梯上，他看到我了：‘克里斯！你还好吗？’他跑下来，领我去了他的化妆室。”这是切斯尼第一次体会与“弗雷迪·莫库里”见面的感觉。“‘你喝不喝香槟？’他问，打个响指，香槟立刻呈上来。我记得他把伏特加往后推，好像已经不流行喝了。然后就是，‘来吸一条可卡因吗……吸一条……’其实是挺好的，就像又回到了多年前的样子。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来我的个人专辑里演奏！我打电话给你！’当然，他从来没有打来过，而我又觉得太尴尬，没有打电话给他。”克里斯·切斯尼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弗雷德·保萨拉。

12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一张新的现场专辑《魔力现场》（*Live Magic*）。令人费解的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包括《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剪短了，好让它们能适合专辑的长度。又有粉丝发出类似匈牙利皇后乐队歌迷俱乐部负责人一样的抱怨（“皇后乐队现在只想要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掏钱买了，这张专辑在圣诞节前适时地为乐队挣到了榜单第三名。

关于弗雷迪私生活的种种猜测甚嚣尘上，这个时间他挑了《伟大的伪装者》来演唱的确是很贴切。“《伟大的伪装者》这个标题用来概括我的所作所为挺好的，因为我就是大伪装者。”他说。听众们应该也是这样想的，2月时单曲排到了榜单第五名。这时候，弗雷迪之前在西班牙电视台上对蒙茨拉特·卡巴耶表达的赞赏，传到了这位歌剧天后的耳朵里。皇后乐队在西班牙的推广商比诺·萨格利奥科正在组织一个电视音乐节“92伊比萨”，借以庆祝西班牙成功申办1992年奥运会。他非常希望能促成弗雷迪和卡巴耶一起演唱。

萨格利奥科约了一次会面，莫库里于3月飞往西班牙，随行带着迈克·莫兰为他打气，他们约定在巴塞罗那丽思酒店和卡巴耶吃午餐。这位时年五十三岁的女高音在祖国西班牙和全球歌剧界都备受尊崇，她从容地迈入酒店大堂，四周的人像朝臣一样膜拜（“她就像示巴女王^[25]一样。”莫兰说），莫库里突然意识到他不再是房间里最重要的人了。“我很紧张，”他承认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说什么才好。”

午餐时莫库里有些拘谨，但是他此行是有准备的，他给蒙茨拉特播放了一首他和莫兰合写的歌剧歌曲《自由恋爱的练习》（*Exercises in Free Love*）。“这首歌中，我假装自己是你。”他对这位女高音说，将歌曲赠给她。令他吃惊的是，她欣然接受，并告诉两人，下个月她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演出，她会唱这首歌。然后她拍拍一脸震惊的莫兰的肩膀，告诉他，他也要上台演奏钢琴。^[26]

考文特花园的演出完成后，他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弗雷迪将为两人写一首全新的歌曲，在萨格利奥科的电视特别节目中表演，他们还会一起录制一张二重唱专辑。“我心想，‘天啊！这下我可怎么办？’”莫库里说。进一步体现摇滚和歌剧世界不同的是，蒙茨拉特告诉弗雷迪，她只能有三天时间来参加专辑录音。

时间有限，莫库里便把下一张个人专辑的计划搁置一边，开始与迈克·莫兰合力专心写这张二重唱专辑的歌曲，其中一首歌曲的填词找了

作词家蒂姆·莱斯^[2]。最后他们谱写了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命名为《巴塞罗那》（Barcelona），专门写给这座成为1992年奥运会主办地的城市。歌词既有英语又有西班牙语，世界顶级女高音和从未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摇滚巨星碰撞出耀眼的光芒。卡巴耶十分喜爱这首歌曲。但是她的日程依然排得很满，弗雷迪使用假声唱女高音的部分，录下来寄给她，以获得她的认可。

卡巴耶终于有空飞去伦敦进行录音时，莫库里开始慌了。“弗雷迪神经紧张，搞得我们更加紧张，”汤豪斯录音室的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说，“蒙茨拉特以前只录过现场收音的专辑。我和大卫·理查兹商量：‘我们以前从来没给唱歌剧的录过音啊。她会用哪种麦克风呢？’然后我们又想到她以前可能从来不会戴耳机录音，所以我们在她的两边安装了几个扬声器。”

蒙茨拉特驾临汤豪斯之前，莫库里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女洗手间。“弗雷迪突然问：‘这儿有女洗手间吗？我只看到过男洗手间！’”布拉夫笑起来。“有人带他去看女洗手间，他又觉得太简陋，请录音室的经理把它修整一下。他主动提出要付钱，其实皇后乐队付给汤豪斯的钱那么多，他根本不用出这种小钱。蒙茨拉特终于来了，一切进展顺利，大家才放松下来，在那之前我们都紧张死了。”莫库里和卡巴耶合作的这张《巴塞罗那》专辑，直到次年6月才能最终制作完成。到那时，弗雷迪的生活已是一片混乱。

4月初，因为对英国音乐的杰出贡献，皇后乐队荣获“艾弗·诺维洛”奖。但这是那个里月唯一的好消息。大约就在1987年4月中旬到5月初这段时间，莫库里收到了他一直害怕的消息。据吉姆·哈顿说，复活节假日，弗雷迪说他接受了活体组织检查，医生从他的肩膀上取了组织样本。几天后，莫库里告诉他，HIV检测结果是阳性。

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奥斯汀给出的版本则不太一样。玛丽回忆说，弗雷迪的全科医生打紧急电话找她，担心打给莫库里的电话都被过滤了。玛丽便催促弗雷迪与医生取得联系。全科医生后来再次打电话找玛丽，因为莫库里仍然没有回应，用玛丽自己的话说：“我追问医生，直到他告诉我需要跟弗雷迪谈话的原因……我的心沉到了底。”

彼得·弗里斯通解释说，“没人能肯定到底是谁传染给谁”，但是他和皇后乐队的摄影师米克·洛克都认为，莫库里很可能是在纽约狂欢期间被感染的。（弗里斯通：“八十年代初的美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病情一经确认，莫库里就展示出了他的务实精神，这种坚定的品格曾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中的所有危机。他跟吉姆·哈顿说，如果吉姆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他完全理解（吉姆拒绝了）。然后他通知了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比齐。在花园小舍为他工作的乔·法内利和彼得·弗里斯通也会陆续得知他的病情。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他才能和皇后乐队的其他成员分享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忠诚地替他保密。

然而，更多坏事接踵而来。1985年，保罗·普伦特被皇后乐队办公室解雇。莫库里答应用自己的公司聘用普伦特，但一年之后，工作没干好，钱却花得所剩无几。彼得·辛斯说弗雷迪有种“误入歧途的忠诚”，保罗·普伦特保管着莫库里在斯塔福德大街的公寓钥匙，而且据吉姆·哈顿所说，“弗雷迪给他钱，让他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度圣诞。”“我记得的是，普伦特在斯塔福德的房子办了好些派对，把那个地方搞得乌七八糟，”辛斯说，“所以弗雷迪把他炒了。保罗咆哮说：‘你等着，我会做这个那个！’然后他真的做了……”

1987年5月4日，《太阳报》爆出耸人听闻的头版头条：《艾滋病害死了弗雷迪的两位情人》，配图是他和托尼·巴斯汀以及一位空乘约翰·墨菲的合影（尽管彼得·弗里斯通后来坚持说，墨菲从来没当过莫库里的情人）。报纸内页里继续大书特书。一篇文章标题是《清晨4点的紧急电话》，“主唱的得力助手保罗·普伦特”透露，4月29日凌晨，弗雷迪给他打电话，诉说害怕死于艾滋的恐慌。另一处，普伦特说莫库里曾与“数百名同性恋者”发生过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太阳报》陆续刊登后续报道，普伦特详细地描述了莫库里和别的摇滚明星如何狂吸可卡因。有迈克尔·杰克逊抓到他吸毒的故事，弗雷迪和朋友肯尼·埃弗雷特吵架背后的真相（原来是这位DJ喜欢蹭莫库里的可卡因，从不自己买）。报纸对嗑药的细节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而几年前，弗雷迪曾半真半假地告诉《晚报》（*Evening Standard*）说，皇后乐队可能是“现存最干净的乐队了”。5月7日，普伦特的最后一篇爆料，报纸刊登了他私人收藏的许多照片：弗雷迪和维尼·基什伯格，弗雷迪和“酒保文斯”……普伦特公布说，莫库里心中的理想男性是演员伯特·雷诺兹，还抖搂出吉姆·哈顿是弗雷迪同居情人的事情。

传闻普伦特收了《太阳报》3.2万英镑。后来他打电话去花园小舍，说他是被报纸逼着爆出这些事情的。莫库里拒绝接听他的电话。5月10日，《世界新闻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是来自弗雷迪，谴

责普伦特“拿死人的故事赚钱”，并指出“我做过的所有事他（保罗·普伦特）都做过，还做得更多”。

5月底，莫库里飞去伊比萨参加“92伊比萨”表演，顺便散心。比诺·萨格利奥科愿望成真：弗雷迪与蒙茨拉特·卡巴耶将在圣安东尼奥的酷俱乐部^[28]进行表演，为六千名受邀嘉宾演唱《巴塞罗那》。参加节目的还有电影明星哈里森·福特，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歌星克里斯·雷、杜兰杜兰乐队、斯潘多芭蕾乐队和马瑞利昂乐队等。弗雷迪和随行人员住在派克酒店，那是一个远离窥视的私家度假胜地。由于近期《太阳报》的指控，同行和对手又都聚集于此，莫库里知道他周围尽是审视的目光。

马瑞利昂乐队的菲什在“魔力”巡演中常和莫库里一起玩至通宵（“在‘斯托利和秘鲁’俱乐部度过，”他承认道）。“我到酷俱乐部的后台区，感觉整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说，“氛围极其阴沉，一切都变了。我觉得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芭芭拉·瓦伦汀从慕尼黑赶过来，她一看便知旧情人病了。根据这位女演员后来的采访，莫库里化妆时需要额外补妆，以掩饰他脸上的色块，那是卡波西氏肉瘤的症状。果真如此的话，至少他的伪装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弗雷迪走上台时，各方面看起来都强壮而健康。

莫库里和卡巴耶为当天的活动做压轴表演，虽然两人是对口形，但加入了迈克·莫兰、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现场伴奏。他们看似一对绝不可能出现的跨界组合：典雅的女高音披着透明的黑色披肩，莫库里穿着燕尾服，唱歌时右腿仍在抽动，就像他和皇后乐队在舞台上的那样。

虽然台下观众此前从未听过《巴塞罗那》，但表演结束时他们全部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10月，两人合作的这首单曲在英国登上第十名。弗雷迪没有辜负这次惊世的合作。它是弗雷德·保萨拉传奇故事中又一个非凡的篇章：七十年代成为摇滚明星后，他和皇家芭蕾舞团共舞；八十年代作为流行巨星再度征战江湖，他现在又将领域拓展到了歌剧。“想想真是太荒谬了，”他沉思道，“她和我站在一起。但是，只要我们在音乐上是共通的，我们看起来如何、来自什么背景根本无关紧要。”

那个夏天，《每日快报》的大卫·威格和莫库里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在伊比萨庆祝弗雷迪的四十一岁生日。大卫和其他人一样心存猜疑，但是弗雷迪不会被绕进去，只要有人问他关于不良健康迹象的问

题，他就会说是因为酒喝太多（“亲爱的，是我的肝”）。他的队友们也存着一肚子疑问，但是，就如罗杰·泰勒所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努力跟自己说，肯定是别的什么问题。”

由于皇后乐队处于休憩状态，纪录片《魔力岁月》是他们在1987年唯一发行的作品。这部影片体现了皇后视频制作公司的商业智慧，他们将纪录片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放那些老的宣传视频，一部分放《一个愿景》的幕后花絮，还有一部分是明星专谈，来自他们的明星粉丝米克·贾格尔、艾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等人。

乐队之外，布莱恩·梅的私生活正在往狗血剧的方向急速发展。1986年圣诞节，超过3000万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东区人》，那一集中安妮塔·多布森饰演的安吉·瓦茨收到丈夫的一纸离婚书。在现实世界中，梅和多布森继续否认存在婚外情。但梅同时又在为安妮塔写歌、制作专辑。此时梅培养的坏消息乐队被证明是个失败的尝试，他们那首由布莱恩炮制的喧闹搞怪版《波西米亚狂想曲》未能上榜。虽然这首歌里甚至迪肯也贡献了和声，但是皇后乐队的其他人大概没有这么热衷于重新制作自己最伟大的歌曲。

罗杰·泰勒的夏季在英格兰、瑞士和意大利的录音室之间度过，他开始准备下一张个人专辑的曲目。泰勒自己演唱并演奏了全部乐器，他决定自己组建一个乐队，这样他就可以出去巡演了。“菲尔·柯林斯都能同时做个人和乐队……还演戏，我也能同时做两个乐队吧，”他开玩笑说，“而且这段时间，我们皇后乐队真的没有很忙。”

在队友们的全心支持下，泰勒在音乐杂志上刊登了两则广告（“顶级摇滚乐队的鼓手寻找音乐家”和“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想成为明星，拨打这个号码”）。最初，泰勒比较谨慎，他想要找真正的乐手而非皇后乐队的粉丝。最后，他挑选出了三个不知名的年轻人：鼓手乔什·麦克雷、吉他手克莱顿·莫斯和贝斯手彼得·努恩。斯派克·艾德尼兼职弹键盘，泰勒负责弹节奏吉他和担任主唱。为了摆脱“罗杰·泰勒”这个名号，他们简单地将乐队命名为十字架乐队。

泰勒和维珍唱片签了协议，原本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推翻它》（*Shove It*）成了十字架乐队的首张专辑。他们的第一首单曲《牛仔与印第安人》（*Cowboys and Indians*）于9月发布。“我就是搭把手，”泰勒告诉《声音》杂志，“我只是这个牢固组合的一份子。”但事实却不完全如此。十字架乐队约了出席星期六早上的电视节目《73

号》，电视版混音由约翰·布拉夫完成。“罗杰说他和乐队一起乘小巴去录音室，”布拉夫说，“然后我和‘水晶’（克里斯·泰勒）坐罗杰的宾利豪车跟在后面。‘水晶’和我到了录音室，前台问我们是不是乐队的人。我们只好说：‘不是的，乐队在后面的小巴里’……这种安排持续了几天之后，罗杰才坐回宾利。”很可惜，这位十字架乐队的富豪指挥官开着阿斯顿马丁、住着伊比萨岛的度假别墅，他的将士们始终和他不是一个级别的人。

《牛仔和印第安人》在榜单表现失利，2月份《推翻它》正式发布。梅、迪肯和莫库里都来客串，弗雷迪主唱了《一种魔力》专辑中没选上的《凡人天堂》。这张专辑是标准的八十年代发行的那种流行摇滚乐，部分带着泰勒新喜欢的乐队INXS的感觉，只有他独特的沙哑嗓音是专辑中的亮点。《推翻它》进入了榜单前五十名，但后续发布的单曲都没有什么收益。这是皇后乐队大于每个成员总和的另一个实例。但是十字架乐队为泰勒提供了一样他再也不能从皇后乐队那里得到的东西：现场演出。他可不会轻易放弃。

1988那一年，对所有人来说都充满挑战。1月份，泰勒在切尔西登记处与多米尼克·贝朗结婚，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是他的证婚人。几周后，他搬出家门，住进了二十五岁模特黛博拉·梁的新居。她最近做的电视广告中咬着一块阴茎形状的吉百利脆片巧克力棒，引起了《每日邮报》读者的激烈讨论。自然，媒体界对鼓手的家室安排十分好奇；这种狂风骤雨般的婚姻和婚后生活，让人们感到摇滚明星做事情可能真的与凡人不同。似乎，这场婚姻的必要性是为了在两人分开后，两个孩子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保障。

更奇怪的是，也在那个时候，约翰·迪肯自己几乎参与了一首热门单曲。这位贝斯手加入莫里斯小调和少校乐队^[29]，在他们的搞怪嘻哈歌曲《口吃饶舌》（Stutter Rap）的宣传视频中跑了个龙套。这支乐队的成员、喜剧演员和作家托尼·霍克斯有一次在乘坐维珍航空去迈阿密的时候，在飞机上偶遇迪肯。“我们共度了漫漫周末，喝个大醉，”霍克斯说，“我深深觉得约翰是个一不留神变成摇滚明星的人。”

泰勒刚在新家落脚没多久，就和十字架乐队出去巡演。在纽卡斯尔梅菲尔的舞台，观众中有几个闹事的，拿吉百利脆片巧克力棒砸他。巡演到了德国，经赞助商的一再要求，泰勒让步，演出的海报被修改为：“罗杰·泰勒和十字架乐队”。不过，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只是“牢固组合的一分子”，十字架乐队只唱一首皇后乐队的歌：《爱车狂人》。

皇后乐队在主业上也有了新的安排。1月，乐队在伦敦奥林匹克录音室相聚。他们做了一项重要决定：从现在起，每一首新歌都归属于全部四位成员。“我真希望我们早点这么做，”布莱恩·梅告诉《Q》杂志，“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虽然这样做确实意味着要有所牺牲，放手把你的创作交出去，但真这么做了之后，你发现整个团队可以在所有方面同心协力。”“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做决定，”罗杰·泰勒补充说，“而不是从收益或是个人的自尊心出发。”

根据梅的说法，当初在制作第一张皇后乐队专辑时，是莫库里提议分开各自的版权。二十年后，弗雷迪却愿意均分这些财富。同样地，他们集体决定回到从前的工作方式，即四个人一起在录音室，而不是各自在不同的录音室，仅与电子合成器做伴。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原本打算叫作“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但在完成前几周改为了“奇迹”（The Miracle）。布莱恩·梅称专辑录制的第一首歌曲《我全都要》回归了“皇后乐队的老派风格”。虽然用了集体署名，但歌曲一开始那强劲的连接、后面更变本加厉的吉他独奏，都明确无误地表明这是布莱恩·梅的创作。这首歌任性的歌词听起来很适合弗雷迪·莫库里，但歌曲标题其实来自安妮塔·多布森的口头禅（梅：“她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梅后来透露，这首歌的想法从他脑海里凭空冒出来的时候，他正在洛杉矶家中的花园里挖土除草。

《奇迹》时断时续地在伦敦奥林匹克、汤豪斯和瑞士的高山录音室录制。莫库里在皇后乐队和蒙茨拉特·卡巴耶的合唱专辑之间两头忙，中间甚至还抽空做了一次现场演唱。4月他在伦敦的领土剧院和《时间》音乐剧剧组一起登台唱了四首歌。鉴于目前媒体对他健康状况的捕风捉影，能这么做十分勇敢，因为这次演出是为新成立的艾滋病慈善机构泰伦斯·希金斯信托筹集资金。不过莫库里仍然没有和皇后乐队其他成员谈过他的健康问题。1999年在接受《魔力》杂志采访时，梅说：“我们是在1987至1988年间发现弗雷迪的事情。”然而1992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梅又说他们是在“（弗雷迪）去世前几个月”才被告知的。无论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弗雷迪本来就不是愿意主动说出来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布莱恩说，“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这里面有种不成文的规则，只要弗雷迪不想谈我们就不谈。他只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巡回演出了，话说到这里就可以了。”

一方面看，这着实奇怪，莫库里成年后绝大部分时间都和这几个人

一起度过，但他却选择对他们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然而，莫库里永远是个谜，即使是对他的乐队成员来说也是。出身、童年、性取向等等，都是他生命中时时保持私密的领域。他的健康问题也是一样。“他的身体显然不太好，”协助制作《奇迹》的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说，“但不会有人议论此事，我们本来也不打算这么做。”

“我个人确实不知道他患上了艾滋病，”大卫·理查兹说，最后的几张专辑他都参与了制作，“我推测他可能得了癌症。我想所有参与的人都不愿去想，事情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每个人都还抱着一线希望，觉得最终会有奇迹发生。”

6月，布莱恩·梅的父亲哈罗德去世。“在他眼里，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两件事情是：第一，放弃学业成为流行明星；第二，和女性未婚同居。”布莱恩说。当年父子俩几乎有一年没跟对方说过话，后来关系才慢慢缓和，哈罗德开始支持儿子对职业的选择。而梅说：“我爸爸一直想要阻止我搞摇滚，但正是他造了我的吉他——正是这把吉他促使我进入音乐行业。”

吉他手的婚姻问题让他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雪上加霜。1988年初，女儿艾米丽出生后不久，梅便离开克里斯蒂娜和三个孩子，从家里搬出来，独自一人住到另外的房子里。虽然他和安妮塔·多布森的关系已经公开，但他说自己“无法承认这件事，也不允许自己和她在一起”。婚姻的破裂、父亲的去世，让梅在为皇后乐队专辑录音时愁云密布。“我完全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他说，“虽然这张专辑里我的部分都能拿出手，但是我的投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关于“摇滚巨星富豪”和“安吉”（多布森在《东区人》里的角色名称）的八卦很快在各种小报上大肆流传。梅将内心的恼怒写到了新歌中，产出了一首舞台感很强的中速摇滚歌曲《丑闻》（Scandal）。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首歌，“比我们更好的那些歌差一点。”泰勒说。

不为乐队工作的时间，梅似乎全天候地与其他人演出，只要别人发出邀请他就去。父亲去世仅几天后，他就参加了查尔斯王子的慈善音乐会，与艾尔顿·约翰、埃里克·克莱普顿在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表演。随后几个月里，他成了兼职吉他手，和霍利·约翰逊一起演出，客串黑色安息日乐队，还与儿时偶像的朗尼·多内根同台。“总是需要一些分心的事情，”他承认，“让你自己忙得停不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治疗。”

10月份，在《奇迹》制作期间，弗雷迪·莫库里和蒙茨拉特·卡巴耶

的二重唱专辑《巴塞罗那》发布。即使今天听来，专辑中如《堕落的牧师》（The Fallen Priest）和《金童》（The Golden Boy）这样的歌曲仍然十分引人入胜。莫库里以自然练就的声音对抗卡巴耶宏大的世界级女高音，竟然毫不逊色。在《Q》杂志的评论中，大卫·辛克莱写了一句有见地的话：“《巴塞罗那》不似《汤米》，也非《茶花女》，它更接近《猫》或者《时间》。”^[30]多年后的音乐剧《我们会震撼你》从这里开始萌芽。《巴塞罗那》在英国排行榜上停留了一个月，排在二十名开外。

专辑发行当晚，巴塞罗那大皇宫前的露天广场上举办了奥运火炬到达庆典，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到场，莫库里和卡巴耶的表演是重头戏。当天的演出名单上还有杰瑞·李·刘易斯、狄昂·华薇克和无处不在的斯潘多芭蕾乐队。这是弗雷迪最后一次现场表演，二人再次使用了对口形的方式。针对这次盛会表演的报道中，出现了“喉咙感染”和“艾滋病”的字眼。在一次演出后采访中，莫库里驳斥说：“要是我的声音出来欠佳，会让她失望的。我不想冒这个风险。”

12月初，十字架乐队在伦敦汉默史密斯音乐宫为皇后粉丝俱乐部年度聚会表演。约翰·迪肯、布莱恩·梅也上台加入，众人一起唱了几首布鲁斯歌曲。弗雷迪没有出现。巴塞罗那的表演中，莫库里保持着自己的舞台形象。或者说，勉力支撑着。他整洁无瑕的晚礼服下，是右小腿及足跟部分的伤口，由于免疫系统受损，伤口永远无法正常愈合。

新年的时候，《奇迹》专辑终于杀青，从被罗杰·泰勒称为“大丰收”的三十首歌曲中，精选出了十首。一些未被采用的歌曲或者收录在CD和磁带附赠曲目中，或者作为之后发行单曲的B面。第一首单曲《我全都要》5月发布，让乐队再次获得英国前五名成绩；它里面声声铿锵的重金属吉他连复，好像是对着时下流行的重金属乐队如枪炮与玫瑰乐队、邪典乐队^[31]挥出的有力拳头。专辑于6月发行，封面由皇后乐队的艺术专家理查德·格雷设计。这幅画使用了最先进的设计程序，也就是后来的Photoshop程序，将四位乐队成员的脸部特写融合成了不分彼此的一张拼接脸；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神奇地连成一体。

《奇迹》专辑直冲英国冠军，在美国则拿到二十四名。虽然布莱恩·梅处于情感困境中，但他在专辑中的表现却十分抢眼。在《我全都要》和《突破》（Breakthru）中，吉他独奏饱满丰富。而在类似沙滩酒吧轻松小调的《风雨必至》（Rain Must Fall）里，梅的吉他简直要将这首歌掀翻。作为皇后乐队里的良心担当，饱受内心折磨的吉他手一次次出其不意的出现，挽救了质量普通的开场曲《派对》（Party），在《我

的宝贝让我改变》（My Baby Does Me）和《隐形人》这两首流行/放克曲中加入反复糅杂的吉他声，并让有齐柏林飞艇感觉的《哈舒格吉之船》（Khashoggi's Ship）听起来更加丰富（也只有皇后乐队才会用沙特著名花花公子和军火富商为灵感写一首歌曲）。“我记得我经常整天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处于极度抑郁状态中，”梅后来说，“我都很惊讶里面竟然有那么多吉他。”

莫库里在这张唱片里延承了他一向美妙的歌喉，依然没有丝毫衰弱的迹象。假如你知道这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的歌声，会更容易理解歌词中包含的深意。专辑同名歌曲《奇迹》是一曲爱与和平的颂歌，梅称它为“弗雷迪的迷你大作”。而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这一切是否值得？》（Was It All Worth It?）中，莫库里反思着财富和放纵、永恒追求完美的人生。《泰晤士报》称之为“一首风格怪异的体育场摇滚版《我的人生路》”。但其他媒体对这张专辑的称赞比较谨慎，《滚石》称赞《奇迹》“部分重现了皇后乐队的华贵之风”。

为推广专辑，乐队与英国广播公司DJ迈克·里德做了一场叫《皇后乐队一小时》（Queen for an Hour）的采访。被问及为什么不做巡演，弗雷迪说他想打破“专辑、巡演、专辑、巡演.....”的反复循环。“我就是这个行业里的搅局者。”他宣称。

《我全都要》发行后的几个月里，《奇迹》中另有四首作为单曲发行：《突破》《隐形人》《丑闻》《奇迹》。除了新的CD格式，百代还同时推出了12英寸的黑胶、盒式磁带和彩胶版本。只有后面两首没突破前二十名。然而，比起以往，制作宣传视频时他们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每部宣传片里，莫库里不是留着胡须就是蓄着很浓的胡须。“我懒得刮胡子了，”莫库里告诉媒体，“像切面包一样乏味。”根据吉姆·哈顿在回忆录《莫库里与我》中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胡须可以掩盖卡波西氏肉瘤斑块，效果比化妆要好。为了拍《突破》视频，皇后乐队定制了一截蒸汽火车头，让它奔跑在剑桥郡乡间，乐队就在车上拍摄。镜头里的莫库里特地拍得很健康：他挥舞着半截麦克风架，弹着假想的吉他独奏，双臂有力地甩动，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奇迹》视频中，皇后乐队找了表演学校的儿童演员来扮演自己，小男孩们全部穿着他们的经典舞台服装迷你复刻版。“拍那个视频真是开心，”泰勒回忆道，“我们全程都在微笑。”但是当真正的皇后乐队在结尾出现时，穿着“魔力”巡演黄色夹克的莫库里看起来明显比1986年老了不少——也更虚弱——好像时间突然加速了。

推广新专辑的任务落到了泰勒和梅身上。只是谈音乐倒是容易（主旨：皇后乐队现在“恢复了精神和活力”），但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德国记者直接询问泰勒，弗雷迪·莫库里是否患有艾滋病。“弗雷迪和以前一样健康，”鼓手坚持说，“我们之所以不做巡演，是因为我们无法就过程达成一致。其他的说法都是愚蠢的谣言。”无论当时鼓手是否已经知道真相，莫库里的队友们已经开始就他的健康问题守口如瓶。

完成《奇迹》之后，莫库里几乎没有休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于是他赶回蒙特勒，坚持要继续工作。1989年春天，《奇迹》尚未发行的时候，皇后乐队的下一步工作已经开始了。“我想我们都以为《奇迹》可能是最后一张了，”1992年布莱恩·梅说，“那时候已经不确定弗雷迪能够坚持多久。所以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坚持下去。”

据吉姆·哈顿说，就是这次在蒙特勒，莫库里终于向其他人公开了他的病情。他在一家餐馆中夸张地展示了病兆。“饭桌上有人感冒，话题转到了对疾病的咒骂上，”哈顿说，“弗雷迪看起来像没事儿一样，然后他卷起右裤腿，把腿抬到桌边，给其他人看他腿部那个疼痛的开放流血的伤口，说：‘你们还说你们有问题，喏，看看这个。’然后，就像他简短地提到这件事那样，弗雷迪很快又转到了其他话题。”然而，就像许多围绕着莫库里最后时日的传闻一样，这件事有很多疑点，一位匿名消息来源坚持说，主唱绝对不会身在公开场合透露这个消息。^[32]

“到了某个时间，他邀请我们所有人一起开个会，”2000年，罗杰·泰勒说，“把所有事实和盘托出，当然我们心里都大概猜到了。”“我们一意识到弗雷迪病了，就立刻抱团结成堡垒，把他保护起来，”布莱恩·梅回忆道，“我们对所有人撒谎，甚至是对自己家人都撒谎。弗雷迪不想让全世界侵扰他的抗争。他曾说：‘我不要人们买我们的唱片是出于他妈的同情。’”莫库里对吉姆·哈顿和花园小舍内部人士的要求，和对皇后乐队一样：一切照常运转。“必须要正常地对待他，”玛丽·奥斯汀说，“如果他发现你流露出悲伤，或者太过情绪化，他会把你推回到允许的界限。”

梅正在筹划另一张个人专辑；莫库里手里有未收录到《巴塞罗那》的歌曲，还有《奇迹》中未使用的素材。根据哈顿所说，“弗雷迪急于回录音室的渴求让皇后乐队其他人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他们都配合着，在1989年的头几个月里，乐队进行连续两到三周的爆发性工作；日

程安排部分取决于主唱的身体状态。不在乐队工作的时候，梅和泰勒似乎也没闲着，他们受邀翻唱了深紫乐队的《水上烟雾》和自己的《谁愿永生》，做慈善用途。不久后，泰勒开始在高山录音室与十字架乐队制作第二张专辑。

皇后乐队讽刺小报的《丑闻》才刚退出榜单不久，莫库里又再次上了八卦新闻头条。11月，《星期日镜报》（*Sunday Mirror*）误报说，弗雷迪主动提出要成为玛丽即将诞生的孩子的爸爸。当时玛丽怀孕数月，但她拒绝说出孩子生父的名字。同月，皇后乐队全员在电视特别节目《再见八十年代》（*Goodbye to the Eighties*）上公开露面，这是一档新年前夜播出的贺岁节目。皇后乐队从西拉·布莱克和年轻的乔纳森·罗斯手中，接受“过去十年最佳乐队”的奖杯。歌迷和评论家仔细观察着莫库里的外表和每一个动作。他站在舞台后方，让布莱恩·梅发表获奖感言，看起来并不像垂死之人。

月底，皇后乐队回到蒙特勒。莫库里已经遵照医嘱戒烟，他还坚持在录音室也这么做；布莱恩·梅本来就反对吸烟，特别是父亲去世之后，他自然很欢迎这一决定。往前几年，莫库里会觉得慕尼黑的混乱享乐比蒙特勒的平静生活要好；然而，现在的他却更愿意享受慢节奏的瑞士生活。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在特立特买了一套可以俯瞰日内瓦湖的顶楼公寓。

歌曲的创意汇集在一起，让布莱恩·梅产出了两首歌：一首是绝望的情歌《我不能和你生活》（*I Can't Live With You*），另一首是和《突破》类似的激情硬摇滚乐《轻率》（*Headlong*）。“原本我是准备把它放在我的个人专辑里，”他承认说，“但听到弗雷迪开口唱过后，我只能说：‘就该这样。’有时候把自己的宝贝交出去是挺肉疼的。”

莫库里的创作，就像往常一样，走两级路线：《黛利拉》（*Delilah*）是一首轻松诙谐的小曲，写给他家的猫咪黛利拉；另一首则是带有福音味道的《神的子民》（*All God's People*），原本是为《巴塞罗纳》专辑写的。约翰·布拉夫在汤豪斯录音室帮忙制作了这首歌的早期版本，他发现不管弗雷迪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仍然是那个一丝不苟的监工。

“当时它还是弗雷迪的个人专辑曲目，但是他让布莱恩来弹吉他独奏，”布拉夫说，“布莱恩加了一段很不错的独奏，但他觉得还能弹更好，于是又弹了一次。弗雷迪说：‘不行，我不喜欢。’于是事情就这么

继续下去，我可以看出来，布莱恩的状态越来越紧绷。又弹了一遍，弗雷迪说：‘哦，简直是垃圾。’大卫·理查兹、迈克·莫兰和我面面相觑。气氛一度很可怕。再弹一遍，弗雷迪评价说：‘哎，给力点啊！你和你那把壁炉板吉他.....好好用心弹！’然后布莱恩纵情放手一搏，果然，弗雷迪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他知道布莱恩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在给他施加推力。”

梅、泰勒和迪肯在蒙特勒赌场音乐厅的一次随性合奏，促成了专辑标题曲目《暗讽》（*Innuendo*）的诞生。这首歌长达六分三十秒，是类似于《骗子》或《先知谣》那样的皇后式恢宏长曲。莫库里以崩塌的群山、破碎的巨浪作为开篇，全曲仿佛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克什米尔》（*Kashmir*）与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Bolero*）的碰撞。“是”乐队的吉他手史蒂夫·豪威到访录音室，结果被邀请进来弹了原声吉他。“它是一首非常奇特的歌曲，”梅后来说，“就像一个幻想冒险世界。”这首歌的标题来源则没有那么神秘。“这是一个我喜欢在拼字游戏里用的词。”莫库里透露道。经典皇后风格的《暗讽》专辑还有一年才会制作完成发布，当年12月份百代便发行了《皇后乐队在英国广播公司》（*Queen at the Beeb*），是一张他们从1973年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录制过的歌曲合集，有种奇怪的未卜先知的感觉。^[33]

皇后制作公司宣布，1990年为乐队成立二十周年，虽然事实上他们是在1981年庆祝十周年的。2月18日，乐队终于获得百代期待很久的英国唱片工业大奖（*BPI Award*）。颁奖典礼在伦敦领土剧院举行。自他们的影像出现在短片《再见八十年代》中后，莫库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伴随着《绝代艳后》的音乐声，弗雷迪带领乐队上台。宽松的西装罩住消瘦的他，头发稀疏了一些，剃光胡须的脸扑着很厚的粉，显得有些憔悴。仍然由梅发表获奖感言，泰勒说了一句简短的话之后，莫库里有些犹豫地靠向麦克风，轻声说“谢谢你们，晚安”，然后就走下台消失在侧翼。

随后在苏豪区的格劳乔俱乐部举办成立二十周年派对，三百多名宾客齐聚一堂。房间里，莫库里和莱莎·明奈利合影，皇后乐队的第一位制作人约翰·安东尼说过，她是弗雷迪最喜欢的电影《歌厅》的主演。循着八卦气味而来的记者聚集在外，一位新闻摄影师拍下了主唱离开俱乐部的照片，他的样子看起来实在糟糕。乔·法内利向报纸投诉说，莫库里只是“有点不高兴，就像人人都会的那样”，但媒体充耳不闻。关于莫库里健康状况的猜测仍在持续。

1984乐队（除了蒂姆·史塔菲之外）在贝斯手戴夫·迪洛韦家里重聚，梅找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布莱恩一点没变，”戴夫说，“他坐在那，即使周围议论纷纷，他只管自顾自的。当时他一定已经知道弗雷迪患病的事情。”

不久之后，乔·法内利透露了自己患上艾滋病的消息。弗雷迪和乔认识差不多十五年了，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关系结束后，法内利留下来成了莫库里的厨师。莫库里知道自己离世之后，乔必然会离开花园小舍，于是提前给他在伦敦奇斯威克买了一栋房子。这一年里他将连续做出几次类似的慷慨之举，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吉姆·哈顿去做了一次秘密的检测，结果他也是HIV阳性。“我懵了，”他后来说，“但我没有告诉弗雷迪。他要忧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没过多久，为了方便哈顿和彼得·弗里斯通为他进行输液药物治疗，莫库里在胸前植入了希克曼导管。

莫库里的队友们只能默默等待他们的主唱恢复能够工作的状态。梅开始为伦敦河畔剧院^[34]的《麦克白》（*Macbeth*）创作音乐，泰勒则回到自己的乐队里唱歌。3月，十字架乐队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极恶不宜知》（*Mad 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泰勒找百代签了一份合约，并开放歌曲创作权给所有乐队成员。这张专辑的声音更硬摇滚，其中的《世界顶峰》（*Top of The World*）有点像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全然的爱》（*Whole Lotta Love*）。相比第一张《推翻它》，它有了明显的改进，但是这个乐队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我自始至终没能让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团体，”泰勒抱怨说，“每个人都写歌，赚到的钱大家平分，真的不是罗杰·泰勒的个人项目。”这张专辑没进排行榜，而且每次十字架乐队接受采访，话题总是绕到皇后乐队、弗雷迪.....

7月的时候，皇后乐队转到伦敦大都会录音室^[35]工作，这里的老板是他们曾经的工程师盖瑞·兰根。皇后乐队第一次在录音室里试听《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盖瑞也在场。1985年他就站在“拯救生命”舞台的侧翼（“到我翘辫子那天，那都是值得我带进坟墓的经历之一”）。兰根对传言有所耳闻，莫库里的外表变化令他震惊。“他看起来备受疾病的折磨，”他说，“我们在大都会录音室正好碰上，聊了几句，但他尽可能地保持着隐私。气色确实不太好。”

8月，弗雷迪的妹妹卡什米拉心中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被哥哥亲口承认。“我确实怀疑他得了艾滋病，”她后来告诉《每日镜报》，“可是我无法开口问一个濒死之人，所以我只能等着，看看他是否愿意告诉

我。”卡什米尔是在瞥见哥哥脚上的伤口时才意识到的。“他选择了这个时刻说：‘是这样，亲爱的，你一定知道我快死了。’”就像对最亲密的朋友和乐队成员一样，莫库里也坚持让妹妹不要提起这件事。而对于父母，他到最后都没有明说。“他非常爱我们，尊敬我们，不想让我们伤心，”2000年时婕尔·保萨拉解释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也不想让他难过。”

到了这个时候，从花园小舍往返大都会录音室的路途中，主唱要不断躲避狗仔队追拍。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明星文化中的我们，很容易忽略在那个年代，媒体对一个流行歌星追踪到这种地步有多么不寻常。皇后乐队在“拯救生命”之后再度飙升的知名度，加上围绕着艾滋病的种种歇斯底里和错误信息，十分凶险。不管莫库里保护得多么密不透风，现在他外貌身形上的变化已经明显到无法掩饰。《每日镜报》的记者抓拍到一张他看起来很虚弱的照片，布莱恩·梅告诉媒体说“弗雷迪没事.....他绝对没有得艾滋病，我觉得是他狂野的摇滚生活方式对身体有点影响.....”但梅的声明完全转移不了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几天后，《世界新闻报》又刊登了一张照片，消瘦的莫库里和他的全科医生戈登·阿特金森离开伦敦一家餐厅。不久后，美国媒体引述被皇后乐队永久驱逐的保罗·普伦特对前老板健康状况的猜测：“我非常担心可能就是艾滋病。”

一天下午，录音室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被叫到花园小舍。“每年乐队都会为粉丝俱乐部录制一段信息，”他说，“弗雷迪想让我去帮他录他的信息。彼得·弗里斯通叫我中午到家里去。我到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说弗雷迪上一个会超时了。”等到1点半，莫库里终于来了，身体状态明显不大好。“他看上去很疲惫，病得很厉害，”布拉夫说，“但是精神上他还是像以往一样，依然有那种冷幽默。我们到了一间空着的卧室。他拿着舞台用的麦克风加半截架子，我们录了一小段歌。那天很热，所以窗户开着，每次他开始唱歌的时候，外面工地的工人就开始打钻。弗雷迪就说：‘哎呀我操！’很好笑。我们用合成器加人声做完了这段，然后他说他需要去休息一下，混音就交给我了。之后，彼得让我拿发票找他们报销，我说：‘哎，不用给了。’几天后，他们叫我再过去，我到那儿，彼得递给我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哈罗德百货的羊毛衫。这是弗雷迪表达谢意的礼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皇后乐队开始准备推广《暗讽》时，主唱的健康状况仍然是一个问题。1991年1月，他们先发行了与专辑同名的那首史诗般的单曲。“是有

风险，因为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太长了，太庞杂了，我们不想在电台里播放’，”布莱恩·梅说，“感觉就像《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一样。”比起《一种魔力》这样的流行金曲，《暗讽》有很大的不同。歌曲的前奏听起来像是一段重金属的葬礼进行曲，而中段的弗拉门戈吉他就像是从另一张唱片里突然插入进来的。也许对电台节目编导来说是个挑战，但它无疑让皇后乐队的老粉十分喜悦，感觉就像《歌剧院之夜》的重现。

超出预期的是，《暗讽》为皇后乐队再度拿下英国榜单冠军，上一次还是《压力之下》。随之而来的宣传视频使用了动画和从前的镜头拼接剪辑的方式，乐队成员的绘画形象以不同艺术家的风格出现，例如毕加索、达·芬奇和波洛克。就像蒂姆·史塔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为前队友罗杰·泰勒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绘制封面一样，一个类似的巧合发生了，被委托制作《暗讽》的一位画师叫作杰里·希伯特，他是史塔菲和弗雷德·保萨拉在伊林艺校的同学。希伯特询问视频被制作成动画，是不是因为他的老校友已经病得无法出场，他被告知说弗雷迪没有生病。皇后乐队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越过这条底线。

《暗讽》专辑紧随其后在2月发布。就像单曲一样，皇后乐队对专辑封面的构思也像是回到了过去。罗杰·泰勒挖到一本十九世纪艺术家让·格兰德维尔的插图书，他建议使用其中的一幅画。选中的这幅是格兰德维尔的插画《宇宙杂耍者》（*A Juggler of Universes*），由理查德·格雷手工上色，调整成为《暗讽》的专辑封面。开篇的同名歌曲让皇后乐队重金属粉丝倍感愉悦，其他的歌曲则比以往还要风格各异。不同之处在于，《暗讽》似乎比《世界新闻》专辑之后的任何一张专辑都具有整体感。尤其是以布莱恩·梅为首的主导力量。“在《暗讽》的时候，其他人都有些情绪不稳定，我稍微振作一些，”他解释说，“我可以比较投入地写更多东西。”就像他自己写的《轻率》和《我不能和你生活》一样，梅在狂躁的重金属歌曲《杀手》（*The Hitman*）和《神的子民》中的表现同样抓耳，另一首灵感来自杰夫·贝克的《瑰宝》（*Bijou*）则更是他的吉他声加上莫库里嗓音的出色表演。

虽然每首歌都集体署名作“皇后乐队”，但往往还是很容易听出作者是谁。莫库里的《黛利拉》纯粹是填空，泰勒的《乘风前行》（*Ride The Wild Wind*）也有类似感觉，听起来很像《一种魔力》里《别失去神智》的翻版。《暗讽》里最让人听过即忘的是莫库里的《不要太用力》（*Don't Try So Hard*），一首凝重忧伤的歌谣。唯独在《暗讽》中

不见踪影的是之前由约翰·迪肯带进皇后乐队的放克风格。贝斯手最近在法国滑雪胜地比亚里茨买了一套度假公寓，似乎从雪坡上滑下的吸引力超过了大都会录音室，他缺席了一些录音时段。

《暗讽》里还有三首明显适合作为单曲发行的歌曲；它们将会映照进莫库里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当时没有人知道终结即将到来。《渐入癫狂》（*I'm Going Slightly Mad*）是一首离奇的流行歌曲，歌词中满是文字游戏。《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是罗杰·泰勒写的优美抒情诗，字里行间不免让人意识到，它其实是皇后乐队在回忆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布莱恩·梅的《精彩必将继续》（*The Show Must Go On*）有着《谁愿永生》那样的波澜壮阔。“我和弗雷迪一起坐下来决定主题是什么，然后写了第一节，”梅告诉《吉他世界》（*Guitar World*）杂志。“那首歌啊，包含着很多的故事，我始终觉得它特别重要，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应对的事情无法通过语言互相表述，却可以用音乐表达。”梅痛苦地意识到，他的这位挚友就要离世了，他想这首歌的暂定名称是不是要改一下，但莫库里仍然像任何时候一样，坚持说他没事。“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有人关心到他身体或是精神上的虚弱，”泰勒说，“他不需要怜悯。”

媒体评价方面，《暗讽》和《奇迹》一样，毁誉参半。《泰晤士报》称赞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对过往青春的一曲毫无保留的惆怅回忆”，又写道“专辑似乎没有什么格调，更别说品味了”。《Q》杂志小心地为皇后乐队代言了一次，同时又强调了其他人没有注意的皇后乐队的另一面：“显然，他们对待工作是一本正经的，但对待自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追随单曲脚步，这张专辑也在英国榜上排到第一名。然而在美国，它却在三十名停滞不前。虽然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他们在美国的销售一直落后，但现在乐队的情况将会有所变化。1990年有大半年时间，吉姆·比奇都在就皇后乐队和美国国会唱片公司解约一事进行谈判。11月，乐队与好莱坞唱片公司（*Hollywood Records*）签署了一份新的美国合约，这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子公司。据说好莱坞唱片的总裁彼得·帕特诺以1000万美元从美国国会公司买下了皇后乐队。

新厂牌得到的一个好处是拿到了皇后乐队的作品。1990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购买新出的CD来替换之前的黑胶唱片，好莱坞唱片计划把皇后乐队以前的专辑全部进行数字重制和再次发行。尽管如此，一些音乐行业的内部人士还是看不懂，为什么好莱坞唱片要花那么

多钱买下这支乐队，因为他们自198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美国进入前二十名的专辑了。人们猜想，好莱坞唱片公司是不是了解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有关皇后乐队未来的事情。

美国新厂牌名下的《暗讽》专辑上市派对于2月在加利福尼亚长滩的玛丽皇后号游轮上举行。宾客们享受着免费的美酒，观赏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乐队只来了两个人。连皇后乐队的老友们都感到困惑。“马克和我应邀参加了玛丽皇后号的这次聚会，”弗雷德·曼德尔回忆说，“我们过去一看，只有罗杰和布莱恩在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这种场合乐队四人都是一起出现。马克和我本来就有点疑惑，视频里的弗雷迪看起来很瘦，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想就更奇怪。我试着打电话给弗雷迪，但是没有回音，于是我又打电话给约翰，但他对此守口如瓶。”

迪肯和莫库里的缺席以“家庭原因”为借口搪塞过去。泰勒和梅这两位从微笑乐队时代就在的最初皇后乐队成员，要再次承担起现身媒体采访的重任，编织谎言来堵住他们的嘴。梅和泰勒的洛杉矶之行期间，《公告牌》（*Billboard*）杂志的戴夫·迪马蒂诺是采访过他们的记者之一。“他们尽职尽责地承担着这项最尴尬的任务，”迪马蒂诺说，“谈论的都是生意，而不是艺术。”整个行程中，两人不断称赞新厂牌（“好莱坞唱片公司精通业务，”泰勒说，“正是我们感觉需要的。”），推广新专辑（泰勒：“某些方面它确实会让我想起《歌剧院之夜》”），并回应最近说唱歌手维尼拉·艾斯的流行歌曲《冰雪宝贝》（*Ice Ice Baby*）引发的争议，因为这首歌用了《压力之下》的贝斯线。（梅：“他应该经过我们允许才能使用，但他没有找我们。”）

被问及为什么皇后乐队连续五年没有现场演出，他们只能被迫抛出一些常用的借口。“弗雷迪发现巡演在精力和体力上都有难度。”梅主动说。“他不喜欢被看成是一个舞台上的摇滚老人。”鼓手接过去补充道。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时，当被问到皇后乐队还会不会再有现场演出时，梅的表情溢满苦恼，“再出去巡演只能是我最美好的梦了。”他叹了口气，仿佛肩头压着难以承受之重。

3月，《渐入癫狂》作为单曲在英国发布。宣传视频中，皇后乐队穿着奇装异服，场景中还有一位扮成大猩猩的人，以及一队憨态可掬的企鹅。莫库里头戴蓬松的假发，双手戴着白手套，笼在故意做得不合身的西装里，好似一位卓别林时代的默片电影明星，但悲伤的是，他看起来也像一位十九世纪感染了肺病的诗人。脸上叠着好几层白色粉妆，让

他显得更加憔悴；在服装下面，他其实还穿了一层衣服，才能撑得起体重骤减的身形。“到了那个时候，一看就知道他病得很重了。”泰勒承认说。

皇后乐队的公关部门发了一段有趣的花絮报道以转移八卦新闻的注意力，报道说弗雷迪正坐在片场沙发上，他身旁的一只企鹅突然撒了一摊尿。“现在这里需要一点皇后乐队的癫狂，”情绪高涨的莫库里宣布，“别费心去质疑我们是否还有理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表受到的关注大于歌曲本身，这首单曲连前二十名都没有进。

就像在做完《奇迹》之后那样，《暗讽》一旦完成，莫库里便指示他的队友们，他要继续工作。一趟短途私人飞机，他就能去往瑞士蒙特勒，逃离伦敦媒体不断的骚扰。在高山录音室，只要他感觉身体能支撑他就开始工作。布莱恩·梅回忆道，“弗雷迪只是说，‘我要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一切照常，一直干到我妈倒下的那天。我就想做这个。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我，并且在这件事上我不想做任何讨论。’”原本的计划是录一些B面歌曲。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手头的材料已经足够制作一张录音室专辑。永远高效务实的莫库里此时心意已决，皇后乐队应该在情况还允许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从他这里得到音乐。

乐队每周工作两到三天，录制了一批新曲目，包括《你别耍我》（You Don't Fool Me）、《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这是莫库里写的最后一首歌）和《母爱》（Mother Love）。现在普遍认为，5月22日《母爱》的一次录音是弗雷迪的歌声最后一次被记录。在录音室里，他让自己更努力地唱这首歌里难唱的中八度，并认定这里要用更高的声调唱。“弗雷迪唱到某个点上，然后说‘不，不，不.....还不够好！这里我必须唱得更高。我需要投入更多力量才行’。”梅回忆说。几杯伏特加酒喝下去之后，莫库里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梅说：“他站起来，发力开唱。那时候，他甚至不撑着东西靠自己都站不起来了，他为我们竭尽了全力。”

“他想要制作音乐到最后一刻，”大卫·理查兹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境况，但对弗雷迪来说尤为如此。但是他真的想要把这个项目做完，即使他知道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两周前，皇后乐队发布了躁动狂暴的新单曲《轻率》。它在英国排行榜上名列第十四位。在歌曲的视频中，整个乐队看起来都突然苍老，甚至平时淘气搞怪的泰勒也是。日渐消瘦的莫库里穿着运动衫，衣服松

松垮垮，但是他依然摆着造型，对着镜头咧嘴而笑，好像试图让世界相信一切都在照常运转。

5月31日，最后一次在高山录音室录音的一周多之后，莫库里出现在伦敦片场，拍摄了最后的视频影像。好莱坞唱片指定《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作为下一首单曲在美国发布。布莱恩·梅此时人在洛杉矶宣传《暗讽》专辑，泰勒、迪肯和莫库里先到伦敦的莱姆豪斯工作室^[36]为这首歌录制视频（梅的影像之后会剪辑进去）。这时候，莫库里脚跟上未愈合的伤病让他连走路都很痛苦，以至于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无法挪动双脚。虽然视频做成了黑白片，但莫库里身体的衰弱状况已经不可能被掩盖。在视频的最后一段，他低声说出那句饱含深情的歌词“我依然爱你”，眼睛看着镜头，仿佛一幕他钟爱的好莱坞女演员在电影中的表演。只要见过这个视频，任谁都能看出来，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8月，保罗·普伦特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他的死亡敲响了冷酷的警钟，提醒弗雷迪自己也时日无多。吉姆·哈顿进行了第二次HIV检测，结果和上次一致。这一次，他选择告诉莫库里。主唱在花园小舍安排了一次安静的晚宴，度过四十五岁生日。他的社交圈子不断缩小，只剩下紧密团结的一小撮人。昔日的玩乐朋友芭芭拉·瓦伦汀和彼得·斯特雷克已经不在此列，仿佛他们会让他想起那些再也无福消受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的来访请求也会被他婉拒（“亲爱的，我今天看起来不太好”）。取而代之的都是少数莫库里依赖和信任的朋友和手下：常驻花园小舍的小团队、迈克·莫兰、戴夫·克拉克、他的司机特里·吉丁斯，以及一直都在的玛丽·奥斯汀。生日过后不久，他起草了一份遗嘱，任命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比齐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10月份，百代加快行动，发布了《皇后乐队最佳金曲II》（*Queen's Greatest Hits II*）和两部视频合集：《最佳影像II》（*Greatest Flix II*）、《影像珍藏盒装》（*Box of Flix*）。在如此密集的发行中，又加上一首皇后乐队的新单曲《精彩必将继续》。这歌名实在很应景。莫库里病得太重，无法拍摄视频，乐队不得不使用旧影像进行剪辑。这首悲壮的歌曲充分地反映了乐队现在的状态。这就是弗雷迪·莫库里，这就是他最震撼心灵的绝唱。

11月初，主唱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宣布不再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他选择了执行自己的死亡。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奥斯汀相信，“他给自己设了一个限。我个人认为，到了他不能再录音或者再也没有力气录音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这时候媒体记者已经在他的住

所外面生了根。彼得·弗里斯通抗议说，“弗雷迪成了关在花园小舍高墙里的囚犯。”蒙茨拉特·卡巴耶请求来与他见面，莫库里拒绝了，他不想让她受到骚扰。

莫库里的父母、妹妹及家属，还有他的两位队友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来看望过他。据吉姆·哈顿说，泰勒和梅分别都打过几次电话到家里来。有一次鼓手在屋外停车，被端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的闪光灯晃花了眼，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警车车尾上。对于爱操心的梅而言，他脑子里还装着另一件事。吉他手终于做完了他的个人专辑，原计划会在一周内发行一首单曲。他知道弗雷迪随时可能去世，担心这时发行看起来像是在拿死人牟利。梅请吉姆·比齐打开这个话题。主唱在生死关头，依然保持着尖锐的幽默：“弗雷迪说：‘要是正发着，我突然去了，不是正好给你带来额外的宣传嘛。’”

11月21日，星期四，莫库里让彼得·弗里斯通打电话叫吉姆·比齐过来。第二天早上，比齐来花园小舍见弗雷迪，两人开了五个多小时的会。根据弗里斯通的说法，“弗雷迪和他（比齐）决定，是时候发表一份关于弗雷迪艾滋病状况的声明了。”得知这个消息，花园小舍的人都很震惊，因为在莫库里的要求下，他们数年来不断向朋友和家人撒谎。吉姆·哈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推测，莫库里是被说服同意的，因为他意识到这么做可以在他死后杜绝任何报纸媒体的所谓独家新闻。“他不想被剥夺自己宣布这件事的权利，”罗杰·泰勒解释说，“这么做绝对正确，时间点也再恰当不过。”

“弗雷迪在世的最后三个星期十分煎熬，只要他在家，墙外面就是一团糟，”布莱恩·梅说，“媒体二十四小时守在他家外面。他真的像是被追着逼近生命的尽头。我认为，假如他更早一些宣布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情，这种待遇还会更早发生。”

虽然八十年代初那种谈艾滋病色变的情绪已经有所消退，但1991年，在许多人眼里艾滋病仍然被钉在耻辱柱上，是只有同性恋才得的“同性恋传染病”。莫库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也清楚他患病的消息将会对他的队友，他们的妻子、女友和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莫库里的一位老朋友说，“弗雷迪非常害怕公众会对这些人做出什么反应。”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方面一样，莫库里选择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一刻。

皇后乐队的公关洛克希·米德在周五午夜时分发布了莫库里官方声明：“仅就过去两周里媒体的大肆猜想，本人在此确认：我的HIV检测

结果为阳性，已罹患艾滋病。为了保护我身边人的隐私，我认为将这个信息保密至今是正确的选择。不过，现在到了让我的朋友们、全球各地的歌迷们了解真相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我的医生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医疗人员并肩作战，抗击这种可怕的疾病。”

11月24日，星期天的早晨，《世界新闻》的报纸头版刊登了这样的新闻：《弗雷迪：我得了艾滋病——皇后乐队巨星的苦痛》。弗雷迪·莫库里在这场与媒体的斗争上打了一场小胜仗，不早不晚。就在新闻发布当天的下午6点48分左右，这位本名叫作弗罗可·保萨拉的摇滚巨星离开了人间。

[1] Sir John Hurt (1940—2017)，英国著名演员，出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曾饰演《哈利·波特》电影系列中的奥利凡德和《神秘博士》科幻剧五十周年特辑中的战争博士。

[2] 这首歌是《太年轻》(Too Young)，收录在艾尔顿·约翰的专辑《火上冰》中。

[3] 英文名为“Virginia Wolf”。

[4] 英文名为“Wham!”。

[5] Jane Seymour，英国女演员（后加入美国籍），曾出演过007系列电影中的邦女郎，成名作有《时光倒流七十年》等。

[6] Lesley-Ann Jones，传记作者，著有《弗雷迪·莫库里传记：权威版》(Freddie Mercury: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一书。

[7] 英文名为“Town house”。

[8] 英文名为“Maison Rouge”。

[9] 英文名为“The Cross”。

[10] 英文名为“Airrace”。

[11] 英文名为“Magnum”。

[12] 英文名为“The Immortals”。

[13] 英文名为“St James' Park”。

[14] 英文名为“Maine Road”。

[15] 英文名为“Knebworth Park”。

[16] 英文名为“Simply Red”。

[17] 英文名为“Paris Hippodrome”。

[18] 英文名为“Marillion”。

[19] 十三年前，还未成名的弗雷迪·莫库里正是用对应的化名拉里·卢勒克斯翻唱并发布了

他的歌曲《回归》。

[20] 英文名为“Neptstadion”。

[21] 2012年皇后乐队将该演唱会和幕后花絮制作成DVD和蓝光发行，并在院线限量上映，名称为《匈牙利狂想曲：皇后乐队布达佩斯演唱会》（Hungarian Rhapsody: Queen Live in Budapest）。名称借用了李斯特谱写的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和皇后乐队创作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22] 英文名为“Big Country”。

[23] 英文名为“Bad News”。

[24] 英文名为“The Platters”。

[25] 《旧约·列王纪》里出现的阿拉伯半岛女王，和所罗门王产生过恋情。

[26] 这里原文应该描述有误，按彼得·弗里斯通的回忆录里的描述和卡巴耶口述，弗雷迪并不知道卡巴耶会在歌剧院表演这首歌。莫兰和卡巴耶事先秘密排练过，当场临时加演，给了在场观众和弗雷迪一个惊喜。卡巴耶向众人指出歌曲作者的座位，弗雷迪迫不得已站起来亮相，随即坐回去窘迫得捂脸。

[27] Sir Tim Rice，英国最著名的词作者之一，横跨音乐剧、影视、流行音乐界的作词大师，安德鲁·韦伯的长期合作者，还参与过迪士尼电影《阿拉丁》《狮子王》《美女与野兽》中主题曲的歌词创作。

[28] 英文名为“Ku Club”。

[29] 英文名为“Morris Minor and The Majors”。

[30] “汤米”的英文名为“Tommy”，是谁人乐队在1969年发布的歌剧摇滚先驱专辑，弗雷迪十分喜爱。《茶花女》指经典歌剧，《猫》和《时间》都是西区著名音乐剧。

[31] 英文名为“The Cult”。

[32] 梅在他2017年出版的《皇后乐队3D图片传记》（Queen in 3-D）中证实了这件事。

[33] 2016年，皇后乐队将英国广播公司录音室录制的全部歌曲、电台播放的部分采访及演唱会片段收录在一起，发行了《广播作品》（On Air）合集。

[34] 英文名为“London Riverside Theatre”。

[35] 英文名为英“Metropolis Studios”。

[36] 英文名为“Limehouse Studios”。

第十一章 库藏的名车

我们不想到老的时候，有钱却没用。

——罗杰·泰勒

弗雷迪·莫库里去世的地点，离二十一年前他的偶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只有不到4公里远。当时，莫库里和罗杰·泰勒为了悼念亨德里克斯，关闭了他们在肯辛顿市场的摊位。那是1970年，谁又会料到，莫库里自己的死亡引起的轰动会比亨德里克斯大得多。他过世的第二天早晨，《太阳报》首页整版是他的大幅照片，双手在身后撑开一面英国米字旗，头条标题写着《弗雷迪死了》。各种大报、小报、电视台、广播电台都以某种夹杂着沉重哀悼和好奇窥视的态度关注着，让整件事蒙上了一种下个世纪才有的娱乐新闻色彩，当代明星娱乐文化就要到来了。

虽然有将近五十名记者和摄影师日夜蹲守在花园小舍外，莫库里死亡的消息却没有立即公布。星期天傍晚时分，弗雷迪的医生戈登·阿特金森告诉家里照顾他的朋友们，弗雷迪大限将至，但也许还能撑过这几天。阿特金森刚走出门没几分钟，莫库里就去了。乔·法内利从房子里冲出来，拦下阿特金森的车，无意中惊动了媒体。

在阿特金森签署的死亡证明上，死因写着“艾滋病引发支气管炎”。彼得·弗里斯通填写了文件的其余部分。不过，他填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莫库里，又名弗雷德里克·保萨拉”，没有提及他的真名弗罗可。

根据弗里斯通对那天晚上的描述，是他通过电话向玛丽·奥斯汀、莫库里的父母和吉姆·比齐告知了这一消息，比齐前一天才刚刚飞去洛杉矶。很快大家又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宣布弗雷迪死亡的声明将由皇后乐队办公室发布，但要等到午夜。弗里斯通的父亲是附近兰德布鲁克陵园的殡仪馆主任，由他安排后事。事情很快通知了警方，设置起临时路障，以争取关键的十几分钟拖住赶来的媒体，让殡仪馆的灵车可以开过来运走遗体。

莫库里的家人和密友得到通知的同时，他的乐队队友们也得知了死讯。“事情发生的那个晚上我整个人是麻木的，”布莱恩·梅后来说，“我们全体见面商量。然后到第二天，我完全崩溃，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哭。”果然，莫库里临死跟吉他手开的玩笑，说他的死会对生意有益应验了。百代推迟了几天才发行布莱恩·梅的新单曲《被你驱动》（Driven By You），这首歌原本是为福特汽车电视广告作的配乐。它拿到了榜单第六位。

在约定好的时间，皇后乐队向媒体发表了集体声明：“我们失去了

最伟大和最受爱戴的家庭成员。我们因他的离去感到巨大的悲痛，也为他的盖世才华就此中断而痛惜不已，但最重要的是，他无畏的人生和面对死亡的勇敢令我们无比骄傲.....我们会尽快积蓄力气，以他习惯的方式来赞颂他的一生。”

彼得·辛斯这时候已经是一名摄影师，他曾为莫库里的个人专辑拍摄过封面照片。由于不知道弗雷迪得的其实是艾滋病，在他去世当晚，辛斯还想着要给主唱写一张开玩笑的贺卡（“赶紧的，快好起来啊，老混蛋.....你懂的”）。他最后一次见到莫库里是在皇后乐队二十周年庆祝派对上。“弗雷迪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他说，“你可以跟他走得非常近，但他从来不让自己感情外露。我替他打工的时候，别人会背地里跟我说，‘噢，他真的很开心有你在，他出去巡演一定会带着你。’但他绝对不会当面跟我这么说。他这一走，我觉得人生有一大块突然没了。”

那些在莫库里还是弗雷德·保萨拉的时候就认识他的人，对他们来说，又另有一番感悟。“总是会有那种想法，”一位以前的好友说，“应不应该打电话给他？是不是可以试着保持联系？但是现实摆在眼前，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不想成为攀附名流的人。有时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我也会想，他是否还是多年前我认识的那个人。”

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莫库里嘴里例行地跑着火车，说死后“要和我所有的宝藏一起埋葬，就像图坦卡门法老一样”。私底下，莫库里告诉朋友们，他想被火化。虽然已经将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出生时的名字和许多过去抛在脑后，但这件事他却遵循着帕西人的传统和父母的意愿。遗体告别仪式尽可能快地安排在11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点，在西伦敦肯萨尔格林火葬场举行。

葬礼前一天，《每日镜报》头版刊登了戴夫·克拉克的讲述，标题是《弗雷迪：临终时刻》。文章配图是克拉克出现在花园小舍的门口，被悲痛的歌迷们献上的花束包围。故事称——有人说并非实情——莫库里的卧室里放置着氧气帐，并且24小时有护士陪伴以减轻他的痛苦。克拉克的故事之外，玛丽·奥斯汀又有另一个版本，《镜报》称奥斯汀“自视为弗雷迪之妻”。玛丽透露了弗雷迪在最后几个小时里身体状况的迅速衰退：“他甚至已经不能说话，很快连看也看不见了.....”她还说，是她把莫库里去世的消息告知他的父母。这两个故事中的某些内容让有些人愤懑，特别是吉姆·哈顿。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的不合和矛盾。

莫库里的私人生活本就十分复杂，再加上皇后乐队与媒体之间多年的摩擦关系，让葬礼当天出了更多问题。虽然皇后乐队谴责记者在莫库里生命的最后几周对他紧追不放，但皇后乐队办公室却又安排了专门拍摄名人的摄影师理查德·杨，在葬礼仪式举办前后进出花园小舍拍照；这一决定让哈顿十分厌烦（“剥夺了我们最后的一点私密时间”）。杨虽是乐队少数信任的摄影师之一，但是他也遭到过布莱恩·梅的抱怨，因为他将莫库里私人派对上梅与安妮塔·多布森的合照卖给了媒体。

玛丽·奥斯汀要求戴夫·克拉克和她共乘葬礼车队的头车，却没让哈顿同乘。哈顿、弗里斯通和法内利都被降级坐到后面的车里。这些年来，与弗雷迪有重要关系的另一位仅有的女性，芭芭拉·瓦伦汀，被告知不用来参加，只能待在慕尼黑那栋她和莫库里一起买下的公寓里。大约四十五位客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告别仪式，包括莫库里的乐队成员、家人和朋友，艾尔顿·约翰也在其中。

殡仪馆外面，皇后乐队的粉丝送来的花环和花束铺满了地面。内部教堂里，两位帕西教士用古老的阿维斯坦语言吟诵出琐罗亚斯德经文，祈祷仪式持续了二十分钟。某家报纸指出，根据帕西教律，按传统，遗体“应该要留给秃鹫清理”。实际当然不会那么处理。弗雷迪的棺材随着艾瑞莎·富兰克林的歌声被缓缓抬进火葬区。之后，现场响起蒙茨拉特·卡巴耶的歌声，伴随着她演唱的威尔第歌剧《吟游诗人》（*Il Trovatore*）中的《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D'Amor Sull' Ali Rosee*），弗雷迪·莫库里就此退场。“我全心全意地活过，就算明天会死，我也无所谓，”莫库里曾经对一位采访者说过，“我这辈子活得精彩，要做的真的都做了。”

葬礼结束第二天，《每日镜报》的毒舌批评家乔·海恩斯写了一篇专栏，诋毁莫库里是“一个弯了的男人——这个评价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他有不正常的性欲追求，是个堕落腐败的吸毒者”，并总结说“他的私生活是一部令人反感的关于堕落、纵欲和邪恶的故事……像他这种人，艾滋病无异于是自杀的方式”。

皇后乐队积极地希望莫库里的死能够唤起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但围绕着它仍然有着太多的污名、太多的恐惧，因为当时很容易得上此病。随后几天，媒体称呼艾滋病是“同性恋疾病”，布莱恩·梅对此说法大加批驳。“他们说什么，‘弗雷迪得了艾滋病是因为他滥交，我们普通人不用担心’，”他气愤地说，“把这种言论印出来，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我没事’，隔天他们就会发现HIV呈阳性。”

因为失望和愤怒，他决定在葬礼后仅一周便接受公开电视采访。梅和罗杰·泰勒出现在通用电视台（GMTV）早餐时段的节目上，回答主持人迈克·莫里斯的问题，他们看起来依然处在强行恢复神智的状态。“八卦小报对他的描述让我们感到非常愤怒，”梅抗议道，“他既没有四处胡搞，也没有吸毒成瘾。”弗雷迪自己说过许多戏言（“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儿，每天早上起来挠挠头，想想看今天要干谁”），让他们说服公众的任务更加困难，其中不少话都被报纸幸灾乐祸地截取下来，断章取义地转载。莫库里自己塑造的舞台形象太成功了，以至于外界许多人很难将他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传奇巨星”与梅努力描述的“害羞、善良、温柔的人”等同起来。

梅和泰勒坚定地认为，莫库里让全世界知道他罹患艾滋病，是想要提高人们的认知；两人都费了不少口舌，谴责媒体报道中普遍存在的恐同心理。但很明显，莫库里生前对隐私的需求也给他的队友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弗雷迪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梅说，“我们尊重他，让他处理自己的生活。但是这样我们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封口，不能和朋友谈论这些事……”“你们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们都不是很了解他？”迈克·莫里斯试探着问。泰勒给出的回答为皇后乐队的集体心态做了总结：“作为一支乐队，二十二年里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但就算我们也不知道弗雷迪的许多事，他是个谜……但是我们将义不容辞地捍卫他的名誉，因为他再也不能为自己发声了^[4]。”为了正名，梅也明确表示，莫库里去世前处在“一段稳定、充满爱的情感关系中……有三个非常关心他的人一直陪着他直到最后。但是没人提到这一点”。这是对花园小舍中他的朋友和照料者的一次难得的公开承认。

这次电视采访还出现了一幕黑色喜剧。当时，摄像机镜头转过去拍到节目的另一位嘉宾，电视魔术师保罗·丹尼尔斯。“保罗，你是皇后乐队和弗雷迪·莫库里的粉丝吗？”另一位主持人凯瑟琳·霍洛威热心地问道。“呃……不是。”他耸了耸肩，然后开始漫不经心地解释说大多数流行音乐都被他忽视了。

除了纠正媒体的错误，梅和泰勒在通用电视台上也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做了宣传。这首皇后乐队最负盛名的单曲现在重新发行，所有收益将捐给特伦斯·希金斯信托基金。它一举冲到榜首，并为艾滋病慈善机构筹到100万英镑的善款。不久后，皇后乐队有十张录音室专辑也将重返英国前一百名。

在美国，有人猜测好莱坞唱片公司在签下皇后乐队之前已经得知莫

库里的情况。1996年出版的布鲁斯·哈林所著的《唱片的小道新闻：音乐行业那些无情的日与夜》（*Off the Record: Ruthless Days and Reckless Nights Inside the Music Industry*）一书中，提到当时好莱坞唱片公司的总裁彼得·帕特诺承认，他听说了有关莫库里健康状况的传言，但他坚持说吉姆·比齐从未直接告诉他弗雷迪生病的信息。“他（比齐）说莫库里不会去巡演，他说得很清楚，皇后乐队不搞巡演，”帕特诺说，“说实话，我觉得曲目很不错。于是我就拍板说：‘好，音乐上我很有信心，而且无外乎两种可能性：要么他没有生病，如果是这种情况，也许我能说服他们再去巡演，我也可以卖出更多唱片；要么他真的病得很重，有可能死的那种。’这两种情况的风险我都愿意承担。”

从1991年2月起，好莱坞唱片开始将皇后乐队的曲目全部制作成CD发行，他们需要卖出二百七十万张皇后乐队专辑，才能打平1000万美元的投入。到年末莫库里去世的时候，他们已经目标在望，售出一百一十万张。帕特诺告诉布鲁斯·哈林：“他死后，销量立刻猛增，我们很清楚在三年之内就可以回本。”

1991年圣诞节，乐队再创佳绩，虽然此时无人欢庆。《波西米亚狂想曲》单曲和《皇后乐队最佳金曲II》专辑都拿到了第一名。很快地，单曲的B面——那首感伤的《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在电台里被播放的次数甚至超过了A面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的内容，比那一次次重复的“Bismillah”和“Galileo”更适合当下的情况。“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泰勒回忆道，“我们根本没有心思关注唱片卖得怎么样。”

对弗雷迪·莫库里的朋友和雇员来说，这一年的年底，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发生改变。哈顿、法内利和弗里斯通都被莫库里在遗嘱中铭记，每人获得税后50万英镑的资产，莫库里的司机特瑞·吉丁斯也获得了10万英镑。此外莫库里还为法内利买了房子，为哈顿在爱尔兰买了一块地。作为园丁和爱人，哈顿和莫库里的关系已经持续了五年多，但他一直知道，绝大部分遗产都会留给玛丽·奥斯汀。

最后，玛丽继承了花园小舍，以及莫库里50%的财产（估值超过1000万英镑）加上未来的版权收入。剩下的一半财产，由莫库里的父母和妹妹平分。当初，有人告诉哈顿，莫库里希望他们三个伙伴能够随心所欲地待在花园小舍。然而莫库里似乎在遗嘱里忽略了这件事。玛丽继承这所房子后，要求哈顿和其他人离开。

彼得·弗里斯通成了一名护工，并短暂地进入酒店行业，后来成为

皇后乐队粉丝俱乐部大会的常驻嘉宾。莫库里死后七年，他出版了一本私人回忆录《谁愿永生：弗雷迪·莫库里传》，记录为这位歌手贴身工作的经历。乔·法内利回到美国，1992年死于艾滋病。这种疾病还会夺走许多莫库里的朋友、前任和同伴的生命。吉姆·哈顿搬回爱尔兰，199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书《莫库里和我》（*Mercury and Me*）。书中对莫库里的逝去进行了十分戏剧化的描述，并不无微词地提及了玛丽·奥斯汀、戴夫·克拉克、吉姆·比齐等核心圈的人。最后哈顿坚持说，莫库里从未同意将他的疾病公之于众。归根究底，吉姆的经历似乎再次验证了与莫库里建立关系的不可能性，哈顿是那个陪伴莫库里生命最后几年的人，却仍然无法与爱人的前女友相抗衡。不过，虽然他在1990年也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但得益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进步，莫库里和法内利没能挺过去，他却幸存下来。哈顿于2010年元旦死于肺癌。

1992年，玛丽·奥斯汀带着两个幼子搬进了富丽堂皇的新家，同时搬进去的还有她的男友，室内设计师皮尔斯·卡梅伦。但是她和莫库里之间的感情，以及莫库里是她的长子教父的事实，让她与卡梅伦的感情无法持续，最终两人分手。花园小舍中莫库里的卧室，她保持原样长达五年时间。“我失去了心中永恒的爱人，”奥斯汀告诉记者大卫·维格，“弗雷迪死后，我觉得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婚姻。我们履行了誓言，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弗雷迪死亡，才能放开手。就算如此，也很艰难。”

对于皇后乐队的其他人来说，没有莫库里他们也同样举步维艰。在接受通用电视台采访时，梅和泰勒曾谈到“举办某种活动”来向主唱致敬。1992年2月，他们因为《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获得英国唱片工业大奖，在颁奖礼上发表了官方声明。“致敬弗雷迪·莫库里：提高抗艾滋病意识慈善演唱会”将于4月20日在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皇后乐队的剩余成员将与众多客座音乐家和歌手合作表演。这场盛事放出七万两千张门票，仅在六小时内便全部售完。

3月份，彩排在牧羊林区进行。皇后乐队三人组，加上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与上台合奏的团队共同排练，包括迈克·莫兰和黑色安息日乐队的吉他手托尼·艾奥米。如今角色发生了奇特的转变，梅、泰勒和迪肯三人集体变成了“鲍勃·格尔多夫”，他们为演出招募客串歌手，就像当年格尔多夫招募皇后乐队参加‘拯救生命’那样。不久后，上过‘拯救生命’的明星如艾尔顿·约翰、大卫·鲍伊、罗杰·达特雷和罗伯特·普兰特，以及格尔多夫本人，都表示会参加这场演出。

莫库里早年敬重的歌手、同时代的对手业已现身，那些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年轻一代也纷纷加入，包括硬摇滚乐队威豹乐队、金属乐队^[2]、极端乐队^[3]和枪炮与玫瑰乐队。几周过去，演出阵容继续扩大，乔治·迈克尔、希尔、丽莎·斯坦斯菲尔德、安妮·蓝妮克丝、莱莎·明奈利.....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演唱的皇后乐队歌曲，但如泰勒所说，“我们认为合适的做法是不能有人唱《又一个人倒下》，因为.....歌词也太不对劲了。”与‘拯救生命’类似，这场演唱会将在全世界七十六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现场直播。皇后乐队仍然处于悲伤的哀悼中，这场演出能让他们稍稍分散情绪。“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的说服力和通过电话煽动人的能力都投入进去组织这场演出，”梅承认说，“那三个月对我来说是好的，可以让我暂时忘记去想我今后该怎么办。”

“弗雷迪会说：‘亲爱的，在温布利体育场？你确定那里够大吗？’”罗杰·泰勒开玩笑说。那一天，体育场里离舞台最远的一层都挤满了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的是忠实的皇后乐队歌迷，也有的是好奇的旁观者，还有那些自‘拯救生命’以来，每当有重大音乐表演，无论是麦当娜、皇后乐队还是斯普林斯汀，都会蜂拥而至的人们。

皇后乐队剩余的三位成员昂首上台，迎接他们的是雷鸣般的掌声。“今天我们聚集于此，颂扬我们独一无二的弗雷迪·莫库里的人生、成就和梦想。”布莱恩·梅宣布。鼓手罗杰·泰勒发型入时，戴着墨镜，身穿拉风的长礼服。这两位从微笑乐队坚持至今的成员看起来浑身上下都是摇滚巨星的样子。相比之下，约翰·迪肯看起来更像即将退休的明星——他的头发剪短了，衣着也很普通。终于到他说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安静而低调。

表演由金属乐队打头阵，他们以最新发布的专辑《黑色传记》（*Black Album*）中的三首金曲燃爆开场。这张重金属唱片在大洋两岸都取得冠军销量，吸引了许多非核心金属粉丝的听众群体。作为一个偏英伦风的摇滚乐队，金属乐队非常熟悉皇后乐队的专辑，比如《绝对心脏暴击》。而他们也正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摇滚乐队之一的路上。莫库里是不是喜欢他们的歌曲不好说，但是金属乐队出现在电视里，对收视率来说有极大的好处。

当天首先翻唱皇后乐队歌曲的是第二个上场的极端乐队。和金属乐队一样，这支来自波士顿的乐队也吸引了一批流行音乐听众。他们的音乐受皇后乐队的很大影响，从他们表演的《活出精彩》和《自行车赛》歌曲串烧中就能看出来。主唱加里·查隆大胆地以一段《穆斯塔法》中

的唱段开始，这是莫库里在《爵士》专辑中混合着部分阿拉伯语的声乐盛宴。

布莱恩·梅是皇后乐队中第一个上台表演的，他冲上舞台，加入威豹乐队，精准地演绎了原版《我既在此》。接着，曾被U2乐队的波诺称为“无脑吞噬大牌摇滚音乐”的搞笑模仿乐队摇滚万万岁乐队上台，模糊了专业和戏仿的界线，为演唱会带来了些许幽默的元素。这支乐队说，他们被要求“将演出歌单的二十五首歌缩短到一首.....”，并开玩笑说“肯定是弗雷迪想这么做”，只是这句话，让人不禁想起自主唱去世后常有耳闻的一些虽无恶意但油腔滑调的陈词。

幕间休息时分，舞台两侧的大屏幕播出莫库里的影像，激起了狂风骤雨般的声浪。演唱会下半场，客串歌手加入皇后乐队，翻唱经典歌曲，贡献了最难忘的时刻。看着罗伯特·普兰特试唱《暗讽》失败是一幅神奇的景象。这位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主唱豁达地面对了这次失利。“复活节期间我去了摩洛哥，我把歌词用胶带贴在我的汽车仪表板上，想要背下来，”他后来说，“弗雷迪以前说他们写这首歌是为了向齐柏林飞艇致敬，但我根本弄不清这些歌词。最后他们给我在舞台地上贴了一大长条写着歌词的纸.....他们好像把这段表演从录像中删掉了。”他们确实是删了。不过，正如普兰特早先就说过的：“所有这些歌，弗雷迪唱的都比我们唱的好。”

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好在观众们沉浸在当天的狂热之中，演唱会的重大意义足以让他们包容那些表现不稳定的歌手。莫库里的音乐是如此独特，连几位老手都被打乱了节奏。彼得·辛斯回归皇后乐队团队，参与了这次致敬演唱会的工作。“这次演出突显了弗雷迪作为一名歌手有多伟大，”他说，“罗杰·达特雷和丽莎·斯坦斯菲尔德唱得还不错。”斯坦斯菲尔德上台时形象醒目，她的头上缠着卷发器，推着一台吸尘器，唱了《我要挣脱一切》。“但有很多人配.....保罗·杨的表演真是可怕。”至少杨在唱《收音机嘎嘎》时，亲身体验了一次眼前成千上万的手臂齐齐鼓掌的盛况。“弗雷迪对自己要求很高，”约翰·布拉夫补充说，“他来唱歌或者做伴唱，一次可能要花三个小时，这还是通常情况。直到别人来做致敬演唱会时，我才明白那么做真的很难。”

随着人群情绪持续高涨，总会有人做出一些过于自我举动。例如大卫·鲍伊。鲍伊和安妮·蓝妮克丝一起唱了《压力之下》，然后和琥珀摩特乐队的伊恩·亨特、米克·隆森一起表演了《所有那些年轻人》（All the Young Dudes），最后以自己的金曲《英雄》（Heros）作为结尾。

好一场精彩的演出。在离开舞台前，鲍伊突然开始了即兴独白：“致我们伟大的朋友弗雷迪·莫库里.....还有你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你的家人们.....那些被这种无情的疾病带走的人们。”

在所有这些张扬的表演中，此举一下子点出了这场演唱会关于生与死的主旨。不过鲍伊后来解释说，“当时那个环境下我觉得自己被感动了。”独白过后，他单膝跪地，开始背诵一段祈祷词。鲍伊后来得意地宣称，摇滚万万岁乐队的人“被震惊到说不出话”。不管如何，后来的录像确实捕捉到了罗杰·泰勒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一向宽厚的布莱恩·梅只是说：“我记得我当时想，他事先说一声就好了。”

就像皇后乐队在‘拯救生命’出尽风头一样，这场致敬演唱会也有一位绝对赢家。在莫库里最后一次接受电台采访时，他说了不少赞扬乔治·迈克尔的话。迈克尔在自己的双人组合威猛乐队解散后，逐渐发展成了一位专业的词曲作家和独立歌手。那天晚上，在伦敦社区福音唱诗班的庞大集体伴唱下，他演唱的《找个人来爱》最接近于莫库里的神韵和活力，抓住了他高超表演技巧的精髓。“乔治·迈克尔的表演是最棒的，”梅表示同意，“他唱《找个人来爱》的时候，声音听起来有种纯粹的弗雷迪的味道。”

“弗雷迪很喜欢乔治·迈克尔的歌《信仰》（Faith），”约翰·布拉夫回忆道，“我记得我在致敬演唱会结束后跟乔治聊过，他说《找个人来爱》这是他一生中唱过的最难的歌。他说，‘太夸张了，一会儿高到这儿，一会又那么低.....’”“我简直是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迈克尔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同时也充满着真正的悲伤。”那个时候，乔治还没有公开出柜。致敬音乐会一年后，他当时的秘密男友死于艾滋引起的疾病。

据说皇后乐队在伦敦的最后一场演出当天，星光熠熠的重要嘉宾席中坐着伊丽莎白·泰勒。在致敬演唱会长长的明星名单中，这位现年六十岁的好莱坞传奇明星也出现其中。她款款走上温布利的舞台，向人群保证“我不是来唱歌的”，开始了她的劝诫。“请使用安全套！”她向人群恳言道，“这个世界需要你活着。”她的演说饱含真情，但在观众听来，即使当中有不少为弗雷迪·莫库里的人生痛哭的直男，这场演讲也有点过于煽情。也许是英国传统的玩世不恭态度，再加上当天消费了数千品脱啤酒导致脑子不清醒，观众的嘘声和笑声在鼓掌时清晰可辨。

对弗雷迪·莫库里圈子里的一些人来说，枪炮与玫瑰乐队的主唱艾

克索·罗斯可能是这场演唱会上不受欢迎的客人。枪炮与玫瑰乐队是一支当代狂躁版的滚石/齐柏林飞艇乐队。但是在他们发布了歌曲《百万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之后，主唱被指责种族歧视和恐同，因为歌词中提到了“移民”和“死基佬”。因此，艾克索·罗斯出现在演出名单中引发争议。他和艾尔顿·约翰并肩走上舞台表演《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更是一番令人惊讶的景象。

“我是艾克索的忠实粉丝，”布莱恩·梅坚持说，“他向人们传达着真实的情感，与各种不同的人分享他的感受。他坦诚地说害怕同性恋的这个事实很有价值，还有他在我们的演唱会上说：‘我来这里既是为了弗雷迪，也因为我觉得艾滋病这个问题会牵涉所有人。’”

艾尔顿也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他在艾克索·罗斯身上找到了这位摇滚明星与自己相匹配的气质。他被毫不客气地从罗斯的化妆室请走，并大声抱怨说：“两个小时后就只得和他合唱了！”但是当晚两人配合得很好；罗斯穿着露脐T恤和皮裙，展示着他可能比有些人想象的更女性化的一面。他像一只热情高涨的小狗在舞台上奔跑时，艾尔顿扮演了稳重的前辈，在歌曲的结尾部分甚至还用胳膊搂住了他。

不过即使是罗斯的皮裙也无法与高亢华美的结尾演出媲美。最佳表演落在演唱会的最后一幕，莱莎·明奈利登台演唱结束曲《我们是冠军》，巧合的是她现在也签在了好莱坞唱片公司。她将这首歌曲唱得如同荡气回肠的百老汇音乐剧，各个年代的摇滚明星全部加入她，组成了临时的松散长发合唱团。明奈利站在前方尽情表演时，罗杰·达特雷、艾克索·罗斯，以及极端乐队、金属乐队和德国重金属乐队蝎子乐队（他们没有表演，但也出场表示支持）的各位成员都出现在她身后，双臂搂着左右人的肩膀：他们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摇摆背景，放眼看去流苏皮革、波点衬衫和开衩的下摆融合为一体。这幅景象正像是弗雷迪·莫库里和皇后乐队的写照：它是简单粗放的重金属摇滚和精致华丽的戏院歌剧的结合体。《泰晤士报》评论家后来写道：“莱莎·明奈利用她精彩的终场表演证明，弗雷迪就是一位穿男装的歌舞女高音。”

不过《泰晤士报》也提问说：“他本人会怎么看？”莫库里深爱的阿瑞莎·富兰克林没有来，不过‘拯救生命’的邀请她也拒绝了，迈克尔·杰克逊也是。至于蒙茨拉特·卡巴耶，这位在莫库里生命最后几年里，对他的音乐有过莫大影响的歌剧演唱家，也因档期问题未能出席。彼得·辛斯坚持认为，有的人来参加是带着他们自己的目的。“我敢打赌当中肯定有人在想，‘这样可以让我的事业回到正轨’，”他叹了口气，“就像

名人版的真人秀《老大哥》一样。”

总之，罗杰·泰勒解释说，这场演唱会本来就是“双重意义的盛会”。它达到了目的：赞颂莫库里的人生和音乐，提高人们对夺走他生命的这种疾病的认知。温布利致敬演唱会及其随后发行的录像带的收益将捐赠给“莫库里凤凰基金会”，这个慈善信托基金会在他去世后一年成立，由梅、泰勒、吉姆·比齐、玛丽·奥斯汀共同担当受托人。

举办温布利演唱会，让皇后乐队的剩余成员保持了几个月全神贯注的忙碌状态。现在他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接下来呢？约翰·迪肯退出公众视野，回归家庭生活；他的妻子维罗妮卡已经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儿子卢克于当年12月出生）。但对梅和泰勒来说，放手并不容易。

4月，凭借《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皇后乐队又将一座“艾弗·诺维洛”奖杯收入囊中，同时梅也因《被你驱动》获得了自己的诺维洛奖。他从1983年就在弄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回到光明》（*Back to Light*）终于接近完成。与此同时，泰勒终于宣告了十字架乐队的结束。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是1991年发布的《蓝岩》（*Blue Rock*），是鼓手在做皇后乐队最后录音的间隙拼凑出来的，他放手由乐队制作，甚至允许队友担任大部分歌曲的主唱。但《蓝岩》只在欧洲大陆发行，没有在英国发行。同时，泰勒与黛比·梁同居后，黛比在1991年3月为他生下了儿子鲁弗斯·泰格。梅总结他们面临的共同情况：“不仅深陷于失去了如此亲近之人的悲痛，整个生活也被突然摧毁。过去二十年来努力建立的一切灰飞烟灭。”艾尔顿·约翰说得更精辟：“对梅、迪肯和泰勒来说，这就像在车库里藏有一辆豪华法拉利，却再也开不了了。”

就在此时，皇后乐队偏偏又火了一把。那年5月，美国青少年喜剧电影《反斗智多星》（*Wayne's World*）极大地助力了皇后乐队在美国的名气上涨。这部电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衍生片，讲述了两位于生活在郊区的摇滚青少年韦恩·坎贝尔和加思·阿尔加的一连串倒霉经历。在一个重要的场景中，两人和两个朋友开着车穿过街区，车里磁带放着《波西米亚狂想曲》。四个人像唱卡拉OK一样全程跟唱，高潮部分疯狂甩头，这个镜头很快风靡全国。

扮演韦恩·坎贝尔的是喜剧演员和作家麦克·梅尔斯，八十年代时曾在伦敦生活。他了解皇后乐队的音乐，也联系过布莱恩·梅，询问是否可以使用《波西米亚狂想曲》。2010年时，梅说：“麦克·梅尔斯当时打

电话给我，寄了一份拷贝来，他说：‘你要确保弗雷迪知悉此事。’那时弗雷迪已经不太好了，我把拷贝交给他，他很喜欢。”主唱希望这首歌在电影中的表现，能够帮助皇后乐队再次打开美国市场。那时他告诉梅：“我觉得我他妈要死上一死，我们才能在美国重获新生。”

结果，《反斗智多星》让美国再次掀起皇后乐队热潮，比弗雷迪之死更甚⁴。《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美国重新发行，达到榜单第二名（单曲收益捐赠给“魔术师”约翰逊的艾滋病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以感染HIV病毒的篮球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命名）。另外发布的一张《皇后乐队经典歌曲》（*Classic Queen*）专辑也随着单曲爬升到第四位。同时，在英国，蒙茨拉特·卡巴耶在欧洲歌剧商会的支持下，于伦敦的白厅举办了一场慈善演出，演唱莫库里最喜爱的歌剧《吟游诗人》。莫库里和卡巴耶的二重唱《巴塞罗那》单曲重新发行，庆祝1992年巴塞罗那主办奥运会，也成了前五名的金曲。

9月，布莱恩·梅发布了专辑《回到光明》。“我只是想自己录制一张唱片，一张没有人和我争论的唱片，看看成果如何。”他解释说。梅的上一张迷你专辑《星星舰队项目》更多是吉他炫技；而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则包含许多更深的思绪。其中一首《尽是忧伤》（*Nothing But Blue*）是写给莫库里的，正好是在他去世前一天晚上完成的；在另一首《我很害怕》（*I'm Scared*）中，梅一口气列出了一大串令他害怕和有不安感的事物。这张专辑在英国排到了前二十名，其中的首支单曲，名为《太多的爱会害死你》（*Too Much Love Will Kill You*）的诚挚情歌，梅在“向莫库里致敬”演唱会上首次表演过，成了排名前五的大热金曲。即将作为乔·科克南美巡演暖场明星的梅，如今面临着担当自己组建的现场表演乐队主唱的挑战。

梅的巡演团队里有斯派克·艾德尼、贝斯手尼尔·默里、吉他手迈克·卡斯韦尔（后来换成了杰米·摩西）和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鼓手科西·鲍威尔，梅担任主音吉他手和主唱。“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弗雷迪——他是大型摇滚演唱会歌手的终极形式，”他解释说，“几年前，我甚至都没想过会尝试当一个乐队的主唱。想想就觉得太吓人了。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巡演中，梅克服了紧张，证明他也能成为一个得力的主唱。巡演倒数第二场演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萨斯菲尔德足球场举行，1981年，皇后乐队曾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阿根廷首场演出。

不过，即使已经不在世，弗雷迪·莫库里似乎仍然会像以前一样发出最强音。梅在巡演的时候，百代推出了《弗雷迪·莫库里特辑》（*The*

Freddie Mercury Album），汇总发行一些他个人歌曲的重新混音版本。这张专辑，以及其中混音版的《独自生活》单曲，让这位已故歌手再次登上英国单曲榜和专辑榜前五名。另一张现场专辑《皇后乐队：温布利演唱会》（*Queen at Wembley Stadium*）则高居第二。圣诞节时，致敬弗雷迪·莫库里演唱会的录像带版本及时发布，微笑乐队也在伦敦大帐篷俱乐部进行了短暂的重聚表演，1992年成了皇后乐队最繁忙的年份之一。

梅需要不停地工作。次年2月，他再次上路。“布莱恩·梅”乐队将进行美国巡演，但一些小剧院的上座率很低。他们被预定为枪炮与玫瑰乐队暖场。尽管梅借此能够在更大的场地表演，但主乐队那位情绪反复无常的主唱可不能保障演出顺利进行。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艾克索·罗斯和音响工程师意外发生争吵，随后罗斯暴怒离开，拒绝完成演出。接下来几天的演出立刻被取消。

巡演重启后，布莱恩·梅乐队在台上经常面对着一排排空着的座位，粉丝们吸着果汁饮料，一边嚼着热狗，一边进进出出。3月份，他们在波士顿冬园演出；皇后乐队曾在这个地方拥有了整座城市。梅说：“二十年来第一次，我必须站到观众面前，仔细展示我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耐心的问题，与我过去习惯的非常非常不同。”布莱恩坚持说，他不想让这些演出变成“皇后乐队的老酒装新瓶”。但他面临的问题，罗伯特·普兰特、米克·贾格尔也曾遇到过：如何摆脱从前那支乐队的光环。《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虽然一些新歌很有吸引力，但还是那些皇后乐队的经典之作，例如《一锤定音》《我既在此》取得的效果最好。”

5月，乐队回到欧洲大陆和英国做主场巡演，在伦敦布里克斯顿学院的两晚演出被录制成一张现场专辑。他们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10月份梅又领着乐队回到了北美，再次开始作为主乐队的巡演。演出之间，他得体地回答着媒体关于弗雷迪·莫库里的问题，同时透露了不少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皇后乐队作为现场巡演乐队的终结，父亲的去世以及第一次婚姻的破裂，都让他“极度精神失常”。他说现场表演是一种“极佳的治愈方式”，不过也不是没有缺点。布莱恩·梅乐队不是皇后乐队，多伦多市中心的丹福思音乐厅⁵也不是枫叶花园，在那里，皇后乐队曾经连续两晚摇滚全场。观众更少，场地更小，甚至更衣室都更简陋……这些经历让人清醒。

弗雷迪·莫库里去世已经一年有余，他与皇后乐队遗留的事业仍将

继续。乐队先是推出了一张包含五首歌曲的迷你专辑《五首现场》（*The Five Live*），有和乔治·迈克尔合唱的《找个人来爱》，这张跑到了榜首位置；莫库里的童年集邮册——也就是当年他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交的第一位英国朋友曾仔细研究过的那套，在苏富比拍卖行以8000英镑的价格售出。印度方面宣布弗雷迪是“第一位亚裔流行巨星”；坦白说，这个名头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承认过。

还有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莫库里留下来的素材足够多，乐队成员已经可以考虑再发行一张皇后乐队的专辑。罗杰·泰勒颇有预见性地称这张尚在沉睡中的专辑为“难产的孩子”。1993年6月，在接受维珍电台采访时，布莱恩·梅告诉DJ理查德·斯金纳说“是有一些素材，但可能不够制作整张专辑”，他承认再做一张皇后乐队的专辑“是我们目前不太能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梅不止一次地坚持说：“没有弗雷迪就没有皇后乐队。”

不过，9月份梅在外巡演时，泰勒和约翰·迪肯在西苏塞克斯郡的考德瑞公园参加了一场慈善演出。新年之后，两人预订了一间录音室，着手筛选皇后乐队剩下的歌曲。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开始往素材中加入鼓和贝斯。这时布莱恩·梅开始参与此事。1994年春天的时候，他说：“仅剩的这些新素材非常珍贵，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是，最后这批音乐是不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皇后乐队的音乐，所以我钻研得非常深。”后来梅承认说：“我从他们（迪肯和泰勒）那里取来了录音带，感觉他们做得不对，于是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它们重新组合。”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次年年初。梅松口了：会再出一张皇后乐队专辑。

1994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听众投票，选出心目中有史以来最佳歌曲一百首，《波西米亚狂想曲》排在第一名。同月，罗杰·泰勒推出一首新的单曲。不过，就算是最死忠的歌迷，也不大可能把这首名为《纳粹1994》（*Nazis 1994*）的歌曲选为最佳一百首。“我觉得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不妨写一些我相信的、有意义的东西，”他解释说，并补充道，“总不能一辈子写流行歌曲。”

《纳粹1994》直指那些犹太大屠杀的否认者，并批判最近兴起的极右政治倾向。虽然立意很好，但因为一些糟糕的歌词，它的质量不佳而且容易被误读。当布莱恩·梅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看法时，他言辞谨慎。“你发出的信号必须明确，”他说，“只要你用了一个像‘纳粹’这样的词，人们的想法就多了。在这个市场上，这种事情不能用太微妙的方式体现。挺遗憾的，罗杰想传递的信息与人们的解读恰恰相反。”

9月份，紧接着单曲，罗杰·泰勒发布了个人专辑《幸福？》（*Happiness?*），所有歌曲全部在自己家中新建的录音室科克福德⁶工坊录制。泰勒在专辑中讨论了许多主题，从法西斯主义到饥饿的穷人，再到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就像布莱恩·梅的《尽是忧伤》一样，《老朋友》（*Old Friends*）一曲也是写给莫库里的。另一首《可敬的默多克先生》（*Dear Mr Murdoch*）是专门数落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的，他手下的《太阳报》向来热衷于挖掘莫库里的私生活。《幸福？》销售情况不错，比十字架乐队的所有专辑都要畅销，促使泰勒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巡演，地点覆盖欧洲大陆、英国和皇后乐队的故地日本。演唱会上，新专辑的歌曲混合着《一种魔力》《收音机嘎嘎》《我要挣脱一切》《我们会震撼你》，恰恰是这些老歌收获的掌声最多。

1995年夏，经历外界了数月的猜测之后，皇后乐队终于宣布即将发行一张新专辑。“不容易，”约翰·迪肯承认说，“罗杰、布莱恩和我的看法不同，我们达成一致需要一些时间。”皇后乐队立刻邀请歌迷俱乐部为这张专辑起名。皇后乐队歌迷俱乐部成立已久，最开始是1973年由罗杰·泰勒在康沃尔郡的老乡帕特·约翰斯顿、苏·约翰斯顿两姐妹组织。1982年至今，俱乐部一直由杰基·史密斯（婚前姓氏为古恩）经营，她与皇后乐队的专家吉姆·詹金斯合著了乐队的半官方传记《皇后乐队：起源》。

最后，众人取了其中一首歌曲的名字，将专辑定名为《来自天堂》。叫这个名字似乎也对应了它感伤的诞生背景。《来自天堂》包含十三首完整的歌曲和一段只有四秒、叫作《对》（*Yeah*）的声音。“它像一张拼图，”梅告诉《Q》杂志，“但是它如果不符合标准的话，我也不会同意发行。”这张拼图取材的范围有十几年，由皇后乐队、大卫·理查兹、贾斯汀-雪莉·史密斯和乔舒亚·J. 麦克雷组成的优秀制作团队拼装完成。最老的歌曲《这是美丽的一天》（*It's a Beautiful Day*）是八十年代《游戏》专辑的遗留物；最新的《母爱》来自莫库里的最后一次录音，稳定的声音发挥让人很难相信竟是出自垂死之人。据说，这首歌结束前的那几秒钟声音，包含了皇后乐队录过的所有歌曲片段的快进。

说到底，莫库里的声音是一切。就算再差的音乐素材也能被他唱出新的感受。莫库里唱了罗杰·泰勒的《凡人的天堂》和梅的新金曲《太多的爱会害死你》，让两个原唱版本都相形见绌。专辑的其他部分归功于乐队成员的和制作人的努力。他们辛苦地把这些素材缝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张连贯的唱片。“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布莱恩·梅承认

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摸索制作这些歌曲的方法，手头只有我们从弗雷迪那里获得的这些有限的材料。有时候全曲只唱过一遍，有时候甚至只唱了三到四句歌词。”梅还分享说：“费了好几个星期我才理顺弗雷迪的声音。最麻烦的是每录一条之后他的那些即兴说话声。”这张专辑结尾还有一首隐藏曲目：一段纯乐器、几乎只有氛围的音乐，收录在CD版本中，长度超过二十二分钟，以莫库里说的一个单字“棒”（Fab）作为结束。封面图片是雕刻家艾琳娜·塞德莱卡所做的弗雷迪雕像的背影，该雕像次年在日内瓦湖畔正式揭幕。由于无法做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视频，皇后乐队委托了英国电影研究所的导演们为每首歌曲制作了短片。

《来自天堂》于1995年11月6日发行。几周后披头士乐队发行了约翰·列侬的遗作《像鸟一样自由》（Free as a Bird），这首歌也是由他的乐队成员和制作人杰夫·林恩在样带基础上补充完成的。《泰晤士报》称这是“死了主唱的乐队之间的竞争”，而且媒体对皇后乐队可没有对披头士乐队那么客气。音乐评论多为负面，《新音乐速递》的话说得最难听：“《来自天堂》俗气、诡异而病态，充满可疑的味道。”它的背景和制作条件，采用的手法，还有如《新音乐速递》所说的“多到发疯的多重音轨录制”让一些评论家感到不满。《Q》杂志写道：“我们不禁要问：皇后乐队在世的成员，他们现在这是什么毫无品味、滥竽充数的招数？”然后说“《来自天堂》比《暗讽》要好一些”。

虽然如此，皇后乐队依然我行我素地增多了营销活动。遗作发行后还不到一周，他们又推出了一套盒装收藏集《终极皇后乐队》（*Ultimate Queen*），装在壁挂式的盒子里，可能是为那些既有钱、家装品味又不怎么样的粉丝准备的吧。除此之外，还有一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制作的皇后乐队的纪录片《世界冠军》（*Champions of the World*），再加一部英国广播电视1台的特别纪录片。此外，还有一件虽然当时基本上没有报道，却展现了皇后乐队远见卓识的事情——他们在11月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网站。

无论批评家和歌迷对《来自天堂》如何疑惑，可以肯定的是，借用“莫库里致敬音乐会”上的摇滚万万岁乐队的话，“这是弗雷迪想要的”。接受德国《滚石》杂志采访时，联合制作人大卫·理查兹说，“如果他（弗雷迪）不是如此渴求这张专辑，他也不会拼命录制这么多歌曲。正是弗雷迪想把这张专辑做完的决心给了我们力量。”布莱恩·梅的说法一致，但态度有所保留。“最后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是我这辈子最

痛苦经历之一，”他告诉广播1台，“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确有过不少争执，但我相信质量是没问题的。这些对身体健康是否有益就是另一回事了。”

《来自天堂》没有让乐队或百代失望。它获得一首榜首冠军金曲，还产生了五首英国榜单前二十名的单曲，尽管其中一首《让我自由》

（Let Me Live，从1983年莫库里随意唱的一小段中变出来的）没有进入英国广播公司1台的播放清单，理由是皇后乐队太老了，不适合新的年轻听众。在美国，《来自天堂》刚刚够到前六十名。布莱恩·梅在1995年说了一些告别的话，表明他计划在没有皇后乐队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经历了二十年反复无常的、每个人的意见都要听的乐队生涯，我觉得我的生活里已经不需要这些了。”事后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没有了皇后乐队的牵挂，几位剩下的乐队成员将回归现实生活。对于约翰·迪肯来说，这个过渡很容易。他膝下又添一子，六儿子卡梅伦出生于制作《来自天堂》期间。当记者问他这段时间在做什么，这位深居简出的贝斯手说，“我主要是在家看孩子”。罗杰·泰勒家里也有了新成员，女儿泰格·莉莉出生于1994年，没多久他就开始为下一张个人专辑写歌。

布莱恩·梅的个人工作有客串节目，为儿童电影配乐，做慈善演出和制作专辑，还有一张向吉米·亨德里克斯、影子乐队、琥珀摩特乐队致敬的专辑.....这张专辑是琥珀摩特乐队的前键盘手摩根·费希尔主动找到梅制作的。“R. E. M乐队和空中铁匠乐队据说也想参与，”他笑称，“但我当时住在日本，没有律师，也没有经理.....所以最终它成了一张日本的琥珀摩特致敬专辑，用的是日本的乐队。那时候布莱恩已经翻唱好了《从孟菲斯一路走来》。我只好写信跟他说，‘你看，对不住啊，这个项目做不成，我只能做一个日本的项目’。特别赞的是，他回信说：‘不管怎样，可以把我的歌放上去。我就算是你的外国特邀乐手吧。’”

八十年代初，费希尔曾与皇后乐队一同做欧洲巡演，之后被告知不再需要他。梅参与致敬专辑可以看成是一种修复友谊的方式。不过，在为摩特乐队已故吉他手米克·隆森举办致敬演唱会的彩排中，费希尔和罗杰·泰勒有碰面，“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谈，”不过，就像梅曾经说

过的，“我总是当好人当过头，我真是个讨好者。弗雷迪从来不会这样。某个小屁孩可能在外面等他五个小时，然后弗雷迪多半会说，‘哎呀，滚开啦，亲爱的，我需要休息。’而我呢，我就是坐在那里当好人，什么东西递到我面前都签的那种人。”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梅在外面接的这些工作里，有一个契机正在悄悄浮现。1991年10月，莫库里去世前一个月，布莱恩曾在塞维利亚举办的“吉他传奇”演唱会上演奏。演唱会尾声的时候，梅和歌手保罗·罗杰斯一起演绎了自由乐队的《现在好了》。两年过去，梅在罗杰斯的专辑《泥水布鲁斯：向泥水乐队致敬》（*Muddy Water Blues: A Tribute to Muddy Waters*）中友情客串。1994年2月，梅也在罗杰斯的伦敦肯特镇场馆的演出中客串，那年夏天他又加入了罗杰斯在蒙特勒的演出。离这二人达成某项固定合作还有一段时间。

1997年1月，皇后乐队三人组自“莫库里致敬演唱会”之后再次公开演出。迪肯、梅、泰勒同艾尔顿·约翰一起，为新芭蕾舞《生命之舞》（*Le Presbytère*）的首演做谢幕表演，这部芭蕾舞的部分灵感就是来自莫库里和他对抗艾滋病的经历。四人在巴黎的夏约宫国家剧院^[4]表演了《精彩必将继续》。这是约翰·迪肯最后一次现场演出。同年，布莱恩·梅因《太多的爱会害死你》再度获得艾弗·诺维洛奖，此时乐队又发布了一张以梅为主导的、名为《摇滚皇后》（*Queen Rocks*）的过往歌曲合辑。“我们想提醒人们，我们一直都是一支摇滚乐队，”他解释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希望人们刚刚买了《皇后II》。”同时迪肯、梅和泰勒一起为合辑录制了一首新歌，《只有你（英年早逝）》（*No One But You [Only The Good Die Young]*），它是专辑中唯一不那么摇滚的深情歌曲，仍然是为了纪念莫库里而作。

梅回到家中，在阿勒顿山的家用录音室完成了一张新的个人专辑。《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于1998年6月发布。它最初的想法是一张翻唱专辑，后来渐渐包含了一些原创歌曲（包括为电视写的歌，以及为格温妮丝·帕特洛的电影《双面情人》[*Sliding Doors*]创作的歌曲《推拉门》），再加上琥珀摩特乐队的《从孟菲斯一路走来》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祈雨愿》（*One Rainy Wish*）。专辑请了特别嘉宾杰夫·贝克、伊恩·亨特，还有崇拜皇后乐队的美国摇滚乐队喷火战机乐队^[4]的鼓手泰勒·霍金斯。就在专辑发布前两个月，梅正在非洲度假，突然得知鼓手科西·鲍威尔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个打击十分沉重。“我经常感到极度抑郁，”他承认，“科西常常能让我精神有所好转。”他重新混音

了《事业》（**Business**），作为对鲍威尔的致敬，在接受《Q》杂志采访时，他厌烦地说“我敢肯定有些人又要骂我在出卖对他的回忆了”。

吻乐队的鼓手埃里克·辛格接替了鲍威尔的位置。那年下半年，布莱恩·梅乐队在英国、欧洲、俄罗斯、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了巡演。

《另一个世界》排到了英国榜单前三十名，主要消费群体是死忠皇后乐队粉丝和狂热的吉他迷。梅说：“老实讲，我很希望有人来跟我说的是，‘我喜欢你的新唱片……它有新东西，很不一样’。而不是，‘你是如何在《歌剧院之夜》里奏出那种吉他效果的？’”

梅发布《另一个世界》后两个月，罗杰·泰勒也重返战场。泰勒从不羞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向曼联球迷协会捐赠了1万英镑，以阻止媒体巨头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接管他们的足球队。天空广播公司的老板正是媒体巨头鲁珀特·默多克，泰勒在自己的歌曲《可敬的默多克先生》中已经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与此同时，他发布了新专辑《电火》（*Electric Fire*），这次矛头指向了懒惰的记者、贪婪的律师和家暴者。音乐风格有硬摇滚、流行、民谣，还有一首翻唱约翰·列侬的《工人阶级英雄》（**Working Class Hero**）。某些歌曲因一家音乐杂志所称的“这位主唱有着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辞藻”令人不快。

《电火》在鼓手家里录音棚搞了一场宣传演唱会，起名叫“赛博谷仓”（**The Cyberbarn**），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它收到了破纪录的59.5万的在线浏览量。次年3月，泰勒在英国再次进行了一次短期巡演，伍尔弗汉普顿的演出上，布莱恩·梅也来了，两人一起表演了《压力之下》。但这张专辑仍然停滞在前五十名之外。泰勒指出：“米克·贾格尔是最顶尖的明星之一，他的个人唱片也卖不动啊。”

《另一个世界》的封底致谢上，写着布莱恩·梅的私人助理朱莉·格洛弗的名字，感谢她的“管理、治疗和日常照料”。在专职为吉他手工作前，朱莉就已经是皇后乐队制作公司的骨干员工。弗雷迪·莫库里去世的消息正是她通知梅的。1999年8月，《星期日镜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布莱恩背着伴侣安妮塔·多布森，与朱莉（“他的迷人小蜜”）有染。当事人全都保持沉默，但格洛弗很快就辞职了。

不久，另一家报纸称，梅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杨木”诊所预定了房间，这家诊所自称是“首家全方位的行为健康和成瘾治疗中心”。原因是所谓的“沉迷于情人安妮塔·多布森”。同样，梅和多布森都未发表评论。不过在近期的采访中，梅坦诚地谈到了自己的情感问题。“在两性

关系上我总是搞砸，”他告诉《魔力》杂志的大卫·托马斯，“我在完全错误的时间结了婚。发生的一切事情中，我努力当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所以我真的无法过狂野淫乱的生活。但是情感上我完全失控，渴求着两个人之间那种强烈吸引、爱和探索的感觉，我变得沉迷于此。”虽然很有启发性，但是读到这位吉他手向一本明星杂志倾吐心声，还是有些奇怪。

“我和抑郁症作过艰苦的斗争，”他告诉《OK》杂志的马丁·汤森，“听起来很傻，因为人们会想，‘真是可悲的有钱人。’但这跟你处于什么阶层并没有关系。”问到他与安妮塔·多布森时好时坏的关系，梅主动爆料：“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和一个不喜欢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人在一起！她喜欢的那些东西我都是被拽着去看的.....整个音乐剧世界都让我身体不适.....现在时不时还会这样。”就像他早先说的“没有弗雷迪就没有皇后乐队”一样，梅对音乐剧的评论迟早也会变的。几年后接受采访时，梅悄悄承认，“杨木”诊所确实帮助他摆脱抑郁症，“陷得太深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请求帮助”。2000年11月，分开几个月后，梅在里士满登记处举行私密仪式，与安妮塔·多布森结婚。

纠缠不清的个人生活之外，这位吉他手似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演出上，只要有人邀请：摩托头乐队、喷火战机乐队、斯派克·艾德尼的摇滚组合、SAS乐队.....百代想办法弄出了一套《皇后乐队最佳金曲III》（*Queen's Greatest Hits III*），挤进了榜单前五名。罗杰·泰勒则惹恼了“一些老古板”，在新的一版千禧年皇家邮政纪念邮票上，他的形象出现在弗雷德·莫库里背后。一位知名集邮家指出：“皇家邮政违反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即除了王室成员以外，任何活着的人都不得出现在邮票上。”其他人则抱怨，作为“享乐主义的同性恋者”，莫库里首先就不该出现在邮票上。

2000年春天，皇后乐队二人组重操旧业，和唱歌跳舞的流行组合5ive一起在全英音乐奖上表演了《我们会震撼你》，激起一片不满之声。一些歌迷哀号说，心中的大神怎么能自降身份，和这种男子偶像团体一起表演。不过，当舞台幕布拉开，干冰的烟雾升腾而起，梅和泰勒在歌曲中间部分突然出现，从这两位乐手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怀念现场演出的刺激的。

由5ive组合和皇后乐队合作的《我们会震撼你》成了那个夏天的榜首金曲，再次把“皇后乐队是不是可以考虑与其他歌手合作”这个问题提上台面。不到一年的时间，5ive组合宣布解散，皇后乐队把注意力转向

了罗比·威廉姆斯，这位从接招乐队40幸存下来的歌手的个人演唱生涯正走得顺风顺水。

威廉姆斯接到邀请，录制《我们是冠军》，作为浪漫动作片《圣战骑士》（*A Knight's Tale*）的原声。“罗比说最好能和皇后乐队一起唱，”梅解释说，“于是，只提前了两天通知我们，然后就被请到录音室里，真的录了——现场收音！只录了四遍。罗比当场唱，东西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很有争议……因为许多皇后乐队粉丝会说，‘啊，他们为什么要和那个从接招出来的人合作？’震惊，可怕！”

这次合作符合皇后乐队长期以来的作风，他们总是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路招致各种非议，不过这次非议的人似乎还包括了约翰·迪肯。2001年4月，迪肯告知《太阳报》：“我不想参与其中，我很庆幸。我听了他们做的东西，简直一塌糊涂。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曲之一，我觉得他们毁了它。我不想出言不逊，但这么说吧，罗比·威廉姆斯不是弗雷迪·莫库里。弗雷迪永远无法被任何人替代——更别说是他。”相应地，前一个月，皇后乐队入驻美国摇滚名人堂，在纽约的典礼上迪肯并未露面。

尽管之前有传闻说威廉姆斯有机会和皇后乐队一起合作，但现在这条线已经戛然而止。2005年5月接受采访时，梅说：“我们坐在那里，灌了不少酒，聊着，想着：‘嗯，说不定能成呢。’但就是从未实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提过和罗比一起去美国巡演的可能，”泰勒说，“我们是认真说的，但情况最终没能凑成。他很年轻，比我们年轻得多……不过，回想起来，也不算是个好主意。”很难让人不去想，是不是就因为约翰·迪肯的公开发声导致了想法的转变。

虽然此时皇后乐队还没有找到新歌手一起巡演，但他们已经找到另一种方法保证音乐的长盛不衰。2001年3月，布莱恩·梅在伦敦首都黄金广播电台说，“我们在做一个音乐剧，本·埃尔顿为我们写了非常精彩的剧本”。这部叫作《我们会震撼你》的音乐剧，其构思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梅和泰勒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遇见了好莱坞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德尼罗自己名下有制片公司翠贝卡（Tribeca），他对皇后乐队做音乐剧的想法很感兴趣。梅解释说，这个想法花了很长时间才实现，因为“一直有各种情节版本修修改改”。经过深思熟虑，最初准备将乐队自传搬上舞台的计划被否决了（梅：“太难为情了”）。然后由本·埃尔顿接手撰写剧本。

埃尔顿以前是喜剧演员，后来成为小说家和导演，他是当红喜剧《黑爵士》（*Blackadder*）的编剧之一。这次他为皇后乐队写了一个原创故事——“发源之地与亚瑟王传奇”那样的——他认为这个故事能够“捕捉皇后乐队的音乐精神”。埃尔顿的故事设定在300年后的未来，地球已经沦为“购物行星”，由“环球软件公司”统治，他们禁止人们使用乐器，打压任何个性、言论自由——当然还有摇滚乐。简而言之：这是一场音乐自由战士和“老大哥”之间的斗争，皇后乐队的众多经典音乐正好可以穿插其中。

2002年5月14日，《我们会震撼你》在伦敦领土剧院隆重首演。该剧立刻取得空前的成功，同时也很快收获一大波恶评，其规模几乎能与过去三十年皇后乐队收获的恶评相当。许多评论人的愤怒是冲着剧本来的，《每日镜报》称其为“本·埃尔顿的可笑故事”。但观众不这么想。2003年8月，这部音乐剧演到了墨尔本，之后又在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巡回演出；11月，它在马德里开唱……到2005年底，《我们会震撼你》已经在拉斯维加斯、莫斯科和科隆演过，并成为领土剧院有史以来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直到2010年，它依然是金牌票房剧，并且还有制作续集的计划。

梅和泰勒抛开种种对音乐剧的疑虑，全心宣传此剧，并时不时在剧中唱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一起上台表演。两人齐心应对着批评（“就是些尖酸的臭记者”），他们还坚信“弗雷迪一定会喜欢的”。就算本·埃尔顿的剧本真如英国《每日邮报》所说，“完全言之无物”，但不难想象，莫库里一定愿意让他的音乐日以继夜地在伦敦西区的新观众面前上演，特别是许多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皇后乐队现场演出的观众。当然，对于那些见证过皇后乐队盛世的人来说，《我们会震撼你》的票可能就没那么好卖。

从参与音乐剧制作，到发行个人专辑，再到双双与年轻流行歌手合作，种种迹象表明，梅和泰勒并不准备安静退隐。2002年6月，白金汉宫举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音乐会，皇后乐队二人组与其他嘉宾同台表演。梅在王宫屋顶上用吉他奏出国歌，开启全场演出。“这是一个象征的时刻——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他说，“因为在我之前，女王的宫殿顶上站一个人演奏这种很吵的乐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也表明，梅和泰勒是需要定期演出的音乐家。

1969年初，弗雷德·保萨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伊林艺术学院一年一度的盛装舞会。这场娱乐活动在位于伊林大街上的哥特式市政厅举行，为舞会伴乐的是布鲁斯摇滚乐队自由乐队，主唱正是声音有着颗粒质感的保罗·罗杰斯。演出结束后，向往发展音乐事业的保萨拉逗留不走，缠着乐队问问题。三十五年后，弗雷德·保拉萨已经不在，保罗·罗杰斯成了皇后乐队的继任主唱。这个消息于2004年12月正式公布。布莱恩·梅说：“皇后乐队好比凤凰，从灰烬中浴火重生。”

起因是三个月前的5月份，在伦敦举行的芬达·斯特拉托卡斯特牌电吉他五十周年庆典演出上，罗杰斯和梅同台合作演出。“我先表示的，”吉他手说，“演出结束后，我们聊着天，保罗的夫人辛西娅（辛西娅·克勒维克，同时也是保罗的经理人）也在，她站在我们中间，来回打量着我俩，说：‘找到感觉了，对不？’我们看着对方说：‘嗯，还真是。’”克勒维克又说他们只欠一个鼓手，梅毫不迟疑地接口说，“这个嘛，我倒是认识一个鼓手……”

几天后，梅把演出视频发给了罗杰·泰勒。两个月后，罗杰斯与梅、泰勒在伦敦哈克尼帝国剧院进行了表演，是一档庆祝皇后乐队入驻英国摇滚名人堂的电视节目。“我们唱了《现在好了》，布莱恩请我唱了《我们会震撼你》和《我们是冠军》，”罗杰斯回忆道，“我们彩排这三首歌的时候，有种大事要发生的感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纷纷起立喝彩鼓掌。”

据罗杰斯说，“伦敦的三场演出”演变成了欧洲巡演。新的三人组被谨慎地称为“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缩写为Q+PR），一起上路的还有老同伴斯派克·艾德尼，布莱恩·梅乐队的吉他手杰米·摩西，以及贝斯手丹尼·米兰达，这一位是美国人，之前一直待在重金属摇滚乐队蓝牡蛎教乐队^[4]。艾德尼是皇后乐队旧日团队里为数不多的留下来的人。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那些“鼓部”“贝斯部”和“吉他部”里与雇主们同吃同住、喝酒玩乐的老部下都已经离开，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盖瑞·史蒂克斯退休不干了，罗杰·泰勒的贴身男秘书克里斯·“水晶”·泰勒去做了景观园艺师，彼得·“阿鼠”·辛斯成了一位摄影师……“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老人参加了保罗·罗杰斯的巡演，”辛斯说，“为皇后乐队工作是一桩好差事，因为你总能参与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他们做的那些事情让其他乐队梦寐以求，而且和他们相处也很有趣。但他们是一个大方的乐队吗？不是。他们会感激下属吗？大多数时候，不会。不过这一点上要感谢布莱恩，我认为他是知道珍惜我们的。布莱恩总是有良心

的。”

2005年3月19日，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组合在开普敦首次亮相，为纳尔逊·曼德拉的“46664抗艾滋病慈善音乐会”第二场进行表演。开场曲是《管好你妈妈》，然后是罗杰斯在自由乐队之后组建的坏伙伴乐队的歌曲《爱不够》（Can't Get Enough），之后是一系列皇后乐队、自由乐队和坏伙伴乐队的歌曲，最后以金曲《现在好了》《我们会震撼你》和《我们是冠军》结束。尽管第一次演出免不了有紧张和错词，但这次演出可以算是为欧洲首次巡演开了个好头。仅一周后，Q+PR在伦敦的布里克斯顿学院开唱，勇敢地面对绝大部分是皇后乐队粉丝俱乐部成员的观众。

梅和泰勒自然很适合演奏自由乐队和坏伙伴乐队的歌曲。自由乐队的《一把呜咽》专辑曾是罗杰当年住在辛克莱尔花园时经常用唱片机播放的音乐。坏伙伴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也是皇后乐队首次美国巡演路上的背景音乐（“弗雷迪喜欢保罗·罗杰斯的声音，”布莱恩·梅说，“但是在录音室里面，如果我尝试让他唱一些布鲁斯的东西，他就要跟我闹。他会说，‘布莱恩，你就是想让我听起来像他妈的保罗·罗杰斯，我做不到！’”）。其实，真正感觉有挑战的是罗杰斯。

保罗·罗杰斯是一个米德尔斯堡码头工人的儿子，他的专长在灵魂乐和布鲁斯音乐，炽热的歌唱风格启发了一代摇滚歌手。此时他五十六岁，年龄正适合，以他的资历和自信，是足以和新组的队友们齐头并进的。“我们不能找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不管他有多好，都不能指望能奏效，”梅说，“和保罗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还有重新诠释过去的方式。”但保罗·罗杰斯不是弗雷迪·莫库里。泰勒指出，“我们成了一个不能使用自己品牌的宣传品”。但是在商业上，“皇后乐队”这个品牌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带来了一些沉重的情感包袱。

为了准备巡演，泰勒雇了一个私人教练开始健身。罗杰斯的身体状况更胜一筹。他是跆拳道黑带，抛弃了年轻时无节制的生活方式，改练瑜伽和健身，而且与几年前相比，他的发际线竟然还神秘地往前移了。保罗转麦克风架的手艺上佳，但他事先放话给《Q》杂志：“我们的表演会充满活力和动感，但不会看到华丽。我不穿披风——可能也不会穿紧身衣。”歌曲表现上，他可以轻松地完成《管好你妈妈》。不过没有了莫库里那夸张妖娆的声线，唱《大屁股妞》和《我要挣脱一切》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舞台表演时，已故主唱的身影会出现在屏幕上，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前奏，罗杰斯只在歌曲的后半段接着唱下

去。弗雷迪·莫库里的灵魂无处不在。

布里克斯顿演出之后，巡演进发至欧洲大陆的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首场演出当天心脏病发作，导致演出被取消（这是皇后乐队的巡演第二次受到教皇的影响）。三天后，在佛罗伦萨，罗杰斯因为喉咙感染，全程大部分时间都只能旁观。

在每一次采访时，梅和泰勒都信誓旦旦地表达着对自由乐队和坏伙伴乐队的喜爱，并坚持说弗雷迪一定会对继任者感到满意。粉丝、评论界和老朋友们对此意见不一。“布莱恩喜欢弹吉他，喜欢有观众，罗杰喜欢当流行明星，保罗·罗杰斯则是自由乐队和坏伙伴乐队的绝佳主唱，”彼得·辛斯评论道，“这个组合很体面，编排得也很好，但有种拉斯维加斯般的虚幻感。”“很多人对这件事十分愤怒，但我认为他们没有想到重点，”布莱恩说，“弗雷迪自己就很喜欢故意挑事端——他对此多半会说，‘搞起来啊。’”而且梅透露说，他已经写信给莫库里的母亲，请求并获得了她的支持。泰勒指出，他们有邀请约翰·迪肯参加，但被他拒绝了。“他决定归隐——我尊重这一点，”罗杰说，“我想他更脆弱一些，也没有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艰难和混乱的生活。他选择不再经受这一切带来的压力。”

不过，对于罗杰斯来说，每一次采访都避不开的是提到他的前任主唱。“我的脑海里想都没有想过要取代弗雷迪·莫库里。”他说，并表示说他也希望“布莱恩·梅成为（自由乐队的吉他手）保罗·科索夫”。罗杰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他加入了前齐柏林飞艇吉他手吉米·佩奇的乐队公司乐队^[12]，也常常被问到“成为新罗伯特·普兰特”是什么感觉。谈到皇后乐队时，罗杰斯说他记得曾在管理层办公室的楼梯上遇到过他们；坏伙伴乐队的经理彼得·格兰特曾经有意管理皇后乐队。另外，他佩服莫库里停止服药的决定（“那真是有勇气”），并对皇后乐队的音乐大加赞扬（“他们几乎已经达到了披头士乐队的高度”）。但罗杰斯很快也表明，他还有个人事业要发展。

离开皇后乐队这架大机器需要一点时间。Q+PR欧洲巡演之后，接着又是英国的八场体育馆演唱会。7月，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组合将在伦敦海德公园演出，同台的还有多位英国的华丽摇滚明星和皇后乐队的歌迷黑暗乐队^[13]，后来因担心恐怖袭击推迟了一周举行。布莱恩·梅透露，约翰·迪肯本来会来参加演唱会，不过只是出席观看。“约翰给了我们永久的祝福，”泰勒说，“但你也可以说约翰在保守他的秘密……我也

不晓得他现在有什么秘密。”泰勒的玩笑话也许是意有所指，因为最近迪肯突然又被媒体曝光。1月份，《每日邮件》披露说，这位贝斯手与一名在伦敦脱衣舞俱乐部认识的二十五岁舞女爆出婚外情。“弗雷迪死后他就患上了抑郁症，”一位老朋友透露说，“我不确定他此生还能不能迈过这道坎。”自然，迪肯迪肯拒绝回应这些传言。

即使保罗·罗杰斯依然有回归个人职业生涯的打算，但相关计划在2005年余下的时间里都不得不搁置。10月份，Q+PR在美国有三场演唱会，包括好莱坞碗剧院^[14]，演出票全部售罄。这是自1982年以来，他们再次以皇后乐队的名字举办美国巡演。比利·斯奎尔作为上次巡演的老朋友和暖场嘉宾，出现在观众席上。“保罗·罗杰斯是史上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而且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目标最终还是无法企及。这是一种没有胜算的局面，因为没有人能取代弗雷迪，而且弗雷迪作为皇后乐队的一部分实在太重要，根本无法重现。”

与此同时，百代的前老总鲍勃·默瑟却感受到，虽然莫库里不在了，乐队却几乎没有变过。1978年的万圣节，默瑟曾经陪伴皇后乐队的诸位在新奥尔良地区度过了狂欢之夜。但皇后乐队永远都那么注重礼节。“他们以前总叫我‘默瑟先生’，天知道什么原因，”他笑着说，“和他们共事多年后，我到好莱坞碗剧院去看他们和保罗·罗杰斯的演出，在马尔蒙城堡酒店的电梯里偶遇布莱恩·梅……你知道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噢，你好啊，默瑟先生。’”

在三场演出票均售罄的激励下，第二年春天Q+PR再次回到美国，巡演场次增加到二十三场。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卖得很好，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州，在那些地方皇后乐队的人气一直不高。Q+PR的现场专辑和DVD《冠军归来》（*Return of the Champions*）让他们获得了英国的前二十名，但在美国却名次不佳。虽然有种种挫折，组合成员之间似乎真的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在这次巡演结束的时候更是迈向高潮。“最后一场演出是在温哥华，”罗杰斯说，“通常到最后，巡演团队都想着回家，但我们却没有。那晚上的表现让我们觉得是整个巡演中最好的。全场同心协力，酣畅淋漓。我们演完之后全部转过身说：‘我们得一起做点别的什么。’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进录音室。”

“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致敬乐队，”罗杰·泰勒坚持说，“我不想让这事看起来成了老歌翻唱。”2008年的夏天，这位皇后乐队的鼓手在采访

中娓娓道来皇后乐队过去的起起落落：他不愿多提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游乐》，盛赞《游戏》，回忆起新奥尔良和慕尼黑的年少轻狂时一阵坏笑。现在，他已经准备好谈论皇后乐队的未来。“假如我们要继续下去，”他说，“就要演奏一些全新的东西。”2008年9月5日，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公布了这件“新东西”是什么。《宇宙摇滚》（*The Cosmos Rocks*），一张自《暗讽》之后再次使用皇后乐队名字发行、具备全新素材的录音室专辑。以皇后乐队出专辑的一贯作风，将它整合出品终究是不容易的。

罗杰斯和皇后乐队的巡演刚刚结束，他就立马开始了自己的演出行程。同时，布莱恩·梅写完了《大爆炸：宇宙通史》（*Bang!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一本和天体物理学家克里斯·林陶特和天文学家帕特里克·摩尔爵士合著的书籍（“哇！一个了解星星的摇滚巨星”，一篇评论赞叹道）。在摩尔的鼓励下，梅重返帝国理工学院，花了九个月的时间重拾科学研究，完成了三十多年前搁置的博士论文。

“所有的笔记我都留着，”他对《泰晤士报》说，“我到阁楼上找出来就行，所以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第二年夏季学期结束时，梅拿到了博士学位，坐实世界上学历最高的摇滚明星的地位。“布莱恩还能够回去完成学位，真的令我无比吃惊，”他的老同学戴夫·迪洛威说，“在摇滚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还能保持一个未受磨损的大脑实在是了了不起。我们一起晚饭时，他真的有试着向我解释什么电波速度和宇宙尘埃，我跟他说，‘对不起，布莱恩，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在他拿到学位前的2007年夏天，梅、泰勒和罗杰斯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专心在泰勒家里的录音室准备新专辑。《宇宙摇滚》和其他皇后乐队专辑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约翰·迪肯。他有被邀请吗？“就算打电话给他，也不一定能得到答复，”泰勒说，“他成了一个隐士。”“除了皇后乐队的会计，迪肯不再跟任何人联系，”一个匿名消息来源透露，“他只想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打高尔夫球。”所以专辑中的贝斯由梅和罗杰斯演奏。

2008年4月，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在阿尔·默里的“欢乐时光”（*Happy Hour*）节目中公布了专辑封面，这是一个由喜剧演员默里以“酒吧老板”的身份主持的电视聊天节目。这三个人出现在默里的“绿房间”的景象，可能会让只认皇后乐队的老粉丝们感到不快，而梅告诉主持人，“我们会表演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在节目上表演了新单曲《“名”人》（*C-lebrity*），虽然此曲还有四个月才发布。这首歌有令人

眩晕的重金属连复，听起来像自由乐队和早期皇后乐队的混合体，歌词讽刺了浮夸的二十一世纪名人文化，有种瓮中捉鳖的感觉。当乐队开始弹《现在好了》时，即使“酒吧老板”在高声伴唱，观众们似乎也都松了一口气。

8月，《“名”人》以单曲形式发布。“它是关于出名的风气，”泰勒解释说，歌词是他写的，“那种急切地想要在电视上露脸的渴望。”在一个充斥着垃圾真人秀节目的世界里，泰勒的观点很有意义。不过他在《经典摇滚》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世上有这么多出名且没用的人，我很生气”，听起来有点暴躁。《“名”人》排到了三十三名，之后便消失在榜单。由于单曲市场正处于衰退晚期，这也不算什么大的冲击。还有整张专辑没发呢.....

被问及制作《宇宙摇滚》的过程，罗杰斯向他的新乐队成员表示敬意，他描述了作为外来人在皇后乐队中工作的体验。“布莱恩在和弦方面是个天才，”他说，“他会告诉我们说他想到一个和弦，拉着我们进录音室，然后音乐顺着就做出来了。就好像他把整段旋律都在脑子里写好了。”同时泰勒信心十足：“我们知道有些人会抱怨说，‘啊，都没有弗雷迪！’当然没有他了，你是不是傻。如果这些人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因为我们还活着。”另一方面，一贯谨慎的梅告诉《魔力》杂志，在制作专辑的时候“是有一些争论，我们大家需要出去喝几杯冷静冷静”。

《宇宙摇滚》听下来是一张奇怪的不痛不痒的摇滚专辑。歌曲《这不是真的》（Say It's Not True）已经在Q+PR巡演中唱过，2007年它的现场版免费开放下载。它是那种华丽悠扬的歌谣，正是皇后乐队早年成名的音乐风格。《冲上浪尖（放学了）》（Surf's Up [School's Out]）则是经典的罗杰·泰勒式的摇滚乐，虽然它似乎比《宇宙摇滚》平庸的开场曲《摇滚宇宙》（Cosmos Rockin）更好，但由于排在专辑比较后面，遭到埋没。另一个如同《我们会震撼你》当中的“嘞——嘞——嘞”节奏一般勾起往日美好回忆的，是歌曲《仍在燃烧》（Still Burnin）。

还有罗杰斯在他的个人巡回演出中已经唱过的歌曲：《战士（和平祈愿者）》（Warboys [A Prayer For Peace]）和坏伙伴乐队的致敬歌曲《巫毒》（Voodoo）。这些歌听起来，有保罗·罗杰斯的歌声，有布莱恩·梅的吉他，有罗杰·泰勒在打鼓，但就是不像皇后乐队。这个名字再次成为症结所在。甚至罗杰斯也有疑虑：“和其他人一样，专辑署名成

皇后乐队我也有点保留意见。起初我以为我们会用‘梅，泰勒，罗杰斯’，就像‘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组合^[15]那样.....”问题就在于，皇后乐队的专辑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地方——白人放克、福音、迪斯科、拉格泰姆爵士——无论某些歌迷甚至乐队其他成员是不是喜欢它们。《宇宙摇滚》就少了这种出乎预料的东西。泰勒说“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还活着”是发自内心的和真诚的。但他和梅都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的过去竞争。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它（《宇宙摇滚》）哼哼一声就没了。”泰勒说。然而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这张专辑在英国排行榜上停留了两周时间，最高的时候排到第五，之后就逐渐下滑。在欧洲的成绩也差不多，它在德国、荷兰和法国都进了前十（在爱沙尼亚甚至达到了第2名），然后便消失了。在美国，它勉强升至第四十七位，至少比《来自天堂》的成绩好一点。但无法成为真正回归市场的重磅专辑。

昨日重现的不仅仅是排行榜。媒体方面，评论从《魔力》有所保留的好评（“少了弗雷迪的华丽，这张专辑倒是一张直截了当的重金属摇滚”），到《卫报》的责难：《宇宙摇滚》虽然差，但差不过《我们会震撼你》音乐剧。但这当中也有百代宣传不力的因素。那个时间，百代公司与许多唱片业同行一样，处于动荡的状态。百代于2007年被私募股本公司“泰丰资本”收购；这件事导致保罗·麦卡特尼离开百代以示抗议。一年后，在百代担任首席执行官长达二十五年的托尼·沃兹华斯也紧随其后离开。皇后乐队的新唱片似乎在这些变故中被忽视了。“我认为唱片公司为我们这张专辑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太糟糕了。”泰勒后来抱怨道。

《“名”人》之后就没有了后续单曲，也没有电视宣传。这种情况下，乐队便转向他们擅长做的事情——巡回演出。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将进行三个月的巡演，场地遍布欧洲各地体育馆。《宇宙摇滚》里的歌曲被加到标准演出歌单中。罗杰斯勇敢地告诉媒体，《绝代艳后》是为数不多的他们无法唱的皇后乐队歌曲之一，因为“和声太繁复精准”。而有人认为《又一个人倒下》也加到不唱的单子里比较好。罗杰斯试图要唱出这首歌的气势，但它真的不适合他。也有人注意到，他经常会忘记《收音机嘎嘎》的歌词。不过，现在他们的歌单里既包含自由乐队的《愿好》（Wishing Well），又有坏伙伴乐队的《海鸥》（Seagull），再加上原本就有的《一锤定音》《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一生挚爱》《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样金曲云集的歌单注定会受到观众的欢

迎，即使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组合似乎已经成了他们一直担心的样子：自己的致敬乐队。

11月，巡演前往南半球，在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进行了五场演出。1981年3月8日，皇后乐队的第一场南美洲演唱会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萨斯菲尔德球场开唱。梅自己的乐队也在这里演出过，但这一次，他们是使用皇后乐队的名义来的。演出很成功，但在阿根廷电视台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的提问似乎只冲着归来的英雄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没有顾上保罗·罗杰斯。“弗雷迪也会选保罗来和我们一起唱歌的，”布莱恩·梅告诉一位电视记者，“他肯定会笑.....我觉得他正在笑呢。”泰勒心照不宣地笑着补充道：“弗雷迪之前在这里过得很开心，看到我们回到这里他一定会很高兴.....”“他最会说段子了，弗雷迪.....”梅插嘴说。此刻他们的新主唱就在一步之遥的地方，但是这两人的表情和话语，却完全沉浸在对那位缺席的朋友的怀念之中.....

莫库里曾经说过：“我们会继续前进，直到我们当中有人死掉，或者被替换掉。我觉得要是我突然离开的话，他们会有替代我的机制的。”他大笑，接着说：“要想替代我，可没那么容易哦。”也许根本是无可取代。南美之行结束时，有传言说皇后乐队+保罗·罗杰斯将到此收场。“也不知道这个想法哪儿来的，”布莱恩·梅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我们只是需要休息一下。”然而，到2009年4月，罗杰斯告诉《公告栏》杂志，他在皇后乐队的任期已经结束。他坚称这是一次友好的分手。现在他将进入下一个重启计划，与坏伙伴乐队重聚。“本来就不是永久性的安排，”他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Q+PR巡演之前，布莱恩·梅承认说：“我也想过，‘干吗不待在家里享清福呢？’但我就是做这个的，谁知道我们还能做多久呢？”不过，回到家里，梅还有许多非音乐的新项目要做。他的下一本书《寻找失落的村庄》（*A Village Lost and Found*）即将出版。这本书与文物保护学者埃琳娜·维达尔合著，探索十九世纪摄影师、立体成像专家T. R. 威廉姆斯的作品。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位吉他手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和辨认威廉姆斯镜头下许多照片中的村庄所在。这是一桩很辛苦且全凭热情的差事。媒体对这位摇滚明星如此不摇滚的爱好感到惊奇，但对那些知道梅的工作方法的人来说，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当年的音响工程师盖瑞·兰根回忆道：“我这儿就有布莱恩·梅花一整个星期研究一段吉他独奏的故事。”

除了做皇后乐队和搞科学研究之外，这位素食主义者还忙着反对猎狐和扑杀獾的运动，在他的网站上长篇大论地炮轰各种议员、记者，阐述他的观点，这些评述文章都很有趣，有时也让人忍俊不禁。（“我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是我决定以后我的吉他皮带再也不用真皮了。”）

2009年11月，他们发布了全新包装制作的《皇后乐队：绝对金曲》（*Queen's Absolute Greatest*），附加一张特别唱片，是梅和泰勒伴着歌曲的品评录音。作为评论员的二人睿智幽默，不时自嘲。手中酒杯里的冰块轻轻碰撞出声，他们品着酒，慢慢分享着有关弗雷迪·莫库里的美好回忆，和这一路走来发生的许多波折。

就如过去自相矛盾一样，这对搭档似乎已经忘记上一首单曲《“名”人》中讽刺的主题了，他们出现在电视真人秀音乐节目《X因素》（*X-Factor*）和它的美国同类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上。“对这种节目我并不是都很乐观，”梅回应道，“但它们毫无疑问为真正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扇门。”在《美国偶像》中，他们和决赛选手一起表演了《我们是冠军》。但最终屈居亚军的亚当·兰伯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非常杰出的歌手，”泰勒说，“我们愿意和他合作。”外界猜测，年仅二十七岁的兰伯特可能将成为皇后乐队的下一任主唱，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16]同时，随着首首金曲的热门音乐剧《我们会震撼你》在世界各地开始巡演，梅和泰勒自己也在不辞辛劳地奔走宣传。2010年夏，在合作三十九年后，皇后乐队脱离百代唱片公司。全球专辑销量累积3亿张，又有大量作品在手，种种迹象表明，到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皇后乐队将继续度过一个高人气和高收益的2011年。

1964年春天，弗罗可·保萨拉与家人从桑给巴尔来到西伦敦郊区的费尔特姆。将近四十五年后的2009年冬天，皇后乐队的粉丝、好奇的当地人，以及弗雷迪·莫库里的母亲婕尔·保萨拉和布莱恩·梅齐聚在费尔特姆的一座购物中心广场，为弗雷迪·莫库里举办纪念地揭幕仪式。

此情此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却又奇怪地合适。纪念牌匾绘制着白色、黄色、红色和黑色图形，中间是一颗金色的星星，镶嵌在这方不知名的地面上，既是为了纪念这位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摇滚明星之一，同时也提醒着人们，他出身于多么普通平凡、远离城市中心的生活背景。纪念牌匾是弗罗可·保萨拉在费尔特姆生活过四年的证明，在那之后，他

便挣脱藩篱，浪迹天涯，逗留于伦敦的房屋和公寓中，将弗罗可、甚至是弗雷德·保萨拉留在身后，最终成了牌匾上那个大写字母写就的“弗雷迪·莫库里，音乐家、歌手和作曲者”。

“弗雷迪，你一生逐梦。”布莱恩·梅在仪式上说。通过莫库里，梅和皇后乐队的其他人也追寻到了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前辈和同时期乐队，但凡经历失去如此重要成员的，都无法再存活下去，皇后乐队却顽强地坚持着，他们就是如此卓尔不群又生机勃勃的乐队。

“我们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罗杰·泰勒最近说，“皇后乐队还活在布莱恩和我的身上。我们将竭尽所能。”坚毅勇敢的二人毫无停歇的迹象，他们仍在和其他摇滚明星、选秀节目出身的新星以及他们自己的全球音乐剧剧组合作。只要有人还在掌舵，二十一世纪的皇后乐队巨擘将继续摇滚。

[1] 原文引用话语与实际采访有出入，已按采访视频原话更新。

[2] 英文名为“Metallica”。

[3] 英文名为“Extreme”。

[4] 后来，皇后乐队特地邀请麦克·梅尔斯客串了弗雷迪·莫库里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他的台词巧妙地致敬了当年的《反斗智多星》。

[5] 英文名为“The Danforth Music Hall”。

[6] 英文名为“Cosford Mill”。

[7] 英文名为“Aerosmith”。

[8] 原文名为“Théâtre National de Chaillot”。

[9] 英文名为“Foo Fighters”。

[10] 英文名为“Take That”。

[11] 英文名为“Blue Öyster Cult”。

[12] 英文名为“The Firm”。

[13] 英文名为“The Darkness”。罗杰·泰勒之子鲁弗斯·泰格·泰勒为该乐队的现任鼓手。

[14] 英文名为“Hollywood Bowl”。

[15] 由几位从不同乐队出来的民谣摇滚界歌手单独组成的超级团，组合名直接用了他们的姓氏。后来尼尔·杨亦有加入。

[16] 2011年起，布莱恩·梅、罗杰·泰勒与亚当·兰伯特以“皇后乐队+亚当·兰伯特”的组合形式开始现场表演，2012年走上巡演道路，从欧洲到世界各地，这场合作关系已经持续了超过八

年，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6年9月26日，他们首次来到上海举办演唱会。

致谢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克莱尔和儿子马修，有太多周末没有好好陪你们；感谢奥朗出版社（Aurum Press）永远耐心的编辑格雷厄姆·科斯特，以及其他同事，尤其是露西·史密斯在图片搜集上的帮助；感谢我的代理人鲁伯特·希斯，以及其他共事者和朋友，包括菲尔·亚历山大、马丁·阿斯顿、戴夫·布罗兰、戴夫·艾弗里、帕特·吉尔伯特、马克·霍德金森、戴夫·林、克里斯·尼兹和彼得·马克沃斯基。

这本书取材于我自己在1998年至2008年间，为《Q》杂志和《魔力》杂志所做的对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的采访，以及其他我采访过，或收集过采访资料的人，包括：约翰·安东尼、马克·艾什顿、朱迪·阿斯特利、路易斯·奥斯汀、马克·伯辛、道格拉斯·博吉、米克·博尔顿、夏洛琳·布歇、约翰·布拉夫、瑞克·卡斯曼、托尼·卡提那尼、克里斯·切斯尼、帕特里克·科诺利、杰夫·丹尼尔、戴夫·迪洛威、瑞克·伊万斯、布莱恩·范宁、菲什、摩根·费希尔、奈杰尔·福斯特、约翰·加纳姆、克里斯蒂安·加斯塔德罗、阿兰·希尔、彼得·辛斯、保罗·亨伯斯通、伊恩·亨特、盖瑞·兰根、杰弗瑞·拉特、莱诺斯·拉维特斯、赖因霍尔德·马克、奥伯莉·莫尔登、马克·莫尔登、弗雷德·曼德尔、艾伦·梅尔、劳瑞·曼斯沃史、鲍勃·默瑟（愿他安息）、巴里·米切尔、阿德里安·莫里希、基思·穆霍兰德、布鲁斯·默里、杰克·内尔森、马丁·内尔森、盖瑞·纽曼、克里斯·奥唐奈、丹尼斯·奥雷根、杰夫·“迪肯”·佩恩、雷·佩尔、瑞克·潘罗斯、格伦·菲密斯特、米克·洛克、史蒂芬·罗森、苏巴希·沙阿、诺曼·谢菲尔德、布莱恩·索萨尔、肯·斯科特、克里斯·史密斯、比利·斯奎尔、雷·斯塔夫、克里斯·史蒂文森、约翰·泰勒、肯·泰斯蒂、理查德·汤普森、安迪·特纳、金斯利·瓦尔德、苏珊·怀特沃尔、特里·耶顿、理查德·杨。衷心感谢所有抽出时间来与我访谈的人。尤其再次致谢：阿德里安·莫里希、戴夫·迪洛威、彼得·辛斯和马克·莫尔登（他的新书《弗雷迪·莫库里：内幕故事》[*Freddie Mercury: From the Inside Out*]即将出版），他们受我所托提供了深度资料。

撰写此书时，大量杂志文章、采访稿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包括《Q》《魔力》《经典摇滚》《原片》《唱片精选》《新音乐速递》《流行音乐周刊》《声音》《唱片与音乐之声》《克利姆杂志》《滚石》。想要了解更多优质皇后乐队的资料，请访问：

www.queenonline.com

www.queenzone.com

www.queenconcerts.com

www.queenarchive.com

www.queencuttings.com

www.brianmay.com

鲁伯特·怀特的博客: [queenincornwall](http://queenincornwall.com)

感谢以上网站提供的帮助。

译后记

2016年9月26日，“皇后乐队+亚当·兰伯特”巡演来到上海，在成军四十五年后，皇后乐队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印下了足迹。作为狂热歌迷的我，演唱会后激动的情绪持续不散，无意中搜到一本英文传记，立刻买书花了五天时间读完。他们的故事简直和音乐一样传奇，令我内心大为震动，迫切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便利用休闲时间对着书自行缩略翻译成文，在网上连载更新。这一译就持续了七个月，坚持做完的时候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洗礼，完成了秘密的致敬。

而我与皇后乐队更深的连接才刚刚开始。就在这年，布莱恩·梅亲自著述的乐队自传《皇后乐队3D图片传记》（*Queen in 3-D*）出版，了解到该书会有多个语言版本后，我大胆地给布莱恩写了一封长信，恳求是否有推出中文版的可能性。三天后，我收到了他本人的回信，优雅、友善且充满鼓励，他肯定了中文版的想法，同时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公开写道，此书将进发中国！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门外汉的我尝试着和布莱恩名下的图书出版公司“伦敦立体图像公司”（The London Stereoscopic Company）的相关人士取得了联系，并开始多方打听国内出版社的意向。由于版权费用等诸多原因，事情到2018年还未有进展，但此间联系的一家出版社告诉我，他们引进了马克·布莱克所著的皇后乐队传记，正是我之前自译过的那一本。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确定作为译者、打开文本译出第一句话开始，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专业领域，再次历经四个音乐家波澜壮阔的人生的同时，也不禁以他们精益求精的原则要求自己。马克·布莱克是资深音乐记者，全篇故事横跨几十年，记载着经典摇滚时代的多样风貌，为了便于理解，在原作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了译注。由于书中散落着大量六十年代至今的名人、乐队、歌曲、杂志等名称，我将乐队名字、地名原文都备在脚注，其他名字在正文中体现，以便需要考据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深入体验。原书完成于2010年皇后乐队即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故传记内容将覆盖到这个时间。在那之后，皇后乐队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今天依然活跃在世界流行乐坛上，他们是不朽的世界冠军。

翻译期间，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理解，谢谢你们在许多日子里，听我倾吐这桩任务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责任；感谢雅众文化的曹雪峰编辑，对我这个没耐心的译者的耐心和包容；感谢皇家丽人的大力帮助和指正，这本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她的功劳；感谢众多皇后乐队粉丝的加油和期待。这本书献给你们。

最后，借用在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饰演弗雷迪·莫库里获得奥斯卡影帝的拉米·马雷克的话：“感谢皇后乐队，感谢你们确保真实和包容存在于音乐中，存在于世界上，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里。”还有，感谢你，弗雷迪·莫库里，你一生逐梦，通过你，我也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我们依然爱你。

席虎牙

2019年3月于上海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美丽的人们
第二章 你体验了吗？
第三章 幸运的巧合
第四章 奇异的颤音
第五章 那帮蠢货们
第六章 秃鹫的胯裆
第七章 嘣——嘣——嚓！
第八章 一山有四虎
第九章 高耸的假胸
第十章 晚安，好梦
第十一章 库藏的名车
致谢
译后记